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李學勤 謝桂華

簡帛研究

二〇〇二
二〇〇三

簡帛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主編簡介

李學勤 1933年生于北京，就讀于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墟文字編合》，1954年起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甲骨學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顧問。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簡論》、《中國青銅器的奧秘》、《東周與秦代文明》、《古文字學初階》、《新出青銅器研究》、《比較考古學隨筆》、《周易經傳溯源》、《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走出疑古時代》、《古文獻論叢》、《四海尋珍》、《綴古集》、《夏商周年代學札記》、《擁莚集》等。

謝桂華 1938年10月生，湖南省新化縣人，1963年8月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同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合著）、《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合著）、《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合著）、《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合著）、《尹灣漢墓簡牘》（合著）、《簡牘研究譯叢》第一、二輯（合譯）、《簡帛研究》第一、二、三輯（共同主編）、《簡帛研究譯叢》第一、二輯（共同主編）；先后發表有關秦漢史及簡牘研究的學術論文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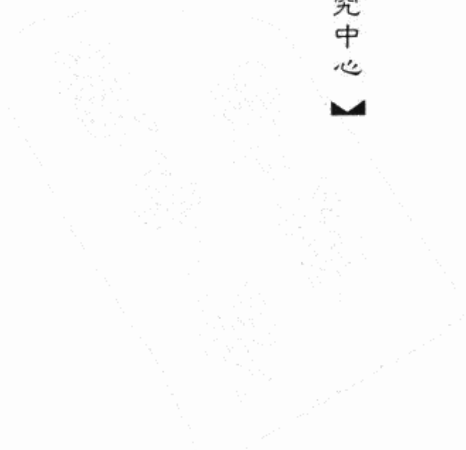


簡帛研究

二〇〇三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李學勤 謝桂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資料

簡帛研究. 2002、2003/李學勤, 謝桂華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6
ISBN 7-5633-5370-4

I. 簡... II. ①李... ②謝... III. ①簡(考古)—研究—文集 ②帛書—研究—文集 IV. K877.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05)第 12391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號 郵政編碼: 541004)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 21.5 字數: 46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2 500 冊 定價: 8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顧問

| | | | | | |
|-----|-----|--------------------|-----|-----|-----|
| 大庭脩 | 田餘慶 | 永田英正 | 何茲全 | 林甘泉 | 徐蘋芳 |
| 張政烺 | 裘錫圭 | 魯惟一(Michael Loewe) | 饒宗頤 | | |

主編

| | |
|-----|------|
| 李學勤 | 謝桂華* |
|-----|------|

編委

| | | | | | |
|------|------|------|------|------|-----|
| 卜憲群 | 汪桂海* | 宋艷萍* | 馬 怡* | 侯旭東 | 孫 曉 |
| 鄔文玲* | 陳松長 | 楊振紅 | 趙平安* | 劉樂賢* | |

(顧問、編委從姓氏筆畫為序排列,加“*”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簡帛研究

選堂題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目 錄

| | |
|---------------------------|------------------------|
| 試釋包山簡中的“筰” | 趙平安(1) |
| 釋包山楚簡或敵宮三字及相關制度 | 羅運環(6) |
| 戰國楚的地方統治體制 | [韓]朴俸柱(13) |
| 包山楚簡所見的“盟” | [日]廣瀨薰雄 著 曹 峰 譯(24) |
| 郭店簡《老子》校記(甲篇) | 何琳儀 程 燕(34) |
| 《老子》中的“損”、“益”說 | 郭梨華(44) |
| 《大一生水》考釋 | [日]谷中信一 著 潘 浩 譯(51) |
| 郭店楚簡札記 | 劉 桓(60) |
| 儒、道兩家的性情論與天道觀 | 彭 林(65) |
| 郭簡“爲父絕君”的服喪意義 | 林素英(74) |
| 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中的“愛親”考 | [韓]李承律 著 曹 峰 譯(86) |
| 上博簡《詩論》與《詩序》詩說異同比較 | 馬銀琴(98) |
| 談談上海博物館楚簡的“舍”字 | 史杰鵬(106) |
| 九店《日書》“相宅”篇釋文校補 | 劉國勝(110) |
| 從秦簡《公車司馬獵律》看秦律的歷史淵源 | 曹旅寧(113) |
|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綜述 | 彭錦華(121) |
| 馬王堆帛書札記四則 | 劉樂賢(128) |
| 古文字學斷代研究的新收穫 | 華學誠(131) |
| 楚帛書伏戲女媧考 | 劉信芳(135) |
| 論述名實的最早出土資料 | 張顯成(144) |
| 簡帛札記 | 李若暉(151) |
| 馬王堆一號漢墓竹簡字詞考釋 | 王貴元(157) |

| | |
|------------------------------|-------------------------|
| 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所見幾個重要概念的研究 | 曹 峰(160) |
|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校讀舉例 | 謝桂華(173) |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 |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177) |
| 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的老年政策 | 宋艷萍 趙根華(196) |
| 孔家坡漢簡中的“徙時”篇 | 李天虹(204) |
| 秦漢郵書管理制度初探 | 高 榮(209) |
| 漢代的都官與離官 | 于振波(221) |
| 國家圖書館所藏漢簡考釋 | 汪桂海(228) |
| 居延漢簡中“無朔簡”年代考釋 | 羅見今(232) |
| 懸泉漢簡《失亡傳信冊》所反映的兩個問題 | 李永平(244) |
| 西漢汝陰侯一號木牘《儒家者言》章題釋文 | 韓自強 韓 朝(248) |
| 再談“神烏傳(賦)” | 饒宗頤(256) |
| 尹灣漢墓遣策札記 | 馬 怡(259) |
| 尹灣簡牘所反映的漢代卒史署曹制度 | 蔡萬進(270) |
| “諸于”考 | 馬 怡(275) |
| 尹灣漢墓簡牘材質與形制的研究 | 周錦屏 劉洪石(280) |
| 宋代永初漢簡的整理和研究 | 陸錫興(284) |
| 關於漢代的避諱 | [日]影山輝國(292) |
| 簡帛發現與《史記》研究 | [日]藤田勝久 著 陳 偉 譯(299) |
| 韓國出土木簡的形制及其內容 | [韓]尹在碩(309) |
| 《額濟納漢簡》即將出版 | 白音查干 特日格樂(318) |
| 銀雀山漢簡出土 30 周年紀念活動掠影 | 郭文鐸(320) |
| 玉門花海出土的《晉律注》 | 張俊民(324) |
| 大庭脩先生的中國簡牘學之路 |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326) |

試釋包山簡中的“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趙平安

湖北荊門包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中，有一個寫得比較特別的字，作

80 號簡

125 號簡

148 號簡

85 號簡

等形，包山楚簡的整理者把它隸作“筴”^[1]，顯然是認為由“竹”和“引”兩部分組成的。

大家都知道，“引”從甲骨文到漢初簡帛文字，都寫作弓形上加一撇^[2]，“象引弓之形”。

如果 𠂔 真是引字，那麼 𠂔 就應當是弓字。可是楚文字中的弓一般作 𠂔，從不寫作 𠂔，因此 𠂔 不可能是引，𠂔 也不應當隸作筴。

看來，這種釋法的錯誤是很明顯的。可能有鑒於此，1993 年湯餘惠在《考古與文物》上撰文，給了它一種新的解釋。他說：

此字下從子省，即子（子、子古本一字，後世分化。詳見拙作《〈說文〉中的省形分化字》，許慎與說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1 年，油印本）。筴從子聲，疑即簡札之本字。子、札古音同屬月部，子與截古音近，古書截、札互通，《釋名·釋天》：“札，截也。氣傷人有如斷截也。”是筴可釋札之旁證。^[3]

本來湯先生是說“疑即簡札之本字”，未敢太過自信。但他的說法一出，影響之大，從者之多，恐怕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平心而論，湯先生之說能讓人信從，自有它的原因。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湯先生的推斷，大致分為三步：

第一步：竽從子，子即予；

第二步：子是竽的聲符，子截古音相近；

第三步：札訓截，子截音相近，竽可訓札。

不難看出，這樣一個論證過程，比起釋竽來，自然要勝出許多。

但如果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它也並不是沒有問題的。

譬如說子截古音雖然很近，但迄今未見通假的例證。而且，即使子截可以通假，也不能因為札訓截，就把竽訓札，因為這中間已經數度“輾轉騰挪”了。

最為重要的是，“札”的本義是“牒”（《說文·木部》），亦即書寫用的小而薄的木片，當文書講是由這一意義引申出來的。我們的調查表明，在先秦時代，札的主要用法除本義外，還有“鎧甲的葉片”，或“疫病”、“災荒”等，絕少表示“文書”的意思。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當“官文書”講則是漢代以後纔有的用法。包山簡是戰國時的材料，以漢之“今”律戰國之“古”，顯然是不够妥當的。

我們認為，這個字應隸作𠄎。

已字戰國文字或作

𠄎 侯馬盟書宗盟類九八：六改字偏旁

𠄎 同上一五六：一改字偏旁

𠄎 楚帛書甲一二祀所從

𠄎 古幣文編一八

𠄎 郭店《緇衣》二〇

𠄎 同上《性自命出》六六

“𠄎”中的“已”，右邊加上了一短劃，是為了字勢的勻稱美觀。這種情況在西周至戰國的文字中都出現過，典型的例子如：

已作𠄎（璽匯 33 40） 𠄎（璽匯 37 67）

祀作𠄎（師遽簋） 𠄎（中山王譽壺）

𠄎作𠄎（璽匯 31 81） 𠄎（璽匯 31 84）

也作𠄎（郭店《成之聞之》一七） 𠄎（同上三〇）

情形與之相類。

由上面的論證，知道 𠄎 可以釋為已，𠄎 可以隸作𠄎。

在上古漢語中，已和己語音相近（同屬之部，聲紐一為齒音，一為牙音），作聲符往往通作。

《說文·支部》：“改，更也。從支己。”郭店簡改一律寫作改，如《緇衣》一六、一七，《尊德義》一、四、五，《六德》一九等，都從已作。

《說文·走部》：“起，能立也。從走，已聲。𠂔，古文起從𠂔。”郭店簡中起寫作𠂔（《老子》甲種三一），又寫作𠂔^[4]（《語叢三》一〇），《汗簡》上之一亦作𠂔。

《說文·女部》：“嬰，說樂也。從女，𠂔聲。”《臣部》：“𠂔，廣臣也。從臣，已聲。”嬰通“己”聲之妃（《說文·女部》）。《太玄·內》：“謹於嬰孰，始於女貞也。”司馬光集注“嬰孰，古妃仇字”。

不僅如此，由於形近，自戰國至漢，己和巳都有寫混的現象。如包山簡的己一般作己（31號、150號等），偶而也作𠂔（79號簡）；居延漢簡中己一般作己，有時也作𠂔（居延圖280）；漢碑中的祀一般作𠂔（孔龢碑），偶而也寫作𠂔（淮源廟碑）。

總之，巳己形音俱近，關係非常密切。

包山簡中的“𠂔”應當讀為記。

記指官方文書。

《戰國策·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笑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鮑彪曰：“記，疏也。”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記，舊時的公文，謂文告。”^[5]

《越絕書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憲遊，博聞強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嘆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而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俞樾《讀越絕書》釋“記”字說：“此古公牘文字，雖未必春秋時格式如此，要亦漢人之遺。”我們認為從上引《戰國策》來看，春秋用“記”表示公文，是完全可能的。

《漢書·張敞傳》：“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資治通鑑·漢宣帝甘露元年》：“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胡三省注：“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

類似的例子在漢代的簡牘中也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要之，從周以降，官文書稱“記”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看出土古文字資料，“記”的出現是比較晚起的事情。《上都府簠》是迄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例子，文中“其眉壽無記”，“記”用為“期”，並不表示官文書的意思。表示官文書的應該另有其字。我們推測這個字可能就是𠂔。𠂔很可能就是表示官文書的“記”的本字。“巳”表音，“竹”表意（“記”書于竹簡，故從竹）。《玉篇·竹部》收“𠂔”字，釋為“簠”，從字形看，它和𠂔似乎有一定的聯繫，但用法不同，不敢遽定，姑存以待考。

把“筮”釋為“記”，包山簡中的相關文例都能講通。

1. 冬祭之月，甲辰之日，少臧之州人冶士石恒訟其州人冶士石臧，言胃傷其弟石臧。既發筮，執勿逸^[6]。沅期馘之，秀夏為聲。^[7]80號簡。

2. 翌辰之月，辛巳之日，鑄官公德訟宋雍、宋庚、差敏慝、鄧繩、黃鰕、黃軌、陳敏、番珏、黃行、登蓋、登迦、登駟、登諫、登階、登牌、馱上、周啟、莫炯、黃為宗、龔相龜、苛駢、雷宋、陽曆、鄧敢、以其受鑄官人而逃。疋吉馘之，秀淪為聲。85號簡 既發筮，遲以廷。85號簡反面。

3. 競得訟繁丘之南里人龔悻、龔酉，胃殺其兄。九月甲辰之日，繁丘少司敗遠龔 護筮，言胃繁丘之南里信有龔酉，酉以甘匠之歲為偏於鄆，居□里。繁陽旦無有龔悻。正秀齊馘之，即尚為聲。90號簡。

4. 宋客盛公騰蕪楚之歲，屈祭之月，戊寅之日，郢易公命聊竄之客葦、馱尹癸謨(讞)^[8]之。東敵公餘痺、啟司馬陽牛皆言曰：郢易之酷官黃齊、黃藍皆以甘匠之月死於小人之敵，邵戊之笑邑。125號簡既發筮，廷疋易之酷官之客。往倚為聲。125號簡反面。

5. 陳歷、宋獻為王煮鹽于海^[9]，爰屯二儋之食，金銓二銓。牂以成收。147號簡客發筮。148號簡。

6. 郢易之酷里人邵奚、邦轡、盤己、郢易之牢中馱竹邑人宋鼎、茅陵之戲里人石紳，貢沽苗之王金不賽。沽苗之客苛咽內之。白逢公縣、發行。150號簡 客發筮。150號簡反面。

例1、2、4、5、6中的“發筮”即“發記”，指發出文書；例3中的“護筮”即“復記”，指回復文書而言。

2001年3月初稿

2003年4月改畢

注釋

[1]參見《包山一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載《包山楚簡》，湖北省鐵路考古隊編著，文物出版社，1991年。

[2]參看于豪亮《說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又載《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

[3]湯餘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2期。

[4]張守中、張小倉、郝建文撰集的《郭店楚簡文字編》把追記分別為兩字，但郭簡中“呂”用為“己”，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紀”從“呂”(乙4·82)，故追可釋為記，即起的古文。《語叢三》一〇“記習彙章”即“起習文章”。

[5]《戰國策箋注》，265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6]這個字原來隸作遑，誤，應隸作遑。它實際上就是甲骨文中幸的增累字，是逃逸之“逸”的本字。可參看拙文《戰國文字的“遑”與甲骨文“幸”為一字說》，載《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7]此字原作𠂔，鄭剛、何琳儀、劉信芳等先生都釋為“𠂔”，已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此字的結構，一般分析為從子來省聲（可參看曾憲通先生《楚帛書文字新訂》，《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我們認為它是聲的省體。金文《史增盤》有聲字，戴家祥先生分析為“從子聲”（《金文大字典》5467頁，學林出版社，1995年）。聲省作𠂔，和聲省作𠂔（郭店簡《窮達以時》一五）𠂔（同上《尊德義》三三）相仿佛。2002年8月7日，王寧先生在“簡帛研究網”上發表《釋聲》一文，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與拙見不謀而合。

[8]此字原作𡗗等形，關於它的釋法，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如包山楚簡的整理者隸作“證”，讀爲“對”，解釋爲“應對”；劉信芳先生從之，解釋爲“審理對證”；葛英會先生隸作“譏”，讀“蔽”，認爲是“判斷、判決”的意思；胡平生先生隸作“譏”，認爲是“驗”的假借字，具有“證”、“徵”、“效”等意義；董蓮池先生釋作“辯”，認爲是“明察”的意思；陳偉先生認爲是“竊”的假借字，作謙詞用；黃錫全先生釋作“譏”，認爲是“審查”、“審問”的意思；廣瀨薰雄先生認爲是“察”的假借字，表示“調查”的意思；李運富先生也認爲應讀爲“察”，但其基本含義是“檢驗”、“核實”、“確認”（參見李運富《〈包山楚簡〉‘譏’義解詁》，2002年9月7日發表於“簡帛研究網”）。這裏姑且從劉釗先生隸作“譏”（《利用郭店楚簡字形考釋金文一例》，《古文字研究》第24輯）。譏字郭店簡用爲“察”，從它得聲的“淺”用爲“淺”，西周金文中從它得聲的“斃”、“𡗗”、“𡗗”可以通賤、剋、翦、斲等字（參上引劉釗文）。從這些語音綫索出發，再考慮到包山簡中法律文書的特點，我們認爲譏應當讀爲“濺”或“讞”。《說文·水部》：“濺，議舉也。”《禮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於公。”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漢書·景帝紀》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讞，平議也。”《漢書·刑法志》：“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讞有對疑案進行覆案以審議定罪的意思，包山簡中的譏大多可以這麼理解。如果參照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就會對譏的有關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9]參看林滢先生《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

釋包山楚簡或敵宮三字及相關制度

◎ 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羅運環

包山楚簡中的或敵宮三字，涉及到戰國時代楚國的地方行政體制這一重要內容。整理小組及一些學者已作過考釋甚至比較深入的研究。^[1]本文打算在學者們紮實的基礎之上，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 或字與相關字的區別及相關制度

或字與相關字在包山楚簡中共有 14 例。目前為止，學術界對這些字例，無論隸定還是釋讀方面都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將有關形體及辭例搜集(截錄)在一起，然後加以分辨。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1 2 3 4 5 6 7 8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9 10 11 12 13 14⁽²⁾ 15⁽³⁾

1. 居於郢或(1)之少桃邑。(10 號)
2. 以數田於章或(2)郢邑。(77 號)
3. 羅之廡或(3)之全者邑人。(83 號)
4. 死於郢或(4)東敵郢戌之笑邑。(124 號)
5. 郢易公命郢或(5)之客董。(125 號)
6. 左馭番戌飲田於郢或(6)藍邑，城田一，索畔蓄(蕪)。(151 號)

7. 鄧或(7)礪敵鄧君之淵邑人黃欽言於左尹。(143 號)
8. 剗戡之少儻鹽族郢(8)一夫, 瘥一夫。(3 號)
9. 五師倍暖司敗周或(9)受期。(45 號)
10. 告暖之司敗周惑(10)受期。(57 號)
11. 陰之正或(11)執僕之父。(135 號)
12. 陰之戡客或(12)執僕之觀涅。(135 號反)
13. 郢儻轍馬於下蔡帀儻之於陽城, 或(13)殺下蔡人舍罕。(120 號)
14. 恒思少司馬郢乘或(14)以足金六鈞舍葉。(130 號)

第 1~7 號的形體, 隸定為或, 與字形相符合。把它們釋為“或”並作為“或”字的別體則在字形上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故多釋為“域”。郭店楚簡發表後有學者改釋“國”,^[4]可從, 但其用義尚需進一步探討。

第 8 號的形體, 應隸定為郢, 隸定為或與字形不符, 是錯誤的。郢字的寫法最早見於西周晚期金文《師寰簋》, 也使用於《楚帛書》、《郭店楚墓竹簡》。郭店楚簡《老子》乙篇: “可以有或, 有郢之母”,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二本及今傳本均作“國”字; 郭店楚簡《緇衣》篇中的“有郢者章好章惡”的“郢”字今本亦作“國”。故此字舊釋“國”可從。其前加方位詞則用為地域義, 《師寰簋》和《楚帛書》中的“東郢”、“西郢”就是如此^[5]。

第 9~14 號互相關聯, 比較複雜。其中第 9 號字形被釋為“國”; 第 11 號字形, 有的釋“國”,^[6]有的釋“或”^[7]; 第 10 號字形, 有的釋惑^[8], 有的釋懼^[9]。第 12~14 號字形皆釋為或, 與字形及字義相符, 沒有問題, 具有參照性。解決 9~11 號形體隸定和釋讀問題關鍵在於區別或、或(國)兩種字形。或, 即國字的省寫, 僅見於春秋戰國之際齊楚宋蔡之間。在楚文字中如《王孫遣諸鐘》、《王孫誥編鐘》, 以及《曾侯乙竹簡》, 共 19 例, 此字最重要的是“匚”符上的橫劃。在古文字中未見其上少橫劃之例, 即使作為美術字的宋國金文《曄末距》的或字, 其上雖沒有橫劃, 但卻以一撇折折劃(兼有實用與裝飾二重性)作為替代。再看戰國中后期楚文字中的或字, 其底橫劃, 往往寫成豎折劃作“L”形, 且多向上與“戈”符的橫劃相連接, 上引字例第 6 號或字所從“或”的底橫劃、第 14 號或字的底橫劃, 以及郭店楚簡《尊德義》第 30 號、《性自命出》第 8、10、19、31 號簡文中 15 個或字的底橫劃都是如此。尤其是郭店楚簡《語叢三》第 42~43 號簡文中的 3 個或字作為底橫劃的豎折劃的豎均向上超出“戈”符的橫劃, 如字例第 15 號。其辭例為: “或由其辟, 或由其不進, 或由其可”。^[10]三個字例均在句中充當副詞“又”, 釋“或”無疑。據此上引字例中的第 11 號、9 號兩形, 均應隸定為“或”, 第 10 號字應釋為惑, 第 9、10 號字均屬於一個人的名字, 寫作“惑”、“或”。與此時代相近的楚私璽有“周惑信璽”^[11], 有同為一人的可能性。

以下將着重討論或字的字形及相關制度。

或字尚不見於中原諸國, 可能是戰國中期楚文字中的一種特殊用字。此字除包山楚簡 7 例之外, 又見於《郭店楚墓竹簡·緇衣》, 其辭例為轉引的《詩》句(見於今本《詩經·小雅·節南山》), 其曰: “誰秉或成, 不自為貞”。^[12]今本或字作“國”, 其在詩中也用為國家之“國”。可

見，此字當釋“國”字無疑。

包山楚簡中有關的寔(國)字共 7 見，即：鄒寔、章寔、廡寔、鄰寔(2 見)、邳寔、鄧寔。這些寔(國)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國”呢？僅從其前綴詞來看，似乎是指某些滅國故地，細審文義則又不是^[13]。不過，毋庸置疑，國域二字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通用的。《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田法》云：“州、鄉以地次受田於野，百人爲區，千人爲或(域)。人不舉或(域)中之田，以地次相……”^[14]。包山楚簡中的或(國)是否能相當於銀雀山漢簡中的或(域)呢？也不能。銀雀山漢簡講的是一種授田和稅收的計量單位，而包山楚簡中的或屬於一種地方行政體制，與銀雀山漢簡不盡相同，不可能通作“域”字用。

縱觀楚國歷史，包山楚簡中的寔(國)有三種可能性：一是滅國不絕其祀的“遷國”；二是吳起變法失敗後，肅王收陽城君等封君之國時而未盡收者；三是新封的侯國。這三種孰是，姑且不下斷語，待有新的資料出土後再作結論。關於這種國的上屬與下轄的組織結構，可從鄰、廡兩個封國的例子中得見一斑。包山楚簡曰：“羅之權裏人湘疵，訟羅之廡寔(國)之𡈼者邑人”(第 83 號簡)。表明：這種封國是由一個縣分立，在行政上受到縣政的干預。包山楚簡又云：“沉陽之酷信黃齊、……死於鄰寔東敵邵戊之笑邑”(第 124 號簡)；“邳陽公命鄰寔之客革、戡尹癸譚(義爲察)^[15]之”(第 125 號簡)。表明寔(國)一般爲寔、邑兩級組織，個別的如鄰寔在國邑二者之間，還有敵一級組織。

二 敵字的釋讀及相關制度

前面已涉及到敵字。在包山楚簡中與制度有關的敵字資料共有 6 條，茲錄(截錄)於下：

1. 司禮之夷邑人程甲受沉陽之酷官黃齊、黃龍。黃齊、黃龍皆以甘匠之歲癸月死於鄰寔東敵邵戊之笑邑。(124 號)
2. 邳陽公命敵寔之客革、戡尹癸譚之。東敵公繇捭、敵司馬陽牛皆言曰：邳陽之酷信黃齊、黃龍皆以甘匠之歲月死於小人之敵邵戊之笑邑。(125 號)
3. 鄧寔礪敵郢君之淵邑人黃欽言於左尹。(143 號)
4. 付壘之關敵公周童耳受期，九月戊申之日不遲(將)周啟、周珠以廷阨門又敗。(39 號)
5. 付壘之關敵公周童耳受期，己丑之日不遲(將)付壘之關人周啟、周珠以廷，阨門又敗。(34 號)
6. 十月己丑之日，篁敵公若賊受期，乙未之日不遲(將)繇發以廷，阨門又敗。(70 號)

敵字字形沒有爭議，但敵是一級什麼樣的組織結構則一直困擾着學者們。縱觀楚國地方行政結構，主要的行政系統縣、里之間無敵一級；食稅州也無敵級組織^[16]。而敵祇出現在封國；也見於大的關口(縣級)。這表明敵不是一級普遍性的組織，是一種特設的地方組織






機構。敢出現於付壘之關，它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示：可能與某些地區因特殊需要而特設的掌管山林川澤的地方虞官有關。其下轄之邑，則應是虞官直轄之邑。其上直屬某個封國或直屬其他機關。付壘之關的虞官機構也直屬該關管轄，故虞官下轄之人亦可稱為“關人”。第1條引文的“東敢公”的“東”，從下文所連接的邑來看，應是就敢所轄範圍的方位而言的，而籠統說來故又可直稱為“敢”（見第2條引文）。





從文字釋讀來看，該字一般作敢，個別作戠。在古文字中偏旁“攴”、“戈”往往互相代用，如“攻”字的偏旁一般從“攴”，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十六經·本伐》、《春秋事語》均從“戈”，寫作戠。包山楚簡第134號簡文“數客百宜君”的“數”，第138號簡文作“戠”，不從“攴”而從“戈”。顯然“敢”是從吾得聲。吾、虞在上古均為魚部疑紐，同部同紐自可通作。如：《詩·召南》有篇名為《騶虞》，古本《墨子·三辯》引作“騶吾”^[17]；《呂氏春秋·貴卒》“吾丘鵠”，畢沅據《漢書》“吾丘壽王”《說苑》作“虞丘”，注此“吾丘”即“虞丘”。^[18]凡此，該為“敢”即虞官機構在文字音韻學方面的佐證。

三 宮字與相關字的區別及相關制度

宮作為一級重要的地方行政組織，在包山楚簡中凡18見。其中涉及到潁陵、鄆、鄧陽、郢都、鄆郢、葉、郢等幾個大宮和安陸一個“小宮”。此外，楚璽中還有數方有關大宮的璽文，如：“下蔡宮大夫”、“上厥（厥）宮大夫之璽”^[19]。過去，學術界在宮字的考釋方面存在分歧，對宮的類型及行政級別的定位也不甚妥當，應當重新加以研討。

在宮字的釋讀方面，過去有釋“宮”^[20]、釋“邑”^[21]、釋“序”^[22]三種釋讀，及謂宮是“邑”字的繁文^[23]、或“邑”字的異構兩種說法^[24]。區分宮所從的“邑”與宮字所從的“呂”及序字所從的“予”，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宮字所從的“邑”與宮字所從的“呂”，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邑”作為獨體字，其會意人所居的城邑，從“口”從“人”，在甲骨文中人旁作跪跽形，西周、春秋的金文變為曲膝形，戰國時，除極少數北方貨幣文、古璽文作形外，楚文字皆作形，而宮字所從的“呂”本是宮字的初文和象形字^[25]，其上下二者或方或圓或作三角形，皆無“邑”字的下垂筆劃。據此釋宮不從“呂”而從“邑”，無疑是正確的。再看宮字所從“邑”與序字所從“予”的區別。獨體“予”是從“呂”（呂字的初文）孳乳出來的，古人為了把“予”同“呂”區別開來，秦系文字作、形以與“呂”相區別；楚系文字及多數六國文字則在其上加區別符號“八”（個別為“𠂇”）作形，如包山楚簡中的“豫”字形體除個別從“呂”之外，皆從宮。因此，釋楚文字宮不從“予”而從“邑”，顯然是正確的。

宮字從從，讀為邑。觀其所指也是一種邑，但它是一種大邑，故簡文有“大宮”這一概念（見第12、13、126、127、67號簡）。大是相對於小而言的，主要是為了有別於“田邑”、“邑里”之類的小邑。因有大小之別，為了避免混淆故加以示區分。在這裏是一種區別

符號，而不是一般的繁化和異構。

現今流行宮爲楚縣的說法，恐與楚制不合。春秋時楚縣縣長稱尹，稱公。戰國時楚縣縣長除稱尹稱公外，也稱令。如：戰國中葉楚子發任上蔡縣縣令，稱之爲“上蔡令”（《淮南子》的《人間》、《道應》）；戰國後期荀卿任楚國蘭陵縣縣令，稱之爲“蘭陵令”（《史記·荀卿列傳》）。包山楚簡有“集陽公”（第130號簡）、“魯陽公”（第2號）、“長沙公”（第61號）、“安陵公”（第117號）、“陽城公”（第120號）、“鄆陵令”（第166號）、“鄆令”（第165號），徐少華先生均考定爲縣長官，^[28]甚是。如此，則宮非楚縣明矣！

宮究竟指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大邑，其上屬與下轄是怎樣的呢？以下幾條簡文有助於我們揭開這個謎底。

1、八月壬申之日，鄆陽大正登生鉞受期，八月癸巳之日，不遲（將）鄆陽宮大夫以廷，阡門又敗。（第26號）

2、九月甲辰之日，顓司敗李聽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遲（將）顓宮大夫黠公旅期，朝易公穆疇與周愷之分譚以廷，阡門又敗。（第47號）

3、戔郢司德 鄆陽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遲（將）安陸之下隨（隋）里人屈犬、少宮陽申以廷，阡門又敗。（第62號）

4、子左尹命漾陵之宮大夫譚州里人陽鎖之與其父陽年同室與不同室。（第126號）

5、口口南陵公邱睪、襄陵之行僕宮於鄆，鄆足命葬王士，足葬王士之宅，僕命恒獲，足若。足命鄆少司城龔頤爲故獲，正於僕。方鄆左司馬競慶爲大司城故客，且政（征）五連之邑於葬王士，不以告僕。既言之，誼之左尹。（155號+155號反）^[29]

上面引文中有：鄆陽縣正帶鄆陽宮大夫以廷、顓司敗帶顓宮大夫等以廷、戔郢司德帶安陸之下隨（隋）里人屈犬和少宮陽申以廷。表明：鄆陽宮在鄆陽縣以下、顓宮在顓縣以下，少宮在戔郢安陸縣以下。這種大邑既不是縣，也非與縣平級。這是其一。

其二，宮的性質有兩種可能，即：郡、縣治所所在的縣城、郡城；封邑。第4條引文中表明漾陵宮內含有州里行政組織。這就是說宮不可能是縣城和郡城，而應是一種比州大的食稅大邑和中等邑（少宮）。第5條引文云：“口口南陵公邱睪、襄陵之行僕宮於鄆”。“宮於鄆”與楚莊王滅陳而“縣陳”的用詞結構類似，宮是名詞作動詞用，即在鄆獲得新“宮”。其大邑內也包含有小邑，“五連之邑”就是其中的一個小邑。鄆的官員兩面三刀，“且政（征）五連之邑於葬王士，不以告僕”，因而引起官司。凡此多方印證，表明宮有大中兩種，是一種官府性或官員的食稅大邑。

至於古璽所見“行宮大夫”，如：“上場（唐）行宮大夫璽”、“江陵行宮大夫璽”、“鄆厚行宮大夫璽”。^[30]黃盛璋先生論及前二璽時認爲“宮大夫”與“行宮大夫”的區別“就在於職官上正式與代理。”並確定此“行”字爲“暫署之意”。此可謂“暫署”說。^[31]也有人“疑（行宮）爲設置在都城外的附邑。”^[32]韓自強和韓朝兩位先生認爲：宮爲“縣宮”。謂前“兩璽據傳均出土於壽縣”；後一璽也發現於安徽的阜陽。認爲三枚行宮大夫璽，“與楚國後期受強秦的步步進逼，楚國統治集團重心東移有關。……這些失去了原有的封地或領地的封君、大吏，身雖已

‘去之他所’，逃到新的住地，仍要保留原有的封號或封地的名稱。這些僑置的有名無實的流亡政權，楚人稱之為‘行宮’”。此可謂“僑置(縣宮)”說。^[33]我們在上文已論定“宮為官府性和官員的食稅大邑”，那麼“暫署”說與“僑置縣宮”說均不能成立。不過“僑置縣宮”說具有較大的啓發性，我們認為這些“行宮”應是“僑置”的“官府性和官員的食稅大邑”。

以上對包山楚簡寔、敵、宮三字及相關制度進行了考證，弄清楚了宮字及相關字在隸定釋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考定寔是國的一種寫法。探討了敵當為虞的假借字。寔是一種封國，縣政有干預權；宮是一種比州大的食稅性質的大邑(也包含中等大的邑)；“行宮”是一種“僑置”的食稅性質的大邑。其行政則屬縣政。敵是少數封國、大關口特設的虞官體制。通過對這些制度的考證，使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戰國時代楚國地方行政體制的認識。其中封國食州之多，說明吳起變法以後，“大臣太重，封君太衆”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並制約了楚國的發展。

注 釋

- [1]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2] 第14號字形不甚清晰，在辭例中又明顯作或字用，學者多將此字摹作或，視與12~13號形體同類，細審原簡，其形接近11號。
- [3]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文物出版社，1998年。
- [4] [日]藤田勝久：《包山楚簡所見戰國楚的縣和封邑》，《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3號，1999年3月。
- [5] 參看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邵條，中華書局，1993年2月。
- [6]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91年。
- [7]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釋文，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
- [8]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91年。
- [9]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21頁。
- [10]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1] 羅福頤：《古璽彙編》第3710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2]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繆衣》，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3] 如包山楚簡第125號簡文“郢陽公命鄒寔之客章”句與第12號簡文“子左尹命漆陵宮大夫”的句式相同，可知包山楚簡稱某寔者應是一種行政組織，不是指滅國故地。
- [14]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學勤：《李學勤集·銀雀山簡〈田法〉講疏》，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 [15] 黃錫全：《楚簡“諱”字簡釋》，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200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16] 羅運環：《論包山簡中的楚國州制》，《江漢考古》，1991年3期。
- [1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三辯》注，中華書局，1986年。
- [18]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貴卒》注，學林出版社，1984年。
- [19]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第0097、0100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0] 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李學勤：《楚國夫人璽與戰國的江陵》，《江漢論壇》，1982年第7期。
- [21]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1371頁。

- [22]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縣”》，《文史》第28輯，中華書局，1987年；《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114～115頁。
- [23]黃盛璋：《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
- [24]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104頁。
- [25]參考于省吾主編的《甲骨文字詁林》官字雍字條姚孝遂按語，中華書局，1996年。
- [26]見《石鼓文·鑿車》字所從的“予”。
- [27]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圖版第220號簡，科學出版社，1997年。
- [28]徐少華：《古複國複縣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1期；《包山楚簡釋地六則》，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200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29]以上包山楚簡引文均出自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
- [30]羅福頤：《古璽彙編》第0099、0101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韓自強、韓朝：《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圖1，《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 [31]黃盛璋：《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
- [32]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104頁。
- [33]韓自強、韓朝：《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戰國楚的地方統治體制

——關於“‘縣邑’支配體制”的試論之一部分

◎ 韓國漢城大學校東洋史學系

◎ 朴偉柱

隨着 20 世紀後半期以來中國全域考古學成果的豐富,分析、比較春秋戰國多數國家的統治體制、社會結構及其地域文化、思想、生活風俗的工作,漸趨成熟。特別是通過結合文獻和考古兩種資料,探索諸國的統治體制,例如對於地方行政組織、人民編制、官職體系、司法制度等的個別特徵之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相關成果也越來越多。同時對於秦漢帝國的中央集權性、一元性的郡縣齊民支配體制的建立和浸透到地方末端的過程上的地域偏差及其多元性、複雜性的研究,也持續地發展。大概 1980 年以前的關於先秦諸國統治體制研究,因過分強調戰國秦的集權性、直轄性的行政、軍事、官僚制度與爭取統一帝國的過程,所以尚未及究察他國的詳細情況和異同。自然,對齊、燕、三晉、楚、吳越等其他列國的人民編制、地方統治的研究很不充分,並且偏重於秦的研究傾向也很濃厚。可是,目前通過細密分析各地考古資料,以彌補文獻資料的限制,探索各國的詳細歷史和固有文化,成為春秋戰國史研究的核心課題。實際上,必須分析先秦諸國突破分散性、離心性的舊封建統治和城邑式支配,而追求集權性、向心性的郡縣齊民支配體制,並邁進向富國強兵、天下統一之過程上的偏差(時間緩急、程度輕重等)和其他各種特殊情況,纔會究明在建設統一帝國道路上諸國成敗分歧的原因和結果。

筆者循着這種問題意識,以包山楚簡為主要材料對楚國統治體制的基本特徵進行初步考察。包山楚簡是戰國中期楚國的一篇行政文書,是有關楚國戶籍制度、身份編制、地方行政組織、官職體系、司法制度等的文獻寶庫,因此成為楚國史研究的必需資料。我已用之分析了楚國的戶籍制度和身份編制,在本稿中將分析戰國時代楚國的地方統治結構。我認為:包山楚簡反映的“縣制”和“邑制”兩種地方行政組織系統的相異編制與某種差別,提供了楚國地方統治特性的重要端緒。而且它含有縣以下幾種中下級行政組織如或、散、邑、

里、州等的豐富事例，又記述了這些組織與縣間的聯絡結構、統轄關係，這補充了偏重於記載郡、縣資料的文獻的局限，且詳細描述了楚國地方行政的多樣性事實。下文以“縣制”和“邑制”這兩種相反的行政系統為中心，來證實楚國地方統治體制不像他國的特殊情況，以追究先秦諸國國家結構之多樣性與秦漢帝國體制的多元淵源之一例。按：必須有機地、綜合地分析多數列國統治體制、社會結構的個性和共性，纔能瞭解春秋戰國政治、社會史之全局。本文是這種重大目標的基礎工作的第一部分。

一、“縣制”系統的行政組織

1. 縣和“宮”

楚國自西周中期熊渠時期以後，不斷推進對外擴張，並獲得了廣大疆域，^[1]並且從春秋初已將四方征服地編為縣，這是列國中最早的。^[2]春秋初以來，大多數楚縣成為楚國對外擴張之基石，並且通過扶養、保有強勁的縣師，^[3]使楚縣在楚國的人民統治、軍事、戰略中具有巨大比重和影響力。^[4]因楚縣是楚國統治體制和政治結構（集權性、向心性的進步動力和分散性、離心性的守舊傾向之對立，王權與貴族權的頡頏關係等）的關鍵因素，所以對楚縣的結構和性質，歷來眾說紛紜。一種說法認為，因為在楚縣中仍然殘存着西周以來的封建性的采邑支配遺制，所以它是西周舊采邑與戰國直轄縣的過渡性的統治組織。^[5]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楚縣很早就自發轉變為戰國時代具有的直轄性的縣，這促進了楚國的中央集權化，並進而發展到秦漢時代的郡縣，^[6]諸說互相對立。包山楚簡可能是提供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端緒。

首先，包山楚簡收錄大量楚縣名，例如已見於先秦文獻的“郢（期）思”（第163號，以下祇記簡號數），^[7]“塋（應即陳）”以外，郢（2）、郢（23）、郢（31）、陰（51）、安陵（62）、郢（63）、羅（83）、緜丘（90）、郢（97）、郢（97）、郢（110）、郢（116）、易陵（119）、郢（125）等不在文獻的諸縣名。且說，從春秋初以來，楚國縣長官的正式稱呼始終並用僭稱“縣公”或一般稱“縣令”（或“縣尹”），包山楚簡又收錄“某（縣）公”和“某（縣）令”。包山楚簡的“某公”如“郢（期）思公”（163）、“塋公”（166）證實了“楚子自稱王，稱其縣尹為公”之記事（《左傳》莊公30年，杜預注）。包山楚簡且含有在文獻沒有記載的新行政組織名稱“宮”。有人認為，“宮”和“邑”是同字，^[8]但包山楚簡顯然分別使用“宮”和“邑”，但“邑”出現得更多，因而兩字似非通用字，而是不同的行政組織名稱。第130號的“葉宮大夫”提供端緒。“葉（應即葉）”是由於春秋後期靈王的遷邑徙民政策，而與陳、蔡一起新設的重要楚縣，包山楚簡記之“葉（葉）宮”而暗示“宮”是“縣”的別稱。而且120-121號記有見載於文獻的重要楚縣“下蔡”領有諸里的情況，例如下蔡散里、下蔡山陽里、下蔡問里、下蔡東郊里、下蔡墓里等，此外還有出土的“下蔡宮大夫”塋（《古璽匯編》0097）。“（下）蔡縣”的別稱亦是“下蔡宮”，其管領長官似是“下蔡宮大夫”，由此可推知宮是相當於“縣”級的上層行政組織之別稱。簡書中葉、下蔡之外又有郢（7）、淅陵（12）、郢（20）、郢（26）、臨易（53）、郢（67）、郢（188）、遊（190）等諸“宮”，其中多

數統率諸里又以宮大夫為管領者。^[9]所以我初步地推測：“縣”和“宮”似是同級統治組織，但因為兩者的來源、內部結構、在楚國地方統治中的作用等相異，所以似按各自的性質、情況區別使用。可是由於資料不充分，目前尚難探索兩者的詳細差異及其內部統治、居民組織的具體情況。

相反地，“邑”據簡書指在中上層行政組織縣、寔、啟等（容後述）之下附屬的基層聚落組織，或有官爵者與“當地有力者”（一般指在各地諸邑、諸鄉村中構築、保有強大勢力的自然發生的、習慣性的土著支配層，即鄉邑內古老氏族、部族共同體的首領及其宗族集團）累代領有的采邑、領邑、封邑等，而僭稱其長官為“公”。^[10]按：在戰國時代，楚國可能從共同體中心的傳統聚落組織之泛稱的“邑”中派生出“宮”和“邑”，“宮”為縣級規模的上層統治組織的別稱，而“邑”為位於鄉村的羣小集住聚落的通稱。

“縣”/“宮”及其下屬行政組織寔·啟·邑等都置有掌管各種行政實務的諸官，以便有效地統轄、管理當地居民。主要官職是縣公／縣令／宮大夫和寔公、啟公、里公（管理、統治各級組織）、莫敖、連敖（推測掌管儀禮或財政）、大小司馬（掌管軍事）、大小司敗（掌管治獄）、大小工尹（掌管工事）等。此外，尚有官師、官令、官婁、大宮、大駢尹、士師等較生疏的中下級諸官，庶人在官者“倌”、臨時派遣的補助官員“客”（對“倌”、“客”容別稿詳論）。他們分掌各種縣廷事務如管理戶籍、徵發徭役和兵役、治獄、解決各種民事訴訟與糾紛等，以輔弼縣公。對楚國地方行政官，以事例較多的縣／宮諸官為主整理如下（對出現數量較多的官職，祇記初出號數）。

①淶陵：宮大夫(12)、司敗(128)、攻尹(107)、大宮、大駢尹、士師(以上12)、正婁(75)、喬差(127反)

②郢：宮大夫(157)、大莫囂(7)、左司馬(155)、攻尹(157)、喬差、左喬尹(以上49)、正婁(66)

③鄢：宮大夫(47)、司敗(20) ④鄢易：宮大夫(26)、大正(26)

⑤郢易：莫敖(111)、司馬(119)、少攻尹(111)、塞公(111)、正差(177)

⑥易陵：連敖(112)、司馬(119)、大迅尹(112) ⑦鄢：莫敖(29)、左司馬(116)

⑧鄢：連敖(110)、攻尹(110) ⑨株易：莫囂、喬左(108) ⑩新都：莫囂(113)

⑪郢易：少司馬(173)、教令、新大厩(以上99) ⑫郢：司馬(22) ⑬荊易：司馬(109)

⑭臨易：宮司馬(53) ⑮郢：大、少司敗(23) ⑯郢：司敗(31)、少司敗(50)

⑰陰：司敗(131)、大迅尹(51) ⑱絲丘：少司敗(90) ⑲申易：司敗(71)

⑳羸易：馭司敗(33) ㉑荊陵：司敗(40) ㉒鄢陵：攻尹、少攻尹(106)

㉓郢郢：大宮、大倌尹(67) ㉔他：官師、官令、官婁(以上5) ㉕郢：正婁(19)

㉖福易：判尹(37) ㉗鄢易：大牟尹(87) ㉘羅：莫敖、連敖、攻尹(以上長沙銅量)。

包山楚簡又詳細記載了縣以下中級組織的實例和內部結構、以及這些組織與縣的統轄關係的實際情況，因此傳達了楚國地方行政之全局信息。以下對此進行考察。

2、縣·里／宮·里系統和縣·寔·啟邑系統

記述楚國縣以下組織之文獻極少，推定為戰國末漢初間楚人編纂的《鶡冠子·王鈇》之伍(5家)·里(10伍)·扁(4里)·鄉(10扁)·縣(5鄉)·郡(10縣)的編制似是唯一資料。但這種行政體系是否存在卻難以考證。包山楚簡對於突破這種文獻局限很有幫助。見載於包山楚簡的縣以下行政組織是寔、敵、邑和里等，這些組織構成了①縣·里／宮·里、②縣·寔·敵·邑·兩大地方行政系統。後者有③縣·寔·敵·邑(4層)、④縣·寔·邑(3層)、⑤縣·邑(2層)等3種層次。這三種層次，可能就是原來的編制(即大縣兼有寔、敵，中小縣沒有兩者中一或二)，或者是文獻記述時的遺漏或省略，目前不好確定。以表整理這兩種系統，如下：

表 1：楚縣組織之兩種系統

* () 中的數字指簡號。* * 因為附△的例子不好確定縣·里的直轄關係，所以目前暫置於縣·里系統(92、132 號的 3 例似是“當地有力者”和有官爵者領有的里。可能楚縣部分地統轄這種里，但目前難以確信)。* * * 在縣·寔·敵·邑系統的例子(②)中還有“筮敵公”(70)，這可能其上下行政組織縣·寔、邑等的記載有遺漏的。

| ①縣·里系統(16 件) | | 宮·里系統(6 件) | ②縣·寔·敵·邑系統(10 件) |
|--------------|---------------|------------|------------------------|
| 郢里(7) | △郢墜午之里(92) | 下蔡敵里(120) | ③ < 縣·寔·敵·邑 > 4 層(2 件) |
| 郢之穰里(23) | △登賚尹之里(92) | 下蔡山陽里(121) | (郢陽縣)郢寔東敵郢戊之笑邑(124) |
| 郢之己里(31) | 潛安之南易里(96) | 下蔡問里(121) | 鄧寔厲敵郢君之鼎邑(143) |
| 安陸之下隄里(62) | 坪易之枸里(97) | 下蔡東郊里(121) | ④ < 縣·寔·邑 > 3 層(4 件) |
| 郢之市里(63) | △陰侯之東郭之里(132) | 下蔡蔓里(121) | 羅之無寔之彘者邑(83) |
| 羅之壠里(63) | 邱易之酷里(150) | 漢陵之州里(126) | 鄧寔之少逃邑(10) |
| 絲丘之南里(90) | 費陵之戲里(150) | | 章寔縮邑(77) |
| □里(90) | △夜基之里(168) | | 郢寔猷邑(151) |
| | | | ⑤ < 縣·邑 > 2 層(4 件) |
| | | | 郊之吳郢邑(95) |
| | | | 申易玄盤邑(97) |
| | | | 郢易之牢申獸竹邑(150) |
| | | | (郊之)五連之邑(155) |

按《表 1》，①縣·里／宮·里系統(22 件)是沒有別的中間組織的單一結構。而②縣·寔·敵·邑系統(10 件)是多層結構，並且不存在兩系統的中下層組織相互交叉(即在縣·寔·敵之下

配置里等)的事例,兩者的基層組織(邑、里)也相異。由此可推知這兩系統是完全分開的排他性的行政組織。西周以來“里”和“邑”通常指基層聚落組織,但是“邑”大體凡稱自然發生的郊野農村(包含山林、耕地),而“里”似指置於都城內部或附近的人工性的統治組織。^[11]據《雲夢秦簡》:“庭火延燬里門,當貨一盾”、“越里中之與它里界者,坦為院”的記事,^[12]戰國秦似是把里編制為人工性的最基層統治組織,以追求直轄統治^[13]。參考邑、里這樣的地域性(郊野對都城)的,來源性(自然聚落對人為組織)的差異,並注目戰國秦的直轄性的“里”的話,可以推測,縣·里/宮·里系統中的縣、里的關係,比縣·寔·散·邑系統中的縣、里的關係更加緊密、直接,因此縣·里系統成為縣的直轄支配能力更高的地域。但是因包山楚簡沒有有關的直接記載,對這一問題容後作慎重分析。

包山楚簡中出現的新種統治形式“寔”,參考諸文獻以釋為“邦”(《說文》)、“封邑”(《漢書·韋玄成傳》)、區域(《包山楚簡》釋文)等,但都不適合用邑的上級集住組織“寔”來解釋。而且《銀雀山漢簡·田法》記云:“州、鄉以地次受田於野,百人為區,千人為域”,其“區”和“域”各指百人、千人單位的授田組織,參考這種“域”可瞭解包山楚簡的“寔”。包山楚簡中出現的別的新行政組織“散”通常指“御”、“圉”(《說文》),亦不適合於寔、邑的中間組織“散”。目前包山楚簡幾乎是唯一的以“散”稱集住組織之資料。包山楚簡又傳達了這種楚國特有的縣·寔·散·邑統治系統的內部統轄關係和行政處理結構,例如:

……郢易之酷官黃齊、黃鬻,……死於寔東散郢戌之笑邑……郢易公命酈寔之客革、馘尹癸謹之。東散公審牌、散司馬陽牛皆言曰,……黃齊、黃鬻,……死於小人之散,郢戌之笑邑。(124·125)

這個例子描述的是,在縣·寔·散·邑中確認死亡者(酷官黃齊、黃鬻)、調查其死亡情況並向上級組織報告過程。據上例,郢易縣公的命令順次地下達到酈寔→東散→郢戌之笑邑,由此可知:這3層組織都直屬、統轄於縣,在職官上模仿了縣的諸官,因此縣·寔·散·邑這4層組織互相協同、聯合處理多種行政事務。與此聯繫地,需要考察介於縣·邑之間的寔、散的行政上的性質。

戰國縣制的核心目標,是使縣之中央集權性的直轄支配貫徹到鄉村最末端,其中秦國最成功地建立了縣·里間的直轄體制,這是眾所周知之事。秦竭力抹殺“中大規模的傳統自然聚落”和“縣·里的中間組織”之“鄉”的獨自作用,以有效地建設縣·里間的直轄統治。^[14]秦的公文書中排斥“鄉”,祇記“縣·里·爵·名”(即所屬縣、所居里、官爵或身份、人名),例如:《雲夢秦簡·倉律》之“書入禾增積者之名事里”、《同·有鞠》之“可定名事里”等。^[15]這些都說明秦國徹底排除中間級組織“鄉”的獨立性,以建立縣·里間的堅固的直轄體制乃至全國性的集權統治。此可謂秦國“縣制”的成功秘訣和治縣術的卓越性。

可是楚國的情況比秦更複雜。據簡書,楚國“縣制”有縣·里/宮·里和縣·寔·散·邑兩系統,其中縣·里系統,類似秦簡排斥中間組織的存在,此暗示在縣·里中接近於秦縣的直轄體制。可是縣·寔·散·邑的情況與縣·里不同。縣·寔·散·邑系統內的中間組織“寔”、“散”,其地位和規模上似相當於傳統中大聚落“鄉”。但是與秦簡不同的是,楚簡中有全記縣·寔·散

·邑4層組織的例子，如：①“(邳易縣)邳·東·敵·邵·戊之笑邑”(124)、②“(鄆·靈·厲·敵·邾·君之開邑)”(143)，這提供了關於楚縣性質的重要線索：在縣·靈·敵·邑系統中，相當於傳統“鄉”級組織的靈·敵，與秦鄉相反地似乎頗保有獨立性和自理行政權，因此中央集權性的縣制也許不能浸透到基層組織。而且因這系統的基層組織“邑”中，似存在相當數量的有官爵者和“當地有力者”的世襲領邑、采邑(①似是當地有力者“邵·戊”之領邑、②是楚國封君“邾·君”的封邑)，可能在此系統中直到戰國中期仍然殘存着西周遺制的封建領主支配，阻礙着縣·邑間的直轄支配。假設縣·靈·敵·邑比縣·里更多保持封建采邑性的因素的話，可謂在楚國“縣制”中直轄支配程度相異的縣·里和縣·靈·敵·邑兩系統(即直轄縣制似較確立的縣·里和采邑性支配殘存且直轄縣制似較萎縮的縣·靈·敵·邑)互相混雜，而像秦縣制的一元性、集權性的統轄方式也許不能充分浸透，地方統治的分散性、分權性比較大。

83號的“羅之權廩里……羅之廩靈之彘者邑”、150號的“邳易之酷里……邳易之牢牢獸竹邑”，這兩例對上述假說進行了補充。據《漢書·地理志》，“羅”本在南郡枝江(今湖北省枝江縣)，春秋時武王先伐之，文王再伐之而遷往長沙。^[16]在汨羅水附近發現的羅國故城證實了《漢志》的記述。^[17]邳易初見於包山楚簡。通過上例可推知，在同縣內也並存着直轄性較高的“里”和分散性較大的“靈·敵”的兩種相反的行政編制。由此推定楚國縣制直到戰國中後期也難能獲得與秦縣制一樣的一元性、直轄性。

雖然靈·敵·邑和里之規模因包山楚簡記載未詳，但據各種文獻記事，例如，①《國語·齊語》：邑(30家)·卒(300家)·鄉(3000家)·縣(15000家)·屬(15萬家)·軌(5家)·里(50家)·連(200家)·鄉(2000家)，②《管子·度地》：里(100家)·術(1000家)·州(萬家)·都(10萬家)，③《鶡冠子·王鈇》：伍(5家)·里(50家)·扁(200家)·鄉(2000家)·縣(萬家)·郡(10萬家)，④《銀雀山漢簡·田法》：里(50家)·州(500家)·鄉(5000家)等，因此基層組織邑、里大略是25、50、100家左右，中間組織靈、敵似是250、500、2500、5000家左右。但此祇是推測，對這個問題需要發現新資料以後再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戰國時代的楚國，“縣制”系統行政組織一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雖然與秦國縣制不同)特等地發達、完備，成為獨自的系統。以下將要分析，與“縣制”系統一起構成楚國固有支配體制兩軸的“邑制”系統聚落組織(即邑、州)的結構和特性，從此追究戰國時代楚國統治體制的內容和特質。

二、“邑制”系統的行政組織

1. 諸邑的性質和結構

對自古以來的自然發生的集住聚落地“邑”，先秦諸文獻一般地描述：它是在西周封建體制之下置於王畿、郊野、諸侯國的基層統治組織，而且直到春秋戰國之際，仍然受到封建領主式支配的地域。因此“邑”漸漸地成為或被認為與直轄縣制相反的聚落組織，所以“邑

制”或“采邑支配”通常代表還沒有克服城邑國家階段的封建性、分割性的領主支配方式。^[18]包山楚簡中的諸邑也可能與此類似。楚國諸邑，除了屬於縣·寔·啟·邑系統的一部分事例（《表一》之②）外，大體上“邑制國家”式舊采邑支配體制和舊宗族秩序，仍然殘存於戰國時代。爲了證明這個問題，需要考察包山楚簡中諸邑之多樣性的現象和作用。整理縣·寔·啟·邑之外的諸邑事例如下：

表 2：楚國之諸邑

* 附◎的例，表示與《表 1》一部分項目重複。

| ①某官之邑(8 件) | ②某爵之邑(6 件) | ④一般諸邑(25 件) | | |
|---------------|-----------------|-------------|----------|-----------|
| 饒尹之鄺邑(28) | (喜君之)長陵邑(54) | 鄧遼區湯邑(3) | 佻楮邑(149) | 鄺邑(174) |
| 司豐之塞邑(124) | 鄺易君之葉陵邑(86) | 上臨邑(79) | 新佻邑(149) | 盲莖邑(182) |
| (大厖之)笑邑(153) | 蒙陵君之墜鼎邑(86) | 下臨邑(79) | 鄧邑(163) | 茶溪邑(182) |
| (大厖之)鄧邑(153) | 聖夫人之鄧邑(179) | 覽道斯邑(88) | 鄧邑(164) | 毋獸鄰邑(183) |
| (大厖之)并邑(153) | ◎鄧寔東啟邵戊之笑邑(124) | 新易邑(149) | 嗣邑(169) | 上鄧邑(188) |
| (大厖之)郢邑(153) | ◎鄧寔鄧啟郢君之鼎邑(143) | 靈地邑(149) | 湛母邑(169) | 郊坪邑(188) |
| (大厖之)余爲邑(153) | ③某人之邑(1 件) | 隅邑(149) | 陽遼邑(169) | 鄧邑(193) |
| (大厖之)鄧邑(153) | 郢啟之郢邑(100) | 郢邑(149) | 郢邑(169) | |
| | | 房邑(149) | 鄧邑(171) | |

據《表 2》，包山簡的諸邑有①某官之邑、②某爵之邑、③某人之邑、④一般諸邑等 4 種。按：①是有官職者的食邑；②是有爵位者（世族、封君）的領邑或封邑；③可能是無官爵，但是“當地有力者”（土豪首領層）世代統率的領邑；④是指不屬於上述組織或領主而孤立地散處的羣小諸邑。當然①、②、③爲有官爵者和地方土豪的勢力範圍，這加強了楚國地方統治的分割性、離心性。另外，可以推測爲地方首領的“某人”（③），被記載於公文書的事實（以“縣·里·爵·名”書式爲準的秦簡全無這種事例），反映了楚國不得已承認他們的采邑領有權，因此舊采邑支配體制直到戰國中期仍然存在的事實。但這些領邑與①、②相比在數量和規模上都比較小，且其中一部分統轄於縣·寔·啟·邑，由此可知楚國對於減少他們分權性的影響力也做了一定的努力。所屬未詳的諸邑④也存在於“縣制”之外，因此與①～③一樣，可能會妨礙直轄縣制在全國的滲透。

我已推定，楚國諸邑可能是與縣制相反的分權性、采邑性的組織，以下將要探索楚邑內部的社會、經濟實況。簡書中的諸邑多數與“田”有緊密聯繫，這暗示邑位於郊野農村，兼爲聚落地和耕作地。這種情況與西周以來古老的田、邑融合的情況有關，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春秋公羊傳》桓公元年）。實際上，在簡書諸邑內，關於“田”的各種糾

紛，如“飢田”世襲紛爭、確定田界、“徵田”(不法徵收田稅)，“賺田”(不法擴張土地)、“斂田”(搶佔土地或強徵田賦)等多有記載。以下要對具體的事例進行考查。

①左馭番戌飢田於郢 寔歟邑城(町)田一素畔舊(畝)。戌死，其子番步後之。步死，無子，其弟番黠後之。黠死，無子，左尹命其從父之弟番款後之。款飢田妨於債，骨質之。左奴游，晨骨積之有五即(則)，王士……謂番戌無後。左司馬道命左令定之，謂戌有後。(151—152)

②啻蘆之田……笑一邑，郢一邑，并一邑，郢一邑，余為一邑，鄒一邑，凡之六邑。王所舍新大廐以啻蘆之田，南與鄒君執疆，東與蘆君執疆，北與鄧陽執疆，西與鄒君執疆。(153—154)

③……迅令人周甬受(縣)正季訥取以賺田於章寔籒邑。(77)

④……郢斂之郢邑人走仿登成訟走仿郢繡以其斂湯沔與彌泊之故。(100)

⑤(一)郢君之右司馬軍臧受期…鄧右忤尹學鉉受期……不歸登人之金，審問有害。(43—44)

(二)鄧賸尹西幣與鄧君之司馬奉為皆告成，謂：小人各微於小人之地，無謗(假)。登人所漸(斬)木四百先於鄧君之地襄溪之中。其百又八十先於鄧地郢中。(140)

①記載了“邑”內的一次“飢田”的世襲糾紛。“飢田”是“食田”即“(官吏)祿田”，簡文上本指“左馭”官番戌之食祿。番戌死後，其子番步繼承此田，但步無子，其死後，戌之弟黠繼承之。黠死後也無子，於是出現了旁系親戚能否世襲的法律問題。當時“左尹士”(推測是左尹的法律諮議官員)承認番家的世襲權，但被“王士”(似是楚王直屬律士)否認。最後，“左司馬”使“左令”裁定番家有繼承權。結果，“飢田”變質到番家的世襲私領。

②記載了確定“啻蘆之田”四方地界的工作，此“田”似包含耕作地和非耕作地，如山林、蘆澤、濕地、丘陵等種類繁多，規模較大的“廣義之田”。可能②之“田”也與①之“飢田”同樣地被世襲，由此推斷“邑”內“田”中，充當有官爵者世襲的食田或采邑的田地也不少。按：到戰國中後期在楚國這種世襲田邑的殘存可能相當多，由此吳起變法中的“三世而收爵祿”(《韓非子·和氏》)的土地改革很難成功。

③“賺田”，④“斂田”也都是在“邑”發生的土地糾紛案件。④的“郢斂”似是無官爵當地首領，並且“湯”釋為“蕩”、“沔”釋為“防”、“彌”為“彌”、“泊”為“澤”，以“湯沔(蕩防)”似指水蕩和堤防，“彌泊(彌澤)”指深澤。^[19]那麼④反映了耕作地“田”之外的山林蘆澤也是土地糾紛對象。此外，155號的“徵五連之邑於葬王士”中“五連之邑”推測為墓地，從中大型楚墓多數位於丘陵來看，此邑似是丘陵。⑤記述了在諸邑內山林蘆澤的利用問題上，兩個官員(鄧縣賸尹與鄧君之司馬)和一般居民(登人)之間發生的徵稅糾紛，登人認為兩官非法強徵田稅，但兩個官員認為可以合法地徵收山林蘆澤之稅。雖然最終結果未詳，但這案件暗示對山林蘆澤的佔有、利用及其徵稅原則上，官民之間的觀點差異和糾紛逐漸加深的情況。

總之，“邑”不但包含一般聚落地，而且還包括耕作地和其他山林蘆澤、丘陵、飢田(祿田)、食邑、采邑等多種多樣的土地與生活空間的基層組織，因此成為各種所有權、利用權、

徵稅權紛爭的溫床。除了這種複雜的結構之外，“邑”內封建性的舊采邑式支配的殘存相當多，另外當地有力者與有官爵者的私權性的影響力也不少，因而直轄性的縣制，可能比縣·里系統還不發達。因為這些封建性聚落組織散處各地，所以到戰國時代楚國統治體制之分散性、粗放性的情況難以完全清除。

2. 州的性質和結構

除了封建性、分散性的諸邑之外，包山楚簡又有“州”的記載，共有 41 處。整理如下表：

表 3：楚國之州

* “某族之州”即在地方有勢力的宗族之領州，應包含於“某人之州”。

| ①某官之州(21 件) | | ②某爵之州(8 件) | ③某人之州(10 件) |
|----------------|------------------|--------------|-------------|
| 郢司馬之州(22) | 鄧(期)思公之州(163) | 邱易君之州(27) | 邵無競之州(95) |
| 新游宮中餼之州(35) | 鄧令之州(165) | 鄧君之耆州(68) | 喜人□州(164) |
| 福易剗尹之州(37) | 鄧醢尹之州(165) | 秦大夫橘之州(141) | 斂之州(164) |
| 霑(靈)里子(之)州(42) | 鄧寢令之州(166) | 新楚君之州(172) | 大堵之州(174) |
| 宣王之垞州(58) | 登軍之州(173) | 鄧君新(之)州(180) | 兢貯之州(180) |
| 登公鳩之州(58) | (鄧)易莫釐(敖)之州(181) | 坪夜君之州(181) | 邵上之州(181) |
| 大臧之州(72) | 右司馬援之州(182) | 鄧君之州(189) | 樹族之州(183) |
| 迅大斂瑯之州(74) | 戕鄧公之州(185) | 坪陵君之州(192) | 王西(之)州(184) |
| 小臧之州(80) | 株易莫釐(之)州(189) | | 邛兢之州(189) |
| 廬人之州(84) | 篁令(之)州(190) | | 笑(之)州(190) |
| 司衣之州(89) | | | * 某族之州(1 件) |
| | | | 鄧族之州(181) |

按《表 3》，楚國之州似有①“某官之州”、②“某爵之州”、③“某人之州”等 3 種。這些州可能是“食州”，即①是有官職者的食州；②是有爵位者的食州；③似是“當地有力者”的食州，其中有官職者的食州最多。因為有官爵者和“當地有力者”（及其宗族）非但被賜與食邑、食田，而且還被賜與食州，所以楚國的直轄性的地方統制可能更萎縮。這種狀況可能到戰國後期仍然存在，因此屈原“哀州土之平樂（憾嘆食州的繁盛）”（《九章·哀郢》）。戰國時代秦國和中原諸國漸漸縮小采邑、食邑、食州以強化中央集權，而相反地楚國仍然保持着不少的分權性食邑、食州。^[20]這就妨礙了直轄縣制和中央集權，導致統治體制的弛緩。但“食州”一般指賞賜“州”的收稅權（沒有承認領有權、世襲權）即“賜稅”，也稱“稅州”、“食稅州”，當然這與賞賜領有、世襲田邑內土地、人民的食邑、食田（即“賜邑”）有區別。由此推測，“食州”當然比“縣制”系統組織在直轄性、公權性上要弱，但比“邑”似則稍強。因此不妨認為，楚簡中的“州”是直轄統治的典型“縣”和分割性的象徵“邑”之中間組織，又雖然“邑”和“州”同樣地屬於“邑制”系統，但兩者的分割性、離心性存在着差異。如果比較分割性、離心性由

強而弱(直轄性、公權性由弱而強)的話,可能為某人之邑 \geq 某官爵之邑 \geq 某人之州 \geq 某官爵之州。“縣制”系統也有這樣的差異(縣·里的直轄性、公權性比縣·或·敵·邑更強),如上所述“縣制”系統之直轄性、公權性比“邑制”系統更強。

關於食州規模,楚簡沒有直接記述,但如果參考《周禮·大司徒》中的“州”為 2500 家,《管子·立政》中的“州”為千家,《管子·度地》中的“州”為萬家等,推測實際上可能為幾千家左右,在數量上也許位於“或”、“敵”二者之間。這樣的中型、大型聚落與食邑、食田一起屬於有官爵者或地方首領的話,難免造成統治上受到分權性和私領性的影響。近數十年間發現的楚國官僚和封君的豪華燦爛的墓葬及其隨葬品,也證實楚國官爵者的巨大經濟力和離心傾向。因此,楚國與秦相比,郡縣化、“齊民”化過程難以順利前進。

※ ※ ※

綜上所述,戰國時代楚國雖然部分地建立了直轄“縣制”,但在更廣大的地域上卻不能避免分散性、封建性“邑制”的支配。結果,在楚國內公權性、直轄性的“縣制”系統統治組織即:①縣·里/官·里、②縣·或·敵·邑,與封建性、分割性的“邑制”系統聚落組織即③某官爵之州、④某人之州、⑤某官爵之邑、⑥某人之邑等長期共存,互相頡頏。

以上 6 種系統組織,從國家直轄統治實現的程度即公權性、向心性由強而弱的順序來說,可以排列為①>②>③ \geq ④ \geq ⑤ \geq ⑥。相反地,比較各地域的獨自性、分割性、離心性由強而弱的話,似是⑥ \geq ⑤ \geq ④ \geq ③>②>①。由此可知,戰國楚的統治體制兼有集權性、向心性和分散性、離心性的兩種相對性質。我想要把楚國這種兩面性、矛盾性的支配體制,用“‘縣邑’支配體制”這樣的新概念來表現。由於“縣(制)”代表一元性的直轄統治,“邑(制)”指封建性的間接支配,所以“‘縣邑’支配體制”恐怕代表了兩種相反的系統混淆的戰國楚的國家體制。楚國固有的“‘縣邑’支配體制”顯然區別於戰國秦的中央集權性、一元性的“郡縣齊民支配體制”,因為這種體制始終持續,所以楚國的郡縣齊民化改革難以完成。

到目前,關於包山楚簡的研究以考釋文字為中心,但用它來探討楚國統治體制結構的全體局面的成果還不够,我的研究希望彌補這種局限,和進一步地探索楚國體制之固有特色。而且,要更明顯地、系統地瞭解楚國統治體制的特徵和整體結構,需要有機地、綜合地探究並比較分析其他諸國的統治行政的情況,就可能通觀先秦時代統治體制之全局。如上所述,楚國與秦國相比,郡縣化、“齊民”化過程難以順利進行。因此戰國時代楚國統治體制和人民編制,似保有相當的多元性、複合性的結構。為了更詳細地證實這個問題,除了本稿所探索的地方行政組織以外,對於戰國楚的官職體系、司法制度和社會風俗、文化思想等多方面,也需要精闢地考察,筆者將著另文論述這些問題。

注 釋

[1]張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0~54頁。

[2]洪亮吉:《春秋十論》,《更生齋文甲集》卷2,“春秋時以大邑為縣始於楚論。”並且據楊寬:《春秋時代楚國縣制的性質問題》,《中國史研究》1981年4期,楚的置縣實況有3種類型。即①滅鄰近小國而改造為縣:權、那處、申、息、鄧、蔡、陳,②

- 改造小國舊都爲縣：商、期思、葉、沈、白、寢，③改造邊境別都爲縣：武城、析、東不羹、西不羹等。
- [3]《左傳》（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修訂本）成公七年，833～834頁，“楚圍宋之役，師遷，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
- [4]安倍道子：《春秋時代の申縣・陳縣・蔡縣をめぐって》，《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41輯，1984年。殷崇浩：《春秋楚縣略論》，《江漢論壇》1980年4期，85～86頁。
- [5]增淵能夫：《先秦時代の封建と郡縣》，《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年，400～410頁。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48～549頁。他指楚縣始終保持（西周春秋式）都鄙制度。
- [6]顧頡剛：《春秋時代的縣》，《禹貢》第7卷6、7合期，1937年。平勢隆郎：《楚王と縣郡》，《史學雜誌》90卷2號，1981年。楊范中、祝馬鑫：《春秋時期楚國執權政治初探》，《江漢論壇》1991年4期。
- [7]對原釋文的“郢思”或“鄧思”釋爲“期思”，參看湯餘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2期。李天虹：《包山楚簡釋文補正》，《江漢考古》1993年3期。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附錄二：釋文。
- [8]因爲楚文字表記習慣上常贅增“宀”、“土”（如：宀、墜），所以不少研究者主張兩字是同字。對於楚文字的特徵，參看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259～268頁。陳邦懷：《戰國楚文字小記》，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9]包山楚簡之外，“下蔡宮大夫”璽，“上陽行宮大夫”璽，“上□宮大夫”璽，“江陵行宮大夫”璽（《古璽匯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0097、0099、0100、0101）等多數大夫璽被發現了，以實證“宮”和“宮大夫”的存在。
- [10]曹錦炎：《包山楚簡中的受期》，《江漢考古》1993年1期，70頁。他說“宮”和“邑”間有大小區分。陳偉：《包山楚簡初探》，98～100頁。他也說“宮”指縣級大邑（因春秋戰國的有稱縣爲邑的習慣，所以邑和宮有時兼稱縣）。參看着兩種觀點，我推斷在楚國區別使用“宮”（縣的別稱）和“邑”（羣小自然聚落）。兩位先生祇指出兩者的規模不同，但是我主張兩者的性質和內部結構也不同（以下見後）。
- [11]參看河村源：《西周時代の邑と里について》，《史叢（日本大學）》30，1983年。
- [1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法律問答》，219、231頁。
- [13]李成珪：《秦地方行政組織과 그性格—縣의組織과 그機能을中心으로》，《東洋史學研究》31，1989年，33頁。
- [14]李成珪：前揭論文，40～46頁。
- [15]這式持續到漢代，屢見於居延漢簡。《漢書·宣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253頁，“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瘠死者所坐名、縣、爵、里。”
- [16]《漢書·地理志》，1566頁，“（南郡）枝江，故羅國……其故地故羅國，蓋羅徙也。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今羅縣是也。”上同1639頁，“（長沙國）羅。”應劭注，“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漢書·五行志》，1356頁，“左氏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斗伯比送之。”
- [17]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7年，232～233頁。
- [18]關於“采邑支配”，參看伊藤道治：《中國古代國家的支配構造——西周封建制度と金文》，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年，第3章2、3節：《采邑、公邑における土地と民の支配（一）、（二）》。
- [19]劉信芳：《包山楚簡司法術語考釋》，《簡帛研究》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28頁。
- [20]劉澤華、劉景泉：《戰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3期。何浩：《戰國時期楚國封君初探》，《歷史研究》1984年5期。何浩：《楚國封君封邑地望續考》，《江漢考古》1991年4期。何浩：《論楚國封君制的發展與演變》，《江漢論壇》1991年5期。

包山楚簡所見的“盟”

◎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 廣瀨薰雄 著

◎ 曹峰 譯

先秦時代，在訴訟場合存在過某種形態的盟誓，這可以廣泛地得以確認。但西周金文中所見盟誓形式叫作“誓”，與此相對包山楚簡則叫“盟”，進而內容也不相同。訴訟中所見的這種“盟”，在傳世文獻中始終未得到過確認，因包山楚簡的出土纔首次得以證實。本文通過比較與訴訟有關的金文中的“誓”、春秋時代的“盟”，以明確包山楚簡所見的“盟”的性質。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一章 金文所見與訴訟相關的“誓”

與訴訟相關的金文數量極為有限，目前要全面瞭解西周時代訴訟情況還很困難，但可以知道的是，透過這些與訴訟有關的金文，可看出它們大都通過“誓”終結訴訟。敗訴者與勝訴者及裁定者之間形成約定後結束訴訟，敗訴者表示服從，履行其約定。其典型的例子可舉五祀衛鼎、鬲攸從鼎。

隹正月初吉庚戌，衛以邦君厲告於井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隰白(伯)、白(伯)俗父曰：“厲曰‘余執隹(恭)王卣(洳)工於邵大室東逆雙(榮)二川’，曰‘余舍女(汝)田五田。’”正廼訊厲曰：“女(汝)貯田不。”厲廼許曰：“余審貯田五田。”井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隰白(伯)、白(伯)俗父廼頌(講)，事(使)厲誓。廼令參有嗣(司)嗣(司)土邑人趙、嗣(司)馬頌人邦、嗣(司)工陞(隋)矩、內史双(友)寺翳帥履裘衛厲田四田。廼舍寓(宇)於厥邑。(五祀衛鼎)

譯文：時值正月，月相為初吉，庚戌這一天，衛同邦君厲一起告於井伯、伯邑父、定伯、隰伯、伯俗父前。衛說“厲說了‘我正在督促位於邵大室東側與北側的榮之二川的恭王河川工程。我給汝田五田。’”長官於是問厲“汝賣田了沒有。”厲承認“我的確實了田五田。”井伯、伯邑父、定伯、隰伯、伯俗父於是作了協議，並讓厲發誓。命三有司即司土邑人趙、司馬頌人邦、司工隋矩，及內史友、寺翳，帶

着裘衛踐履屬之田四田。於是屬在其邑中給了衛房屋。

這裏，有作為裁定者的井伯、伯邑父、定伯、隰伯、伯俗父讓作為敗訴者的邦君厲發誓的記錄。

隰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在)周康宮儼大室。隰從以攸衛牧告於王曰：“女(汝)覓我田。”牧弗能許隰從。王令省，史南以即號旅。號旅廼事(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隰從其且(租)，射分田邑，則殺(釋)。”攸衛牧則誓。(隰攸從鼎)

譯文：時在三十二年三月，月相為初吉，壬辰這一天，王在周康宮的儼大室。隰從和攸衛牧一起告於王前。隰從說“你要了我的田。”牧不能認可隰從的說法。王命令前去調查，於是史南到了號旅那裏。號旅讓攸衛牧作了如下誓言。“如果我不向隰從繳納租稅，而要分其田邑的話，願受放逐。”攸衛牧發誓了。

這也是強制讓敗訴者攸衛牧發誓的記錄。

考察以上與訴訟有關的金文，可以確認這些訴訟大致有着以下的程序。

一方當事者(甲)的主張：“曰……”

另一方當事者(乙)的主張：“許曰……”

裁定者(丙)的裁定：“廼曰……”或“廼使乙誓曰……”

另一方當事者(乙)的誓約：“則誓”

如“廼使乙誓曰……”之文句所示，在訴訟終了之際，先由裁定者陳述誓辭，然後將相同的話強制性地讓敗訴者發誓。^[1]

還有這樣的例子。

隰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莽上官。白(伯)揚父廼成贊曰：“牧牛。戲乃可湛(堪)。女(汝)敢以乃師訟。女(汝)上₁先誓。今女(汝)亦既又₁(有)誓。專、趙、魯、覲、儻，亦茲五夫既服₁乃誓。女(汝)亦既從₁辭(辭)從誓。必可(苛)。我義(宜)便(鞭)女(汝)千，嚴嚴女(汝)。今我赦女(汝)，義(宜)便(鞭)女(汝)千，黜嚴女(汝)。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罰女(汝)三百受。”白(伯)揚父廼或事(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擾乃小大事，乃師或以女(汝)告，則至乃便(鞭)千，嚴嚴。”牧牛則誓，厥以告吏覲、吏呂於會。牧牛辭誓成，罰金。假用作旅盂。(倨匱)

倨匱是非常難讀解的金文，對其的解釋至今諸說紛呈、並不一致。但是，從“女上₁先誓(汝背逆(?)了以前的誓言)”^[2]、“白揚父廼或事牧牛誓(伯揚父於是又讓牧牛按以下誓辭發誓)”、“乃師或以女告(汝的上官再和汝發生訴訟)”來看，以前曾經有過一次訴訟，訴訟的結果是讓牧牛發誓，但他未履行，所以有了第二次訴訟。這就是這段金文的內容。

“必可(苛)。我義(宜)便(鞭)女(汝)千，嚴嚴女(汝)。今我赦女(汝)，義(宜)便(鞭)女(汝)千，黜嚴女(汝)。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罰女(汝)三百受。”這段話中的三種刑罰的意思是，因為牧牛沒有履行第一次訴訟的誓言，所以被處罰。有意思的是，處罰的內容分三種，即“便女千，嚴嚴女”→“便女千，黜嚴女”→“便女五百，罰女三百受”，有個逐步減輕的過程。從最後“牧牛辭誓成，罰金”來看，牧牛接受了第三種的處罰，即支付了“便女五百，罰女三百受”的罰金。那麼，第一種的處罰“便女千，嚴嚴女”為什麼會先提出來？也

許這是因為牧牛在第一次訴訟中發過誓，如果不履行誓言的話，就接受“便女千，黻黻女”的處罰。這樣看來，也許第一次訴訟中發的誓也和第二次訴訟的誓言即“自今余敢擾乃小大事，乃師或以女告，則至乃便千，黻黻”幾乎一樣。也就是說，兩次訴訟中重複着幾乎一樣的誓言。這個案件在誓言的履行上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發，即需要發誓的人僅僅是敗訴者一方，而且是否履行誓言也由敗訴者自己決定。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確認，與訴訟相關的金文中所見的誓，作為終結訴訟的手段發揮着作用。此外舉行誓的主體是敗訴者，勝訴者對敗訴者強制性地讓其發誓。從誓辭的內容來看，勝訴者和裁定者制定某個約定，敗訴者發誓服從通過訴訟形成的約定，並加以履行（但敗訴者是否真的履行誓言，由其自己決定）。同時還要注意的是，在與訴訟相關的金文中舉行盟的例子一個也沒有。可以這樣認為，西周時代的訴訟中，較之盟，誓發揮着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春秋時代的盟

在傳世文獻中，有關盟的記述很多，但其大部分是春秋時代的盟。特別是《左傳》中涉及到盟的記載格外豐富。我們從中可以知道舉行盟的具體情況。

首先簡單地概括一下盟的特徵。^[3]關於盟的定義，常常被引用的是《禮記·曲禮下》的下一段。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莅牲曰盟。

如“莅牲曰盟”所示，盟最大的特徵是用犧牲立盟某事。反過來說，誓不用犧牲祇用語言約束某事。在這一點上誓與盟不同。還必須注意的是舉行盟誓的主體，誓的主體祇是宣誓的一個人，盟則是多數人。在這點上盟與誓大不相同。

關於盟所發揮的機能，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類型。

第一，會盟。會盟是多國間締結的政治協約。霸者召集其它諸侯舉行會盟最為典型。這樣的盟不勝枚舉。最有名的是齊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傳·僖公九年》）

關於葵丘之盟，《孟子》有詳細的記述。據此，《左傳》中所記“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這句話當視作是盟辭的最後一句。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第二，宣誓絕交的盟。衆多的人集聚在一起結黨宣誓要放逐敵對者。這可以看做是“盟某”的表現方式。滋賀先生的論文中詳細地研究過這樣的盟。它也是政治協約的一種，不過不同的是這是由國內的權貴召集的。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漬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左傳·襄公三十年》）

這描述了鄭國內亂的一個場面。紛爭發生在子皙和伯有之間，鄭大夫們關於支持誰打倒誰，國內分成了兩派。最終亡命國外的伯有攻回鄭國。這一年裏爲了收拾鄭國的局勢，人們多次舉行了盟的活動。

第三，戰爭中的盟。這是決定戰爭勝敗，約定和解條件的盟。例如有這樣的例子。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諸侯皆不欲戰，延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抽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迺盟而還。（《左傳·襄公九年》）

從以上文章看，盟是當事雙方爲取得和解而締結的，並不是約定敗者必須遵從勝者的要求。同樣誓有時也在戰爭中舉行，但在上述方面其性質與盟完全不同。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左傳·昭公四年》）

這裏，楚共王強制慶封誓（“使言曰……”），其做法與上述金文所見使某人誓的做法（“邇使乙誓曰……”）是相似的。通過比較盟辭和誓辭，可知盟是爲了達成和解舉行的，誓是勝者強制敗者舉行的。

第四，君主爲保障臣下地位而舉行的盟。我們往往可以看“賜盟”這樣的表現方式。與其它不同的是，這個盟是君主一個人舉行的。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從侯馬盟書中我們可以得知春秋時代盟的具體面貌。侯馬盟書是春秋晚期晉國有關盟的記錄。當時韓、魏、趙的勢力壯大，晉處於分裂前夜。在權力紛爭過程中，各種貴族勢力互相締結了許多盟書。因此通過侯馬盟書我們可以瞭解春秋時代盟的真實情況。研究結果表明傳世文獻所記錄的由衆多的人使用犧牲完成的盟並非單純的虛構。其中一個盟書是這樣的。

郕緄敢不聞（判）其腹心以事其主（主），而敢又（有）志〔復〕趙盾及其子孫、史黶及其子孫於晉邦，及羣虐（呼）明（盟），廬（吾）君其明（盟）惡（殛？）覘（示）之，麻臺（夷）非是（氏）。（四九：二）

如果郕緄敢不明確其真心以幫其主，意圖讓趙盾及其子孫、史黶及其子孫返回晉邦，跟他們的黨徒結盟，吾君就通過盟宣告誅殺，消滅他誅滅其氏族。

侯馬盟書多次重複這樣的盟“不許敵人進入晉地”。這是國內大夫們宣誓齊心合力對抗敵人，它屬於上述盟第二種類型。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盟的機能跟誓大不一樣。也就是說，盟不是勝者強制敗者執行的，而是有着共同意志的人們爲了強化他們同盟。在傳世文獻中我們找不到春秋時代在訴訟中舉行盟的記錄。筆者認爲這一點很重要。

第三章 包山楚簡所見的盟

包山楚簡所記載的訴訟中，沒有舉行過誓的跡象，但可以確認舉行過盟。就是說，在訴訟中不舉行誓，這一點包山楚簡和西周時代不一樣，而在訴訟中舉行盟這點又和春秋時代不一樣。那麼，包山楚簡所見的盟究竟起着怎樣的作用？

包山楚簡所見的盟，以 131—139 號簡所記最詳。

僕軍造言之。視日以鄒人𢇛(舒)慶之告誼(屬)僕,命遠爲之剡(斷)。鄒之正既爲之盟(盟)誼(證)。慶逃,𢇛(舒)𢇛(拘),其餘𢇛(執),𢇛(將)至𢇛(時)而剡(斷)之。視日命一𢇛(執)事人至(致)命,以行古𢇛上恒。僕𢇛(倚)之,以至(致)命。(137 號簡反)^[4]

譯文:本人軍謹向您作以下的報告。視日把鄒人舒慶的訴案委託給了我,命從遠爲之作出判決。鄒的正已經爲之舉行過盟證。舒慶逃亡,舒𢇛越獄,其他人均已拿獲,預定不久之後可下決斷。視日命某個執事人報告此事,派遣了古𢇛上的恒。我托他向您作報告。

這裏,針對視日發出的“從速決斷”的命令,回答是“因爲已經舉行過盟證,所以不久之後可下決斷”。由此可知,盟是下決斷前的前提條件、必要手續。

那麼,這盟證實際上是怎麼樣舉行的呢?

𢇛、𢇛皆言:“苛冒、恒卯𢇛殺𢇛(舒)𢇛。小人與慶不信殺恒卯,卯自殺。”恒𢇛、苛冒言曰:“𢇛(舒)慶、𢇛(舒)𢇛、𢇛(舒)𢇛殺恒卯,慶逃。”

𢇛(夏)𢇛(夷)之月癸亥之日𢇛(執)事人爲之盟(盟)𢇛(證)。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盟),皆言曰:“信𢇛(察)𢇛(問)智(知),𢇛(舒)慶之殺恒卯,𢇛、𢇛與慶皆(偕)。𢇛(察)𢇛(問)智(知),苛冒、恒卯不殺𢇛(舒)𢇛。𢇛(舒)𢇛𢇛(執),未又(有)剡(斷),𢇛𢇛(拘)而逃。”(136-137 號簡)

譯文:舒𢇛和舒𢇛都說,“苛冒和恒卯殺害了舒𢇛。我和舒慶確實沒有殺恒卯。卯是自殺的。”恒𢇛和苛冒說,“舒慶和舒𢇛、舒𢇛殺了恒卯,舒慶逃了。”

夏夷之月癸亥之日執事人爲之舉行了盟證。總共二百十一人參盟,大家都這麼說,“確實察此事,問此事,知此事。舒慶殺了恒卯,舒𢇛和舒𢇛及舒慶都參與了。我們對以下的事情都察之,問之,知之。苛冒和恒卯沒有殺舒𢇛。舒𢇛被捕後,還沒有下判決,就從牢獄脫逃了。”

這個案子是因舒𢇛和恒卯死亡而引發的爭訴。提訴人舒慶提出是苛冒和恒卯殺害了舒𢇛,恒卯自殺。與此相對,對方恒𢇛和苛冒提出是舒慶和舒𢇛、舒𢇛三人殺害了恒卯。在兩當事人意見截然相反的情況下,盟被舉行了。人們盟證的內容是“確實察此事,問此事,知此事。舒慶殺了恒卯,舒𢇛和舒𢇛及舒慶都參與了。我們對以下的事情都察之,問之,知之。苛冒和恒卯沒有殺舒𢇛。”通過舉行這樣的盟,可以確定兩當事人究竟哪一位所主張的事實是真實的。

除了 131-139 號簡的事案以外,包山楚簡裏還有 120-123 號簡、23 號簡兩處事案中有關於盟的記述。

□客監匠𢇛(𢇛)楚之𢇛(歲),享月乙卯之日,下𢇛(蔡)𢇛里人𢇛𢇛告下𢇛(蔡)𢇛𢇛(執)事人𢇛(陽)城公𢇛𢇛。𢇛言𢇛(謂):“𢇛𢇛𢇛(竊)馬於下𢇛(蔡)𢇛(而?)𢇛(𢇛)之於𢇛(陽)城,或殺下𢇛(蔡)人𢇛𢇛。小人命爲𢇛(契)以傳之,𢇛(陽)城公𢇛𢇛命𢇛𢇛解𢇛(拘),傳𢇛𢇛得之。”

享月丁巳之日,下𢇛(蔡)山𢇛(陽)里人𢇛𢇛言於𢇛(陽)𢇛(城)公𢇛𢇛、大𢇛尹屈達、𢇛𢇛(陽)莫𢇛𢇛(𢇛)𢇛、𢇛𢇛。𢇛言𢇛(謂):“小人不信𢇛(竊)馬,小人信𢇛下𢇛(蔡)𢇛(關)里人𢇛女返、東𢇛里人𢇛貯、𢇛里人𢇛不𢇛(害)𢇛殺𢇛𢇛於𢇛不𢇛(害)之官(館),𢇛(而?)相𢇛之於大𢇛(路)。”……

邦倖未至剌(斷),有疾,死於苟(拘)。雇女返、場貯、競不割(害)皆既盟(盟)。(120—123 號簡)

譯文:□客監匪來到楚國那一年享月乙卯之日,下蔡的蒧里人會闢告於下蔡的咎的執事人陽城公業畢。會闢說,“邦倖在下蔡竊馬而在陽城賣這匹馬,又殺下蔡人會畢。小人我請求寫書契逮捕邦倖。陽城公業倖命令僚的邦解拘捕他,已經逮捕了他。”

享月丁巳之日,下蔡的山陽里人邦倖告訴陽城公業畢、大鮑尹屈達、鄆陽莫翥臧竈、舍華。邦倖說,“我確實沒有竊馬。我確實在競不害之館跟下蔡的闢里人雇女返、東邛里人場貯、蒧里人競不害一起殺害了會畢,在大路上遺棄了他的屍體。”……

邦倖未及裁斷,因病在獄中死亡了。雇女返、場貯、競不害都舉行了盟。

這裏同時審理的是竊馬和會畢被殺的兩個案子。被告人邦倖承認他自己殺害了會畢,不過否認竊馬。但沒到判決之前邦倖就死了。雇女返、場貯、競不害舉行了盟。事案就此終結了。^[5]

據 131—139 號簡的案子再來看這個案子,這裏也是兩個當事人的意見正好相反,所以他們必須通過盟來確定哪一位主張是正確的。可是在盟舉行之前邦倖就死了,無法再作決斷。

下面再來看 23 號簡的案子。

八月己巳之日,邻少(小)司敗臧(臧)未受期。九月癸丑之日,不遲(將)邻大司敗以盟(盟)邻之械里之敗無又(有)李亥凶(思),卅升(證)門(問)又(有)敗。秀不孫。(23 號簡)^[6]

譯文:八月己巳之日,邻的小司敗臧未受期。九月癸丑之日,如果不把邻的大司敗帶來盟證邻的械里確實沒有李亥思的話,那受期人就要受審而受處罰。秀不孫(作記錄)。

這個案子關涉到李亥思的居住地的問題。可能是想通過盟證證明李亥思不在邻之械里。那麼這裏所使用的盟辭可能類似於“邻之械里之敗無又李亥凶”。也就是說,在這裏盟也同樣起着確定什麼是事實的作用。

通過以上事例來整理一下包山楚簡中盟的特徵。首先是關於盟的主體。131—139 號簡是跟事件沒有什麼關係的二百十一個第三者,120—123 號簡是事件的共犯(不過他們不是被告人),23 號簡是紛爭發生地方的官吏。就是說,盟不是由訴訟當事人舉行的,而是由第三者舉行的。

其次是關於盟辭。131—139 號簡是“信設斷智,拿慶之殺佗卯,迺、迺與慶皆。設斷智,苛冒、佗卯不殺拿昀。拿焜執,未又剌,迺而逃。”23 號簡是“邻之械里之敗無又李亥凶。”這些盟祇宣誓肯定哪一位的主張是事實。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包山楚簡中的盟跟訴訟有關的金文中的誓的內容完全不同。就是說,誓是敗者宣誓將遵從訴訟的結果。與此對應,盟是確定所爭執的事實是否確鑿無疑。

最後是關於盟在訴訟中發揮的作用。訴訟首先要基於證據作事實的認定,然後在確認事實的基礎上下判決。包山楚簡中的盟是關於事實認定的宣誓,而與訴訟有關的金文中的誓就是一種最終判決。在程序上可以說包山楚簡中的盟早於與訴訟有關的金文中的誓。

所以“盟”和“證”結合而會形成“盟證”這樣的詞句。因為“盟證”的舉行，事實認定得以終結，可以下判決了，即可以下“斷”了。所以盟是作為斷的前提條件、必要手續。

至今為止，關於中國古代訴訟中的盟，常常引用《周禮·司盟》的以下一段文字來考慮問題。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鄭注：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

據此，可以說訴訟中所舉行的盟，是在作證之前舉行的，人們盟誓自己說的是真話。事實上包山楚簡中的盟也是這樣被解釋的。^[7]不過再看看包山楚簡中盟的實例，即知它不是宣誓要說真話，而是確定什麼是真話。從傳世文獻中找類似的盟，也許可舉出這個例子。

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泚〈泚〉泚〈盟〉，擣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藥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墨子·明鬼下》）

這裏，兩個當事人各自盟誓自己所說的事實是真話，並不是盟誓自己要說真話。可以說這也是作為立證手段的盟。

還有這樣的例子。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遁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史記·孟嘗君列傳》）

這裏說的是孟嘗君曾遭受了謀反的嫌疑。其中作盟的人通過自殺設盟，不跟某人約定某事，祇為了證明孟嘗君的無罪。這也是作為立證手段的盟，跟包山楚簡中的盟有着類似的性質。

從以上的例子看，應該說在戰國時代訴訟中所舉行的盟有着多種多樣的形態。所以，筆者認為，我們不可能祇據《周禮·司盟》的一段文字來解釋所有的訴訟中的盟，也不應該這樣去做。

附記：

在2001年8月於湖南長沙舉行的“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暨長沙吳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上，關於“盟證”的解釋，陳偉先生指出“盟證”指的是“盟”與“證”兩個手續。首先“盟誓（發誓）”說真話，然後“證言”某個事實。其實，陳先生在《包山楚簡初探》中已經指出：“簡文雖然有時盟證連言，但盟與證實際上是兩件事。盟是兩周時流行的一種儀式。……上舉簡書的盟施於證人，目的則是為了舉證的真實性（即信）”（143頁）。不過筆者仍然認為“盟證”是一個手續，並不是“盟”與“證”兩個手續。這是因為包山楚簡裏有一個例子按照陳先生的說法不能解釋。

八月己巳之日，鄰少（小）司敗臧（臧）未受期。九月癸丑之日，不遲（將）鄰大司敗以盟（盟）鄰之櫟里之敗無又（有）李亥自（思），升（證）門（問）又（有）敗。（23號簡）

如果像陳先生說的那樣，“盟”祇是舉行“證”前的一種儀式，那麼“盟鄰之櫟里之賁無有李亥思”的“盟”不應該是“盟”而應該是“證”，即“盟’鄰之櫟里之賁無有李亥思”應該是“證’鄰之櫟里之賁無有李亥思”。由於“鄰的櫟里確實沒有李亥思”這樣的事實是“盟”的賓語，顯然“盟”就是講述事實，是提供證言，而不是僅僅發誓說真話。

陳先生把“盟證”分成“盟”與“證”兩個手續之最大根據是 139 號簡反的記述。

左尹以王命告子郢公，命繫上讖（讖）獄為郢人拿（舒）涅盟（盟）其所命於此著（書）之中以為誾（證）。

陳先生是這樣斷句的：“盟其所命於此書之中以為證”，根據這個斷句他說：“盟為證的必然附屬物”。可是此文應該斷句為“繫上之讖獄為陰人舒涅盟。其所命於此書之中以為證。”意思是“命令繫上之讖獄為郢人舒涅作盟。將他在此所請求的人作為證人”。所以這是讓“證人”作“盟”的記述。這樣的話，“盟”在這裏跟“證”也是一樣的。

注 釋

[1]關於金文所見的“誓”字，孫常叔：《則灋度量則、則誓三事試解》（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6月）作過綜合的考察，他正確地指出“誓”是受制裁的敗訴者被強制執行的行為。

[2]關於“上𠄎”“𠄎”的解釋有多種多樣的說法。筆者從文意上來看，試圖把“上𠄎”“𠄎”推測為“違逆”的意思。

現簡單地歸納一下至今為止的各種見解。龐懷清、鎮烽等：《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青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1976年5月）把“𠄎”作“𠄎”，將其視為“忒”的假借字，解為“違背”，將“𠄎”作“𠄎”（𠄎的古文），並引《說文》“𠄎，瑞信也”視其為“恪守”的意思。程武：《一篇重要的法律史文獻——讀倭區銘文札記》（《文物》1976年第5期，1976年5月）、李學勤：《岐山董家村訓區考釋》（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劉海年：《倭區銘文及其反映的西周刑制》（法學研究編集部編《法學研究》1984年第1期，中國科學出版社，1984年2月）也基本上持以上立場。唐蘭：《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青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文物》1976年第5期，1976年5月）將“倭”作“𠄎”，視為“挺”的假借字，引《說文》的“挺，拔也”，視其為“背離”的意思。將“𠄎”作“𠄎”，視為“御”的假借字，理解為“處理”的意思。白川靜：《金文通釋》《倭區》（《白鶴美術館誌》第四九輯、白鶴美術館，1978年12月）將“𠄎”作“𠄎”，把戈視作使用聖器舉行誓約的“表示誓約方法的字”。將“𠄎”作“𠄎”，視作“忒”的假借字，理解為“違背”的意思。伊藤道治：《中國古代國家的支配構造——西周封建制度と金文》（中央公論社，1987年，283～286頁）將“𠄎”作“𠄎”，在其註（10）中釋其為“違”的假借字。將“𠄎”作“𠄎”，視為“違背”的意思。松丸道雄、竹內康浩：《西周金文中之法制史料》（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2月）將“𠄎”作“𠄎”，但意義不明。將“𠄎”作“𠄎”，視其為“印”。

[3]關於春秋時代的誓和盟，筆者較多地參考了滋賀秀三：《中國上代の刑罰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誓と盟を手がかりとして—》（《石井良助先生還曆祝賀法制史論集》，創文社，1976年3月）。

[4]“以行古繁上恆”這一句非常難解。劉信芳：《包山楚簡司法術語考釋》（《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把“繁”釋作“讞”的假借字，讀為“讞罪”，把“以行古繁上恆”釋作“按故例應議案於上恆”。史傑鵬：《關於包山楚簡中的四個地名》（《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五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6月）把“繁”釋作“湛”的假借字，把“繁上”看作是淇水河岸地。並將“古”看作是“故”的假借字，把“恆”理解為常法，“行古繁上恆”即“按照過去‘湛上’的制度行事”。

筆者認為這一句與“命繁上之戡獄為郢人李恆累（命令繁上之讞獄為郢人舒恆作盟）”（139號簡反）意思大致相同，通過比較可知“古繁上”乃地名，“恆”乃擔任讞獄這一官職的人的名字。關於“行”，筆者認為即“派遣”之意。“行某人”即將人作為“行”的賓語的例子在包山楚簡中還可舉出一例。

九月辛酉之日，新大廡陳漸受期。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代易（陽）廡尹郢之人或我於長墨（沙）公之軍，𡗗（𡗗）門（問）又（有）敗。（61號簡）

九月辛酉之日，新大廡陳漸受期。十月辛未之日，如不把代陽的廡尹的郢之人或我“行”至長沙公軍那裏，受期人要受審訊、受處罰。

[5]123號簡“郢倖未至剌，有疾，死於郢”的後面，有八字左右的空白，接着又寫“廡女返、場貯、競不割皆既盟”。筆者認為這說明，因被告人郢倖的死亡，此事件告一段落，文章可以終結了。然後作為事件的事後處理，記載了廡女返、場貯、競不割三個人所進行的盟。

[6]劉樂賢先生讀“𡗗”為“𡗗”，意為“信”。見《楚文字雜識（七則）》，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10月。

[7]例如，李零：《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1992年10月／王玉哲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李零：《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中，將120～123號簡、131～139號簡的“既盟”，解釋為“起誓”。周鳳五：《〈舍畢命案文書〉箋釋——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文史哲學報》第41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4年6月）也引用《周禮·司盟》的文章，以支持其說。

郭店簡《老子》校記(甲篇)

◎ 安徽大學中文系
◎ 何琳儀 程 燕

送(絕)智棄卞(辯) (1)

送：諸本均作“絕”。《說文》“絕，斷絲也，從刀系卩聲，𠄎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段注：“斷之則爲二，是曰絕”。按，𠄎從刀，從二絲，會以刀斷絲之意。^[1]《古文四聲韻》作“𠄎”_{P77}，簡文字形乃《說文》古文、《古文四聲韻》之省文，即二絲省作一絲。

卞：原篆作𠄎，裘按“當是鞭的古文”。檢戰國齊、燕、晉各系文字均作𠄎形。^[2]唯楚系文字作𠄎、𠄎等形。^[3]如果參照西周金文作𠄎(𠄎匜)，傳鈔古文作𠄎，《古文四聲韻》22引《籀韻》鞭之演變序列大致是：

𠄎 → 𠄎 → 𠄎 → 𠄎

具體而言，鞭本爲借體象形字，由於聲化的趨勢，其象形部分亦從𠄎聲。鞭(𠄎)並紐元部；𠄎，明紐元部，聲韻均合，《古文四聲韻》尚且保存𠄎從𠄎之遺意。𠄎作A形，參楚文字𠄎作𠄎(鄂君啓節)，𠄎作𠄎形(𠄎前鼎)，責作𠄎(郭店·太9)，深作𠄎(郭店·尊19)。^[4]A又作二形疑爲楚文字之變異，又作𠄎形，增一飾筆，戰國文字中屢見不鮮。至於漢碑作𠄎形，隸定爲卞顯然是楚文字𠄎之省簡。在典籍中或與弁字通用，如《左·昭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釋文》“弁又作卞”。本簡𠄎(卞)讀辯。簡本上下文作“送智棄卞”。帛甲作“絕聲(聖)棄知(智)”，帛乙作“絕聖棄知(智)”，王本作“絕聖棄智”，爲後人所改，顯然是儒道二學思想對立的產物。

覘(盜)側(賊)亡又(有) (1)

覘：諸本均作“盜”。覘從兆得聲。兆、盜均屬宵部，音近可通。《古文四聲韻》作𠄎_{P64}，疑與包山𠄎有關，亦作𠄎₆₇，參《說文》銳之古文作𠄎。《古文四聲韻》所引似另有所本。疑讀“奪”，詳見另文。

側:諸本均作“賊”。《說文》“賊,敗也,從戈,則聲。”側、賊皆從“則”聲,故可通,《古文四聲韻》作 a 𠄎 b 𠄎_{P84}, a 從戈,則聲。b 從戈,從則省聲。則本從鼎,參《金文編》。

凶(絕)僞(偽)棄慮 (1)

僞:諸本均作“仁”。蓋後人所改。僞,或讀作“偽”。^[5]《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楊倞注:“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爲。故‘僞’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其說可從。

慮:諸本均作“義”。蓋亦後人所改。慮,或改釋爲“慮”。^[6]慮、慮形似而誤。《荀子》“僞”、“慮”多連言。如《性惡》“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正名》“情然而心爲之擇謂動謂之僞”。其說可從。

三言以爲𠄎(辯)不足 (1-2)

𠄎:諸本均作“文”。或釋“弁”,通“辨”;^[7]或釋“史”,讀“使”。^[8]按:釋“弁”,可從。弁、史在簡帛文字中形近易混。弁、文均屬唇音,故音近可通。

見(視)索(素)保仆(僕) (2)

視:諸本均作“見”。“見”應是“視”之誤。《廣雅·釋詁三》“視,效也”。

少△(私)須(寡)欲 (2)

須:諸本均作“寡”。或釋“寡”之誤寫。此字又見於 24 簡,與“寡”有別,誤寫的可能性不大。《書·序》“須於洛汭”。馬注:“須,止也。”“須欲”與“寡欲”有程度的不同。又“須欲”與下文“不欲”(32 簡)義近。

江海(海)所以爲百浴(谷)王 (2)

海:諸本均作“海”。海,海之異體。《古文四聲韻》作:𣶒_{P88},右旁的四斜點應是“水”旁四點的移位,“𣶒”疑“每”之訛。

浴:帛甲、帛乙作“浴”,其它各本作“谷”。簡文作𣶒、𣶒,或隸定“渦”,^[9]甚有見地。《文選·江賦》“盤渦谷轉”,可證“渦”、“谷”有別。《廣韻》:“渦,水坳。”泛指小水。《老子》意謂江海爲諸多小水之歸宿。疑“浴”、“谷”爲“渦”傳鈔之誤。

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 (4)

厚:諸本均作“重”,義近互通。《古文四聲韻》作: a 𠄎 b 𠄎_{P48}, a 與《說文》“厚”之古文吻合。下似從子形,其訛變序列爲𠄎、𠄎、𠄎^[10],至於簡本其下似從“毛”者,又 a 之訛變。

舉(罪)莫厚虐(乎)甚欲 (5)

厚:想本、王本無此句,其它各本均作“大”。簡文字形作“𠄎”,由金文所訛變,且有聲化趨勢,蓋其下從主聲,主、厚均屬侯部。“厚”與“大”其義相涵。

甚:諸本均作“可”。簡文原篆作𠄎,與《說文》古文𠄎相對,可知簡文字形乃偏旁易位所致。此字下部所從作反“可”之形,故帛甲、帛乙遂誤作“可”。《古文四聲韻》作: a 𠄎 b 𠄎_{P48}, a 與《說文》古文形近, b 上部爲甚之訛變,下部所從待考。

咎莫兇(僇)虐(乎)谷谷(欲)得 (5)

咎:帛甲作“𠄎”,其它各本均作“禍”。𠄎、禍音同相通。《說文》“咎,災也。”咎、禍義同

相通。

僉：帛甲、傳本作“僉”，其它各本均作“大”。《說文》“糴”的籀文作“糴”，由此推之：“僉”可讀作“甚”。如上所云，甚有“大”義。《廣雅·釋詁三》：“僉，多也。”僉、僉、大義近互通。

以衍(道)差(佐)人室(主)者(6)

衍：諸本均作“道”。或以爲：讀爲“道”的“衍”是“從行從頁”的“道”省去聲符“首”而形成的，它和讀爲“行”的“衍”是人步於衢道之間的會意字，來源本一樣。^[11]可備一說。《古文四聲韻》作：a 𠂔_{p44} b 𠂔_{p44}a 即“道”，b 即“衍”，與簡文相同。

室：諸本均作“主”。《說文》段注：“經典作主，小篆作室。主者古文也。”《古文四聲韻》作：𠂔_{p39}，與簡文字形相似。

果而弗矜(矜) (7)

矜：帛甲、帛乙、王本作“矜”。《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毛傳：“矜，憐也”。應屬聲訓。“矜”與“憐”聲近，“矜”可能本作“矜”，後與“矜”相混。“矜”與“矜(矜)”聲音相近，故可通假。《古文四聲韻》作：𠂔_{p34}其下疑“命”之訛變。

其事好長(7-8)

長：帛甲、帛乙無，王本作“還”。或認爲：其事好長，應於“長”下斷句，尹灣漢簡《博局占》六博術語“長”，《西京雜記》作“玄”，玄乃深遠之義。疑王本“還”或可讀爲“遠”。^[12]按：原簡標點可能有誤，“長古”不辭。“長”從上讀，則“好長”疑讀“久長”。久、好之幽旁轉。“疚”通“充”（《通假會典》387頁），“好”通“旭”（《通假會典》724頁），此乃“好”、“久”相通之旁證。又“久長”見《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何久長”。37號簡文亦有“長舊”之例，讀爲“長久”。

必非(微)溺玄達 (8)

達：帛甲、帛乙同，其它各本作“通”。《廣雅·釋詁一》：“達，通也。”義近相通。《古文四聲韻》作：△△_{p75}，與簡文形似，此形上部與小篆“達”右上部相同。

夜(豫)虐(乎)奴(若)冬涉川 (8)

夜：帛甲、帛乙、河本皆作“與”，其它各本作“豫”。與、豫、夜均屬魚部，故可通用。包山簡“平夜”即典籍之“平與”，與之相類。^[13]

猷(猶)虐(乎)其奴(若)悞(畏)四 𠂔(鄰) (8-9)

𠂔：帛乙同，其它各本作“鄰”。《古文四聲韻》作：△△_{p16}，會二城相鄰之意。𠂔可分析爲“鄰”之初文又加注“文”聲。鄰，來紐真部；文，明紐諄部，來、明爲復輔音，真諄旁轉。^[14]

敢(嚴)虐(乎)其奴(若)客 (9)

敢：帛乙作“嚴”，其它各本作“儼”。按：“敢”應據王本讀“儼”，下文“客”則應讀“恪（恣）”。《禮記·祭義》“嚴威儼恪”，可證“儼”與“恪”連文。

客：帛甲、帛乙、王本均作“容”，其它各本同簡本。蓋因二字形近而誤。或以爲：作“客”者是也。客、釋爲韻。^[15]按：此說可取。

觀(渙)虐(乎)其奴(若)懌(釋) (9)

覲:想本作“散”,其它各本作“渙”。覲,從止,從見,袁聲。袁、渙皆元部字,音近可通。渙、散義近可通。《說文》,“渙,流散也。”《古文四聲韻》作𣎵_{P60}、𣎵乃𣎵之訛,𣎵則爲“𣎵”之訛。

澤:帛甲、帛乙作“澤”,想本作“洿”,其它各本作“釋”。《釋名·釋形體》:“洿,澤也。”澤、釋音近可通。

竺(孰)能庀以迄者 (10)

庀:原篆作𠂔。帛甲、帛乙作“女”,其它各本作“安”。或認爲:庀,滂紐脂部,宐,明紐質部,旁紐陰入對轉。《說文》:“宐,安也。”^[16]可備一說。

迄:帛甲、帛乙作“重”,其它各本作“動”。主、重上古聲母近,韻部分屬侯、東,陰陽對轉。^[17]戰國文字“冢”字習見,從“主”聲,讀“重”。故“迄”、“重”、“動”音近可通。王本“動”前“久”乃衍文。

執之者遠之 (10-11)

遠:諸本均作“失”。對照簡文下句,“遠”蓋“失”之誤。

亡執古(故)亡遊(失) (11)

遊:帛甲、王本皆作“失”。“遊”明確從“羊”聲。羊,喻紐四等,古讀定紐,失,審紐,古讀透紐,定與透均屬舌音,自可通假。^[18]

誓(慎)冬(終)女(如)門(始)末 (11)

誓:各本均作“慎”。有學者將此字改釋爲“塵”。^[19]《古文四聲韻》上平三一(16頁)引《古老子》作𡇗_{P16},從鹿省,從二土。簡文從土,訢聲,隸作“訢”,“訢”乃聲符。釋爲“塵”。塵,定紐真部;慎,禪紐真部,故“塵”可讀“慎”。

侯生能守之 (13)

能:帛甲作“若”,帛乙、王本作“若能”。能、若皆屬泥紐。下句皆有“將”,可知此句皆表示假設,四個本子意思基本相近。

守:諸本皆同。原篆作𠂔,其“十”旁與“又”旁位置互換,本應作𠂔。^[20]

天下皆智(知)𡇗(美)之為 𡇗(美)也 (15)

𡇗:帛甲、帛乙、河本、王本、傅本皆作“美”。𡇗、美乃一字之異體。甲骨文美作𡇗,作𡇗。前者乃人的正面之形,後者乃人的側面之形。《古文四聲韻》作𡇗_{P37}、𡇗_{P66},前者可隸定爲𡇗,《集韻》:“𡇗通作美。”

音聖(聲)之相和(合)也 (16)

音:帛甲作“意”,帛乙、河本、王本、傅本同簡本。音、音(意)形音皆有關涉。^[21]

是以聖人居亡為之事 (17)

聖:帛甲作“聲”,帛乙作“𡇗”,王本同簡本。聲、𡇗、聖音近可通。《古文四聲韻》作𡇗_{P67},與帛乙形近,從耳從口,會意,見甲骨文。

仆(樸)唯(雖)妻(微) (18)

妻:諸本皆作“小”,“妻”應讀“穉”,^[22]《方言》:“穉,年小也。”則妻(穉)、小義近可通。

萬勿(物)酒(將)自寅(賓) (19)

賓：諸本均作“賓”。《古文四聲韻》作：𠂔_{P16}，即方，從宀，萬聲。賓從貝方聲。二字音近可通。簡文從宀從貝，省聲符“万”。《爾雅·釋詁一》：“賓，服也。”

以逾甘零(露) (19)

逾：帛甲、帛乙作“俞”，其它各本作“降”。逾，簡本整理者認為：“疑讀爲揄或輸”，按當讀“輸”。《詩·小雅·正月》：“載輸爾載。”箋：“輸，墮。”《穀梁·隱六》“鄭人來輸”平傳，“輸者，墮也”。“墮”與“降”同義，故王本“逾”作“降。”^[23]或認為逾、降音轉，按逾屬侯部，降屬東部，韻部相近。然而，逾屬喻紐四等，降屬見紐，聲紐甚遠，故“逾”與“降”不能構成侯東對轉。

訃(始)折(制)又(有)名 (19)

訃：諸本均作“始”，音近可通。簡本原篆應隸定爲詎，參侯馬盟書“台”作𠂔。《古文四聲韻》作𠂔_{P10}。

折：諸本均作“制”。折、制同屬月部，音近相通。《說文》：“折，斷也。”《說文通訓定聲》：“制，以刀斷木。”二者義亦相通。古文字“制”，從刀從木，會意。參《戰國文字聲系》915頁。

夫亦廼(將)智(知)止 (20)

止：原篆作𠂔，應隸定爲止。“之”之繁文，讀“止”。河本作“之”，其它各本均作“止”。

猷(猶)少(小)浴之與江海(海) (20)

少：帛乙作“小”，河本、想本、王本、傅本作“川”。少、小一字之分化，自可通假。“川”似爲“小”之訛誤。

浴：帛甲、帛乙同，其它各本作“谷”。浴，疑“渦”之誤，參上“百渦王”。“小渦”與“江海”爲反義詞。

又(有)廼(蟲)城(成) (21)

廼：諸本均作“物”。廼，從頁，升聲，讀若狀。《易略例》注：“物，象也。”狀、象音義均近。

蟲：帛甲、帛乙作“昆”，其它各本作“混”。簡本“蟲”應爲“𧈧”之誤字。

敫(繡)蜀(獨)立不亥(改) (21)

敫：帛甲作“繡”，帛乙作“蕭”，王本、傅本作“寂”。“繡”、“蕭”與“寂”均屬齒音幽部。寂從叔得聲，“叔”和“敫”均屬舌音，猶上文“𧈧”(銳)作“盜”、“覩”。

繡：帛甲作“繆”，帛乙作“繆”，河本、王本作“寥”，想本作“漠”，傅本作“寔”。寥、繆均屬幽部，聲系可通。寥、寔義近可通。

虛(吾)𧈧(強)爲之名曰大 (21-22)

虛：或以爲“虎”之繁化，^[24]讀“吾”。

大曰潛(逝) (22)

潛：帛甲、帛乙作“筮”，其它各本作“逝”。據隨縣編鐘銘文中“潛”之文意認爲可能是與“遺”音近的“衍”，有“延伸、擴大、超過”之義。(潛，潛爲一字之異體)。^[25]或認爲，此字在鐘銘音階字之前，疑讀“殺”，《集韻》：“殺，降也。”^[26]殺、筮、逝音近可通。此字尚無定論，待考。

國中又四大安 (22)

國：帛甲、帛乙作“國”，其它各本作“域”，或認爲此字應隸作“囡”^[27]按：域，匣紐之部；

囷，匪紐蒸部。之、蒸陰陽對轉。也可能囷是國之誤寫，二者形、音均近。

王𡗗(居)中一安 (22)

安：傳本作“尊”，其它各本作“焉”。“安”讀爲“焉”。“尊”是承上“大”而言，“尊”、“大”義近。

天墜(地)之𡗗(間) (23)

𡗗：諸本均作“間”。曾姬無卣壺“間”作“𡗗”，簡文應是其省簡。《古文四聲韻》作𡗗_{P20}。𡗗爲“門”之訛變，𡗗左旁可能是因文字類化由“夕”而訛變。

其猷(猶)𡗗(簫)與 (23)

簫：諸本均作“簫”，形訛。《古文四聲韻》作簫_{P81}，即簫，吳澄曰：“橐，冶鑄所以吹風熾火之器也，爲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轄以鼓扇於內者，簫也。”^[28]

與：帛甲、帛乙作“興”，河本、王本、傳本作“乎”。興、與、乎音近可通。

虛而不屈 (23)

屈：帛甲、帛乙作“𡗗”，河本、想本、王本作“屈”，傳本作“𡗗”。屈、𡗗、𡗗音近可通。《管子·心術》“虛而不屈”。注：“屈，竭也。”《古文四聲韻》作：a 𡗗 b 𡗗，a 之所從𡗗，b 之所從𡗗皆爲“尾”之訛變，a 之所從土蓋爲“出”之訛。b 之所從𡗗即出。

至虛，互(恒)也 (24)

互：諸本均作“極”。互，亟形近易混，“極”、“亟”自可通假。

獸(守)中，筓(簾)也 (24)

筓：帛甲作“表”，帛乙作“督”，其它各本作“簾”。《說文·竹部》：“筓，厚也，從𠂔，竹聲，讀若簾。”段注：“筓、簾亦古今字。”督、簾皆屬覺部，音近可通。《古文四聲韻》作筓，加注聲符“土”，筓、土皆爲舌頭音。（“土”也可能是繁化部件。）

天道員員 (24)

天道：帛甲、帛乙作“天物”，河本、王本、想本作“夫物”，傳本作“凡物。”天與夫猶易相混。凡、夫皆爲句首副詞，義近可通。

員：帛甲作“雲”，帛乙作“耘”，河本、王本作“芸”，想本作“云”，傳本作“𡗗”。“員”通“云”簡文常見。如《緇衣》3 號簡“詩云”寫作“詩員”。

其霏(脆)也，易畔(判) (25)

霏：指本、王本、河本、傳本作“脆”。霏，疑從雨，毳省聲。遂州龍興觀碑作毳，可資旁證。脆與毳相通，參《古字通假會典》447。

畔：應隸定爲“𡗗”，即“畔”之六國古文。指本、河本作“破”，王本作“泮”，傳本作“判”。畔、泮、判皆從半聲，音近可通。典籍亦作“判”。《說文》：“判，分也。”與“破”義近可通。

其幾也，易𡗗(微)也 (25)

幾：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微”。《說文》：“幾，微也。”屬聲訓。

九成之臺，甲 (26)

成：帛甲、帛乙、傳本作“成”，指本作“重”，河本、王本作“層”。成、層、重音義均近。

甲：帛甲、帛乙爲“作”，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起”。或認爲“甲”爲“乍”之誤書。^[29]作、起義近可通。

閔(閉)其遄(兌) (27)

閔：諸本均作“閉”。此字乃“閔”之誤寫，讀若縣，《說文通訓定聲》訓“虛”。^[30]也可能即“閉”之誤。

賽(塞)其門 (27)

賽：諸本均作“閉”。“賽”通作“塞”，王念孫云：“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爲之。”^[31]“閉”、“塞”義近可通。《太玄經·守》：“閉明牖。”注：“閉，塞也。”《古文四聲韻》作閔_{P84}省“土”。

門：帛甲作“閔”，帛乙作“說”，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兌”。“門”、“說”皆可通作“兌”。《淮南子·道應訓》“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高誘注：“兌，耳目鼻口也。”“閔”蓋讀爲“門”，與“兌”義近可通。

迺(同)其斲(塵) (27)

斲：帛甲作“斲”，帛乙、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塵”。“斲”釋“塵”上文已作分析。斲、塵音近可通。“斲”右下有重文符號，疑衍。

割其輶 (27)

割：帛甲作“坐”，帛乙作“鏹”，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挫”。《汗簡·手部》撤作𢇛，《古文四聲韻》撤作𢇛，或認爲“搖撤雙聲”。^[32]按，此假搖爲撤。撤，透紐月部；挫，精紐歌部，二者音近。《廣雅·釋詁一》：“挫，折傷也。”“撤，壞也。”義近可通。

輶：帛甲作“閔”，帛乙作“兌”，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銳”。《古文四聲韻》錄閔作：𢇛_{P77}從心賁聲，待考。

而民爾畔 (30)

爾：帛甲、帛乙、指本、河本、王本皆作“彌”，傳本作“跡”。此字應釋“𠂔”。（參包山 150 箇）。𠂔與林聲系可通，“離”從“林”聲，“𠂔畔”可讀“離畔”，《國語·楚語》下“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𠂔”上部似“爾”形，它本遂誤作“爾”（彌）。另外，“𠂔（離）”與“彌”亦頗近。^[33]故爾、跡、彌皆可通。

畔：諸本均作“貧”。貧，並紐文部；畔，並紐元部，聲紐相同韻部旁轉，音近可通。

戠(奇)勿(物)慈(滋)記(起) (31)

戠：帛甲作“何”，指本、河本、王本作“奇”，傳本作“袞”。據簡文字形應隸作“戠”。“戠”、“何”、“奇”皆從“可”聲，音近可通。袞、奇義近可通。《周禮·天官·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袞之民。”鄭注：“奇袞，譎觚非常。”

舍(含)惠(德)之厚者 (33)

舍：帛乙、指本、河本、王本、傳本均作“舍”。舍，從西，今聲；含，從口今聲，音近可通。或認爲：舍即飲。《集韻》：“飲，<說文> 獸也。古作舍。”《漢書·游侠傳·朱家》“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顏師古注：“飲，沒也，謂不稱顯。”^[34]可知：“飲德”與“含德”義亦相通。

惠：帛乙、指本、河本、王本、傳本均作“德”。《玉篇·心部》：“惠，今通德。”

蟲(蝮)蠶蟲(虺)它弗蠶 (33)

蟲：從虺，由聲。《說文》“由，鬼頭也，象形。”大徐讀“敷勿切”。帛甲作“逢”，帛乙作“蠶”，王本作“蜂”，均從“夆”得聲。“敷”、“夆”均屬唇音。可見“由”聲紐爲唇音，並非無據。

攫鳥獸(猛)獸弗扣 (33)

攫：指本、河本、王本、傳本同，帛甲作“擢”，帛乙作“據”。攫、擢、據音近可通。

扣：帛甲、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搏”，帛乙作“捕”。搏、捕皆從“甫”得聲，音近可通。與“扣”義近可通。《廣韻》：“扣，扣擊也。”《廣韻·釋詁三》：“搏，擊也。”《集韻》：“捕或作搏。”

未智(知)牝戊(牡)之合□惹(怒) (34)

牝：原篆作𠂔，應隸定爲“𠂔”。其它各本均作“牝”。“𠂔”、“牝”皆從“匕”聲，音近可通。“𠂔”，郭店簡中習見，例如《唐虞之道》3、《忠信之道》2、《語叢二》39、《語叢二》47、《語叢三》66等。字本從“才”(或作十)，“匕”聲。^[35]本簡以“𠂔”爲“牝”，這對理解後世出現的“鴿”義頗有啓示。

□：原篆作𠂔，不識。帛甲、帛乙、傳本作“脰”，指本、河本作“峻”，王本作“全”。□應與“脰”、“全”音近。“脰”、“全”均屬齒音。

終日虐(乎)而不𦵏(憂) (34)

𦵏：帛甲作“𦵏”，帛乙作“𦵏”，指本、王本作“𦵏”，河本作“𦵏”，傳本作“𦵏”。“𦵏”同“憂”，《說文》：“𦵏，愁也，從心從頁。”“𦵏”蓋爲“憂”之省體。^[36]“憂”帛書常寫作“夏”，故傳世本多將“憂”寫作“𦵏”。^[37]章炳麟曰“司馬彪曰‘楚人謂嘔極無聲曰𦵏’”，𦵏、𦵏同字，故河本作𦵏。^[38]

和曰𦵏 (34)

𦵏：諸本均作“常”。簡文此字應隸作“𦵏”，其字爲“𦵏”之形訛，參楚帛書甲尚作𦵏。《古文四聲韻》錄“當”作𦵏_{P28}，所從的“尚”與簡文上部相似。又“𦵏”與下文“明”押韻，可資旁證。𦵏、常音近可通。

勿(物)𦵏(壯)則老 (35)

𦵏：指本、河本、王本、傳本作“壯”。𦵏，從土臧聲；壯，從土爿聲。“𦵏”疑爲“壯”之異體。《古文四聲韻》作：a 𦵏_{P66} b 𦵏_{P66}，b 從畱爿聲，左旁乃“爿”之訛。a 從畱，壯聲，右下乃“畱”之訛。

則：帛甲作“即”，河本作“將”，其它各本與簡本同。《詞詮》卷六：“即，承接連詞，與‘則’同，古即則通用。”按，則、即、將均屬齒音。

貴(得)與真(亡)𦵏(孰)𦵏(病) (36)

貴：原篆從“貝”，“之”聲，讀“得”。“得”本從“又”從“貝”會意，“又”亦聲。^[39]“又”、“之”與“得”均屬之部字。“貴”爲上下結構，疑因下文“真”而類化。

𦵏(厚)𦵏(藏)必多真(亡) (36)

𦵏：諸本均作“多”。厚，多義近可通。下文亦有此例。

贗：王本作“藏”，音近可通。《古文四聲韻》作：𠂔_{P29}，從亠壯聲，壯，藏皆為陽部字，故可通。

湍而羣之 (38)

羣：原篆省口旁，帛甲、帛乙作“允”，河本作“銳”，想本作“悅”，王本、傅本作“稅”。羣、允皆為文部字，音近可通。允、兑形音均近，“銳”、“悅”、“稅”蓋後世傳本所訛。

貴福(富)喬(驕) (38)

貴福：帛甲、帛乙作“貴富”，其它各本作“富貴”。此三者義近可通。貴，《古文四聲韻》作𠂔_{P53}，《說文》：“𠂔古文妻從肖女，肖古文貴字。”𠂔為肖之訛。

自遭咎也 (38-39)

咎：諸本均同簡本。簡本原篆作𠂔，左從刀，刀乃人形所訛。《古文四聲韻》作𠂔_{P48}，其左旁蓋為“害”。《說文》：“災，害也。”故咎、害義近可通。

攻(功)述(遂)身退 (39)

退：帛乙作“芮”，其它各本同簡本。芮從艸內聲，內，退皆為物部，音近可通。《說文》：“退，或從內。”

注 釋

- [1]孔廣居：《說文疑疑》，引《說文詁林》，中華書局，1982年，5806頁。
- [2]何琳儀：《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9月，1063~1064頁。
- [3]張守中：《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51頁。
- [4]何琳儀：《說蔡》，《東南文化》1999年第五期。
- [5][6]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於“絕偽棄詐”》，武漢大學“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年10月。
- [7]《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 [8][12]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三聯書店，1999年8月。
- [9]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藝文印書館，1999年1月。
- [10]何琳儀：《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9月，334頁。
- [11]李學勤：《說郭店簡“道”字》，《簡帛研究》第3輯，廣西教育出版社。
- [13]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
- [14]何琳儀：《中山王考釋拾遺》，《史學集刊》，1984年第3期。
- [15][38]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11月。
- [16]顏世鉉：《郭店楚簡散論（一）》，武漢大學“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年10月。
- [17][18][20][22][26][30][33][36]何琳儀：《郭店竹簡選釋》，《文物研究》十二，黃山書社，2000年。
- [19]黃德寬、徐在國：《傳抄〈老子〉古文輯說》，待刊。
- [21][35][39]何琳儀：《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9月，1頁。
- [23]有學者據《國語·楚語》“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分析“踰”（“逾”字異體）指沿江而下，進而將郭店簡中的此字直接訓為“下”。其結論雖然與《國語》韋注，“踰，度也”不合，但是卻與我們的結論相似。
- [24]黃德寬：《曾姬無卣壺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2002年7月。
- [25]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文物出版社，1989年1月。

[27]李天虹:《郭店楚簡文字雜釋》,武漢大學“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年10月。

[28]吳澄:《道德真經注》引自高明《帛書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5月,245頁。

[29]彭浩說,引自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32頁。

[31]王念孫:《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97頁。

[32]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415頁。

[34]丁原植:《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9月。

[37]高明:《帛書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5月,95頁。

後記:

黃德寬、徐在國先生曾為本文提供若干資料,在此謹致謝忱。

《老子》中的“損”、“益”說

◎ 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

◎ 郭梨華

通行本《老子》中共有三處提到“損一益”之說，分別見於第42章、48章、77章，這三章中僅有第48章的前半部份出現於郭店簡《老子》乙組中，“損”字在郭店簡中作“員”；其餘兩章並不出現於郭店簡；與帛書甲本與乙本對照，除殘損外，文句上無大差異，祇在關鍵字上有異，即甲本“損”字作“𠂔”，乙本作“云”。《老子》中的“損一益”說，並不是我們今天在論述有關經濟議題中所談論的損益平衡說，但是否祇是如同高明先生在《帛書老子校注》中所言：“《老子》以樸素的辯證觀點，說明了‘損’、‘益’兩種現象之轉化。”抑或是如同王家祐先生指出：“爲道日‘損’，爲學日‘益’，已有《易》卦之釋。”^[1]對於這一問題，確實值得多加關注，因爲在《淮南子·人間訓》曾經記載“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愼〔噴〕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而與帛書《老子》同時出土的帛書《要》篇中也論述孔子對於《損》、《益》二卦的重視；其次，帛書《要》篇中提到《損》、《益》，是結合四時，在《老子》中所論述的“損一益”說在通行本第77章中，則是結合“天之道”論述，而《老子》的天道觀，似乎又與史官天文的傳承有關，是以《老子》中的“損一益”是否與《易》卦之釋相繫？《易》與史官天文的傳承又是如何？這些都亟待解答。

《老子》三章中的“損”、“益”問題

《老子》中三處中並提“損”、“益”，在這三處中各有不同的說明方向，茲分別解析如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42）

這一章的“損”“益”是就“物”的方向說明，“物”（萬物）是陰陽二氣共構所形就的呈現，因此當其“沖”時，轉化成了“和”，此處之“和”，應當是《國語》中史伯所言“和實生物”的“和”，關於這一點《莊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話應可以作為《老子》“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句話的再詮釋，它說：“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因此，“和”呈現為“物”，“物”基本上表現出兩種運動形式，一個是“損”的運動，一個是“益”的運動，這兩種運動狀態，從更高的層次而言，無所謂絕對性，而這整個就是“道”的展現；換言之，“損”、“益”既是“物”的兩種運動，同時也是“道”的展現，就“物”而言，“損”“益”是兩種不同而且相反的運動狀態或說作用，就“道”而言，“損”“益”的互動共同完成了“道”的展現。

其次：

學者日益，為道日損（損）。員之或（又）員，以至亡（無）為。亡為而亡不為。（依竹簡本 48）

這一章的“損”“益”是就“學者”與“為道”所作的區分，“益”是因為有所“缺乏”而增益，同時也蘊涵“溢”的意義；“損”則是因為“滿”而減損之，同時也蘊涵“虛”的意義。因此“損”“益”各自是在作一種調和的作用。“損之又損”當如“玄之又玄”的句式，有再轉深一層的意含，同時也指出了被描述的存在，其特質或作用是“X之又X”的X。據此，“無為”的顯現是藉着“損”的作用達致的，《老子》37章“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之”（郭店簡本作：術亘亡為，侯王能守之），指出了“無為”既是“道”的特質，同時也是侯王所當信守的，“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即同時兼涉“無為”的這兩種涵義，因此“無為”相較於“損”的作用，顯現了“益”的效用。《老子》43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即詮釋了“損之又損”中“損有”使之成為“無有”，顯現“無為”之“益”。《老子》的這種損益互動觀，不但在《文子·九守》中記載着“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2]而且也與孔子觀魯桓公之廟（《困學紀聞》認為當以周廟為是）時，對於宥坐之器的觀點相互輝映，《說苑·敬慎》云：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周廟這件事情，同時也記載於《荀子·在宥》、《淮南子·道應訓》、《韓詩外傳·卷三》、《孔子家語·三恕》，可見孔子觀周廟之欹器，應確有其事，而且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其重要意含在於欹器之被置於周廟，不但表示這是一件禮器，同時也宣示着重要內涵，即滿

則覆，強調謙沖胸懷。因此，從文化的觀點而言，欽器置於君王之側，作為君王的提醒，實際是發揮了周人對於盈滿虧損的智慧。^[3]《國語·越語》曾載范蠡之言：“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實際上正體現了當時人的一種盈虛互動的觀點。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對於道家學術本源與精要說明，應是領略了《老子》損益互動觀的思想，他說到：“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再其次：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77）

在這一章中，《老子》所論的“損”、“益”^[4]，是針對“天之道”與“人之道”論述其運作的方式，整個論述中有幾點相當值得關注，一是有關天象的譬喻，一是對於有餘與不足之間“損一益”的互動觀。關於天象的譬喻，《老子》應當是取象於天文中對於宇宙模式的一種論述，認為“自然”的運行，就好比是一把張開的弓，這樣的一種譬喻在春秋戰國時期是相當特殊的，因為當時對於天地的宇宙模式是以“天圓地方”為主，也就是後世所謂的“蓋天說”，但是《老子》的這一譬喻顯然不意味着是一種“蓋天”思想的體現；另外，東漢所謂的“渾天說”，鄭文光先生認為其思想的發展最早當可溯源至戰國時的惠施^[5]，但這種大地為一球形的思想，《老子》是否已經意識到，則很難斷言，因此這一譬喻的重要性，不在於天文學上的觀點正確，而在於說明了《老子》承繼史官文化的特質，將上古時代的“觀象授時”，從農業耕作的需求性與時間的人文制度化，提昇為哲學思想中攸關“自然”之“道”，這一自然之道的取象可能源自於四時運行的觀測，《周髀算經》：“冬至、夏至為損、益之始。”《易·彖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說明了“損一益”互動觀在春秋戰國時是普遍存在的。這一“自然”之原理，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中，體現為《老子》58章所言：“禍兮福兮之所倚，福兮禍兮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換言之，“損一益”互動不僅取象於天文曆象，同時也作為聖人效法“道”而行的指引。

《老子》對於“學”的態度

在《老子》三章的“損一益”互動觀中，最引起人們關注與爭辯的是《老子》對於“學”的態度，這一問題的辯明旨在重新反省：《老子》對於當時文化的批判與省思中所採取的態度。郭店簡本對應於通行本48章提出“學者日益，為道日損。”對應於通行本20章提出“陰（絕）學亡息（憂）”。這兩部份在郭店楚簡本中是接續着的，因此引發筆者思考《老子》中所謂的“學”究竟指什麼，如果“學”的內容是指後來所稱的“六經之學”，或者如《國語·楚語》中申叔時對於教導太子提出《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那麼“絕

棄學”這件事，不但非常違反史官的職掌，因為史官掌記言與記事，有一迫切的任務就是對於“學”之內容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也與“損一益”的互動觀有異。

《老子》48章，“損”“益”分別是從事“道”與“學”的兩種運動方式，損“之”的內容，當是指“學者日益”這件事，而不是針對“學”這件事，河上公注解“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者，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這裏非常明確指出並不是“學”、“道”互斥，而是“日益”與“日損”的互斥，但是這一種互斥的關係卻又在“損之又損”中出現互動。因此，若考慮“損一益”是在“滿”與“不足”的情況下發生，則“為道”與“學”就不可能截然二分為不相干涉的兩件事，說明如下：

(1) 竹簡本在這一部份之後緊接着是“絕學無憂……”，可對應於通行本第20章，一般都解釋為《老子》棄絕“學”，而這“學”的內容是否就是“為學日益”中當時知識份子所“學”的內容？果真如此，老子是“反學”的，老子所言的“自然”是與“學”相對立的兩方，但是老子的“自然”並不在對立中，而且從老子的後學中，也可以發現都是熟悉當時詩書禮樂之學，因此斷然說老子“反學”，是有待斟酌的。這個問題的明確，可以從兩個方向理解，一是“陰（絕）學亡（憂）”後緊接着是“唯與可（呵），相去幾可（何）？兇（美）與亞（惡），相去可（何）若？人之所畏（畏），亦不可以不畏。”一般都認為後面文句所言的美、惡等都是因為“學”的因素所造成，因此絕棄了“學”就能“無憂”；這種理解一種是源自於對“學”的意含不够明確，如嚴復因此批評老子“絕學固無憂，顧其憂非真無也。處憂不知，則其心等於無耳。非洲駝鳥之被逐而無復之也，則埋其頭目於沙，以不見害己者為害。老氏絕學之道，豈異此乎？”^[6]另一種則是依高亨與蔣錫昌將“絕學無憂”一句置於通行本19章之後，依“絕聖棄智”之例，主張老子棄絕“學”。竹簡本《老子》出土後，主張將“絕學無憂”應置於19章之後，自然失去依據。老子所謂“絕學”，劉信芳先生認為：“《說文》：‘絕，斷絲也。’案‘絕學’之‘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斷’，《史記·天官書》：‘後六星絕漢。’《正義》：‘直渡曰絕。’‘絕學’本身包含有繼學的逆命題，應是有所絕棄，有所繼承，從原有之學過渡到新創之學。”^[7]另外一解，是認為“絕學”即“絕末學”，《後漢書·范升傳》：“升上奏云：老子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個人以為“學”的問題，確實在《老子》之後有歧解，其一是：《莊子·大宗師》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關於“道”是否可“學”的問題，女偶認為“不可”。其二是：1973年河北定縣所出土的竹簡《文子》，卻明確指出“學一神聽”之於“道”的重要性，並且說出此“道”即“天之道”，即是“文之順”所依歸之“道”，換言之，“學”與“道”之間的關係是正面而且肯定的。《文子·道德》：“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這一段與竹簡《文子》可相對應：〔脩德非一〕聽，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2482）、學在肌月（肉），以口聽者（1756）、〔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不能〕（2500），丁原植先生認為應屬古本《文子》資料^[8]。

藉由《莊子》、《文子》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老子》對於“學”與“道”的關係是值得重視

的。

(2)“爲道”是在與“道”的內容相關涉，但又不是“道”的狀態，所進行的活動。《老子》中對於“爲”之於“道”，是採取“無”爲，“爲而不恃”的方式，因此“爲道”並不是“目的”，而是一過程，在《老子》對於“道”的描述，是以“聞”的方式呈現“道”的“在”，“爲道”猶如“進道若退”，劉信芳先生認爲是“進益學者”^[9]，說明了“爲道”無法截然與“學”二分，這一方面是因爲“道”的本然性運作是“無爲”，“無”從邏輯的觀點理解是“否定”，同時也是一種“確定性”的作用，但若從生命的觀點而言，則是一種容納與接受，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即是闡明“無”作爲“用”的“容受性”以及被發現的可能性；換言之，從生命的觀點而言，“道”與“學”並不是互斥的。另一方面，若不是從生命性的觀點，《老子》的貢獻是指出了“道”與“學”的二分，把部屬於“道之學”的“學”明確區分開來，這應是回應當時“學”之墮落使然，《論語·憲問》中不也記載孔子對於古今之學者的評論：“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一“學”的墮落，不在於“內容”上的指稱，而在於態度，即將“知識之學”與“生命之學”二分的墮落。就此而言，《老子》明確指出“道”與“學”是不同的。

依據上述兩點論述，可以說《老子》對於當時“學”的方式提出了批判，同時也回應到古人之“學”的方式，但是對於這一方式《老子》是以“道”的提出說出“道”之爲“生命之學”，這在竹簡《老子》對應今本《老子》19章中非常清楚，在這一章中由於與今通行本有“異文”存在，使得我們重新正視這一章的重要性，在這一章中，竹簡本提出“以爲莫不足”，今本爲“文不足”，若我們同時也考慮竹簡《文子》提出的“文之順”，以及孔子對於杞、宋之於夏、商的文獻不足徵之歎，以及讚歎“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可以勾勒出當時“文”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三位哲學家的憂與思就在問題的勾勒浮現中展現。因此對於《老子》在“道”與“學”的關係上，個人認爲不純然可以簡化爲對於“學”的反對或排斥，也不能指其爲枝節之學或政教禮樂之學，說出其與“道”的相斥，因爲這問題本身的困難度在於牽涉自我指涉的邏輯矛盾^[10]。

《老子》“損一益”思維與《易》的關係

《老子》三章中的“損一益”互動觀，我們可以發現與四時的運行及日月盈虛之天象有關係，而且與《周易》經、傳相互呼應，《損卦·上九》“弗損益之”，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另外《序卦》中也說到“損而不已必益”，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損上九曰‘弗損益之’，故云‘損終則弗損益之’。損益盛衰，循環之道。損極必益，故言損而不已必益，而受之以益也。”說明了“損一益”之間是相互推移轉化，與《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陰陽互動思想是相呼應的，《老子》所言“損之又損”基本上也是彰顯“益”的效用，正與《易》的思想有相當共通性，這一種共通性也表現在《老子》強調“反”、強調“復歸”以及天道環周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設想：《老子》在某一程度上是承繼《易經》的思想，關於這一部份，當代

學者杜而未先生^[11]與王博先生^[12]都曾做過統計與分析。

孔子稍晚於老子，同樣也受《易經》之學，這件事情在《史記》中曾記載“孔子晚而喜易”，1973年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的出現，更確證了這件事。在《要》篇中記載着“孔子繇（籀）易，至於損益一（二）卦，未尚（嘗）不廢書而嘆，戒門弟子曰：二（參）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審察也，吉凶之（）也。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物）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室也，故曰益。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物（物）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故曰產。……〔益之〕始也吉，其冬（終）也凶。損之始凶，其冬（終）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孔子對於“損一益”的重視，這件事不但記載於《說苑·敬慎》，也見於《淮南子·人間》、《孔子家語·六本》，孔子對於“損一益”的說明，強調了其“天象”上的意含，同時也認為“損”“益”二卦是瞭解易道、觀天之道非常重要的門戶。

因此，引發我們仔細考察《老子》、《易經》及孔子在說明“損一益”上是否有差異。“損一益”在周人的思想中從孔子觀廟之欹器，可以發現是具現《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的思想，因此“謙”或者“虛”的觀點，是三者“在天象”觀測外的又一共通點，但三者也有不同：

（1）關於“虛”

《老子》強調“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是從“損一益”互動中，指出世俗中“弱”的思維的重要，如知雄“守雌”、“柔弱”、“虛”、“沖”，並且認為這一“弱”的思維纔是體現“道”的重要質素。

從“虛”的觀點而言，它確如孔子觀周廟對“欹器”的重視，但孔子並不是強調“虛”的完成，而是指出“謙”的重要，在於其“不滿”，以及調和盈虛之“中”，《說苑·敬慎》：“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孔子家語·六本》：“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有成其滿博哉！”都說明了“謙”之為“益”的效用。

（2）關於天道

《易經》對於辭中並沒有提出“天道”或“天之道”一辭，關於“天道”或“天之道”的運行，可以藉着卦序及陰陽的互動中得知，其強調終始復返之“時”，在“時”中又強調其“位”之“正”。《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明了《易》對於“時”的觀點。這與《老子》“天道員員”的持續相類，但畢竟《老子》從其中提出哲學的重要觀念“反”，與“正言若反”的思維，同時也因為“天道”的天文取象，提出了“天道無親”的觀點。

孔子則在《論語》中提出“逝者如斯夫”的天道觀，但又同時在《先進》指出“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述而》：“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在此具有仲裁者的位格特質。

結 論

總結上述的探討，不僅老子與易學有關係，孔子也與易學有關，呼應了章太炎、劉師培

先生對於“學出於史官”的觀點，同時也從傳世典籍與帛書《要》中，發現不僅老子取象於天文，孔子也關心天文之事。

“損一益”自《易經》以來，存在着互動的觀點，但“損一益”互動觀在《易經》、《老子》與孔子思想中，表現出有所承繼又有不同的發展，展現了孔、老思想的獨特點，孔子由“謙受益”中，強調了“中”的思維，《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老子則強調“致虛極，守靜篤”。

注 釋

- [1] 見於《楚簡〈老子〉東釋》中〈王序〉。《楚簡〈老子〉東釋》，魏啓鵬，萬卷樓，1999。
- [2] 《文子》中這一段資料，據丁原植先生在《文子資料探索》中的解析，認為應屬於文子學派的思想資料，而且全章似應為《文子》古本資料。見於該書 155 頁，萬卷樓，1999 年。
- [3] 感謝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啓鵬先生，提醒我注意“欽器”在周作為一種禮器的重要性。
- [4] 《老子》此章中通行本與帛書甲本都用“益”字。“補”有“益”之義，如《漢書·董仲舒傳》“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唐顏師古注曰：“補，益也。”
- [5] 鄭文光：“渾天說的形成過程，我以為天球思想是早就出現的——它約略與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同時。但是，大地是一個球形的思想卻出現得比較晚。從現在能找到的材料看，當自戰國時代開始。戰國時代的名家惠施，在他的論辯中就含有大地是球形的思想。例如，‘南方無窮而有窮’。《莊子·天下》）怎樣能夠既是‘有窮’，同時又是‘無窮’呢？如果把大地想像為一個圓球，那麼，儘管它體積有限，一直向南走，卻可以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又例如，‘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莊子·天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天下的中央，怎麼可能在燕的北面，同時又在越的南面呢？關鍵在於‘天下之中央’一語。在蓋天說體係裏，‘北極天下，為天地之中央’（《晉書·天文志》）可見古人認為天球北極下面，即地球之北極，乃是天下的中央。但這是因為蓋天說比天穹為半球形的緣故。如果天、地俱為球形。則有北極必有相對的南極，那就不是一個‘天下之中央’，而是有兩個了。一個在‘燕之北’——北極，一個在‘越之南’——南極。可見惠施對於大地之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認識。”（《中國天文學源流》，鄭文光，222 頁，萬卷樓，2000；原始版本：科學出版社，1979，209 頁～210 頁）。
- [6] 轉引陳鼓應先生：《老子注譯及評介》，138 頁。
- [7] 見於劉信芳：《荊門郭店老子解詁》，藝文印書館，1999，51 頁。
- [8] 見於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萬卷樓，1999，220 頁。
- [9] 見於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57 頁。
- [10] 這種自我指涉的邏輯矛盾猶如“我說的這句話是謊話”。
- [11] 請參閱杜而未：《老子的月神宗教》，132～135 頁。學生書局，1988。
- [12] 請參閱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65～72 頁。文津書局，1983。

《大一生水》考釋

——論述其與今本《老子》的關係^[1]

◎ [日]谷中信一著

◎ 潘 浩 譯

序 言

把《大一生水》和郭店《老子》丙本視為同一文本的兩者，或者視為不同文本的兩者，當今學界存有以上兩種不同見解的現象不容忽視。例如，荊門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文物出版社版，1999年）贊成後者觀點，而崔仁義著《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萬卷樓，1999年）一書則贊成前者觀點。崔氏雖是參與有關整理作業的荊門博物館工作人員，卻圍繞《大一生水》提出了對立的獨自見解，此種現象顯然是不可輕視的。

事實上，文物出版社出版物已將《大一生水》和《老子》丙本列為不同文本，讓兩者獨立存在。如果按此劃分法，那麼為什麼兩者在形製以及書體等處都存有共同之處呢？正如凡例中所言，現在還不能合理且恰當地解釋這個問題。這裏必須注目的是兩者的內容，將《大一生水》中的一部分與今本《老子》作一比較之後，發現兩者中屢屢出現同樣的說法和措辭。忽視這一點而在將兩者列為不同文本的兩者之前，需要再加斟酌。

與此相反，如將兩者看作同一文本，是否可以說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呢？回答當然也是否定的。丙本和今本《老子》兩者從語句表現方式上看，存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大一生水》卻與今本《老子》不存在語句表現方式上的任何一致，這一點可以說是關鍵之疑。也就是可以假設先有某一完整的傳本，之後丙本與《大一生水》將其兩分，丙本部分被今本《老子》所吸取，《大一生水》則被排除在前者之外，但這種推測似乎也有些勉強。

總的來說，哪種見解都是不無欠缺的。

本篇論文圍繞以上這些問題點，就丙本和《大一生水》兩者是否同出於某一完整的傳本展開論證。在這裏，首先對《大一生水》的思想試作分析，闡明其所具有的特色，然後就今本《老子》中存有多少與其相似的特色進行論述，提出拙見。企盼各位博學之士批評指正。

一 《大一生水》的思想

(1) “天”的概念

該篇篇頭如下：

大一生水、水反輔(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輔)大一、是以成地。□□□……

把該篇的思想以“天”為中心進行分析，可以作以下結論。即在“天”之前置“水”，並且設想“大一”，構想“大一”為最核心的概念，並設想其是一種遠遠超過“天”的宇宙之本體，是一最高形上實體。

關於“天”的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按照熊十力氏的學說，“天”被稱為兩大魔物之一，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概念^[2]。料想“天”的意思很難把握所以纔有了這樣的說法。按一般的說法，“天”指①蒼天這一物理性存在。②如“天帝”、“上帝”等詞所示，指具有神格性，君臨天下的人格神，是一種主宰性的存在。③如“天理”、“天道”等詞所示，是貫穿天地人的“理法”（“義理”），理尚事物之客觀規律的存在。這三種解釋均可看出“天”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存在受到崇拜^[3]。但是，《大一生水》中關於“天”的傳統思想與以上這些理解完全不相一致。原因或許還在於“天”的思想的淵源的不同。今本《老子》中有關“道”的思想的理解也是同樣，設想“道”勝過“天”是一最高形上實體。

那麼該篇中的“天”，到底是怎樣被理解的呢？“天”被理解為位於“地”的相反極端，換言之，祇不過被理解為如①中所指的一種物理性的存在。而且，主張“天”由“大一”和“水”生成，並且刻意重視“水”。從另一面也顯出“天”在該篇中所處地位較低。

如上所述，該篇比起“天”其實更重視“水”，把“水”作為一種根本存在。這種定義被稱為“水”的哲學，因其強調了“水”的最大特性^[4]。當然“水”的哲學中的“水”，與五行思想“水火金木土”（相克說的排列。相生說則為“木火土金水”）中的“水”是處在完全不同內容的上下文中的，當然也就與五行思想毫無關係。順便要指出的是，“土”逐漸佔據了五行思想的中心，自然與強調“水”，且把“水”作為中心的該篇主題漸不相融^[5]。該篇中祇有一處有關“土”的例句，如下：

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

如上例句所示，“天”之“氣”與“地”之“土”為一組對子，而且“地”與“土”也為一組對子。可見這裏並不是指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而是用“水”、“氣”、“土”這三行來解釋天地萬物的起源。這是該篇思想史上的一大特徵。

(2) “陰陽”的概念

該篇中：

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者。……四時者，陰陽之所生。

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此天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釐，陰陽之所不能成。

此文中也有“陰陽”一詞出現，其他如《管子》四時篇，《淮南子》天文訓，《禮記》禮運篇等著書中均有類似用法，這裏也可以說陰陽思想在當時已有相當顯著的影響^[6]。

以此舉例，《老子》一書四十二章，有關“陰陽”的唯一例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將前文與此文作一對照。道生成萬物的過程中沒有“陰陽”一詞出現，而實際上通常把“二”解釋為陰陽二氣，依此解釋以上兩文也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然而應該注意到郭店《老子》中卻沒有與此類同的部分^[7]。

(3) “神明”的概念^[8]

接着談一談“神明”這一概念。該篇中有以下記述：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

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

也就是說，從實際存在的且擁有莫大質量的天地中，孕育出神明，而神明又形成陰陽這一促成天地間萬物生生不息、千變萬化之根源。

那麼這裏提到的“神明”，應把其理解成一個持有何種意義的概念呢？在天地、神明、陰陽、四時、燥濕、寒熱等概念之中，神明是最難捕捉其實體的概念。因其不同於天地，可以被看見，又不同於四時、燥濕、寒熱，可以被身體所感受。

古代人認為“天地”對於人來說，僅僅是一種物理性存在。而使其千變萬化的是一種看不見的形而上的實際存在，存在於天地之間，它直接主宰起着天地間所有複雜微妙的變化。這種虛無的物質可以理解為以上所說的“不可見且神妙無比的神明”。同時，此種物質也可理解為一種類同於界於人的身體（肉體）、這種物理性存在的內部，控制人的思維行動的形而上的存在，如同理解精神作用宿留在人的“心”中一樣，“天地”這一物理性存在的內部，類推出一種起着和人體內的心（=精神）一樣的，某種巨大作用的一種內在的存在。也就是這裏所說的“神明”。中國思想史上一貫擁有“類推思辨法”這一特色，這裏顯然也依據了此種方法（應該不會有錯）。換言之，“神明”不指如全知全能的神般的超越性存在，而是將天地擬人化，用“神明”一詞表達在被構想的天地這一物質中發揮心理作用（spirit）之意，相當於人的精神能力（spirit）。更確切地可以說相當於《老子》書中關於“道”而接近於“德”的概念吧。因為所謂“德”，是在將“道”這一極其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存在內在化，而且屬於概括了“道”的巨大作用的概念^[9]。

以“神明”的以上解釋，再來追尋一下“大一”的概念。先後生成了天地和神明，作為最

核心概念的“大一”，被定義為生成論的發端，是一種兼有物質性和精神性的二重性存在。也可以從“大一”既被認定為“萬物之母”、又被認定為“萬物之經”等處得以確認。將具有以上特色的“大(=太)一”擬人化，作為一種宇宙神信仰，漸漸與太一信仰相聯繫^[10]。

(4)關於“水”的哲學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

以上文起頭的一文，被稱為該篇中異常的生成論。今本《老子》中沒有類同，因而通常從《老子》丙本中分離，被認為主要講述關於水的哲學，特別是強調在宇宙生成論中水所起的作用的特異思想而給予評價。^[11]

那麼，“宇宙生成論”這種措詞究竟是否恰當呢？不如用“天地生成論”一詞更為妥當。因為在這裏不是指包容天地的巨大無邊的宇宙的形成過程，更確切的應該說，祇不過是說明了人類周邊的環境，也就是天地。人類的眼睛能夠看到的範圍中的天地，或者可能經歷的四時、冷熱、燥濕等依次相繼出現的過程。以上所講的過程，祇不過是一種被經歷的世界的生成過程。也就是被經歷的世界的生成論，即空想的、神秘的、或者說其是哲學上的生成論，不如稱其為體驗性的、經歷性的、環境論性的生成論更為恰當。

那麼在此種生成論中，“水”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呢？為此再回到開頭的一段。

水是一種瀰漫於天地之間的物質，這種定義來自於作者對水所具有的經驗。現今也把地球稱為水的惑星，可以說這點是共通的。然而最先存在的是“大一”，而不是“水”，也就是否定“最先瀰漫於天地間的是水”，指出“最先存在的是大一”，“大一”也就是第一原理(=God)。“大一”最初創造的不是光，卻是“水”。(光在此之後生成，陰陽或許就是此種物質。)而在下一階段，“水”輔助“大一”生成“天”，然後生成“地”。這種構思與《老子》一書中強調形成萬物(宇宙萬物演變)的根源是“道”的構思完全一致。

“大一”生成“水”之後，掩藏在“水”的內部(“大一藏於水”)，從“大一”掩藏在“水”內部可以類推，瀰漫在天地間的“水”中包含“大一”，“大一”和“水”總是在一起，也就是說，“水”生成“天”、“地”之後，“大一”卻以“大一”的姿態繼續存在。那麼“大一”和“水”之間的關係又有些微妙，這裏使我們想起《老子》第一章“兩者同出異名”一文。即“大一”和“水”，被認為是“同出”卻“異名”的兩者。因而在《大一生水》之後接有《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一文。換言之，單“大一”一者不能生成天地，“水”的輔助是必需的。而且，此時“水”本身是一種 a priori(先天的)存在，“大一”當然同樣也屬 a priori 存在。那麼，這裏應該可以把“大一”和“水”理解為最核心的概念(也就是“道”)的異名。“大一”首先作為“萬物之母”受到尊敬的同時，如“萬物之經”之詞義，在生成萬物之後又主宰着萬物的演變。這一構想也可以說是古人在具有了“水”生成萬物，養育萬物的同時內在一切生物體內，成為維持生命的源泉這一經驗之後的古代人智慧的產物。

如果把“大一”看作第一原理的話，包藏着“大一”的“水”又是什麼呢？還是應該把其與“大一”看作同等的存在。那麼“水”不單是“道”的代稱，更可以說是“道”的現實狀態。有關這種理解，《老子》一書中“水幾於道”(第八章)講述道的巨大的作用，指出水也具有同樣的

作用,更準確地可以說“水”的作用本身即為“道”。

這裏,“大一”如果和《老子》書中的“道”是同一概念的話,“大一生水”也與《老子》書中“道生一”(第四十二章)同義。“一”可以說是“道”的現實狀態。而且假設“一”為“水”,同時把“一”理解為“大”也可以信服。因為水形變為雨,從天而降,滋潤大地,最終匯入湖海。都因其具有融通無礙、善於變換形態之特性而已。

以此類推,今本《老子》中明確“道”即“大”和“一”,而郭店《老子》中卻沒有明確“道”即“一”,加以沒有言及“水”(沒有圍繞“水”的敘述),這一點至今還存有疑問。從該篇中言明“道”即“一”、“大”,而且敘述了其與“水”的密切關聯來看,可以說加上《大一生水》篇的思想這個要素,纔更進一步接近了今本《老子》^[12]。因此以上所示的疑問點,通過繼丙本之後《大一生水》部分的讀解,可算冰消瓦解了。

綜上所述,在分析了《大一生水》中的“天”、“水”、“神明”、“陰陽”等概念之後,不得不再次對把《大一生水》為篇名的該篇,列為與《老子》不同的文本這一劃分法抱有極大疑問。依據以上考察的結果來看,將丙本單單看作是鑄成《老子》原型的一種傳本,《大一生水》與丙本作一體處理的見解似乎更為妥當。

這個問題將在第二章,圍繞《大一生水》和今本《老子》的類似點作更深一步的探討。

二 《大一生水》和今本《老子》的類似點

在本章中,將明確雖以《大一生水》為篇名,卻沒有某一貫穿文章首尾的內容或主題,依據其內容大致可將此文劃分為上下兩段的事實。並進一步證實上下哪段中都存有和今本《老子》極其類似的部分,並就類似之處所持有的意義加以考查。^[13]

首先,將《大一生水》的“大一”解釋為閃爍在夜空北部的那顆小亮星,即北極星“太一”,從“大一”生成了“水”這一宏大的規模來看,暫且不得不對此持有疑問。雖說後世將北斗信仰和太一信仰相聯繫,因而得出了這樣的結果。但是對於由《大一生水》本身直接產生了此觀念的看法應再加斟酌。

(1) 關於構成

文物出版社出版物,均為第1~8簡、第9簡、第10~14簡的三段分法。其中包含命名由來一語的段落最長。崔仁義氏將此文與丙本列為同一傳本系統,而在《大一生水》部分的竹簡排列方法上與文物本大體相同。

然而,對於以上這種排列方法,劉祖信氏將排列稍作變動,提出第1~8簡、第10~12簡·9·13·14簡二分的異議^[14]。

該篇竹簡共十四枚,比《老子》甲、乙、丙本缺損相對較多,且哪一學說均屬推測,劉氏學說相對較佳。本論依照劉氏上下2段劃分法對該篇進行考察。

依此分法將該篇分為上下兩段,斟酌其意後不免發現第10號簡“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一文,可列為下=土=地、上=氣=天的等式。另外天地彼此所含成分不

同，上下相向，而且已經指出“天”即“氣”這點也應注目。而在前段中，主張“大一”和“水”生成“天”，接着“大一”和“天”又生成“地”的生成論，而這裏又將“天”“地”明顯區別，那麼聯繫“天地”生成“神明”一說，不得不說在理論上其實已經失去了協調性。也可以推斷上下兩段，在天地觀上持有略微不同的見解。更直截了當地說，“天由很輕的氣所形成，地由很重的土所形成”這一觀點，與“天”“地”均由“大一”和“水”生成的生成論《大一生水》沒有直接關係。

也就是說，《大一生水》一篇並不首尾並具，而祇是若干短文的集成。同樣也將《老子》甲、乙、丙本看作若干短文集成的話，丙本與《大一生水》在構成上可以說並無差異，甚至可以說是一整體文獻。

(2)關於句法

今本《老子》中“是以”這一句型共計 38 例。《大一生水》上段中計 7 例，略多。同樣“故……”的句型共 64 例，《大一生水》下段中 3 例。上段中則為“是故……”，計 1 例（《老子》為“是故”，計 2 例）。在句法上兩者不存在任何親近關係點還不能確證。另外，被稱為與《老子》一書的共通點，應予注目的“A 生 B”這一句型，並不很少出現^[15]。

而在這裏更應該注意的是作為生成論，且最引人注目的《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文，從內容上分析比較，《大一生水》講述由“大一”到萬物生成的全過程，將“大一”=“道”這一等式置換後，可以發現祇不過用詞不同，所說的內容全相同。這裏，句法以及思想的類似之處可以得以確認。加之郭店《老子》中沒有這一部分的内容一點應予注意。

(3)關於語彙

關於語彙又有些什麼特徵呢？《老子》中，聖人這一例詞共有 32 例，較多，而君子的例詞僅有 2 例，很少。《大一生水》中聖人 1 例（下段），君子 1 例（上段），均極少，《大一生水》與《老子》對比而因文字數相當少，所以語彙的比較並沒有多大意義。基於這點來證實兩者的相似之處實在有些勉強，還是應把兩者的思想內容加以對比。

(4)關於思想

首先，《老子》一書將“道”命名為“無名”（第一、三十二、三十七各章），第二十五章又賦予“大”之名，以“道”為字，將其擬人化。可以說醞釀出《老子》一書獨特的氣氛（第 25 章的一部分，在郭店甲本中有類似。）《大一生水》篇中此點共同，下段中“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亦托其名”“天地名字并立”等文，都是圍繞“名”“字”的敘述。

第二，《老子》書中稱“道”為“萬物之母”（第一章）“食母”（第二十章）“天下母”（第二十五、五十二章）“國之母”（第五十九章），均從母性的角度來捕捉道的概念，這一點是其極大的一個特徵。而《大一生水》也有“萬物母”的比喻，這裏，如果把母性原理這一《老子》最大的思想特色置之度外，便很難理解老子思想^[16]。然而郭店《老子》中卻沒有類似以上這些關鍵詞彙的出現。

第三，《老子》書中以母性原理為根本的世界觀，也同樣沿用其於“處世觀”上，重視“柔弱謙下”，眾所周知，這又給《老子》的思想構造增添了一大特色。例如“柔弱勝剛強”（第三

十六章)、“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第七十六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等,以上所列均涉及《老子》世界觀,當然也是其處世觀的體現。所以,《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中有“老聃貴柔”一文,《荀子》天論篇中有“老子有見於訥、無見於信”,表面上都是針對老子處世觀的評價,而根本上是與老子世界觀有很大關係的。《大一生水》從“天道貴柔”這一世界觀出發,稱述“爵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責於……”的處世教訓,可以說在所有意義上與《老子》思想略存差異,卻不大相徑庭。

第四,《老子》一書中最富有特色之文,“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第二十二章)等,均提倡立下功績卻不以此誇耀,取得一定的地位卻不貪戀,反而能够長久地保全自身的反論型處世哲學。《大一生水》中的“聖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身不傷”一文所講述的聖人行事總能獲得成功且保持自身安寧,也可把此處看成與《老子》思想同質。

第五,《大一生水》下段中,“(不足於上)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一文,講述“天”的不足之處“地”來補,“地”的不足之處“天”來補,“天”“地”保持相互平衡,持續安定狀態。很明顯這裏祇是講述自然界巧妙的天意,並不蓄意說明處世之道的秘訣。然而,如“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第七十七章)一文,講述“人之道”不會解除“有餘”或“不足”兩者之間的不平衡狀態,甚至助長此種情形,而“天之道”卻解消兩者之間的不平衡,甚至從把其作為處世治國之範一點來看,可以說兩者間存有共通之處的假設可以成立。

結 論

綜上所述,通過語彙、語法的比較,圍繞《大一生水》與今本《老子》間的相似之處,没能獲得明確的結論,但是通過思想的分析,可以說兩者極其相似。雖說兩者均闡述道家思想,相似也理所當然,這種觀點當然可認成立。問題在於將文物本和與其類似內容的文本(管見所及,應將兩者視為同一文本),一者命名為丙本,另一者命名為《太一生水》,將兩者加以區分究竟為了什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分明與《道德經》上下五千言是由老聃在春秋末年所著,《史記》中又有老子傳的記載這一前提,都被後世之人認定為史實有關。同樣甲、乙、丙本也是在確認其為《道德經》五千言的抄本的前提下,開始整理作業的。祇要將這個前提置之於度外,而將丙本與《大一生水》看作獨立的兩種文本進行分類、整理顯然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再者,簡本原文將“大一”故意改寫為“太一”,不得不說是使事實更加難辨。因為“道”

即“大”且為“一”這一邏輯在今本《老子》中尤為強調和重視，而且本論已經提供了充分的論據，論證了該篇中的“大一”與《老子》中的“道”完全同義這一論點。但是也必須指出，郭店《老子》甲、乙、丙本中有“道”即“大”的論述，卻沒有“道”即“一”的論述，有關這一點的論據還十分欠缺^[17]。

如將丙本與《大一生水》作同一文本處理的話，那麼郭店《老子》甲、乙、丙本均為與今本《老子》並無多大差異的老聃著書《道德經》上下五千言的抄節本這一設想也就完全不成立了。

在此至少可推斷，戰國中期有可能被稱作原《老子》的文本已有多數存在，從當時已有如今本般體裁均整的著書這一點已經可以得以證實。推斷在還沒有相當於今本《老子》（不如說馬王堆本《老子》）著書的戰國中期，郭店《老子》甲、乙、丙本、《大一生水》篇等被集成一部著書，之後又被改寫或另寫，以至《老子》五千言一書的成立。因而依此推論，《大一生水》、甲、乙、丙本都在今本《老子》的形成過程中，產生過很大影響。

注 釋

[1]除文物出版社出版物以外，都稱該篇為“太一生水”，而竹簡上的文字卻為《大一生水》。依此以《大一生水》作為本論的篇名，其次，此篇名與本論論點也有很大關係。

[2]參照熊氏所著《乾坤衍》一書。

[3]津田左右吉：《古代中國的天和上帝的概念》（1922年）一書中，①擡頭仰望見到的天（＝用肉眼可看見的天，青天），②與人一般的天（＝說其為人格神，與其說祇是將概念擬人化罷了）③代表倫理規範的天（＝抽象的政治道德。公平無私、助他人之德），④相對於人為，作為自然的天，以上4種。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0年）一書，①物質之天（＝即與地相對之天），②主宰之天（＝即所謂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③命運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如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是也。），④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如荀子天論篇所說之天也。），⑤義理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說“天命之為性”之天是也。），細分為以上5種。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1988年）一書，①指人們頭頂上蒼蒼然的天空……屬於自然之天（馮氏的①④），②指超自然的至高無上的人格神。……屬於主宰之天（馮氏的②③），③指理而言、有以理為事物之客觀規律。……屬於義理之天。（馮氏的⑤）分為以上3種，可以說各種學說其實大同小異。

[4]魏啓鵬氏：《楚簡〈老子〉東釋》（萬卷樓，1999年）一書中，可見此種見解。

[5]此處所述，是否與該篇以成為佚書有關，以待後考。

[6]參照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研究（一）·太一生水》釋注。再者，該書同樣稱《大一生水》，卻不稱《太一生水》。本稿起草之時也受到很大啓示。

[7]郭店楚簡“陰陽”一詞，祇出現在《大一生水》這一部分中，此外，僅“陰”一字，在語叢四“利木盒（陰）者，不折其根。”一文中出現，可見陰陽思想在當時並不具有很大的影響。

[8]關於“神明”的考究，管見所及，參閱許抗生：《初讀〈太一生水〉》（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1999年8月）、李零：《讀郭店楚簡〈太一生水〉》（所收同上）、趙建偉：《郭店楚墓竹簡〈太一生水〉疏證》（所收同上）等論著。

[9]以“類推法”展開思考，一直是中國思想的傳統特色，參照拙論《中國古人的天人論之管見》（《日本倫理學會編《倫理學論集》30》1995.10）。

[10]夏德安氏指出：“大一（太一）”作為人格神在後世，曾被賦予一定的形相。這一點通過石像等可以證驗其歷史跡象。本

篇論文中“太一”之神創造天地的神話也可被認可，文中的推斷可以說可能性極高。依據郭店楚簡國際學術專題論文集（2000年12月，日本女子大學）中夏德安氏的報告，即“The Nature of Taiyi in the Guodian Manuscript ‘Taiyishengshui’: Abstract Cosmic Principle or Supreme Cosmic Deity?”一論文。郭店竹簡《太一生水》太一的性格：抽象的宇宙原則或者宇宙最大神”一說，在其論文中詳述。

[11]“宇宙生成論”一詞可稱為常用語。在前揭池田氏著書中可見。

[12]圍繞郭店《老子》和今本《老子》中的道的不同點，應予注目。具體參照拙論《從〈郭店老子〉看今本〈老子〉的完成》（《人文論集》特輯，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5）

[13]最早着眼於《大一生水》和今本《老子》相似性的論文，管見所及，有陳鼓應：《〈太一生水〉與〈性自命出〉發微》（《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1999年8月）等。

[14]參照《〈太一生水〉淺議》（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資料，2000年8月）。此處裘錫圭氏持將其分成3章，並稱第1～8簡為太一生水章，第10～13簡為名字章，第9、14簡為天道貴弱章。參照《〈大一生水〉“名字”章解釋——兼論〈太一生水〉的分章問題》（《古文字研究》第22輯所載）。

[15]參照池田知久監修：《郭店楚簡研究（一）》31～32頁。

[16]應注意到此處與在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天”的思想，即父性原理，實際上是一對極好的對照。

[17]參照前揭拙論。

郭店楚簡札記

◎ 黑龍江省地方志辦公室

◎ 劉 桓

《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出版後，個人借助書中的“釋文”和“注釋”進行研讀，作了一些札記。此札記內容有二：第一部分是從文字訓詁方面對一些簡文加以詮釋、疏證；第二部分是對子思著作的流傳及其思想來源有所探討。所論一定有謬誤之處，敬希方家不吝賜教。

一

此天之所不能殺，陰(地)之所不能釐，陰(陰)易(陽)之所不能成。((《太一生水》)[1]

“注釋”以殺爲衰、滅之義，以釐爲改義，均不確。按：這段話的前兩句實見於典籍。李零先生指出《荀子·儒效》作“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是類似說法[2]。《淮南子·繆稱訓》作：“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韓詩外傳》卷一作“天不能殺，地不能生”。末一字“生”與文意不符，顯係“埋”(或“葬”)字之誤。簡書此三句意皆相因，是說此天之所不能(將其)殺死，地之所不能(將其)埋葬，陰陽之不能(將其)盛下。因前兩句文意既明，循其義知“成”應讀“盛”。

即(呂)望(望)爲將參濟，戰監門參陰(地)。((《窮達以時》))

“注釋”中裘錫圭先生讀參爲臧，參濟爲棘津，均甚是。然“注釋”於“戰監門”無說，個人以爲“戰”應讀爲守，蓋“戰”乃獸字之誤，獸即狩，固可通“守”。《荀子·君道》說(周)文王“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殷代州人中有許多人做“州臣”，處於被奴役的地位。簡文說呂望的身份是臧，顯然較爲卑賤，故以守“監門”爲職事，此與他出身於州人的說法有相一致之處。

至信女(如)皆(時)，杙至而不結。((《忠信之道》))

裘錫圭先生按語：“此句意爲四時按規律運行，而無盟約，故爲信之至。”所說甚是。“杙至”乃指四時之必至，《大戴禮記·主言》：“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又同書《禮察》：“行

此之信，順如四時。”當屬同類說法。

古(故)君子之立民也，身備(服)善以先之，敬新(慎)以_以之，其所才(在)者內悞(矣)。(《成之聞之》)

類似的說法，如《孔子家語·入官》：“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

士成言不行，名弗得悞(矣)。(同上)

“成言”指已經答應的話，亦即諾言。《楚辭·離騷》：“初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它。”王逸注：“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它志。”可以體會“成言”之意，是指商量好的話。本文則指諾言。

是古(故)谷(欲)人之忌(愛)己(己)也，則必先忌(愛)人；谷(欲)人之敬己(己)也，則必先敬人。(同上)

這段話當為古語。《國語·晉語四》：“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為此數語之所出。

昔者君子有言曰“聖人天惠(德)害(曷)？言新(慎)求之於己(己)，而可以至川(順)天常(常)悞(矣)”。(同上)

古人言“天德”，與殷周天命觀雖無直接的關係，但在思維方式上總是略有影響。《莊子·天地》說：“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同書《天道》：“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道家之言“天德”，或言人君之德成於天，或謂天之運行本亦成德。此處“天德”與《莊子·天地》所言“天德”有一致之處，但顯然有儒家內省思想。

惟忿懣(讒)，改悛勅(勝)，爲人上者之彊(務)也。(《尊德義》)

悛勅(勝)之義，可與書中《語叢二》“乘生於忿(怒)，基生於輒(乘)”相參證。“悛勅”同於“基乘”，尋繹文意，悛基均當讀忌，《說文》心部：“基，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基基。”段注：“今《尚書》無此文，蓋即《泰誓》‘未就予忌’也。基、忌音同義相近。”是爲基、忌相通之證。“悛(忌)勅(勝)”義當近於“忌克”，《左傳·僖公九年》：“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孔疏：“其言多所忌，多欲陵人。”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忿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盧注：“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

禹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同上)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

旬民忌(愛)則子也；弗忌，則強也。(同上)

按《逸周書·芮良夫》：“德則民戴，否則民仇。”《呂氏春秋·適威》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僞《書·泰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以上說法與簡文對照，意思大同小異，文字略有出入，仍可看出其來源應出自同一古語，惟在流傳中出現

一些變化而已。𦣻當讀爲仇。“注釋”讀讎，亦通。

辨，宜(義)之方也。((《性自命出》))

章草从𠂔的字寫作井，如妍作姘，即其證。此字从言从𠂔，似即訃字。《說文》言部：“訃，諍語訃訃也。从言，𠂔聲。”段注：“劉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訃訃然也，斬之。’《魏書》作妍妍，皆訃訃之同音也。”

凡勿(物)又(有)𦣻又(有)卯，又(有)終又(有)𦣻(始)((《語叢一》))

𦣻、卯即本、末。卯可讀末，古從卯聲字可與從未或末聲字相通假。如柳與昧通，《書·堯典》“曰昧谷”，《尚書大傳》作“柳穀”，《史記·五帝本紀》“曰昧谷”，《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末與未聲字相通，如《史記·外戚世家》“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以妹喜女焉。’”故卯可讀末。^[3]簡文此語，實見於《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可相印證。

凡微(說)之道，級者爲首。((《語叢四》))

按《荀子·非相》：“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可見不單後來《韓非子》有《說難》之文，儒家早就論及這一問題。此似爲儒家著作。

二

子思即孔伋，是孔子之孫，他生活在兵戈紛擾的戰國時期。關於子思的生平資料，祇有《孟子》、《禮記》等古書的片段記載較爲可靠，《孔叢子》則屬後人僞託之作，作爲史料則頗成問題。據《禮記·檀弓》、《韓非子·難三》所記魯穆公與子思的對話，以及郭店楚簡的《魯穆公問子思》，可以確知子思曾在魯穆公時居魯，甚或仕魯。《孟子·告子下》載：“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淳于髡語。《鹽鐵論·相刺》引此，文字有出入，如“爲政”作“爲相”，“子柳、子思爲臣”作“子思、子厚爲之卿”，等等。)所說當離事實不遠。子思居魯之前，還曾居衛、居宋，《孟子·離婁下》：“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史記·孔子世家》：“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錢穆先生考證：“觀魯穆公之重敬子思，知子思居衛當在中年壯歲。大抵子思先曾事衛，歸老於魯，乃當繆公之世也”。^[4]所說甚是。子思居宋大約也是中年前後的事。子思晚年居魯時，已是三桓勢盛，《孟子·萬章下》載：“費惠公(按即魯季氏)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云云，說明子思不得不與季氏打交道。

子思的學術思想大都被孟子所繼承，二人構成思孟學派。《子思子》一度廣爲流傳，郭店楚簡發現有《子思子》即爲明證。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子思子》流傳未久，即遭到道家 and 儒家荀子的攻擊和批判。郭店楚簡《老子》甲本是目前發現的《老子》最早的本子之一。其文字與今本頗有不同。其中“𡗗(絕)僞棄慮(慮)，民復季(孝)子(慈)，”後來傳世的《老子》已改爲：“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其中“𡗗(絕)智棄卞(辯)”被改作“絕聖棄知”(見《莊子·胠篋》所引)，這說明儒家子思所主張的“仁”、“義”、“聖”、“智”，已逐漸爲道家所排斥。在

儒、道思想發生碰撞中，儒、道兩家由相互包容，走向了某種對立。至於來自儒家荀子的批判，除了《荀子·非十二子》對思孟“五行”說的批判外，還有《禮論》對“情性”的否定。該文說：“故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也，是儒墨之分也。”將“情性”歸之為墨家的主張，其實也是在說子思。

到了漢代，《子思子》仍不乏研習者，楊樹達先生曾指出，《淮南子·繆稱訓》“今校知與《子思子》佚文同者凡七八節之多，疑皆採自彼也”。^[5]除了楊氏書中指出的七八節之外，還有一些與《子思子》相似的提法。如《繆稱訓》的“口惠之人無必信”，《禮記·表記》說“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郭店楚墓竹簡·忠信之道》作：“口由（惠）而實弗从（從），君子弗言爾。”該文說“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窮達以時》則說：“古（故）君子傳於反（反）己（己）。”該文說“故君子慎其獨也”，《禮記·中庸》說：“莫見乎顯，莫顯乎隱，故君子慎其獨也。”《五行》說：“能為罷（一），狀（然）後能為君子，慤（慎）其蜀（獨）也。”該文說：“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聞也。”《中庸》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繆稱訓》中起碼還有這四處提法與《子思子》相似，說明《子思子》在漢代仍有影響。

子思的學術傳承也值得探討，子思的主要學術思想無疑是繼承孔子的，但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和曾子對子思的影響也很重要。過去學者論及思孟學派的學術淵源，就有人提到子游。如郭沫若先生認為思孟學說出自子游氏，一是因為《荀子·非十二子》批判子思、孟子“以為仲尼、子游為滋厚於後世”；一是思孟所說的“五行”與《禮運》篇的“五行”有關，而《禮運》出自子游氏之儒。^[6]郭氏提出這兩個證據，前者可謂顯證，可以不論。後者《禮運》所言“五行”，多指金木水火土，雖然提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到底不大明確。“五行”到了子思手裏，纔被運用於倫理道德的範疇，而賦予新的含義，遂為儒學發展做出貢獻。子思將仁、義、禮、智、聖稱為“五行”，這是將孔子的仁禮學說與舊的五行說相結合的一個創造。

子思受子游的影響是無疑的。《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學者大多認為應屬《子思子》，該文說：“喜斯慍，慍斯奮，奮斯咏，咏斯猷，猷斯訢。訢，喜之終也。慍斯憂，憂斯戢，戢斯慤，慤斯察，察斯通。通，慍之終也。”這段話學者指出見於《禮記·檀弓》，書中明言是子游的一段議論^[7]，這就足證子思學說曾受到子游的影響。

至於子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文學子游、子夏”，可見子夏對經典有精深研究。後人認為“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以此可見，子夏的學術以闡揚孔子學說為主，無疑也對子思的學術發生影響。

過去曾長期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曾子為子思之師，對此章太炎著文《徵信論》予以考辨，謂曾子、子思非師生關係。從經典記載看，曾子確實不必為子思之師，但二人關係密切，在討論問題時也能各抒己見。《禮記·檀弓》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曾子主張“孝”，故在“執親之喪”中“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覺得太過，就以“先王之制禮”來糾正之。由此可見子思對曾子能發表不同的看法。

子思在《中庸》中就強調：“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其“求諸己”的內省思想，在《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中也有所體現。“求諸己”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但曾子的言論行動也表現出同樣的傾向，如《論語·學而》記“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云云；《荀子·法行》載：“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凡此與《中庸》的“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毫無二致。

還有子思在《中庸》及《五行》中所主張的“慎獨”也受到曾子的影響。據學者研究，《大學》為戰國時期儒家著作，個人認為其成書年代約與《中庸》相近。《大學》載：“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下面接着就是：“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進一步申明“慎獨”之義。可知子思也曾受到曾子重視“慎獨”的影響。

曾子的有些學說概念在子思的著作中仍在沿用，如曾子提出“貴貴”，《呂氏春秋·孝行覽》：“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闡釋“貴貴”為：“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以上又見《禮記·祭義》，無“曾子曰”）“貴貴”的說法在子思的學說中又有新的闡釋。郭店楚簡及馬王堆帛書《五行》是學者所公認的《子思子》中的一篇，楚簡《五行》說：“貴貴，其止（等）尊（尊）賢（賢），義也。”可見子思乃將“貴貴”納入“尊賢”的學說中，子思認為“親親”、“尊賢”同樣重要。《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到了孟子，進而闡述為：“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注 釋

- [1]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下凡引此書，不再一一出注。
- [2]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1999年。
- [3] 以上柳與昧通，末與未聲字相通之例，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611頁。
- [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中華書局，1985年，173頁。
- [5] 楊樹達：《淮南子證聞》，見《楊樹達文集》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2頁。
- [6] 見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十批判書》，科學出版社，1966年。
- [7] 見陳來：《荊門竹簡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彭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補釋》，《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十二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儒、道兩家的性情論與天道觀

——從郭店楚簡看儒、道性情同異

◎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 彭 林

郭店楚簡的心性論有某些比較新的提法，如《性自命出》篇提出了“道始於情”的命題，以道與情直接聯繫，似乎與道家思想仿佛；《語叢一》云“爲孝，此非也。爲弟，此非也；而不可不爲也。爲之，此非也；弗爲，此非也”，《語叢二》云“父孝子愛，非爲也”，似與道家的“無爲”相通。有研究者認爲，《性自命出》“把情的地位也提得很高，甚至成爲某種意義上的道德標準，大有情本論的味道”。^[1]有學者說，《性自命出》“道生於情，情生於性”，“凡人性爲可惡也”，“凡人情爲可悅也”等語所表達的意思就是“率直性情”云云，“完全是子思的思路”^[2]。還有學者說，《性自命出》“包含有許多道家思想的成分”，此篇對人的性情的論述“與道家特別是《莊子》相近”^[3]，等等。由於事關郭店儒書的思想定位問題，需要作深入的討論。

一、儒家性情說溯源

重視性情，是否爲道家最早提出？是否爲道家所特有？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長期以來，學者大多將性情作爲道家的專利，因而在見到郭店簡中有關心性論的文字之後，就自然而然地與道家或道家思想相聯繫。筆者認爲，就文獻而言，最早提出應該重視人性問題的並非道家，而是儒家，其思想淵源至遲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

《尚書·西伯戡黎》載，殷商末年，文王興兵滅黎，殷王室大臣祖伊就已經意識到天性與人道的關係，並且將是否尊重人性作爲國家興廢存滅的標準之一：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不豫天性”，《史記·殷本紀》作“不豫知天性”。孫星衍云：“天性謂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信也”^[4]。可知，此處的“天性”就是《禮記·中庸》和郭店簡《成之聞之》中提及的天命之性，也就是人性。

又《尚書·召誥》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節性”，孔傳：“時節其性，令不失其中，則道化惟日其行。”召公在此論及性與道的關係，認為祇有“節性”，“道化”纔能“惟日其行”。殷周之際最重要的變化，是社會從崇拜鬼神之道的時代轉向了人本主義的時代。把泯滅人性作為紂王失德亡國的重要教訓之一來記取，是歷史的重大進步。

在儒家的另一部經典《周易》中，關於性命、性情的論述也時有所見，如：《周易·繫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高亨注云：“以《易》道論萬物之性，則能存其性而不傷其性。”^[5]《周易》之“性”，多指萬物的自然之性，如《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之成為陰，陽之成為陽，是其本性使然。^[6]《乾·文言》解釋卦辭“利貞”二字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高亨注：“天之利德是利物，天之貞德是有其規律之正，此乃天之性情^[7]。”《周易》的“性”是指萬物的本性，其中包括人性在內，並將“窮理盡性”、“順性命之理”作為聖人作《易》的宗旨：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8]（下略）

《周易》的邏輯鏈環是：一陰一陽為《易》之道，成此者為性；聖人作《易》，是為了“順性命之理”。可見聖人之道以性命為基礎，性命與道不可分離。

至於《禮記》的《中庸》、《樂記》等七十子後學的文字，對於性情的論述就更為豐富、系統，此不贅舉。可見，重視性情是儒家固有的傳統，並非道家所特有。

二、縱情與節性

儒、道兩家重視性情，這是共同點；兩家的分歧在於：人性與道的關係是什麼？人性能否等同天道？人類的性情是否需要受到制約？

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羣”^[9]，人類既然已經從動物界走了出來，就不甘心再回到動物界，與禽獸為伍，但是，人類既然是由動物脫胎而來，則自身必然帶有動物屬性。如果人類不能對自身的動物屬性加以控制，那麼，人類就不能從根本上區別於動物。

上天在創生萬物的同時，賦予了它們各自的屬性。儒家將萬物的這種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稱為“天命之性”。郭店簡的“道者，羣物之道”^[10]，說的正是自然屬性的普遍性。郭店簡的《尊德義》提及水道、馬道、地道和人行道，但是作者並非要強調它們的同一性，恰恰相反，

是要將人道從羣物之道中區別出來。牛馬之類的動物，處於散在的、無序的狀態，祇能在極低的層次中循環重複，永遠不可能出現質變。人類不同，人是萬物之靈，人道高於水道、地道、牛馬之道，或者說人性高於動物性。人類必須在族羣或者社羣中、依靠羣體的力量纔能生存，而羣體中的人類必須學會自我約束，纔能和諧共處，社會纔能走向繁榮。這種約束，最根本的是對自我情感和欲望的約束。如果率性放任如禽獸，社會就會混亂不堪，“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11]。因此人類能否節制心性情欲，是社會治亂興衰的關鍵之所在，“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12]。

人性究竟在哪些地方高於動物性呢？《尊德義》歸結為人類能够引導，也就是接受教育：“惟人道為可道也”。經過教育和調控，人性可以進入理想境界。《中庸》把“中”、“和”作為人的性情所應該達到的理想境界，並解釋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在通常情況下，人性不是表現得過度、就是不足，並不能自發地達到“中”、“和”的境界。為此，儒家將符合天道、德行的行為規範稱之為“禮”，推行於世，希冀以此從外部來制約人性，使人人“好惡以節，喜怒以當”^[13]。

從郭店楚簡可知，主張通過禮來使人們獲得性命之正的是子思學派。《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開首從性情落筆，又強調性情出於天命，不免給人造成儒家是重情主義者的誤解。但是，祇要通讀全文就不難發現，此篇的主旨並非強調性情的不可或移，而是主張以義統性，對性情加以節制，所以下文云“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頌，樂其道，悅其教”，其重心在於如何由情達於道。

《性自命出》“始者近情，終者近義”之語，是子思學派對於性、禮關係最精闢的詮釋：禮從情開始，即所謂“禮生於情”^[14]；但禮又不等同於情，禮是情的主導，禮的任務在於將情引導到符合於“義”的境界，所以說“體其義而節文之”^[15]，也就是《禮記》所說的“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16]。因此，子思學派對待人性的基本態度可以概括為“節性”二字^[17]。

以禮加於性情，非但没有泯滅性情，反而有涵養和提升性情的作用，可以“養情”^[18]和“化性”^[19]。人情的快樂，祇有依附於禮纔能得到保證，“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20]。“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21]荀子認為：人性不能“自美”；聖人制禮，施偽^[22]於人性，正是要使人性臻於美的境界，“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23]

以筆者淺見，郭店楚簡關於心性論的論述，大體上不出《中庸》的範圍。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並無二致。儒家雖然重性，但絕不是唯性主義者。儒家心目中的人類性情，不過是進行理論創作的素材。理論創作離不開素材，但理論創作的根本任務，不是要保全素材的原貌，而是要改造它，使之臻於完美。

道家不然。在道家的理論體系中，性情是萬物的靈魂，也是人類的靈魂，道家的根本任務就是保全萬物素樸的自然之性。因此，真正的唯情主義者的是道家。有趣的是，道家著作中也論及水道、馬道等，可見是當時雙方論辯的話題之一。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24]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踢。馬知己此矣！^[25]

莊子所謂的水、馬之道，是指水、馬的自然之性，與郭店簡提及的萬物之道相同。兩家的分歧在於，子思學派講水道、馬道，意在說明萬物之道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其中，人道的個性最為鮮明，人道高於羣物之道。莊子論水、馬之道，卻是要說明人道與水道、馬道的相同。莊子既把水性、馬性作為“天德之象”，也將人性作為天道的體現：“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26]因此，莊子說水、馬之道，意思是人道，莊子說人道，意思是說水、馬之道，彼此沒有區別。

在莊子看來，人與萬物齊一，無差無別，都是天的作品。莊子宣揚物我皆化的境界，主張忘情、忘我、忘卻天性之外的一切。在他看來，人的精神、意識，並不是人類區別於萬物的前提，而是出入於萬物、虛化為萬象的能力，進入“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的境界；不僅“夢蝶”，而且夢為魚鳥，“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27]冥情任運，悠游於天地之間。

莊子還否定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精神對於軀體的領有關係，“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28]認為人之身，人之性命以及子孫，都是天地之所委，不過是維繫物種綿延、形形相禪的軀殼，是天道的物質形式，其根本意圖是要否定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追求。

莊子是徹底的自然主義者，主張保有宇宙萬物的全真之性，反對對於自然之性的任何破壞。一切改變事物自然屬性的行為，都是對於天道的褻瀆，因此說，“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29]，淆亂天之常道，悖逆物之本性，自然之化就無法成就。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30]，“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31]。在道家看來，儒家主張誘導、改善人性，正是對於自然之性的最大破壞，尤其不能容忍。儒家主張“終者近義”，義者，宜也。既有宜者，必有不宜者。有宜、有不宜，則情感有是、有非，也即是有禮與非禮。道家反對情有是非之說，主張“無情”，“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32]人情應該順應天機自發而動，生死付諸自然。莊子將人性絕對化，引入了天不變、道不變、人性也不變的邏輯鏈環，因而持縱性的立場也就是勢在必然的了。

三、君子與小人

君子與小人，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對重要範疇。孔子每每以君子、小人對舉，以君子為脩身、得道之人，以小人為淺薄、無知之徒，如：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33]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34]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35]

郭店楚簡屢屢提及君子，間以君子與小人並舉，以見兩者的對立之處：

君子慎其獨也。

君子集大成，能進之爲君子。

能爲一，然後能爲君子。^[36]

是故小人亂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倫以順天德。

小人不逞人於[仁]，君子不逞人於禮。

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37]

刑不隸於君子，禮不隸於小人。^[38]

顯而易見，郭店簡所論君子、小人與孔子完全一致。荀子將節性還是縱情作爲君子與小人之別的標志：“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39]將子思學派的情、禮關係說得極爲透徹。

並非巧合的是，在道家著作中，也屢屢提及君子與小人，如《莊子》云：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40]

君子所以驕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41]

但是，儒、道兩家的君子、小人觀不僅毫不相同，而且是根本對立的。首先，道家認爲，在上古，人人無知無欲，何來君子、小人之別？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42]

無知、無欲，就是道家推崇的“素樸”；素樸就是民懷抱天然之性，順自然之道。因此，道家認爲，如果一定要區分君子、小人的話，就祇能以是否保持天賦的素樸之性作爲標準，能保之者爲君子，反之則爲小人。桑戶死，其友人子反、琴張認爲桑戶不過是“返真”，故編曲鼓琴，相和而歌，被周遭之人視爲“畸人”。但道家認爲，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不諧於禮儀，是“畸於人而侔於天”，是真正的君子，所以說“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43]

其次，道家認爲，儒家標榜的君子，是以殘傷人的天性爲代價的，完全違反了自然之道，因此，道家正是在這一點上，猛烈地抨擊儒家：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44]

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45]

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是儒家推崇的至治之極、理想世界。道家則認爲，人的樸茂之性被破壞，正是肇端於三皇五帝，根本不值得稱道，“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46]“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47]

道家評判歷史，似乎把性情作爲唯一的權衡，他們把燧人、伏羲以下的歷史，看作是一

部“德”不斷“下衰”的歷史，因為聖賢“興治化之流”，從而真性盡失，“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48]三代以下，更毋論矣，“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49]莊子對堯、舜、禹、湯、文、武等六位儒家推崇的先聖大加貶斥，指責他們的根本錯誤在於“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50]。扭曲了人的性情。由此而形成的道家的歷史觀，與儒家當然是截然相反。

莊子痛詆儒家的仁義之學，同樣是根基於全性保真的立場，“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51]認為仁義之學改變了人性，莊子還明確批評孔子“亂人之性”^[52]，把凡是以禮儀束縛性命之情者，一律視為小人。

可見，儒、道兩家都注重君子與小人之辨，雙方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主要標準，都是在對待性情的態度上，即縱情還是節性。

四、儒道兩家的天道觀

儒、道兩家的性情論，之所以有如此對立的色彩，當推本於兩家的天道觀。從現存文獻看，最早提及以人法天的是《老子》：“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自然界，“人居其一”，本是不爭的事實，《老子》卻將它作為人類必須按照自然法則來建立社會法則的依據。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類必須把自己作為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參與宇宙的整體的循環。自然界周流不息、恆久不變的強大生命力，更使人們由衷地崇拜，因而試圖加以仿效，從中獲得符合天道的、萬世不移的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種非常流行的立論原則。

但是，不同的學派或者學者，對於自然和道的理解並不相同，由此導致了學術思想體系的結構性的差異。道家是典型的自然主義者，認為自然界的自發狀態就是天道，萬物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體現了天道。天的作品沒有錯誤可言，任何改變萬物性狀的舉動，都是試圖塗改天道，都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為世人厭惡的“駢拇”（六指），由於它出於天成，是上天的安排，人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去掉它：

彼正正者^[53]，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岐；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54]

祇要是天造地設，就沒有善惡可言，由此可以推導出人性天然合理而無善惡的結論。“小惑易方，大惑易性”。^[55]認為失其真性，乃是最大的“惑”。因此，性命之情最為可貴。

儒家也體認到了自然界的物質存在，以及自然規律的不可逆轉。儒家的自然之道與道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儒家用陰、陽二氣說解宇宙。《老子》也講陰陽，但它並不講究陰、陽的狀態。而儒家理論中的陰陽二氣是平衡的，祇有平衡的陰陽纔能產生萬物。儒家把陰陽二氣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四時作為萬物之母。儒家理論中的四季，寒暑適中，任何過度或不足，都會造成宇宙秩序的混亂。“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56]因此，必須陰陽有時，四時有序，寒暑有度，萬物方能正常生長。

《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高亨注云：“乾道，天道。即天象之自然規律。”“‘各正性命’之主語是萬物。性，屬性。命，壽命。萬物如人與鳥獸蟲魚草木等皆受天道變化之支配，適應天道變化而運動，各得其屬性之正。”“太和非謂四時皆春，乃謂春暖、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氣皆極調諧，不越自然規律，無酷熱、無嚴寒、無烈風、無淫雨、無久旱、無早霜，總之，無特殊之自然災害。”^[57]由上引文字可知，周人已經將性命作爲人類的根本，進而提出“得性命之正”的命題。子思學派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從理論上完善地解決了如何獲得性命之正的問題，即人類應該仿效自然的和諧，來追求自身性情的中正。

儒家也把天放在很高的位置，這一方面是儒家尚沒有力量從傳統的天道觀念中擺脫出來，而在另一方面，儒家又將天道作爲重要的思想資源來加以利用。殷周革命之後，周人已經認識到“天命靡常”，“天道邇，人道近”^[58]，因而意識到不能過於依賴天，轉而注重人的作爲，並逐步將天道人格化，“商罪貫盈，天命誅之”^[59]，“天道賞善而罰淫”^[60]，“天道無親，惟德是授”，^[61]逐漸將人的精神從自然界中獨立出來，是要以人事統率自然，故《荀子·天倫》有“制天命而用之”之說。

道家的天道觀，以自然的天爲核心，要將人融入自然，所以強調人的自然屬性，以及人與自然的共性，尤其是人與動物的共性。認爲人與萬物沒有差別，都是自然的存在形態。道家主張縱情率性，與自然同化，無疑是源自對於天道的認識：“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62]天道無爲，故人道無爲，“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63]人道是臣道，理應服從於作爲主道的天道。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在春秋、戰國之際，儒、道兩家發生過激烈的論戰，論戰的核心是如何對待人類的性情，即人類的性情是需要節制，還是應該任其自然？由此延伸到人類是否需要禮樂、教化，君子與小人的標準等重大問題的討論，從而形成了兩家思想的主要特色。儒、道性情之爭的理論背景是雙方天道觀的不同。儒、道兩家都主張人道取法天道，但道家所謂的天道，是自然的同義詞，無所施爲；而儒家的天道，經過了人格化、道德化的詮釋，被當作真理的代名詞，反映了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改造人類自身的自覺意識。

注 釋

[1] 東方朔：《〈性自命出〉篇的心性觀念初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325頁。

[2] 歐陽楨人：《在摩蕩中弘揚主體——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認識論檢析》，《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363頁。

[3] 高華平：《試述〈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的道家思想》，《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371、373頁。

[4]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證》。

- [5]《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6月，518頁。
- [6]《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6月，514頁。
- [7]《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6月，70頁。
- [8]《周易·說卦傳》。
- [9]《論語·微子》。
- [10]《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 [11]《荀子·非十二子》。
- [12]《荀子·正名》。
- [13]《荀子·禮論》。
- [14]《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二》。
- [15]《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
- [16]《禮記·坊記》。
- [17]參見拙作：《始者近情 終者近義——子思學派對禮的理論詮釋》，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3期，3～14頁。
- [18]《荀子·禮論》。
- [19]《荀子·性惡》。
- [20]《荀子·禮論》。
- [21]《荀子·脩身》。
- [22]此“偽”是人爲之義，讀《荀子·性惡》即可知。參閱拙作《論有爲與無爲》，《光明日報》2002年4月9日。
- [23]《荀子·禮論》。
- [24]《莊子·刻意》。
- [25]《莊子·馬蹄》。
- [26]《莊子·庚桑楚》。
- [27]《莊子·大宗師》。
- [28]《莊子·知北游》。
- [29]《莊子·在宥》。
- [30]《莊子·天運》。
- [31]《莊子·天地》。
- [32]《莊子·德充符》。
- [33]《論語·爲政》。
- [34]《論語·里仁》。
- [35]《論語·雍也》。
- [36]《郭店楚墓竹簡·五行》。
- [37]《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
- [38]《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
- [39]《荀子·儒效》。
- [40]《莊子·山木》。
- [41]《莊子·外物》。
- [42]《莊子·馬蹄》。
- [43]《莊子·大宗師》。
- [44]《莊子·駢拇》。
- [45]《莊子·盜跖》。
- [46]《莊子·天運》。

- [47]《莊子·在宥》。
- [48]《莊子·繕性》。
- [49]《莊子·駢拇》。
- [50]《莊子·盜跖》。
- [51]《莊子·駢拇》。
- [52]《莊子·天道》。
- [53]上“正”字乃“至”字之訛，參閱王先謙《莊子集解》。
- [54]《莊子·駢拇》。
- [55]《莊子·駢拇》。
- [56]《荀子·禮論》。
- [57]《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6月，55頁。
- [58]《詩·大雅·文王》。
- [59]《左傳》昭公十八年。
- [60]《尚書·泰誓》。
- [61]《國語·周語中》。
- [62]《國語·晉語六》。
- [63]《莊子·大宗師》。
- [64]《莊子·在宥》。

郭簡“為父絕君”的服喪意義

◎ 臺灣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 林素英

一、前言

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中，“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的記載，引起諸多學者談論，一時之間眾說紛紜。由於這句簡文中之服喪紀錄關係親親與尊尊在服喪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之問題，對於補充現有服喪資料之不足，具有相當高的價值，頗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文擬延續徐少華、劉樂賢、魏啓鵬與彭林等四位先進學者之相關討論，將此問題作整體的疏理，而理解其服喪意義。

二、郭店簡的服喪紀錄與禮書服制記載的相互關係

沈文倬根據喪禮進行的特性，認為《喪服》、《士喪禮》、《既夕禮》以及《士虞禮》四篇的關係密切，因為喪禮節目的安排，都必須配合《喪服·經》之規定進行，因而認為此四篇應是同時撰作的。沈氏更進而推斷此四篇寫成之時期，應在魯哀公末年到悼公初年之間，亦即周元王、定王之際，約當公元前五世紀中期。至於《服傳》為解經之作，又受到《禮記》論禮諸篇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撰作的年代應在《禮記》論禮諸篇成書之後，亦即約當周慎親王以後（315B.C.）至秦始皇三四年（213B.C.）焚書以前。^[1]由於郭店一號楚墓的年代被推定不晚於公元前300年，而竹簡所抄錄的內容又應早於此一年代，因此判斷竹簡中的服喪資料，或當本於《喪服經記》之材料以及佚《禮》中的古文《記》，所以竹簡中的服喪思想亦大致與禮書之記載相合。

郭店簡中“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的一段服喪紀錄，雖然無法在現有文獻中找到完全

相同的記載,但是有些僅與《儀禮》《喪服》所載稍有詳略之差異,有些則與《禮記》所載幾無二致:如《喪服》記載較詳,為父與君皆斬衰三年,所服為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之裝束;為妻則齊衰杖期,所服為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為昆弟齊衰不杖期,所服與齊衰杖期大致相同,僅由杖改為不杖、疏屨改為麻屨而已;至於朋友,則相為弔服外加麻經帶而已;^[2]簡文與《喪服》所載雖然有詳略之別,不過大體不差。另外,《大傳》有“五世祖免,殺同姓也”之記載,《喪服四制》也有“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3]之紀錄,則與簡文之內容更為接近。

追溯我國的喪服禮俗雖然起源相當早,不過,要發展成具有規模,且形成體系周延完整的制度層次,則有賴周代在人類理性覺醒、人文思想擡頭以後,再經過長期的補充修訂而漸臻於完備的。^[4]由於父系社會的影響,因而周代的社會組織自然以男性為中心,且又配合封建、宗法等繼承制度,所以明定以男系為法定的繼承系統,故而以男性親屬方為同姓己族,而將妻黨、母黨等親族視為異姓外親,同時為求達到凝聚本宗親族的力量,培養血濃於水的親族感情,以致必須採取崇揚己族、抑制外親的措施。將這種崇揚己族、抑制外親的思想貫徹於喪服制度時,就明顯可見所謂“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5]的親屬組織,其實專以父系親屬為主,至於妻黨、母黨之親屬,有服之親其實並不多,且均以服總麻之輕服為原則,即使是血緣關係相當親近者,充其量也祇能因為特殊條件而加服至小功之服。由此可見當時的喪服制度中,配合宗族組織的內、外位而嚴格區分內、外親,是一道非常重要且不可逾越的根本分際。

大體明瞭喪服制度訂定之大旨以後,再對照簡文的服喪紀錄與禮書中的相關記載,將可發現關係這句簡文服喪思想最密切的,應該首推“親親、尊尊、名、出入、長幼、從服”^[6]六大服術原則中的前兩大制服原則:“親親”,即是按照服喪者與死者血緣的親疏遠近關係,而訂定喪服的輕重;此即所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7]“尊尊”,則是依照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以及所從事職務的差異,而設置不同的喪等;此即所謂“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8]此兩大服術原則,將是深入理解簡文“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的關鍵點。

從對比簡文之服喪紀錄與禮書之相關記載,可以發現兩者大抵相合,因而若欲深入理解簡文“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中服喪思想之真正涵義,確實還應透過更完整的喪服制度方可以窺其全貌。

三、“為父絕君”等簡文所凸顯的服喪意義

由於親族網絡十分綿密,再加上死生有命,所以不免有人會遭遇前喪未除,而後喪又起之悲哀,因此《雜記》與《問傳》中即載有許多則遭遇輕重不等之親喪應如何“兼服”之狀況。^[9]而概括上述“兼服”輕重親喪之類型,即可以發現“輕者包,重者特”、“以服重者更易服輕者”為“兼服”二喪時的根本原則,亦即當前喪應舉行練、祥之祭與除服之時,皆按時舉行,

代表前喪之有時而盡；事畢，然後再重返後喪應服之服。至於“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的記載，則明顯表示為人子、為人臣者併遭父喪與君喪時的處置之道。然而欲深究此一問題之深切涵義，則首先必須明瞭為君服斬的歷史淵源，進而理解何以君臣之義不可廢之道理，然後方可進入人子、人臣併遭君父二喪時應作的抉擇。以下即透過簡文與《曾子問》的相關文獻對照，而隨文展現其蘊含的文化意義。

（一）為君服斬的歷史淵源

從簡文“疏斬布實(經)丈(杖)，為父也，為君亦然。”對比《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可以清楚地發現斬衰之服本為親父至尊而設，至於為君(包含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有地者)，^[10]則為外推對於親父之尊與敬，而至於社會之貴貴(卿大夫)、邦國天下之尊尊(諸侯與天子)的結果。由於所謂“君”，包含天子、諸侯、卿大夫三類，因此以下將分別敘述此三類君與父之間的相關以及為此三類君服斬之理由，更由此得見喪服以親親為本，且以尊尊為推而輔之的大義。

1、君父合一

由父而能外推以至於君，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周代推行封建、宗法制的關係，更由於極力推行“嫡長制”的繼承法，加上封建、宗法又與喪服制度相併而行，因此天子與諸侯對於太子與世子而言，就是標準的“人君亦人父”；相對的，太子與世子對於天子與諸侯，則是標準的“人臣亦人子”；此即“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11]之情況。在這種亦君亦父、亦臣亦子的情形下，君臣與父子之間不但具有濃厚的人倫親情，臣子對於君父同時還應實踐社會所推崇的尊尊之義，因此世子與太子對於君王，不但應當克盡人子孝親之情，也必須履行人臣忠君、敬君之義，所以君父享有兒臣為己服斬衰三年之重喪，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

2、從“合一”到“相擬”的君父關係

由於天子對於同姓諸侯，又可區分成三種親屬關係：具有父子關係者，則諸侯理所當然應為天子之親父服斬衰三年；具有伯叔子侄等“諸父猶父”、“兄弟之子猶子”^[12]關係者，為人臣之子侄亦可比照為親父之禮而為天子伯叔服斬衰；具有兄弟“一體之親”的親近關係者，在一般五服中，尚且還須為“一體之親”服齊衰期之重服，而為位尊如天之天子兄弟提高到以最高之喪等服喪亦在情理之中，此從《喪服小記》所明載的“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13]即可以得到說明。對於諸侯兄弟尚且如此，對於位居天子之兄弟服斬實亦為人情之常。

至於天子所分封之異姓諸侯，不但多屬功臣，與王室具有親密之政治軍事聯繫，而且還多半與王室具有婚姻關係，因此天子亦時常以伯舅、叔舅稱之，所以彼此之間同樣具有人倫親情之基礎。倘若往前追溯昔日“舅權”極盛之時期，亦可發現當時還存有“舅亦如父”之民俗，^[14]因而此類之諸侯對於天子之喪，亦可比照人子為父服斬之最重喪等處理。

諸侯與大夫第二層次之分封情形，亦類同於天子與諸侯第一層次分封之狀況，因此其君父相擬之狀況，亦屬相類。至於第三層次的大夫，其爵位世襲者與位居大夫之親父，也是“亦君亦父”、“亦臣亦子”之關係，因此君父之關係亦同於上。至於大夫與其他家臣之間，由

於家臣雖然可以擁有祿田，不過卻無法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因此家臣必須更賣力為大夫工作，促使自己所效命之大夫可以在政治、經濟上獲得更好的發展；而家臣復又藉由大夫之獲益，間接提高自己之利益，所以二者之間更具有禍福與共、休戚相倚的現實關係。由於這類家臣對於大夫而言，除卻政治上的從屬關係以外，還有更實際的經濟仰賴關係，所以彼此縱然並無宗族血緣關係，但是家臣對於大夫，卻很容易克盡宛如人子的“死忠死孝”之道；有此特殊因緣，所以家臣為此類大夫之君，亦可比照子之為父服斬衰之方式辦理。

3、由親親擴大為尊尊

各級封君與直接隸屬之封臣間，由於君父相擬以及相互依存的關係，臣之為君明顯由親親而擴大至於尊尊之層次，因此從為父斬衰而類推之，則有“為君亦然”之服喪文化。由於為父服斬乃源自人類本然而具的親親哀情，所以親親的服術原則不但在制定喪服時更具有優先性，而且其重要程度亦相對更高。基於人情之本然與封建、宗法制在當時社會的推行，因此《喪服·斬衰》該章，於首列人子為父服斬之後，緊接其下，則呈現政治上最為尊尊的關係，於是以“諸侯為天子”為第二條經文，然後再以為“君”排列第三，層次井然，絲毫不紊，因而所服均為“正斬”。

由於此三類服喪者與服喪對象之間，均來自“君父合一”之本源，所以服喪者為此不同對象所穿着之喪服並無差異，代表“君父同尊”之義。至於排列在章末的“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則由於以“公士、大夫”而為“君”者，其地位本來就遠低於天子、諸侯之“君”，因而此處雖然同樣列入應服斬衰之範圍，不過倘若此君而非父，則所服之斬衰僅能歸屬“義斬”，而與“正斬”之衰三升稍有差別，改以三升半之布為斬衰用布。^[15]從“正斬”與“義斬”之些微差異，可以再度證明“尊尊”緣於“親親”，且“親親”在服喪原則上又稍稍高於“尊尊”之義。

（二）君臣之義不可廢的道理

親親與尊尊雖然同時列入六大服術原則之一，《喪服小記》尚且還明載有“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16]的說法，可見在一般情況之下，親親與尊尊雖然同時並列“人道之大者”，不過若要在親親與尊尊之間再作比較時，則二者仍然應有先後輕重之差序分別。從最顯而易見的外在排列順序形式而言，已可明白表示親親優先考慮於尊尊的事實；從制定喪服的內在涵義而言，則喪服本為喪親者至痛之飾，因此服喪之正則當以“親”為斷，有親則有服、無親則無服，情深痛甚者則所服最為粗惡長久，情薄親疏者則服短期的輕服，因此親親不但必須優先考慮於尊尊，而且親親之情還更重於尊尊之義。

不過，文獻資料中，《禮器》特別並列“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為“倫”，^[17]且孔子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18]之歎，因為誠如《荀子》所載：“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其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19]又如《呂氏春秋》所載：“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辟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辟，而人備可完矣。”^[20]另外，郭店楚簡中，《成之聞之》有“天降大常，以理人倫，制為君臣之義，著為父子之親，分為夫婦之辨”^[21]之記載，即從治理人

倫的角度，將“君臣之義”列為第一；《六德》的“子弟大材藝者大官，小材藝者小官，因而施祿安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謂之君”^[22]，則從安百姓、利民生的立場，以說明人君之重要；《語叢三》也從“父亡惡，君猶父也，其弗惡也，猶三軍之旌也，正也”^[23]，說明人君之重要。無論從現有文獻以及簡文所載，在可見君道之於萬民之教化發展，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以致《莊子》更藉孔子之口，而說明“命”與“義”二者相併為天下之大戒，認為“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24]可見親親之情雖然比較尊尊大義具有先在性與獨特性，但是人生而處於人世間，為求生活的順遂發展，則無法僅僅固守親親之情，而無視於尊尊大義的存在，必須隨時注意此二者之調和與平衡，因此反映於服喪上的，則是併遭君父二喪時，必須慎加權衡以求情義兼顧。

除卻上述引證各家之說以外，《說苑》與《韓詩外傳》也同時記載齊宣王詢問田過有關君喪、父喪之事例（雖然文字稍有不同，但是並不影響內容之差異），可以作為當時一般儒者認為喪父重於喪君想法之佐證，亦即田過透過“父親於君”的人倫事實，以說明“父喪重於君喪”的道理。由於田過的說辭盡情盡理，終於使宣王悒悒然而無以響應。^[25]可見聖王明君確實無法否認“父親於君”的人倫事實，不過，相對而言，亦明顯可見苟無君之土地、爵祿，亦無以奉養尊顯父尊，是以此又再度可見“君臣之大義不可廢”的道理。

劉樂賢教授就曾於《郭店楚簡〈六德〉初探》中，舉上述之事例，以說明儒者認為喪君不如喪父之想法，因而認為簡文所載“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之服喪方式，在儒學史上不但並非絕響，而且還可能反倒是古代儒者的一致看法。^[26]劉氏之說乃信而可徵之說法。

（三）併遭君父二喪時的權衡

經由上述之討論，可知當君而非父，亦即當君父不相合一之時，則自然以父處於親近之內位，而以君居於相對較疏遠的外位，所以在人際關係講求由內而外、由親而疏的原則下，親親重於尊尊、父喪重於君喪的道理已可無疑義。若以此說對照《孝經》所載“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27]，則可見父由於兼有至親與至尊之身份，因而能享有愛與敬雙極之地位，且推此孝敬之道以事君長，即可以成就忠順之美；然而當父喪與君喪二者發生衝突時，則須注意此二者相互之間應當如何協調以求其妥。以下即透過《曾子問》的兩段文獻記載，可以發現禮有“權而得其宜”的變通之道，更可據此而知親親與尊尊之間必須講求複雜而微妙的平衡關係：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28]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29]

透過上述曾子與孔子一問一答的文獻紀錄，從“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之記載，首先可以確定此處所謂之“君”，當指諸侯以上之“君”，因此其所屬之臣，即可包括大夫、士，所以此處之臣為“君”服喪，均屬於斬衰中之正斬，與為父所服之喪服毫無差別。另外，綜合此兩段文獻，又可以歸納出孔子分別從未殯、既殯、啓殯、發引等四個進行喪禮的重要時刻，分別考慮君喪與父喪應如何平衡之問題，從中還可以觀察儒者所進行的權衡之道：

1、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雖然從始死至於停殯之前，死者都要歷經招魂的復禮、沐浴、飯含、襲冒、小斂與大斂等儀式節目，然而因為彼此所處的社會階級不同，以致為死者安排的各項儀式節目內容，在複雜與繁瑣的程度上也相對有別，因此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30]的區分。由於大夫以下皆為三日而殯，而諸侯以上則或者五日、或者七日而殯，因此面臨君薨未殯又逢父母之喪的時候，自然應詳加衡量事情之輕重緩急，先歸於自家，在三日之內處理父母停殯前之一切事宜，然後再趕赴君之處所，協助處理相關事宜。大夫之妻由於身為命婦，與大夫共享一體之尊，雖然不必參與國君之朝夕奠，不過遭逢為國君舉行朔月奠、月半奠以及薦新奠之時，還必須與大夫同赴國君之處所共同致敬盡哀。在這段協辦國君喪事之期間，為父母每天所舉行之朝夕奠祇好採取權變方式，由室老或子孫代為主持；不過，這段期間內假若遭逢為父母舉辦的朔月、月半以及薦新之奠，則必須趕回家中致敬盡哀。

從國君縱使尚未停殯，人臣倘若遇有父母之喪，也須先歸於家中處理親喪看來，已可顯現父母親喪之重與刻不容緩；且必待父母停殯之後，方可再至國君之處所協辦喪事，足見人子居父母之喪與君喪相較，的確具有優先性。同時，如此之交互安排為父、為君服喪誌哀，又可以說明當一個人面對父與君雙重正斬之喪時，即必須謹慎權衡輕重緩急，不可缺席任何較重要之喪禮儀節，方可以盡人子或人臣之哀，且使親親與尊尊之間能獲得較妥善的協調。孫希旦即根據本段文獻記載，認為文中所述三種狀況，旨在說明當一個人併遭君親之喪時，則必須權乎已殯、未殯之差異情形，以為緩急輕重之節，務必使恩與義得以交相盡而無憾，此即表示禮之深入人心之處。^[31]

2、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倘若國君已經進入停殯之階段，人臣始有父母之喪，則一來因為國君以上停殯之期間長達五月或七月之久，而治喪事宜至此又已經暫時告一段落，再者因為父母之喪乃天下之達喪，所以縱然貴為一國之尊君，亦無壓制人臣而奪人喪情的道理，因此人臣自應即刻返回家中為父母治喪盡哀，準備在三個月之內安葬父母。不過，人臣在歸家處理喪事期間，倘若遭逢國君舉行朔月、月半以及薦新等較大之奠禮，亦須前往國君之處所行禮誌哀，至於為君每日例行之朝夕奠，則由於父母親喪重於君喪，因而為人臣者亦必須有所割捨。如此盡心盡意交互為國君與父母致敬盡哀，足以顯現人子在盡心服喪誌哀以盡親親之情之餘，尚且必須注意何時應該克盡人道尊尊之大義，亦即人道雖然以親親為重，不過卻又必須與尊尊

取得一定程度之妥協。

3、君啓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喪禮進行至啓殯之儀節，代表緊接在朝祖之後即將進行安葬之大典。^[32]人臣於此時而突然遭遇父母之喪，則縱使國君即將大葬，人臣亦須即刻回歸家中哭喪以盡人子之禮；行哭禮之後，再趕赴為國君送葬之行列以盡人臣之禮。在送葬儀式即將舉行之之前，人子尚須先回返家盡哀，足見父子親情對於人道而言，比起君臣之義，是更為根本、自然而無法取代的。

4、君既引，而臣聞父母之喪。

啓殯朝祖之後，再歷經大遣奠與讀贈、讀遣之儀節，即將靈柩移上柩車，然後執引而行。執引之人數隨死者所屬階級之不同而各有定數，^[33]其它送葬之行列則隨行於後，因而當喪禮進行至執引之儀式，則表示國君出殯之行列已正式出發，且即將進入安葬入窆之最重要儀式，以致身為人子者，此時就必須暫時按捺住心中對父母之哀情，繼續參與為國君送葬之典禮，以盡人臣之禮，並避免擾亂浩浩蕩蕩的出殯隊伍。然而在國君之靈柩入窆以後，遭親喪之人臣即先行反歸家中哭喪以盡人子之哀，而不再等待封墓之後始歸。

此處雖然不見人子即刻返家奔喪之安排，然而由於國君之靈柩既已執引，則已進入喪禮之最重要階段，且已接近尾聲，因此衡情論理，人子為父母盡哀雖然意義深重，不過畢竟尚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可以誌哀盡孝，但是為國君服喪盡義，此時則為最重要之時刻，自然不宜臨時退卻，所以為人子者亦應忍一時之哀情而先申為君尊尊之大義；一旦靈柩入窆，有父母之喪者則即刻奔喪反家以盡親親之人情，而不再等待嗣君封墓之後始反歸。由此仍然隱約可見國君有不奪人臣哀情之處，祇是在時間相當緊迫時，仍須考慮通權達變之需要，以展現人道亦有不以親親害尊尊之細微設想。

5、父母之喪既引，聞君薨。

與上述情況相對反，則為父母發喪到達執引出殯，而聽聞君薨之消息時，應該如何服喪之情形。由於此時出殯之行列既然已在途中，而且入殯安葬之事又最為重大，因此仍然繼續為父母進行安葬之禮，待父母之靈柩入窆，始更改出殯所着之斬衰服飾，而以括發、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之裝束，至國君之處所哭喪。鄭玄即稱此改服哭喪為“不以私喪包至尊”，^[34]且亦應是文獻所載“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35]之義，代表人子在盡親親之情之餘，仍須盡人臣尊尊之大義，使親親與尊尊之間取得一定程度之平衡。

文獻對於君喪與父喪衝突時的權變平衡之道既已如上所述，對照簡文“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所載，亦在說明併遭君、父二喪時的處理之道。劉樂賢教授以為所謂“絕”（以及稍下的“殺”均同），乃是喪服用詞，是“減殺”之意，亦即“當服父喪與服君喪衝突時，可以將君服做減省，而不是為服君喪而減省父喪”。^[36]然而彭林教授卻認為典籍中之“絕”，均無“減殺”或“減省”之義，以為“為父喪減省君喪”在禮書中得不到證明。^[37]若從文字的形義而言，“絕”字之義及其在一般典籍中的用法，的確應如彭氏所質疑者，均無“減殺”或“減省”之義，且應作“斷”字解，意指“斷而無服”之義，此固然可自成一說，然而卻應與喪服中因為“絕族無施（移）服”、天子與諸侯“絕旁期”的“絕服”有別。魏啓鵬教授則主張以“繼”代“絕”，認為

“絕”因為無“減殺”或“減省”之義，所以無法與喪服制度中的“減殺”措施連結，然而易之以具有次於上而居於後，包含減降義涵之“繼”，即可以消除此困難。^[38]

至於簡文中究竟為“絕”或“繼”的問題，則由於郭店簡該段文字中四處“絕”或“繼”的刻法本身並不一致，因此彭氏早有“我們有理由認為，前三字是‘絕’字誤寫或省寫；或者說，楚簡中‘絕’與‘繼’不甚分別”之說；復以“繼”與“絕”具有相反為訓，絕則繼之，繼必由絕的特殊緣故，因此古時流行之文本中，此二字之字形亦不甚區別。^[39]既然“絕”與“繼”具有此反相為訓的微妙關係，則置於喪服制度中探尋其意義之時，自然不能忽略此一層特殊關係；尤其再與上述《曾子問》的文獻兩相對照，從為人子、為人臣者併遭父喪、君喪之雙重喪服時，則必須權衡輕重緩急，採取情義兼顧、交互服喪以盡哀的措施，亦即先服父喪至於停殯（或者安葬），然後趕赴國君處所協辦治喪以盡哀；此亦與簡文“為父絕君”之意相當。倘若究其實，如此交互為父、為君服喪，亦可說是暫時斷絕為父所服之喪，而改服當時為君應服之服；而當其參與國君之“殷事”再重返為父服喪時，亦是暫時斷絕為君所服之喪，如此交相更替（先君喪後父喪之時，亦採取相對的措施），至於除服為止，則“絕”與“繼”乃是交相而為之。至於簡文“不為君絕父”，則意指先遭君喪時，由於國君或者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或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均較大夫以下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之期間長久，因而為人子者不能等待君喪處理完畢始反家哭喪，而須暫時中斷為君所服之喪，先行反家哭喪以盡人子之哀；此又與《曾子問》之記載相互吻合。

雖然劉氏、彭氏與魏氏對於簡文的解讀不盡相同，不過彼此皆同意此句簡文必須放在整體喪服制度中討論始能透徹明瞭其原義。此句簡文即在凸顯人臣與人子“兼服”君父二喪時，服喪者該如何權衡平衡之問題，且從其權衡平衡之道，又可以說明“服術”的六大原則終究以“親親”為首，卻又必須設法兼顧“尊尊大義”的道理。

四、結論——仁內義外的喪服文化特質

郭店簡的服喪紀錄，在提及“門外之治義斬恩”之後戛然而止，李學勤教授即以爲簡內僅言及門內之治而不及門外之治的現象，乃是《六德》之作者預設眾人皆已熟悉有關喪服之問題，因而引用《喪服四制》的結果；^[40]亦即郭店簡實以門內、門外之治總結喪服制度的綱領，而且以爲“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是最根本的體制。不過恩情雖然重要，但是在複雜的人世間，人情終需擴大以方便世人進入廣大的社會組織，於是如何“以理節之”使歸於義，就顯得相當重要，因為“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責責、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因而倘若能善用恩、理、節、權的方法，並隨之確立“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的原則以區分內外，即可以適應複雜的社會生活之需要。

《雜記》所載“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孔穎達即於《正義》中清楚地指出：“此謂國有君

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41]亦即喪親之臣雖然身遭君喪與親喪之雙重喪變，仍然可以自盡其哀痛親人之情以服親喪，僅在“以義斷恩”的考量下，謝絕他國外賓之弔喪，因此國君對於臣子並無“奪喪”之嫌，亦可以合乎弔喪者應該“哀痛主於君”以國為重的設想。另外，“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42]都是對於“門外之治義斷恩”最好的腳注，說明親親雖然重於尊尊，但是倘若已經參與公家祭祀大事，而後始聽聞父母以下諸親人之喪，此時則必須以義為斷，視當時公事進行的程度，以是否已經視察洗滌之祭器為決定是否繼續參與祭祀之基準，因為祭祀之事始於“視濯”，既已“視濯”，則不可以中輟；倘若尚未“視濯”，則使人告於國君，而後即行舉哀奔喪。

《六德》服喪紀錄的前文“仁，內也；義，外也”之記載，即明顯指出服制之設計乃是以仁為經為本、以義為緯為權的做法，此正合乎《禮運》“仁者，義之本也”^[43]、《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44]之說法，同時也與《語叢》“仁生於人，義生於道。或生於內，或生於外”^[45]的記載互相呼應。這種以仁為本、以義為輔的服制設計，正是本於“仁，人心也；義，人路也”^[46]仁義的根本特性之發揮，正可以說明儒家學說以“仁”為核心的一貫主張。

由於“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47]因而聖賢制禮，務必使喪禮盡哀、服喪盡情的“親親”思想，乃是天地之經，更是人情之自然，是貫串整體服制思想的根本核心，與君權勢力的高低無涉；《語叢》所載“禮因人之情而為之”，又說“情生於性，禮生於情”^[48]即為此義。甚且，如此親親之仁，當其擴而大之，則發而為尊尊之大義，成為世人所可遵循、所應遵循之大道。因此《性自命出》即載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49]之說，所以“直情徑行”儒者向來以為“戎狄之道也”，^[50]而必須要求以“禮”節之，且《坊記》又有“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51]之載，故知以“禮”而“節”之之道，即是以“義”為度的節制標準，所以“發乎情而終於義”，正是儒家“仁內義外”思想之充量發揮。綜合以上所論，可知“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的服喪紀錄，正凸顯整體喪服制度本於人情而制禮的事實，不過在人情之外，尚且還必須懂得權衡輕重緩急以兼顧“尊尊大義”，方足以彰顯人性以仁內而義外的文化特質。

注 釋

[1] 有關《喪服》等四篇撰作之時期，其詳參見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23～54頁，原見於《文史》，第16輯；另外，有關《服傳》之部分，則參見同書《漢簡〈服傳〉考》，163～182頁，原見於《文史》，第25輯。

[2] 斬衰、齊衰部分，其詳參見《儀禮·喪服》，見於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352～355頁；“朋友，麻”，則見於《喪服·記》，397頁。

- [3]分別見於《禮記·大傳》，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619頁；《喪服四制》，1032頁。
- [4]其詳參見拙著：《喪服制度的文化意義——以〈儀禮·喪服〉為討論中心》，（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48～54頁。
- [5]《禮記·喪服小記》，591頁。
- [6]《禮記·大傳》，619頁。
- [7]《禮記·喪服四制》，1032頁。
- [8]同上注。
- [9]其詳參見《禮記·雜記下》，735頁；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唯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緦，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問傳》，956頁；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問傳》，958頁；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自“斬衰之葛”以下，亦見於《喪服小記》，601頁；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 [10]《儀禮·喪服·斬衰》，349頁，“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條下，《傳》曰：“君，謂有地者也。”此處對於“君”之定義，採取鄭玄於346頁，《傳》曰：“君，至尊也。”下之說法，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然清·盛世佐，《儀禮集編》，54頁，載元·敖繼公曰：“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此爲之服者，諸侯則其大夫、士也。公卿大夫，則其貴臣也。”然而由於《喪服·斬衰·傳》明白指謂“有地者爲君”，而非“有臣者皆爲君”，故知敖氏之說實與《傳》之原義有所出入。因此盛氏收集各家對此條經文的說法後，云：“案《特牲禮》，士亦有私臣，但分卑不足以君之，故其臣不爲斬也。”另外，清·褚寅亮：《儀禮管見》，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1181頁，載：“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蒞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早臣與，與臣隸，名亦臣也，而豈遽爲之服斬乎？《傳》意言公士、大夫之無地者，雖有臣，不爲服斬也。公士、大夫且然，況於士乎？”盛氏、褚氏之說最爲有理，因而此處之“君”，不採取“士之有臣者亦爲君”之說在內。
- [11]《禮記·文王世子》，398頁。
- [12]《禮記·檀弓上》，143頁：“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既然“兄弟之子猶子”，可知“諸父亦當猶父”。另外，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59頁記載：卜辭及商旬稱父輩皆曰父，不分叔、伯。周初始見叔父之稱，不論稱爲伯父、叔父，終未離父，伯、叔不過長幼的分別，不論稱爲兄子、弟子，終未離子。
- [13]《禮記·喪服小記》，607頁，鄭《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正義》曰：熊氏以爲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 [14]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一）》，74～79頁，舉以下三例說明周初之時“舅權”之遺痕未泯：《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驅駟彭彭，維師尚父（武王后邑姜之父），時維鷹揚。”《左傳·僖公二六年》：“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尚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愛齊侯呂伋（大公之子，成王母邑姜的兄弟），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 [15]《儀禮·喪服·記》，402頁，載：“衰，三升，三升有半。”由於記文所載斬衰服所用之布有三升、三升半兩種，而《問傳》卻無此斬衰用布之相關說明，因此賈公彥在此《疏》之中，以“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的方式，“引‘或人’所解爲證”，以疏解經文與注文之義。更引“其《斬》章有《正義》‘子爲父、父爲長子、妻爲夫之等是正斬。’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以說明此三升半實是義服。同時賈氏尚且已於《喪服》346頁，《斬衰》章首爲“君”之條下，以“爲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爲《疏》，說明“義服”之內涵，而分別斬衰有如上所分的“正斬”、“義斬”兩類。而清·胡培塈撰，段熙仲點校：《儀禮正義·喪服》，（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1618頁，“附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中的《衰冠升數圖說》記載：“以三升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更於1625頁，《降正義服圖說》中記載：“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三條入義服。……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

服經》文，列二者於父為長子之前，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至於彭林教授則於《再論郭店簡〈六德〉“為父絕君”及相關問題》中，亦主張“諸侯為天子、臣為君屬義斬”之說，則與筆者所見相異。

[16]《禮記·喪服小記》，594頁；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17]《禮記·禮器》，450頁。

[18]《論語·微子》，見於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166頁。

[19]《荀子·王制》，見於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326頁。

[20]《呂氏春秋·恃君覽》，見於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1321頁。

[21]荆門市博物館編，裘錫圭審訂：《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68頁。

[22]《郭店楚墓竹簡·六德》，187頁。

[23]《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三》，209頁。

[24]《莊子·人間世》，見於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貴雅出版社，1991，155頁。

[25]該事件見於漢·劉向：《說苑·修文》，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201頁。同時又見於漢·韓嬰：《韓詩外傳》，第7卷，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58頁。

[26]其詳參見劉錦賢：《郭店楚簡〈六德〉初探》，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387頁。

[27]《孝經·士章》，見於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24頁。

[28]《禮記·曾子問》，377頁。

[29]同上注，379頁。

[30]《禮記·王制》，239頁。

[31]其詳參見清·孫希旦、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曾子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533～534頁。

[32]《禮記·檀弓下》，172頁；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33]《禮記·雜記下》，749頁：“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人。”《周禮·地官·遂人》，見於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234頁，記載遂人之職云：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由於為天子執引之人數不在禮書之正文記載中，因而此處鄭玄注云：“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另外，《檀弓下》，165頁，孔穎達於《正義》引何東山言執引之人數：“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

[34]其詳參見《禮記·曾子問》，379頁之鄭注。

[35]同上注，376頁。

[36]其詳參同注26，劉氏該文，386頁。

[37]其詳參見彭林：《再論郭店簡〈六德〉“為父絕君”及相關問題》，見於“簡帛研究網站”資料。

[38]其詳參見魏啓鵬：《釋〈六德〉“為父繼君”》，見於《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2期，103～106頁。

[39]同注37。

[40]其詳參見李學勤：《郭店簡〈六德〉的文獻學意義》，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頁。

[41]《禮記·雜記上》，729頁。

[42]同上注，736頁。

[43]《禮記·禮運》，439頁。

[44]《禮記·中庸》，887頁。

[45]《郭店楚墓竹簡·語叢》，194頁。

[46]《孟子·告子上》，見於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193頁。

[47]《禮記·雜記下》，737頁。

[48]前者見於《郭店楚簡竹簡·語叢一》，194頁；後者見於《語叢二》，203頁。

[49]《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179 頁。

[50]其詳參見《禮記·檀弓下》，175 頁。

[51]《禮記·坊記》，863 頁。

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中的“愛親”考

◎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東亞學術院儒教文化研究所 李承律 著

◎ 曹 峰 譯

一、前 言

如郭店楚簡^[1]《唐虞之道》(以下簡稱本篇)第6號簡“堯(堯)舜(舜)之行, 恐(愛)畢(親)隣(尊)取(賢)。”所云,“愛親”是堯舜所實踐之二件大事之一。這個“愛親”根據6~7號簡“恐(愛)畢(親), 古(故)孝。”知其是針對父母的“孝”,“孝”根據“孝, 忝(仁)之穴(冕)也。”(第7號簡),可知其被定性為“仁”中最高的德目。然而就“愛親”的例子來看,“古者吳(虞)舜(舜)管事穴(瞽?)窆,乃戈<弋>丌(其)孝,忠事帝堯(堯),乃戈<弋>丌(其)臣。”(第9號簡),“古(故)丌(其)為穴(瞽?)窆子也, 邑(甚)孝。秉<及>丌(其)為堯(堯)臣也, 邑(甚)忠。”(第24號簡),“恐(愛)畢(親)算(尊)取(賢), 吳(虞)舜(舜)丌(其)人也。”(第10號簡),舉的全部是舜的例子。如第21~22號簡“古者堯(堯)之舜(舉)舜(舜), 昏(聞)舜(舜)孝, 智(知)丌(其)能叛(養)天下之老(老)也”所云,堯祇在舉用舜時起到作用。即“愛親”作為對被禪讓一方所要求的品德而受重視。

本文對於本篇這種有特色的“愛親”,從以下四點加以分析,①“愛親”與“親親”意義上的區別,②從先秦到西漢時代為止“孝”思想的變遷,③“忠、孝”的對立與矛盾及其統一化的問題,④“孝”及其“愛”的觀念化、普遍化的問題。通過以下的分析,試圖明確以“愛親”為主題的本篇的思想意義,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愛親”與“親親”是同義語嗎

對於本篇的“愛親”,許多學者往往將其視作“親親”的同義語,將二者混同、混用起來。

例如，陳明氏指出“親，指血緣上相關的人物，作為自然人，表現為家族內部的父母弟兄等。……親親（‘愛人’）是自然情感，故應作為氏族政治的基礎。”^[2]張立文氏指出“儒家‘愛親’（親親）與‘尊賢’並非衝突，……《中庸》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把“愛親”看作是《中庸》篇的“親親”的同義語^[3]。鄧建鵬氏指出“《唐虞之道》以孝導源於‘愛親’，‘愛親’是對與已有血緣關係之人的愛。”^[4]丁四新氏指出“‘愛親’，本為血緣關係中的愛，尤其是子對父之愛”的同時，又指出“親親可以容納賢賢，賢賢亦可容納親親原則”，依然是把“愛親”和“親親”相混同^[5]。其他如廖名春、羅新慧諸氏也把“愛親”看作是“親親”的同義語而將二者混用^[6]。這個問題，因為和中國古代宗族、家族制度的歷史、社會變遷有着深刻的關係，是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

先來看一下“愛親”。在當時的家族或宗族制度中親子關係和父子關係處於中心位置，“愛親”如，①《莊子》人間世篇中仲尼之言“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②《管子》形勢解篇中“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③《韓非子》難二篇中“嚴親在闔，輕犯矢石，孝子之所以愛親也。”④《孝經》天子章篇中“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蓋天子之孝也”等表示，除了《管子》之例以外，不用說，其意義大致都限定於上述關係中。雖然語氣上稍有不同，但與“愛親”有着類似意義的“事親”、“尊親”也完全相同。

幾乎可以說是常識，“親親”有着以下兩種意思。其一是“親父母”，其二是“親親族”（或者說以親族為親族）。

先看前面的例子，《孟子》告子下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以對父母之怨提起問題，緊接着下文說“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據此可知，“親”即意味着父母，它與“孝”相連結。同一篇中還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考慮到這裏“親親”與“愛其親”、“敬長”與“敬其兄”是相對應的，故將這裏的“親親”看做是父母也無妨。再如其他例文，《禮記》文王世子篇在談到武王死後暫時踐阼的周公是如何教育幼少的成王時，有“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的仲尼之言，這裏的“親親”之“親”，也指的是父母。

再看後面的例子，（1）《孟子》萬章上篇有“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裏的“親親”我想無疑指的是親族的“親”，“親親”被看作是比“仁民”“愛物”更緊要的事情。其它例子如，（2）“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親親者以私為道也。”（《商君書》開塞篇），（3）“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賺，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荀子》禮論篇），（4）“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荀子》大略篇），（5）“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6）“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以上爲《左傳》僖公二十四年），（7）“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左傳》昭公十三年），（8）“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禮記》大傳篇），等等均表示親族。

更明確反映出“親親”之“親”不是父母的例子有，（9）《墨子》非儒下篇“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10）《禮記》文王世子篇“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11）同喪服小記篇“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12）《禮記》大傳篇“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等等。特別是（9）的“親屬”是“本宗”與“外姻”兩概念的合併。與此相對，（10）（11）（12）均似表示同宗內親疏的差等，較之（9）範圍要小。

總之，“親親”是較之“愛親”更上層的概念，兩者的區別雖然不能說嚴密，但可還是有區別的，這一事實必須注意。

這一事實，在《禮記》中庸篇中也不例外。衆所周知，《中庸》自古以來被疑爲漢代以後的作品，圍繞其成書時代的爭論，至今尚無定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這裏的“親親”從“親親之殺”來看，無疑指的是包含父母在內的親屬全體。這從“九經”所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中也可輕易看出。

然而問題並不僅僅在於作這種概念上的規定。這類概念中蘊含相互對立，時而相互衝突的政治社會思想上更深刻更本質的問題。這裏必須指出的是一個事實，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以“愛親”即父子關係爲原則的“孝”與“尊賢”是不相對立、不相衝突的。常常被認爲與“孝”相對立、相衝突的概念無疑是以君臣關係爲原則的“忠”，而與“尊賢”相矛盾、相衝突的概念是“親親”。因此，將本篇的“愛親”與“忠”相對立、相衝突的假說也許是妥當的，但將把它與“親親”相混同，並視爲與“尊賢”相矛盾、相衝突之概念的假說，看來是無法成立的^[7]。

三、“孝，忝（仁）之穴（冕）也。”

（一）《唐虞之道》的“孝”及其思想史的地位

舜和“孝”相關聯的舜的孝子故事，在《尚書》堯典篇中僅能看到“以孝烝烝”一處，對此最加以強調，且賦予獨特意義的是《孟子》。例如，離婁上篇“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萬章上篇“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告子下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而，本篇有“孝，忒（仁）之灾（冕）也。”把“孝”視作“仁”中最高的德目，這是有必要考察的事。

衆所周知，把“孝”看作儒家倫理、道德的一個德目，最早給予重視的是《論語》。特別學而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顯示出“孝”與“仁”關係的典型文例。但它與“弟”並稱，尚未賦予獨立的意義。“其爲仁之本與”之言帶有疑問意識，又非出自孔子之口。再說《論語》中“孝”較之“仁”重要性要低^[8]。斟酌以上數點，筆者認爲在《論語》的階段，還未達到“孝”是“仁”中最高德目之認識地步。

把針對父母的“孝”視作“仁”的實質性內容者，正是《孟子》。例如，離婁上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其他如告子下篇“親親，仁也。”（此處“親親”之“親”指的是父母。）也是這樣的例子。《孟子》把舜作爲孝子的模範，並嘗試作出儒家的解釋。據此，進而有意識地把舜樹立爲地位不可動搖的代表“孝”的儒家的聖人（參照前引離婁上、萬章上、告子下篇等）。同時“孝”的精神不僅僅限於父子關係，還致力於把它定位爲推進政治社會的根本原理（參照告子下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不用說這種現象在《論語》中已見其端倪（參照學而篇“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爲政篇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同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等。）。

像這樣的由《論語》、《孟子》高揚的“孝”的精神不僅僅對於儒家內部，似乎也對其他學派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管子·戒篇》中，桓公向管仲請教之際，管仲回答“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度>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是其一例。那裏所見的“孝弟者，仁之祖也。”恐怕是受到過《論語》、《孟子》影響的人寫成的，這裏也是“孝、弟”合而不分的。

“孝”從“弟”中分離出來，而且在儒家所有的德中被賦予最高的價值，這在可以認爲是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所成書的與“孝”有關的一系列的文獻，即《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孝經》、《呂氏春秋·孝行篇》中可以看出來。

①“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

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

②“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同上)

③“夫孝，德之本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篇)

④“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經》三才章篇)

⑤“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經》聖治章篇)

⑥“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呂氏春秋》孝行篇)

⑦“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同上)

⑧“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違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同上)

⑨“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能。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違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禮記》祭義篇)

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同上)

①是在“孝”的精神上把“仁、義、忠、信、禮、行、彊、樂、刑”(⑧是“仁、禮、信、彊、樂、刑”，⑨是“仁、禮、義、信、彊、樂、刑”)等各種倫理、政教作為基礎附加上去。②表明正因為“孝”以所有的倫理為基礎，所以成為“天下之大經”，成為天地的普遍的準則^[9](⑩沒有“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這一句，但意義大致與②相同。)。此外③④⑤，如津田左右吉氏所指出的那樣，與孝悌為仁之本(《論語》學而篇)，堯舜之道乃孝弟(《孟子》告子下篇)相比，孝要更受到重視，特別是③⑤雖然承認了衆多的德行，但把孝視作德之本，就是把其他的德行全部從屬於孝了^[10]。最後還有⑥⑦，說的是必須以“孝”的精神統治國家，即所謂的孝治主義。

如此，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作為“至德要道”的“孝”理念臻於完善。以“孝”理念的思緒史的展開為背景，再對照本篇的“孝，志(仁)之穴(冕)也。”筆者以為，(1)它受到了《孟子》所見舜的孝子故事的強烈影響，(2)把“孝”從“弟”中分離出來，將其視為“仁”的最高之德這點上看，在儒家諸德中重視“孝”的傾向要甚於《論語》、《孟子》，但也沒有到《大戴禮記》

《孝經》《呂氏春秋》的意識，即特別高揚“孝”，把“孝”的地位與《論語》中孔子的“仁”等同起來。關於這點，《六德》第39～42號簡的“先王之耆（教）民也，司（始）於孝弟。君子於此戈<式>𠂔（體）者亡所茲（廢）。是古（故）先王之耆（教）民也，不𠂔（使）此民也𠂔（其）身，𠂔（失）𠂔（其）𠂔（體）。孝，𠂔（本）也。下攸（脩）𠂔（其）𠂔（本），可以𠂔（斷）𠂔（讒）”。可以說也是相同的。不用說“孝，𠂔（本）也。”並不是諸德之本的意思。

因此，從思想史的觀點看，本篇的“孝，𠂔（仁）之𠂔（冕）也”中所見“孝”的思想，是不是可以說在從《論語》經《孟子》向《大戴禮記》《孝經》《呂氏春秋》展開、變遷過程中，起着橋渡的作用呢。

（二）“忠”與“孝”

再從別的角度來討論。它與“忠”、“孝”之對立、矛盾及其統一化的問題相關。

本篇的“孝，𠂔（仁）之𠂔（冕）也”一句的後面，接下來還有第9號簡及其第24～25號簡“古者吳（虞）𠂔（舜）管事𠂔（瞽）𠂔（寔），乃戈<式>𠂔（其）𠂔（孝），𠂔（忠）事帝𠂔（堯），乃戈<式>𠂔（其）𠂔（臣）。”“𠂔（其）𠂔（爲）𠂔（瞽）𠂔（寔）子也，𠂔（甚）𠂔（孝），𠂔（秉）<及>𠂔（其）𠂔（爲）𠂔（堯）𠂔（臣）也，𠂔（甚）𠂔（忠）。𠂔（堯）𠂔（禪）天下而受（授）之，南面而王而<天>下而𠂔（甚）君。古（故）𠂔（堯）之𠂔（禪）𠂔（乎）𠂔（舜）也，女（如）此也”的內容。然而，上述內容中必須注意的是，舜對堯盡“忠”的部分。這看上去非常普通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但據筆者考察，從先秦到漢初我們可以看到的任何一本文獻中，找不到舜對堯盡“忠”的明確記載。因此是否可以這樣推測，本篇明確地記載“忠”，恐怕與戰國後期至末期，“忠”（忠君、忠誠）同“孝”一樣都成為政治社會上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特別是“忠”“孝”的矛盾、對立問題），而被大書特書之事實^[11]有着深刻的關聯，並在本篇中登場了呢。

“忠”或者說君臣倫理與“孝”或者說家族倫理的對立、矛盾的問題，《論語》中所見直躬的故事（《論語》子路篇），還有積極樹造舜的孝子形象的《孟子》，即萬章上篇：“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及離婁上篇：“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盡心上篇：“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或許與上述問題有些關聯，但嚴格說來，問題意識尚不明確^[12]。

與此相對應的是《荀子》的“禮”至上主義，即認爲人是萬物中至高的存在，支配萬物的原因要求之於作爲社會規範的禮義，根據禮義來區別人類社會的各種事象，以此獲得社會的調和和安定。作爲當然的結論，較之個人的道德更重視社會全體的秩序、規範、正義，由社會整體的規範涵蓋個體的德行。將上述思想充分體現出來的是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

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

然而，戰國末期至漢代初期，如前所述，以孝爲諸德之本，將其它的德行全部從屬於孝的傾向變得顯著。就“忠”而言，出現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即認爲擴大“孝”的精神則可移“孝”爲針對君的“忠”，或者說仕君即實現“孝”的手段。不用說在這種思維方式引導下，“孝”和“忠”的對立、矛盾就自然化解了。前文所見與“孝”相關的一系列文獻，例如《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的“忠者，忠此者也。”《呂氏春秋》孝行篇的“人臣孝，則事君忠”正明確地反映出這種狀況，其它可參照的還有如下例子。

①“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也可參照《呂氏春秋》孝行篇、《禮記》祭義篇）。

②“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

③“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立於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孝經》開宗明義章篇）

④“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孝經》廣揚名章篇）

與此相比，本篇的“孝”和“忠”基本上是受禪一方，即作爲舜的資質被論述的。其中“忠”“孝”的矛盾、對立的問題，因爲是舜所理想地加以實現的人格的两面，而被消解得無影無痕。可以說雖然就思想立場和具體內容而言與《荀子》不同，但“忠、孝”被“禮”這一社會規範涵蓋而全然沒有意識到兩者的矛盾、對立，僅僅是併稱在一起，這點可以說與《荀子》在基軸上是相同的^[13]。

四、“孝之菑(殺)，恐(愛)天下之民”——與墨家的兼愛說相關聯

在此還有一個必須探討的問題，即“孝”和“愛”的觀念化、普遍化的問題。本篇中與此問題有關的是第7號簡的“孝之菑(殺)，恐(愛)天下之民”。

但是，到底上述問題應看作是“孝”的觀念化、普遍化呢，還是“愛”的觀念化、普遍化呢？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重要問題。爲了摸清問題的所在，讓我們先來看看學者們對此問題的見解吧。朱榮貴氏指出“郭店楚簡和《孟子》論孝相近之處尚有以孝爲聖人孝化百姓主要的

方式”，認為它與《論語》所見“孝”的觀點是相通的^[14]。鄧建鵬氏指出：“《唐虞之道》以孝導源於‘愛親’，‘愛親’是對與已有血緣關係之人的愛。由親愛親族擴充到以‘愛天下之民’為孝，又以‘愛親’同仁對應起來，‘愛親故孝’，‘孝，仁之冕也。’所謂孝，即在於仁，仁亦是愛天下之民。”^[15]把“悉（愛）天下之民”看作是“孝”的擴充或是“孝”自身。此外，丁四新氏指出“推孝而及他人，則能愛天下之民，……能愛親則能行孝道，推愛及人，行之於天下，而愛天下之民，這就是仁道。”與鄧氏的解釋大致相同^[16]。總之，以上三者都是把上述文字看作“孝”精神的觀念化、普遍化。為判明其真偽，有必要將“𡗗（殺）”與“悉（愛）天下之民”分開來分析。

自從文物出版社本（157頁）將“𡗗”釋作“方”的假借字（或異體字）以來，關於此字的解釋有兩種意見。第一，認為它是“放”的意思。第二，認為它是“殺”字的古文。前者是由李零氏最先提出的，“‘放’，原從虫從方，整理者讀‘方’，可商。”^[17]但僅止於此，未提出任何根據。

後者是由陳偉氏最先提出的，陳氏列舉了三個事例來證明它為“殺”的古文^[18]。筆者贊成陳氏的意見，在字形方面再做一些補充。郭店楚簡中作“𡗗”的字有以下三例，即“𡗗”（《唐虞之道》第7號簡）、“𡗗”（《語叢一》第103號簡）、“𡗗”（《語叢三》第40號簡）。《說文》（一篆一行本）中“殺”的古文有“𡗗、𡗗、𡗗”三體，其中的“𡗗”與“𡗗、𡗗、𡗗”酷似。此外，它和《汗簡》所收的《尚書》的“殺”（“𡗗”）也類似（嚴格來說祇少了一筆），和《古文四聲韻》所收崔希裕纂古的“殺”（“𡗗”）也很相似。由此可見，首先從字形上看，此字即“殺”的古文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看“殺”的含意。對此，陳氏認為是“滅殺”的意思，即不平等，據親疏而加以差別、差等之意。

在此，我試圖從別的角度來探索一下解決該問題的線索。與《語叢三》第40號簡“悉（愛）𡗗（親）則（則）𡗗（其）𡗗（殺）悉（愛）人”相類似的句子，是郭店楚簡《五行》第33號簡“悉（愛）父，𡗗（其）𡗗（繼）^[19]悉（愛）人，𡗗（仁）也。”與此可對照的文句是帛書五行篇第192行的“悉（愛）父，𡗗（其）𡗗（繼）悉（愛）人，仁也。”關於“𡗗”，《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注釋〔一八〕，將其當作“繼”的異體字，意為“次”。和第192行之說呼應的第254行有“悉（愛）父，𡗗（其）悉（愛）人，仁也，言悉（愛）父，而𡗗（後）及人也。”其中關於“殺”的注釋將其當作“差、滅”之意，認為它和“繼”的含意也相近^[20]。

然而，通觀本篇全文，雖然是基於“孝”展開，但差別愛的描述或者說這方面的強烈意識幾乎看不到^[21]。由此可見，本篇中“𡗗（殺）”的含意，較之“差、滅”，解為“繼”（或“次”）似乎更妥當些。這樣的話，“孝之𡗗（殺），悉（愛）天下之民”的意思就是，因為“悉（愛）天下之民”意為超越血緣關係，實現遍及全天下的“愛”，所以首先要“孝”即愛親，以此為邏輯程序，纔能實現遍及全天下的“愛”。然而，要注意的是這一點，即本篇把“悉（愛）天下之民”作為堯舜德行之一，換言之，實踐遍及全天下的“愛”的主體是帝王。

要說與“悉(愛)天下之民”相類似的表達或類似的思想,在儒家系統的文獻中也自古可見“愛人”之語。例如,《論語》中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篇)。從中也可以看出把“愛”普遍地加以擴大的意圖。但,如先輩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論語》的上述文章,概而言之,應該把“愛”看作是血緣性的“愛”^[22],這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孟子》也大致相同。雖然一方面如“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離婁下篇),講到普遍的“愛”,或如“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篇)所云,講到“仁、義”的擴充,但另一方面,如“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篇)所云,對於“物、民、親”要按照親疏,清楚的區分出“愛、仁、親”並加以差等,因此,在給予“物、民、親”的待遇上是分等級的。關於在現實中施行的普遍的“愛”,如“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盡心上篇)所云,《孟子》主張現實中普遍的“愛”的實施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不如說這纔是《孟子》本質的立場。特別是“堯舜之仁,不徧愛人”的思想,更反映出與本篇的“堯(堯)堯(舜)之行,……悉(愛)天下之民”有着決定性差異。

那麼,在先秦時代,像本篇那樣,宣揚以帝王爲主體的、要在全天下實行普遍之“愛”的學派是誰呢。不用說是墨家,在其特有的兼愛論中表現得十分顯著。

兼愛上篇如“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所明確展示的那樣,聖人的作用僅僅祇是勸導“愛”,故極力抑止對“愛”的強制性實施。作者在那篇的最後用“不可以不勸愛人”之子墨子之言來加以證實。

但是兼愛中篇二次提及“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並立證“兼相愛交相利”已爲過去的聖王(禹、文王、武王)實施完畢,最後如“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所示,進而變成君主針對萬民的平等愛、普遍愛。這不用說顯示出兼愛論朝着統治者、有權者之傾斜^[23]。

到了兼愛一篇,如池田氏所指出的,雖然依然存在相互愛的痕跡,但幾乎都變成了“愛人利人”這樣的話,即對他人的“愛”的意義更強烈,君主的面向萬民的平等愛、普遍愛更爲強化了^[24]。例如,“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中的“兼君”的描寫,“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

王兼也”中作為兼愛實行者的文王的描寫，“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則更甚，試圖在以君主為頂點的政治秩序中，據賞罰對萬人強制實施兼愛^[25]的傾向格外明顯。

隨着從中篇到下篇的遷移，君主的面向萬民的平等愛、普遍愛更被強調，對權力的依存、對權力的傾斜之傾向更強化。之所以有這樣強烈的傾向，其原因如各家所指出的那樣，它反映了官僚制度的完備、君主一元體制的確立這種戰國後期以後的狀況^[26]。本篇的“恐（愛）天下之民”與《論語》《孟子》的思考方式有着本質的區別，這已在上文指明。將這一情況與《墨子》相對比，特別是與兼愛下篇對比如何呢。兼愛下篇反映出君主的面向萬民的平等愛、普遍愛作為墨家兼愛論的最後階段已完全定型，而本篇的“恐（愛）天下之民”描述的是堯舜作為帝王的行動。兩者結合起來考慮，可以判斷，本篇所受的是兼愛論中幾乎最終階段的影響。

五、結 語

之所以說本篇受過墨家的兼愛論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料。《孟子》滕文公上篇“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就是其例。墨子學派的夷子所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除了順序的差異，實際上與本篇的“孝之蚤（殺），恐（愛）天下之民”思考方式完全相同。夷子發問儒家之道指的不也是以平等愛、普遍愛為主旨嗎。與此相對，孟子完全加以否定。本篇的“孝之蚤（殺），恐（愛）天下之民”，從孟子的見解看無疑是無法認同的。從這點出發，很容易推定本篇是成手於與孟子學派的思想有相當距離的學派。還有其他因素也要考慮進去。第一，與《孟子》的批判相反，兼愛上、中、下篇整體並不否定使用“孝”“悌”等舊禮來安定社會的宗法秩序，甚至還要維持它、安定它，這與本篇的“孝”思想不相矛盾^[27]。第二，本篇的“堯（堯）舜（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和“孝之蚤（殺），恐（愛）天下之民”，不僅在表現方式上，而且在思想上與兼愛下篇的“愛人利人”極其相似。不過本篇不主張依賴賞罰的法治，從中可看出與兼愛下篇不同的面貌。

因此，可以推察出作者以下的意圖。本篇的“孝之蚤（殺），恐（愛）天下之民”，既積極地吸收了墨家的兼愛論，特別是兼愛下篇^[28]的末期思想，因不主張賞罰而與之劃出界線。進而作者認為作為統治者如強化血緣關聯會有被疏遠之危險，要讓非血緣關係的人也進入統治層中^[29]。這從它同以下文句“德（禪）之澶（流），世亡忘（亡）直（德）”的上下關聯來看，也能輕易地讀出其意。

注釋

- [1]郭店楚簡的引用,以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為底本。但在確定文字之際,據圖版加以改正之處也不少。
- [2]陳明:《〈唐虞之道〉與早期儒家的社會理念》(《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247頁/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5,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 [3]張立文:《略論郭店楚簡的“仁義”思想》(《孔子研究》1999-1,1999年3月,66頁/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1999-5,1999年7月)。彭邦本、李景林的傾向也與其相同。彭氏指出“又如在‘親親’、‘愛親’、‘尊賢’等問題上,《唐虞之道》等佚文與《中庸》不僅有共同的議題,而且術語、論點乃至思路的相同、相似及相承亦脈路清晰。”(《郭店〈唐虞之道〉初論》,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等主辦:《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第1冊,武漢大學,珞珈山莊,1999年10月,73頁)李氏指出“《唐虞之道》乃以尊賢,親親言仁義。……《中庸》以‘仁者仁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論治道。其言天下有‘九經’,首三經即修身,尊賢,親親。”(《從郭店簡看思孟學派的性與天道論——兼談郭店簡儒家類著作的學派歸屬問題》,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等主辦:《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第1冊,武漢大學,珞珈山莊,1999年10月,100頁。“仁者”後面的“仁”當為“人”字之誤)其他,如王葆玟:《郭店楚簡的時代及其與子思學派的關係》(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等主辦:《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第2冊,武漢大學,珞珈山莊,1999年10月,155頁)、楊儒賓:《郭店出土儒家竹簡與思孟學派》(《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武漢大學,珞珈山莊,1999年10月,4頁)也持同樣的見解。
- [4]鄧建鵬:《〈唐虞之道〉的民本思想》(《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5,1999年9月,46頁。)不過請注意“血緣關係之人”不僅限於父母。
- [5]丁四新:《愛親與尊賢的統一——郭店簡書〈唐虞之道〉思想論析》,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等主辦《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第1冊,武漢大學,珞珈山莊,1999年10月,79、86頁。
- [6]參照廖名春:《郭店楚簡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3,1998年9月,74頁/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1999-1,1999年3月)及羅新慧:《郭店楚簡與儒家的仁義之辨》(《齊魯學刊》1999-5,1999年9月,29頁)。
- [7]關於“愛親、尊賢”兩概念的關係問題,請參照拙論:《郭店楚墓竹簡的儒家思想研究——郭店楚簡研究序論》,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2月,第七章之第二節。
- [8]池澤優:《中國戰國時代末期的“孝”思想の思想的意味——“孝”の宗教學・その五》,《社會文化史學》31,1993年9月,15頁。
- [9]池澤優:《中國戰國時代末期的“孝”思想の諸文獻——孝の宗教學・その三》,《築波大學地域研究》11,1993年3月,48頁。
- [10]津田左右吉:《儒教の研究》三,《津田左右吉全集》18,岩波書店,1965年,22-23頁。此外,林秀一:《孝經學論集》(明治書院,1976年,331頁)也引用①②③④,並指出“在此特別要注目的是,在大戴禮,特別是孝經中,孝不再像論語所見的孝、弟、忠、信那樣,和其他的各種德處於並列關係,而是將孝高高擡起,成為其他諸德的統一原理,讓其他諸德從屬於它,使原來的並列關係變成從屬關係,孝被置於和論語中孔子的‘仁’同樣的地位。”這是與津田氏類似的見解。
- [11]例如,《呂氏春秋·高義篇》、《韓詩外傳》卷二、《史記·循吏列傳》所見的石碣故事,並參照板野長八《儒教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95年,9-11頁。
- [12]較之把直躬故事看作“孝”和“忠”的問題,更應看作是“孝”和“法”的問題。而《孟子》離婁上、萬章上、盡心上篇的內容,如概而言之,是較之“天下”更要重視“父”,因此這裏直接對於“孝”而言,“忠”還不成為問題。
- [13]關於這點,請參照沼尻正隆《呂氏春秋の孝說について》(《研究紀要》17,1975年3月,126頁)及內山俊彦《荀子》(講談社,1999年,287頁)。但內山氏指出因為郭店楚簡的出土,對於儒家“忠”“孝”並列始於荀子的傳統說法,有修正之或者保留意見之必要(同書,337頁)。
- [14]朱榮貴:《郭店楚簡的孝道思想》,《經學研究論叢》6,1999年6月,167-168頁。
- [15]鄧上引論文(4),46頁。

- 【16】丁上引論文(5), 79 頁。
- 【17】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 17 輯, 三聯書店, 1999 年 8 月, 499 頁。
- 【18】陳偉:《郭店楚簡別釋》(《江漢考古》1998-4, 1998 年 11 月, 69 頁)及《文本復原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9-2, 1999 年 3 月, 8 頁)。
- 【19】“秋”字, 文物出版社本“五行釋文注釋”【注釋】[(四二)]的裘按將其作“稽”的異體字, “繼”的假借字。此外請參照池田知久:《郭店楚墓竹簡〈五行〉譯注》(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的思想史的研究》第一卷, 1999 年 11 月)第十七章注釋【51】(39~40 頁)及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0 年)《竹帛〈五行〉篇校注》【經 14】的【注】④。
- 【20】關於“紿”和“殺”, 還請參照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汲古書院, 1993 年)注(13)(305 頁)及注(30)(315 頁)。
- 【21】如果有差別愛(所謂親親主義)之強烈意識, 就與下文“德(禪)之灌(流), 世亡心(亡)直(德)”相矛盾、衝突了。
- 【22】池田上引書(20)(305 頁)注(13)。
- 【23】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的研究——〈孔子傳〉的形成〉と儒墨集團の思想と行動》, 創文社, 1973 年第 1 刷, 1984 年第 3 刷, 478 頁。
- 【24】池田知久:《〈墨子〉の兼愛説と尚賢説》, 《中哲文學會報》6, 1981 年 6 月, 57 頁。
- 【25】增淵龍夫:《新版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 岩波書店, 1996 年, 161 頁。
- 【26】參照渡邊上引書(23)(605 頁), 板野長八:《中國古代における人間觀の展開》, 岩波書店, 1972 年, 45 頁, 增淵上引書(25)(164 頁), 池田上引論文(24)(57~58 頁)。
- 【27】參照增淵上引書(25)(156 頁)。
- 【28】渡邊卓氏認為兼愛下篇是公元前四世紀末至秦帝國成立(前 221 年)前後為止形成的著作。渡邊上引書(23), 517 頁。
- 【29】以上結論, 對池田上引書(20)(305 頁)注(13)及注(15)的見解多有繼承。

上博簡《詩論》與《詩序》詩說異同比較

——兼論《詩序》與《詩論》的淵源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馬銀琴

甲骨卜辭與敦煌藏經洞的驚世發現，使甲骨學、敦煌學成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學科。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結合出土文獻進行學術研究已經成為文史學界普遍認同的方法和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近年來，考古新發現中一些中國早期的文獻文本資料陸續被公佈出來，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郭店楚簡、包山楚簡、阜陽漢簡、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等。每一批新資料的公佈，都會給學術界帶來一場不小的震動。它們的出土，為深入瞭解和認識中國古代歷史，解決文學史、史學史、思想史、制度史上一些懸疑千古的學術難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學基礎，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因此也成為學術界高度關注的一個焦點。2001年歲末上海博物館整理公佈了一批戰國楚簡資料，其中被稱為《孔子詩論》的部分，由於其內容的特殊性，格外引人注目，在其刊佈之初即有學者斷言中國文學史將因此而重寫，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從《詩經》形成史的角度看，這批資料及其初步整理成果，與《詩經》的早期形態相關聯的問題就有以下幾個：

一、整理者把這篇作品分成《詩序》、《訟》、《大夏》、《少夏》、《邦風》、《綜論》等六個部分，亦即在作品序列的編排上採用了《頌》、《大雅》、《小雅》、《風》的順序。其中《詩序》一類，輯錄概論詩而不涉及具體作品的簡文；其中《訟》、《大夏》、《少夏》、《邦風》四類，分別輯錄論及具體篇章的簡文；而被歸入《綜論》類的，則包括所論對象分屬於《邦風》、《大雅》、《少夏》的那部分簡文。根據《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1]第二簡“訟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犀，其歌紳而逖，其思深而遠，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2]，整理者認為，這裏“可能存在着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3]《上博書》對簡文的編排順序，表明整理者對這種說法的肯定。這就是說，如何排列 29 枝簡書的順序，如何理解簡文的意義，將影響到對《詩》的早期形態的認識。

二、從內容上看,《詩論》是和今本《毛詩序》性質相近的一份文獻。整理者認為,在這份文獻中“從未出現過象《小序》那樣將詩的內容極端政治化”的情況,因而判斷“小序並非是孔子所論的真傳”,而是“漢儒的臆測”^[4]。這一觀點能不能成立呢?這就有待於對以下兩個問題——楚簡《詩論》的內容是否與《詩序》相矛盾?其時代關係如何?——作深入研究了。而這樣一來,《詩序》的性質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價值,都需要重新認定。

由此引出第三個問題:“獻詩諷諫”、“采詩觀風”的古說是否可以否定?還是應當據信為實?因為《詩論》與《詩序》相矛盾的文句,集中見於對《國風》諸詩的評論,而這種差異很可能是同采詩之制相關聯的。

對於上述第一個問題,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爭論,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即整理者所謂“可能存在着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的看法,基於不正確的簡文排列順序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簡文意義錯誤理解,這種說法不能成立。根據學者們重新排列的簡文順序可以肯定,《詩論》論詩的順序正是按照《國風》、《小雅》、《大雅》、《頌》的順序排列的,也就是說,《詩論》時代的《詩》,在類的編排上與今本《詩經》無別。

後兩個問題,則共同關涉到了詩經學史上一個爭訟已久的公案:先秦時代的《詩》是否有序?同時也引出另一個新問題:《詩序》與《詩論》有無關聯?其時代關係究竟如何?在這些問題上,筆者的看法與諸多學者有些不同。為此撰寫本文,略作申論,以求教於方家。

從《詩論》的內容看,同它最接近的文獻是《詩序》。《詩論》中的評述之語,很大一部分和《詩序》相類似。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比較《詩論》評語與《詩序》之間的同異,進一步討論二者之間的關係。

據統計,出現於《詩論》中的詩歌共有六十首,除未能找到對應詩篇的《角幡》之外,《伐木》、《裳裳者華》僅存篇名,《小明》、《青蠅》的評語亦僅存一字,語意不全。因此,可資與《毛詩序》進行比較的,僅有五十五首。為醒眉目,茲按今本《詩經》的順序,將簡文評述之語與《毛詩序》的相應內容列表如下,簡文中的數目字表示竹簡編號:

| | | |
|----|--|---|
| 關雎 | 關雎之怡;關雎以色俞於豐(10);關雎之怡,則其思臆矣(11)。好,反內于豐,不亦能怡乎?(12)以琴瑟之效,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14) |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
| 葛覃 | 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見歌也,則 |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澣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
| 卷耳 | 卷而不知人(29) |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
| 樛木 | 樛木之時,則以其条(11);樛木福斯才君子(12) |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
| 兔置 | 兔置其甬人,則吾取(23) |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

| | | |
|------|--|--|
| 芣苢 | 拊而士(29) |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
| 漢廣 | 漢廣之智,則智不可得也(11) |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
| 鵲巢 | 鵲巢之歸,則離者(11);鵲巢出以百兩,不亦又離摩?(13) |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 |
| 甘棠 | 甘棠之保(10);及其人,敬愛其樹,其保厚矣。甘棠之愛,以邵公(15);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甚貴其人,必敬其立,敬其人,必好其所為,亞其人者亦然(24) |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
| 蠡斯 | 中氏君子 ^[5] (27) |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
| 柏舟 | 北白舟悶(26) |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
| 綠衣 | 綠衣之思(10)綠衣之憂,思古人也。(15) |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僇,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
| 燕燕 | 燕燕之情,害曰童而皆賢于其初者也。(10)燕燕之情,以其蜀也。(16) |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
| 北風 | 北風不絕人之怨(27) |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
| 牆有茨 | 牆有茨慎密而不知言(28) |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
| 木瓜 | 木瓜之保,以俞其捐者也。(18)木瓜又賦願而未得達也(19) |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
| 君子陽陽 | 賜賜少人(25) |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
| 兔爰 | 又兔不逢時(25) |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
| 揚之水 | 揚之水其愛婦怨(17) |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
| 采芣 | 采芣之愛婦(17) | 采芣,懼讒也。 |
| 將仲子 | 將中之言不可不畏也(17) |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
| 褰裳 | 涉秦其絕(29) |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
| 東方未明 | 東方未明又利詞(17) |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
| 猗嗟 | 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亂,吾喜之(22) |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
| 蟋蟀 | 蟋蟀智難(27) |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

| | | |
|-------------------|--|--|
| 有扶之杜 | 折杜則情喜其至也。(18)吾以折杜得雀□(20) | 有扶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
| 宛丘 | 宛丘曰:匄又情,而亡望,吾善之(22) |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
| 隰有萋楚 | 隰又萋楚得而悔之也(26) |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
| 鴈鳩 | 鴈鳩曰:其義一氏,心女結也,吾信之(22) | 鴈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
| 鹿鳴 | 鹿鳴以樂詞而會,以道交見善而效,冬乎不厭人。(23) |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
| 天保 | 天保其得彛蔑疆矣。巽寡,德古也。(9) |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
| 湛露 | 湛露之盥也,其猷醕與。(21) |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
| 菁菁者莪 | 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9) |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
| 河水 ^[6] | 河水知。(29) | 沔水,規宣王也。 |
| 祈父 | 祈父之責亦又以也。(9) | 祈父,刺宣王也。 |
| 黃鳥 | 黃鳥則困而谷反其古也,多耻者其病之乎?(9) | 黃鳥,刺宣王也。 |
| 十月之交 | 十月善諱言。(8) |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
| 雨無政節南山 | 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8) |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
| 小旻 | 少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8) |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
| 小宛 | 少宛其言不惡,少又佞焉。(8) |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
| 小弁巧言 | 少弁、考言,則讒人之害也。(8) | 小弁,刺幽王也。天子之傳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
| 何人斯 | 可斯謂之矣。離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也(27) |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
| 谷風 | 谷風負(26) |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
| 蓼莪 | 蓼莪又孝志(26) |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
| 無將大車 | 將大車之轡也,則以爲不可女可也(21) |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
| 大田 | 大田之卒章,知言而又豐(25) |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
| 文王 | 文王曰:文王才上於邵於天,吾美之。(22) |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
| 大明 | 又命自天,命此文王,城命之也,信矣。孔 = 曰:此命也夫。文王佳谷也,得乎?此命也(7)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皇矣 爾明德言,城冒之也(7) |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
| 生民 | 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24) |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
| 清廟 | 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豐,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業。(5)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6) |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

| | | |
|-------|-----------------------------|----------------|
| 烈文 | 烈文曰：乍競佳人，不顯佳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敬之(6) |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
| 昊天有成命 | 昊天又城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6) |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

分析上表所列《詩論》與《詩序》對這五十五首詩歌的評述，可以把其間的異同關係概括為以下三種情況：

在第一種情況下，《詩論》與《詩序》的評述相互支持、相互補充與發明，表現了基本一致的評判取向。屬於這一類的作品最多，共有三十七首，它們是：《周南》的《關雎》、《葛覃》、《兔置》，《召南》的《鵲巢》、《甘棠》、《蠡斯》，《邶風》的《柏舟》、《綠衣》、《燕燕》、《北風》，《鄘風》的《墻有茨》，《衛風》的《木瓜》，《王風》的《兔爰》、《君子陽陽》，《齊風》的《東方未明》，《小雅》的《鹿鳴》、《天保》、《菁菁者莪》、《湛露》、《河水》、《祈父》、《黃鳥》、《十月之交》、《雨無正》、《節南山》、《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谷風》、《蓼莪》、《無將大車》，《大雅》的《大明》、《皇矣》、《生民》，《周頌》的《清廟》。

第二種情況是《詩論》的評述與《詩序》不發生在同一個層次上，其間不存在可比性。《詩論》採用了流行於春秋時代的“斷章取義”之法——僅針對詩篇中某幾句話發表評說，或在引詩之後用簡單判語表明主體態度，如“吾美之”、“吾信之”、“吾喜之”、“吾善之”之類。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述以及感情性判斷是不應該被當成篇章之義而與《詩序》進行比較的。屬於這一類因而可以排除不予討論的作品有《猗嗟》、《宛丘》、《鳴鳩》、《大田》、《文王》、《烈文》、《昊天有成命》等。

第三種情況是，《詩論》的評說與《詩序》不合，二者表現了完全不同的評判取向。《詩論》立足於歌辭本身進行評說，而《詩序》則按“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的方式，把詩歌與倫理政治聯繫起來。屬於這一類的作品共有十一首：《周南》的《卷耳》、《樛木》、《采芣苢》、《漢廣》，《王風》的《揚之水》、《采葛》，《鄭風》的《將仲子》、《褰裳》，《唐風》的《蟋蟀》、《有杕之杜》，《檜風》的《隰有萇楚》。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詩論》與《詩序》相互支持、相互補充與發明的情況佔有壓倒多數的明顯優勢，這說明它們應是同一系統的詩說。^[7]那麼，對於後一種情況中不相吻合的現象又應作如何理解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一首詩歌全部出自《國風》。這一現象是令人感到奇怪的。為什麼《詩論》與《詩序》不相吻合的情況會如此集中的出現於《國風》當中呢？要討論這一問題，就要討論《國風》作品的采集目的以及先秦時代人們詩歌觀念的演變。

在秦漢時代的史籍中，出現過許多關於“采詩觀風”、“獻詩諷諫”的記載。“獻詩”之制由於《國語》、《左傳》的記錄而得到了學者們的肯定，但是出現於《禮記》、《漢書》等史籍中的“采詩觀風”之說，卻由於缺少先秦信史的記載而一直是爭論和懷疑的對象。直到今天，在《上博書》公佈的這批資料中，終於可以找到支持“采詩觀風”之說的證據了。《詩論》第三簡云：

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

這條簡文明確說到了《邦風》“納物”、“溥觀人俗”以及“大斂材”的特點。這也就是《漢書·藝文志》所云“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之義。除此之外，在第十六、二十、二十四簡又曾三次出現過“民性固然”這句話。由此可以確認，誠如傳世文籍所記載，除了獻詩諷諫的制度之外，“采詩觀風”亦是聖王之制的重要內容。

一旦確認了“采詩觀風”這一先秦古制，我們便可以進一步討論作為中國政教文學理論核心內容的美刺之說了。所謂美刺理論，實質上是關於獻詩、采詩的理論；或者說，是對獻詩、采詩指導思想的理論化與系統化，是獻詩、采詩制度的直接衍生物。其核心本質，則通過“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的序詩方式表現出來。換言之，詩之美與刺，是序詩者依據詩歌創作或采集時代執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對詩歌作品性質及意義作出的帶有濃厚主觀色彩的規定與評說。假若一代之主並非有德之君，產生於這一時代的作品，無論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會因這“一人”之無德而被納入“刺”詩的行列。通過研究《詩經》作品的創作與編輯時代可以知道，幾乎所有的“刺”詩，其被編輯的時代都晚於被創作的時代。這意味着，所謂采詩觀風，一方面表現為采詩之樂官通過歌詩向君王呈現與作品相聯繫的民俗土風，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樂官通過這些詩篇向當朝君王呈現前朝的社會風貌，提供歷史鑒戒，以達到“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與儀式配樂一樣，出於諷諫目的采詩觀風也是周代樂教的重要內容，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的序詩方式，則是造成用詩之義與歌辭本義疏離的重要原因。《國風》中大量抒寫男女歡愛的情歌被《詩序》當成“刺時”之作，皆緣此。儘管《毛詩序》云“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但是，這種序詩方式並非《國風》的專利，它也同樣也出現於《小雅》當中。《小雅》中與時政無關的“刺幽王”之詩，亦因此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說，《詩序》是周代樂教的直接成果。

周代社會的教育制度，除了以瞽矇為對象、服務於禮儀的樂教之外，還有以國子為對象、培養政治人才的樂語之教。周代樂教的重要內容是“風、賦、比、興、雅、頌”，而樂語之教的中心則是“興、道、諷、誦、言、語”。前者實際上是瞽矇傳詩時弦歌諷誦的六種方法，而後者最重視的，則是立足於歌辭的“詩言”與“詩義”之教。^[8]萌芽于西周中期的引詩、賦詩，正是實施樂語之教的成果與表現。樂語之教使樂歌的文辭受到了很大的重視。春秋中期以後，隨着引詩、賦詩之風的逐漸盛行，當人們賦引的對象由《雅》、《頌》而延及《國風》之時，依據采詩觀風的思想對詩義的解讀所造成的與詩辭本義之間的矛盾逐漸凸現出來。適應當時社會“賦詩言志”的現實需要，調整《詩序》與作品歌辭本義的矛盾，立足於歌辭對之重新闡釋，遂成為實施樂語之教的當務之急。換句話說，一旦“賦詩言志”成為諸侯聘問的重要外交手段，那麼，立足於文辭本身的引申與闡發必然成為各國詩教的重要內容。這應是《詩論》賴以產生的文化土壤，也是《詩論》對《卷耳》、《漢廣》、《采芣》諸詩的評述與《詩序》發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在《從漢四家詩說之異同看〈詩序〉的時代》^[9]一文中，筆者曾對《毛詩》和齊、魯、韓三家說詩特點作過分析，認為：“在《毛詩》一系傳承舊說並作進一步申述的同時，儒家後學亦有

人開始從詩本身出發去理解詩義，由此出現了突破傳統說法的詩學流派，發展到漢代，形成了齊、魯、韓三家之說。史籍記載今文三家或出自戰國末年的荀子，這種說法在時代上是可信的。”在分析了《詩論》中相關的內容之後，我們知道，漢代今文三家從詩歌內容出發理解詩義的作法，實際上應該萌芽於孔子時代之前，而在孔子以《詩》立教的授詩實踐中，也已經有了立足於歌辭闡發詩義的先例。這就是說，原先被認為出自荀子的今文詩說，實質上仍然是孔子傳詩系統的支流。而這些支流的存在，則進一步證明《詩序》（準確說是《毛詩》首序）的產生時代，必然在孔子之前。^[10]

作為周代樂教的成果，《詩序》的產生與詩文本的形成過程相始終，它的解詩習慣的轉變——由早期重視儀式功能轉變為後期專注美刺，實質上反映了周代禮樂文化由重視禮儀之教向重視德義之教的轉變。到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官學失守，樂人散在民間，原來由大師執掌的樂教與由大司樂執掌的樂語之教，開始在孔子恢復周道的實踐中走向融合。當他按照“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造士路線授徒講學時，融合樂教與樂語之教為一體的《詩論》也就產生了。因此可以說，《詩論》是在《詩序》的詩說傳統面臨挑戰之時，與當前需要相結合的產物。作為《詩序》向漢四家詩說傳承發展的中介環節，它表現出了一種承上啓下的意義：上承《詩序》建立的詩說傳統，下啓儒家後學據詩立說之先河。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各派所傳，自成一系，至漢代出現的四家詩，便是孔子所建立的詩教系統中最有影響的幾條支流。

注 釋

[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以下簡稱《上博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2]本文所引《孔子詩論》的篇名及釋文，以《上博書》為基礎，亦部分地採用了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68 期）、廖春春《上博〈詩論〉簡的形製與編連》（《齊魯學刊》2002 年第 2 期）、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等文章的研究成果，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3]《上博書》，122 頁。

[4]《上博書》，140 頁，146～147 頁，166 頁。

[5]此句之“中氏”，《上博書》整理者以未找到對應詩篇處理，此後學者大多採用了“中氏”即《蠡斯》的觀點。但在理解“《蠡斯》君子”的文意問題上，歧義頗多。筆者認為，此處之“君”字，不應解作“君子”之“君”。《周書·盤庚》云：“從之成羣曰君。”《韓詩外傳》卷五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白虎通·號》亦云：“君之為言羣也。”《廣雅·釋言》云：“君，羣也。”“君”、“羣”迭韵而意義相關。故簡文所謂“中氏君子”，應讀作“《蠡斯》羣子”，意為“《蠡斯》多子（成羣之子）”。如此，則上下文意明白曉暢且與詩義契合無間。

[6]上博簡《孔子詩論》整理者云：“從簡文看‘河’字與‘沔’字筆畫有清楚的區別，至少簡文之‘河’字不可能誤認為‘沔’字，因此，《河水》應是逸詩的篇名。”學者多贊同此說。李學勤先生在《〈詩論〉與〈詩〉》一文云：“古文字‘河’、‘沔’（見石鼓文）二字也確相近似，不過若說《左》、《國》和《詩論》簡文都出於同樣訛誤，未免過巧。再有《詩論》的《河水》，是否一定即《左》、《國》的《河水》，也沒有確證。目前，我們還是暫以簡文《河水》作為佚詩為好。”（文載《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 24 輯）儘管上述說法很有道理，簡文中的“河”與“沔”筆畫亦有清楚的區別，但“河”、“沔”形既相近，容易相混而誤，便不能因“過巧”而排除簡文的刻寫者將“沔”字寫成“河”字的可能。而且，既然《沔水》“朝宗于海”符合重耳賦詩之義，而簡文“河水智”之評說亦與《沔水》之義相合，則當以韋昭之說為是，確認《河水》即《沔水》。

[7]李學勤：《談〈詩論〉“詩亡隱志”章》（《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江林昌《上博竹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序〉的關係》（《文學遺產》2002年第2期）等，皆主張《詩論》與《詩序》屬同一詩學系統。在這一點上，筆者的看法與他們一致。

[8]參見王小盾師：《詩六義原始》，載《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9]載《文史》第51輯。

[10]參見拙文《〈毛詩〉首序產生的時代》，載《文學遺產》2002年第2期。


談談上海博物館楚簡的“舍”字

◎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獻研究中心

◎ 史杰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緇衣》篇 16 號簡里有這麼一句話：

則民言不吝行，行不吝言。

其中的吝字，原簡文寫作，從今從石，整理者隸定爲“吝”，這是沒有問題的。^[1]傳世的《禮記·緇衣》篇這句作：“則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矣。”和這個字對應的字是“危”字。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篇里這句話則作：“則民言不隱行，行不隱言。”注釋七八云：“隱，今本作‘危’，鄭注：‘危猶高也。’”裘錫圭先生認爲隱字當從“禾”聲，讀爲“危”，“禾”、“危”古音相近。^[2]這個看法無疑是對的。不過，現在上海博物館的簡文面世，李零先生通過對勘，認爲“吝”也是“危”的訛寫，^[3]還有學者撰文認爲這個字上部“人”字下面的兩短畫是裝飾性符號，的確就是“危”字。^[4]應該說，這些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雖然戰國文字中加裝飾性符號的情況很多，可畢竟我們沒有在楚國文字中發現從“人”的字下面有加兩短畫爲裝飾性符號的現象。因此，這個字除了的確有可能釋爲“危”之外，我們還懷疑，它上面不是從“人”，仍然是從“今”，應當就是《說文》中“𡗗”字的異構字。^[5]

《說文·部》中有個“𡗗”字，說解云：“仰也，從人在厂上。一曰屋相也。秦謂之桷，齊謂之𡗗。”這個字在《廣韻》二十四鹽的詹(職廉切)小韻下云“本魚毀切”，可見它有兩個讀音，“職廉切”的發音是韻書中常見的，而“魚毀切”的這個音，也就是和“危”相近的發音，來源不清楚，段玉裁在當時估計已經糊塗了，他把“𡗗”字列入他自己劃分的十六部，可見是承認這個字念“魚毀切”的，但在《說文》正文的“詹”字下又說應該“從𡗗聲”，列入八部。我們認爲，通過《說文》的說解，這個“𡗗”字應該讀“職廉切”，因爲許慎把它訓爲“仰”也，而“瞻仰”一詞在現在也是常語，《詩經》里還有《瞻卬》一篇，可見《說文》把“𡗗”訓爲“仰”，就是把它的讀音當成“瞻”字來理解的。至於《說文》中云“一曰屋相也。秦謂之桷，齊謂之𡗗”，意思是當時有人已經把它用爲屋檐的“檐”。

我們知道，“𡗗”是個會意字，分析起來，是從人從厂的，《說文》對“厂”的說解是“山石之

崖岩，人可居”，楚簡中在“𠂔”的下部改寫成“石”字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我們認為，楚簡中的“舍”字就相當於《說文》中的“𠂔”字。至於字的上部，也許書寫者爲了讓人明白它的讀音，故意把上部的“人”形改造爲“今”字作爲聲符。上古音“今”在見母侵部，“瞻”在章母談部，侵、談兩部都是閉口音收尾，相通例子很多。比如《史記·衛康叔世家》：“悼公黔。”《呂氏春秋·慎小》“黔”作“黠”。“黔”爲侵部，而“黠”爲談部。《易·坎·九二》：“坎有險。”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周易》“險”作“訖”。“險”爲談部，而“訖”爲侵部。都是例子。聲母看似相隔，但章組字在上古實和喉音字有密切聯繫，^[6]可以通假。例如“枝”字在上古爲章母支部字，而同從“支”得聲的“皮”卻屬見母。《史記·晉世家》的“示眯明”，《公羊傳》作“祁彌明”。“示”是船母，章組字；“祁”是群母，見組字。就是例證。因此，這個“𠂔”字應該就是“瞻”字的初文，形體象人站在崖上眺望，爲了表明讀音，把人字改造成今字作爲聲符。

下面我們談談對“𠂔”在簡文中字理解的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楚國文字中有“危”字，見於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之一，寫成“𠂔”形^[7]。上海博物館《緇衣》第9簡的“詹”字，寫成“𠂔”形，正和“危”的上部相似。我們前面提到，《廣韻》“𠂔”有“職廉切”與“魚毀切”兩讀。“舍”從“今”聲，當是讀“職廉切”的“𠂔（詹）”字異體（即把“𠂔”所從的“人”聲符化）。但是簡文是把它當作讀爲“魚毀切”的“𠂔（危）”字來用的，“今”旁在這裏不起表音作用。上博簡（二）《民之父母》“辯”字作“𠂔”，從古文“鞭”聲，但古文“鞭”所從的“午”不起表音作用，簡文“舍”的情況與之類似。^[8]

另一種可能是：簡文“𠂔”就是讀爲“瞻”。當然，當作瞻字，在簡文中意思講不通。再加上傳世文獻和郭店簡中相應的字寫成“危”或和“危”音近的字，似乎都不支持我們的說法。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古書中和“𠂔”音近的字，也就是上古音侵、談部的字，有很多訓爲“高”，甚至能和從“危”聲或和“危”音近的字互訓。就拿《說文·木部》的“楣”字來說，說解爲：“秦名屋榜聯也。齊謂之檐。”其中“楣”和“危”聲近（一在脂部，一在歌部，在古書中有間接相通的例子），而對應的東西在齊國叫“檐”。又如《爾雅·釋宮》：“坳謂之坳。”坳是談部字，正好和檐聲近。又如《說文》：“𠂔，壁危也。”《漢書·文帝紀》：“或𠂔於死亡。”孟康注：“𠂔，音屋檐之檐。”又如《詩·小雅·菀柳》：“居以凶矜。”毛傳：“矜，危也。”（矜，一般被歸爲真部，認爲所從“今”旁爲“令”字的訛誤。但它在《釋名》中用侵部字聲訓，在《漢書》中和侵部押韻。我們因此仍認爲它本從“今”得聲，更早的時候應當在侵部^[9]。或者另有一個從“今”聲的“矜”字，和從“令”聲的來源不同），《廣雅·釋詁一》：“𠂔，危也。”𠂔在談部，都是同樣的例子。根據這些兩個聲符的字互訓的情況，我們認爲“危”字原本是以“𠂔”字爲義符而分化出來的字，甚至有可能在更早的時候是音近義通的同源字，但由於現在還找不到更早的聲音上的依據，我們對這兩個字本身的討論祇能到這裏爲止，頂多祇能說《說文》中“𠂔”字因爲和“危”字意義相近，而被“錯誤”地注上了“魚毀切”這個發音。當然，還有第三種可能，就是因爲“𠂔”字本來就有兩個讀音，用來表示讀音不同，但意義有關聯的兩個概念。這樣的例子在古文字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比如“𠂔”字，既可以表示“郭”，也可以表示“墉”；“果”既可以表示“範”，又可以表示“圍”；“鳳”曾經有“鳳”和“凰”兩種讀音^[10]，都是一樣的道

理。

如果“𠂔”的讀音相當於“瞻”，那麼我們還要接着討論這個字在簡文中的意思，有些學者曾談過這個字，如楊澤生先生反對把郭店楚簡中相應的“危”字訓為“高”，認為在簡文中讀不通，而認為“危”這個字處在動詞的位置上，應該讀為“過”或“禍”，意思為損害。^[11]我們覺得他認為是動詞的看法是正確的，祇是古注為什麼把“危”訓為“高”，還可以更深入地討論一下。顏世鉉先生則贊成鄭玄的注釋，將這個字讀為“岑”，並引《說文》、《方言》中訓“岑”為高為證。^[12]我們前面說過，象“岑”那樣古音在侵、談部的字很多和“危”互訓，從這點來說，顏說是對的。但我們應該看到在語法上，這個“舍”確實應該做動詞用，不應該如顏認為的那樣當形容詞，所以毋寧選一個能做動詞用的能和“舍”通假的字為好。

我們把“舍”讀為“險”，上古音“險”為曉母談部字，從“今”聲的字多在見母侵部，見、曉兩母皆為喉音，談、侵兩部旁轉，可以通假。《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齧”，注：“欽，或作顛。”是其證。古代“險”也有“危”、“高”的意思。《玉篇·阜部》：“險，高也。”又“險，危也。”《孔子家語·弟子行》：“若商者，其可謂不險矣。”王肅注：“險，危也。”可見“危”和“險”兩個字在古代是有很密切聯繫的，我們今天常用的雙音並列合成詞“危險”看來是有很早來源的，是由兩個意義和讀音相近的單音詞構成的，似乎類似於王力提到的駢詞。^[13]我們肯定楊澤生先生的說法，在“則民言不舍行，行不舍言”這句話裏，“舍”所處的位置應該是個動詞，當然，在古書中，“險”多作為形容詞和名詞用。但是，“險”字作為動詞用的例子也不是沒有的，如《國語·晉語一》：“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韋昭注：“險，危也。”這句話正好是用“險”和“危”對文，更加證明了我們的判斷有可能是對的。再如《莊子·繕性》：“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14]句中以“險”和“離”對文，都直接帶賓語，應該是動詞無疑。所以，上博簡此條簡文“則民言不行，行不言”就是說民衆的言不險害其行動，行動不險害其言，和傳統的解釋基本上是不相背的。現在的很多大型字典如《漢語大字典》也沒有收“險”的動詞用法，恐怕是不够完全的。

順便說一下，顏世鉉先生提到王念孫將《緇衣》的“危”讀為“詭”，訓為“違”、“反”的觀點，認為是講不通的。其實追查“危”、“險”的詞源就可以明白，王念孫訓“危”讀為“詭”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危”、“險”兩個字在古代還有傾斜的意思。如《廣雅·釋詁二》：“險，植也。”《新書·道術》：“反平為險。”又《廣韻·支韻》：“危，不正也。”《文子·上德》：“尺雖齊必有危。”都是從“高”這個意義引申來的，因為高就未免有傾側的危險，這和古人“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哲學思想是相契的，一旦傾側，便走向了“高”的反面，也就是訓為“違反”的“詭”了，所以說，訓“違反”的“詭”在這層意義上可以看作是用了“危”的引申義。其實，古書中有些詞，到底解釋為本義還是引申義有時是難以判斷的，如上面我們舉的《莊子·繕性》：“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郭注：“行者違性而行之。”成玄英疏：“險，危阻也。”一個訓為“違”，一個訓為“危阻”，撇開他們對全句的理解不談，就單個字來看，都有一定道理。但句中以“險”和“離”對文，可見“險”和“離”的意思是相近的，這裏的“險”當然解釋為險害危阻不是不可以，但是用危險引申出來的違背的意義來解釋，無疑更為確切。

此文寫完後曾得到李家浩先生修改，謹致謝忱！

2002年4月

注 釋

- 1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92頁注釋。
- 2 見《郭店楚墓竹簡》，《緇衣》注釋78，文物出版社，1998年。
- 3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見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2日。
- 4 徐在國、黃得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2002年2期。黃錫全《郭店上海楚簡對讀札記》，《古墓新知》31頁，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
- 5 異構字的概念參看《漢字學概要》94頁，王寧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6 參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85~94頁，商務印書館，1980。
- 7 王健民、梁柱、王勝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像》，《文物》1979年7期。
- 8 李家浩《戰國竹簡中的“才”》(待刊於《北京大學學報》)。
- 9 楚簡中多有侵部字和真、文部字相通的現象，參看袁錫圭《釋郭店楚簡〈緇衣〉“出言有1，黎民所訓”——兼說“1”爲“針”之初文》，《古墓新知》，1~8頁，國際炎黃出版社，2003年1月。
- 10 參看袁錫圭《說“白太師武”》，《古文字論集》357頁，中華書局，1992年。
- 11 楊澤生《關於郭店楚簡〈緇衣〉篇的兩處異文》，未刊。
- 12 顏世鉉《上博楚竹書散論(二)》，見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4月18日。
- 13 王力《漢語史稿》47~48頁，中華書局，1980。
- 14 此句郭象注曰：“行者，違性而行之。”按“行”在這裏作爲動詞，那麼上句的“善”也應該是動詞，郭慶藩云：“善字疑是爲字之誤，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大德也。”並引《淮南子》爲證。我們覺得他的懷疑有一定道理，不過“善”、“爲”字形不類，致誤的可能性不大。我們懷疑“善”當讀爲“踐”，則和下文的“行”意思相近。“善”和“踐”都是元部字，可以通假。《禮記·曲禮上》：“則必踐之。”鄭玄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九店《日書》“相宅”篇釋文校補

◎ 武漢大學歷史系

◎ 劉國勝

江陵九店 56 號楚墓側龕出土的《日書》簡中^[1]，有一篇抄文，內容主要是講相宅之術，不少語句與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相宅”篇接近^[2]。由於該墓竹簡保存情況不佳，殘斷簡較多，簡文字迹亦不太清晰，給竹簡編聯及文字考釋帶來不少困難。《九店楚簡》（以下簡稱《九店》）一書對這批楚簡作了全面的整理工作^[3]，在釋文、注釋、分篇、編聯等方面都發表了許多很好的見解，解決了不少問題。本文擬就九店《日書》“相宅”篇的內容提出一些考釋方面的補充意見，看法不一定對，供參考。文中諸條簡文的簡號依《九店》一書的簡號。除有說明外，條目中的釋文概照《九店》。校按中所引九店《日書》簡文均參《九店》一書，不另注明。

（1）凡置壇、樹邦、作邑之道：蓋西南之寓，君子尻之，幽煥不出。北方高，三方下，尻之，安壽，宜人民，土田驟得。蓋東[口]之寓，45 君子尻之，口大口口口。116

按：簡 45 號與 116 號，據“蓋東[口]之”下一字“遇（寓）”斷離的兩部分字形，當可綴合。兩簡相合後，基本完為整簡。

首四字，原報告圖版照片僅存左半，右半殘簡的照片漏掉^[4]。《九店》隸定作“凡得坦豉”，不誤。第四字，劉信芳先生讀為“樹”^[5]，可從。

“道”字，原文殘泐不清，《九店》釋“遇”，通“寓”。該字似從辵，從頁，應釋為“道”。古文“道”字，從首，又有作從頁，並見郭店楚簡^[6]。道，謂術也。簡文“置”、“樹”、“作”，皆作修建之義。“壇”，同壇，謂祭祀場地，在此也可能泛指臺基。《左傳》哀公元年“室不崇壇”，杜預注：“平地作室，不起壇也。”“邦”，疆界，此似作城郭講，九店《日書》簡四一云“入邦中”，即言入城中。“作邑”，見於《詩·大雅·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可能是闢地營邑的意思。《淮南子·時則訓》：“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簡文“置壇”、“樹邦”、“作邑”並為土功之事，言其“道”，謂其治之術也。《九店》將 45 號簡排於篇首，我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116 號簡上的“君子尻”三字，《九店》未釋。“君子”作合文書寫。“尻”字，原文殘泐不

清，據該字在文中所處位置及殘剩筆畫看，應作“厽”。

(2) 東、北高，二方下，黃帝口口口庶民，厽之，47 土少。蓋東南之寓，以為厽，必有男賊出室。55

按：簡 47 號與 55 號，據“厽之”之“之”斷離的兩部分字形，似可綴合。

“黃帝”下一字之下似有合文（或重文）號。簡文“黃帝口口口庶民”或可斷作一句，類似睡虎地《日書》甲種“行”篇簡一二八正“赤帝恒以開臨下民”的句式。

“以為厽”，《九店》釋作“日以厽”。

“男賊”、“室”，《九店》未釋。“男”，原文從田、力，田旁筆畫稍泐，該字與九店《日書》簡三七“男必美於人”之“男”形同。“賊”，原文從鼎，從刀，即“則”，此讀為“賊”。郭店《語叢二》簡二七有字作從則，從心，裘錫圭先生按疑當讀為“賊”^[7]。簡文“必有男賊出室”，猶言居家必出男賊。

(3) 凡口，不可以蓋口口之牆。48

按：“牆”，《九店》未釋。“牆”，原文從耳，從章，疑當讀為“牆”。郭店《語叢四》簡二“牆有耳”之“牆”字形與此近似。包山簡一七〇有姓名作“絳牆”，似即“朱牆”^[8]。

簡文“之牆”上二字，寫以合文，《九店》疑為“右嚮”，蓋是。睡虎地《日書》甲種“土忌”篇簡一三八背云：“毋起北南陳垣及增之。”整理小組注：“北南陳垣，順南北向的牆。”

(4) 宮尻南、北，不利人民；居西北利，不利豕。49

按：“豕”，《九店》未釋。睡虎地《日書》甲種“相宅”篇簡二〇背伍云：“園居西北匱，利豬，不利人。”

(5) 無藏貨。西流，君齊。50

按：“無”下一字，《九店》懷疑可能是“哉”的殘文。此字似從宀，從臧，從貝，疑讀為“藏”。睡虎地《日書》甲種“相宅”篇簡一七背叁云：“水竇北出，無藏貨。”

“西”下一字，《九店》未釋。此字似從水，從蟲省聲，疑當釋為“流”。該字字形與郭店《成之聞之》簡一一“非從末流者之貴”之“流”近似。“流”，或可讀為“游”。

(6) 厽之，富，婦人正 57

按：“富”，《九店》未釋。原文殘泐，似從富，從示，疑為“富”。

“人正”上一字，《九店》未釋。當釋“婦”。睡虎地《日書》甲種“相宅”篇簡二〇背貳云：“字多於東南，富，女子為正。”“女子為正”與簡文“婦人正”義同。

九店楚簡《日書》“相宅”篇儘管在內容上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相宅”篇互有出入，但我們不難看出，兩種抄文在內容上有一定關聯。睡虎地秦簡《日書》“相宅”篇是分欄抄寫在簡上的，讀時須依欄橫讀，再下轉次欄，屬同一事項的內容還往往集在一塊敘述。九店楚簡《日書》的“相宅”篇大概是順簡次遞抄的，同一屬項有時有間隔。應該說，秦簡《日書》“相宅”篇的文章結構更具合理性。不過，我們也注意到，九店楚簡《日書》“相宅”篇使用起隔句作用的標識符號的現象是十分頻繁的，不同屬項之間一般都作點逗。

注 釋

-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 [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文中所引睡虎地秦簡的有關資料，均參見此書。
-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5月第1版。
- [4]經檢查，漏照殘片仍完好保存於藏簡試管內，現已經捆縛處置。
- [5]劉信芳：《九店楚簡日書與秦簡日書比較研究》，《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問學社有限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529頁。
- [6]張守中等：《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26～27頁。
- [7]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206頁。文中所引郭店楚簡的有關資料，如未特別注明，均參見此書。
- [8]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從秦簡《公車司馬獵律》看秦律的歷史淵源

◎ 廣東教育學院政法系

◎ 曹旅寧

戰國時期，魏國李悝制定了《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並“改法爲律”，這似乎是說秦律直接承自魏律。早在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就指出，秦爲戎族。到了1949年，他又在《法家流變考》一文中指出：“余前論周、秦民族，固知秦之爲戎也。法家之學，莫先於商鞅。商鞅治秦，若由文而退野，是豈知商君之爲緣飾秦人夷狄之舊俗，而使之漸進於中夏之文明邪？凡商君之法多襲秦舊，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1]蒙先生的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秦文化的獨特性；二是秦律淵源於固有制度。事實是否如此呢？雲夢秦簡《秦律雜抄》中有《公車司馬獵律》。其文曰：

射虎車二乘爲曹。虎未越泛薜，從之，虎環（還），賞一甲。虎失（佚），不得，車賞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賞一甲。·豹鼷（遂），不得，賞一盾。·公車司馬獵律。

講的是田獵時使獵物逃脫的話應受懲罰的規定。這條律文，整理小組注釋“公車司馬”爲：“朝廷的一種衛隊。《漢書·百官表》屬衛尉，注：‘《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公車司馬當係秦王的親信和貼身侍衛，一般由郎官充任，享有政治、法律特權。陳直先生也指出：“漢代人民上書，皆由公車司馬代遞，見漢舊儀、漢官儀，及東方朔傳。”^[2]整理小組注釋解釋“虎未越泛薜”句說：“越，跑開。《小爾雅·廣言》：‘越，遠也。’泛，疑讀爲𪔐。《廣雅·釋詁一》：‘棄也。’薜，疑讀爲鮮，《淮南子·泰族訓》注：‘生肉。’此句的意思可能是說老虎還沒有棄掉作爲誘餌的生肉而跑開。”裘錫圭先生指出“注釋之說似稍迂曲”，認爲律文“泛薜”猶言“𪔐𪔐”、“邊鮮”，與“蹢躅”、“蹢躅”，以至“盤旋”、“盤桓”，皆爲音近義通之詞，律文“虎未越泛薜”，“疑是虎未遠越而蹢躅旋行之意”。^[3]1990年文物版精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已將裘先生的見解作爲一說列入注釋中。我們認爲裘先生的見解是正確的。秦漢時又多有以機具和陷阱捕殺猛虎的情形，如《淮南子·兵略訓》所謂“虎豹不動，不入陷阱”；《後漢書·循吏列傳·童恢傳》：“設檻捕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二引晉令遺文：“諸有虎，皆作檻阱籬柵，皆施箝，捕得大虎，

賞絹三匹，虎子半之”；以生肉為誘餌捕虎應是在此種場合，而非在射獵活動中。《公車司馬獵律》的狩獵場面還可與戰國獵器圖像以及古代亞述王以車獵獅的石雕圖像相印證。^[4]新出秦封泥中也有“左田之印”和“郎中左田”兩封泥，有學者考證有可能就是田獵之官。^[5]龍崗秦簡中有云：“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贏□□□”(180)，胡平生先生指出：“‘行田’即行獵，是進行田獵的意思。‘贏’下應是‘律’字。……所謂‘吏行田贏律’，應是官員進行田獵活動超過法律規定次數或規模，須論罪處罰，……但具體的有關官吏行田的法律如何？今已不可而知”。^[6]龍崗秦簡中又有云：“而輿較(?)疾驅入之，其未能逃，亟散離(?)之。唯(?)勿令獸□(能?)□”(252)，胡平生先生指出“此簡似乎是關於進行田獵活動的律文，大意是：田獵的車輿迅速將野獸追入包圍圈，野獸未能逃跑，應盡快將其分隔開來，必不能讓野獸能……殘缺的下文可能是‘傷人’一類的話”。胡平生先生又在《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概述》中指出：“在睡虎地簡《秦律雜抄》中有幾條《公車司馬獵律》的律文……前面引過的一一九號簡(即舊號 252 號簡)，似乎內容與此比較接近。一一九號簡究竟是不是《公車司馬獵律》之律文，有待發現新材料來證明。”^[7]我們認為《公車司馬獵律》這條律文來自實際狩獵生活的觀察是沒有錯的，這條律文提供了一把剖析秦律早期起源的鑰匙。

一

要瞭解《公車司馬獵律》的歷史淵源，首先要對秦國早期歷史文化略作回顧。秦人，據古史傳說，係黃帝之孫顓頊裔女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子大業，以後代代相傳，舜時賜姓嬴氏。商末，嬴姓一支首領中潏遷於西戎，保西陲。但有學者指出：秦人與商人、周人一樣，都共奉黃帝為始祖，托言自己是華夏族的正統後裔，其可信程度值得懷疑，很可能是以後附會的。^[8]秦自中潏以後，母系為驪山之戎，父系為戎胥軒。由此說秦是戎族是有根據的。^[9]周人軍隊中原有秦夷一種，與其他夷人同列。金文中有兩器銘文提到這個周人以外的族類，一件是師酉簋，另一件是詢簋，時代相當於周厲王、周宣王二代。^[10]秦人在周人軍隊中以部落為戰鬥單位，以後代史實推論，當與漢代的胡兵、越騎，唐代的番兵，明代的土兵、狼兵，清代的蒙騎、漢軍及回子牛錄的性質相近^[11]；與羅馬帝國晚期的日耳曼傭傭軍也有相近之處。秦人興起於商末周初，其居地在周人之西，今甘肅東部一帶是無疑的。據《史記·秦本紀》：秦始封非子原居犬丘(今甘肅天水西鄉)，因替周孝王養馬有功，得為附庸，邑於秦(今甘肅清水)。非子傳秦侯、公伯、秦仲、莊公。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莊公之後的襄公、文公都葬在西陲。

1918 年，出土於甘肅天水西南鄉的秦公簋，王國維就認為“其為西垂陵廟器”^[12]。近年來新的考古發現為探索秦國發祥地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13]1993 年，甘肅禮縣一帶的古墓葬遭到嚴重盜掘，海外出現了一些出自禮縣的有“秦公作鑄”銘文的青銅禮器。1994 年在巴黎又展出了一批出自甘肅禮縣的金飾片。1994 年 3~11 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禮縣永坪鄉趙坪村的大堡子山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探明中字型大墓 2 座，瓦刀型車馬坑

2座,基本上搞清了該墓地的排列以及中小型墓葬的分佈情況,並對其中的2座中字型大墓、1座瓦刀型車馬坑、9座中小型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由於大堡子山秦公諸器的時代為兩周之際,故M2的墓主祇能在莊公、襄公和文公之間加以辨析、確認。其中襄公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知,甘肅東部的清水、天水、禮縣這個地區是秦人的發祥地。^[14]有學者指出,從西周至春秋時代的晚期渭水上游富於森林和草原。^[15]由於林木易得,當地盛行“板屋”。《詩·秦風·小戎》:“在其板屋。”正義:“秦之西垂民亦板屋。”秦人祖先也是以游牧、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的。伯益以後秦人祖先的事跡,都與牧畜、狩獵有關。秦人又以牧馬著稱,而古代馬對於游牧民族有着特殊的意義^[16]。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大型車馬坑內共有殉車12乘,每車兩服兩驂,即4匹馬,坑內共有48匹馬。禮縣秦墓又出土了一批用作裹棺飾物的金虎、鸕臯、動物圖案的金飾片,這可能同北方民族使用金器的傳統有關^[17]。

岑仲勉先生指出:秦人與周代世系相平行而略有先後,不必便是相為承繼的關係。這樣一來秦律便可溯源至秦人建國以前的部落習慣法時代。^[18]此外,秦人所處社會較周人為滯後也是事實。《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有學者認為,秦國人殉制度較晚出現,當是東方影響所致。^[19]但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M2共有殉人19個,分為生殉和殺殉兩種,前者作痛苦掙扎狀,後者有的頭上有洞,姿勢規則。多為青少年。M3現存殉人8名。9座中小型墓也安放有殉人,這反映出人殉是秦人固有習俗,說明秦人固有制度與周人不同,這與兩周時期其他諸侯國君基本不用人殉形成強烈對比。但這是否與史載秦人來自東方及與殷人的密切關係有關?回答是否定的。《史記·匈奴列傳》:“其送死,近幸臣妾從死者數十百人。”這說明人殉亦是北方民族的固有習俗。睡虎地秦簡出土以後,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係來看,秦國固有的社會制度也較東方六國落後^[20]。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墓普遍使用人殉則更加有力地論證了上說。由此推論,秦律中多秦國舊法也是有根據的。

二

《公車司馬獵律》的雛形最早應是在田獵生產活動中形成的勞動紀律。秦簡有《田律》,注釋指出:“田律,律名,漢代有田律。其內容是關於田獵的規定。這裏簡文的田律,主要是關於農田生產的律文。”此說不確。應該說秦漢田律的內容相差不大,既包括田獵活動,也包括農業生產活動的管理。由此推測,秦《田律》應包括漁獵與農業生產兩部分,秦《田律》的條文中就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夜,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麋(卵)鰕,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魚鱉。置陷罔(網),到七月而縱之。唯不幸死伐棺(棺)享(槨)者,是不用時。邑之紆(近)皂及它禁苑者,麋時勿敢將犬以之田。”秦本是游牧民族,從事漁獵自是本分;農業本來起源於採集業,最早的區分並不明顯。胡平生先生在《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概述》中指出:“龍崗秦簡裏的‘田’,有些關乎田獵,如一一七號簡‘田

不從令者論之如律’、一一八號簡‘一盾，非田時也，及田不口口坐口’，有可能是與《田律》有關的律令內容。”這些律令關乎狩獵紀律。這一點也可從民族學的材料加以印證。如鄂倫春人在家庭公社階段，由於祇有弓箭和扎槍，還不能以各自的力量去獵凶猛的野獸，從而集體狩獵在當時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形式。在集體圍獵中，家族長分配每個成員擔任不同的任務，出獵時說了大話的，擅自行動的，不適當地唱歌、跳舞和打鬧的，統統要受到家族長的指責。與鄂倫春處於同一社會階段的鄂溫克人習慣法則規定，行獵長有權監督同獵人遵守打獵紀律，同獵者對行獵長的指揮必須絕對服從。^[21]

或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狩獵紀律又怎麼會同公車司馬這樣一支近衛軍聯繫在一起呢？原來游牧民族幼習騎射，平日專務放牧及狩獵，其生活已具軍事化的特徵，其武事起源必與射獵有關。^[22]例如歷史上的周人曾與戎狄一樣過着漁獵或游牧的生活。《詩·小雅·車攻》描寫了周王圍獵的情景。其中有“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旆，搏獸於敖”，意思是說負責狩獵的官員及精選的獵士以旌旗為指揮，在敖山打獵。《詩·小雅·吉日》：“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意思是說周王要打獵，先叫士兵把漆沮兩岸的麋鹿驅逐到獵場去。有學者指出：“古者田獵軍戰本為一事。觀軍戰斷耳以計功，田獵亦斷耳以計功，而未獲之前，田物謂之丑，敵眾亦謂之丑，即獲之後，田物謂之禽，敵眾亦謂之禽。是古人視田時所逐之獸，與戰時所攻之敵無異，禽與敵等視，則田而獲禽，猶之戰而執訊矣”；“田獵須駕車馬，合徒兵，執兵戈，進與禽獸搏鬥，故田獵尚不止含有娛樂意義、經濟意義，且有治兵的重要意義隱於其間”；“為什麼軍事訓練和演習可以借用田獵來舉行呢？戰爭最初出現於原始公社制瓦解時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獵工具，戰爭方式與集體圍獵相同。”^[23]

三

秦人早期以放牧和狩獵經濟為主。《公車司馬獵律》與《石鼓文》所反映的秦人漁獵情景有密切的關聯。石鼓為十個形似大鼓的刻石，每個石鼓上均刻有文字，稱為《石鼓文》。其內容有許多是描寫漁獵場面的。《石鼓文》“汧汭”第一：“饌鯉處之，君子漁之。”“田車”第七：“秀弓寺射，麋豚孔庶。”^[24]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弁言”中曾說：“石鼓呈饅頭狀，這是古代石刻中僅見的一例。秦始皇帝的各種有名的刻石都是沒有遵守秦人的這個傳統的。我的推測是這樣：這應該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種反映。它所象徵的是天幕，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廬，今所謂的蒙古包子。秦襄公時的生產概況離游牧階段不遠，故在刻石上採取了這種形象。這和祀神之地稱‘時’相比照，還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證。時字當是從埶字轉變而來，鷄栖埶為埶，獸畜栖止之處亦可為埶。石鼓《車工》石有“即邀即時”句，實即“即衛即埶”，時乃埶之省文。游牧民集祀神之處自當為獸畜栖止之處，故神祠亦因而稱“時”。石鼓是襄公作西時時的紀念碑，祠稱時而碑象天幕，即使不是生活上的直接反映，至少所體現的觀念離實際生活必不甚遠。”^[25]關於石鼓的年代，歷來說法不一。郭沫若為什麼將石鼓文斷定在秦襄公時代？因為他從石鼓文中找到了內證。原來襄公舊都在汧水之源，據石鼓文的

描述，汧水可涉馬，並可履石而渡，知其水必淺。乃是汧水之源頭處^[26]。《詩·秦風·駟鐵》也有“駟鐵孔阜，六轡在手”，獵畢後，車子上“載獫狁驕”即帶着獵物及獵犬歸去。此詩大概也為襄公時所作。秦簡《法律答問》有一系列秦王宮內執役人員職掌的解釋，年代相當久遠，有些條目明顯早於秦孝公和商鞅的時代，可為“載獫狁驕”的注腳。其中有：“可（何）謂‘宮狡士’、‘外狡士’，皆主王犬者毆（也）。”整理小組注釋云：“狡，一種產於匈奴地區的大犬，《逸周書·王會》：‘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說文》：‘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秦王設有專人為他喂養、管理獵犬，顯然是為了狩獵之用。狡的體型高大，可從戰國時代中山王國王陵出土的帶有金銀首飾的被稱為“北犬”的獵犬遺骸看出個大概。^[27]由此看來，《公車司馬獵律》可上溯到秦襄公時代或更早以前。

《史記·秦本紀》：“三年，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渭汧之會。”這段話的意思是秦文公率兵東行狩獵達一年之久，一直到達汧水與渭水的相會處。我們認為這對研究《公車司馬獵律》極具意義。它反映了秦人的行獵制度，可惜史載過於簡略。我們接下來運用民族學的資料略加說明。11～13世紀的蒙古人，還不能依靠單一的游牧經濟過活，必須獵取各種野獸和部分地從事漁撈，來補充食物的不足……圍獵差不多總是遠征、戰爭和襲擊的伴隨物。軍隊藉此獲得食物和演習……他們有時舉行各部落和各氏族參加大規模的圍獵，例如，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的王罕共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28]史書又載：“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繁衆，待報後，即使周圍一月程地內屯駐之部落每十人中簽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而所指之地。此種隊伍分為左翼、右翼、中軍。各有將統之，其妻室盡從。”^[29]清朝在沒有入關以前，每年要舉行三四次大規模的狩獵，這種狩獵同樣具有軍事訓練和演習的性質。清太祖、太宗屢以出征出戰並舉，勸勉部下。每年行獵季節，多在冬季農閑，春秋亦有，五月已少，六月則絕無。每次行獵的時間，最常見的是十天左右，少則三四天，多則二十至三十天。他們行獵的紀律與行軍的紀律一樣，具體來說有“不准斷圍，不准踐踏田禾，不准伐山林木”。“太宗時將部衆每三百人立一牛錄厄真管屬，就是後來的佐領，為八旗制度的基本單位。牛錄，華言大箭。厄真，華言是主。滿洲舊俗，凡出師行獵，不論人數多寡，全依照族寨而行，各依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名曰牛錄厄真，後來官制即取於此。這是出獵制度演為軍事制度的例子。”^[30]秦人早期的軍事行政制度的起源自然與此相近。

四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中有反映秦人行大蒐禮的零星材料，將其與《公車司馬獵律》有機地結合起來，可為我們展示秦律早期起源的真實情景。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

分甲以為二甲蒐者，耐。

整理小組注釋：“甲，《戰國策·秦策》：‘秦下甲以攻趙。’注：‘兵也。’蒐，以檢閱軍隊為目

的的一種田獵活動。”大蒐具有軍事檢閱、軍事演習和軍事部署的性質，《左傳》中有不少關於田蒐的材料。《周禮·夏官·大司馬》記載這種活動也最為詳細，清儒孫詒讓《周禮正義》旁徵博引，講疏完備；近人李亞農著有《大蒐解》，也作了詳細解說。^[31]我們具體來看《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冬”：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菜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錡，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擺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軍，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教無辜，伐有罪。……

從上述材料來看，大蒐禮具體分爲閱兵和演習兩部分，前者包括：(1)建築教場，樹立標木。(2)建築集合，排練陣勢。(3)陣前誓師。(4)教練進退和作戰。後者包括：(1)建築圍獵場所。(2)建置軍舍和軍門。(3)依次出軍門，分列左右，排列成行。(4)獵場周圍置驅逆之車以驅獸。(5)陣前立“表”祭祀，並誓師。始終具體發佈禁令，具有法律的性質。(6)進軍狩獵。(7)凱旋。(8)獻禽。(9)慶賞和處罰。吳榮曾在《周代的農村公社制度》中指出：“在原始公社時期的那種人民大會，到進入階級社會後，性質完全變了，它變成國君對全國軍隊的大檢閱。周代的大蒐也即往昔人民大會轉化而來的，這和歐洲法蘭克王的‘三月閱兵’的性質是相像的，我們知道‘三月閱兵’，其前身即爲法蘭克人的人民大會”；“周人的大蒐是檢閱，也是操練，並且還和大畋獵結合起來，大畋獵的目的之一是驅害獸。”^[32]楊寬先生更從制度層面對西周、春秋時代的田獵活動進行探討。指出“大蒐禮”原爲借用田獵來進行的軍事檢閱和軍事演習；大蒐禮具有“國人”(公民)大會的性質，是當時推行政策、加強統治、準備戰爭的重要手段。^[33]原來，軍事民主制時期，是原始社會末期、國家形成之前的一個社會階段。荷馬時代的希臘、王政時代的希臘以及古日爾曼人等都屬於這個階段。“議事會”是當時的常設的權力機關，最初由氏族的長老組成，後由氏族顯貴中選出的代表組成，能對一切公共事務和重大問題作出決定。“人民大會”是當時最高和最後的權力機關，由全體部落男性成員即全體戰士組成，因爲這時部落中的每個成年男子都已是戰士。“人民大會”一般由“議事會”召開，有權用舉手或喊聲通過或反對“議事會”所作的決定。有權表決選舉軍事首長和高級公職人員，有權表決“議事會”制定的法律並授予執法權，還有權對刑事訴訟進行最後的審判；更有權決定一切大事，包括本部落有關生產和生活以及保衛本部落的安全等

問題，如對其他部落進行談判、宣佈戰爭、任命使者和出征將帥等，這種武裝的“人民大會”，就是當時作為“人民生活底正常的職能”的“進行戰爭的組織”，其組織是按照軍隊的編制的，會議往往在廣場上舉行，在議決重大問題時，還具有軍事檢閱的性質。楊寬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古代羅馬把‘民衆大會’的決議稱為‘法律’，我國古代雖然沒有見到這種情況，但是最初的法律，也是在具有‘國人’大會性質的‘大蒐禮’上公佈的，而且就以舉行‘大蒐禮’的所在地命名，如稱為‘被廬之法’、‘夷之法’等，我國公佈的第一部成文法——晉國執政范宣子所為《刑書》，就是根據‘夷之蒐’所公佈的‘夷之法’。”晉國在“夷之蒐”上頒佈的法律，可以作為《刑書》，鑄在鼎上作為成文法公佈，可知在“大蒐禮”上制定和頒佈的法律，不限於戰爭時所用的軍法，也包括統治用的“常法”。

秦國行大蒐禮是可以肯定的。《公車司馬獵律》以及《秦律雜抄》中關於蒐的規定便是明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曰：“嫡子匿不以名，令於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極有可能便是“人民大會”選舉軍事首長的例證。

《公車司馬獵律》由最初的生產狩獵紀律再到軍事紀律以至成文法的軌跡，應該是十分清晰了。由此我們可以窺見秦律的古老源頭。

注 釋

- [1] 蒙文通：《法家流變考》，《古學甄微》，巴蜀書社，1987年，361頁。參見《秦之社會》，《古史甄微》，巴蜀書社，1999年。
- [2]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9頁。
- [3] 裘錫圭：《睡虎地竹簡注釋商榷》（二）“泛辭”條，《文史》第13輯。近來陳偉武則認為“簡文‘越’用常義，指跨越。秦簡‘越’與‘泛’近義連文，意即‘翻越’、‘跨越’。辭讀為柵，指苑囿的籬落、柵欄。‘虎未越泛辭’謂老虎未跨越柵欄”。反映的是在禁苑中行獵的情景。陳偉武：《睡虎地秦簡核詁》，《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 [4] 徐中舒：《戰國獵器圖像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1935年；鄭振鐸：《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72～73頁圖版，商務印書館，1930年。
- [5] 劉瑞：《“左田”新釋》，《周秦漢唐研究》（一），三秦出版社，1998年。
- [6] 胡平生：《雲夢龍崗秦簡考釋校證》，《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
- [7] 胡平生：《雲夢龍崗秦簡考釋校證》，《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胡平生：《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概述》，載《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8月，6頁。
- [8] 周偉洲：《周人、秦人、漢人和漢族》，《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9]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載《古史甄微》，巴蜀書社，1997年，72～74頁。
- [1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釋文，科學出版社，1957年，88～89頁。段紹家：《藍田出土汧叔等彝器研究》，《文物》，1960年第2期。
- [11] 許倬雲：《西周史》，三聯書店，1994年，263～264頁。
- [12]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秦公敦跋》。
- [13] 韓偉：《論甘肅禮縣出土的秦金箔飾片》，《文物》，1995年第6期。李朝遠：《上海博物館新獲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7期，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陳平：《淺談禮縣秦公墓地遺存及其相關問題》，王輝：《也談禮縣秦公墓地及其銅器》，《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戴春陽：《禮縣大堡子山墓地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5期。
- [14] 李學勤：《探索秦國發祥地》，《中國文物報》，1990年2月19日。
- [15] 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91年，237頁。

- [16][蘇]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俊譯:《蒙古社會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61~62頁。
- [17]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247頁。
- [18]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9頁。
- [19]黃展岳:《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210頁。
- [20]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漢社會》,《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增訂本序”,文物出版社,1991年。
- [21]秋浦等:《鄂倫春社會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25~28頁;《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中華書局,1980年,127頁。
- [22]如《元史·兵志》:“蒙古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王廷洽:《〈詩經〉與魚獵文化》,《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23]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丁“田獵”,《聞一多全集》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201頁;郭寶鈞:《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78年,161頁;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99頁。
- [24]、[25]、[26]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學出版社,1982年,63頁、44頁、14~15頁、38頁。李零先生指出石鼓所歌咏的田獵,性質應與河北平山出土的青銅壺銘文的描寫相似,也是爲了祭祀。參見《秦漢禮儀中的宗教》,《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年,181頁。考慮到中山源出白狄,是否此應與北方民族的習俗有關。
- [27]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期。
- [28]《蒙古社會制度史》,64~65頁。
- [29][瑞典]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中華書局,1962年,156頁。
- [30]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清史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4~35頁。
- [31]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十六,2322~2363頁,中華書局,1992年;李亞農:《大蒐解》,《學術月刊》,1957年第1期。
- [32]吳榮曾:《周代的農村公社制度》,《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7年。
- [33]楊寬:《大蒐禮新探》,《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後收入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93~715頁。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綜述

◎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

◎ 彭錦華

1993年6月18日至20日,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原湖北省沙市市博物館)為配合宜黃(宜昌至黃石)高速公路工程建設,主持發掘了周家臺三〇號秦墓^[1]。這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的頭向為北,隨葬陶器、銅器等各類器物44件,出土竹簡381枚,木牘1方。

一 簡牘形制特徵

竹簡出於棺槨間北端的西南角槨底板上,為竹筴編席包裹成一散堆,與膠結狀的淤泥一起緊貼在槨底板上。竹簡呈東西方向放置,簡首向東。我們在清理棺槨間北端底層的隨葬器物時,將它同竹筴一起取出,及時運回室內進行清理。

剝離竹簡外層上的淤泥,揭取竹筴裏外兩層編席殘片,見到竹簡簡首在受到上層隨葬器物重壓後已經散開,其表層部分的竹簡簡首殘損較為嚴重。

在清理前經過觀察,發現竹簡的形製有長短之分,長簡與短簡各自成卷相疊壓,長簡在上,短簡在下。在長簡之中,又發現最上層一卷竹簡簡尾末端皆有斜面,呈“削頭”,而下面一卷竹簡簡尾末端則為無斜面的“平頭”,這表明兩種竹簡在形製上的差異,有可能存在着內容篇節上的區別。為慎重起見,我們決定將這批竹簡劃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清理,依次編為甲、乙、丙三組,並分別編以出土登記號,同時繪制《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竹簡尾端側視圖》。

清理後,甲、乙、丙三組共出竹簡389枚(以一個號竹簡作1枚計)。這批竹簡經過拼接、編聯,共有竹簡381枚,統一編入編排順序號。在整理中,我們根據竹簡的內容進行了編組調整,即將甲組的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曆譜竹簡抽出,與乙組的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

合編為第一組，擬定篇題為《曆譜》，本組共有竹簡 130 枚（含空白竹簡 4 枚）。木牘因其內容為曆譜，故而編組時也將它放入第一組。同時將甲組剩出的關於“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磨日”占、“五行”占等內容的竹簡編為第二組，擬定篇題為《日書》，本組共有竹簡 178 枚（含空白簡 10 枚）。再將丙組竹簡編為第三組，其內容為醫藥病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農事等，擬定篇題為《病方及其它》，本組共有竹簡 73 枚。

竹簡在出土時呈褐色，係採用成竹劈剝為長條篋青，經刮削整治而成。第一、二兩組竹簡係長簡，簡長 29.2~29.6 釐米，寬 0.5~0.7 釐米，厚 0.08~0.09 釐米，其上、中、下三道編聯綫已腐朽，竹簡上仍留有編聯綫殘跡。在竹簡篋黃一面的右側，每一道編聯綫之下，有用刀削成的三角形小契口。兩組竹簡在形製上的微小差異是：第一組竹簡的尾端為無斜面的“平頭”，第二組竹簡的簡尾則為有斜面的“削頭”。從兩組竹簡中部的一道編聯綫所壓之處均為沒有文字的空檔位置來判斷，推測它是先將竹簡編聯成冊而後書寫文字的。第三組竹簡均為短簡，長 21.7~23 釐米，寬 0.4~1.0 釐米，厚 0.06~0.15 釐米。本組竹簡的規格很不一致，其寬窄、厚薄差異很大，有的竹簡製作十分粗糙，個別竹簡還帶有竹節。其上、下兩道編聯綫下無契口，因此編聯綫在竹簡中上下挪動的現象較為普遍。編聯綫所壓之處沒有明顯的空檔位置，有的編聯綫還壓在文字上，這也說明本組竹簡是在文字書寫完畢後而再編聯成冊的。

竹簡上的文字均為墨書隸體，但有的文字仍篆勢尤存。出土時，竹簡上的文字大都清晰可見，也有少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幾乎所有文字都書在篋黃一面，祇有一枚竹簡的篋青還書有標題。

第一、二兩組竹簡上的文字，書寫工整道麗，書體風格基本一致。第三組竹簡上的文字書寫則較為隨意，其文字大小、排列疏密很不規則，書體風格差異十分明顯。有的文字字跡不甚清楚。可以看出，這組竹簡上的文字並非一人一次寫就。

關於簡文的書寫格式，第一、二組竹簡一般是將文字寫在上下兩道編聯綫以內，上有天頭、下留地腳。但第一組中的秦始皇三十七年月名等則是頂頭書寫。第三組竹簡上的文字是一律頂頭書寫，簡尾也不留地腳。第一、二組中有部分竹簡，如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五時段”占等則為分欄橫排書寫。因限於位置空間，第一組竹簡中的日干支下的記事，有的是分雙行書寫或倒書在該日干支之上。有的簡文在一句的第一個字之上標有用墨作的圓點，以示一句的起始。在第一組竹簡秦始皇三十四年月名之上，都有用墨作的扁形方塊標記，該年後九月月名之上，則是有用墨作的長形方塊標記。句中有使用作句讀的鈎識。

這批竹簡除空白簡外，每枚簡上的字數多寡不一，最少的祇有一個字，最多的達 43 個字，總計字數為 5302 個。

木牘一方，出於棺槨間北端的西部淤泥中，與隨葬的漆耳杯、漆勺等隨葬器物混在一起。出土時，木牘首朝向東北、正面向上而略有傾斜。

木牘長 23 釐米，寬 4.4 釐米，厚 0.25 釐米。正、背兩面書有文字，均為墨書隸體，大部分文字比較清晰，部分文字漫漶不清。文字書體風格一致，文字大小差異並不懸殊。在書

寫格式上均採用頂頭分欄橫排書寫。在日干支記事句中仍有作句讀的鈎識。全牘文字計有 149 個。

二 簡牘文字的內容

第一組是由竹簡和木牘兩部分組成，簡牘的內容為曆譜。

竹簡部分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曆譜共由 64 枚竹簡所組成，它列有全年 13 個月(含後九月)的日干支。秦以十月為歲首，該年 13 個月分次排列，雙月排在前面，單月排在其後，閏月(後九月)排在最後。每枚簡自上而下分作六欄(後九月分作五欄)，每欄記一日干支，於是全年 384 天的日干支全部排出。如：

“二月 丙午 宿竟陵”。(一〇號簡三欄)

“壬子 治鐵官”。(一六號簡三欄)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三十七年(前 210)曆譜由 62 枚竹簡所組成，其中有秦始皇三十六年 12 個月朔日干支簡 11 枚，秦始皇三十七年 12 個月朔日干支簡 12 枚，以及屬於上述兩年的日干支簡 39 枚。如：

“癸丑 四月 大”。(七五號簡)

“六月 丁未 小 澤”。(八八號簡)

木牘上文字的內容為秦二世元年(前 209)曆譜。其正面從上至下分兩欄書有秦二世元年 12 個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背面從上至下分五欄：壹欄分行書有秦二世元年十二月戊戌嘉平、己卯日之記事；貳、叁、肆、伍欄則依次書寫該月的全月日干支。如正面壹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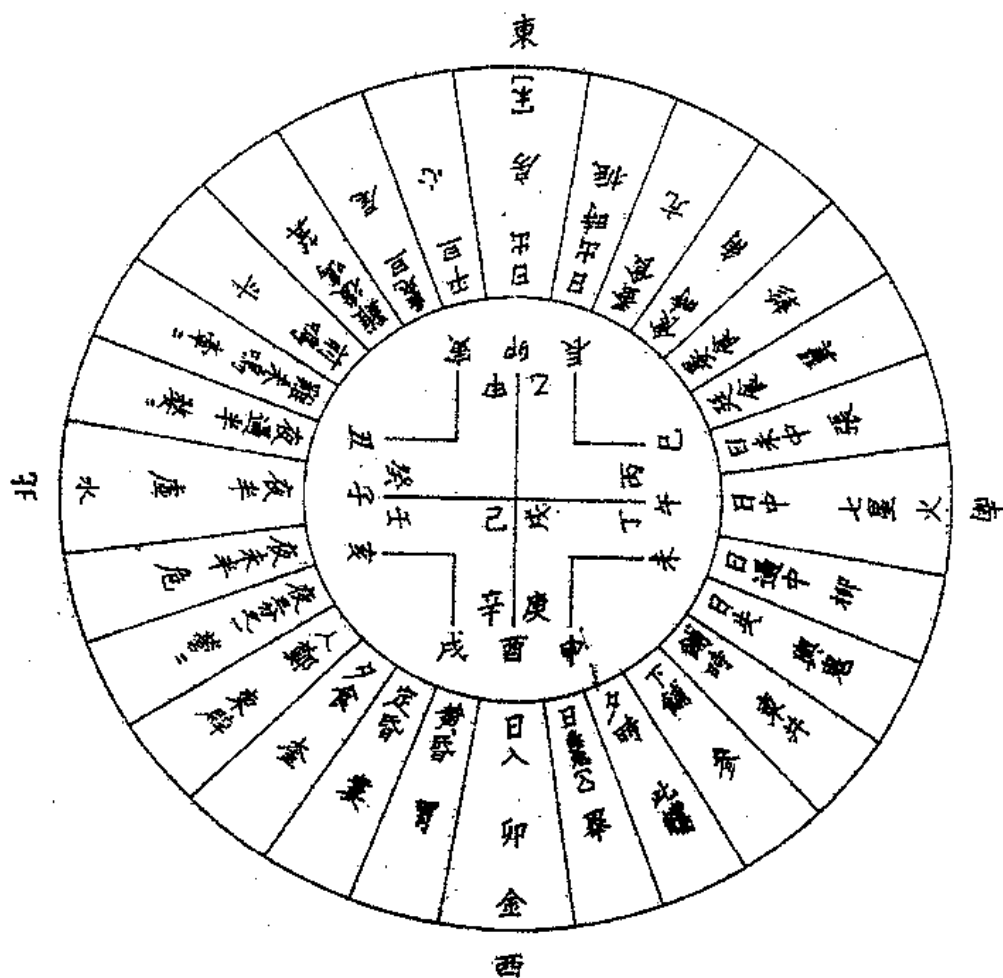
“十月 乙亥 大”。“十一月 甲辰 大。”……

背面壹欄：

“以十二月戊戌嘉平，月不盡四日”。

第二組竹簡內容有“二十八”占、“五時段”占、“戎磨日”占、“五行”占等，計有四幅綫圖，它們均係若干枚竹簡並列靠攏組合一平面，然後在其上以墨綫繪製圖形。

例如綫圖(一)由 26 枚竹簡拼合、以兩個大小不等的同心圓構成。



綫圖(一)

(簡一五六——一八一號)

在大圓外側的上、下、左、右四個方位,分別標以“東”、“西”、“南”、“北”表示四方。在大小兩圓之間的圓環部分,用 28 條直綫將其分割成 28 塊的扇面,每塊扇面由內向外書有文字。從內容上看,可以分爲內、中、外三圈。

內圈順時針方向依次記有二十八個時稱,若以“夜半”作爲一日之始,其次第爲:夜半、夜過半、雞未鳴、前鳴、雞後鳴、雞旦、平旦、日出、日出時、蚤食、食時、晏食、廷食、日未中、日中、日過中、日失(昃)、舖時、下舖、夕時、日寃入、日入、黃昏、定昏、夕食、人鄭(定)、夜三分之一、夜未半。

中圈逆時針方向依次列有二十八宿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

斗、牽牛、婺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七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轸。外圈在上、下、左、右四個方位標有木、金、水、火，與大圓外側所書的東、西、北、南相對應。圓環中的內、中、外三圈文字排列參差不齊，可以看出，其書寫次序是以扇面為單位，由內向外書就的。

在此圓的中央小圓內繪有“非”圖形，以北向十二地支中的“子”為起點，按照其順序，分佈於圓形四方的12個端點，其間內側記有除“戊”、“己”以外的八天干，“戊”、“己”二天干則記於中心部位。

古代星占所用之式由天、地兩盤構成。天盤在地盤之上可以旋轉，以斗柄指向。本圖列有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及東、北、西、南四個方位等，與漢式地盤的基本內容相同，如安徽阜陽汝陰侯墓出土的西漢初年式盤^[2]。同時與甘肅武威出土的東漢初年式盤也是基本相似的^[3]。

現將各類占卜簡文舉例如下：

“二十八宿”占：

“尾，斗乘尾，門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七號簡)“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鬥，勝，不合。”(一九八號簡)。

“五時段”占：

“丑(朝)有怒。(莫食)有美言。(日中)遇怒。(昧時)有告，聽。(日夕時)有惡言。”(二四八號簡)

“戎磨日”占：

“| ⊕ | ⊕ | ⊕ | ⊕ | ⊕”(一三一號簡三欄)“此所謂戎磨日也。從朔日始數之：畫當”(一二二號簡三欄)“一日。直一者，大微；直周者，小微；直周中三”(一三三號簡三欄)“畫者，窮”。(一三四號簡三欄)。

“| ⊕ | | ⊕ || ⊕ || ⊕ || ⊕ || ⊕ ||”(二六一號簡)“☐日：數從朔日始，曰：微周窮，窮周微，微周窮，窮周☐日直窮，得；直周，復環之；直微，不得。已”(二六二號簡)“入月，數朔日以到六日，倍之；七日以到十二日，左之；十三日已到十八日，向之；十九日以到二十四日，右之；二十五日”(二六三號簡)“以到三十日，復倍之。”(二六四號簡)

“五行”占：

“置居木，里社、冢主歲，歲為上。”(三〇二號簡一欄)

“壬子，其下有木。”(三〇二號簡三欄)

第三組竹簡內容為醫藥病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農事等。

醫藥藥方：

“取車前草實，以三指撮，入酒若粥中，飲之，下氣。”(三一二號簡)。

“以正月取桃蠹屎少半升，置醇酒中，溫，飲之，令人不憚病”(三一三號簡)

祝由術：

“已齏方；以菽七，脫去黑者。操兩瓦，之東西垣日出所燭，先埋一瓦垣址下，復環禹步三”(三二九號簡)“步，祝曰：‘呼！垣址，苟令某齏已，予若菽子而微之齏已。’即以所操瓦而盍□”。(三三〇號簡)

擇吉避凶占卜：

“有行而急，不得須良日，東行越木，南行越火，西行越金，北行越水，毋須良日可也。”(三六三號簡)

農事：

“肥牛，善食之，而飲以秣，一月已。”(三七三號簡)

三 簡牘研究的幾個課題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的出土，為我們研究、考察秦代社會的經濟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第一 簡牘中曆譜內容包括有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和秦二世元年共四個年份的月朔日干支、月大小及部分日干支，特別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中完整地排列有全年十三個月(含後九月)共 384 天的日干支。這是我國目前關於秦代曆譜資料考古的最新發現，為我們考察秦代和秦漢之際的我國曆法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西漢武帝太初元年我國施行太初曆以後，我國歷史上曆法開始有了系統完整地記載。但在先秦時期，還沒有一部系統的關於記載天文曆法的著作流傳下來。因此，秦代和秦漢之際我國施行的曆法問題就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4]。根據歷史文獻記載，秦始皇在統一全國後曾有“改正朔，易服色”的改曆活動。漢初“襲秦正朔”，說明秦末與漢初施行的是同一曆法。關於漢初過去有“殷曆”、“顓頊曆”等不同說法。近年來，有的學者根據新出土的文物資料，如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所載曆法的推算，提出了漢初施行的“四分曆”說^[5]。因此，周家臺三〇號秦墓曆譜簡牘的出土，對考察、訂正我國在秦末漢初所施行的曆法提供了新的依據。

第二 在《曆譜》及其它日干支記事的竹簡簡文中，有多處涉及到古代地名，有的是古代縣名，有的古代縣名仍沿用至今，但大多數古代地名卻是我們迄今未曾發現過的新地名。在這些日干支記事中先後涉及的古代地名有：“長道”、“贏邑”、“上帝”、“離涌”、“羅涌”、“區邑”、“尋平”、“井韓鄉”、“江陵”、“黃郵”、“竟陵”、“都鄉”、“□上”、“路陰”、“宛”等計 15 處之多。這些古代地名，對我們考察江漢地區的歷史沿革，豐富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範圍和內容，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第三 在《日書》竹簡中，分別以 26 根和 40 根竹簡並列拼成的兩塊平面上，繪有二組線圖，其中的一組圓形線圖反映了秦代式之地盤的基本形製和內容。該圖列有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及東、北、西、南四個方向等，與漢式地盤的基本內容相同，我們對照《淮南子·天文》等古代文獻中的有關記載也是相吻合的。可以肯定，它是目前最新發現的秦式地盤

圖樣。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星占風俗在當時秦代社會中十分流行的狀況。這種秦式地盤圖樣，不僅為我們瞭解秦代式盤占卜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而且對於我們探討古代社會星占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

第四 在“二十八宿”占中，每一宿占所列占項都大致相同，其占項主要有“獄訟”、“約結”、“病者”、“行者”、“來者”、“逐盜”、“追亡人”、“市旅”、“物”、“戰鬥”等。這些占項內容涉及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與人們日常生活關係甚為密切。這批資料的出土，對於我們考察秦代社會生活狀況及其占卜習俗，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五 在《日書》竹簡的圓形綫圖中，即大小兩圓之間的圓環內側，順時針方向依次記有二十八個時分時稱，如“夜半”、“夜過半”……這種將一天的時間完整地平分為二十八個時分時稱的“一日分時之制”，乃是迄今為止關於“二十八時分”時稱的最早記載。

第六 在《病方及其它》的竹簡內容中，記載了當時民間流傳的部分醫用藥方。如：

“取肥牛膽盛黑菽中，盛之而繫，懸陰所，乾。用之，取十餘菽置粥中而飲之，已腸辟。不已，”(三〇九號簡)“復益飲之。粥足以入之腸。”(三一〇號簡)

整理和研究這批藥方資料，對於我們發掘祖國醫學遺產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第七 竹簡和木牘上的文字，其總數在五千字以上，這些文字並非一人一次寫作。同時，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上也有不少烙印和刻劃的文字。秦漢時期正是我國漢字處於由秦隸向漢隸變革發展的時代，因此，這批文字資料的發現和出土，為我們研究我國漢字發展、演繹的歷程增添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總之，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的發現與出土是江漢地區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收穫，它對促進和推動秦代社會文化的科學研究必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注 釋

[1]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

[2]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年第5期。

[3]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

[4][5]張培瑜：《新出土秦漢簡牘中關於太初前曆法的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

馬王堆帛書札記四則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劉樂賢

一 燔材

馬王堆帛書《經法·四度》的結尾說：“黃金珠玉臧（藏）積，怨之本也。女樂玩好燔材，亂之基也。守怨之本，養亂之基，雖有聖人，不能為謀。”^[1]

文中的“燔材”，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注釋說：“燔材，讀為繁載。古代貴族，女樂玩好不離身旁，出必載之以行。《管子·七臣七主》：‘瑤臺玉鋪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鐘石絲竹之音不絕。’材亦讀為載，與此同。”^[2]

我們認為，“燔材”似宜讀為“繁滋”。“燔”讀“繁”，與帛書整理小組的意見相同。案，“燔”、“繁”古音皆元部並紐，應可通假^[3]。而“茲”與“才”通假，或從“茲”得聲的字與從“才”得聲的字通假，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多有其例^[4]。

“繁滋”一詞亦見于古書，是“多”或“很多”的意思。《意林》卷一引《尸子》：“樹蕙非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惟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後漢書·張敏傳》：“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三國志·吳主五子傳》：“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

在古書中，“繁滋”又可寫作“滋繁”。《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滋繁。”李善注：“滋繁，言多也。”^[5]《晉書·荀勗傳》：“比前行所省，皆須與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晉書·文苑傳》：“洎姬曆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并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帛書《經法·四度》的“燔(繁)材(滋)”，也是“多”或“很多”的意思。“女樂玩好燔(繁)材(滋)”，是說女樂玩好甚多。這樣釋讀，從帛書的上下文看，是十分合適的。

二 侍表

馬王堆帛書《稱》說：“有義(儀)而義(儀)則不過，侍(恃)表而望則不惑，案法而治則不亂。”^[6]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注釋說：“《鶡冠子·天權》：‘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淮南子·說林》：‘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儀和表是古代測高低遠近和定方位的工具。”^[7]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在注釋中提供的材料，對理解帛書的文義很有參考價值。不過，他們將“侍表”讀為“恃表”，似乎還不盡妥當。我們認為，“侍表”應據《淮南子·說林》讀為“植表”。從古音看，“侍”是之部禪紐，“植”是職部禪紐，二字讀音十分接近，可以通假。古書中有不少從“寺”得聲的字與“直”或從“直”得聲的字相通假的材料，如“持”通“殖”，“特”通“直”，“特”通“殖”，“特”通“植”等^[8]。在馬王堆帛書中，也有類似的通假現象。例如，《經法·亡論》：“三雍(壅)：內立(位)朕(勝)胃(謂)之塞，外立(位)朕(勝)胃(謂)之費^[9]，外內皆朕(勝)則君孤直。”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讀“孤直”為“孤特”，並解釋說：“直、特古音相近通用。孤特，孤單而無憑借。”^[10]據此，“侍表”確可讀為“植表”。

既然“侍表”即“植表”，則帛書的“侍表而望則不惑”就是《淮南子·說林》的“植表而望則不惑”。

三 不為得

馬王堆帛書《稱》說：“聖人不為始，不專(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11]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注釋說：“《淮南子·詮言》：‘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12]

案：帛書的“為”字應訓為“求”或“取”。古書的“為”字，也有類似用法。《孟子·盡心上》：“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荀子·王霸》：“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

可見，帛書的“不為得”與《淮南子·詮言》的“不求得”意思相同。

四 “相”與“柏”

《戰國策縱橫家書·蘇秦謂燕王章》說：

謂燕王曰：“今日願藉(藉)于王前。假(假)臣孝如增(曾)參，信如尾星(生)，廉如相(伯)夷，節(即)有惡臣者，可毋斬^[13](慚)乎？”王曰：“可矣。”“臣有三資者以事王，足乎？”王曰：“足矣。”“王足之，臣不事王矣。孝如增(曾)參，乃不離親，不足而益國。信如尾星(生)，乃不延(誕)，不足而益國。廉如相(伯)夷，乃不竊，不足以益國。臣以信不與仁俱徹，義不與王皆立。”王曰：“然則仁義不可爲與？”對曰：“胡爲不可。人無信則不徹，國無義則不王。仁義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自復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相(伯)蛇政，皆不復其掌(常)。若以復其掌(常)爲可王，治官之主，自復之術也，非進取之路也……”^[14]

此章內容亦見於《戰國策·燕策一》和《史記·蘇秦列傳》。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根據文義并參照《戰國策·燕策一》和《史記·蘇秦列傳》的記載，認爲帛書的三個“相”字都是“伯”的訛寫。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馬王堆帛書中“相”、“伯”二字的寫法不太相近，由“伯”直接訛抄成“相”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從馬王堆帛書的用字習慣看，“伯”常可用其通假字“柏”代替。例如，帛書《刑德》乙篇的神名“風伯”，全都寫作“風柏”^[15]。“柏”、“相”二字的寫法較爲接近^[16]，容易致混。我們懷疑，上引《戰國策縱橫家書》的三個“伯”字，原本寫作其通假字“柏”，因“柏”、“相”寫法接近，因而誤抄成了“相”。如果這一推測不誤，則帛書此章的三個“相”字都應釋爲“相(伯)”。

注 釋

[1]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2頁。

[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2頁。

[3] “番”、“蕃”與“繁”通假的例子，可參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217～218頁。

[4] 傳世文獻的例子，可參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418～421頁。出土文獻的例子，可參看李學勤《說“茲”與“才”》，《古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年，第170～171頁。

[5] 據《四部叢刊》本(六臣注)。胡克家刻本(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作“繁滋”，且無李善的此條注文。

[6]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1頁。

[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3頁。

[8]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403～407頁。

[9] 此字原作左“人”右“費”。

[1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5～56頁。

[11]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1頁。

[1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3頁。

[13] 此字原作上“斬”下“手”。

[14]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2頁。

[15] 傅舉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32～143頁。

[16] “柏”所從的“白”有時寫得與“日”完全一樣(參看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1頁)，“柏”和“相”祇是右邊差一橫，確實十分接近。

古文字學斷代研究的新收穫

——讀郝茂博士的《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

◎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 華學誠

衆所周知，隸書的產生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但是這個分水嶺在哪裏，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由於資料的限制，長期以來一直沒能說清楚。1975年睡虎地秦簡出土以後，秦國簡牘書跡無所發現的空白終於得到了填補，更重要的是，這些珍貴的秦簡文字正是漢字由篆到隸的過渡形態，它因此而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和中國文字史研究上具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郝茂博士的《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正是以已公佈的秦國簡牘文字為討論對象而撰成的一部斷代文字學專著。

讀郝茂博士的著作，首先感受到的是，著者站在文字發展史的高度對秦簡文字進行考察的宏大氣度。

近二十多年來，先後出土的秦簡資料有睡虎地秦簡（1975）、青川木牘（1979）、放馬灘秦簡（1984）、龍崗秦簡（1989）等，1990年出土的江陵楊家山竹簡和1993年出土的江陵王家臺秦簡，據報道也都是墨書秦隸。這些資料一經公佈，立即就有學者投入精力進行研究，文字的釋讀、字表的編制等基礎研究工作都已經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其特點和結構規律的文章也時有所見，特別是字形、字用問題已得到了相當深入的討論。然而，能把現有的全部秦簡文字置于中國文字發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系統考察並進行精細研究的，則首推郝茂博士的這部著作。

郝茂博士的研究首先從歷時着手，在完成對甲骨文、金文、石刻文以及早期楚簡等商周古文字的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再按照結構成分的歷時對應，將所有簡文材料劃分為傳承字和新出字兩大類（第14頁）。正如王寧先生所說：“這種劃分要以在秦簡文字以前是否出現過這一字形為標準，具有一定的‘冒險性’，但在理論上又是非常必要的。”（第385頁）令人欽

佩的是，郝茂博士的這項工作做得非常紮實，也非常出色。經著者研究，秦簡有 1830 個不二字（第 16 頁），同構字形初見於殷商文字的有 395 個（第 19 頁），初見於西周文字的有 248 個（第 22 頁），初見於春秋文字的有 117 個（第 24 頁），初見於戰國文字的有 33 個（第 26 頁），上述這些傳承字共 793 個（第 27 頁）；其餘一千餘字都是新出字（第 27 頁），其中新構字 195 個（第 33 頁），新增字 844 個（第 33 頁）。郝茂博士的這些研究成果，不僅逐一釐清了秦簡文字的傳承與發展，從而對文字發展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而且對漢語史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然，由於這種研究是以現在可以見到的古文字材料為基礎的，隨着今後新材料的不斷出土，郝茂博士在本書中所得出的若干具體結論可能還需要加以修正，但是由郝茂博士走出的這條在斷代文字研究中區分傳承字與新出字的道路，則是具有方法論意義的。

“由於《說文》是公認的最為系統的秦文字資料，書中小篆是秦文字正體的代表”（第 13 頁），郝茂博士的歷時研究還以《說文》為參照系，全面考察了秦簡傳承字與新出字在《說文》中的著錄情況：秦簡傳承字入《說文》者共 791 字，其字形合《說文》小篆者 772 字，合《說文》古文者 4 字，合《說文》籀文者 1 字，與篆、古籀文均不合者 14 字（第 36 頁）；新出字中的新構字在《說文》中共著錄 193 字，其字形合《說文》小篆者 177 字，合《說文》古文者 2 字，與小篆、古文不合者 14 字（第 38 頁）；新出字中的新增字在《說文》中共著錄 726 字，其字形與《說文》小篆相合者 699 字（第 39 頁）。《說文》共著錄秦簡文字 1710 個，另有 120 字沒有著錄，其中傳承字 1 個、新構字 2 個、新增字 117 個，這些字《說文》失收是與它們本身的使用頻率密切相關的（第 40 頁）。由於郝茂博士的歷時分析是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之上的，所得結論自然科學可信。

郝茂博士的著作給我的第二個突出印象就是，在對秦簡文字進行靜態分析和動態描寫的過程中，準確把握並成功地運用了“字素分析法”。

李圃先生認為，漢字不單純是個字形問題，而是漢語語素（義/音）的物化。李圃先生的漢字學理論體系包括三個系統，即漢字取象發生系統、漢字本體結構系統和漢字心理認知系統。與這一理論相適應的漢字分析方法，李圃先生稱之為“字素分析法”。郝茂博士兩度負笈上海，前後六易寒暑，深得李圃先生漢字學理論之三昧，最好的證明就是他的這部研究秦簡文字系統的著作，因為這部著作“成功地貫徹了漢字學三維系統的理論，準確地把握並運用了字素系統的分析方法”（李圃序）。

我們先來看看郝茂博士對秦簡字字素的靜態分析。所謂字素的靜態分析，就是指“對進入造字過程之前的字素系統的分析”（第 41 頁）。郝茂博士首先對所圈定範圍內的 1830 個秦簡字按照字素分析法理論進行了有效的離析和歸並，獲得 444 個字素，包括 422 個基本字素和 22 個準字素（第 46 頁）；在這一過程中，著者從秦簡字本身的特點出發，看到了其形體存在着“變體與同形”、“訛粘與訛分”的現象，並認識到這些現象不僅表現在書體方面，而且“同時影響到字素系統”（第 46 頁），“能夠反映字素的基本特性”（第 57 頁），因而提出了一系列科學有效的判定方法，比如對變體的判定，著者在窮盡單字的全部字形之後，首先根據

字素的構形理據和它們在簡文中的出現頻率確定其中一個為代表形體——通體，與之相對的其它形體則被認定為變體(第46頁)，又比如對訛粘字素的判定，著者不僅參照《說文》的釋形，而且歷時比勘了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字形(第57頁)。秦簡字經離析、歸並出若干字素之後，著者發現還“有一種與字素不同的構形成分，它不具備形與音、義相統一的特徵，更不能單獨構成新字，祇屬於依附於字素形體的綴符”，而“這種綴符卻有別音別義的功能，這就是字綴”(第63頁)，因此著者就此展開了進一步討論，使人們清晰地看到了字綴介入字素的兩種方式及其作用(第63~66頁)。同時，著者還敏銳地發現並有效地區分出兩類與字綴作用不同的綴符，這種綴符可以造成“字素變體”，它“和字綴在概念上不是一回事”(第66頁)。最後著者概括出秦簡文字字素的量化特徵，即能產性、不平衡性和穩定性。至此，一個猶如剝繭抽絲般的靜態分析過程方告結束。

接下來我們看看郝茂博士對秦簡字字素的動態描寫。所謂字素的動態描寫，是相對於字素的靜態分析而言的，它着重於對字素的功能、結構層次等進行描寫。元素在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和特性就是系統元素的功能；在文字系統中，這種能力和特性直接地表現為字素和語素音義之間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則在整字的組構過程中體現出來。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著者首先展開了對秦簡字字素功能的動態描寫。根據字素的動態功能，可以劃分為穩性字素和活性字素兩種。郝茂博士把穩性字素嚴格界定在下述範圍，即“處於直接顯示語素音或義的上位層面上的結構單位”，並對它們作了“窮盡性的功能測查”(第74頁)；秦簡中的425個穩性字素按其所擔負的表意、表音、意音兼表功能又被分成七類，少數功能不明的字素則沒有納入統計範圍。活性字素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靜態字素臨時組合而成的”，它與穩性字素的共同點在於，“都是顯示語素音義的功能的基本構形單位”，差異在於，活性字素“可逐層分析它的內部構素成分，並可將其內部關係有序地展示出來”，而穩性字素則沒有處於下位的構素層次(第81頁)；在對秦簡中的499個活性字素進行了“窮盡性的功能測查”之後，著者又進行了分類論說，鍼對活性字素的特點，著者還對活性字素的內部層次情況作了全面調查，並對活性字素的構素成分進行了深入分析。著者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最後又對穩性字素和活性字素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揭示出它們在功能方面的異同和參構數量方面的差異。

郝茂博士還把字素系統的分析方法成功地運用到對秦簡的整字分析之中。著者的整字分析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新出字的造字方法的描述，第二是秦簡文字的結構分析。著者以秦簡新出字為對象歸納秦簡造字法是很有見地的，因為傳承字產生於秦簡以前，由傳承字而概括出來的造字方法並不屬於秦簡。著者在對秦簡新出字進行窮盡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歸納出秦簡文字的五種造字法，即獨素造字、合素造字、更素造字、加素造字和省變造字(第101頁)。這種研究價值很大，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結論來自於對第一手材料的窮盡性分析，而且在於它回答了“秦簡新出字是通過什麼途徑和方式產生的”，並使人們由此觀察到“秦簡文字系統的形成與演進趨向”(第100頁)。著者對秦簡文字所進行的結構分析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即結構層次、表詞方式和結構類型。結構層次的分析，表明秦

簡文字構形呈現出系統性的基本特徵；表詞方式的分析，則直接揭示出“整字是運用怎樣的表示方法顯示語素的音與義的”（第 113 頁）；對結構類型的歸納，著者是以動態的字素理論為指導而進行的，也就是說這種歸納是“立足於揭示字形結構同所表示的語素音義之間的關係”的，因而“自始至終貫徹結構層次的理據性分析”（第 122 頁）。

郝茂博士的著作所呈現的第三個鮮明特點是，精確的數據，翔實的資料。

可以這樣說，著者所有的討論都是建立在可靠的數據和資料之上的，我們在前文中已引用了不少，謀求資料的窮盡和堅持分析的量化，是這部著作給人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印象之一；而書後所附錄的《秦簡字素總表》、《穩性字素功能表》、《活性字素功能表》和《秦簡字形分類參照表》，又絕不能視為是單純的資料，事實上它們已和前面的討論構成了一個相互支撐、相互印證的統一體，這一點開卷就能夠感受，無須贅言。

漢字已存在了幾千年，它為承載和傳播我國的傳統文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正確地認識漢字，科學地總結漢字產生、演變、發展的歷史，仍然是需要我們花大力氣、也值得我們去花這樣的力氣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工作。從事這種研究的一個卓有成效的方法就是“窮盡式斷代研究”，郝茂博士的《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正是運用這一方法而取得成功的範例！

2002 年 2 月 21 日於吳淞江邊之潛齋

楚帛書伏戲女媧考

◎ 安徽大學歷史系

◎ 劉信芳

關於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目前已有 110 餘種研究論著。本文討論的範圍限於甲篇第一章。以下我們先作出釋文，然後就文字釋讀及文意的理解逐次作說明。^[1]

曰故又(？有)態電(伏)戲，出自崑(顓)頊，處於衡□，厥□魚(漁)魚(魚)，□□□女。夢夢墨墨，亡章弼弼，霭每水□，風雨是於。乃取(娶)【甲 1】虞(夙)遶(沙)□子之子曰女媧，是生子四。□□是襄(襁)，而埴(殘)是各(格)。參化虞逃，爲蛇爲萬。以司堵襄(壞)，咎(晷)而步達。【甲 2】乃上下騰傳，山陵不斌(疏)，乃命山川四晦(海)，寔(熱)氣寒氣，以爲其斌(疏)，以涉山陵、龍汨出瀾(漫)。未又(有)日月，四神【甲 3】相弋(代)，乃步以爲歲，是佳(惟)四寺(時)。

一、關於伏戲

“曰”，開篇語詞。史牆盤銘：“曰故文王。”若校之典籍，則“曰故”之用法如同“烏呼”，曰、烏雙聲，故、乎疊韻。“電戲”由嚴一萍先生(1968)、金祥恒先生(1968)所釋出^[2]。電戲號“有熊氏”，饒宗頤先生(1985)引《易緯·乾鑿度》鄭注“蒼牙有熊氏得易源”爲證^[3]，其說是。“顓頊”的釋讀可參姜亮夫先生(1979)的有關考釋^[4]，拙文《楚帛書解詁》也曾討論過這一問題。

“處”字見於鄂君啓節，學者對該字已有正確的隸定，惟舊多讀爲“居”，則未妥。字與包山簡 32“居處名族”之“處”字同形。

“𡗗”字從𡗗，從𠂔，鄂君啓節有人名“𡗗”。或謂字從佳從𠂔，惟其下一字已殘，謹闕疑。饒宗頤先生(1985)釋“𡗗”，何琳儀先生(1989)將該字連同殘文釋爲“雷澤”^[5]均有待於進一

步證明。高明先生(1985)隸定爲“擢”^[6],與字形不合。

“漁魚”,嚴一萍先生(1968)讀爲“魚人”,饒宗頤先生(1985)讀爲“俛俛”,何琳儀先生(1986)讀爲“魚魚”或“吾吾”^[7]。按字讀爲“漁魚”,《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又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漁”謂捕魚。

“漁魚”前一字尚存殘畫,似可復原爲“畋”字。《呂氏春秋·直諫》:“以畋於雲夢。”高〈注〉:“畋,獵也。”望山楚簡2—5:“畋車一乘。”田車即田獵用車。《璽璽》0270 著錄一楚璽“畋璽”,即田獵官璽。

“夢夢墨墨”,《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暗暗,惟時何爲?”帛書“夢夢墨墨”實與《天問》“瞢瞢”義同。“夢”,睡虎地秦簡《日書》又作“瞢”,如883反、852反之“惡瞢”即“惡夢”。“瞢”之本義,洪興祖〈補注〉云:“目不明也。”“墨墨”,《管子·四稱》:“政令不善,墨墨若夜。”高明先生(1985)引《史記·商鞅傳》:“殷紂墨墨以亡。”《韓詩外傳》作“紂默默而亡”。《莊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注云:“窈冥昏昏皆了無也。”吾友吳鬱芳先生曾致函云:“墨墨猶默默,古通用。如《卜居》‘吁嗟默默’,後作嘿嘿,或作墨墨。卜偃曾有‘天下有五墨墨’之語,又作默默。夢夢乃指視之無形,墨墨乃指聽之無聲。”所言甚是。

“亡章弼弼”,“亡章”,饒宗頤先生(1985)釋“章”爲形,“蓋言宇宙初辟,尚未成形”。李零先生(1985):“亡章,殆指無法度。”^[8]何琳儀先生(1986):“‘亡章’,即‘無別’。”按亡章疊韻,字不單獨爲釋。亡、章皆陽部字,且夢夢、墨墨、弼弼皆連語,惟獨將“亡章”理解爲詞組,竊意以爲不妥。“亡章”猶“芒芒”,《詩·商頌·玄鳥》:“宅殷土芒芒。”《左傳》襄公四年:“芒芒禹迹。”芒芒,廣遠貌。“弼弼”,嚴一萍先生(1968)釋爲“宿”字,“讀爲肅,乃肅敬之義”。饒宗頤先生(1985)引《爾雅》“弼,重也”,《方言》“弼,高也”爲訓。李零先生(1985)謂“弼古通拂”。高明先生(1985)謂“弼”古文從弗作,字通“弗”,《詩·小雅·蓼莪》:“飄風弗弗。”按上引《天問》“馮翼”可作“弼弼”之注腳。《淮南子·天文》:“天地未形,馮馮翼翼。”高誘〈注〉:“馮翼,無形之貌。”《淮南子·精神》:“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窈窈冥冥”與“馮馮翼翼”同書互見,算得是劉安爲“馮馮翼翼”作的自注。馮、弼雙聲,是知“弼弼”同“馮馮”,皆爲描寫天地混沌之狀的連綿詞。

“𩇑每水𩇑”,第一字上從网,下殘泐,包山簡100“𩇑澤”,“𩇑”與此字殘畫相合,字應讀爲“彌”,張衡《西京賦》(《文選》卷二):“彌皋被岡。”薛綜〈注〉:“彌,猶覆也。”第二字饒宗頤先生(1985)、高明先生(1985)、何琳儀先生(1998)隸作“每”^[9]。拙稿舊以爲字上部似从艸,字从“女”聲,讀爲“洳”,《詩·魏風·汾沮洳》:“彼汾沮洳。”沮洳,水漸貌。按郭店簡《語叢一》34:“樂每禮靈。”“每”與此字形近,茲據以隸定。字讀爲“晦”,《爾雅·釋天》:“霧謂之晦。”《說文》:“霧,晦也。”大凡有關人類起源之傳說,多以爲遠古曾經有一個霧氣瀰漫的時代,《舊約·創世紀》:“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但有霧氣從地上騰,滋潤遍地。”可爲其比。可知“彌晦”即霧氣瀰漫。

“風雨是於”,商承祚先生(1964)釋“於”爲語助詞^[10]。陳邦懷先生(1965)讀“於”爲

“居”^[11]。李零先生(1985)釋爲“以”。饒宗頤先生(1968)讀“於”爲“呼”，云：“‘風雨是呼’一類句法，見於大荒北經：‘燭龍……風雨是謁。’”^[12]高明先生(1985)讀“於”爲“越”，《書·盤庚》：“越其罔有黍稷。”孔〈傳〉：“越，於也。”《左傳》昭公四年：“風不越而殺。”杜〈注〉：“越，散也。”則“風雨是於”謂“風雨激揚散發”。何琳儀先生(1986)讀“於”爲“謁”，《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郭璞〈注〉釋“謁”云：“言能請致風雨。”《書·舜典》“遏密八音”，《春秋繁露》引作“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虞閼父”，《史記·陳世家·索隱》作“遏”，何氏據以云：“風雨是於”謂伏羲“有呼風喚雨之神力”。按讀“於”爲“遏”是也，惟釋以“呼風喚雨”則未妥。《爾雅·釋詁》：“遏，止也。”“風雨是於”謂天地茫昧之時，無風無雨也。《創世紀》所記伊甸園是一個無雨的世界，與帛書所記類似。

以上“有熊”句，述伏羲之姓氏；“出自”句，述伏羲之世系；“處於”句，述伏羲之居住地；“漁魚”句，述伏羲賴以生存的生產方式；“夢夢”以下四句，述伏羲時代的人類生活環境。可知帛書開篇所述，以漁獵時代爲其時代背景。《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孔〈疏〉：“用此罟罔，或陸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罔魚鱉也。”與帛書所記基本一致。由帛書可知，楚人以“蜺戲”、“女媧”爲人類始祖。

二、關於女媧

帛書“乃取(娶)夙沙□子之子曰女媧”一句，述女媧之世系，內容十分重要。

“取”，嚴一萍先生(1985)讀爲“娶”。

“遷”字見於丙篇之九，又見於包山簡 250，李零先生(1988)隸定爲“遷”^[13]。“虞遷”，何琳儀先生(1986)讀爲“且徙”，謂“乃取且徙”即纔娶妻又遷徙。按如此釋讀，“娶”、“徙”與下文“女媧”，“生子四”等內容脫節，於行文脈理有不符。拙稿舊讀“乃趣且徙”，亦有此弊。伏羲與女媧乃夫婦，“娶”自是娶女媧爲妻，“生子四”應指伏羲與女媧生子四。如此則“女媧”之前的七字應是交代女媧之族姓與家世，有如：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爲嫫祖。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史記·五帝本紀》))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史記·五帝本紀》))

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史記·秦本紀》))

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綽氏，產重黎及吳回。《大戴禮·帝系》)

禹娶於涂山氏之子，謂之女嬀氏，產啓。《大戴禮·帝系》

準此類例，“虞遷”乃女媧之族姓，“□子”乃女媧考妣之名。

既明“虞遷”乃族姓，則“虞遷”應讀爲“夙沙”。“虞”字多見於包山簡，除人名用字外，例

多讀爲“且”，簡 198：“虞(且)志事少遲得。”210：“虞(且)外有不訓。”皆其例。“且”古音在魚部莊紐，夙古音在幽部心紐，古音魚、幽爲近旁轉，“如甫聲字爲瞞”(章太炎先生《小學略說》)是也。“遲”字楚簡習見，多讀爲“徙”，然亦有讀爲“沙”之例，如包山簡 78“長鄺”即“長沙”。

《左傳》襄公二年記有齊人“夙沙衛”。《呂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高〈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帝王世紀》(《類聚》十一)：‘神農氏，姜姓也。……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夙沙既爲大庭氏之後，其地望應在齊魯一帶。《左傳》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孔〈疏〉：‘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魯連子》云：夙沙瞿子善煮鹽。’類似記載又見《御覽》八六五引《世本》。《漢志》載‘魯仲連子五卷’，魯仲連爲戰國晚期齊國人，齊人言齊地先祖事，所記‘夙沙瞿子’當可信。據此可推定帛書‘夙沙’後殘失之字應是‘瞿’字。

“女媧”，原帛“媧”是個繁難字，考釋茲從略^[14]。李學勤先生(1984)謂女下一字讀爲媧或讀爲皇都沒有確據，“包義所娶是另一人，不是女媧”^[15]。謹錄以存參。本文重視《易·繫辭》等典籍的有關記載，認爲伏羲所娶即是女媧。

綜上，帛書所記女媧乃“夙沙瞿子之子”。夙沙乃齊地遠古氏族，以煮鹽爲生。傳說女媧爲“風”姓(《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列子·湯問》注)，又傳說多謂伏羲與女媧爲兄妹(《風俗通義》佚文)，今既釋出帛書“夙沙瞿子”，則伏羲與女媧各有居處之地，各有姓氏。

關於茫昧時代人類的生存活動

“□□是褻”，“褻”字諸家多讀爲“壤”。按字讀爲“褻”，《說文》：“褻，礫褻，祀除厲殃也。古者燧人繁子所造。”《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礫褻，以畢春氣。”鄭玄〈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率百隸素(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礫牲以褻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礫，出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礫於四方之門，礫褻也。”

“而殘是各”句，“而”，嚴一萍先生(1986)曰：“諸家皆釋天，誤。此爲而字。”其說是。“殘”字諸家多釋“踐”。字應讀爲“殘”，義與礫近。《周禮·夏官·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鄭玄〈注〉：“殘，殺也。”殘謂碎割，或稱作“礫”，《荀子·宥坐》：“五子胥不礫姑蘇東門外乎。”楊倞〈注〉：“礫，車裂也。”知帛書“殘”用與“礫”同。“各”，嚴一萍先生(1986)釋“高”，與字形不合。高明先生(1985)釋“吝”，按帛書乙 4、乙 5“吝”字二例，其右上二捺均等長，與此字形不同。商承祚先生(1964)釋“各”，按“各”讀爲“格”，《詩·小雅·楚茨》：“神保是各。”毛〈傳〉：“格，來。”《爾雅·釋詁》：“格，至也。”“而殘是格”合上句觀之，謂礫褻以除惡也，所以然

者，蓋往古之時，“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女媧“斷鯀足”，“殺黑龍”，於是“狡蟲死，顓民生”（《淮南子·覽冥》）。先民巢居野處，必有“磔”、“穰”而後有生存空間也。

“參化虐逃”，“參”與“虐”、“化”與“逃”為互文。“參”與曾侯乙墓衣箱二十八宿星名“參”字同形。“虐”字與《說文》“虐”之古文同形。郭店簡屢見此字，多讀為“乎”，而帛書此例則應依《說文》古文讀為“虐”。

所謂“參”是以星宿名代指凶癘。《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戰國時已將二十八宿劃分為四宮，即東蒼龍、南朱鳥、西咸池、北玄武。《史記》〈索隱〉引《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曾侯乙墓衣箱（E66）所繪二十八宿，東為蒼龍，西為白虎，故古人又習稱西方七宿為“西白虎”。“參、虎古多連言，《招魂》‘參目虎首’是也。《山海經·海內北經》：‘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披髮。’《續漢書·禮儀志》記大難之儀：‘肺胃食虎。’是古人固以虎為凶癘矣。

所謂“虐”謂“虐鬼”，《論衡·訂鬼篇》：“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蜺蜺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庫（按：“溷庫”衍文），善驚人小兒。”類似記載又見於《續漢志》李賢〈注〉引《漢舊儀》。

所謂“化”，原帛字形從示，化聲，讀為“變化”之化，《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又：“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又：“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所謂“逃”其實就是逃亡、逃走之“逃”，諸家或釋“兆”，非是。“參化虐逃”的意思即簡單又明白，謂即行“穰”、“殘”（磔）逐疫之儀後，諸凶神虐鬼紛紛變化逃亡。

“為蛇為萬”，“蛇”，商承祚先生（1964）、陳邦懷先生（1965）、饒宗頤先生（1985）、曾憲通先生（1985）釋“禹”；嚴一萍先生（1968）釋“禺”；李零先生（1988）釋“思”；何琳儀先生（1986）謂“禹、禺、萬均應從內”，而帛書該字並不從內，“其非禹和禺可以斷言”。因改釋作“虫”。按何氏否定該字非“禹”和“禺”之理由是很充分的，然釋為虫則略有欠缺。該字所從之“虫”有添加裝飾筆畫，正似所謂畫蛇添足者。依據帛書原字形，該字應分析為從“虫”，“以”聲，無疑是“蛇”字。“萬”，商承祚先生（1964）隸作“𪛗”，釋為商之先公“契”。嚴一萍先生（1968）：“此字與甲篇第十一行第十七字及乙篇第三行第卅一字‘𪛗’所從之萬，完全相同，當是萬字。”其說是。《說文》：“萬，虫也。”《荀子·議兵》：“慘如蜂蠆。”“蠆”與“萬”同，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 190 下“蜂螫蟲蛇”，“螫”字郭店簡《老子》甲本 33、傅奕本作“蠆”。帛書“為蛇為萬”，謂諸凶神虐鬼幻化逃亡，變成了蟲蛇之類。

《淮南子·覽冥》謂女媧補天殺龍以後，“狡蟲死，顓民生”，“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此類記載明顯受到了帛書的影響。

“以司堵壤”，“堵”，饒宗頤先生（1985）、李零先生（1985）、何琳儀先生（1989）釋“堵”；高明先生（1985）、何琳儀先生（1986）釋“域”。按釋堵是也。《說文》：“堵，垣也，五版為堵，從土者聲。”“司堵壤”即管理城垣。

“晷而步達”，“晷”，讀為“晷”（饒宗頤先生 1985、高明先生 1985）。晷本古代測日影以定曆法的工具，引伸為規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釋名·釋天》：“晷，規也，如規畫也。”《漢書·律曆志》：“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而”，嚴一萍先生(1968)釋“而”，學者多釋為“天”。曾憲通先生(1993)引李家浩說釋為“而”^[16]，後又謂“而”乃“天”字之誤(曾 1999)^[17]。按依“而”字讀已可讀通，不必改字。

“步”，《後漢書·張衡傳》：“察三辰於上，跡禍福於下，經緯曆數，然後天步有常。”(高明先生 1985 引)

“達”，舊多誤釋，字又見江陵九店楚簡《日書》30，李家浩先生釋“達”，甚是。^[18]帛書“達”謂營建道路以相通達。《爾雅·釋天》：“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九達謂之達。”是凡以道路相通皆可謂之達。古人以步為測量單位，“步達”引伸為推步之意。“晷而步達”合上句觀之，謂以晷測日影以定方位，推步測量以建交通網絡。下文言及陸路與水路交通，知“達”兼指陸上道路與水上通航。

“上下騰傳”，“騰傳”從陳邦懷先生(1965)釋。《說文》：“騰，傳也。”按騰傳析言之，謂以舟車相通，渾言則無別也。“騰”從舟作，《廣雅·釋詁》：“騰，渡也。”《左傳》成公五年：“晉侯以傳招伯宗。”傳謂傳車。《離騷》：“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王逸《章句》：“騰，過也。”又：“轉，行也。”騰、轉實即帛書“騰傳”之分用。《漢書·司馬相如傳》錄《上林賦》：“轉騰激洌。”孟康《注》：“轉騰，相過也。”“轉騰”即騰轉之倒，有如現代漢語“比較”又作“較比”，傳與轉通。

“山陵不疏”，“斌”饒宗頤先生(1968)初釋“疋”，後(1985)改釋“殺”。按釋“疋”是。《離騷》：“及前王之踵武。”王逸《章句》“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說文》：“疋，足也。”疋、武古音同在魚部，音近義通，此所以從疋與從武無別。《說文》：“疋，通也。”斌又作疏，《禮記·月令》：“其器疏以達。”《玉篇》引作“其器斌以達。”知“山陵不疏”即山陵不通，亦即僅知山陵之籠統，未知山陵有方位彼此之具體劃分。

“乃命山川四晦”，“命”，饒宗頤先生(1985)讀為“名”，《書·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大川。”李零先生(1988)從其說。“晦”，字從日從每，讀為“海”(饒宗頤先生 1985)。然不必理解為納百川之“海”。《周禮·夏官·校人》：“凡將事於四海山川。”鄭玄《注》：“四海，猶四方也。”《孟子·告子下》：“孫叔敖舉於海。”然《荀子·非相》云：“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是邊鄙之地稱“海”。

“熱氣寒氣”，“熱”，或釋“熏”(饒宗頤先生 1985、李零先生 1988)，或隸作“寮”(嚴一萍先生 1968、李學勤先生 1984)，或從嚴說讀為“燎”(何琳儀先生 1986)，均與字形不合。李零先生(1995)釋為“熱”^[19]。按釋“熱”是也，拙稿《楚帛書解詁》曾有補證。

“寒”，嚴一萍先生(1968)釋為“再”。饒宗頤先生(1985)釋為“百”。李零先生(1985)釋為“害”，又(1995)釋為“寒”。該辭例既與“熱氣”對稱為文，則字釋“寒”是正確的。可參金文克鼎、寒姒鼎之“寒”字。帛書“寒”之字形可分析為從宀從人在罍中，下有火，有如《說文》對

寒字的分析。其中𠂇、𠂈與金文寒字的相關部件對應，中間部分應是“人在𦍋中”之省形。

周鳳五先生(1997)將“寒”字改釋為“倉”^[20]，曾憲通先生(1999)支持周說，並進一步論證帛書“寅”從艸得聲，字讀為“燥”，與郭店簡《老子》“臬(燥)勝蒼(滄)”正可互證。按帛書丙篇另有“倉”字，與此字形不同，故此字仍應釋“寒”。

“氣”，古人多以“氣”指風，宋玉《風賦》：“風者，天地之氣。”又《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王逸《章句》：“寒氣聊戾，歲將暮也。”屈原《天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莊子·則陽》：“四時殊氣。”凡此氣皆指季風。古有八風之說，見《左傳》隱公五年、《呂氏春秋》、《禮記·月令》、《爾雅·釋天》等。“八風”之說過於繁瑣，以中國季風特點論之，春夏多吹東南風，秋冬多吹西北風，《淮南子·地形》：“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是帛書熱氣即東南熱風，寒氣即西北寒風。

“瀧汨幽溝”，陳邦懷先生(1965)謂“瀧汨皆楚國水名”，釋“汨”為湘水支流汨水。饒宗頤先生(1985)隸作“汨”，釋為急流，李零先生(1988)從其說。李零先生(1985)、李學勤先生(1984)、高明先生(1985)釋“汨”，於字形近之，於辭例則不可解。

按上文“山陵”乃泛稱，則“瀧汨幽溝”，不宜實指。“瀧”字疊韻訓為漬水，《說文》：“瀧，雨瀧瀧也。”《荀子·議兵》：“案角鹿倮瀧種東瀧而退耳。”楊倞《注》：“東瀧與凍瀧同，沾濕貌。”《論衡·自紀篇》：“筆瀧瀧而雨集。”典籍絕少見“瀧”單用之列，知“瀧汨”應合讀為訓。屈原《天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王逸《章句》：“鴻，大水也。”“瀧”、“鴻”疊韻，瀧汨亦即汨鴻，謂大水或急流。

“幽”字從水㠩聲，饒宗頤先生(1985)以為“洧”，為“幽”之後起字，其說是也。

“溝”，陳邦懷先生(1965)、饒宗頤先生(1985)、李學勤先生(1984)讀為“漫”，何琳儀先生(1986)隸作“厲”，將其坐實為《水經注·澠水》之厲水。李零先生(1988)讀為“瀨”。按釋“漫”是。《石鼓文》“溝溝有鯨”，鄭樵《注》：“溝即漫。”“溝(漫)溝(漫)”亦連續為辭，有如“洧洧”(見《說文》)、“漫漫”(《離騷》曼曼《釋文》又作漫漫)、“壇曼”(司馬相如《子虛賦》“案衍壇曼”)，皆為疊韻連語。“瀧汨幽溝”構詞如疊床架屋，已開漢賦之先河，蓋帛書作者約與屈宋同時而稍早，固有此文風。

以上帛書述人類認識山陵河流之歷程。山川四海，熱氣寒氣乃先民劃分山陵河流之客觀依據，《山海經》有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之分，此依山之相對方位而劃分山陵；《西山經》崑崙之丘“河水出焉”，《中山經》岷山“江水出焉”，《水經》卷一崑崙墟“河水出其東北隅”，此以山水之共存關係而得山陵河流之劃分；《山海經》有海外南西北東經，海內南西北東經，此依四海而明山陵河流之劃分；《大荒經》記有四方風名，此與帛書以熱氣寒氣分疏山陵河流相類。

“未有日月”，“未”，或隸作“朱”，讀為“殊”(李學勤先生 1984)，未妥。該句應理解為未有紀日，未有紀月，即未有天干地支也。《史記·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日月成，故明也。”此“日月”即指曆法計算單位之日、月。知計算日、月，則曆數明確。是太初之民，祇知圓圖紀年，認識到一年有四時(季)，從春及冬為一年。及至知道計算大餘、小餘，

纔能確知一歲(年)有多少日,有多少月,於是可據天象定歲首,日、月各有定歸矣。《淮南子·覽冥》:“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六經·順道》:“大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陰陽,不數日月,不志四時。”是古人已經認識到遠古曾經有過不記日月四季的時代。

《大戴禮記·五帝德》謂黃帝“曆離日月星辰”,《史記·曆書》:“黃帝考定星曆”《索隱》:“《世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此北方所傳古史,與帛書所記不盡相同。

“四神相代”,按帛書“四子”、“四神”、“四時”三位一體,“四時”是時間概念,即春、夏、秋、冬四季,是客觀存在;而“四子”、“四神”、則是“四時”的人格化和神話,是“四時”在初民思維中的產物。帛書的作者認為:四時的產生,是先祖(神)推步的結果,也就是認識的結果。“弋”,《尚書·多士》“敢弋殷命”即敢代殷命。代,更也。

“步以爲歲”,《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帝令大禹,步于上帝。”鄭(注):“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睹得失反復也。”《大戴禮記·五帝德》謂帝顓頊“履時以象天”,王聘珍(解詁):“履,步也。履時謂推步四時。”

“四時”,《書·堯典》記帝堯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別爲春、夏、秋、冬之正。《春秋公羊傳》隱公六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左傳》昭公元年:“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大戴禮記·五帝德》謂帝堯之時,“四時先民治之。”帝舜之時,“羲和常曆,敬授民時。”與帛書所記類似。

以上帛書述伏戲女媧的時代,初民與猛獸搏擊,爭得生存空間,分疏山陵河流,認識天地日月的歷程,與《淮南子·覽冥》等典籍的有關記載大略相合。

餘 說

楚帛書第一章明確記有伏戲、女媧的世系;述遠古之時,天地茫昧,“風雨是於”,伏羲漁獵爲生,始有人類初始之生產活動;娶女媧而生子四,是有人類自身之生產活動。磔攘凶厲,營建城垣,先民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中,爲自己爭得生存空間,由野蠻走向文明。依據山川、四方原野的相對位置,熱氣寒氣的寒暑分佈狀況,認識到山川河流的方位與分佈,是爲空間觀念之始;當時尚未有紀日紀月,僅僅依據四季的自然變化而認識到歲和四時,是乃時間觀念之始。

依據楚帛書第二章、第三章的敘述,炎帝時已測出方位,分天爲九天,劃地爲九州,於是山川河流之分佈已有具體之經緯;四神以五木覆“天旁”,建立觀測天象的體系,有了最原始的結繩刻符之類的紀日紀月;帝堯時已有了依據恆星周期的“日月之行”;共工創制干支曆法系統;商代相土建立時分制。由鴻荒至商代,天文地理曆法之學之產生與發展,敘述得明明白白。

亘古以來,對人類認識天地時空的歷程表述得客觀而具體者,惟帛書甲篇一本。我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進一步討論有關問題。

注 釋

- [1] 關於《楚帛書》，拙稿《楚帛書解詁》（《中國文字》新 21 期，1996 年）曾有過討論，本文參考新出楚簡，吸收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對舊稿多有訂正。
- [2] 嚴一萍：《楚簡書新考》（上、中、下），《中國文字》第 26、27、28 冊，1967 年 12 月、1968 年 3 月、6 月；《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三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年 10 月。
- 金祥恒：《楚簡書“筮戲”解》，《中國文字》第 28 期，1968 年 6 月。
- 以下凡徵引某作者同一篇論著，於姓名後以括號附論文發表之年，不重複出注。
- [3] 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 年 9 月。
- [4] 姜亮夫：《〈離騷〉首八句解》，《社會科學戰綫》，1979 年第 2 期。原帛“頤頤”字繁難，為方便排版，本文對此難字有所避開，請讀者諒解。
- [5] 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校補》，《江漢考古》，1989 年第 4 期。
- [6] 高明：《楚簡書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12 輯，中華書局，1985 年 10 月。
- [7] 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 年第 1 期、第 2 期。
- [8] 李零：《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 年 7 月。
- [9]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
- [10] 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 年第 9 期。
- [11] 陳邦懷：《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油印本，1965 年 4 月；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 5 輯，中華書局，1981 年；《一得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10 月。
- [12] 饒宗頤：《楚簡書疏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1968 年 10 月。
- [13] 李零：《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補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1988 年 7 月；《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 [14] 關於帛書“女媧”的釋讀，請參何琳儀先生《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 年第 2 期。拙稿《楚帛書解詁》亦曾有過討論。
- [15] 李學勤：《楚帛書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 年 12 月。
- [16] 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 年 2 月。
- [17] 曾憲通：《楚帛書文字新定》，《中國古文字研究》第 1 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 6 月。
-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19] 李零：《古文字雜識（五則）》，《國學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 [20] 周鳳五：《子彈庫帛書“熱氣倉氣”說》，《中國文字》新 23 期，1997 年 12 月。

論述名實的最早出土資料

——附訓詁術語三條

◎ 西南師大文獻所

◎ 張顯成

名實問題，是語言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國關於名實問題論述的早期文獻資料，過去都見於傳世文獻，例如《荀子》、《墨子》、《論語》。下面，就筆者研讀簡牘帛書所見，選錄介紹馬王堆漢墓帛書的一些關於名實問題論述的最早的地下出土資料（共十六條），竊望有利於中國哲學史和中國語言學史的進一步研究。^[1]

一、《經法·論》50行上～57行下：“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生（性）也；必者，天之命也；□□□□□□□□者，天之所以為物命也。此之胃（謂）七法。七法各當其名，胃（謂）之物。物各□□□□胃（謂）之理。理之所在，胃（謂）之□。物有不合於道者，胃（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謂）之逆。逆順各自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也】。強生威，威【生惠（慧）】，惠（慧）生正，【正】生靜。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極，與天俱見，盡□於四極之中，執六枋（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為萬事□，察逆順以觀于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為，達於名實【相】應，盡知請（情）、偽而不惑，然後（後）帝王之道成。六枋（柄）：一曰觀，二曰論，三曰僮（動），四曰轉，五曰變，六曰化。觀則知死生之國，論則知存亡興壞之所在，動則能破強與弱，轉則不失諱（譴）非之□，變則伐死養生，化則能明德徐（除）害。六枋（柄）備則王矣。三名：一曰正名，立（位）而（乃）偃（安）；二曰倚名，法而（乃）亂；三曰強主滅，而（乃）無名。三名察則事有應矣。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臣不親其主，下不親其上，百族不親其事，則內理逆矣。逆之所在，胃（謂）之死國，【死國】伐之。反此之胃（謂）順，順之所在，胃（謂）之生國，生國養之。逆順有理，則請（情）、偽密矣。實者視（示）【人】虛，不足者視（示）人有餘。以其有事起之則天下聽，以其無事安之則天下靜。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靜（爭）。勿（物）自正

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三名察則盡知情（情）、偽而【不】惑矣。有國將昌，當罪先亡。”

案：八正：指本篇上文所談的“四時有度，動靜有位，內外有處”。七法各當其名，謂之物：“七法”各自有自身的名稱，叫做“物”。執六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爲萬事□，察逆順以觀於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爲，達於名實相應，盡知情、偽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執掌六柄（六種治理國家的方法）以號令天下，詳審三名（三種名實關係）以處理各種事務，明察順與不順來探求霸王、帝王危亡之理，明瞭虛、實、動、靜各方面的做法，判斷事物達到用名與實相符的標準去衡量，則盡知實情與偽詐而不被迷惑，這樣，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便成熟了。正名：與實相符之名，即名實相符，與“倚名”、“無名”相對。^[2]倚名：即名不正，亦即名實不相符。強主滅，乃無名：再強的霸主滅亡了，於是也會無名無實。種樹：分別指種植穀物和種植樹木。百族：即百姓。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爭：指名與實相符社會就會安定，名實不相符社會就會爭亂。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這是黃老思想的無爲理論，指事物各自爲正，事物各自爲自身命名，事物各自爲定。此段論國家存亡興壞之所在，強調事物要“當其名”，要名實相符；並着重闡明了三種名實關係（“三名”），一是“正名”，二是“倚名”，三是“無名”；最後指出，“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爭”，“名自命”，“三名察則盡知情、偽而不惑”。這些，都是圍繞着循名責實的問題來展開論述的。這裏，名實問題的論述是與政治倫理問題的論述緊密相聯的（下文所引各條也大都如此）。

二、《經法·道法》3行上～4行上：“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無執也，無處也，無爲也，無私也。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爲刑名聲號矣。刑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迹匿正矣。”

案：刑名，又作“形名”，即形體和名稱，刑名的問題也就是名實的問題。聲號：聲名和稱號，故聲號亦即名。逃迹匿正：逃避踪跡，隱藏目標。此段也是講黃老虛無論，大意是：瞭解大道的方法，唯有行虛無。虛無則萬物秋毫均成，同時萬物必然有名有實。名實一經確立，則事物的黑白善惡分明。故執道者觀審於天下，無執、無處、無爲、無私。因此，天下之事物，都是自行確立其名實，名實關係一確立，則萬物就無所逃匿隱迹了。這裏，說明事物“必有刑名”，“無不自爲刑名聲號”。且“刑名立，則黑白之分已”，“刑名已定，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迹匿正”，世界萬物就會進入有序狀態：這些都是在強調名實關係的重要性。

三、《經法·道法》8行上：“凡事無大小，物自爲舍。逆順死生，物自爲名。名刑已定，物自爲正。”

案：此段大意是：凡事無論大小，萬物都是自行確立其存在的位置。萬物的逆順死生，都是自行確立其相應的名稱。名實關係確立以後，萬物就會各自正常地發展變化。這裏，也是首先說明萬物都有其名，即“物自爲名”，然後強調名實關係的重要，即“名刑已定，物自爲正”。

四、《經法·四度》45行下：“名功相抱（孚），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孚），名進實退，是胃（謂）失道。”

案：孚：符合。此段大意是：名聲與功業相符，故能長久。名聲與功業不相符，名聲高於

實際，這叫做“失道”。這裏，強調“名功相孚”，若“名功不相孚”，“名進實退”，則謂之“失道”，也是說明名實一定要相符。

五、《經法·論約》68行下～69行下：“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筭（策）。”

案：此段大意是：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必詳細審察事物之起因，審核其名與實。確定了其名與實，則其逆順自然有位，死生自然有分，存亡興壞自然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不變之道，決定其禍福死生及存亡興壞之所在。因此能做一切事都不會失理，論天下而不會失算。這裏，強調論天下必先審名實。

六、《經法·名理》74行上～76行下：“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循名廢（究）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審察名理冬（終）始，是胃（謂）廢（究）理。唯公無私，見知不惑，乃知奮起。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見正道循理，能與（舉）曲直，能與（舉）冬（終）始。故能循名廢（究）理。刑名出聲，聲實調合，禍福廢立，如景（影）之隋（隨）刑（形），如向（響）之隋（隨）聲，如衡之不藏（藏）重與輕。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乃得名理之誠。”

案：刑名出聲：指以名來命形，必然有言語聲音。聲實調合：指名實相符。聲，言語聲音，即名稱；調合，即相符。此段大意是：考察天下事物，必須要審查其名稱。如果名實相符，再依據其名稱究其事理，是者為福，非者為災。是非有分，當依法斷之。要以虛靜之心謹慎地聽取，要以法則為準繩。要審察事物的名稱和理則的整個變化，這就是究理。唯有公正無私見知不惑者，乃知努力奮起。故執道者審察天下，依循正道事理，能指明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始終過程。所以，他們能依據名稱來推究事理。以名來命形必然有言語聲音，若名實相符，則禍與福、廢與立，雖然如影隨形，如響隨聲般緊密相聯，但也會猶如衡之不藏輕重一樣清楚地昭示出它們。因此，唯有執掌道者能作到虛靜公正，得名理之誠。這裏，強調要“審其名”，要“循名究理”，“審查名理終始”，要“聲實調合”，名實相符。

七、《經·果童》^[3]96行下～97行上：“夫地有山有澤，有黑有白，有美有亞（惡）。地俗（育）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德瘧（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陰陽備物，化變乃生。”

案：地育德以靜：地化育德故而靜。天正名以作：天正名萬物故而作（指運動變化）。正名，辨正名稱、名分，即使名實相符。相養：同“相成”，即相輔相成。兩：指陰與陽。若：乃。此段大意是：地有山澤黑白美惡。地化育德故而靜止，天正名萬物故而運動。其靜止與運動、德惠與刑殺相輔相成，這陰與陽乃有其名而相輔相成。陰陽配合成就萬物，陰陽相推變化乃生。這裏，強調“正名”，強調陰陽“有名”，方有世界萬物。

八、《經·正亂》106行下：“帝曰：謹守吾正名，毋失吾恆刑，以視（示）後人。”

案：正名：辨正名稱、名分，使名實相符。此段大意是：黃帝說：要謹守我確立的名實關係，不要丟失我所確定的刑罰，以示之於後人。這裏，強調要謹守“正名”，即要保持名實相

符。

九、《經·姓爭》110行下~112行上：“夫天地之道，寒濕（熱）燥濕，不能並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常，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昔（措）刑不當；居則無法，動作爽名，是以僇受其刑。”

案：循名：根據事物的名稱，此實指循名責實。若易成：乃易成。爽名：不合名，即不循名責實。此段大意是：天地運行之道，寒與熱，燥與濕均不能並立；剛與柔、陰與陽固然也不能兩行。兩者相輔相成。居靜時有法度，動作時循名責實，這樣舉事纔容易成功。若舉事變化無常，超過極限，失去分寸，變亂固有常則；不施德惠，用刑不當；居靜沒有法度，動作不循名責實，均會因此身受殺戮之刑。這裏，強調要“動作循名”，舉動要名實相符，不可“動作爽名”。

十、《經·成法》120行下~122行上：“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昔者皇天使馮（鳳）下道一言而止。五帝用之，以杻（扒）天地，【以】揆（揆）四海，以壞（懷）下民，以正一世之士。夫是故讒民皆退，賢人滅（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辯乃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

案：故曰不多：本來就不必說得很多。一言：一個字，指“一”，即“道”，《韓非子·揚權》：“用一之道。”循名復一：根據事物的名稱復歸於道。復，歸也。一，指道。此段大意是：我聽說治理國家成功的辦法，原本就不必說得很多，一個字而已，根據事物的名稱復歸於道，這樣來處理問題，老百姓就不會違法亂紀。……過去上帝派使者鳳凰下到人間傳授道祇說了一個字，這就是道“一”。五帝用它來分開天地、管理四海、懷柔百姓、匡正一代讀書人。所以讒民皆退，賢人咸起，五邪之屬因此逃匿，巧言諂媚者乃被禁止。根據事物的名稱復歸於道，這樣來處理問題，老百姓就不會違法亂紀。這裏，反復強調要“循名復一”，方“民無亂紀”。

十一、《經·前道》131行下~132行上：“故王者不以幸治國，治國固有前道，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陰陽□□□□□□□□□□□□□□□□□□□□【名】正者治，名奇（倚）者亂。正名不奇（倚），奇（倚）名不立。”

案：前道：指事前先謀定，《禮記·中庸》：“道前定則不窮。”名正：與“正名”意同，即名實相符。此段大意是：所以君王不靠僥幸來治國，治國之事固然當事前謀定，要上懂得天時下懂得地利，中懂得人事。善于通曉陰陽……名實相符的國家就會太平安定，名不符實的國家就會發生混亂。與實相符的名稱不會不正，與實不符的名稱不會立起來。這裏，反復說明“名正者治，名倚者亂。正名不倚，倚名不立”，強調名實要相符。

十二、《經·十大》141行上：“欲知得失請（情），必審名察刑（形）。刑（形）恆自定，是我俞（愈）靜。事恆自施，是我無爲。”

案：形恆自定：形是自我確定的，此實指事物的形與名的關係是自行確定的。此段大意是：欲瞭解禍福得失，一定要審察名與形是否相符。事物的形名關係都是自我確定的，因此我愈加安靜不動。事物都是按其自身規律發展變化的，因此我無所作爲。這裏，強調“審名

察形”，方知得失。“形恆自定”，是宣傳無爲論。

十三、《稱》143行上：“道無始而有應。其未來也，無之；其已來也，如之。有物將來，其刑(形)先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

案：名以其名：第一個“名”是動詞，意爲命名；第二個“名”是名詞，意爲“名稱”。此段大意是：“道”無端始，卻化生萬物。其未化之際，一切皆無；其已化生之後，當遵從不悖。物將要產生，它的形體會先顯露出來。建置了其形體，就要給它命名。這裏，“建以其形，名以其名”，是說明有形則有名，有了概念則有與之相應的名稱。

十四、《稱》145行下～146行上：“帝者臣，名臣，其實師也。王者臣，名臣，其實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實賓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實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實虜也。”^[4]

案：庸，同“傭”，傭工。此段大意是：帝王之臣，名稱上是臣子，其實是老師。諸侯王之臣，名稱上是臣子，其實是朋友。霸主之臣，名稱上是臣子，其實是賓客。危主之臣，名稱上是臣子，其實是傭工。亡主之臣，名稱上是臣子，其實是俘虜。這裏，處處都是在論述名與實的關係。

十五、《稱》151行下：“利不兼，賞不倍，戴角者无上齒。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案：戴角者无上齒：長角的動物(即反芻動物)沒有上齒。角是動物的武器，齒也是動物的武器，這裏是說，有角作爲武器的動物，就沒有牙齒這種武器，二者祇能居其一。无，同“無”；下同。提正名以伐：即以功伐行正名，根據功伐行賞來正名，使名實相符。此段大意是：利益不能加倍，獎賞也不能加倍，不能得兼，猶如長角的動物就沒有上齒而祇能有一樣。根據功伐行賞使名實相符，讓各自得其所欲而止。這裏，“提正名以伐”，也是在強調“正名”，強調名實相符。

十六、《道原》171行下～173行上：“明者固能察極，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謂(謂)察稽知極。聖王用此，天下服。无好无惡(惡)。上用□□而民不廢(迷)惑。上虛下靜而道得其正。信能無欲，可爲民命。上信无事，則萬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爭。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不爲治勸，不爲亂解(懈)。”

案：明者：指明瞭道的人，掌握道的人。察極：指察看到細微末節。服人之所不能服：得人之所不能得。服，即得，得到。分之以其分：依據其身分來劃分其等級。前一個“分”是動詞，分別，劃分；後一個“分”是名詞，指名分等級。此段大意是：明瞭道的人能察看到一切細微末節，知人之所不能知，得人之所不能得，這叫做通過察考而知曉一切細微末節。聖王運用此，天下人就能服從。無所謂“好”(喜好)，無所謂“惡”(厭惡)。君主用它而老百姓就不會迷惑。在上之君以虛治國，在下之民則以靜務事，治國之道就會得其正。君主誠信而無貪欲，就可以號令萬民。君主能做到誠信而虛無不多事，則萬物都會得到虛無的好處。依據其身分來劃分其等級，使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萬民就不會有紛爭而安分守己。授予萬物以相應的名稱，則萬物就會自行安定。這樣，就不會國家安定時纔勸勉百姓務事，也不會由於國家混亂就懈怠於民。這裏，強調要“分之以其分”、“授之以其名”，即要確定名實關係，這樣纔能“萬民不爭”、“萬物自定”。

在馬王堆漢墓帛書中還有一些有關名實問題論述的資料，此不再贅引。以上所摘引的十六段帛書文字，大都是圍繞着正名，圍繞着循名責實來展開論述的。同時，它們又往往是既在談名實關係，又在談政治倫理問題，而談政治倫理問題又往往是借名實理論來闡述的，可見名實理論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所引的《經法》、《經》、《稱》、《道原》四種佚書，依次抄寫在帛書《老子》乙本的前面，據研究，它們就是失傳已久的《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黃帝四經》四篇”，其成書年代在“戰國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00年前後”。^[5]《黃帝四經》的發現，為研究道家學派，特別是為研究黃老學派，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同時，這批關於名實問題論述的最早的地下出土文獻，也為我們研究中國語言學史和哲學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附出土簡帛文獻中所見訓詁術語三條：之為言也猶；為言猶；為言也猶。

這三條都是聲訓術語，都未見於傳世文獻，它們出現於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中：^[6]

一、《五行》203行~204行：“有大罪而大誅之，簡；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弗【誅，不】行。有小罪而弗赦，不辯【於】道。簡之為言也猷（猶）賀（加），【賀（加）】大而罕者。^[7]匿之為言也猷（猶）匿（暱），匿（暱）小而軫（賑）者。簡，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簡，嚴也。匿：隱藏也。暱：近也，親也。賑：救濟，救助。此段大意为：對有罪者要大誅之，這就是簡嚴；對有小罪者要赦免他們，這叫做隱匿。對有大罪者而不誅之，這叫做“不行”。對有小罪者而不赦免之，這叫做“不辯於道”。簡（從嚴）就是加（加重懲罰），加重懲罰犯大罪者而使大罪少發生。匿（隱藏）就是暱（親近），親近犯小罪者而救助他們。簡嚴，為義之方。隱匿，為仁之方。

二、《五行》298行~301行：“有大罪而弗□誅，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不辨於道也。間（簡）為言猶衡（加）也，【衡（加）】大而炭（罕）者，^[8]直之也。不周□四者，不辨於道也，有大罪而大誅之，間（簡）。匿為言也猶匿（暱），匿（暱）小而軫（賑）者，直之也。間（簡），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言仁義之用心之所以異也。義之盡，間（簡）也。仁之盡，匿。”直之：使之直。正曲為直。

以上被訓詞與訓釋詞古音關係如下：

“簡”與“加”：簡，見母、元部。加，見母、歌部。二者音近，聲同韻對轉。故以“加”訓“簡”是以雙聲韻近字為訓。

“匿”與“暱”：暱，從“匿”聲，“暱”與“匿”音同。故以“暱”訓“匿”是以同音字為訓。

從以上引文來看，以上聲訓術語“之為言也猶”、“為言猶”、“為言也猶”，是各自獨立的三條訓詁術語。不過，因為例證不豐，也不能排除後兩者（為言猶、為言也猶）是前者（之為言也猶）的省寫的可能。這有待於更多的出土文獻材料來證明。但是無論怎麼說，這些訓詁術語的發現，為訓詁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新材料，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注 釋

- [1]帛書引文所用版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為便於排印和閱讀，下文帛書引文中個別的生僻字徑改作通行字，個別的通假字也徑出本字，原衍文刪去，原訛誤字改正。對帛書的釋讀，主要參考整理報告；也時有己見，但為行文簡潔，不再專門注明。依慣例，引文使用了以下符號：[]，表示補出的殘缺字或脫文；□，表示無法補出或不能辨識的殘缺字；()，表示前一字是假借字或異體字。
- [2]“正名”在不同的語境中常有不同的兩種意義：一是名詞義，即符其實之名；一是動詞義，就是使名正，也就是使名實相符。這裏是名詞義，下文引文中有時是動詞義。
- [3]《經》，整理小組原命名為《十大經》，後又命名為《十六經》，不確，今依李學勤先生說改稱《經》。下同。下文“十二”條所引章名“十大”也為依李學勤先生說所加。說見李學勤先生《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它》，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4]此段也見於《說苑·君道》、《戰國策·燕策》等傳世典籍，但文字不盡相同。
- [5]見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載《考古學報》1975年10期。關於《黃帝四經》的成書及作者等問題，後龍晦、任繼愈、李學勤等先生多有補說（龍說見《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探源》，《考古學報》1975年4期；任說見《中國哲學史》〈秦漢〉102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說見注③所引文）。另，有的學者認為此四種佚書不是《黃帝四經》，但無論怎麼說，它們屬黃帝書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 [6]《五行》屬思孟學派作品，其“成書早於《孟子》”。說詳魏啓鵬《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校釋·帛書〈德行〉研究札記》及該書《龍晦序》（巴蜀書社1991年版），拙作《“集大成”與“金聲而玉振之”訓釋補正——帛書研究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2期）。另，以下引文中的着重號為筆者所加，表示訓詁術語。
- [7]此句“質(加)”依下文“匿(匿)小而軫(賑)者”句補，因兩句相對，句式當相同。
- [8]此句“衡(加)”依下文“匿(匿)小而軫(賑)者，直之也”句補，因兩句相對，句式當相同。

簡帛札記


◎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博士後

◎ 李若暉

總

《易·坎·上六》“實於巖棘”，“巖”馬王堆漢墓帛書“叢”作“總”，鄧球柏先生釋為“帛青白色”^[1]，張立文先生曰：“‘總’假借為‘叢’，‘總’，《說文》：‘帛青色，從糸蔥聲。’倉紅切，東韻。‘叢’，《說文》：‘聚也。從艸取聲。’《唐韻》、《正韻》：‘徂紅切。’東韻。‘總’‘叢’韻同，古音近相通。”^[2]帛書之“總”或當分析為從艸總聲。戰國文字極其詭異，常有置部首於全字之一隅者。例如郭店《淄衣》第九簡之“署”字部首“日”在左下方，聲旁“尸”所從之“尸”卻寫在全字之左側，致使整理者釋此字為“俗”^[3]，李家浩先生則以此字為從尸從昏，而“昏”為“几”之異體，故釋此字為“尸”，讀為“署”^[4]。幸得上海簡《淄衣》此字“日”在“几”上，方得辨明此字即“署”之異體，從日尸聲^[5]。《唐韻》：“藁，俗叢字。”《淮南子·原道》“木處榛巢”，高《注》：“聚木曰榛。”劉文典《集解》：“《文選·天台山賦》注、《左思招隱詩》注、《答張士然詩》注引高注並作叢木曰榛。”^[6]吳承仕《淮南舊注校理》：“王仲宣《從軍詩》注引高注：‘聚木曰榛。’與此相應。下文‘隱於榛薄之中’，注云：‘藁木曰榛。’即實言之，叢聚並從取聲，音義相近，注家隨意作之，亦容傳寫錯互，不關宏旨。”^[7]蔣禮鴻先生曰：“此當作藁木曰榛。藁即叢之俗字。下文隱於榛薄之中注曰：‘藁木曰榛。’是其證也。《主術篇》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注曰：‘聚木為榛。’聚亦當作藁。”^[8]“總”、“嚴（藁）”東部疊韻，精從旁紐，古可相假。故“總”即“叢（藁）”改換聲符之異體字。

視

郭店《老子》甲2“視索保僕”，整理者原注：“‘視’字下部從立‘人’，與簡文‘見’字作者

有別。”^[9](以下以“△”形表示此字。)其後,裘錫圭先生曾在1998年達慕思會議上專門考釋此字。其文不長,茲引錄於下:

乙3“長生舊(久)△之道也”,今本59章作“長生久視之道”。丙5“△之不足見(見)”,今本35章作“視之不足見”。郭店楚簡的整理者指出,簡文“見”字“目”下一般為跪坐人形,“下部為立‘人’”的則是“視”字,其說可信。△應是“視”的表意初文。在過去發現的楚文字資料裏,“見”字下部都作跪坐人形。包山楚簡屢見官名“△日”,以前釋作“見日”,其實應該釋作“視日”。《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此視日也是楚官職名,不知與簡文的視日是否有關。明白了楚簡“見”“△”二字的區別,再去看較早的古文字,就可以發現在殷墟甲骨文、周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裏也存在這種區別。在這些古文字中過去釋作“見”的那些字裏,凡下部作立人形的,也都應該改釋為“視”。應該指出,郭店簡《五行》篇中的“見”字,有一些下部已作立人形,與“視”無別(見23、29等號簡)。可見用“目”下人形的寫法來區別“見”和“視”的辦法,在當時已經出現了被放棄的趨勢(“視”的形聲字在古文字中早已出現,如何導的“覩”,參看《金文編》第619頁)。^[10]

裘先生此文中所舉乙、丙本“△”字,今本亦作“視”,故此二字之釋,當無疑義。但甲本之“△”字,今本卻是寫作“見”,則此字之釋,仍有商榷餘地。

裘先生對此的解釋是:“簡本中也有一些字,從字形方面看跟今本中與之相應的那個字對不上。這樣的字,如果在句子裏根本無法講通,就有可能是一個錯字。如果講得通,則說明簡本跟今本有異文。簡本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這裡。例如今本19章的‘見素抱朴’,甲2作‘△(視,在此當讀為‘示’)素保朴’,從文義上看似乎比今本好(‘示素’的說法比‘見素’合理。)”^[11]為什麼“視素”的說法比“見素”合理?如果將二者作為對立來考慮的話,“見”讀為現,為顯現,屬於無意識;“視”讀為示,為顯示、出示,屬於有意識^[12]。而對於老子來說,任何有意識的顯示,都是非道的。道從來也不有意地顯示什麼,道只是在無意識中顯現出什麼被人看到,其實你看到的無論什麼都不是道,只有什麼都沒看到你才看到了道。道只是無一“素”。對於脩道者也一樣。在此,“素”與“朴”從哲學意義上說為同義,亦即外面所顯示的,和裏面所保有的,絕無二致^[13]。倘若內外相反,則成為後世法家之“術”。《韓非子·難三》:“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之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堂。”又《外儲說右》:“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唯無為可以規之。”^[14]如此“視素”,祇能是“示無保有”了。

若從文字學角度考慮,古文字中“見”與“視”固然有別,但裘文也承認:“應該指出,郭店簡《五行》篇中的‘見’字,有一些下部已作立人形,與‘視’無別(見23、29等號簡)。可見用‘目’下人形的寫法來區別‘見’和‘視’的辦法,在當時已經出現了被放棄的趨勢。”且如前文所引,裘先生所釋係據郭店《老子》乙、丙篇之字形,尤其是“視之不足見”一句之中二字的明

顯差異。但郭店《老子》簡三組存在歷時性差異，分別具有不同來源^[15]，則此處之“視”，或仍當釋為“見”。

下面再就“視”的字形略作探討。

《說文》八下《見部》：“視，瞻也。眡，古文視。眡，亦古文視。”而在古文字中，“視”凡有五種字形。最普遍者為目下直立人形，裘先生認為這是“視”的“表意初文”。其次是何尊的“覩”，其右側形符顯然從屈足之“見”。其三為侯馬盟書之“覩”，其右側所從形符顯直立之“視”。其四為“眡”，《說文》四上《目部》：“眡，眡，亮，从目，氏聲。”古文字中實為“視”字，《說文》誤分^[16]。其五為“視”，見《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426。

我們推測，“視”之表意初文本作目下直立人形，後加聲符“氏”或“示”表音，由此造成其表意初文類化為“見”或“目”。古文字中類似的變化還有一些，如裘錫圭先生就曾指出：“最早的形聲字不是直接用義符和音符組成，而是通過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意符而產生的。”其舉例有：“‘雞’的初文是象物字，後來加注了音符‘奚’，再後象雞的形符又被換成了‘鳥’旁，就成了一般的形聲字。”再如：“‘裘’的本義是皮衣。初文是象物字，後來加注了音符‘又’，再後象皮衣的形符又換成了‘衣’旁，就成了一般的形聲字。大概是為了適應語音的變化，聲旁‘又’後來又換成了‘求’。”^[17]

奄

《楚辭·九章·涉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阜陽雙古堆漢簡《楚辭》有此句，唯僅殘存六字，作“不進旖奄回水”^[18]。黃靈庚先生據以認為：

《書鈔》卷一三七引淹回作奄回，黎本《玉篇·水部》“滯”條引回作洄。庚案：奄，猶奄忽也。後人蓋因言水而改作淹。回、洄古今分別字。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夏侯嬰之夏侯竈墓出土《楚辭》殘簡，存《涉江》此三字，然淹作奄，回亦作回。蓋古本如此也。^[19]

黃說似乎以“淹”為“淹留”、“奄”為“奄忽”之專字，二字絕不相混。原其實則未必如是。今試考察《楚辭》“淹”“奄”之用例：《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王《注》：“淹，久也。”“淹”與“忽”相對而言，“忽”即“不淹”^[20]。《離騷》：“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王《注》：“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黃靈庚先生曰：“屠本峻《楚辭協韻》淹省作奄。非是。”^[21]《遠遊》：“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王《注》：“四時運轉，往若流也。”《九辯》之一：“時蹇蹇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王《注》：“雖久壽考，無成功也。”《九辯》之三：“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洪《補》：“奄，忽也，遽也。”黃靈庚先生曰：“《分注杜詩》卷一一注、《杜詩箋注》卷三注引奄作淹，《類聚》卷三及《唐類函》卷七載引奄訛作淹，《昌黎文集》卷一注、《事文前》卷一〇引奄訛作潦。《施注蘇詩》卷三〇注、《杜陵詩史》卷二、卷一八趙注、《集注杜詩》卷三二注引並作奄。”^[22]按“潦”當即“淹”之訛。《九辯》之七：“事蹇蹇而覲進兮，蹇淹留而躊躇。”王《注》：“久處無成，卒放棄也。”《招魂》：“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王《注》：“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

也。”《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注》：“周旋中野，立踟躕也。”《招隱士》：“心淹留兮恫慌忽。”王《注》：“踟躕低徊，待明時也。一云，倚立踟躕，待明時也。”《七諫·怨世》：“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王《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哀時命》：“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王《注》：“言己欲躊躇久留，恐百饑饉，糧食絕乏也。”可見在後世版刻中，二字區別漸嚴，其初則未必如是。且似此等聯綿詞，一詞多寫典籍多有，不必求之過深^[23]。故不可以漢簡作“奄”，論證《涉江》之文義為奄忽。

又姜亮夫先生以“淹回”連讀，釋曰：“淹回，猶言僵回，淹回一韻之變。”^[24]郭在貽先生論曰：“此解誤。此句當讀為‘淹一回水一而疑滯’。‘回水’為迴旋之水，‘淹’為淹留，疑滯之‘疑’當讀為凝。句意為江船淹留於迴旋之水而凝然不進，與上句‘船容與而不進’相對應。若照《校注》所釋，則是迴旋之水而又凝滯，豈不矛盾？（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即用此文，明凝滯的主詞為舟，而非水。）”^[25]實則黃先生解“淹”為奄忽，亦與凝滯之語矛盾。

其後姜亮夫先生晚著《楚辭通故》，仍曰：“按淹留本通詁，惟此不得言留。奄回猶言淵回、淵旋，即今言灣還之義。謂水回旋，故下言疑（讀為凝^[26]）滯也。音轉則為還回，淹、淵、還韻通，還回亦迴旋也，此南土方言。即今語所謂灘之長言，灘者水中有淵旋，或以深陷之坎，或以大石所障，使水不得暢流，今大江兩岸多有之，蜀中滇人皆呼曰灘，三峽多險灘，亦其此也^[27]。北土為高原地帶，水少淵旋，故灘遂為南土所獨有。古語長言之則曰還回、曰淵回，而淹回、淵回，皆以訓詁字書之者也。（在貽讀回水為一詞，意謂‘淹留^[28]於回旋之水’，說亦明快，故錄之。）”^[29]是姜先生在讀郭先生文後，仍堅持舊說。

今試為郭說再補一證。若依姜先生說，則“淹回水”為一詞，“淹回”為“水”之脩飾語，則“淹回水”為名詞，但因為連詞“而”不能連接名詞，所以這一解釋不合語法。《馬氏文通》曰：“若‘而’字之前若後惟有名字者，則其名必假為動、靜字矣。不然，則含有動、靜之字者也。不然，則用若狀字者也。”例如《莊子·列禦寇》“古之人，天而不人”，“天”“人”兩字，皆假為靜字。《孟子·公孫丑上》：“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人役’、‘弓人’、‘矢人’三名也，而自為上截者，蓋上截當重讀，猶云‘既為人役而恥為人役’云云，故‘人役’、‘弓人’、‘矢人’雖自為上截，而其意含有動字者也。”^[30]但“淹回水”一詞，則無法適用於馬氏所列的幾種情況。因此，姜說非。

注 釋

[1]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49頁。

[2] 張立文：《帛書周易譯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64頁。

[3]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129頁。

[4] 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載姜廣輝主編：《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347～348頁。

[5] 參看張富海：《郭店楚簡〈淄衣〉篇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10～11頁。

- [6]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上冊18頁。
- [7]吳承仕：《淮南舊注校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4頁。
- [8]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續〈淮南子校記〉》，載《蔣禮鴻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355頁。
- [9]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114頁。尹振環先生堅持此處當作“見”字，並謂：“《釋文》注之為‘視’，未說明理由，不當。”不知何故。且其既謂此字當釋“見”，又注“見”為“視也”，令人不得其解。見尹振環：《楚簡老子辨析》，中華書局，2001年，170頁，參看其32~33頁、168~173頁。
- [10]裘錫圭：《以郭店〈老子〉簡為例談談古文字的考釋》，載[美]Sarah Allan [英]Crispin Williams 原編、邢文編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學苑出版社，2002年，29頁（又名《以郭店〈老子〉為例談談古文字》，載姜廣輝主編：《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83頁）。
- [11]同上31頁。
- [12]張吉良先生以為二者“義通”，可以作為一條思路。見張吉良：《老聃〈老子〉太史儋〈道德經〉》，齊魯書社，2001年，20頁。但如依此說，則此字釋“見”釋“視”就只有純粹文字學意義。但我們理應探討每一異文有無表示意義差異的可能性。
- [13][明]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十《朴太素字說》：“蓋朴也、素也，皆質之所始也。質之所始，其道之根幹乎。是故中虛外無，不可為像，是謂溟滓——道之根也。”見張元濟編：《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2094冊，147頁。
- [14]尚可參蔣重耀：《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66~74頁。
- [15]參看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2000年，5~11頁。
- [16]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755頁。
- [17]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151頁。
- [18]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楚辭〉》，載《中國韻文研究》，創刊號，湘潭大學，1987年，78頁。圖版見該書圖版第2頁，圖版四，唯此簡下題“《離騷》漢簡拓片取影二”，其簡且上下倒置，不知何故。
- [19]黃靈庚：《楚辭異文辯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351頁。
- [20]洪《補》，《釋文》忽作留。姜亮夫先生云：“《說文》留尚冥也，義不甚可通。忽，倏忽，速也。廣雅釋詁一：‘疾也’。蓋聰之借字。”（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11頁。）按姜先生誤認字形。《說文》七上《日部》：“昐，尚冥也，从日，勿聲。”非此字。檢《說文》五上《日部》：“留，出氣詞也。”段《注》：“此與《心部》忽音同意異。忽，忘也。若《羽獵賦》擅習如神，傅毅《舞賦》雲轉飄留，《漢樊敏碑》奄留滅形，皆出氣之義。倏奔之貌，本當用此字，不當作忽忘字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02頁。）又檢《說文》十三下：“聰，疾風也，从風，忽聲。”由是可知“忽”為“留”之借字，“聰”則“忽”之後起分別文，姜先生以為本字，本末倒置矣。姜先生晚年作《楚辭通故》，於“忽忽”條下曰：“一作留者，留本語氣詞，音與忽同，蓋亦借字。詳留留條下。”（姜亮夫：《楚辭通故》，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冊410頁。）其“留留”條下則已改引《說文》“留”字之訓釋，然其下仍曰：“按留與心部忽，形近音同而意異。忽忽兩楚方言常語，迫切之貌，作留留者，形近而誤。”（第4冊411頁。）又其“忽”條第一義“疾也”下曰：“按《說文》訓聰為疾風，則為專字。”（第4冊39頁。）是猶因仍舊說。
- [21]黃靈庚：《楚辭異文辯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23頁。
- [22]黃靈庚：《楚辭異文辯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597~598頁。
- [23]《淮南子·兵略》：“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閭入，莫知其所集。”顧千里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條疑當作倏，閭疑當作闔。飄忽倏閭，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閭，莫之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倏即忽也，閭即奄也。（楊倞注：‘感忽悠閭，皆謂倏忽之間也。’是矣。又云：‘悠閭，遠視不分辨之貌。’則非。）飄往忽來，與倏出闔入對文。”（引自[清]王念孫：《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79頁。按《讀書雜誌》九《淮南內篇補》即題為“顧校淮南子各條”，據王引之叙（977頁），王念孫曾以《淮南子雜誌》請顧氏批閱，後錄其批語以為此篇。）又按，顧氏此語亦關係《荀子·議兵》、《新序·雜事》者甚巨，而集解諸書，如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266頁）、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313頁）皆未徵引，故特為揭出之。

[24]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408頁。

[25]郭在貽：《曼齋文存中編·〈屈原賦校注〉補正》，載《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2002年，第3冊，434頁。

[26]擬，疑當作凝。

[27]疑當作“亦以此也”，或“亦其比也”。

[28]當衍一“留”字。

[29]姜亮夫：《楚辭通故》，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冊，508頁。

[30]呂叔湘、王海榮編：《馬氏文通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481～485頁，參看210～211頁以及郭錫良：《古漢語虛詞研究評議》，載《語言科學》，2003年，第1期，94～95頁。

馬王堆一號漢墓竹簡字詞考釋

◎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 王貴元

一、定

簡二〇八 漆畫其末一，長二尺六寸，廣尺七寸，盛定^[1]

簡二一四 漆畫卑臑徑八寸卅，其七盛乾定，郭首。卅一盛瘡(臙)載(載)。

簡二〇八下原注：“定，疑爲‘定’字，或釋‘肉’字。”

按：釋文二字，原形作，此是“定”字無疑。《馬王堆帛書·九主》：“[法]君明分，詒(法)臣分定。”(《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 382 行)^[2]定字作。《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奉陽君鬻臣，歸罪於燕，以定其封於齊。”(《戰國縱橫家書》圖版 35 行)^[3]定字作。《馬王堆帛書·十大經》：“刑(形)恆自定，是我俞(愈)靜。”(《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 141 行上。)^[4]定字作。形體與竹簡此字完全相同。



“定”與“奠”通用。《周禮·地官·司市》：“奠賈。”鄭玄注：“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定。’”《周禮·考工記·弓人》：“寒奠體。”鄭玄注：“奠讀爲定。”《國語·齊語》：“定三革。”韋昭注：“定，奠也。”今人猶有“奠定”之語。上二簡之“定”即借爲“奠”。《說文·丌部》：“奠，置祭也。”《釋名·釋喪制》：“喪祭曰奠。”也引伸指喪事所用祭品，《周禮·地官·牛人》：“喪事，共其奠牛。”鄭玄注：“喪所薦饋曰奠。”簡二〇八下原注：“漢代二尺六寸，約合 59.8 釐米；尺七寸，約合 39.1 釐米。382 號漆案長 60.2 釐米，寬 40 釐米，與此相近，案上又放置杯盤食物，當即簡文所記之器。”是上二簡之“定”即指案上用於喪祭之食物。

二、絞緒

簡二四六 絞緒巾二，續據(緣)。

簡二四七 紋緒巾一，素掾(緣)。



簡二四八 紋緒巾一。

釋文“紋”字原形作,此當爲“紋”字,《居延漢簡甲乙編》:“囟下莢屋枅解隨囟”(乙圖版陸玖 78.11)^[5]莢字作,二形“交”旁寫法相同,皆爲“交”之草寫體。《禮記·玉藻》:“絞衣以裼之。”鄭玄注:“絞,蒼黃之色也。”《集韻·爻韻》:“絞,蒼黃色。”“緒”通“紵”,《墨子·非命下》:“強乎紡績織紵,多治麻絲絺葛緒。”孫詒讓《問詁》引畢沅曰:“緒,紵字假音。”紵爲麻類植物,可織布,其所織布也曰紵。《玉篇·糸部》:“紵,麻屬,所以緝布也。”《漢書·高帝紀下》:“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顏師古注:“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絞緒巾”即蒼黃色紵布巾,其下二四九簡“緒巾一”,則指巾顏色爲紵原色,故不言“絞”。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早緒禪衣一”^[6],即皂色紵布單衣一件,此與上簡“絞緒巾二”等叙式相同。馬王堆一號墓遣策叙絲麻織品多言顏色,如下簡“白綃乘雲繡”、“紺綺信期繡”、“青絲履”等。又,此墓所出紡織品顏色以各類黃色爲主,可見黃色爲當時貴族服飾流行色。

三、纁印 旅

簡二五一 郭(梓)中鄉印穀帷一,纁掾(緣),素校。袤二丈二尺,廣五尺。青綺帟,素裏、掾(緣)。^[7]










釋文鄉字似用唐蘭先生釋,但唐蘭先生說:“鄉字右旁似从邑,未詳。”^[8]按,此字當是纁字,祇是“龍”之左旁寫作“月”,頗少見,然《居延漢簡甲乙編》:“南部匱六所狗龍一。”(甲圖版壹柒陸 2460)^[9]其龍字所从“龍”之左旁也寫作“月”,可見漢代“龍”有此種寫法。《龍龕手鑒·糸部》:“纁,直也。”直乃古值字,洪頤煊《讀書叢錄·論〈說文〉》:“直本作值。”《集韻·志韻》:“值,《說文》:‘措也。’或作直。”《說文》以措釋值,措、置互訓,纁在此義爲措置,“纁印穀帷”即措置印花的穀紗帷幔。一號墓出土“泥金銀印花紗”和“印花敷彩紗”兩類多種印花絲織品,印花由小型刻板措置,以泥金銀印花紗標本爲例,“圖案外廓略作菱形,每個單位長6.1釐米,寬3.7釐米,錯綜連續排列,通幅共有圖案13個單位”。^[10]

“素校”之“校”原形作,此當是旅字,《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夫共中(仲)彌(圉)人驂旅其扶(扶)以犯尚民之衆。”(春秋事語圖版 89 行)^[11]旅字作,字形相近。正因爲隸書旅字左旁有時寫得像“扌”,所以產生了扌、扌等俗體,《廣韻·語韻》:“旅,俗作扌。”《康熙字典·手部》:“扌,《篇海》音義同旅,又《篇韻》姓也。按,《廣韻》:‘旅,俗作扌。’此又訛從衣,更謬。”簡二五三:“素乘雲綉枕巾一,纁周掾(緣),素綰。”簡二五五:“素長壽綉機巾一,纁周掾(緣),素綰。”“素旅”與“素綰”相似,皆在“纁掾”後叙述,當指紡織品邊緣外接續之物,處物品之末端,《方言》卷十三:“裔、旅,末也。”符合文義。

四、辟

簡二八七 滑辟席一,廣四尺,長丈。生繒掾(緣)。

簡二八八 滑辟席一，績掾(緣)。

釋文“辟”原形作,按,辟字从从辛,从中从,字形無從口者,此乃辟字。《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書廷辟有日報。”(圖版 185 行)^[12]辟字作。又“歲離辟律於御史。”(圖版 199 行)^[13]辟字作。字形完全相同。《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攘臂而乃(仍)之。”(《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 2 行)^[14]臂所從辟作,帛書、多不分。辟在此讀爲蒲,辟、蒲古音同爲並母,辟屬錫部,蒲屬魚部,韻可旁對轉。《集韻》蒲有“白各切”音,古韻屬鐸韻,則與辟旁轉。《說文·草部》:“蒲,水草也。可以作席。”《周禮·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紡純。”上二簡之下二八九、二九〇簡正言莞席。

注 釋

- [1]釋文據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標點爲本文作者加,下同。
- [2]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線裝本,30頁。
- [3]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線裝本,47頁。
- [4]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精裝本,79頁。
- [5]中華書局,1980年版,下冊 58 頁。
- [6]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第6期。
- [7]釋文“穀”、“麥”二字依朱德熙、裘錫圭先生釋,見《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考釋補正》,《文史》,第10輯(1980年)。
- [8]《長沙馬王堆漢墓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遺策考釋》,《文史》,第10輯(1980年)。
- [9]中華書局,1980年版,下冊 162 頁。
- [10]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上集 56、57 頁。
- [11]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精裝本,61頁。
- [12]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線裝本,27頁。
- [1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精裝本,64頁。
- [14]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精裝本,3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所見 幾個重要概念的研究

◎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課程

◎ 曹 峰

前 言

《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以下簡稱《經法》),是1973年11月至12月期間,於湖南省長沙市東郊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墓主可能是長沙王丞相、第二代軟侯利緝的兄或弟)中出土的大量帛書中的一種。從使用字體及避諱文字(避高祖劉邦的諱,不避惠帝劉盈、文帝劉恒的諱)判斷,《老子》乙本及四種卷前古佚書的抄寫年代大致在漢初惠帝、呂后時期至文帝時期的公元前168年(馬王堆第三號漢墓的築造年代)這樣一段時期裏。《經法》是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第一篇,共計77行,共分道法、國次、君正、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等九篇,分章時不改行,各篇末記有篇名,然後空一字後置一■(黑方塊),接着寫下一篇,篇末記有“經法凡五千”。

《經法》出土至今,已快三十年了。關於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已有多部著作和許多論文面世^[1],這方面的研究似乎已經沉寂下去,不太引起學界的關心了。然而筆者認為在至今為止的大多數論著中,對《經法》的概念分析與結構分析上存在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對於《經法》的三大概念——“道”“名”“法”,祇重視“道”“法”而輕視“名”,對於《經法》的思想構造,祇講“道法”關係二元結構,而不講“道名法”關係三元結構,對於《經法》的思想背景,祇看到來自道家或法家的影響,而不看到來自名家的影響^[2]。其實“道”“名”“法”是《經法》中所見的三個最主要的概念,用它可以概括《經法》之邏輯結構。筆者認為,在這個邏輯結構中,“道”是一個虛的概念,《經法》將重點放在了名、法二項上。着重論述的是這兩者的相互關係,以及執道者如何把握名、法。誠如多數研究者所指出的

那樣，《經法》中的法思想在邏輯上與“道”有着必然的聯繫。但筆者認為，要真正把握《經法》的法思想，較之“道”，更重要的是“名”，不對“名”的內在結構即“刑”、“名”、“實”以及《經法》的內在結構即“道”、“名”、“法”作出深入的研究，就無法對《經法》作實質意義上的分析。但至今為止，尚無對以上兩重關係加以全面分析的論文，這就是本文所要寫作的宗旨。

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為數不少的研究者將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卷前四冊古佚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看作同一部書亦即《黃帝四經》，把《經法》視為“黃老學派”的著作，把《黃帝四經》看作是一人一時之作。但也有學者對此抱懷疑態度，所以上述問題學界尚無定論^[3]。筆者認為，在對《經法》的內在結構和重要概念作出實質性意義的分析之後，或許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幫助。在此首先陳述筆者幾個基本的立場。

1.《黃帝四經》的提法及“黃老學派”的概念尚有許多不明之處，所以拙論基本上不加使用。

2. 如將四篇古佚書看作一個整體來研究，筆者認為這有礙於《經法》的思想傾向的正確把握。《經法》與其他三篇之間，較之共通之處不如說相異之處更多一些。

第一節 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所見的“刑”、“名”、“實”

如用“道、名、法”來概括《經法》的邏輯構造，則“名”顯然是“道”與“法”之間的媒介。至今為止的研究，大多用《經法》的第一句“道生法”來把握《經法》整體的思想內容，將道法二元關係當作第一位的關係來考慮。因此，並未充分意識到“名”的重要意義。閱讀《經法》九篇可知，首篇道法篇和末篇名理篇均集中地討論了“名”的概念，其它的七篇的邏輯內涵也是基於“名”的思想而展開的，關於“名”的論述總體上要多於“道”、“法”。因此筆者認為闡明《經法》的思想實質的關鍵詞是“名”，“名”作為“法”的邏輯前提，不對其思想構造加以分析，就無法深入展開《經法》中有關“法”的思想的研究。至今為止關於《經法》中“名”的研究並非沒有，但存在的問題是對《經法》論述的重點較之“道”、“法”更重於“名”這一點認識不足，另一個問題是至今為止的研究大多祇觸及到“刑名”這一概念。然而，僅用“刑名”無法充分說明《經法》中“名”的思維構造，另一方面，如果像“余一”、“余二”那樣，將“刑名”僅僅理解為君主對臣下所使用的“循名責實”的刑名法術的話，對《經法》中“名”的性質就有無法正確把握的危險。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把“刑、名、實”當作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看待，重新研究三者的相互關係。

《經法》所見的“刑、名、實”可分作一般層面和政治層面二類。一般層面的“刑、名、實”如《管子》心術上篇“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尹文子》大道上篇“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所言，是一般意義上觀察普通事物時使用的基本概念。即在對事物加以判斷之際，“刑”、“名”、“實”三要素缺一不可。形是事物的樣態，實是事物的本質，名是對形與實總合把握。因而看到聽到確定了的名，即可想見事物的樣態，把握事物的本質。《經法》雖然沒有對“刑、名、實”三者的邏輯關係展開學術上的討論，但字裏行間看得出

作者充分理解這三者的邏輯關係。道法篇有“見知之道，唯虛无(無)有。虛无(無)有，秋稿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就是說所謂“見知之道”，唯有採取“虛無有”的態度。採取“虛無有”的態度，即知即使非常細微的事物，也必然有其刑與名，刑和名一旦確立了，其本質也就分明了。可見，確認了事物的刑和名，所謂“黑白之分”的對於事物本質的是非判斷也就瞭然了。這和《尹文子》大道上篇“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的表現方法是類似的。如四度篇“規之內曰員(圓)，矩(矩)之內曰[方]，[縣]之下曰正，水之[之靜]^[4]曰平，[繩之□曰直]^[5]。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長，權衡之稱曰輕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小多有數”所言，“規之內”、“矩之內”、“縣之下”、“水[之靜]”、“繩之□”、“尺寸之度”、“權衡之稱”、“斗石之量”等等形態是由“員”、“方”、“正”、“平”、“小大短長”、“輕重”、“小多”這樣的名來規定的，而這些名其實又正反映着本質。作為政治統治者的君主，並不關心這種一般層面上的“刑、名、實”的分析，他們關心的是這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即萬物皆有其“刑、名、實”，“刑”之上的“名”一旦確認，就會具有規定事物本質的效果。名理篇說“有物始[生]，建於地而洫(溢)於天，莫見汙(其)刑(形)，大盈冬(終)天地之間而莫知汙(其)名。莫能見知，故有逆成。物乃下生，故有逆刑(形)。禍及汙(其)身。”這裏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實”字，但從中可以知道，如果不能考察(見知)事物的“刑”“名”，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就會採取錯誤的行動(逆成)，事物就會走向與名相反的“逆刑”，陷於“禍及汙身”的境地。

接着探討一下政治層面的“刑、名、實”。《經法》基本上是基於實踐經驗的政治理論，考慮的是現實的人事狀態和國家狀態，故十分注目政治層面的“刑、名、實”。如四度篇“美亞(惡)有名，逆順有刑(形)，請(情)僞有實。王公執□以為天下正”所言，政治上的“刑、名、實”一旦為統治者把握，就能期待支配天下了。

《經法》的作者在論述君主以及國家的必然姿態之前，首先展開了一系列的審名、正名活動。就是說，如果名不能確定，君主以及國家的必然姿態也就無法確立。這方面的表述在《經法》中十分多見。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汙(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處)。……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无(無)遺筭。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論約篇)

天下有事，必審汙(其)名。名□□。循名處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財(災)。(名理篇)

在闡明審名、正名活動之前，先有必要分析一下《經法》中的“刑名”，筆者認為如果不使用“刑、名、實”這個邏輯框架，而將“刑名”作為一個獨立概念來看待的話，就無法充分理解《經法》的思想構造。如果像“余一”、“余二”那樣，將“刑名”限定為“循名責實”的“刑名法術”的話，不僅僅是《經法》中“名”的思想，連《經法》中“法”的思想也會無法正確把握。

那麼《經法》中“刑名”的適用範圍究竟有多大呢？如金谷治所指出的那樣，“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申不害所強調的刑名之術，本來是一種為安定君主地位、確立君權而使用的臣下

操縱術。”但《經法》的“刑名”的適用範圍是“儘管涉及的是一國的存亡興廢，但也期待着‘論天下而無遺策’的成果。它不是那種單純的臣下督責操縱術。”^[6]淺野裕一的見解也大體相同。“《經法》的刑名思想，與法家的刑名參同術不同，它涉及到相當廣泛的領域，作為認識第一階段的對萬物的事實判斷自不待言，還包括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依據法規對臣下的督責，進而包括君主實力與名聲的參同，天道的推移以及與天道推移相審合的國家戰略的策定等等。”^[7]確實，《經法》中的“刑名”與“臣下督責操縱術”相關的論述非常少^[8]，將“刑名”理解為“刑名法術”是非常不完整的，既有必要將“刑名”放在廣闊的領域考察，也有必要將“刑”與“名”分開來加以考察。

筆者認為，《經法》在考察“刑”、“名”之際，是以名實是否一致作為判斷基準的。就是說，君主在審名、正名之際，考察“刑名”的參同即名實一致與否正是“見知”的目的。因此，筆者認為使用名實關係論來分析《經法》，纔能更深入地把握《經法》的思想構造。在此，先來看一下《經法》中關於“名實”關係的論述。

毋為虛聲，聲湓（湓）於實，是胃（謂）威（滅）名。（四度篇）

名功相抱，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名進實退，是胃（謂）失道。（四度篇）

名實不^[9]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靜（爭）。（論篇）

執六枋（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為萬事□，察逆順以觀于朝（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為，達於名實〔相〕應，盡知請（情）偽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論篇）

以上引文，將名實的一致不一致與政治的成功不成功直接關聯起來，將其作為一種普遍的原則進行了抽象的論述。從《經法》第二章到第八章，其內容雖然考察的是各種各樣的具體的政治場合，雖然不一定直接出現“名”或“實”字，但能看出都是以名實一致論作為判斷的基準。君主的主要的政治活動即是達成名實的一致，以名實不相乖離為原則指導政治行動。名實一致之處，對君主、國家來說就是其必然的姿態，應該將其作為標準，換言之作為法則定下來，名實不相一致之處，顯然就違背了其必然的姿態，不能將其作為標準和法則。

《經法》中“名實”的對象大而言之是“君”和“國”，具體而言，其對象如下所示，是關乎“君”“國”存亡的各種政治現象。

凡觀國，有六逆。元（其）子父，元（其）臣主，雖強大不王。元（其）臣^[10]謀臣在外立（位）者，元（其）國不安，元（其）主不晉（悟）則社稷殘。元（其）主失立（位）則國无（無）本，臣不失處（處）則下有根，〔國〕憂而存。主失立（位）則國芒（亡），臣失處（處）則令不行，此之胃（謂）顓（顓）國。主兩則失元（其）明，男女掙（爭）威，國有乳（亂）兵，此胃（謂）亡國。（六分篇）

君臣易立（位），胃（謂）之逆，賢不宵（肖）竝立，胃（謂）之乳（亂），動靜不時，胃（謂）之逆，生殺不當，胃（謂）之暴。逆則失本，乳（亂）則失職，逆則失天，〔暴〕則失人。失本則〔損〕，失職則侵，失天則几（饑），失人則疾。（四度篇）

與以上“六逆”相類似的表達方式，還有國次篇的“五逆”，六分篇中與“六逆”相反的“六

順”，亡論篇的“六危”、“三壅”、“三凶”等等。作者將政治場合最深刻問題加以細緻地分類，然後考察了各種各樣的名實狀態。其考察方法遵循的是名實一致論，即君主在考察名（例如君臣父子等）必然形態時，依據名實的一致不一致，給出“逆”、“順”等等是非的判斷，然後依據這一判斷賦與對象以新名，再基於這一判斷及其新名，推斷出對象必然的結局，或採取相應的政治行動。當然在採取實際行動時，也依然遵守着名實一致的原則，如“毋爲虛聲，聲湫於實，是冒威名。”“名功不相抱，名進實退，是冒失道”所言，禁止名過其實或實不達名。以下，通過六分篇的例子再一次詳細說明上述的程序。

“元（其）子父，元（其）臣主，雖強大不王。”→“適子父，命曰上賸，群臣离（離）志。大臣主，命曰雍塞。”→“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

如果現實中存在着“元子父，元臣主”這種狀態，可推定其實質爲“雖強大不王”。基於這樣的“刑”與“實”，再具體分析的話，“適子父，命曰上賸，羣臣离志。大臣主，命曰雍塞。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將子專父權的行徑命名爲“上賸”，臣專君權的行徑命名爲“雍塞”。如有“上賸”及“雍塞”等事態發生，可以想像強國會削弱國土，中等的國家會受戰爭破壞，小國就會滅亡。就是說在將含有各種是非判斷的“上賸”“雍塞”等名加之以對象之後，據此可以想見它必然走向“羣臣离志”“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的結果。

因此，君主要做的事就是掌握類似“上賸”“雍塞”這樣的名，依據名實相應的原則，考察國內外的各種政治狀況，想見其必然結局，在一旦行動時採取正確的對應姿態。六分篇說“主上者執六分以生殺，以賞[伐]^[11]，以必伐。……故王天^[12]。”四度篇說“審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國。”可見確定與把握政治上所有的名，對君主而言是何等重要事情。這些篇章中未必常常出現“刑”“名”“實”等抽象概念，也未必常常論及名實一致的原則，但整個論述的過程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具有名實關係論的邏輯思路。用《荀子》正名篇所說“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也可以說是《經法》的邏輯思路。

根據對象的形態和本實而爲其定名在《經法》中屢屢可見。如六分篇的“命曰”，國次篇的“是謂”、“此謂”，四度篇的“謂之”，論篇、亡論篇、論約篇的“謂之”、“曰”、“命曰”等等。從這些大量使用的判斷用句看，審名、正名活動貫穿《經法》全文。

從以上的分析出發，可以說《經法》中君主審名、正名的活動是分二個階段進行的。

1. 從審“名”到定“名”。即依據名實的一致不一致，確定對象的名是“正名”還是“倚名”^[13]。這個階段，乍一看，是處於用名正“實”的階段，而實際上正相反，是從事物的“刑”與“實”確定名的正與不正。

2. 從定“名”到定“法”。法是在名確定之後纔成立纔使用的。統治者以確定了的名爲演繹判斷的前提，給出對象以必然的結局，然後採取相應的行動。即使有關事態尚未發生，也可事先採取防範的舉動。這種必然的行動可以認爲就是法。

第二節 《經法》所見的“道”、“名”、“法”

《經法》中有關道的論述並不多，論述的重點較之道更多地放在名和法上。但在邏輯構

造上,名和法都與道有着密切的關係,道可以說是名與法邏輯上的最高範疇。《經法》第一句“道生法”,等於是法因道而獲得根據,獲得權威。《經法》中沒有“道生名”之句,但檢討《經法》全文可知,名也和法一樣為道所生,因道而獲得根據。例如,道法篇和名理篇有以下內容。

虛無(無)刑(形),亅(刑)裂(寂)冥冥,萬物之所從生。……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莫知亅(其)所從生。見知之道,唯虛無(無)有。虛無(無)有,秋稿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道法篇)

有物始[生],建於地而洩於天,莫見亅刑,大盈冬天地之間而莫知亅名。莫能見知,故有逆成。物乃下生,故有逆刑。禍及亅身。(名理篇)

從以上引用文可看出,道是一種“虛無刑”、“莫見亅刑”、“莫知亅名”的存在^[14]。對於由道而生的萬物,祇有取“虛無有”姿態的人纔能確定其刑、名,纔能把握其死、生、敗、成的結局。道並非如人格神般生出名、法,沒有人(《經法》中為執道者)的介入,就永遠處於“莫見亅刑”、“莫知亅名”的狀態。

那麼,道和名、法三者究竟是在怎樣一種邏輯結構下聯結起來的呢?在考察這個問題之前,先有必要闡明《經法》中道的屬性。芳賀良信將《經法》所用的“道”的概念分為三類。“第一是作為萬物生成根源的‘道’,……第二是作為君主認識根源的‘道’,《經法》中多見的‘執道’的‘道’與此相當。第三是萬物的或特定事物的‘名’,即作為必然姿態的‘道’,例如道法篇的‘輕重不稱,是胃失道。’”^[15]筆者認為,第一種“道”是本體論的道,第二種道是認識論的道,第三種道並非如芳賀氏所言指的是名,它和四度篇“名進實退,是胃失道”一樣,指的是態原則、規律的掌握^[16]。第三種道在此不作為拙論的考察對象。第二種“道”,即執道者與道的關係放在第三節中探討。這裏先來考察本體論的道。

如馮友蘭所指出的那樣,“道家是經過名家的思想而又超過之的。……‘無名’是對着‘有名’說底。他們對着‘有名’說,可見他們是經過名家底。”^[17]道家所主張的“無名”等概念,是為與當時盛行的重“名”思想相對抗而作成的。因此,從思想的演變看,“無形”、“無名”是從“有形”、“有名”之後產生的。《經法》也一樣,從邏輯構造上看,“無刑”、“無名”是“刑”、“名”的根源,道是名、法的根源,其理由有二。一則伴隨着道生萬物,“刑”、“名”也同時產生出來,所以如果把握了“刑”、“名”,等於執道者把握了萬物的根本。再則,如果名、法是根據道而生,那麼執道者所必須把握的名、法中也就具備了道的絕對性、普遍性和不變性。

但如前所述,《經法》論述的重點在於名、法而不在於道。或者說雖論及道,卻不止於道的“虛無刑”、“莫見亅刑”、“莫知亅名”等屬性,也不止於道與名、法的本體關係,而強調的是執道者在認識階段上,必須採用道的姿態。關於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討論。

《經法》所見的“名”的邏輯構造已在上一節中作了分析,接下來試圖闡明《經法》中的法以及名和法的關係。《經法》中所見的法及與法直接有關的內容如下所示。

法者,中(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毆。□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毆,法立而弗敢

廢〔毀〕。□能自中(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篇)

一年從元(其)俗,二年用元(其)德(德)^[18],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徵)。(君正篇)

〔有〕得者,發禁掇(弛)開市之正(徵)毀。號令者,連爲什伍,巽(選)練賢不宵(肖)有別毀。以刑正者,罪殺不赦毀。(君正篇)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乳(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乳(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君正篇)

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生也。必者,天之命也。□〔者,天之〕□〔也。〕□□□者,天之所以爲物命也。此之謂七法。(論篇)

四時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終)而復始。(論約篇)

天下有事,必審元(其)名。名□□。循名廢理之所之,是必爲福,非必爲材(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名理篇)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見正道循理,能與曲直,能與冬(終)始。故能循名廢理。刑(形)名出聲,聲實調合^[19],禍(福)材(災)廢立,如景(影)之隋(隨)刑(形),如向(響)之隋(隨)聲,如衡之不藏(藏)重與輕。(名理篇)

通過分析以上引文,筆者認爲《經法》所見的“法”可分二類。一種是人(準確地說是君主)制作的,期待在政治場合發揮作用的法令。另一種則是如論篇、論約篇所見的、作爲參照標準的自然法則。如對第一種法再作詳細分類,一類是如君正篇所見的具體的法令,即在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軍事場合實施的政策與號令、以及作爲刑法的刑罰,一類是如其他篇章所看到的抽象的法。爲何具體的法令祇反映在君正篇一篇之中,通過對這問題的解答或許可以窺見《經法》關於“法”的思想的真相。就是說,《經法》中關於法的注意點,不在於具體的法令,而在於法是如何成爲法的這一點上。換言之,《經法》中所見“法”的思想傾向於關於法的根本認識,把側重點放在了法作爲法的根本屬性,即法的客觀性、明確性、有效性、公正性、絕對性、普遍性、不可變性的論述上。不用說,導出這些根本屬性的前提,正是《經法》論述的重點——“名”,這一點在後文中加以論證。這裏有必要回顧一下《經法》的思想特徵,蔣樂羣曾作如下分析:

《經法》在論述因爲前項的狀態和行動,導致了後項的狀態與效果之因果關係時,不引用歷史人物的名言作爲根據,也不設置自然異變、占筮占星等神秘的迷信的根據,而是把不言而喻的事情,即時性地聯結起因和果來。這種論述方法即所謂的即事性的發想,在戰國時代法家系及兵家系文獻中十分普通。^[20]

確如蔣氏所言,站在實踐的立場上,着眼於政治效果的《經法》的論述與法家系及兵家系的文獻有類似之處。但法家系及兵家系文獻所導出的法都是具體的法令、號令,或是具體法令、號令的具體運用和實際效果。《經法》雖有這方面的內容,但並不完全如此,同時也

把論述重點放在法所成立的理由和根據上。另外，如上一節所述，《經法》基於實際的經驗，在論述原因與結果的因果關係時，所採用的方法論是名實一致論。可以說在其他法家系及兵家系文獻較少看到的名與法的特殊關係決定了《經法》所見法思想的思想傾向。

那麼，這究竟是怎樣一種特殊關係，也就是說名和法的交匯點究竟在何處呢？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經法》中名和法往往是相互對照的^[21]。道法篇有“法者，中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毆”之句。《荀子》正名篇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即如果名正實喻，則辨說時就能“以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兩者何其相似，前者說的雖然是法，但它必然也是在名正之後纔能推行。

但從邏輯上看，兩者究竟是如何聯結起來的呢？關於這一點，研究《經法》的學者中沒有人指出過，胡適在其《先秦名學史》一書中論述道“法代表某類事物的全部本質屬性，因之與某類事物據以構成的原型相同”，“法是對預見結果的明確表述。假如這種預見的結果不能實現，正如不能實施一樣，它們就不再成為法。”^[22]筆者認為從胡適的見解中，可以為我們研究名與法的交匯點提供重要的啟發。

1. 通過對各種政治現象中名實關係的考察，《經法》在審“名”到定“名”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對象本質屬性的把握。在代表事物本質屬性這點上名和法其實是一致的。

2. 《經法》中的名，是基於實踐的經驗，在明確政治上因果關係之後得出的結論，所以具備了客觀性和有效性。即它不是以歷史人物的名言及自然異變、占筮占星為根據，而依據的是人能確切認識的政治的得失和自然的法則，在反復的檢驗中確認了其有效性和可信度，所以以名為出發點，可以演繹出人行動的必然結果及事物發展的結局。這種客觀性、必然性、確實性、有效性也是法所追求的屬性。

3. 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規則，《經法》還大量論及作為參照標準的自然的法則。筆者認為這是為了強調人所制定的名與法具有等同於自然法則的絕對性、普遍性、公正性而引入的。詳言之，即論述天地的法則及“規”、“矩”、“縣”、“水”、“墨繩”、“尺寸”、“權衡”、“斗石”等自然標準的目的，不是僅僅把它當作人應遵從的規範，而是將君主的名、法與之對比，強調君主制定的名、法也同自然的法則一樣公平無私、神聖不變，一旦確立就同自然的法則一樣能自行地發揮作用。道法篇說“稱以權衡，參以天堂，……。事如直（植）木，多如倉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無所逃忤（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四度篇說“（‘規’、‘矩’、‘縣’、‘水’、‘墨繩’、‘尺寸’、‘權衡’、‘斗石’）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辰之期，四時之度，〔動靜〕之立（位），外內之處（處），天之稽也。高〔下〕不敝忤（其）刑（形），美惡（惡）不匿忤（其）請（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忤（其）立（位），士不失忤（其）處（處），任能毋過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傳世文獻中與此類似的表現有，《慎子》威德篇說“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荀子》禮論篇說“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尹文子》大道上篇說“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鼎鑿

譬，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都是這樣從事物的一般法則引伸到人類的一般法則。因此與自然的模範、規則同等的公平無私的“法”一旦確定，不用說就“生法而弗敢犯毆，法立而弗敢廢〔毆〕。”

根據以上三點，可以說在邏輯上，一旦名確定下來，法的根本也樹立起來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又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筆者以為祇有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纔能真正把握“法”的含意。即在邏輯上，祇有“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確立了嚴格意義上的名，實踐上“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纔有可能得以實施。法的“嚴而少恩”的理由並不僅僅因為“專決於名而失人情”，從邏輯上看，它與“使人儉而善失真”有着直接的關係。其實無妨把“專決於名”的“名”看作就是“法”。

《經法》中關於法的論述比名要少，實際上，在很多場合，名與法相當。道法篇說“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爲刑名聲號矣。刑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此處“聲號”與前引名理篇所見“刑名出聲，聲實調合”的“聲”相同，既可視作確定了的“名”，在實際動作的場合，也可視作“法令”“號令”。論約篇有“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元（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之句，“刑名”一旦確定，“逆順”、“死生”、“存亡興壞”的“有立”“有分”“有處”都可以看作是“以法斷之”的活動了。此外，馬王堆漢墓《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六經》姓爭篇有“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元（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德）則無有，昔（措）刑不當。居則無法，動作爽名。是以僂（戮）受元（其）刑”。成法篇有“黃帝問力黑，……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以守一名。……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也可作爲參照，即法和名是直接對應起來的。

第三節 君主與“道”

君主與名、法的關係事實上已經在第三、第四節中作了闡明。如《呂氏春秋》正名篇“名正則治，名喪則亂”所言，《經法》中君主最大的使命不是“執法”，而是審“名”。審“名”是在考察對象的“名”時，使用名實一致論，進行對象的是非判斷，給出對象必然的結局，再賦與對象以新的“名”。審“名”的目的是，君主依據確立了的“名”，決定所必須採取行動，即“以法斷之”。名、法既然是君主基於實踐經驗制定的，也就具備了客觀性、絕對性、有效性，就能期待它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管子》心術上篇說“名也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任法篇說“生法者，君也。”筆者認爲這可以用來表達《經法》中君主與名、法的關係。

如前所述，《經法》的基本思想構造是“道、名、法”。人如能把握這個構造，就能君臨天

下。《經法》把能真正把握者稱之為執道者。

從“執道者”這個稱呼可知，《經法》要求君主是把握和堅持道的人。把握和堅持道，不僅僅是順應作為參照標準的天地之道等自然規則，更重要的是，在認識對象並判斷其本質時，必須採取道的姿態。那麼，所謂道的姿態究竟是怎麼一種東西呢？首先請看《經法》以下的記述。

見知之道，唯虛無有。（道法篇）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無執，無處也，無為，無私。（道法篇）

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乃得名理之誠。（名理篇）

《管子》心術上篇有“聖人得虛道”之說，同篇中還有“人主立於陰，陰者靜，以靜制動，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韓非子》主道篇也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乍一看均與《經法》十分類似，然而細加分析可知它們說的是不同的事情。《管子》心術上篇和《韓非子》主道篇注目於處於權力頂點的君主能否統御臣下。這種專制體制下君主的心理狀態，最主要的就是君主不想因表達了自己意圖而被臣下追隨利用。因此在專制機構中君主的最佳對應祇能是無為。所以，《管子》心術上篇和《韓非子》主道篇所見的君主的“虛靜”充其量祇是術的一種，出於維護君主專制體制的必要。而《經法》則不同，它的道的立場不是“以靜制動”的御臣術，而是在“見知”天下時，所必須遵循原則般的立場。如前所述，道是“虛無刑”的，而“刑”“名”生自“無刑”“無名”，故君主站在“無”的立場上，就能在尚未確立“刑”“名”的地方，也可以客觀地“見知”天下。君主以“無刑”的道的姿態去把握“有刑”的對象，換言之，是以流動的姿態，把握刻刻變化的對象。請參看以下名理篇的記述。

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處於度之內而見於度之外者也。處於度之[內]者，不言而信。見於度之外者，言而不可易也。處於度之內者，靜而不可移也。見於度之外者，動而不可化也。動而^[23]靜而不移，動而不化，故曰神。神明者，見知之稽也。

道是神明（神聖的明察）之源。所謂神明，指的是處於法度之內而又看到法度之外。所謂“處於法度之內”，是指（神明）不說什麼但“已若（諾）必信”（下文有“已若（諾）必信，則處（處）於度之內也。”）。所謂“見於法度之外”，是指（神明）雖有言，但其自身立場不因（外物的影響）而改易。所謂“處於法度之內”，是指（神明）靜而不遷移。所謂“見於法度之外”，是指（神明）雖動（與時而變，與物相應），但其自身立場不因（外物的影響）而變化。靜而不遷移，動而不變化，所以說它“神”。“神明”是用於“見知”的特殊的能力。

這段文字非常抽象，很難用白話表達得清楚。但筆者認為，綜合《經法》全文來看，這裏可以說抽象地表達了君主的二種帶有根本性意義的姿態。即既能堅持、堅守已經樹立了的法度，又在不存在法度的地方，能與時刻變化着的對象相對應而不走向極端。這種可以自由把握事物的主導權稱之為“神”。君主具備了“神”的能力，就可以如下列引文所示的那樣，站在“唯公無私”的立場，確保帶有客觀性、絕對性的姿態，並達到“虛靜公正”的道的境

地。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取（聖）。无（無）私者知，至知者為天下稽。（道法篇）

故唯執〔道〕者能上明於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畔），富密察於萬物之所終始，而弗為主。故能至素至精，惜彌無刑（形），然後（後）可以為天下正。（道法篇）

□〔生〕□，□生惠，惠生正，〔正〕生靜。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論篇）

讀了以上引文可以發現，《經法》中的君主並非消極地“以靜制動”，倒不如說正相反。“虛靜公正”不是君主行動的出發點，反而應該說是行動的結果。而“神”或“神明”既是君主所需把握的姿態，是“見知之稽”，也是最終追求的目標即“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如總結《經法》中君主與道的關係，乃是為了最大限度把握住名、法，君子必須站在道所指示的客觀的自由立場，最終達到“虛靜公正”之道的境地。

餘 言

如果再引用幾句話，將其作為《經法》政治理想的集中體現，那一定是以下這兩段。

事無小大，物自為舍。逆順死生，物自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為正。（道法篇）
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論篇）

《韓非子》主道篇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楊權篇說：“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尸子》分篇也說：“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

雖然如上所述，在關於“道”的出發點上，《經法》與《韓非子》主道篇有所不同。但比較《經法》與《韓非子》主道篇、楊權篇及《尸子》分篇可知，這三者都有把“道”“名”聯繫在一起的傾向，都強調“名”在政治中的作用，而且都有着相同的表達方式（勿自正，名自命，事自定。），這不會是偶然的吧。關於《尸子》的成書尚有許多爭議，關於《韓非子》主道篇、楊權篇，很多學者都指出過，《韓非子》主道篇、楊權篇與解老、喻老篇可歸為一類，與五蠹、顯學等韓非自身的思想不同^[24]。木村英一認為這四篇是“韓非子後學之作”^[25]。權且不論這兩者孰前孰後，但由此說明表現出思想類似性的《經法》的成書年代也不會太早吧^[26]。如從“道”、“名”、“法”結構分析作為切入口，筆者認為把《經法》的成書年代定在戰國末期是比較妥當的。

注 釋

[1]主要的論著有：

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一冊、第四冊，文物出版社，1975年1月。（以下簡稱“文物本一”）
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以下簡稱“文物本二”）
3.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儒法鬥爭的關係》，《考古學報》，1975年1期，及其“附錄”。（以下簡稱“唐”）
4.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以下簡稱“余一”）
5. 余明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中英對照）》，岳麓書院，1993年3月。（以下簡稱“余二”）
6.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6月。（以下簡稱“陳”）
7. 鄭開、張慧姝、谷斌：《白話道教經典·黃帝四經今譯、道德經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2月。（以下簡稱“社科本”）

東京大學馬王堆帛書研究會出版了《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四度篇譯注（1997年刊行）、論篇譯注（1998年刊行）、亡論篇譯注、論約篇譯注（1999年刊行）、名理篇譯注（2001年刊行），本文所引釋文基本上依據上述譯注，不過其中也有筆者修正之處。對於沒有東京大學馬王堆帛書研究會譯注的道法篇、國次篇、君正篇、六分篇，筆者在引用時，在參考以上各出版物的基礎上，嘗試制作了個人的釋文。對於原文的字形，筆者依據文物出版社的圖版再度加以辨認，有些字形是筆者不同意諸家釋文而重新制作的。

- [2] 芳賀良信氏第一個對經法所見“刑”、“名”、“道”、“天”、“理”、“法”諸概念加以了全面的整理，並着重對“道”、“法”關係作了闡明。但筆者認為他對“名”這個關鍵概念尚未充分加以把握，對“名”、“法”關係在《經法》中的重要性尚未充分加以重視。芳賀良信《『經法』の刑名思想における思惟形式》（日本《東方學》第九十七輯，1999年/《禮と法の間隙——前漢政治思想研究》汲古書院，2000年8月）
- [3] 最初推斷四種卷前古佚書是《黃帝四經》的唐蘭學說《黃帝四經初探》（《文物》，1994年10期）對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多數學者均基本上贊成其論據，如前引的“余一”、“余二”、“陳”、“社科本”等，都認可了《黃帝四經》的稱呼。但也有學者感到明確斷定其為《黃帝四經》尚覺根據不足。如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黃帝四經〉》（《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及《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中國哲學》第二輯，三聯書店，1980年3月）就鮮明地提出了反對意見。日本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均持慎重的態度，較少使用《黃帝四經》的稱呼。不管使用不使用《黃帝四經》的稱呼，許多學者都認為四篇古佚書有着共通的思想，是一部完整的文獻。尤其是“陳”更強調它是“一人一時之作”。但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黃帝四經〉》（上引）因體裁各具等理由指出“從形式上看，四篇佚書原來不像是一部書，……它們大概是帛書的主人為了學習黃老言而抄集在一起的。”金谷治：《古佚書〈經法〉等四篇について》（《加賀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文史哲論集》，1979年3月）也認為“把‘經法’等四篇看作是一部完整的書是牽強的。四篇相互間雖有密切關係，但又各具特色，可以想見存在着時代上的差異。”具體請參照曹峰：《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に見える“道”、“名”、“法”の研究》第一節《〈經法〉の所屬學派と成書年代について》（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編《中國哲學》第16號，2001年6月）。
- [4] “水之”之後，“日平”之前當脫一“靜”字，參照東京大學馬王堆帛書研究會編《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四度篇譯注（1997年刊行）【注14】。
- [5] “水之〔靜〕日平”之後，“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長”之前，當脫“繩之口曰直”一句，參照東京大學馬王堆帛書研究會編《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四度篇譯注（1997年刊行）【注15】。
- [6] 金谷治：《先秦における法思想の展開》，日本《集刊東洋學》第47輯，1982年。
- [7] 淺野裕一：《黃老道の成立と展開》，創文社，1992年11月，59頁。
- [8] 名理篇有“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之句，其內容與君主據法操縱臣下的刑名參同術類似，但這類內容在《經法》不多見，並非其論述的主要方面，不可因此以偏概全。
- [9] “名實”後面的“不”字當為衍字。東京大學馬王堆帛書研究會編《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論篇譯注（1998年刊行）【注26】認為，如將其作為衍字，則前後相對應的句子，在字數上合不起來了，故未看作衍字，但考慮到

“定”字的意思和“靜(爭)”的意思是正相反的,筆者認為還是應該作衍字處理。此句當讀為“名和實完全相符就安定,名和實不相符,則成為矛盾的原因。”

[10]“元”後面,“謀臣”前面的“臣”字當為衍字吧。

[11]“賞”後面的字完全缺損。從前後的文意判斷,此處當指“賞罰”這類具體的政治舉措。但君正篇多見“賞伐”,“伐”即“罰”的假借字吧。因此在此補一“伐”字。

[12]此處,原文作“王=天=下”,祇有“下”字沒有重文符號,顯然是脫漏。

[13]四度篇有所謂“三名,一曰正名一曰立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乳,三曰強主威而無名。三名察則事有應矣。”(所謂三名,第一是“正名”,即處於必然的地位中且安泰無恙。第二是“倚名”,處於衰退而混亂的狀態。第三是強主也遭毀滅處於“無名”的狀態。能明察這三名就能對應各種事情了。)

[14]《管子》心術上篇中有“虛而無形謂之道”,《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道原》有“恆无(無)之初,週同大(太)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靜(靜)不貳(照)。古(故)未有以,萬物莫以。古(故)无(無)有刑(形),大週无(無)名。……人皆以之,莫知元(其)名。人皆用之,莫見元(其)刑(形)。……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則也。顯明弗能為名,廣大不能為刑(形)。”這說明名理篇中雖未點出“道”字,但通過“莫見元刑”、“莫知元名”的表現方式,可知這裏講的就是道的形態。

[15]芳賀良信:《〈經法〉の刑名思想における思惟形式》(上引)。

[16]此外,四度篇有“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論篇有“物有不合於道者,冒(謂)之失理”。論約篇有“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這些“道”指的都是“原則”、“規律”。

[17]《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6月,293頁。

[18]“余一”、“余二”、“陳”、“社科本”都將“用元德”釋為“選用有賢德的人”,但下文有“德(德)者,愛勉之[也]”,故可以認為“德”是君主對於民衆的“愛勉”之德。

[19]關於“刑名出聲,聲實調合”的“刑”“名”“聲”“實”,芳賀良信《〈經法〉の刑名思想における思惟形式》(上引)有詳細探討。筆者贊同芳賀氏把“刑名”當作“通常的刑名參同”,但不贊同把“聲”看作是表示刑名參同之結果的,例如是與“逆順”“死生”相當的概念。芳賀氏把“實”看作是例如與“逆”相對應的,“亡”“壞”等表示終結的概念,對此結論筆者不能隨從。四度篇有“聲,華[也。實]者,用也。……毋為虛聲,聲流於實,是冒威名。”可知“聲”實際上就是名,在指導實際行動的場合,“聲”事實上就是“號令”“法令”。“實”即付諸終結的實際行動。

[20]蔣樂華:《帛書〈經法〉の“天”に關する一考察—“天殃”、“天道”、“得天”等をめぐって—》,日本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創刊號,1997年3月。

[21]例如,芳賀良信:《〈經法〉の刑名思想における思惟形式》(上引),姜廣輝:《試論漢初黃老思想——兼論馬王堆漢墓出土四篇古佚書為漢書的作品》,《中國哲學史研究集刊》第二輯,1982年7月,胡家聰:《黃老帛書〈經法〉的政治哲學——兼論淵源於稷下之學》,《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文津出版社,1993年11月,第十二章第三節《〈黃帝四經〉的刑名思想》等。

[22]參照胡適:《先秦名學史》,學林出版社,1996年8月,144頁,149頁。

[23]從文意上判斷,“靜而”前面的“動而”二字是衍字。

[24]參照容肇祖:《韓非子考證》,商務印書館,1936年,木村英一:《法家思想の研究》,弘文堂,1944年、內山俊彦:《中國古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認識》,創文社,1987年1月,第七章之三“韓非學派”。

[25]木村英一:《法家思想の研究》(上引),224頁。

[26]關於《經法》成書年代之爭論,請參照曹峰:《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に見える“道”“名”“法”の研究》第一節《〈經法〉の所屬學派と成書年代について》(上引)。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校讀舉例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謝桂華

一、釋文

例 1、《二年律令·盜律》簡 63、64(釋文 143 頁):

智(知)人爲群盜而通飲(飲)食餽饋之,與同罪。弗智(知),黥爲城旦舂。其能自捕若斬之,除其罪。有(又)賞如捕斬 63 群盜法(發),弗能捕斬而告吏,除其罪,弗賞。64 整理者注:餽,通作“饋。”《周禮·王府》注:“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

《后漢書·楊震傳》注:“食也。”

按:從圖版來看,“饋”寫作“遺”,同簡“通”字左偏旁亦如此作,故應改釋作“遺”。

例 2、《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488~491(釋文 205 頁):

一、御史言,越塞關關,論未有□,請關出入塞之津關,黥爲城旦舂;越塞,斬左止(跡)爲城旦;吏率主者弗得,贖耐;令、488 丞、令史罰金四兩,智(知)其請(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傳,令以關出入者,與同罪。非其所□爲□而擅爲傳出入津關,以 489 傳令關令論,及所爲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使、官屬人、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490 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制曰:可。491

按:“論未有□”之“□”,似可補釋作“令”。“官屬人”之“人”,乃是對“屬”字下半部“蜀”中“勹”筆拖長的衍釋,應該刪去。

例 3、《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494(釋文 206 頁):

□、制詔御史,其令諸關,禁弗出私金□□。或以金器入者,關謹籍書,出復以閱,出之。籍器,飾及所股者不用此令。 493

原整理者注:“禁弗出私金‘□□’之‘□□’,下一缺字左從‘金’。”

按:“□□”,因簡文嚴重漫漶不清,殊難辨認。第一個“□”,似可補釋作“器”,第二個

“□”，疑可補釋作“鐵”。

又：“出復以閔，出之。籍器”，武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楊建同學撰寫的博士論文《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以下略稱《楊文》）指出，應改標點為“出復以閔出之籍器”，甚是。

例 4、《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498、499（釋文 207 頁）：

□、御史請諸出入津關者，詣入傳□□吏(?)里□長物色□瑕見外者及馬(識)物關舍人占者，津關謹閔，出入之。縣官馬勿職(識)物 498 者，與出同罪。·制曰：可。 499 按“里”下“□”，《楊文》補釋作“年”，甚是。“色”下“□”，疑可補釋作“疵”。又《楊文》指出，簡 498 后應接簡 503：“□□等出。·相國、御史復請，制曰：可。”似亦可從。

例 5、《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500、501（釋文 207 頁）：

□制詔相國、御史，諸不幸死家在關外者，關發索之，不宜，其令勿索(索)，具為令。相國、御史請關外官為使若繇(徭)使，有事關中，500 不[幸]死，縣道各(?)屬所官謹視收斂，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櫝，以印章告關，關完封出，勿索(索)。櫝中有禁物，視收斂及封 501

按：“關發索之”之“索”，原簡亦寫作“索”。“各(?)”，筆畫有殘缺，應改釋作“若”。又《楊文》指出，原理整者所注簡 501 後“以下缺簡”，應按簡 499：“者，與出同罪。·制曰：可。”甚是。

例 6、《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504、505（釋文 207～208 頁）：

□、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置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來，復傳，504 津關謹閔出入。馬當復入不入，以令論。·相國、御史以聞，·制曰：可。 505

按：“得私置馬關中”之“置”，乃“買”的誤釋。

例 7、《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513～515（釋文 208～209 頁）：

十五、相國、御史請郎騎家在關外，騎馬節(即)死，死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質(致)告居縣，受數而籍書 513 馬職(識)物、齒、高，上郎中。節(即)歸休、繇(徭)使，郎中為傳出津關，馬死，死所縣道官診上。其詐(詐)貿易馬及偽診，皆以詐(詐)偽出馬令論。其 514 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視，為致告關中縣道官，賣更買。·制曰：可。 515

按：“其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之“□”，似可補釋作“買”。

例 8、《奏讞書》簡 36～48（釋文 216 頁）：

·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江陵餘、丞驚讞敢(讞)之。五月庚戌，校長池曰：士五(伍)軍告池曰：大奴武亡，見池 36 亭西，西行。池以告，與求盜視追捕武。武格鬥，以劍傷視，視亦以劍傷武。今武曰：故軍 37 奴，楚時去亡，降漢，書名數為民，不當為軍奴，視捕武，誠格鬥，以劍擊傷視，它 38 如池。·視曰：以軍告，與池追捕，武以劍格鬥，擊傷視，視恐弗勝，誠以劍刺傷 39 武而捕之，它如武。·軍曰：武故軍奴，楚時亡，見池亭西。以武當復為軍奴，即告池 40 所，曰武軍奴，亡。告誠不審，它如池，武。·詰武：武雖不

當受軍弩(奴),視以告捕武,武宜 41 聽視而后與吏說話是不當狀,乃格鬥,以劍擊傷視,是賊傷人也,何解? 42·武曰:自以非軍亡奴,毋罪,視捕武,心恚,誠以劍擊傷視,吏以爲即賊傷人,存吏當罪,43,毋解。·語視:武非罪人也,視捕,以劍傷武,何解? 視曰:軍告武亡奴,亡奴罪當捕,以告捕武,武 44 格鬥傷視,視恐弗勝,誠以劍刺傷捕武,毋它解。·問武:士五(伍),年卅七歲,診如聲(辭)。·鞠之:武不 45 當復爲軍奴,□□□弩(奴)告池,池以告與視捕武,武格鬥,以劍擊傷視,視亦以劍刺傷 46 捕武,審。·疑武,視罪,敢獻(讞)之,謁報,署獄如發。·使當:黥武爲城旦,除視。·廷以聞,47 武當黥爲城旦,除視。48

按:“□□□弩(奴)告池”之“□□□”,應補釋作“軍以亡”。

例 9、《蓋廬》簡 44(釋文 279 頁)中之:“皮(彼)則失材”一句,原整理者注:“材,疑爲‘枋’字誤,讀爲‘方’。”

按:從圖版來看,“材”原簡本寫作“枋”,乃整理者誤將“枋”釋作“材”。

例 10、《蓋廬》簡 46(釋文 280 頁):

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 ……

46

按:“吾欲殺其害民者”之“殺”,原簡寫作“救”。

二、標點

例 11、《二年律令·置吏律》簡 219、220(釋文 163 頁):

縣道官有請而當爲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者,219 罰金四兩。 220

原整理者注:“‘者’字下原有重文號,衍。”實際上應標點爲“毋得徑請者。徑請者,罰金四兩。”

例 12、《二年律令·置后律》簡 377(釋文 184 頁):

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產產,大父母、大父母之同產十五日之官。

377

按:原整理者注:“‘產’下衍重文號。”實際上“產”下符號非重文號,而是頓號。又“大父母、大父母之同產”應改釋爲“大父母、父母之同產”。

三、排序

例 13、《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506 ~ 508(釋文 208 頁):

□議，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扞(扞)關、鄆關、函谷[關]、武關及諸河塞津關。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 506 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爲久久馬，爲致告津關，津關謹以籍(籍)、久案閱，出。諸乘私馬入而復以出，若出而當復入者，507 出，它如律令。御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復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制曰：可。 508

例 14、《二年律令·津關令》簡 509~511(釋文 208 頁)：

十二、相國議，關外郡買計獻馬者，守各以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謹籍馬職(識)物、齒、高移其守，及爲致告津關，津關案閱，509 津關謹以傳案出入之。詐僞出馬，馬當復入，皆以馬賈(價)訖過平令論，及賞捕告者。津關吏卒，吏卒乘塞者智(知)弗告劾，510 與同罪；弗智(知)，皆贖耐。·御史以聞，制曰：可。 511

按：《楊文》指出，例 13 之簡 507 後應接例 14 之簡 510、511；而例 13 之簡 508，應移至例 14 之簡 509 之後，均甚是。

簡 508 中之“自言在縣官”，原簡於“在”字下漏寫“所”字。原整理者注：“‘皆’與‘津’之間似有脫字。”疑可補釋作“皆爲致告津關”。

例 15、《二年律令·具律》簡 102、103(釋文 148 頁)：

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灋(讞)。相國、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段(假)吏，若丞缺，令一尉爲守丞，皆得斷獄、灋(讞)獄，102 皆令監臨庫(卑)官，而勿令坐官。 103。

按：簡 102 末尾之“皆得斷獄、灋(讞)”“獄”似應改標點爲“皆得斷獄、灋(讞)，獄”且簡 102 之後應接簡 104，至簡 106 之後(釋文 148 頁)：

事當治論者，其令、長、丞或行卿官視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縣道界也，及諸都官令、長、丞行離官有它事，104 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之官在所縣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長若真丞存者所獨斷治論有不當，令真令、長、105 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斷治論及存者之罪。唯調屬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106 且根據律文內容，當屬於囚律。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

◎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

2002年3月，由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考古古文獻研究中心李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謝桂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徐世虹教授共同發起對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的研讀交流活動，由李均明負責召集。主要參加者除上述三個單位的學者外，還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同仁。此外，曾有香港、臺灣地區及美國、韓國、日本國學者到訪研讀班。研讀地點設於中國文物研究所，得到中國文物研究所領導及該所文物考古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胡平生先生的大力支持。

迄今研讀活動已進行12次，從《二年律令》讀起，由參加者輪流主持，大家一起逐簡逐字進行校讀。已讀者有《賊律》、《盜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諸章，並從《具律》中分出《囚律》章。對各章之釋文、標點、注解皆做了充分的討論，本文所見僅為對《亡律》之前各章的校讀，對文義之深入探討擬另文發表。參與本文撰寫者（按姓氏筆劃為序）有：王昕、尹在碩、李均明、宋艷萍、沈頌金、徐世虹、張小鋒、蔣非非、蔡秀萍、謝桂華、謝洪波等。

賊 律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坐謀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按：據圖版，簡1所見“障”皆作“鄣”。關於“同產”，整理小組注云：“同產，《後漢書·明帝紀》注：‘同產，同母兄弟也。’”可備一說。我們認為，西漢時期之“同產”亦指同父所生兄弟，《漢書·孔光傳》：“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中，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明確把中山孝王劉興與定陶恭王劉康稱作漢成帝的同產弟，但他們是同父異母所生，《漢書·宣元六王傳》：“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恭王康，馮昭

儀生中山孝王興。”故西漢早期之“同產”，不可排除其包括同父異母兄弟的可能。“其坐謀反者”句之“坐”字，整理小組論：“坐，連坐。”我們認為此字亦可解釋為坐罪。

賊燔城、官府及縣官積取(聚)，棄市。燔寺舍、民[室][屋][廬][舍]、[積][取](聚)，[黥]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罰金四兩，[責](債)4所燔。鄉部、官告失、吏主者弗得，罰金各二兩。5

按：據圖版，“燔寺舍”上當有“賊”字，應釋“賊燔寺舍”。“賊燔”指故意縱火。

偽寫皇帝信璽、皇帝行璽、要(腰)斬以勾(徇)。9

按：“皇帝行璽”後之頓號當改為逗號似更妥。

橋(矯)制，害者，棄市；不害，罰金四兩。11

按：此款標點為“橋(矯)制害者，棄市；不害，罰金四兩。”似更妥。

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完為城旦舂。其誤不審，罰金四兩。12

按：整理小組將“誤不審”解釋為“偶不確切”，不甚明確。我們認為此處“誤”乃指一種過失行為，非指偶然。

[詐]諸詐(詐)增減券書，及為書故詐(詐)弗副，其以避負債，若受賞賜財物，皆坐臧(贓)為盜。其以避論，及所不當14[得為]，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兩，及毋避也，皆罰金四兩。

按：“其以避論，及所不當[得為]”句，如去掉逗號意思更為明確。

諸食脯肉，脯肉毒殺、傷、病人者，亟盡孰(熟)燔其餘。其縣官脯肉也，亦燔之。當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贓)，與盜同法。20

按：整理小組注云：“脯肉，乾肉。”乃指“脯肉”本義，簡文所指則當指已變質乾肉。

鬪而以刃及金鐵銳、錘、椎傷人，皆完為城旦舂。其非用此物而野人，折柙、齒、指，肢體，斷決鼻、耳者27，耐。其毋傷也，下爵毆上爵，罰金四兩。毆同死<列>以下，罰金二兩；其有痕瘡及□，罰金四兩。28

按：“野”整理小組注：“野，疑為‘眇’字。《說文》：‘眇，一目少也。’即一目失明。”或說此字當釋“眇”。據圖版，“斷決鼻”之“決”左旁從“月”，或當釋“朕”，與“決”通。

鬪毆變人，耐為隸臣妾。穰(懷)子而敢與人爭鬪，人雖毆變之，罰為人變者金四兩。

31

按：“爭鬪”之“爭”為簡體字，與全書體例不合，或為排版之誤，當改為“爭”。

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段(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其子有罪當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聽]。[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教人不孝，36黥為城旦舂。37

按：整理小組注：“泰，讀如‘大’。泰父，大父。”或說“泰父母”與“大母”在同一條簡文中出現，疑“泰父母”與“大父母”有區別。“父母段(假)大母”句應標點為“父母、段(假)大母”。關於“三環”，整理小組注云：“環，讀如‘還’，《說文》：‘復也’三環，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人告

其子不孝，必須經反復告三次，司法部門纔予受理。類似的法律規定亦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或說‘三環’疑指‘反復詢問三次’意。

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毆<毆>毆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38

按：整理小組注：“收，即收帑。《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注引應劭曰：‘秦法，一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據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此注引應劭文有誤，原文應作“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

以縣官事毆若毆吏，耐。所毆毆有秩以上，及吏以縣官事毆毆五大夫以上，皆隸為城旦舂。長吏以縣官事毆少吏46[者]，亦得毋用此律。47

按：整理小組注引王先謙《漢書補注》引何若瑤曰：“百官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百石以下有卒食佐史之秩為少吏。”文中“卒食佐史”當為“斗食佐史”之誤。

盜 律

盜賊(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隸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完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耐為隸臣妾。不55盈百一十錢到廿二錢，罰金四兩。不盈廿二錢到一錢罰金一兩。56

按：據圖版，“不盈百一十錢到廿二錢”句當釋“不盈百一十到廿二錢”，句式習慣見前“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每句中第一數詞皆無量詞，而第二數詞皆附量詞“錢”。“不盈廿二錢到一錢”下當設逗號。

盜盜[人]。贓(贓)，[見]存者皆以畀其主。59

按：贓乃指所盜之物，對被告而言為贓物，故此款當讀為“盜盜人。贓(贓)見存者，皆以畀其主。”似更妥當。

智(知)人為群盜而通飲(飲)食餽饋之，與同罪；弗智(知)，隸為城旦舂。其能自捕若斬之，除其罪，有(又)賞如捕斬。63 群盜法(發)，弗能捕斬而告吏，除其罪，勿賞。64

按：“智(知)人為群盜而通飲(飲)食餽饋之”之“饋”字當釋“遺”。據圖版所見，此字左旁從“辵”不從“食”。遺，贈予、致送。《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欲厚遺之。”又：“[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

群盜及亡從群盜，毆折人枳(肢)，朕體，及令彼(跛)蹇(蹇)，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及投書、縣(懸)人書，恐獨人以求65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冢(塚)，略責人若已略未責，橋(矯)相以為吏，自以為吏以盜，皆磔。66

按：或說“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句當讀斷為“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頓號前後屬兩種不同的犯罪行為。

相與謀劫人、劫人，而能頗捕其與，若告吏，吏捕頗得之，除告者罪，有(又)購錢人五萬。所捕告得者多，以人數購之，71而勿責其劫人所得贓(贓)。所告毋得者，若不盡

告其與，皆不得除罪。諸予劫人者錢財，乃爲人劫者，同居 72 智(知)弗告吏，皆與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曰，能自頗捕，若偏(徧)告吏，皆除。73

按：“而勿責其劫人所得臧(贓)”，當讀爲“而勿責(償)其劫人所得臧(贓)”。秦漢簡牘所見“償”通常皆寫作“責”。此條款所云“勿責(償)其劫人所得臧(贓)”乃指勿以購賞款抵償劫人所得贓值。

盜出財物于邊關徼，乃吏部主智(知)而出者，皆與盜同法；弗智(知)，罰金四兩，使者所以出，必有符致，毋符致，74 吏智(知)而出之，亦與盜同法。75

按：“罰金四兩”下當句斷。全文當讀“盜出財物于邊關徼，乃吏部主智(知)而出者，皆與盜同法；弗智(知)，罰金四兩。使者所以出，必有符致，毋符致，吏智(知)而出之，亦與盜同法。”此條款針對兩種情況而設，一爲盜出財物于邊關徼者，二爲使者所以出者，故其間當句斷，不應僅設逗號。

盜出黃金邊關徼，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與同罪；弗智(知)，索弗得，戍邊二歲。76

按：“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與同罪；”句當讀爲“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與同罪；”“卒”與“徒”身份不同：卒乃指戍卒之類，而徒指刑徒。

諸有段(假)於縣道官，事已，段(假)當歸。弗歸，盈二十日，以私自段(假)律論。其段(假)別在它所，有(又)物故毋道歸段(假)者，自言在 78 所縣道官，縣道官以書告段(假)在所縣道官收之。其不自言，盈廿日，亦以私自假律論。其假已前入它官及在縣道官廷(?)79

按：據圖版，“盈二十日”當釋“盈廿日”，文例見同條簡 79“其不自言，盈廿日，亦以私自假律論。”

具 律

按：原書《具律》凡 44 簡，分屬 25 條款。今據簡冊位置及內容考察，其中有 25 簡 13 條款當屬《囚律》，另有 1 簡歸屬未能確定，應從《具律》中分出。

據《張家山漢墓竹簡·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所見，《二年律令》所在是由 C 組和 F 組構成的卷冊，原爲一卷，由於外力的作用，C 組與 F 組之間已形成凹陷，C 組右側亦受衝擊，處在這兩個位置的竹簡順序與層次已錯亂，但 C 組中段簡冊層次仍分明。值得注意的是：同是 C 組中段錄出的所謂《具律》簡，却分屬圖中所見外起第二層及第三層，二者重疊，顯然不屬於同一卷層。按道理，如果《具律》條款是連貫的，不應出現重疊現象。理由爲《二年律令》之《賊律》和《盜律》凡 81 簡僅佔外起第一層稍多一點的位置，雖然第二層的周長短於首層，但無論如何也能容納 70 簡以上，今所謂《具律》凡 44 簡，却佔兩層位置，而且重疊之處比較長，顯然不合情理。再從內容考察，第二層所見無疑屬《具律》，而第三層所見當屬《囚律》：以存在重疊現象的上部中段第二層簡 82 至 86 爲例，其內容皆屬量刑加減及刑事責任年齡

等規定，與《晉書·刑法志》所云：“以《具律》具其加減”的宗旨正合，無疑為《具律》條款。而《具律》之標題簡，恰恰也位於下部中段外起第二層位置，與引引簡屬同一層，故其間當即《具律》律章所在。而與之重疊之第三層簡 93 至 98，據內容考察當屬《囚律》條款（考證詳見下文）。按層位及內容綜合分析，以下簡文或屬《具律》：

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內公孫、外公孫、內公耳玄孫有罪，其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耐以為鬼薪白粲。82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83

□殺傷其夫，不得以夫爵論。84

呂宣王內孫、外孫、內耳孫玄孫，諸侯王子、內孫耳孫，微侯子、內孫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85

吏、民有罪當笞，謁罰金一兩以當笞者，許之。有罪年不盈十歲，除；其殺人，完為城旦舂。86

□所與同鬼薪白粲也，完以為城旦舂。87

有罪當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斬左止（趾），斬左止（趾）者斬右止（趾），斬右止（趾）者府（腐）之。女子當磔若要（腰）斬者，棄市。當斬為城旦者黥為舂，當贖斬者贖黥，88 當耐者贖耐。89

按：“女子當磔若要（腰）斬者”至“當耐者贖耐”皆為對女子減刑的規定，文義當連貫，“棄市”不宜用句號，或可作“女子當磔若要（腰）斬者棄市，當斬為城旦者黥為舂，當贖斬者贖黥，當耐者贖耐。”

有罪當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為司寇，司寇耐為隸臣妾。隸臣妾及收人有耐罪，黥（繫）城旦舂六歲。黥（繫）日未備而復有耐罪，完 9。為城旦舂。城旦舂有罪耐以上，黥之。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城旦刑盡而盜賊（贓）百一十錢以上，若賊傷人及殺人，而先 91 自告也，皆棄市。92

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金一斤四兩。贖劓、黥，金一斤。贖耐，金十二兩。贖髡（遷），金八兩。有罪當府（腐）者，移內官，內官府（腐）之。119

鬼薪白粲有耐罪到完城旦舂罪，黥以為城旦舂；其有贖罪以下，笞百。120

城旦舂、鬼薪白粲有罪髡（遷）、耐以上而當刑復城旦舂，及曰黥之若刑為城旦舂，及奴婢當刑畀主，其證不言請（情）、誣 121 人；奴婢有刑城旦舂以下至髡（遷）、耐罪，黥（顏）（顏）畀主，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刑盡而賊傷人及殺人，先自告也，棄市。有罪 122 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其以亡為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 123 論命之。庶人以上，司寇、隸臣妾無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為隱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124

■具律 125

囚 律

按：“囚律”標題為筆者所加，原簡未見標題。《二年律令》諸律章之標題皆署於文末。今所見與《囚律》內容相關之末簡恰恰位於原卷冊 C 組與 F 組之間被撞擊處，此處所出簡多殘斷，則《囚律》標題簡於此被擊碎或字迹磨滅的可能極大，故未見存。

本文《囚律》條款皆從原書《具律》中擇出。《囚律》來源甚早，《晉書·刑法志》：“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為六章律，所云“網”即“囚”也。《唐律疏議》：“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里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與、廛三篇，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十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有關《囚律》的內容可從其演變的軌迹中尋求，《晉書·刑法志》述漢律：“《囚律》有詐偽生死”、“《囚律》有告劾、傳覆”、“《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故“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即將漢《囚律》一分為三。唐代又合成為《斷獄律》，《唐律疏議》：“《斷獄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里悝《囚法》而出此篇。”知唐《斷獄律》即漢《囚律》之流。故凡漢律中有關詐為生死、告劾、傳覆、繫囚、鞠獄、斷獄的條款，皆可能屬於《囚律》。《二年律令》中有許多條款內容與唐《斷獄律》相類，如：

《二年律令》簡 113 與唐《斷獄律》：“諸鞠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鞠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相類。

《二年律令》簡 93 至 98 與唐《斷獄律》：“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刑名易者：從笞入杖、從徒入流亦以所剩論，從笞杖入徒流、從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論。其出罪者，各如之”相類。

《二年律令》簡 107 到 109 與唐《斷獄律》：“諸斷罪應決配之而聽收贖，應收贖而決配之，若應官當而不以官當及不應官當者，各依本罪，減故、失一等。”又“諸斷罪應絞而斬，應斬而絞，徒一年；自盡亦如之。失者，減二等。即絞訖，別加害者，杖一百。”又“諸縱死罪囚，令某逃亡，後還捕得及囚已身死，若自首，應減死罪者，其獲囚及死首之處，即須遣使速報應減之所，有驛處發驛報之。若稽留使不得減者，以入人罪故、失論減一等”相類。

凡與唐《斷獄律》內容相類的簡文，屬《囚律》的可能極大。而《二年律令·具律》存有《囚律》條款之直接證據見於西北出土漢簡，如《敦煌縣泉漢簡釋粹》：“囚律：劾人不審為失，以其贖半論。”與《二年律令》簡 112 文句相似；又《居延新簡》EPT10·2A：“囚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所涉為訴訟關係中的受理機構及司法權，《二年律令》類似條款見簡 101、102 等。據上述現象，原《二年律令·具律》中所引下列簡文當屬《囚律》：

鞠(鞠)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止(趾)為城旦，它各以其

罪論之。其當毆(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93 罰歲金八兩；不盈歲者，罰金四兩。94 □□□□兩，購、沒入、負償，各以其直(值)數負之。其受賕者，駕(加)其罪二等。所予藏(贓)罪重，以重者論之，亦駕(加)二等。其非故也，而失不 95 □□以其贖論之。爵戍四歲及毆(繫)城旦舂六歲以上罪，罰金四兩。贖死、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贖斬宮、贖刺黥、戍不盈 96 四歲，毆(繫)不盈六歲，及罰金一斤以上罪，罰金二兩。毆(繫)不盈三歲，贖耐、贖遷(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購、沒入、負償、償日作縣 97 官罪，罰金一兩。98

按：簡 94 之“不盈歲者，罰金四兩”文末位於簡之中段偏上，亦當為一法律條款之末尾，故其下之簡 95 當屬另一條款之首簡，應分開。“而失不□□以其贖論之”句，“不”下一字當釋“審”。審，確實、明悉。《二年律令》簡 112 見“劾人不審，為失。”《二年律令·賊律》：“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完為城旦舂。其悞不審，罰金四兩。”整理小組注：“悞不審，偶不確切。”

一人有數□罪毆，以其重罪罪之。99

按：依釋文通假慣例，“毆”可作“毆(也)”。

□□□□□，以其罪論之。完城旦舂罪，黥之。鬼薪白粲罪，黥以為城旦舂。其自出者，死罪，黥為城旦舂；它罪，完為城旦舂。100

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遠其縣廷者，皆得告所在鄉，鄉官謹聽，書其告，上縣道官。廷士吏亦得聽告。101

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灋(讞)。相國、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假(假)吏，若丞缺，令一尉為守丞，皆得斷獄、灋(讞)獄，102 皆令監臨庫(卑)官，而勿令坐官。103

事當治論者，其令、長、丞或行鄉官視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縣道界也，及諸都官令、長、丞行離官有它事，104 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之官在所縣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長若真丞存者所獨斷治論有不當者，令真令、長、105 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斷治論及存者之罪。唯謁屬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106

按：上引簡 102 至 106 文連貫，當屬同一條款。但簡 103 “皆令監臨庫(卑)官，而勿令坐官。”不當列于此，也未能確定其屬何律章。又簡 102 與 104 當連讀為“……相國、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假(假)吏，若丞缺，令一尉為守丞，皆得斷獄、灋(讞)。獄事當治論者，其令、長、丞或行鄉官視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其中“皆得斷獄、灋(讞)”之句式與簡 102 文首“縣道官丞毋得斷獄及灋(讞)”同。

告，告之不審，鞠之不直，故縱弗刑，若論而失之，及守將奴婢而亡之，篡遂縱之，及諸律令中曰同法、同罪，其所 107 與同當刑復城旦舂，及曰黥之，若鬼薪白粲當刑為城旦舂，及刑畀主之罪也，皆如耐罪然。其縱之而令亡城旦 108 舂、鬼薪白粲也，縱者黥為城旦舂。109

證不言請(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獄未鞠而更言請(情)者，除。吏謹先以辨告證。110

譯訊人為詐(詐)偽，以出入罪人，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111 劾人不審，為失；其輕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為不直。112

治獄者，各以其告勅治之。敢放訊杜雅，求其它罪，及人毋告勅而擅覆治之，皆以鞠獄故不直論。113

罪人獄已決，自以罪不當欲气(乞)鞠者，許之。气(乞)鞠不審，駕(加)罪一等；其欲復气(乞)鞠，當刑者，刑乃聽之。死罪不得自气(乞)114鞠，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爲气(乞)鞠，許之。其不審，黥爲城旦舂。年未盈十歲爲气(乞)鞠，勿聽。獄已決盈一歲，不115得气(乞)鞠。气(乞)鞠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气(乞)鞠，上獄屬所二千石官員，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116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117

按：此款首簡“罪人獄已決，自以罪不當欲气(乞)鞠者，許之。”當標點爲“罪人獄已決，自以罪不當，欲气(乞)鞠者，許之。”“當”指相稱、相當。“不當”乃指判決不公正，罪刑不相稱。

毋敢以投書者言毆(繫)治人。不從律者，以鞠獄故不直論。118

告 律

殺傷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殺傷主、主父母妻子，自告者皆不得減。告人不審，所告者有它罪與告也罪等以上，告者不爲不審。132

按：“所告者有它罪與告也罪等以上”句原簡脫“告”字，釋文補上後按凡例規定應以[]號括出。“所告者”乃指被告。

捕 律

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強盜，即發縣道，縣道亟爲發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將，令兼將，亟詣盜賊發及之所，以窮追捕之，毋敢□140界而環(還)。吏將徒，追求盜賊，必伍之，盜賊以短兵殺傷其將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邊二歲。三十日中能得其半以上，盡除其罪；141得不能半，得者獨除；·死事者，置後如律。大瘐臂臑股肱，或誅斬，除。與盜賊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還142留畏栗弗敢就，奪其將爵一級<級>，免之，毋爵者戍邊二歲，而罰其所將吏徒以卒戍邊各一歲。興吏徒追盜賊，已受令而遁，以畏栗論之。143

按：“三十日中能得其半以上”之“三十”當釋“卅”。整理小組此條注釋[六]所引《漢書·祭彤傳》：“伐匈奴，坐逗留畏懦，下獄死。”或有誤。經查，《漢書》無此人傳。類此內容見《後漢書·祭遵傳》：“[祭]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

捕盜賊、罪人，及以告勅逮捕人，所捕格鬪而殺傷之，及窮之而自殺也，殺傷者除，

其當購賞者，半購賞之。殺傷 152 群盜、命者，及有罪當命未命，能捕群盜、命者，若斬之一人，免以爲庶人。所捕過此數者，贖如律。153

按：簡 152“捕盜賊……殺傷”與簡 153“羣盜、命者……贖如律。”文義不能相連，當分屬兩個不同的條款。

亡 律

隸臣妾、收人亡，盈卒歲，毆（繫）城旦舂六歲；不盈卒歲，毆（繫）三歲。自出毆，□□。其去毆（繫）三歲亡，毆（繫）六歲；去毆（繫）六歲亡，完爲城旦舂。165

按：“自出毆”按通假慣例，可作“自出毆（也）”。據圖版，“□□”當釋“笞百”。“笞百”爲常見刑罰等次之一，同律章簡 159 見“……其自出毆（也），若自歸主，主親所智（知），皆笞百。”又簡 164 見“城旦舂亡，黥，復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皆笞百。”簡 165“自出毆（也）”乃指文首“臣妾、收人”之行爲，故“自出毆（出）”之前不宜句斷，而用分號較妥。全文可釋讀爲“臣妾、收人亡，盈卒歲，毆（繫）城旦舂六歲；不盈卒歲，毆（繫）三歲；自出毆（也），笞百。其去毆（繫）三歲亡，毆（繫）六歲；去毆（繫）六歲亡，完爲城旦舂。”

諸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不智（知）其亡，盈五日以上，所舍罪當黥□贖耐；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隸臣妾、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170 贖耐。171

按：據圖版，□處似無字。按本簡見“盈五日以上，所舍……”體例，文末或可作“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贖耐。”

取亡罪人爲庸，不智（知）其亡，以舍亡人律論之。所舍取未去，若已去後，智（知）其請（情）而捕告，及誦（誦）告吏捕得之，皆除其罪，勿購。172。

按：簡號“172。”所見之句號或爲誤排，當去掉。

收 律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其子有妻、夫，若爲戶、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爲人妻而寡、寡者，一七四皆勿收。坐奸、略妻及傷其妻以收，毋收其妻。一七五

按：據圖版，“罪人完城旦”後無“舂”字。

雜 律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壞決道出入，及盜啓門戶，皆贖黥。其垣壞高不盈五尺者，

除。 一八二

按：“越邑里、官市院垣”句，當讀爲“越邑、里、官、市、院垣”。

捕罪人及以縣官事征召人，所征召、捕越邑里、官市院垣，追捕、征者得隨迹出入。

一八三

按：“捕越邑里、官市院垣”句，當讀爲“捕越邑、里、官、市、院垣”。

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者，而敢字貸錢財者，免之。 一八四

按：“宦皇帝”，整理小組注“在朝中爲官”。這一概念史籍中或僅見於《漢書·惠帝紀》，即“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系”，而《二年律令》則迭見。原注較爲寬泛，有關其含義，可參見閻步克先生的《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日本學者好並隆司的《關於張家山漢簡律文中的“宦皇帝”》（《別府大學大學院紀要》第5期，2003年3月）。

“字貸錢財”，整理小組注：“字，《孝經援神契》：‘言孳乳浸多也。’字貸，疑指以高利貸獲利。”《史記·貨殖列傳》“子貸金錢千貫”，《索隱》案：“子謂利息也。”

復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爲城旦舂。復男弟兄子、孝（季）父柏（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爲城旦。 一九五

按：據圖版，簡末“皆完爲城旦”後有字迹，似爲“舂”，可讀爲“皆完爲城旦舂”。

錢 律

盜鑄錢及佐者，智（知）人盜鑄錢，爲買銅、炭，及爲其行新錢，若爲通之，而能頗相捕，若先自告、告其與，吏捕，二〇六頗得之，除捕者罪。 二〇七

按：據圖版，“若先自告”的“若”後還有一字，然不能辨識，故當釋爲“若□先自告”。

置吏律

□□□□有事縣道官而免斥，事已，屬所吏輒致事之。其弗致事，及其人留不自致事，二一一盈廿日，罰金各二兩，有（又）以亡律駕（加）論不自致事者。 二一二

按：“斥”整理小組注引《漢書·武帝紀》“無益於民者斥”注“斥，謂棄逐之”。《史記·田叔列傳》：“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免斥”一詞，居延漢簡亦屢見。如 EPT 五一：三一九簡：“●甲渠言樞庭士吏李奉、蹇長陳安國等年老病，請斥免，言府。●一事集封□。”又 EPT 六八：一二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故“免斥”似應是一個單獨的概念。

郡守二千石官、縣道官言邊事急者，及吏遷徙、新爲官、屬尉、佐以上毋乘馬者，皆得爲二一三駕傳。縣道官之計，各關屬所二千石官。其受恒秩氣稟，及求財用年輸，郡

關其守，中關 二一四內史。

按：“新爲官、”當讀爲“新爲官，”。又，注釋〔五〕中的“常秩”，當去“秩”字。

縣道官有請而當爲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者二一九，罰金四兩。 二二〇

按：據圖版，“毋得徑請。徑請者者罰金四兩”之原文爲“毋得徑 = 請 = 者 = 罰金四兩”，“徑請者”三字下各有一重文號，故當釋爲“毋得徑請者，徑請者罰金四兩”，注釋〔三〕亦可刪去。

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 二二一

按：整理小組注：“姬，衆妾之總稱。”據《史記·呂太后本紀》注：“《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姬似與八子、孺子、良人同爲妾的稱號，故似應讀爲“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

傳食律

發傳□□□□，度其行不能至者□□□□長官皆不得釋新成。使非有事，及當釋駕新成也，毋得以傳食焉，二二九而以平賈（價）責錢。非當發傳所也，毋敢發傳食焉。爲傳過員，及私使人而敢爲食傳者，皆坐食臧（贓）爲盜。 二三〇

按：據圖版，“發傳□□□□”之第三字，左邊“戶”字可識，以下文“發傳所”見之，或可釋爲“所”字。第六字似可釋爲“衛”字。

使者非有事，其縣道界中也，皆毋過再食。其有事焉，留過十日者，粟米令自二三四炊。以詔使及乘置傳，不用此律。

按：“使者非有事，其縣道界中也”，當讀爲“使者非有事其縣道界中也”。

田律

馬、牛、羊、犍、鹿食人稼穡，罰主金馬、牛各一兩，四犍若十羊、鹿當一牛，而令犍(?)稼償主。

按：參以第一一簡“犍(矯)制，害者，棄市；不害，罰金四兩”的圖版可知，此處“令”字後一字確爲“犍”字無疑，原釋文中“(?)”可去。

行書律

十里置一郵。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郵。 二六四

按：“南郡江水以南”與“至索南水”之間似不應斷開，連讀可能意思更通順。

令郵人行制書、急事、復，勿令爲它事。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北地、上、隴西，卅里一郵；地陷陝不可郵者，二六六得進退就便處。

按：“急事、”當讀爲“急事，”。若按照原斷句，則“復”字的意義無法解釋清楚。“復”爲返回或回去之意，屈原《九章·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復。”

復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鷄創中五郵，郵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戶，毋租其田一頃，勿令出租、郵粟。 二六八

按：原注“下辨、故道，道名，在武都郡”，有誤。漢初並沒有設置武都郡，武都郡設置於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曹參跟從高祖“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櫟”。《索隱》依據《地理志》，認爲下辨、故道乃二縣名，皆屬武都郡。此可能爲注者所本，一仍其誤。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年)認爲：故道縣位於秦嶺北坡，控制入蜀故道，疑秦時屬內史，項羽封十八諸侯王時，以屬雍王章邯。下辨亦是出蜀的另一道，由此北出至隴西西縣而後轉東，亦通雍、櫟。下辨秦時屬隴西，亦是章邯所屬縣，漢初因秦制。武帝元鼎六年，隴西分南部武都道、下辨道一帶以成武都郡。

發致及有傳送，若諸有期會而失期，乏事，罰金二兩。非乏事也，及書已具，留弗行，行書而留過旬，皆二六九盈一日罰金二兩。 二七〇

按：“非乏事也”句後疑有漏抄，或當爲“罰金一兩”。又，原注“乏，廢”。或以爲“乏事”爲一詞，不能分開解釋。《戰國策·趙策二》：“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乏事，意爲荒廢政事。

諸行書而毀封者，皆罰金二七四一兩。書以縣次傳，及以郵行，而封毀，□縣□劾印，更封而署其送徹(檄)曰：封毀，更以某縣令若丞印封。 二七五

按：“□縣□劾印”的首字雖不清楚，但有殘迹。經詳審，該字中間不清，而左右尚有殘留筆迹。從其左邊和右下部的筆迹看，似是“讞”旁；從右上部的殘迹看，似是“𠂔”字。又與第二七三簡清晰的“過”字圖版比較，疑是“過”字。第三字或可釋爲“所”？

諸獄辟書五百里以上，及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皆以郵行。 二七六

按：“辟書”，整理小組引《文選·詣蔣公奏記》，注爲“辟，猶召也”。《左傳·文公六年》“辟獄刑”杜注：“辟猶理也。”居延漢簡所見“推辟”之語，亦爲推究驗治之義。《流沙墜簡·流沙墜簡補遺·考釋》之八：“推辟者，《魏志·荀攸傳》‘及推問權果殺人亡命’，六朝以後均謂讞獄爲推，則推辟謂驗治也。”是以“辟書”爲調查、治理之書。

賜 律

賜衣者六丈四尺、緣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緣丈、絮二斤，袴(袴)二丈一尺、絮一斤半，衾五丈二尺、緣二丈六尺、絮十一斤。五大夫以上二八二錦表，公乘以下緹表，皆帛裏；司寇以下布表、裏。二月盡八月賜衣、襦，勿予裏、絮。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賜衣襦、棺及官衣常(裳)。二八三郡尉，賜衣、棺及官常(裳)。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

居縣賜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縣賜棺。 二八四

按：依照簡文內容及各簡形制和字體看，二八四簡當下接二八九簡。

賜棺享(榘)而欲受齋者，卿以上予棺錢級千、享(櫛)級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錢級六百、享(櫛)級三百；毋爵者棺錢三百。 二八九

按：二八九簡當上接二八四簡。

賜吏酒食，衛(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吏肉十斤，佐吏八斤，酒七升。 二九七

按：疑下接三〇二簡。

賜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 三〇二

按：疑上接二九七簡。

戶 律

田典更挾裏禽(鎗)，以時開；三〇五伏閉門，止行及作田者；其獻酒及乘置乘傳，以節使，救水火，追盜賊，皆得行，不從律，罰金二兩。 三〇六

按：關於“伏”的注釋，可參見《風俗通·佚文》之“辨惑”：“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卿以上所自田戶田，不租，不出頃鋤粟。 三一七

按：或疑“自”字爲“占”字之誤，因爲二字字形極爲相似。

諸不爲戶，有田宅，附令人名，及爲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邊二歲，沒入田宅縣官。爲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三二三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 三二四

按：“諸不爲戶，有田宅”當讀爲“諸不爲戶有田宅”。

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雜案戶籍，副藏(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並封。留弗移，移不並封，三二八及實不徙數盈十日，皆罰金四兩；數在所正、典弗告，與同罪。鄉部嗇夫、吏主及案戶者弗得，罰金三二九各一兩。 三三〇

按：“數在所正、典弗告”，當讀爲“數在所，正、典弗告”。此處“告”爲舉報、報告之意。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三三一官嗇夫印封，獨別爲府，封府戶；節(即)有當治爲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嗇夫發，即雜治爲；三三二藏(藏)□已，輒復緘閉封藏(藏)，不從律者罰金各四兩。

按：“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當讀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

寡夫、寡婦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瘡(瘡)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三四二異其子；令毋它子，欲令歸戶入養，許之。 三四三

按：此處云“寡夫”，不云“鰥夫”，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喪婦者云鰥、喪夫者名寡”有所不同。

效 律

實官史免徒，必效□。 三四九

按：“實官史免徒”應讀爲“實官史免、徒”，因爲免與徒指免官與調任（或調離）兩種不同情況，且這樣句讀，也與三五〇簡的句讀體例一致。

出實多於律程，及不宜出而出，皆負之。 三五二

按：原注釋爲：“出實，超出實有數，參看《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之‘計脫實及出實多於律程’條。”有誤。此處“出”，意爲支出、支付。“出實多於律程”一句意爲：“支出（或支付）時，實際多於律程所規定的”。

傳 律

當士（仕）爲上造以上者，以適（嫡）子；毋適（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長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傳，須其傳，各以其傳三六一時父定爵士（仕）之。父前死者，以死時爵。當爲父爵後而傳者，士（仕）之如不爲後者。 三六二

按：“當士（仕）爲上造以上者”一句中的“（仕）”，可徑直刪去，下文亦同。《說文》釋“士”，其一義爲“事”，其引《白虎通》爲左證；一義爲“任事”。又，“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傳”之圖版爲“若次其父所 = 以 = 未傳”，“所”與“以”下各有一重文號，故應釋爲“若次其父所以，所以未傳”。又，簡三五九～三六二的內容，可與尹灣漢簡的內容參讀。

不更以下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歲，皆傳之。公士三六四、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隱官子，皆爲士五（伍）。疇官各從其父疇，有學師者學之。 三六五

按：“小爵”，原注釋爲“從律文看，指有爵的青年”，不確。從簡文看，小爵是指傳籍以前雖未成年，但已取得爵位的男子。又，簡號三六四當與其後的頓號互易。

置後律

疾死置後者，微侯後子爲微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子。關內侯後子爲關內侯，卿侯（後）子爲公乘，【五大夫】後子爲公大夫，公乘後子爲官三六七大夫，公大夫後子爲大夫，官大夫後子爲不更，大夫後子爲簪裹，不更後子爲上造，簪裹後子爲公士，其毋適（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 三六八

按：三七二簡“女子比其夫爵”或可綴于三六八簡之下。

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產產、大父母、大父母之同產十五日之官。三
七七

按：原注云：“產”下衍重文號。查圖版，“產”下非重文號，而為一“ \angle ”形，為句讀符號，在本句中起頓號作用。《流沙墜簡·烽燧類》四十五王國維考證云：“第四十六簡（當為第四十五簡之誤），隊長四人，前三人名下皆書 \angle 以乙之，如後世之施句讀。蓋以四人名相屬，慮人誤讀正文也。”又，原簡圖版在“大父母”的“父母”二字下各有一重文號，即“父=母=”，因此此處應為“父母”二字的重文。原文當釋為“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產、大父母、父母之同產十五日之官”。

死毋後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為庶人，以□人律□之□主田宅及于餘財。奴婢多，
代戶者毋過一人，先用勞久、有三八二□子若主所言吏者。三八三

按：據圖版，“以□人律□之”之“以”下尚存“庶”字殘筆，“律”下為“論”字的可能性最大，謂奴婢被解放為平民後，即按對待平民的法律執行。

女子為父母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
死，妻得復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三八四

按：據圖版，此句“父”當釋“戶”，字形作“戶”；“母”當釋“毋”，字形作“毋”，此二字之清晰寫法亦見于《二年律令》三七九簡，全句當通讀為“女子為戶，毋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

□□□長(?)次子，□之其財，與中分。其共為也，及息。婢御其主而有子，主死，
免其婢為庶人。三八五

按：據圖版，“□之其財”之“□”當為“畀”字殘迹，文例見《二年律令》三八四簡：“棄妻，畀之其財”。又“與中分。其共為也，及息”不當句讀，當連讀為“與中分其共為也及息”，意謂平分其共有財產及財產所產生的新效益。

興 律

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
官令毋害都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三九六丞謹掾，當論，乃告縣道官以從
事。徹侯邑上在所郡守。三九七

按：整理小組注云：“掾，佐助，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細查圖版，“掾”當釋“錄”，指將毋害都吏報告的情況記錄在案，如果應當論處，則指令下屬縣道官執行。“從事”指遵照執行，漢簡屢見。又，整理小組注云：“此條律文或當入《具律》。”《晉書·刑法志》述魏定《新律》前的法律體系時云“是時承用秦漢舊律，……《興律》有上獄之文”，可與該律文互證，故不當入《具律》。

當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盜去署及亡盈一日到七日，贖耐；過七日，耐為
隸臣；過三月(日)，完為城旦。三九八

按：整理小組認為原簡文“三月”為“三日”之誤，當非是。按當時的刑罰等序，完為城旦重于耐為隸臣，既然逃亡過七天耐為隸臣，則過三天反而完為城旦是不合理的，故原簡文“過三月”當無誤。關於刑罰等序，參見《盜律》：“盜賊（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完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錢，耐為隸臣妾……。”

金布律

帛、□食之四二一各半其馬牛食。

按：據圖版，“□”當釋作“𠂔”。又，注釋〔三〕所引《說文》，在“馬一歲也。……讀若弦”前當補入“馬”字。

租、質、戶賦、園池入錢四二九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

按：“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一句，當讀為“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

亡、毀、傷縣官器財物，令以平賈（價）償。入毀傷縣道官，賈（價）以減償。四三四
按：“入毀傷縣道官”當讀作“入毀、傷縣道官。”

秩 律

●御史大夫，廷尉，內史，典客，中尉，車騎尉，大僕，長信詹事，少府令，備塞都尉，郡守、尉，衛（衛）將軍，衛（衛）尉，漢四四〇中大夫令，漢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

按：注釋〔四〕中的“掌檄循京師”之“檄”，為“徼”之誤。

史 律

□□，大史官之；郡，郡守官之。卜，大卜官之。史、人（卜）不足，乃除佐。 四八一

按：“史、人（卜）不足”之“人”可釋為“卜”，此句讀作“史、卜不足，乃除佐”。

謁任史、卜，上計修法。謁任卜學童，令外學者，許之。□□學佯敢擅縣（徭）使史、卜、祝學童者，罰金四兩。史、卜年五十六，四八四佐為吏盈二歲，年五十六，皆為八更；六十，為十二【更】。五百石以下至有秩為吏盈十歲，年當睨老者，為十二更，踐更□□。四八五疇尸、菑御、杜主樂皆五更，屬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踐更大祝。四八六

按：首句當讀為“謁任史、卜上計修法，謁任卜學者令外學者，許之。”又據圖版，四八五簡下端當為無字空白，故釋文“□□”當去之。四六八簡當另起一行。

津關令

一、御史言，越塞關關，論未有□，請關出入塞之津關，黔爲城旦舂；越塞，斬左止（趾）爲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贖耐；令、四八八丞、令史罰金四兩。智（知）其請（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傳，令以關出入者，與同罪。非其所□爲□而擅爲傳出入津關，以四八九傳令關令論，及所爲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人、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四九〇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制曰：可。 四九一

按：據圖版，簡四八九末有缺字，“以傳令關令論”當釋爲“以□傳令、關令論”。簡四九〇“官屬人”之“人”爲衍文，當爲“官屬”。“以傳令關令論，及所爲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人、軍吏卒乘塞者”句當讀爲“以□傳令、關令論。及所爲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軍吏卒乘塞者”。

□、制詔御史，其令諸關，禁毋出私金□□。或以金器入者，關謹籍書，出復以聞，出之。籍器、飾及所服者不用此令。 四九三

按：據圖版，“禁毋出私金□□”當釋爲“禁毋出私金器金□”，“或以金器入者”當釋爲“其以金器入者”。“出復以聞，出之。籍器、飾及所服者不用此令”句當讀爲“出，復以聞，出之。籍器、飾及所服者不用此令”。“籍器”指借用的公家器。

□、相國、御史請緣關塞縣道群盜、盜賊及亡人越關、垣離（籬）、格塹、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隨出入服迹窮追捕。令四九四將吏爲吏卒出入者名籍，伍人閱具，上籍副縣廷。事已，得道出入所。出人盈五日不反（返），伍人弗言將吏，將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論之。 四九五

按：“事已”當釋爲“事已”。“出人盈五日不反”當釋爲“出入盈五日不反”。又，“相國、御史請”後可加冒號，下文亦同；“關”是垣離（籬）、格塹、封刊的定語，故其後頓號可去。

□、相國上內史書言，請諸詐（詐）襲人符傳出入塞之津關，未出入而得，皆贖城旦舂；將吏智（知）其請（情），與同罪。●御史以聞，●制四九六曰：可，以□論之。 四九七

按：“御史以聞”句當讀爲“御史以聞”。

□、御史請諸出入津關者，詣入傳□□吏（？）里□長物色□瑕見外者及馬職（識）物關舍人占者，津關謹聞，出入之。縣官馬勿職（識）物四九八者，與出同罪。●制曰：可。

四九九

按：據圖版，“詣入傳”當釋爲“皆以”。“里□長物色□瑕見外者”當釋讀爲“里、年、長、物、色、疵瑕見外者”。根據簡文內容，簡四九九當聯綴於簡五〇一之後。

□、制詔相國、御史，諸不幸死家在關外者，開發索之，不宜，其令勿索（索），具爲令。相國、御史請關外人宜爲吏若繇（徭）使，有事關中，五〇〇不□幸死，縣道各（？）屬所官

謹視收斂，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橫櫝，以印章告關，關完封出，勿索（索）。橫櫝中有禁物，視收斂及封。 五〇一

按：“制詔相國、御史，”可讀作“制詔相國、御史：”，“諸不幸死家在關外者”當讀爲“諸不幸死，家在關外者”。據圖版，“縣道各(?)屬所官”當釋爲“縣道若屬所官”。根據簡文內容，簡五〇一後應編連簡四九九，新的編連方式及釋讀當爲“□、制詔相國、御史：諸不幸死，家在關外者，關發索之，不宜，其令勿索（索），具爲令。相國、御史請關外人宦爲吏若縣（徭）使，有事關中，五〇〇不幸死，縣道若屬所官謹視收斂，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橫櫝，以印章告關，關完封出，勿索（索）。橫櫝中有禁物，視收斂及封五〇一者，與出同罪。●制曰：可。四九九”對此，楊建先生已有詳論，參見氏着博士論文《西漢津關制度研究》所附《〈津關令〉簡釋》。

九、相國下〈上〉內史書言，函谷關上女子廟傳，從子雖不封二千石官，內史奏，詔曰：入，令吏以縣次送至徙所縣。縣問。審有引書，毋怪，五〇二□□□等出。●相國、御史復請，制曰：可。 五〇三

按：據圖版，簡五〇三之“出”當釋爲“比”，又該簡上部殘斷，故當另起一行，釋爲“等比。●相國、御史復請，制曰：可。”

□、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置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爲書告津關，來，復傳，五〇四津關謹聞出入。馬當復入不入，以令論。●相國、御史以聞，●制曰：可。 五〇五

按：據圖版，“得私置馬關中”當釋爲“得私買馬關中”。

□議，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扞（扞）關、鄆關、函谷【關】、武關及諸河塞津關。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五〇六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爲久久馬，爲致告津關，津關謹以籍（籍）、久案閱，出。諸乘私馬入而復以出，若出而當復入者，五〇七出，它如律令。御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復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制曰：可。 五〇八

按：根據簡文內容，簡五〇八應編連於簡五〇九之後，簡五〇七之後當聯綴簡五一〇、五一一。新的編連方式及釋讀當爲“□議，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扞（扞）關、鄆關、函谷【關】、武關及諸河塞津關。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五〇六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爲久久馬，爲致告津關，津關謹以籍（籍）、久案閱，出。諸乘私馬入而復以出，若出而當復入者，五〇七津關謹以傳案出入之。詐僞出馬，馬當復入不復入，皆以馬賈（價）訛過平令論，及賞捕告者。津關吏卒、吏卒乘塞者智（知），弗告劾，五一〇與同罪；弗智（知），皆贖耐。●御史以聞，制曰：可。五一一”。對此，楊建先生亦有詳論，參見氏着博士論文《西漢津關制度研究》所附《〈津關令〉簡釋》。

十二、相國議，關外郡買計獻馬者，守各以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謹籍馬職（識）物、齒、高，移其守，及爲致告津關，津關案閱，五〇九津關謹以傳案出入之。詐僞出馬，馬當復入不復入，皆以馬賈（價）訛過平令論，及賞捕告者。津關吏卒、吏卒

乘塞者智(知),弗告劾,五一〇與同罪;弗智(知),皆贖耐。●御史以聞,制曰:可。

五一—

按:根據圖版及簡文內容,簡五一〇、五一—應編連於簡〇七之後,簡五〇九之後當聯綴簡五〇八。又“自言在縣官”句“在”下脫“所”字,“皆津關”之“皆”字當為“告”字的誤寫。新的編連方式及釋讀當為“十二、相國議,關外郡買計獻馬者,守各以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謹籍馬職(讖)物、齒、高,移其守,及為致告津關,津關案閱,五〇九出,它如律令。御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復入而死亡,自言在[所]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告>津關。制曰:可。五〇八”。對此,楊建先生亦有詳論,參見氏着博士論文《西漢津關制度研究》所附《<津關令>簡釋》。

十三、相國上內史書言,諸以傳出入津關而行□子□未盈一歲,與其母偕者,津關謹案實籍書出入。●御史以聞,制曰:可。 五一二

按:根據簡文內容,“諸以傳出入津關而行□子□未盈一歲”疑為“諸以傳出入津關而新產子若未盈一歲”。“津關謹案實籍書出入。”句當讀為“津關謹案,實,籍書出入。”

十五、相國、御史請郎騎家在關外,騎馬節(即)死,得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質<致>告居縣,受數而籍書五一三馬職(讖)物、齒、高,上郎中。節(即)歸休、繇(徭)使,郎中為傳出津關,馬死,死所縣道官診上,其詐(詐)貿易馬及偽診,皆以詐(詐)偽出馬令論。其五一四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視,為致告關中縣道官,賣更買。●制曰:可。 五一五

按:“其五一四不得□及馬老病不可用”句文意不明,疑有脫簡。

廿一、丞相上長信詹事書,請湯沐邑在諸侯,屬長信詹事者,得買騎、輕車、吏乘、置傳馬,關中比關外縣。丞相、御史以聞,●詔 五一九

按:據圖版,“詔”當釋為“制”。根據文意,“請湯沐邑在諸侯,屬長信詹事者,得買騎、輕車、吏乘、置傳馬,關中比關外縣。”句當讀為“請湯沐邑在諸侯屬長信詹事者,得買騎、輕車、吏乘、置傳馬關中,比關外縣。”

律令二十□種 五二六

按:據圖版,“律令二十□種”似為“律令二十九種”。又,王莽之前的“二十”均寫作“廿”,此處則為“二十”。

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的老年政策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宋艷萍

◎ 地質出版社 趙根華

“孝”在漢代佔有重要的社會地位，在漢代的文獻中，關於宣揚孝道的例子舉不勝舉，特別是漢武帝之後，注重倫理綱常的儒家和政治相結合，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更得以提高。武帝之後形成的種種老年優待政策都有文獻可查，但漢初一直缺乏可考的文獻資料，張家山漢簡的出土為我們研究漢初老年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

“孝”一直被漢代統治者所注重和宣揚，可以說漢代是以“孝”治天下。漢宣帝便明確下令：“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1]宣帝以“孝”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到了東漢，“孝”更成為指導政治生活的準則。圍繞孝道，漢代已形成了贍養老人的相關政策，我們從張家山漢簡中就可窺其一斑。“孝”在漢代不僅存在於道德層面，在法律中也得以充分體現，東漢著名公羊學家何休認為“罪莫大於不孝”，將不孝放在了罪惡之首。何休認為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這三種行為要處以梟首的極刑。當代學者陳谷嘉先生指出：“漢承秦制，秦代前期曾推行的把‘孝’作為重要的法律，在漢代仍然如此，並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漢代法律規定，不孝不僅僅是道德譴責的問題，而且會受到法律的重判。‘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要‘斬首梟之’。”^[2]這一點從張家山漢簡中便得以充分體現。

從張家山漢簡可以看出，老年人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國家以嚴酷的法律對其權益加以保護。對子不孝父母處罰非常嚴厲，如《二年律令·賊律》中說：“子賊殺傷父母，

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賊殺傷就是故意殺傷，如果兒子故意傷害父母，就要處以在集市中梟首示衆的極刑。如果兒子圖謀殺父母但卻沒得逞，這種現象也不能姑息，要處以棄市的極刑。如《二年律令·賊律》中規定“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毆（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這條律令規定了三種犯罪行徑：一種是子牧殺父母，第二是子毆打辱罵父母的長輩以及與其有名義母子關係的人，第三是父母告子不孝，這三種情況子都要被棄市。什麼是“牧殺”？《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對其解釋為：“可（何）謂牧？·欲賊殺主，未殺而得，爲牧。”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認為：“牧，讀爲謀。”牧殺也就是謀殺。謀殺在秦漢時期是很嚴重的罪行，在量刑時和有實際行動的罪行一樣嚴懲不貸。兒子殺害長輩是萬惡不赦的，即使殺傷人後投案自首也無濟於事，《二年律令·告律》中規定：“殺傷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殺傷主、主父母妻子，自告者皆不得減。”兒子殺害父母被處極刑，他的妻子也要負法律責任，被收到官府去作勞役。漢初不僅規定兒子要孝敬長輩，而且媳婦也要孝敬夫的長輩，否則也要處以極刑。《二年律令·賊律》中規定：“婦賊傷、毆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後母，皆棄市。”從先秦時期人們就形成了夫婦一體的概念，《公羊傳》認為：“夫人與公一體也。”^[3]既然夫婦一體，那麼妻子就理所應當地孝敬夫的長輩，如果不孝就要受到同樣的處罰。正因夫婦一體，所以丈夫不孝被處極刑，妻子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被收到官府去服勞役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二年律令》可以看出，漢初犯有普通罪者可以用爵位或金錢來贖罪，或者通過皇帝的大赦免除其罪，如《二年律令·錢律》中：“捕盜鑄錢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級。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許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隸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爲庶人。”一級爵位可以免除一名死罪，或者兩名城旦舂、鬼薪白粲，或者三名隸臣妾、收人、司空，從此確知漢初可以用爵位去免罪，既可以免自己的罪，也可以去免別人的罪。除用爵位以外，國家也允許用金錢贖罪，《二年律令·具律》中明確規定了贖罪的具體價格：“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金一斤四兩。贖劓、黥，金一斤。贖耐，金十二兩。贖遷（遷），金八兩。”當然皇帝登基和有喜慶之事時大赦天下，所免罪的人就不計其數了。國家通過以上幾種措施免除對犯人的懲罰，但並不是所有犯人都有的機會，不孝罪就不在可以贖罪或免罪的範圍之內。《二年律令·賊律》中明確規定：“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毆（毆）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爲收者，皆劓，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不孝要棄市，其妻子收爲官奴，不得以爵位或金錢贖罪，也不在皇帝赦免的範圍之內，可見不孝在漢代是多麼嚴重的罪行。

我們現在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漢代則不同，子與父的地位是絕對不平等的。子殺傷父要處以極刑，但父殺傷子處罰要輕得多，《二年律令·賊律》中規定：“父母毆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毆笞辜死，令贖死。”父母把兒子毆打致死，祇要拿出錢來贖死罪就可以了。按照法律，贖死罪是金二斤八兩，也就是說祇要拿出二斤八兩的贖金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父告子不孝，兒子要被棄市，但兒子或媳婦卻沒有告父母的權利，《二年律令·告律》中

規定：“子告父母，婦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無論父母犯了多大罪行，作為兒子和媳婦都不能告他們，否則就要被棄市。孝道在漢初成為人們的道德自律，甚至教人不孝者也要得到嚴厲的處罰，《二年律令·賊律》中規定：“教人不孝，黥為城旦舂。”《奏讞書》中也明確規定：“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棄市。棄市之次，黥為城旦舂。”教人不孝要處以黥為城旦舂的處罰。黥是肉刑，在罪犯臉上刺字塗墨，留下永久的痕跡，這是羞辱刑的一種。城旦舂是徒刑，服四年勞役，男犯要早起築城，女犯要舂米供刑徒口糧。黥為城旦舂把肉刑和徒刑加在一起，是一種比較重的處罰。

我們現在說，贍養老人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在漢初，對老人的贍養也已具有相應法規。如《二年律令·戶律》中規定：“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質賣。孫死，其母而代為戶。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孫子為戶籍的主人，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如果不能好好贍養老人，那麼政府就要出面干涉，把孫子趕出家門，讓其祖父母佔有他所有田宅、財產及奴婢，祇是不許出賣而已。這一政策確實非常嚴厲，是對老年贍養權的極力維護。

漢初政府制定了很多保護老年人權益的法規。如在刑法方面，漢初對老人適當給予照顧，老人被照顧的年限為七十歲，《二年律令·具律》中規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七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七十歲的老人和公士等有爵位的人觸犯了刑法，可以免除肉刑，祇處以完刑即可。完就是耐，即剃去犯人的鬚角，這樣的刑罰相對來說是比較輕的。

漢初，老年人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國家以嚴厲的刑法保護他們在家庭中的特權，當然這些特權都是在不違背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一般情況下，兒子或者家族中的其他成員犯了罪，如盜竊、強姦、殺人等，老年人是不連坐的，祇把罪犯的妻及子收為官奴，其家產田宅也沒入官府，如《二年律令·收律》中規定：“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姦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但如果兒子或家族中其他成員犯的是有害國家的罪行，那麼老年人就不能幸免了。《二年律令·賊律》中規定：“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坐謀反者，能備（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從以上律條可以看出，罪人犯了謀反、投降諸侯、不積極防守來犯之敵等罪行，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不僅罪人本身要處以腰斬的處罰，而且他的父母、妻子和家族的其他成員不論老少都要連坐。在《史記》、《漢書》中也可看到這樣的例子，如晁錯被漢景帝以謀反罪處死，“錯當要（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4]看來漢初對老年人的種種優待政策，在國家利益面前就不值一提了。這種現象反映了漢代親親和尊尊之間的微妙關係，公羊學家一貫主張在親親和尊尊發生矛盾時要以尊尊為重，要“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5]漢代一直信奉尊尊親親的這一原則，張家山漢簡中兒子犯有危害國家的罪行，父母不再受到優待，便是尊尊高於親親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

二

從張家山漢簡可以看出，漢初已形成了遺產分配的相關法規。《二年律令·戶律》規定：“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有爭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勿聽。所分田宅，不爲戶，得有之，至八月書戶，留難先令，弗爲券書，罰金一兩。”政府鼓勵老年人先立遺囑，鄉部嗇夫親自參加，遺囑被寫入券書中，一式三份，像戶籍一樣被保存在官府中。遺囑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子女發生財產糾葛，上訴到官府，就以遺囑爲判案的依據，但如果事先沒有立遺囑，那麼財產訴訟便沒有了依據，官府便不予理睬。遺囑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如果有無故滯留刁難遺囑者，或者不把遺囑寫成券書者，都要被罰金一兩。漢代的遺產不是祇留給長子，而是均分給所有的兒子，《二年律令·置後律》中明確規定：“□□□□長(?)次子，□之其財，與中分。”據《漢書·陸賈傳》記載，漢初儒生陸賈得到漢高祖賞賜的“千金”，年老時他把這筆財產平均分給五個兒子，每人“二百金”，正反映了漢代遺產均分的現象。如果沒有兒子，女兒也是合法的繼承人，甚至在沒有任何親屬的情況下，奴婢也可以繼承主人的財產，《二年律令·置後律》中規定：“死毋後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爲庶人，以□人律□之□主田宅及餘財。奴婢多，代戶者毋過一人，先用勞久、有□子若主所言吏者。”對於民衆財產的分配，政府採取讓民自己作主的靈活政策，如《二年律令·戶律》中規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子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爲定籍。”“諸(?)後欲分父母、子、同產、主母、段(假)母，及主母、段(假)母欲分孽子、段(假)子田以爲戶者，皆許之。”看來漢初政府對民衆財產分配採取充分尊重態度。秦朝時規定男子到了成年之後，必須單獨立戶，但漢初這一政策有所改變，《二年律令·戶律》規定：“寡夫、寡婦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瘡(癰)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異其子；今毋它子，欲令歸戶入養，許之。”寡夫、寡婦、夫妻有病者及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都是生活難以自理的人，如果他們不希望兒子單獨立戶，能和兒子在一個戶籍下得其贍養，政府對此採取贊同態度。這一政策是對秦朝戶籍政策的改變，爲漢朝中期以後大家族的出現開了先河。

漢初不僅財產可以繼承，而且爵位和戶籍都可以繼承。漢初沿用了商鞅創立的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按照從下向上的順序爲：公士、上造、簪裹、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從公士到不更相當於先秦時期的士階層，從大夫到五大夫相當於大夫階層，從左庶長到大庶長相當於卿，關內侯和徹侯相當於諸侯。有爵者根據爵位的高低，分別享有大小不等的田宅。皇帝根據爵位的高低，每年要賜予他們一定的物品，包括衣被、酒肉糧食等，東西的多少當然有一定標準，從張家山漢簡可以看出，爵位和官級之間在享受國家待遇上有一定等量換算關係，《二年律令·賜律》中規定：“賜不爲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

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裹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當官員得了無法治愈的大病時，皇帝一般要賜予他們棺材和衣物，東西的多少是按官品的高低而定的，“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賜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賜衣、棺及官常(裳)。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縣賜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縣賜棺。”有爵位的人和官員一樣得到皇帝的賜與，如果不願要實物，也可以兌換成錢，“賜棺享(椁)而欲受資者，卿以上予棺錢級千、享(椁)級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錢級六百、享(椁)級三百；毋爵者棺錢三百。”

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還保存了世卿世祿制度。有爵位的人，在其死後，按照嫡長子繼承制，他的嫡長子要承襲一定爵位及戶主身份，叫作置後，被置者稱為“後子”。《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對“後子”的解釋為：“可(何)謂‘後子’？·官其男為爵後，及臣邦君長所置為後大(太)子，皆為‘後子’。”後子的爵位是依據其父爵來定的，《二年律令·置後律》具體規定如下：“疾死置後者，徹侯後子為徹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子。關內侯後子為關內侯，卿侯(後)子為公乘，[五大夫]後子為公大夫，公乘後子為官大夫，公大夫後子為大夫，官大夫後子為不更，大夫後子為簪裹，不更後子為上造，簪裹後子為公士，其毋適(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徹侯和關內侯的後子都直接繼承父爵，但從卿之後，後子的爵位都比父爵為低，卿(包括大庶長、駟車庶長、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長、左庶長)後子為公乘，五大夫後子為公大夫，公乘後子為官大夫，公大夫後子為大夫，官大夫後子為不更，大夫後子為簪裹，不更後子為上造，簪裹後子為公士，也就是說，從卿到簪裹，後子的爵位都比父爵低了兩級。如果沒有嫡子，也可以以庶子作為後子。後子不僅從父親那裏繼承爵位，而且也繼承了戶主的身份。韓國學者尹在碩指出：“漢朝政府通過後子制度建立起一整套支配其編戶民的體制，解決民間社會的繼承紛爭，盡量避免絕戶現象產生，並實現其對編戶民源源不斷地徵收稅役之目的。”^[6]尹在碩對後子制度本質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置後是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所置之後由官府登記造冊，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有關官吏故意拖延置後子造冊的時間，超過十日者，就要受到罰金的處罰，《二年律令·置後律》明確規定：“當置後，留弗為置後過旬，尉、尉史主者罰金各□兩。”

除後子外，其他兒子到了法定的年齡，都要另立戶籍，稱為傅。傅籍的年齡也是根據其父的爵位來確立，“不更以下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歲，皆傅之。”國家除讓有爵位者立後子外，其他有傅籍的兒子也可以得到相應的爵位。“不為後而傅者，關內侯子二人為不更，它子為簪裹；卿子二人為不更，它子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為簪裹，它子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為上造，它子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為公卒。”從關內侯到公大夫，除後子外，另兩個有傅籍的兒子得到稍高點的爵位，其他兒子比這兩個兒子爵位低一個檔次。不更之下，後子外的其他兒子都沒有了爵位。當然，在確立傅子爵位時也有一定原則：“當士(仕)為上造以上者，以適(嫡)子；毋適(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長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傅，須其傅，各以其傅時父定爵士(仕)之。”^[7]仕為上造的是公乘、公大夫的兩

名傅子，也就是從公乘、公大夫之上，除後子之外，受到較高爵位的兩名傅子要以嫡子，沒有嫡子的便以庶子，以年齡大者優先，或者是父親指定者為先。傅子在著傅籍時，要以父親當時的爵位來確定傅子的爵位，如果父親死了，兒子在著傅籍時，要以父親死時的爵位來確定。無論是後子還是傅子，都根據他們得到的爵位，享受國家的相應福利，包括田宅、皇帝賜予的各種物品等。

西漢初期的遺囑制度和置後制度，讓財產和爵位等得以適當繼承，是先秦以來世卿世祿制度的殘餘，但這一政策確實溫情脈脈，在強調孝道、注重宗法倫理情節的漢代社會是非常必要而合理的。當然它具有更深層的目的，那就是有助於建立起更系統、具有宗法特色的統治秩序。

三

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已形成了一套老年政策。在《二年律令·傅律》中，按照爵位的高低及年齡的大小，把老年人分為皖老、免老、受杖老人和享受鬻米老人等四種。第一種老人是皖老，什麼是皖老？《二年律令釋文注釋》對其解釋曰：“皖老，減半服徭役。”看來皖老就是減除一半徭役的老人。多大的老人稱為皖老？《二年律令·傅律》規定：“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為皖老。”皖老的年齡是隨爵位的高低而有差等：不更為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爵位越高享受老年政策的時間越早。公卒、士五（伍）沒有爵位，所以享受減除徭役的年齡比不更要推遲四歲，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漢初等級制的嚴格性。張家山漢簡明確了皖老的權力，《二年律令·徭律》規定：“皖老各半其爵繇（徭），□入獨給邑中事。·當繇（徭）戍而病盈卒歲及毆（繫），勿轟（攝）。”皖老減免一半的徭役，而且在服徭役時也要給與適當的照顧，如果因生病或其它原因耽擱了服役，也不要嚴厲處罰他。對於生病的皖老，國家免除其子出外運糧的差使，《二年律令·徭律》中規定：“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皖老，若其父母罷瘠（癯）者，皆勿行。”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這些生病的老人能得到生活上的照顧。

第二種老人是免老。《二年律令釋文注釋》對其解釋為：“免老，因年高免服徭役。”免老就是免除了徭役的老人，這一點在《二年律令·徭律》中有明確規定：“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繇（徭）使。”《二年律令·傅律》規定了免老的年齡：“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為免老。”免除徭役者的年齡為：大夫以上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免老比皖老年齡要大，免除了一切徭役，祇在家貽養天年了。

第三種老人是受杖老人，《二年律令·傅律》規定：“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杖（杖）。”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由國家賜予手

杖，這可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手杖，擁有手杖的老人，可以享有國家賦予的特權。據武威市磨嘴子十八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記載：“制詔丞相、御史：高皇帝以來，至本二年，勝（朕）甚衰老小，高年受王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有敢妄罵詈、毆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馳道旁道。市賣，復毋所與，如山東復。有旁人養謹者，常養扶持，復除之。”“制詔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趨，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徵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建始是西漢成帝的年號，以上兩段簡文便明晰了受杖老人的權利：享有與六百石的官員同樣的權利；不許別人隨意打罵、徵召；可以隨意出入官府、郎第及馳道旁道；做生意要免除納稅；如果有人贍養他們非常殷勤，贍養者可以免除徭役（這是對孝敬老人的鼓勵措施）；犯罪也要從輕處罰。受杖老人比免老在權利上為高，當然早已免除了一切徭役。給七十歲老人賜王杖是漢代一以貫之的養老政策，漢代文獻中多所涉及，如《漢書·孔光傳》中曰：“賜太師靈壽杖，”王充《論衡·謝短》曰：“七十賜王杖”等。這是國家賦予老人的特權，也是漢代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標志。

第四種老人是享受饔米老人，《二年律令·傳律》中規定：“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饔裹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稟饔米月一石。”《二年律令釋文注釋》認為：“饔疑應作‘饔’，讀為‘饔’。《漢書·文帝紀》‘今聞吏稟當受饔者，或以陳粟’注：‘饔，給也。饔，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饔也。’”糜，《釋名》解釋為“糜，煮米使糜爛也。”《博雅》解釋為“糜，汨也，饔也。”饔，《禮記·檀弓·檀弓疏》：“厚曰饔，希曰粥。”看來糜就是粥，淖，《說文解字》解釋為“泥也”，淖糜可能是煮爛的粥。看來，國家給與老人的饔米是為了解這些老人做粥喝的。這些老人的年齡為：大夫以上年齡在九十以上，不更九十一，饔裹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九十多歲的老人牙口肯定不好了，所以發給他們饔米以做粥喝。這些老年人每月由政府發給饔米一石，這些米對老年人的生活來說確實綽綽有餘，看來這些老人已由國家贍養起來。這充分體現了漢代對老年人的重視，有點像《禮記》中“使老有所養”的“大同”世界的味道了，這也是儒家一貫宣揚的孝道同政治相結合的結果。從以上看，漢初已形成了完整的養老體系，這一體系形成為漢代的養老制度。東漢章帝於章和元年秋七月下詔：“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8]養衰老是對全體老人而言的，授几杖就是本文所說的受杖老人，行糜粥飲食其實就是本文所說的第四種老人，這裏的糜粥可能就是張家山漢簡中提到的饔米，看來漢代敬老愛老已經成為慣例。

從張家山漢簡的有關係文看，漢初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套老年政策，老年人根據年齡和爵位的高低享受不同的優惠政策，他們的爵位和財產可以遺傳給子孫，政府確立了嚴密的遺囑制度，使老年人的遺願得到法律的保護，避免了不必要的財產糾紛。漢初老年政策的確立，保障了老年人的權益，從法律方面確立了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尊養三老，視孝也”^[9]成為一種社會導向，為漢代以孝治天下打下堅實的基礎。

注 釋

[1]《漢書·宣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

[2] 陳谷嘉：《儒家倫理哲學》，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45 頁。

[3]《春秋公羊傳注疏》（宣公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186 頁。

[4]《漢書·晁錯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5]《春秋公羊傳注疏》（哀公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339 頁。

[6] [韓]尹在碩：《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反映的秦漢時期後子制和家系繼承》，《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31 頁。

[7]此標點遵照《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版），謝桂華先生另外標點為：“當士（仕）為上造以上者，以適（嫡）子；毋適（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長者，若次其父所以，所以未傳，須其傳，各以其傳時父定爵士（仕）之。”謝先生在“所以”間斷開，意思就非常明瞭了。

[8]《後漢書·章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

[9]《漢書·賈山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孔家坡漢簡中的“徙時”篇

◎ 武漢大學考古系

◎ 李天虹

2000年3月，湖北省隨州市孔家坡8號墓出土600餘枚簡牘，時代屬西漢早期，內容包括《日書》、《曆譜》及告地策。關於簡牘出土以及清理的概況，張昌平先生在2000年8月於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目前這批簡牘的初步整理工作已經結束，本文在這裏先行介紹的是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徙時”篇。

“徙時”全篇書寫在四枚竹簡上，出土時每枚竹簡都斷成了三段，但能够完全復原，文字基本沒有殘缺。“徙時”是簡文原有的標題，書寫於第一枚簡的天頭，正文則全部在天頭下書寫：

徙 時

正月五月九月：西北啓光，正北吉昌，〈東北反鄉〉^[1]，東死亡，東南鬪，正南別離，西南執辱，正西却逐。

二月六月十月：東北啓光，正東吉昌，東南反鄉，正南死亡，西南鬪，正西別離，西北執辱，正北却逐。

〔三〕月七月十一月：東南啓光，正南吉昌，西南反鄉，正西死亡，西北鬪，正北別離，東北執辱，正東却逐。

四月八月十二月：西南啓光，正西吉昌，西北反鄉，正北死亡，東北鬪，正東別離，東南執辱，正南却逐。

其內容是將一年十二個月分爲四組，按順時針方向講述行徙四維及四方的吉凶。熟悉《日書》的學者都能一目瞭然，這篇文獻的內容與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歲”、“遷徙”，乙種的“嫁子刑”^[2]，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徙”等四篇文獻大體相同^[3]。據學界的研究，這類文獻的性質大體可以確定，他們都是以“歲”所在的方位爲依據來占斷吉凶。但是，

由於一些占斷詞語在其他文獻中很少出現，同時又沒有可供作語意聯繫的上下文，所以目前對占斷詞語內涵的解釋還比較欠缺，本文擬主要在這方面作一點探討。為方便起見，茲將其它四篇文獻的相關內容逐錄於下：

歲篇^[4]

一月五月九月，歲在東方，以北大祥，東旦亡，南遇殃，西數反其鄉。
 二月六月十月，歲在南方，以東大祥，南旦亡，西遇殃，北數反其鄉。
 三月七月十一月，歲在西方，以南大祥，西旦亡，北遇殃，東數反其鄉。
 四月八月十二月，歲在北方，以西大祥，北旦亡，東遇殃，南數反其鄉。

嫁子刑^[5]

正月五月九月：正東盡，東南鬪，正南央麗，西南執辱，正西郤逐，西北續光，正北吉富，東北反鄉。

二月六月十月：正南盡，西南鬪，正西央麗，西北執辱，正北郤逐，東北續光，正東吉富，東南反鄉。

三月七月十一月：正西盡，西北鬪，正北央麗，東北執辱，正東郤逐，東南續光，正南吉富，西南反鄉。

四月八月十二月：正北盡，東北鬪，正東央麗，東南執辱，正南郤逐，西南續光，正西吉富，西北反鄉。

遷徙

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東北小吉，若以是月也東徙，毀，東南刺離，南精，西南室毀，西困，西北辱。

二月六月十月：東徙大吉，東南小吉，若以是月也南徙，毀，西南刺離，西精，西北室毀，北困，東北辱。

三月七月十一月：南徙大吉，西南小吉，若以是月也西徙，毀，西北刺離，北精，東北室毀，東困，東南辱。

四月八月十二月：西徙大吉，西北小吉，若以是月也北徙，毀，東北刺離，東精，東南室毀，南困，西南辱。

徙

[正月五月九月，歲在]東，東徙死，西徙反，南徙寡殃，北徙吉，東南誰〈離〉，西南鬪，西北辟道，東北小吉。

[二月六月十]月，歲在南，南徙死，北徙反，西徙寡殃，東徙吉，西南誰〈離〉，西北

鬬，東北辟道，東南小吉。

[三月七月十一]月，歲在西，西徙死，東徙反，北徙寡殃，南徙吉，西北誰〈離〉，[東]北鬬，東南辟道，西南小吉。

[四月八月十]二月，歲在北，北徙死，南徙反，[東徙]寡殃，西徙吉，東北誰〈離〉，[東]南鬬，西[南辟道]，西北小吉。

其中“歲”、“遷徙”、“嫁子刑”三篇與“徙時”相同，都是按順時針方向講述行徙四方及四維的吉凶(“歲”篇祇有四方)，所使用的表示吉凶的詞語與方位循環依次相配(“遷徙”篇在上引文字之後並對各占斷詞語進行了解釋，但原文殘缺比較嚴重^[6])。“徙”篇則是先講四方，然後再按順時針方向講四維。各篇八個方位的占斷詞語中，似乎祇有兩個方位是吉利的，其方位並且相連，餘者則全部不吉。從字面來看，五篇文獻可以分為兩組，“歲”、“遷徙”、“徙”三篇，“徙時”、“嫁子刑”兩篇，每月方位和吉凶用語的搭配比較一致。其吉凶用語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 歲 | 大祥 | | 旦亡 | | 遇殃 | | 數反其鄉 | |
|-----|----|----|----|----|----|----|------|----|
| 遷徙 | 辱 | 大吉 | 小吉 | 穀 | 刺離 | 精 | 室毀 | 困 |
| 徙 | 辟道 | 吉 | 小吉 | 死 | 離 | 寡殃 | 鬬 | 反 |
| 徙時 | 啓光 | 吉昌 | 反鄉 | 死亡 | 鬬 | 別離 | 執辱 | 却逐 |
| 嫁子刑 | 續光 | 吉富 | 反鄉 | 盡 | 鬬 | 央麗 | 執辱 | 郅逐 |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同，尚有待今後作進一步的探討。下面，我們由“徙時”篇入手，對個別吉凶詞語的含義略加分析。

死亡，“嫁子刑”篇與之相對應的詞語是“盡”，秦簡整理小組未作解釋。盡，死也。《後漢書·列女傳·皇甫規妻》：“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遷徙”篇中的穀，原簡的解釋是“死也”(《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 94 簡六三正，下文簡稱《秦簡》)，“徙”篇、“歲”篇和“穀”相對應的詞是死、旦亡。可見單純從詞義來看，穀與“徙時”篇的“死亡”，“嫁子刑”篇的“盡”也是相對應的。整理小組也認爲穀相當於“嫁子刑”篇的“盡”，因此把它讀作“磬”，云：“《爾雅·釋詁》：‘盡也。’”(《秦簡》頁 189 注[一])今按，磬的含義“盡”是“沒有”，與死亡似乎沒有關聯。查“穀”在秦簡《日書》中常常通爲“擊”(《秦簡》頁 212 簡三三背壹、頁 215 簡四三背叁)，“遷徙”篇的穀似乎也應當讀作“擊”，指因爲攻擊而被殺死。《古今韻會舉要·錫韻》：“擊，攻殺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司馬割羊，司士擊豕”，鄭注：“割、擊，皆謂殺之。”

別離：“別”字“徙時”篇原簡作：

J696

J504

古“別”字本從“𠂔”，如馬王堆漢墓竹簡或作𠂔、𠂔(《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262，下文簡稱《字表》)等。又漢印別字或作𠂔(《字表》頁262)，在“𠂔”旁的下部添加了一橫筆，形體較為特殊；孔家坡簡“別”字的寫法與其完全一致，故亦當釋作別。“別離”一詞古已有之，《楚辭·九歌》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嫁子刑”篇與“別離”對應之詞為“𠂔麗”，整理小組注曰：“《說文》：‘𠂔，分決也。’《廣雅·釋言》：‘麗，離也。’𠂔麗即分離。”(《秦簡》頁249注[三])“𠂔麗”一詞大約等同於訣別。“遷徙”篇中有“刺離”一語，刺，原簡的解釋是：“室人妻子父母分離。”(《秦簡》頁189簡六三正)可見“刺離”的含義與“別離”、“𠂔麗”相同。整理小組注謂：“刺疑讀作謫。”(《秦簡》頁189注[一])《說文》：“謫，罰也。”與簡文本身對“刺”的解釋不一致。“徙”篇相應之詞本作“誰”，劉國忠先生已經說明當是“離”的誤字^[7]。

却逐：“却逐”在“嫁子刑”篇裏作“郅逐”。郅，整理小組注謂：“郅即卻字，讀為隙。隙逐，因有怨隙而被驅逐。”(《秦簡》頁249注[五])今按却也可能讀作本字。《廣雅·釋詁》：“却，讓也。”《廣韻·藥韻》：“却，退也。”《漢書·爰盎傳》“盎引却慎夫人坐”，顏注：“却謂退而卑之也。”其義與“逐”相通。

另外從上表可知，“徙”篇的“寡殃”和“歲”篇的“遇殃”相互對應。遇，原簡或作“禺”，帛書整理小組均讀作“遇”。今按，遇、禺也有可能讀作“偶”，“偶殃”和“寡殃”詞義非常接近。“遷徙”篇的辱，原簡也有解釋，整理小組的釋文作：“辱者，不孰而為……。”“孰”字圖版不很清楚(《秦簡》圖版94簡六三正)。從字面來看，辱相當於“徙時”和“嫁子刑”篇中的執辱。執、孰字形相近，釋文“孰”也許本是“執”。

最後，再就上述文獻中的“歲”做一點說明。秦簡“歲”等諸篇文獻發表後，學者們對“歲”展開了熱烈的討論^[8]。《淮南子·天文》云：“斗勺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正)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越絕書·外傳·記軍氣》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劉樂賢先生首先提出，秦簡“歲”篇裏的“歲”，可能是選擇家們常說的太歲，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神名^[9]。其後胡文輝先生更明確指出，“歲”篇中的“歲”即《淮南子·天文》中叫做“大時”或“咸池”的太歲；《記軍氣》與“遷徙”篇都是根據叫做“大時”或“咸池”的太歲來占斷吉凶的^[10]，其說已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上述五篇文獻方位和吉凶的對應關係彼此互有差異，但有兩點完全相同之處，那就是遷徙所往，凡“歲”所在方位則大凶(死)，凡“歲”始離方位則大吉；而帛書“徙”篇談到移徙的吉時之一是“咸池所去(離開)”，說明“歲”與咸池確實有密切的關係。

注 釋

[1]“東北反鄉”四字原簡漏抄，此據文例補。

- [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89、190、248～249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嫁子刑”的“刑”字圖版文字不甚清楚，劉國勝先生認為當改釋為“時”。
- [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式法〉釋文摘要》，《文物》2000年7期，91頁。
- [4]為方便起見，“歲”篇中的楚月名直接換算成秦月名；如果可以肯定假借字的本字，則直錄本字。
- [5]“嫁子刑”和“遷徙”篇原簡抄寫有不少錯誤，本文所錄係訂正後的簡文，參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89、386頁，文津出版社，1994年。
- [6]秦簡整理小組的釋文作：“□□□□者，死也。刺者，室人妻子父母分離。精者，□□□□□□□□□□□□。困者，□□□□□□。辱者，不孰而為口人矢口。”參看《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94簡六三正，189頁。
- [7]劉國忠：《試論馬王堆帛書〈式法〉的“徙”篇》，“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大學，2000年8月。
- [8]參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01～104頁。
- [9]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03～104頁，劉先生在本篇的注釋3中說明後一種說法是李學勤先生提出的。
- [10]胡文輝：《釋“歲”——以睡虎地〈日書〉為中心》，《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88～134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秦漢郵書管理制度初探

◎ 甘肅張掖河西學院歷史系

◎ 高 榮

郵書管理制度是古代郵驛管理的重要內容。由於文獻資料零散不足，學界對秦漢郵書管理制度的專門探討尚不多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着大量秦漢簡牘材料的問世、公佈，熊鐵基、高敏、劉廣生、李均明等多位學者都曾對此問題進行過研究。^{〔1〕}但因當時居延新簡、敦煌懸泉簡尚未公佈，故對有關問題的研究仍有遺漏和不足。本文擬在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利用簡牘材料對秦漢郵書的寄發、運行、簽收和考核等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考察，錯謬之處，敬請教正。

一、郵書寄發管理

秦漢時期的郵書往來極為頻繁，凡向上級請示，都須呈送書面報告，不得口頭請示或由他人代言，即雲夢秦簡《內史雜》^{〔2〕}所謂“有事請毆（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羈）請”。為保證郵書的安全保密與權威性，在寄發郵書時，就實行了嚴格的檢署和登記制度。檢指封檢，署為題署。檢署制度亦即封檢題署制度。封檢工作由發文者承擔，題署文字除收文者及文書傳遞方式由發文者書寫外，其他（如文書到達時間、傳遞者、封泥是否完好等）則由收文者署寫。

1、封檢

檢是用以封緘文書之物，多以木板為之。在檢上均有刻齒、封泥，蓋印後用繩捆束，此即封檢。秦漢時，上自皇帝，下至公卿大臣及掾屬小吏皆有印綬。皇帝及諸侯之印稱璽，其他百官則稱印或章。故有“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3〕}之說。《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金璽綠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

……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顏師古注引《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比二千石以上，“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爲蟲獸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即使比二百石以下無印綬的小吏，也各有私印。凡公文往來均以繩捆束，並於結繩處施以拓有文書簽署者或其衙署印文的封泥。王國維先生指出：“書函之上既施以檢，而複以繩約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後題所予之人，其事始畢。”^[4]封泥既可防止泄密和作偽，又是文書真實性和權威性的憑證。如不加封，其真實性就要受到懷疑。秦將在以秦二世名義給李良的信上故意“不封”，就是“欲其泄露，君臣相疑。”^[5]如果偽造官印，即爲犯罪。秦律中將諸如低級官吏偽造丞的官印冒充大嗇夫之類的行爲，統稱爲“僞（矯）丞令”；如果假冒嗇夫的封印，就要按偽造官印罪論處。^[6]秦簡《爲吏之道》云：“口者，關；舌者，符璽也。璽而不發，身亦毋薛（薛）。”所謂“璽而不發”，即用璽印封緘而不打開。此爲秦統一前的律文，故吏之印也稱璽。秦以後，璽始爲皇帝之印的專稱。秦始皇在臨終前賜公子扶蘇之書就有璽封，“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中車府令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等私拆始皇璽封之書，詐爲詔令，“更爲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7]凡此都說明秦時公文均須封緘，至於漢代，公文封緘已有明確記載，《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漢制度》云：

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

《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漢官儀》云：

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據此則制書要經皇帝璽印和尚書令之印兩次封緘，所謂：“漢詔皆重封……殆璽封在囊內而尚書令印封在囊外。”^[8]前者意即該文書是由皇帝簽署的，後者則表示該文書是由尚書令發佈的。制書如此，其他官文書亦然。前引秦簡《法律答問》中提到的嗇夫封印，即指由嗇夫封緘文書而言，並非由嗇夫發佈文書。如果是露布文書，雖不加封緘，但仍須有發文者的封泥，如 H278.7^[9]爲露布，但其上卻有封泥孔的痕跡，即爲明證。

2、文書寄發登記

作爲文書的發佈者，除用檢封緘文書外，還要對所寄發文書進行登記，以明確責任，保證郵書的順利運行。發文者所記內容多少雖不盡相同，但其格式則基本一致。概而言之，發文記錄大體包括收件者和文書主要內容、文書所涉及的事類多少、件數和封緘方式，有些還須注明封緘時間（月份和干支日）和封緘者職、名等。對此，李均明先生在其《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一文中言之甚詳，其說亦多可採，故此不再贅述。但因該文材料僅限於居延舊簡，故對發文記錄的形式尚有遺漏，試看以下二簡：

(1) 大守府書塞吏武官吏皆爲短衣去足一尺告尉謂第四守候長忠等如府書方察不變更者●一事二封 七月庚辰掾曾佐嚴封 E.P. T51:79^[10]

(2) ●俱起燧長程偃等皆能不宜其官換如牒告尉謂城北候長輔●一事二封 八月丁亥士吏猛奏封 E.P. T52:18

此二簡均出於甲渠候官遺址，其封檢方式均為“一事二封”，為居延舊簡所未見。從簡文內容來看，前者是甲渠候官要求第四候長忠等就“太守府書”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的下行文書記錄；後者則是甲渠候官要求城北候長輔根據牒書撤換不勝其職的俱起燧長程偃等，實際上是甲渠候官給第四候長的批復。其所以要用“一事二封”的封檢方式，可能是文書內容更為重要的緣故。通過這些發文記錄，不僅可瞭解文書寄發情況，也便於以後的檢查考核，具有明確責任的意味。

二、郵書運行管理

為保證郵書傳遞的迅速、準確和安全，秦漢時期在郵書運行中實行了分段管理和限時傳遞。

1、限時傳遞

郵書的種類很多，按發文者劃分，有詔令文書和其他各種官文書。其中有緊急文書，也有普通文書；但不論何種文書，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秦簡《行書律》規定：“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霽（畢），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統一六國後，始皇帝即下令改“命為制，令為詔”。此“命書”即秦國國君發佈的命令，相當於秦漢時期作為“帝者制度之命”的“制書”。凡“命書”、“制書”與特別注有“急”字的文書均為緊急文書，必須立即遞送，不得延誤；對於一般公文（即“不急者”），雖不必“輒行之”，但也必須在當日送出，即所謂“日霽（畢），勿敢留”。從漢代的情況看，緊急文書和一般文書的傳遞，各有程限。《漢舊儀》云：

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據此則皇帝璽書為緊急文書，以“晝夜千里為程。”徵諸文獻，其說不誤。《韓非子·難勢》：“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馭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至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論衡·說日篇》有“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騏驎晝日亦行千里”之說。《漢書·昌邑哀王劉髡傳》載，漢昭帝崩，制詔昌邑王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自日中至晡時行 135 里，用時一時。以一日十六時計，^[11]則一晝夜間約行 2160 里。當然，這是途中一刻不停，並以“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為代價的。事實上，一晝夜間毫不停歇地快速奔馳，在當時是決不可能的。如果除去途中必要的交接、停留，“晝夜千里為程”是可信的。對此，漢代匈奴騎兵南下的資料也可為佐證。據婁敬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12]匈奴輕騎南下，沿途不可能暢通無阻。為了避開或突破漢軍阻擊，勢必要繞道迂回或與漢軍交鋒；加以中途不能更換馬匹，人、馬都需有必要的停留和休整。如果除去這些因素，“日行千里”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晝夜千里為程”是就非常情況下需要火速傳遞的特急文書而言，其他需要快速傳遞的文書，則要遠低於“晝夜千里”的速度。如《漢書·趙充國傳》載，漢宣帝時，趙充國從

金城向朝廷奏報軍情，往返不過 7 天。如果將朝廷議論和批復的時間算作 1 天，則往返祇有 6 天。從金城到長安單程約為 1850 里，往返 3700 里，平均每日約行 620 里；另據《漢書·王溫舒傳》載，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從河內到長安，“奏行不過二日”，河內距長安約為 1100 里，則平均每日當行 550 里。這個速度雖不及“晝夜千里”，但比漢簡中一日一夜 160 里的速度快了許多。

(3) 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書積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

E. P. S4T2:8A

(4) 𠙴燧卒世去臨木燧十七里當行一時七分𠙴中程

E. P. T50:107

按此二簡規定，每時所行均為十里，一晝夜當行百六十里，與前述“晝夜千里為程”和日行五六百里的速度均相差甚遠。其所以如此，前者係用人徒步遞送普通文書，後者則是驛騎傳遞火速加急的“璽書”和其他緊急文書。漢代簡牘及文獻中多有“馳行”、“馬馳行”、“馳傳”、“疾置”及“亭次走行”、“行者走”、“以縣次傳”等的記載，也是指緊急文書與普通文書而言的。可見，秦時區別“命書及書署急者”與“不急者”的規定，到漢代仍相沿未改。而且，不論哪種文書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如超過規定的時間，即為“留遲”、“不中程”，有關責任者要受到相應的處罰（詳見“郵書考核管理”）。

2、分段傳遞，各負其責。

由於郵書運行有嚴格的時限，而整個傳遞過程又多是郵人、郵卒前後相繼，接力傳遞。為明確責任，保證郵書的及時送達，秦漢時期還實行了分段管理的制度。為此，不僅各郵站有詳細的郵書過往記錄，而且各區間對過往郵書的性質、數量、種類、收文者、發文者、印章封泥是否完好、郵件封皮的顏色、質地及郵書受付時間、傳遞者等內容也要作詳細的記錄，如：

(5) 出西書三封置記二 二封詣府一封冥安長印一封酒泉太守章一封毋印章詣敦煌十二月癸酉大農付樂望卒印。

87-89C:2^[13]

(6) 入西皂布緯書一封 大司徒印章詣府緯完賜……從事宋掾書一封封破詣府

II 114②:89^[14]

(7) 北書二封 其一封詣居延騎千人一封章破詣𠙴𠙴趙卿治所五月戊寅下舖推木燧卒勝有受三十井識教燧卒樊隆己卯蚤食五分當曲燧卒蔡崇付居延收降亭卒尹𠙴𠙴

E. P. T59:156

(8) 北書五封 一封遣杜陵左尉印詣居延封破𠙴𠙴旁封十月丙寅起卒順

H505.39

(9) 東第一封橐一驛馬行西界封書張史印十二月廿七日甲子晝漏上水十五刻起徙商名永初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夜參下舖分晝時縣(懸)泉驛徒吾就付萬年驛

VIF13C②:10A

十二月廿七日夜參下舖分晝時

VIF13C②:10B

上述各簡均為郵書的運行記錄，所記內容雖詳略不一，但其基本格式卻是一致的。其一，均

記郵書的運行方向和數量，如南書、北書、東書、西書和一封、二封等。有的在表示方向的東書、西書、南書、北書前還有“出”或“入”字。其中凡“入”者均指由他處傳至本郵站者，而“出”者則指經由本站發出的郵書。還有的記錄收到本（批、輩）郵書的時間，如簡（9）“十二月廿七日夜參下餽分盡時”。其二，均記郵書性質（如詔書、置記、合檄、板檄等）、封泥印章（即發文者）和收文者。如果發現無印、封泥破損或已經旁封等情況，均要記錄下來，如簡（5）、（6）、（7）、（8）等。有的還記載郵書封皮的質地、顏色等，如簡（6）之“皂布緯書”即為其例。這類情況多見於敦煌懸泉簡中。其三，記錄本郵書承接前站和交付下站的時間及交接人、遞送者等。一般從前站接受郵書者即為本站郵書的遞送者，也有的是由亭長承接而派亭卒遞送，如下簡：

（10）南書一輩一封張掖肩候詣肩水都尉府

●六月二十四日辛酉日蚤食時沙頭亭長受驛北卒音日食時二分沙頭卒宣付驛馬

卒同

H505.2

簡（10）中接受驛北卒郵書者為沙頭亭長，而承擔遞送任務者卻是沙頭卒宣。據、吏承接郵書與派卒向下站遞送並不一定是同步的，而郵書登記則在交接雙方都在場時進行；一旦本站承接郵書並辦理登記手續，前站任務即告完成，以後的遞送等事均與前站無關。記錄受付時間和交接人，正是為此。

由此可見，郵書的運行記錄不是指整個郵程而是在一定區間進行的，或祇記一個郵站承接前站和交付下站的情況；或記兩個或兩個以上郵站，對郵書運行的檢查考核也是如此（詳下）。這說明漢代郵書運行是分段或分區管理的。

秦代郵書運行記載不詳，但秦簡《法律答問》云：

“發偽書，弗智（知），貲二甲。”今咸陽發偽傳，弗智（知），即復封傳他縣，他縣亦傳其縣次，到關而得，今當獨咸陽坐以貲，且他縣當盡貲？咸陽及他縣發弗智（知）者當皆貲。

簡中傳信的查驗是逐站進行的，對於未能識別偽造通行證而放其通行者又比照下傳偽造文書處理，說明郵書傳遞也是分段負責，故有“獨咸陽坐以貲，且他縣當盡貲”的疑問。這從秦簡《封診式·遷子》爰書亦可得到印證。其爰書云，咸陽命吏、徒攜帶通行證及恒書一封送交廢丘縣令史。到達廢丘後，即更派他人，並特別注明“法（廢）丘已傳，為報，敢告主”。即到達廢丘後，其任務即告完成，就要回報咸陽。因此，秦代郵書傳遞也是分段管理的。這也說明秦漢郵書的運行管理是前後相承的，祇不過漢代郵驛更為發達，其分段更細、管理更為完善而已。

三、郵書簽收管理

郵書由發文者發佈後，輾轉傳遞，送達目的地後要經收件者簽收登記；拆發郵書者如非主官或收件者本人，而是令史、尉史之類的屬吏，還需作啓封記錄。

1、簽收登記

郵書送達目的地後的簽收登記，從以下各簡可知其梗概：

(11)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長禹敢言之謹移戍卒賁賣衣財物爰書名籍一編敢言之

印曰蘭禹 六月壬戌金關卒延壽以來 候史充國 H10.34AB

(12) 五月丙寅居延都尉德庫守丞常樂兼行丞事謂甲渠塞候寫移書到如大守府書律令/掾定守卒史奉親 E.P.T51:190A

章曰居延都尉章

甲渠

五月甲戌臨桐卒馮弘以來 E.P.T51:190B

(13) 印破

甲渠官 令史定(此倒書)

正月甲辰門卒同以來 E.P.T6:36

(14) 張掖居城司馬

甲渠郵候以郵行

九月戊戌燧卒同以來●二事 E.P.T43:29

以上各簡均為郵書的簽收記錄。或記於郵書標題或末尾簡的背面，如簡(11)；或記於郵書封檢上收件者名稱兩側偏下位置，如簡(12)、(13)、(14)。所記內容一般為三項，即發文者、郵書到達時間和最後遞送者。發文者係抄寫封泥印文，如“印曰蘭禹”、“章曰居延都尉章”、“張掖居城司馬”等均是；如果封泥脫落或破損，則須注明，如簡(13)。郵書到達時間一般為月份和記日干支，如簡中“六月壬戌”、“五月甲戌”、“正月甲辰”、“九月戊戌”等；郵書傳遞者均記其名與身份，如(11)、(13)、(14)三簡中的“金關卒延壽”、“門卒同”、“燧卒同”等；也有記其身份與姓名者，如簡(12)“臨桐卒馮弘”。有的還標有郵書所記事類，如簡(14)“二事”；還有的標有簽收者職、名，如簡(11)的“候史充國”和簡(13)倒書的“令史定”。這些書寫於文書原件上的文字，字體大小和筆迹均與原件其他文字有別，從簡上“某某以來”的字樣來看，顯然是收件者後來寫上去的。

2、啓封記錄

拆封郵書，一般稱為“發”。發即開啓之意，如秦簡《法律答問》云：“有投書，勿發，見輒燔之”、“發僞書，弗智(知)，貲二甲”。其中的“發”均指啓封。這在漢簡中屢有反映：

(15) 居延尉丞 其一封居延倉長一封王憲印 十二月丁酉令史弘發 H136.43

(16) 其一封居延都尉章一封王充印 五月戊戌尉史疆奏發 H158.8

(17) 水肩塞尉印 十月壬戌卒周平以來 即日魯夫□發尉前 佐相 H506.9B

(18) 書五封檄三 二封王憲印(中略)二月癸亥令史唐奏發 H214.24

(19) 董雲 三月丙戌肩水庫魯夫宋宗以來 令史博發君前 H284.4B

據以上各簡，啓封記錄包括文書來源(即發文者)、數量和啓封者等項內容。拆發郵書封檢

者一般為令史或尉史，他們都是都尉府或候官的秘書人員，簡(17)中拆發郵書的嗇夫亦非主官，而是尉的屬吏。由於他們秩位不高，一般不得擅自啓封，而必須先向主官請示或經主官授權，如簡(16)、(18)分別記有“尉史彊奏發”、“令史唐奏發”；或在收件者(主官)面前當面啓封，簡(17)、(19)即為其證。有些重要文件則有發文者標注的在主官當面啓封的字樣，如下簡：

(20) 居令延印

回 甲渠發候尉前

□□□□□□以來

H55.1

本簡為居延縣令發往甲渠候官的郵書，發文者注明“甲渠發候尉前”，即要求本文書在甲渠候及甲渠塞尉都在場時啓封。而簡(16)、(19)即為此類文書的啓封記錄。如果下吏擅自啓封，就要受到責罰。

四、郵書考核管理

郵書的考核主要是對其是否及時(即“中程”與否)、安全(即有無遺失)和保密(封泥完好與否)等的檢查。這種檢查主要有收件者及上級部門的考核和各級郵驛組織的月報、年報兩種形式。收件者根據郵書封檢中的起發時間，對郵書傳遞是否符合規定進行檢查和考核。郵書封檢完好又按時送達，即為“中程”，本次郵書傳遞即告結束；如果郵書失期，即為“不中程”；或者郵件丟失、封泥毀壞，均要逐級追究責任。

1、收件者和上級的考核

郵書啓封後，收件者要將有關情況及時回復發文者，漢簡中屢見有“日時在簡中到課言”，即指此。如發現郵書留遲失期、封泥破損脫落及郵件遺失等情況，可以向上級反映。上級組織則移書責問有關部門長吏，令其在規定期限內將調查結果上報或令直接責任者“詣官對狀”，然後再決定處罰。如秦簡《行書律》規定，擅自滯留郵書，“留者以律論之”；“書有亡者，亟告官。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如果丟失文書、符券等物，即使後來找到，也不能免予處罰。如秦簡《法律答問》規定：“亡久書、符券、公璽、衡贏(累)，已坐以論，後自得所亡，論當除不當？不當。”漢代郵書考核則更加完善，如下各簡：

(21) 丁丑到留遲封破毋旁封記到各推

E. P. T59:504

(22) 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書積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書到各推辟界中必得事案到如律令言會月廿六日會月廿四日

E. P. S4. T2:8A

(23) 郵書失期前檄召候長敞詣官對狀

H123.55

(24) 六月辛未府告金關嗇夫久前移拘逐辟彙他令史解事所行蒲封一至今不到解何記到久逐辟詣會壬申旦府對狀毋得以它為解各署記到起時令可課告肩水候官候官所移卒責不與都吏□卿所舉籍不相應解何記到遣吏抵校及將軍未知不將白之

H183.15AB

(21)、(22)二簡是因郵書留遲、封泥破損又無旁封而由(都尉)府移書責問,令候官在其轄區(即“界中”)進行調查,其中簡(22)還限定在三天內即當月二十六日答復;簡(23)則是因郵書失期,由候官發檄書責令候長徹到候官接受質詢;簡(24)是都尉府因一封應到而未到的郵書,在六月辛未日令有關責任者金關畜夫久於次日早上到都尉府說明情由。

關於郵書失期的檢舉、調查驗問,以下各簡可提供更為詳細的材料:

(25) 卅井關守丞匡檄一封詣府十一月壬辰言居延都田嗇夫丁官祿福男子王歆等入關檄甲午日入到府留遲 E.P.F22:133-134

(26) 卅井關守丞匡檄一封詣府十一月乙未言男子郭長入關檄丁酉食時到府留遲 E.P.F22:138-139

(27) 甲渠郵候以郵行 回 府告居延甲渠郵候卅井關守丞匡十一月壬辰檄言居延都田嗇夫丁官祿福男子王歆等入關檄甲午日入到府匡乙未復檄言 E.P.F22:151A

甲渠郵候以郵行 回 男子郭長入關檄丁酉食時到府皆後宮等到留遲記到各推辟界中定吏主當坐者名會月晦有 E.P.F22:151B

甲渠郵候以郵行 回 教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戌起府 E.P.F22:151C

甲渠郵候以郵行 回 十一月辛丑甲渠守候告尉謂不侵候長憲等寫移檄到各推辟界中相付受日時具狀會月廿六日如府記律令 E.P.F22:151D

(28) 甲渠言卅井關守丞匡檄言都田嗇夫丁官□等入關檄留遲謹推辟如牒 E.P.F22:125

(29) 持行到府皆後宮等到留遲記到各推辟界中相付日時具言狀會月廿六日謹案鄉嗇夫丁官入關檄不過界中男子郭長入關檄十一月十八日乙未食坐五分木中燧長張勳受卅井誠勞 E.P.F22:324

(30) 北燧長岑舖時勳付城北燧助吏王明下舖八分明付吞遠燧助吏□□皆中程留遲不在界中敢言之 E.P.F22:464

以上六簡出土於同一地點,所敘內容相近,文意基本連貫。據 E.P.F22:140-143,簡(29)、(30)是前後相連的。因此,這六簡可基本反映漢代對郵書失期等事進行調查的一般情況。(25)、(26)兩簡是卅井關守丞匡於建武四年十一月壬辰、乙未兩次致檄居延都尉府,反映居延都田嗇夫丁官、祿福男子王歆等及男子郭長入關檄留遲事,可視為收文者向上級反映郵書失期的例證。簡(27)(實為觚)A、B、C 三面是居延都尉府根據卅井關守丞匡兩次檄言,於十一月戊戌致記甲渠郵候,責成其令下屬候長在各自“界中”進行調查,並將應負責任的有關區段長吏名單於本月三十日上報都尉府;D 面為甲渠守候根據居延都尉府指示責令不侵候長憲等在其轄區進行調查,並將各郵站間的受付日時等詳細情況於本月二十六日以書面形式上報候官。此簡可視為逐級責問的實例。簡(28)、(29)、(30)三簡為甲渠郵候向居延都

尉府彙報調查情況的牒書。結果是自卅井誠勢北經木中、誠北到吞遠燧，“皆中程，留遲不在界中”。雖然(28)與(29)二簡之間尚有缺漏，但並不影響對文意的理解。由此，我們認為：漢代對郵書滯留誤期等事的考核，大致要經過收件者檢舉、都尉府責問和有關部門的調查、彙報等三個程式。一經查明，不僅直接責任者要受處罰，而且還須追究“吏主當坐者”即主管官吏的責任，如下簡：

(31) 十一月郵書留遲不中程各如牒晏等知郵書數留遲爲府職不身拘校而委任小吏忘爲中程甚毋狀方議罰檄到各相與邸校定吏當坐者言須行法

H55.11, H137.6, H224.3, H55.13, H224.14, H224.15

此簡即爲對不能身體力行而委任小吏，明知“郵書數留遲”而謊報“中程”的(都尉)府吏晏“議罰”並追究“吏當坐者”責任的文書。

對郵書留遲不中程負有責任者，除向上級部門陳述原因外，還須謝罪並接受處罰，以下三簡即爲當事人檢討過失的謝罪書：

(32) ☐九日謁府定行道十三日留釋叩頭死罪死罪 E.P.T53:128

(33) ☒☐皆留釋失期職事毋狀罪當死叩頭死罪 ☒ E.P.T59:541

(34) ☒日迫奉書不及以失期毋狀當坐罪當 ☒ H264.39

對郵書失期的處罰，視其情節輕重而有不同：

(35) ☒坐閏月乙卯官移府行事檄留遲三時九分不以馬行適爲戍卒城倉轉一兩 ☒致官會月十五日畢 E.P.T59:96

(36) 俱南燧長范譚留出入檄適爲驛馬運銚庭芟廿石致止害燧 E.P.T59:72

(37) 行罰檄到遣燧長鄭奴持食詣官會今當省治臨桐 ☐☒ E.P.F22:650

此三簡所記，或爲驛馬伐芟，或爲城倉轉運，或繕治亭燧等，均爲罰服一定時間的勞役。還有受杖者：

(38) 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塗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糴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督五十 E.P.T57:108A

簡中候史廣德因嚴重失職，被杖責五十，係數罪並罰。漢簡中還有罰金和奪勞的規定：

(39) 不中程百里罰金半兩過百里至二百里一兩過二百里二兩

不中程車一里奪吏主者勞各一日二里奪令 ☐各一日 E.P.S4.T2:8B

本規定書於居延都尉府就某候官遞送公文嚴重失期而責其調查上報的文書背面，當爲處理郵書失期所遵循的一般原則，而非臨時性的規定，或即秦簡《行書律》所謂“留者以律論之”之類的“律”。

封泥的作用，在於防止泄密和作偽，故在傳遞郵書時要盡可能保證封泥完整，即《論衡·定賢篇》所云“郵人之過書，……封完書不遺”者，“則爲善矣”。如果封泥破損就要受到處罰：

(40) 第十秭甲卒破檄封請辟行罰言狀 E.P.T44:4B

前述郵書在傳遞過程中，對有無封印，封泥是否破損或是否已經旁封等均作詳細記錄，

就是爲了明確責任。至於丟失郵件，尚未發現明確的處罰記錄，前引(24)簡正面所言“所行蒲封一至今不到解何”，就是對丟失郵書的調查詢問。

2、各級郵驛組織的月報與年報考核

承擔郵驛任務的各級組織除對過往郵書及時登記和遞送外，還要將本郵站或本轄區內各郵站的郵書傳遞和驛馬等情況逐月匯總，分別呈報上級部門。這些上報材料稱爲“郵書課”、“郵書刺”或“過書刺”和“驛馬課”。如“臨木燧建始二年二月郵書刺(E. P. T51:391)、“臨木部建武八年閏月郵書課”(E. P. T20:2)、“甲渠候官河平二年三月郵書□”(H227·14)、“不侵部建武六年四月驛馬課”(E. P. F22:640。)等，就分別是以燧、部和候官爲單位逐月上報的郵書課和驛馬課標題。其正文內容從以下各簡可知其梗概：

(41) 建始二年十二月甲寅朔甲寅臨木候長憲敢言之謹移郵書課一編敢言之

E. P. T51:264

(42) 元延四年九月戊寅朔戊寅不侵候□謹移八月郵書課一編敢言之

E. P. T40:147A

□□命第七吏即日下鋪時起

E. P. T40:147B

(43) □月郵書課北書一封張掖廣地候印詣居延四月癸亥卅以□ H214.12

(44) 北書三封合檄板檄各一其三封板檄張掖大守章詣府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大守府牛掾在所九月庚午下鋪七分臨木卒副受卅井卒弘雞鳴時當曲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行一時二分 H157.14

(45) 書一封居延都尉章詣大守府三月癸卯雞鳴時當曲卒便受收降卒文甲辰下鋪時臨木卒得付卅井誠勢北卒參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時中程 E. P. W:1

以上五簡所記內容雖互不相連，但均爲郵書課簡，據此可復原郵書課的基本格式。簡(41)及(42)正面爲郵書課正文開頭的書寫套語，記某年月日(干支記日)某官(如燧長、候長等)某某上報某月郵書課一編；簡(43)——(45)均爲郵書課正文，記郵書運行方向(如南書、北書等)、性質(如詔書、置記、府記、合檄、板檄等)、數量、發文者、收文者、各郵站受付時間、該郵書在本轄區內的運行里程、實際用時多少、是否中程(包括留遲與不及行)等。從(44)、(45)二簡所記郵書受付及運行區間來看，均爲甲渠候官某月的郵書課，至於候官以上的都尉府是否也逐月上報，目前尚難斷言。

郵書課本身也是郵書，故需記起發時間及遞送者，如簡(42)。一般在本月初上報前一月的郵書課，如簡(41)、(42)均爲本月初一，內容係由郵書運行記錄整理而成。所不同者，運行記錄是隨時登記，郵書課則是逐月整理，並據郵書受付時間對各區間的郵書運行中程與否作出評價，故多有“界中××里，定行幾時幾分(有的還寫當行幾時幾分)，中程(或不及行、過程、留遲幾時幾分)”等語；而郵書運行記錄則沒有這些內容。如果某月本區間無郵書過往，在月報材料中也要說明，如：

(46) 長長敢言之謹案四月毋郵書

E. P. T65:96

(47) 書言官三月毋郵書過界中者

E. P. T65:30

(48) 誠北部建武八年三月軍書課●謹案三月毋軍候驛書出入界中者……□

E. P. F22:391

(49) 入東軍書一封皂繒緯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門始建國二年九月戊子日蚤(早)

食時萬年亭驛騎張同受臨泉亭長陽

Ⅱ 0115①:59

“軍書課”當即過往軍事郵書的上報材料。敦煌懸泉漢簡表明,軍事郵書也是由郵驛系統負責傳遞的。據此可知漢代的郵驛組織同時承擔着軍情文書和一般行政公文的遞送,因而在逐月上報時也有“軍書課”與一般的“郵書課”之別。此外,漢簡中還見有“驛馬課”:

(50) ●不侵部建武六年四月驛馬課

E. P. F22:640

(51) 橐他駁南驛建平元年八月驛馬閱具簿

H502.7

(52) 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丁酉肩水候丹敢言之謹移傳驛馬名籍□□敢言之令

史臨尉史音

H284.2AB

簡(50)、(51)分別為不侵部和駁南驛逐月上報驛馬文書的標題。祇不過前者稱“驛馬課”,後者謂“驛馬閱具簿。”簡(52)為肩水候據所屬各驛站報告向都尉府呈送的“傳驛馬名籍”正文的起首部分。據相關簡例,本簡“名籍”後未釋讀的“□□”當為“一編”二字。至於“驛馬課”、“驛馬閱具簿”或“傳驛馬名籍”的具體內容,從敦煌懸泉漢簡所見的“傳馬名籍”冊^[15]來看,主要包括驛馬數量、毛色、牝牡、烙印、年齒、身高和名稱等。居延漢簡中則有如下記載:

(53) 驛一所馬二匹鞍勒各一□

H18.18

(54) 驛馬一匹駁壯齒四歲高五尺二寸 上 調習

H142.26

(55) □診視馬皆齒長終不任驛□

H266.17

(56) 城北燧驛馬二匹毋鞍勒□

E. P. T59:268

據此可知,驛馬課內容還包括有無鞍勒和馬的性能。簡(54)中的“上”當指馬的等級,“調習”可能是指尚需馴馭調教之馬。簡(55)則言因驛馬已超期服役而“終不任驛”。馬的年齒、性能直接影響郵書傳遞的效率,故須及時上報以求補充和更換。從下簡看,邊塞地區驛馬羸弱或年齒過長而不勝其役者似非個別現象:

(57) 候長候史馬皆廩食往者多羸瘦送迎客不能竟界大守君當以七月行塞侯尉
循行課馬齒五歲至十二歲

E. P. S4. T2:6

本簡所言候長候史馬“多羸瘦送迎客不能竟界”,故須更課體健齒壯者。五至十二歲當即驛馬的正常服役年齡,簡(56)中“馬齒皆長”或即超過十二歲的老馬。

除逐月上報的“郵書課”、“驛馬課”外,還有年度報告:

(58) 始建國天鳳二年正月盡十二月郵書驛馬課

E. P. F25:12A

●郵書驛馬課

E. P. F25:12B

本簡出土於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駐地)房屋遺址,簡上文字當為始建國天鳳二年甲渠候官年度材料的標題。與月報不同的是,此年報告將郵書課與驛馬課合而為一,稱“郵書驛馬課”,可能是因為郵書課與驛馬課所言同屬郵驛事務,可歸為一類,具有年終總結的意味。

迅速、準確和安全是古今郵遞一致遵循的原則。隨着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的空前

遼闊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體的確立，迫切需要建立全國範圍快速、高效、安全的資訊傳遞系統，以保證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署間行政公文和軍事情報的及時上陳與下達，由此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郵書寄發、運行、簽收和考核制度，從而保證了秦漢郵驛的高效運轉和政令軍情的及時傳遞。因此，秦漢統一局面的鞏固與發展，與其嚴密的郵驛管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注 釋

- [1]參閱熊鐵基：《秦代的郵傳制度——讀雲夢秦簡劄記》，載《學術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劉廣生等：《中國古代郵驛史》修訂版，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版之第5～6章；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載《文物》1990年第10期。
- [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以下凡引此書者均祇注篇名，不再寫書名。
- [3]《漢書》卷上。
- [4]參閱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王國維遺書》第6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110頁。
- [5]參閱《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集解引張晏說。
- [6]秦簡《法律答問》云“‘僞(矯)丞令’可(何)駁(也)？爲有秩寫其印爲大嗇夫。盜封嗇夫可(何)論？廷行事以僞寫印。”
- [7]《史記·李斯列傳》。
- [8]參閱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王國維遺書》第6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115頁。
- [9]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因簡文較長，恕不具引。以下凡引此書者均在簡號前加H表示，不另注。
- [1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凡引此書者均祇標簡號，不再注書名。
- [11]關於漢代時制，有一日十八時、十六時及十二時制之說，本文採用一日十六時之說。參閱宋會群、李振宏：《秦漢時制研究》，《歷史研究》，1993年第6期。
- [12]參閱《史記》、《漢書》之堪敬(列)傳。
- [13]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94頁一一三簡；吳初曠、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亦收錄此簡，簡號爲1291，但“樂望卒”之“望”字未釋。
- [14]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89頁一〇七簡。
- [15]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81頁九七簡，因簡文較長，恕不具引。

漢代的都官與離官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 于振波

《史記》三家注及《漢書》顏師古注都曾為都官作過注釋。自從睡虎地秦簡出土以來，一些學者又結合漢代史料對都官展開討論，所得結論，大體說來比較一致，即以《漢書》顏師古的有關注釋為基礎，對都官的涵義做了盡可能精確的推敲。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認為：

都官，直屬朝廷的機構，古書又稱中都官。《漢書·宣帝紀》注：“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1]

離官，附屬機構，與都官對稱。^[2]

于豪亮先生結合睡虎地秦簡和漢代關於都官的記載，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之後，認為：

“都官”是中央一級機關，“中都官”是在京師的中央一級機關，中央一級機關大部分在京師，因此稱為“中都官”，也有相當一部分不在京師，就祇能稱為“都官”。^[3]

上述觀點比顏師古的注釋都大大推進了一步。但是，內史、三輔之類設在京畿地區的地方行政機關是否在都官之列？是否“直屬朝廷的機構”或“中央一級機關”都可以稱為“都官”呢？諸如公、卿等朝廷大臣都有自己的辦公場所，而公、卿又各有自己的下屬機構乃至更小的分支機構，如果所有這些機構都稱作“都官”，又如何理解“離官”？本文擬結合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等資料，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一、都官是縣級機構

《漢書·成帝紀》：三輔長無共張徭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4]

三輔為京畿地區的地方行政區劃，長安屬於京兆尹，長陵屬於左馮翊。三輔與中都官並提，說明京畿地區的地方行政機構不屬於都官。

《史記·酷吏列傳》：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5]

“廷尉及中都官”一語表明，廷尉也不在中都官之列。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諸侯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6]

西漢前期諸侯王國的官制與朝廷的官制幾乎完全相同。王國的丞相、羣卿、大夫與都官並提，說明丞相、羣卿、大夫不屬於都官，反過來證明漢朝中央的丞相、列卿、大夫之類的高級官員也不屬於都官。

《漢書·王莽傳中》：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7]

這是《漢書》對王莽新朝中央官制的部分記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三為基數，整齊而刻板。這與西漢的官制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中關於都官的記述，仍然能向我們透露出漢朝的情況。新朝分主中都官的，是二十七大夫和八十一元士，而不是公、卿。這暗示着，都官除了不涉及地方行政之外，還有一定的級別限制。

《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官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8]

《漢書·元帝紀》：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9]

漢代二千石一般包括列卿、郡太守、郡尉（都尉）和王國相、內史等等中央和地方要員。此處的中都官與二千石、諸侯相等依秩次排列，說明這些官員不包括在中都官之內。而“下至中都官”、“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等等，表明中都官的級別在二千石、諸侯相之下。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10]

淮南王謀反，令官奴鑄造皇帝璽及各級官員的官印。這條史料說明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和二千石官員都不在都官之列，且官秩都高於都官令、丞。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官長’？可（何）謂‘嗇夫’？命都官曰‘長’，縣曰‘嗇夫’。”^[11]都官長與縣嗇夫（縣的長官）並提，反映出二者在職責或官秩上存在着某些關聯。下面我們再來看張家山漢簡中的幾條資料：

《二年律令·具律》：事當治論者，其令、長、丞或行鄉官視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縣道界也，及諸都官令、長、丞行離官有它事，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之官在所縣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長若真丞存者所獨斷治論有不當者，令真令、長、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斷治論及存者之罪。唯謁屬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12]

令、長、丞屬於縣級機構的吏員編制，而且“行鄉官視它事”的官員也祇能是縣、道等行政官員的職責，因此，該條律文提到兩種情況，一是針對縣、道官員，二是針對都官官員。

令、長是長官，丞爲其副，這些官員如果離開其官署，必須有人代行其職責。這條律文規定，代行離署官員職責的人如果工作出現失誤，那些離署的官員（不論是出外辦公，還是生病）也要負連帶責任。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如果這些離署的官員是去謁見其上司（“屬所二千石官”），就可不必負連帶責任。由此可知，都官的上司爲二千石官，而二千石官本身不屬於都官。因此，不論是從上下級機構的從屬關係上，還是從吏員設置上看，都官似乎與縣平級。

《二年律令·秩律》：太醫、祝長及它都官長，黃（廣）鄉長，萬年邑長，長安尉長，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鄉部百六十石。^[13]

整理小組注：“太醫、奉常和少府的屬官均有太醫；廣鄉，漢初似屬鉅鹿郡；萬年，邑名，漢初屬內史；長安尉，漢初屬內史。”都官之長與其他縣、邑等機構之長有相同的秩次，進一步證明了上述推論。“太醫、祝及它都官長”一語，表明屬於列卿下屬的太醫長、祝長等都是都官的長官。據此推測，列卿名下設有令、丞或長、丞的下屬機構，諸如奉常名下設有令、丞的太樂、太宰、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和設有長、丞的均官、都水，太僕名下設有令、丞的大廄、未央、家馬，治粟內史的名下設有令、丞的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和設有長、丞的幹官、鐵市，少府名下設有令、丞的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和設有長、丞的胞人、都水、均官，等等，當均爲都官。這些設有令、丞或長、丞的機構大部分設在京師，稱“中都官”；而設在京師以外地區的，則稱爲“都官”。

《二年律令·置吏律》：都官除吏官在所及旁縣道。都官在長安、櫟陽、雒陽者，得除吏官在所郡及旁郡。^[14]

這是對都官所辟除屬吏的籍貫加以限制。漢代郡、縣等地方長官辟除屬吏也有籍貫限制，嚴耕望先生指出：

州郡國縣道侯國政府之屬吏皆由長官自辟本域人，各以本州、本郡國、本縣道侯國所轄之境爲準，不得用轄境以外之人。

監官長吏自辟之屬吏，必用本籍人，唯京畿郡縣可除外。^[15]

兩相對照就會發現，漢代對都官長官辟除屬吏的籍貫限制與漢代對縣級地方屬吏的籍貫限制是一致的。廖伯源先生對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等材料詳細考察後指出：

《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有鹽、鐵官長、丞七例，史籍一例，八例皆非本郡人。鹽鐵官在地方任職，且其職掌涉大利，因比照地方官吏之籍貫限制，謂鹽鐵官吏與地方行政官吏之籍貫限制同。^[16]

鹽、鐵官均爲都官，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具體論述。這裏需要指出，廖先生的上述推斷與《二年律令·置吏律》完全一致。而都官官吏的籍貫限制與縣級地方行政官吏的籍貫限制相同，證明都官爲縣級機構。

二、離官蠡測

前文說鹽官、鐵官均爲都官，是根據尹灣漢簡的相關資料得出的結論。據尹灣漢簡《集簿》：^[17]

縣、邑、侯國卅八，縣十八，侯國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

令七人，長十五人，相十八人……

縣、邑、侯國屬於同級地方行政機構，縣、邑的行政長官爲令或長，侯國的行政長官爲相。根據上述簡文，東海郡有十八個縣、十八個侯國和兩個邑，總計三十八個縣級地方行政單位；同時又有七個令、十五個長和十八個相，計四十個縣級長官。那麼，爲什麼三十八個縣級地方行政單位卻出現了四十個縣級長官？可能的解釋是，由於都官不屬於地方行政單位，所以不計入三十八個地方行政單位之中，但是吏員數量是根據官秩統計的，所以都官的吏員與縣、邑、侯國的吏員統一合計，結果就出現了上面三十八個地方行政單位卻有四十個縣級長官的現象。換言之，東海郡有四十個縣級單位，其中三十八個爲地方行政單位，另外兩個爲不涉及地方行政的中央直屬單位。也就是說，都官的長官與縣平級，這進一步證明都官爲縣級單位。

那麼，東海郡的都官究竟指的是什麼？這可以從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得到解答。東海郡的三十八個縣級地方行政單位(縣、邑、侯國)均出現在《吏員簿》中，此外，在縣、邑和侯國之後，《吏員簿》又列出三個鹽官和兩個鐵官的吏員編制情況：^[18]

伊盧鹽官吏員卅人，長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嗇夫二人，佐廿五人，凡卅人。

北蒲鹽官吏員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嗇夫二人，佐廿二人，凡廿六人。

郁州鹽官吏員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嗇夫一人，佐廿三人，凡廿六人。

下邳鐵官吏員廿人，長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官嗇夫五人，佐九人，亭長一人，凡廿人。

□鐵官吏員五人，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嗇夫一人，佐二人，凡五人。

《東海郡吏員簿》按太守府、都尉府和縣、邑、侯國、鹽官、鐵官的順序列出了各單位的吏員編制情況，並在文書的末尾有東海郡吏員的匯總數目“最凡吏員二千二百二人”，而這一數字與上述各單位吏員數目的總和是一致的，因此有理由相信，該文書是一份完整的文書。既然如此，上面所提到的東海郡的兩個都官祇能出自於鹽官與鐵官中間。可是，這三個鹽官和兩個鐵官中，哪兩個可能是都官呢？我們注意到，三個鹽官中祇有伊盧鹽官設長，兩個鐵官中祇有下邳鐵官設長，其他鹽、鐵官都祇設丞及其以下官吏，因此，我們認爲，所謂都

官，當指設長的鹽官和鐵官。

那麼，如何理解那些與縣、邑、侯國列在一起卻沒有設長的鹽官和鐵官呢？我們認為，未設長的鹽官和鐵官可能就是附屬於都官而與都官對稱的“離官”。這可以從《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的有關記述中得到說明：^[19]

鹽官長，琅邪郡東莞徐政，故都尉屬，以廉遷。

鹽官丞，汝南郡汝陰唐宣，故大常屬，以功遷。

鹽官別治北蒲丞，沛郡竹薛彭祖，故有秩，以功遷。

鹽官別治鬱州丞，沛郡散丘淳于賞，故侯門大夫，以功遷。

鐵官長，沛郡相莊仁，故臨胸右尉，以功遷。

鐵官丞，臨淮郡淮陵龔武，故校尉史，以軍吏十歲補。

鐵官別作□丞，山陽郡方與朱賢，故有秩，以功遷。

鑒於鹽官設有長、丞的祇有伊盧鹽官，鐵官設有長、丞的祇有下邳鐵官，因此，上述簡文中的鹽官長、鹽官丞和鐵官長、鐵官丞儘管沒有注明其所在的地名，我們也能知道他們分別是伊盧鹽官和下邳鐵官的長、丞。至於“別治”、“別作”，從字面意思上看，當指分支或派出機構；而從簡文內容上看，標有“別治”、“別作”字樣的，恰恰是那些沒有設長的鹽官和鐵官。由此可知，那些沒有設長的鹽官或鐵官是作為設長的鹽官或鐵官的分支或派出機構而存在的，並受設長的鹽官或鐵官管轄，而這正與離官的情況相符。據此推斷，所謂“別治”或“別作”，當是離官的不同稱呼而已。從東海郡的情況推斷，某郡如果有若干個同類性質的機構，則祇設一個都官，其他為離官；離官的長官，其官秩和許可權比都官的長官低，且受都官長官的管轄。

三、關於張家山漢簡一條簡文的注釋

如果說都官是直屬於中央機關的縣級機構，就會與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對下面這條簡文的某些注釋相抵觸：

《二年律令·置吏律》：縣道官之計，各關屬所二千石官。其受恒秩氣粟，及求財用年輸，郡關其守，中關內史。受（授）爵及除人關於尉。都官自尉、內史以下毋治獄，獄無輕重關於正；郡關其守。^[20]

縣、道的帳目，要向其上級單位的二千石長官（郡守或王國相等）報告。縣、道官吏根據其官秩領取官府提供的定量糧食，以及縣、道每年的各種開銷，各郡的縣、道要向其郡守彙報，京畿地區的縣要向內史彙報。“中關內史”中的“內史”和郡屬於同級地方行政機關，不同之處在於，內史是管理京畿地區地方行政事務的機關，其長官也稱內史。整理小組對這部分簡文的注釋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出在簡文的後半部分。如果按照整理小組的解釋：“尉，疑指廷尉。下文之‘尉’也

應是廷尉。”就意味着廷尉負責官吏的辟除和爵位的授予。可是，不論是從傳世文獻的記載中，還是從考古資料中，都找不到廷尉有這方面職責的證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廷尉，秦官，掌刑辟”；^[21]《後漢書·百官二》：“廷尉……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22]都與授爵或辟除官吏無關。鑒於這條律文主要是講縣、道與其上級單位二千石長官的關係，我們有理由認為，此處的尉是指縣尉。授爵是否與廷尉或縣尉有關，由於材料不足，姑且不論，但縣、道屬吏的任用，尉是有決定權的，里耶秦簡中編號為 J1③ 157 的簡牘就是一例。^[23]這雖然是秦朝的情況，當與漢代的情況相去不遠。因此，我們認為，簡文中第一個“尉”是縣尉，而不是廷尉。

“都官自尉、內史以下毋治獄”一語中的尉和內史應該是指都官的屬吏。試想，如果這裏的尉指廷尉、內史指京師的地方行政長官，而廷尉和內史都是二千石官，這句話豈不是意味着不許二千石以下官員治獄？二千石以下的官員不能治獄難道由三公來治獄嗎？這是明顯與事實不符的。郡、縣的長官都有權治獄，而其屬吏卻不一定有這個權力，對此無需贅言。都官是縣級單位，其長官應當可以治獄，而其某些屬吏不能治獄，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如果把此處的尉、內史理解為都官的屬吏，就不會出現上述悖論。我們知道，秦代和西漢前期，京畿地區的地方行政長官稱內史，後來其轄區一分為三，變成三輔，其長官的名稱也隨之改變；漢朝諸侯王國的行政長官也稱內史，直到成帝時廢。至於簡文中提到的這個“內史”，或許是對都官某些屬吏的通稱，也有可能是“令史”或其他官名的筆誤，總之文獻不足徵，祇好存疑^[24]。但是不論從上下文的關係上看，還是從漢代郡縣治獄的實際情況上看，此處的尉、內史應當是都官的屬吏，而不可能是廷尉、京師內史這樣的高官。

整理小組認為：“正，此處指廷尉正，為廷尉屬官。”我們則認為，此處的“正”，指的是都官之上級單位的長官。既然這條簡文的最後一句“郡關其守”是指縣、道官的獄訟審理結果要向其上級單位郡彙報，與此相對應的都官“獄無輕重關於正”，當指都官長官審理獄訟的結果，要向其上級單位的長官彙報。由於都官的上級長官都是中央某機關的大臣，如廷尉、太僕、治粟內史、少府等等，簡文中有時稱“屬所二千石官”，“正”也許是其簡稱。至少，作為縣級單位的都官，越過其所屬的二千石長官而直接向廷尉及其屬吏彙報刑獄審理結果，好像不太可能。

四、結論

最後，讓我來歸納一下本文的結論：

第一，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及其所轄各縣、邑的長官官府，屬於地方行政機關，不是都官。

第二，公卿等中央大員的某些下屬機構是都官，但公、卿等官員的官署本身不是都官。

第三，祇有長官為令或長的中央直屬機構纔可稱為都官。

第四,某郡如果有若干個同類性質的機構,如鹽官或鐵官,則祇設一個都官,其他為離官。離官的長官,其官秩和權限比都官的長官低,並受都官長官的管轄。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使用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之漢籍全文資料庫、簡帛金石資料庫和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國學寶典”等文獻檢索系統,在此致謝。

注 釋

- [1]《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34頁。
- [2]《睡虎地秦墓竹簡》,59頁。
- [3]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見《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112頁。
- [4]《漢書·成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305頁。
- [5]《史記·酷吏列傳·杜周》,3153頁。
- [6]《漢書·百官公卿表上》,741頁。
- [7]《漢書·王莽傳中》,4103頁。
- [8]《漢書·宣帝紀》,242頁。
- [9]《漢書·元帝紀》,288頁。
- [10]《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3090~3091頁。
- [11]《睡虎地秦墓竹簡》,192頁。
- [12]《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148頁。
- [13]《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202頁。
- [14]《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162頁。
- [15]語出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筆者無從借得此書,故轉引自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天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99頁。
- [16]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120頁。
- [17]《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77頁。
- [18]《尹灣漢墓簡牘》,84頁。
- [19]《尹灣漢墓簡牘》,93~94頁。
- [20]《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簡文見161頁,注文見162頁。
- [21]《漢書·百官公卿表上》,730頁。
- [22]《後漢書·百官二》,中華書局,1965年版,3582頁。
- [23]該簡正面是涇陵響舍夫向遷陵縣令、尉提交的報告,大意是說,該鄉成里的里典以及涇陵郵的郵人有缺額,決定任用成里的居民成為里典、勾為郵人,並請求遷陵縣令、尉批准。該簡的背面是遷陵縣的批復,遷陵縣派縣丞到涇陵鄉實地考察後認為,成里祇有二十七戶居民,已有一典,不需要再任命一個典,因此縣尉決定把成、勾都用作郵人。詳見拙文《里耶秦簡中的“除郵人”簡》,《湖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 [24]《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裴松之注引華嶠《譜敘》曰:“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見中華書局,1982年版,406頁)這是三國西晉時期的情況,而且將內史作為縣的官吏而記載下來的也僅此一條,為孤證。

國家圖書館所藏漢簡考釋

◎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 汪桂海

上世紀三十年代，居延地區漢代烽燧遺址出土了大量漢簡，當時，裘善元手中也收藏有一批，約四五十枚。裘氏的這批簡後來分散至各處，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整理居延漢簡資料，最終編成《居延漢簡甲編》，當時找到這批流散各處的漢簡中的一部分，其中有：

- 1、1944年歸於前西北圖書館（後歸前中央圖書館）計二十七枚簡。
- 2、商承祚所藏六枚簡
- 3、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六枚簡（一枚簡舊存，五枚簡1954年文物局撥交）。
- 4、南京博物院所藏一枚簡（1936年北京歷史博物館移交）。

共計40枚簡，均係裘善元售出者（見《居延漢簡甲編·陸·編輯後記》）。後來，《居延漢簡甲乙編》（上、下）出版，收錄居延漢簡更為齊全，但對這批流散漢簡的收集工作再沒有新的進展。

事實上，經裘善元手中流散出的居延漢簡在國家圖書館也收藏有兩枚。這兩枚簡從未向外界公佈過，至今不為學界所知。筆者因工作關係，得以見到這兩枚簡，發現其中一枚學術價值甚高，不可因其為零簡而忽視之。

兩枚簡釋文如下：

簡一：癸亥詔。遇為侍郎騎秩比四百石，居，地節三年十月辛酉詔。致，遇秩四百石，居

簡二：肩水金關

兩枚簡原先均係藏書家張蔥玉先生舊藏，張先生則得自裘善元，時間在1946年。與兩枚簡一同得到的還有木勺一枚，木檢一枚，均無文字，張氏為此撰跋文，自叙得木簡之樂，云：

地節乃漢宣帝劉詢年號，迄今已兩千零四年，辛墜流沙蘊藏不壞。余懷想十年，今

始得之，因署“漢簡樓”以自傲。

三十五年四月渝州陶園寓居者

從木簡來源以及簡二文字為“肩水金關”來看，它們應出自居延地區。簡二在已公佈的居延漢簡中較常見，這裏不作討論。下面着重說一下前一簡。

這枚簡長 23.3 釐米，寬 1.3 釐米，厚 0.3 釐米，長度恰為一漢尺，是普通漢簡的標準長度。木簡是順木紋堅削削製而成，紋理細密而清晰，質地堅硬，材質應是松木。居延漢簡的大多數是就地取材，用松木削製成的。

從簡文分析，此簡是一枚詔書目錄簡，在這枚漢簡的前後還應有別的簡與之編聯成冊，此簡祇是一卷簡冊中的零簡。

簡中“遇為侍郎騎秩比四百石，居，地節三年十月辛酉詔”一句，應是關於地節三年十月辛酉所下詔書內容的提要性記錄。《漢書·百官公卿表》：侍郎，光祿勳屬官，秩比四百石，與議郎、中郎、郎中皆掌守宮殿掖門戶，“出充車騎”。“侍郎騎”當即在皇帝外出時充車騎之侍郎。“遇”有邂逅相逢、不期而會之意。《論語·微子》：“遇丈人以杖荷蓀。”皇侃《義疏》：“遇者，不期而會之也。”《禮記·王制》疏引《五經異義》：“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居”有止息、停止不動之意。《呂氏春秋·慎人》：“舜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也。”高誘注：“居，止也。”意謂舜手足胼胝也不停止歇息。又《素問·平人氣象論》：“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日心死。”王冰注：“居，不動也。”這句話的大意應是：與充作侍郎騎的秩比四百石的官員邂逅相逢時，要中斷任何活動，保持肅靜。

“致，遇秩四百石，居”一句的下文所接應是“某年某月某日詔”等字，是對另一次所下達詔書內容的提要性記錄。致，此處疑當作民衆會聚解釋。《左傳》哀公二年，楚人“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杜預注：“致之者，會其衆也”。《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氓。”鄭玄注：“致，猶會也。”簡文所提到的聚會，當非每年八月案戶比民時的聚會，應指民間閭里進行公共活動時的聚會。此時，若有秩四百石的官吏不期而至，要中斷正在進行的聚會活動，保持肅靜。

依照簡文體例，“癸亥詔”三字之前，應有另一枚簡，上書“某年某月癸亥”所下達詔書的內容提要。

從這枚簡上的文字可以看出，它的内容涉及到漢代人在遇見某種級別的官吏時的儀軌或行為規範。類似內容的規定，在《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書中有所記載，現在能見到的祇是此書中的一些佚文：

- 1、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避。衛士傳不得進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
- 2、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

執板拜，朝賀對揖。

3、[侍御史]見中丞，執板揖。

4、[城]門候見[城門]校尉，執板下拜。

5、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6、(司隸校尉)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謁，持板揖。公議、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

又《漢舊儀》：

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

“漢官典職儀式”，顧名思義，指的是漢代職官的職掌和禮儀規範。古代職官制度不僅包括各類職官的職掌及相互間的運作，還包括不同職官之間的禮儀規範。今人對後一方面的研究似乎注意不夠。上面這些材料都屬於職官禮儀規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秩級低的職官遇見秩級高的職官，皆須行敬禮，或執板下拜，或執板對揖。例如尚書郎(秩四百石)，見到尚書(秩六百石)，須執板對揖；見到尚書令(秩千石)、尚書僕射(秩六百石)，須執板下拜。城門候(秩六百石)見城門校尉(秩比二千石)，須執板下拜。

第二、三署郎、尚書臺與御史臺職官，秩雖不高，但地位甚為尊顯。例如，三公(秩萬石)諸卿(秩中二千石)遇見秩級比自己低得多的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尚書郎、御史中丞(秩千石)、侍御史(秩六百石)等臺官，所乘車馬皆須預先避開，讓開道路，等待臺官的車馬過去之後，纔能離開。三署郎不過秩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見到三公諸卿卻皆不必行敬禮。尚書臺之位尊在所有職官中尤為突出，如御史中丞遇見尚書丞、郎(秩四百石)，也要將所乘車馬避開，讓開道路，並且須執板作揖。待尚書丞、郎的車馬走遠了，御史中丞的車馬纔可以離開。此時，尚書丞、郎則乘於車上，祇行舉手禮。

國圖這枚詔書目錄簡提到地節三年十月辛酉詔書內容為“遇為侍郎騎秩比四百石，居”。侍郎是三署郎之一，可見，這道詔書也與對三署郎的禮儀規範有關，可惜現在祇能知其內容大概，而難知其詳。儘管如此，這枚簡依然為我們研究漢代職官禮儀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

這枚簡上的詔書目錄，每條包含該詔書的內容摘要和下達時間。我們知道，以往公佈的居延漢簡中有兩枚與詔書目錄有關的簡，反映漢代詔書目錄的兩種形態，它們是：

1、縣置三老二 行水兼輿船十二 置孝弟力田廿二 徵吏二千石以符卅二
郡國調列侯兵卅二 年八十及乳朱需頌殿五十二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3, 10.1, 13.8, 126.12

2、[詔]書七月己酉下√一事丞相所奏臨淮海賊/樂浪遼東

□得渠率一人，購錢卅萬，詔書八月己亥下√一事大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3.8

對第一枚簡，大庭脩、陳夢家都曾作過很細致的探討。二人的意見儘管略有差異，但思路卻

比較一致，都是試圖從史書中找到與該簡提到的詔書令相同的詔書並確認其下達時間。陳夢家認為這是漢武帝之前的施行詔書目錄，屬於《甲令》或《令甲》。（《漢簡綴述》陳夢家，中華書局1980年）大庭脩也認為它是先帝第一級之令或曰令甲，但同時又指出目錄內容“多與郡守職能有關，故不排斥是太守挈令之類法令集的可能。”（《漢簡研究》大庭脩撰、徐世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事實上，漢代所下達的詔書，內容相近的往往不止一件，例如，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提到的與王杖有關的詔書令就不止一例，現見到的它們在蘭臺令中的編號就有第卅三、第卅二、第卅三等，而且時間間隔很大。與這枚簡涉及到的詔書令內容相近的詔書同樣不會祇有一例，未必能夠與史書裏保留下的詔書找到一一對應的關係。

漢代詔書具有法令的效力，詔書令的編纂方法應與其它官府文書檔案一樣，根據內容分類，每一類中所收的詔書令按先後次序編排並編號。但《合校》的這枚詔書目錄簡涉及的詔書都不屬於同一類，因此，其後所附編號不可能是各詔書令在相應律令裏的編號，與王杖簡出現的“蘭臺令第卅三”、“蘭臺令第卅二”、“令在蘭臺第卅三”不能等同。

我個人認為，此詔書目錄應是居延地區官府吏員從大量詔書令中挑選編定的一組詔書令，目的不外二端：一是日常行政事務處理時，作為法令舊例之參考依據；二是供小吏學習律令與文書制作等吏事時的參考教材。因此，這是一個詔書令選本。其中每件詔書後的編號應是按選本中詔書令的先後次序而重新給予的，不可能與史書中出現的“令甲第X”之類有對應關係。大庭脩提出“不排斥是太守挈令之類法令集的可能”是有道理的，可惜未作深論。

至於第二枚目錄簡，則應是當時詔書檔案目錄的基本式樣，該目錄書於一枚稱作“兩行”的簡上，是某一年施行詔書的目錄，據考證時間當為更始元年。（《簡牘文書學》李均明、劉軍，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這個目錄的每一條目均由兩部分構成，即詔書內容摘要以及下達時間，編排次序是按照下達時間的先後。將此簡與國圖所藏的這枚木簡比較之後，會發現二者在格式上有很一致的一致性。從這兩個詔書目錄的實例可以看出來，漢代詔書檔案的編纂確實是按照內容不同來分類編纂的。更始元年目錄簡包含的大約都是關於鎮壓某些造反民衆類的詔書。國圖藏目錄簡包含的則是關於職官禮儀類的詔書。

詔書目錄簡的價值很大，它可以為我們瞭解漢代文書檔案的編纂整理，認識漢代律令的編定、增益過程提供了具體實例，對研究漢代各種令的形成過程很有幫助。

可以說，國圖所藏這枚漢簡雖祇有寥寥數字，卻為研究漢代詔書目錄與職官儀軌增加了一條重要材料。

居延漢簡中“無朔簡”年代考釋

◎ 內蒙古師大科學史研究所

◎ 羅見今

一、引言

漢簡中紀年簡是少數，大量簡牘沒有年號。如果對非紀年簡進行分類，則有幾類的年代有可能經考釋而被確定。現已知至少有三類：一、曆譜散簡，二、記有某月朔干支的“月朔簡”，三、八節干支簡。根據中國傳統曆法朔閏八節干支出現的周期性，以及在一定時段內某朔閏八節干支出現的獨特性，這些非紀年簡斷代研究在理論上可信，在實踐中可行。本文繼續這一系列研究，對第四類非紀年簡——“無朔簡”的年代進行考釋，共涉及 60 餘枚居延漢簡。

漢簡中僅記有月份而日數不明的干支簡比比皆是，如“六月甲子”、“九月乙巳”、“二月戊午”（見 15.2, 16, 25 號簡）等，以及“閏月己亥”（274.21A）、“□二年九月庚寅”（EPT43:83）等，後者帶有無年號的年數。這類非紀年簡的共同特徵是：簡上沒有月朔記錄，本文將其定義為“無朔簡”。它們的年代一般不可求。

祇有少數“無朔簡”的年代可被認定。一種考釋方法利用了簡上與曆法無關的記錄：其史實記載與史書相合，或它的内容甚至筆跡與紀年簡一致。如《居延新簡釋粹》第(183)：

例一、“正月辛丑，御史大夫定國行丞相事，下小府，中二□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屬實/令史元”（EPT53:66A）

據《漢書·于定國傳》和《百官表》，確認“該簡為甘露三年元月所下之詔無疑”^[1]。以下本文舉出兩例。

例二、“□三年十一月戊寅下”(EPT59:493)

此簡與 59.61, 62, 99 三簡所記“●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內容、筆跡一致,知它是該年詔令片段。

例三、“□□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酉令賜□”(EPT56:327)。

此簡的干支序列奇特,與居延簡 162.7, 10, 12—15 等所記序列相同,而後者為元康四年簡(162.6)。

能用這種方式確定年代的簡畢竟太少了,研究者一般不把這類簡列入年代考釋範圍。需要指出,根據簡上僅有的時間記錄和出土資訊,無朔簡年代考釋可作為一個專題予以解決。於是必須回答兩個問題:

問題一:無朔簡應具備哪些條件纔有可能考定其年代?

問題二:能否找到一種一般的方法來求這類無朔簡的年代?

原有的研究已經給出個別實例:

例四、“□六年十月癸卯甲渠郵□□”(231.22)

考釋結果:“應為天鳳六年十月辛丑朔,三日癸卯”^[2]。同文對 EPT43:83 號所加注中提出“按伴出紀年簡”的方法,並列出兩個可供選擇的年代。

這些方法可資參考。但結果是零星的,考釋方法沒有形成體系。

本文從無朔簡中挑選出具有附加條件的一部分,提出一種一般的方法,根據伴出簡上下時限和《二十史朔閏表》^[3],運用曆法知識和邏輯推理,反推出朔的範圍,減少該月朔所屬年代的可能,或考出它們的年代。

本文各簡釋文依《居延漢簡釋文合校》^[4]和《居延新簡——甲渠候官》^[5]。

二、無朔簡年代考釋選例

第 1 枚:263, 14 號,釋文為

“九月庚寅日勒田官令史顯□□□□□”(A 面)

“十月甲午石北亭長廣都”(B 面)

“橐他候官 肩水候官

倉石候官 庚候官”(C 面)

出土於地灣(A33),263 組僅有一枚前 80 年的紀年簡(263.6 號)。

在 A33 的全部 105 個編號組中,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紀年簡、可構成上下時限的編號組共有 36 組,其上下時限的平均跨度 17.86 年 \approx 18 年。據此統計,可假定 263 組時限與此相似。於是以前 80 年為中心,劃出前 88 至前 71 年的區間。即將該簡上下時限看作是前 88

年至前 71 年。簡文九月與十月雖分屬 A、B 兩面，但寫於同簡，應為同年。則“九月庚寅(27)^①”至“十月甲午(31)”共 5 天，十月朔必為辛卯(28)至甲午中的一天。在上述 18 年區間內十月朔干支序數在(28)至(31)的僅有元鳳二年(前 79)九月小甲子(01)朔庚寅廿七日，十月癸巳(30)朔甲午二日。結論是惟一的。

漢昭帝時的簡在居延漢簡中屬於較早的，也較少。按此簡明確列出肩水都尉所轄四候官，但未列出廣地候官，對於研究邊塞防禦組織的設置、發展與變化，公元前 79 年的結論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時間線索。

第 2,3 枚:10.29,31 號,釋文為

“閏月丁巳 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卒史義”(10.29)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
當用者如詔書/令史得”(10.31)

出土地為地灣(A33),10 編號組紀年簡上限前 71 年,下限前 61 年。查朔閏表,在該區間內有四年置閏:

地節元年(前 69)閏正月己巳(06)朔 地節三年(前 67)閏九月甲申(21)朔

元康二年(前 64)閏七月戊戌(35)朔 神爵元年(前 61)閏四月壬午(19)朔

簡文“閏月丁巳(54)”、“閏月庚申(57)”應在此四年內,僅有閏七月戊戌(35)朔與之相容。故知這兩簡應是記元康二年^② 閏七月廿日和廿三日事。^[6]

另,10.6 號簡記“閏月庚子(37)”,僅與以上四朔中(06)相悖,故有其餘三個可能的年代。

第 4 枚:202.15 號,釋文為

“□□□□為□□券書家財物一錢□

□□□□到二年三月癸丑□”

出土地為破城子(A8),202 編號組上限前 61 年,下限前 59 年。在此時段內恰有神爵二年(前 60)三月丙午(43)朔,簡文“三月癸丑(50)”與之相容。癸丑當為該年三月八日。

第 4 枚簡所屬編號組時限較窄,所考年代似為巧合。一般說來,不排除真實年代有跳出該組時限的可能性,假如拓寬時限,原考結論不變,則其可信度就提高。在 A8 的全部 164 個編號組中,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紀年簡的共 82 組,其上下時限的平均跨度為 20.12 年 \approx 20 年。據此統計,將第 4 枚置於前 69 至前 50 年考察,則滿足條件的增加兩簡:前 56 年三月癸丑(50)朔和前 52 年三月庚寅(27)朔。放大區間跨度有助於比較不同時限內同一記錄的獨特性,有利於判斷結論的可信度。

第 5 枚:54.23AB 號,釋文為

① 注:為便於計算,本文在干支後附記它的序數,甲子、乙丑……癸亥記作 01,02,……,60。

② 注:神爵元年實閏三月壬子(49)朔(大庭脩,1960),而非如《二十史朔閏表》或其他曆表^[7]之閏四月,這兩簡的年代就增加了一個可能:神爵元年閏三月六日和九日。此二簡與 10.27 號“元康五年”簡為同冊(陳夢家^[6],1980),則結論僅為公元前 61 年簡。

“五月庚辰初壘亭盡甲辰廿四

二百九十/五月乙巳作四”(A面)

“肩水成亭二所下廣二丈八尺四

六月簿餘穀百六十石四”(B面)

出土地為地灣(A33),54編號組僅有前54年紀年簡一枚(54.10號)

簡文A面“五月庚辰(17)”至“五月乙巳(42))”共26天。若五月大,庚辰可能是五、四、三、二、一日,此時五月朔當在丙子至庚辰,即(13)至(17);若五月小,朔當在(14)至(17)。

仿照第1枚簡的考證法,A33各編號組上下時限的平均跨度為18年,據此統計,可假定54組時限與此相似。於是以前54年為中心,劃出前63至前45年的區間。則五月朔(13)至(17)應在其中。查《朔閏表》,此19年中僅有前55年五月大丙子(13)朔滿足,其餘18年五月朔非(13)至(17)中的任一個,均予排除。故確知54.23AB記五鳳三年(前55)事,五月五日庚辰開始建亭,幹了25天,直到五月廿九日甲辰(41)。該月晦為卅日乙巳。

第6枚:209.22,釋文為

“十一月己卯掾彊所收五年餘芟錢二千五十五

元年芟錢萬四千五百廿八●凡萬六千五百八十三

出錢五千七百廿五□收掾車給官費

出錢三千八百六十六□居延責錢

亭 □

□ □ 出錢千縣所□□

□ □

凡出萬五百九十一

今餘錢五千九百九十二

出錢四百五十一十一月壬辰付令史根□□□

出錢三百一十一月壬辰付士吏□□□□□”

出土地為破城子(A8),209編號組無紀年簡。首先注意到簡文“元年”在“五年”之後,兩年的芟錢相加亦合於簡上記錄,同時“十一月己卯(16)”至“十一月壬辰(29)”共14天。A8的上下時限為前88年至公元31年,可用它來代替209組的時限,因為“五年”之後的“元年”為數較少,在此119年內也不過五個,淘汰其十一月朔同(16)至(19)不相容的前38、公元6和14年,可得與簡上內容不悖的兩解:

初元五年後的永光元年(前43)十一月甲子(01)朔己卯十六日 壬辰廿九日

建昭五年後的竟寧元年(前33)十一月丙寅(03)朔己卯十四日 壬辰廿七日

第7枚:264.21號,釋文為

“□□□六月庚寅付四

四

□四

□□□六月甲子朔時當曲”

出土於 A8,264 組上限前 44 年,下限前 5 年。六月甲子到庚寅 27 天,甲子可能是四至一日,或六月朔當在(58)至(01)四者之一。在該組時限的 40 年內,與此相合的六月朔共有三年:可能是建昭二年(前 37)或建平元年(前 6)六月壬戌(59)朔甲子三日、庚寅廿九日,或河平二年(前 27)六月甲子朔、庚寅廿七日。由此例可見當考察區間較大時,其解的個數一般也要增加。

第 8 枚:339.17 號,釋文爲:

“□二年十一月戊辰除爲□士吏□□年”

出土於地灣(A33),339 組僅有前 37 年的紀年簡一枚(339.14)。A33 各組平均跨度 18 年,據此劃出區間前 46 至前 28 年,排除與簡文“十一月戊辰(05)”相斥的兩個“二年”(前 42、前 31),相容者僅有建昭二年(前 37)十一月己未(56)朔,戊辰當爲十日。

第 9 枚:135.1 號,釋文爲:

“□□□二年閏月癸卯誠北侯長弘□”

出土地爲破城子(A8),135 編號組上限前 34 年,下限前 28 年。在此時區內恰有建始二年(前 31)閏正月己丑(26)朔,簡文“閏月癸卯(40)”與之不悖。癸卯當爲該年閏正月十五日。假如將上下時限擴大到三倍,即:上限前 41 年,下限前 21 年,則相容者僅增加一解:建昭二年(前 37)閏八月庚寅(27)朔,癸卯當爲十四日。說明同時滿足“二年”、“閏月”、“癸卯”三個周期的解在這 21 年中僅有兩個。

第 10 枚:75.20 號,釋文爲

“閏月壬午定時西山上者出吏

三月甲辰餐府半見□”

出土地爲金關(A32),75 編號組紀年簡上限前 32 年,下限前 10 年。假設簡上所記閏月與三月相連(即閏二月),則壬午(19)至甲辰(41)時跨 23 天;或當三月在前時(即假設閏三月),時跨 39 天。列出前 32 至前 10 年各閏月朔,淘汰與簡文“閏月壬午(19)”相斥的前 31、前 26、前 18 年;再列出所餘各年的三月朔,淘汰與簡文“三月甲辰(41)”相斥的前 21、前 12、前 10 年,所餘三年與簡文相容:

建始四年(前 29)三月丁酉(14)朔 閏十月癸酉(10)朔

陽朔二年(前 23)三月壬寅(39)朔 閏三月壬申(09)朔

永始二年(前 15)三月丙戌(23)朔 閏五月甲寅(51)朔

最後,考察閏月與三月的距離。上面所列三年中前後兩年閏月與三月相去太久,再予淘汰。故結論爲:75.20 號簡記陽朔二年事,三月三日甲辰與閏三月十一日壬午。簡上所記三月與閏三月相連可能性較大,可信度較高;如不作此假設,則有上述三解。

第 11 枚:495.11 號,釋文爲

“出麥大石三石四斗八升 閏月己丑食驛馬二匹盡丁酉□”

出土於大灣(A35),495組有兩枚前2年的紀年簡。A35共45個編號組,有伴出紀年簡的20個組的上下時限平均跨度為15.45年 \approx 15年。據此統計劃出區間:前9年到公元6年。其中閏月朔皆與簡文“閏月己丑(26)”至“丁酉(34)”相悖,或皆容不下(26)至(34)共9天。說明該簡年代跳出了預設的區間。為此可將上下限放寬一倍:前18年到公元11年(後者取A35下限),其中與簡文相容者僅元延元年(前12)閏正月小己巳(06)朔,知己丑廿一日,丁酉廿九日晦。簡文:“盡丁酉”,漢簡常見所“盡”者為一月之末,今求出丁酉晦,可信。

第12枚:140.3號,釋文為

“戌卒梁國睢陽新□里公乘孫□年廿六 九月丙寅出 癸巳入”

出土地為金關(A32),140編號組紀年簡上限前27年,下限前8年。簡文“九月丙寅(03)至癸巳(30)共28天。若九月大,丙寅可能是三、二、一日,此時九月朔當在甲子(01)、乙丑(02)及丙寅;若九月小,則朔在(02)、(03)。在前27至前8年區間內查九月為此三朔者,僅有元延元年(前12)九月小乙丑朔相合,故知該卒二日丙寅出,廿九晦日癸巳入。

通過估算某月朔干支所在範圍,即可考出簡所屬年代(如第1、5、12枚較典型),這是同月同朔干支的周期性所確定的,可證明這一周期律為 $31n(\pm 5)$ 年。例如,當 $n=1$,為26,31或36年,當 $n=2$,為57,62或67年等。已據此考釋了一批“月朔簡”的年代,見注[8][9][10]。

第13—16枚:EPT5:19A,21,6.102,59.30號共4枚

第13枚:EPT5:19A號,釋文為

“□給元年十二月辛丑盡二年三月積三□”

□償元年五月庚辰盡八月積三月□

□二石三斗 □”

第14枚:EPT5:21號,釋文為:

“□少償元年五月庚辰盡七月積二月廿一日食□

□年十二月盡二年三月積四月小畜直月六斗□

□升少”

第15枚:EPT6:102號,釋文為:

“□十二月辛丑盡二年三月積三月二十叁日祿粟□”

第16枚:EPT59:30號,釋文為:

“九月奉泉七百少千四百六十九宣又當得元年十二月辛丑盡二年”

出土於額濟納河流域(E)破城子(P),探方(T)號為5、6(甲渠候官遺址塢內東北角)和59(塢東灰堆)。T5上限前54年,下限公元15年,T6公元14至30年,T59前62年至公元32年。四簡均記“(元年)十二月盡二年”,其中三簡有“十二月辛丑”,故知四簡內容相關,可互相補充;字跡相似,應為同時所書。

漢時計算積日,凡整月不論大小,習慣皆按30日入算(例如居延簡145.37號所示演算

法),故據“五月庚辰(17)盡七月積二月廿一日食☐”,若五月大,從庚寅至晦日庚子(37)共21天,此時五月辛未(08)朔,庚辰十日;若五月小,此時壬申(09)朔,庚辰九日。今查《朔閏表》,“元年”且五月朔在辛未者,兩漢僅有公元9年;又查“元年”且五月朔在壬申者,兩漢僅有公元107年。後者超限,不取。

又據“十二月辛丑(38)盡二年三月積三月二十泰日祿粟☐”,若十二月大,從辛丑至晦日丁卯(4)共27天,此時十二月戊戌(35)朔,辛丑四日;若十二月小,此時己亥(36)朔,辛丑三日。今查《朔閏表》“元年”且十二月朔在戊戌者,兩漢有前80年、公元9和107年。前後兩年超限甚遠,不取;又查“元年”且十二月朔在己亥者,兩漢竟無。

綜上可得惟一的結論:上述四簡“二年”指始建國二年(公元10);元年五月大辛未朔庚辰十日,十二月大戊戌朔辛丑四日。

第17—57枚:EPT59:191—228,84,98,494號,共41枚。

第17枚:EPT59:194號,釋文爲

“尉史李崇 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十二月辛未自取 卅”

注:十二月辛未取大黃布的簡共5枚,另有195,196,217及494號。

第18枚:EPT59:226B號,釋文爲

“十二月二十二日賦吏二十六人

十二月十泰日賦吏十三人”

第19枚:EPT59:198號,釋文爲

“☐☐☐長賜林,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十二月丁丑候長良取 卅”

注:十二月丁丑取大黃布的簡共8枚,另有199,209,212,215,218,219,224號。

第20枚:EPT59:192號,釋文爲

“推木候史馮長 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三年正月己丑候長☐☐取 卅”

注:正月己丑取大黃布的簡共8枚,另有197,200,202—205及98號。

稱這類內容的簡爲“大黃布簡”,再如

“●右第十部士吏以下吏十一人用大黃布百三十三枚” (EPT59:220)

“●右第十泰部候長以下吏九人☐” (EPT59:223)

“●右吞遠部士吏以下吏九人用大黃布百一十泰枚今☐” (EPT59:228)

“●最候以下吏百泰人 用大黃布千三百☐” (EPT59:22)

“大黃布簡”41枚,僅錄以上8枚,餘從略。“大黃布”是新莽貨幣。

出土於破城子塢東灰堆,T59上下限爲前62~公元32年。這41枚簡應在分發十月俸錢大黃布的過程中寫成。三年十二月辛未(08)、丁丑(14)、四年正月己丑(26)分發過三次,前後19天。先估算四年正月朔所在範圍,應不早於戊寅(15)、不遲於己丑(26)。注意到簡文將四寫成三,是新莽時特點,到建武四年已不見此寫法(如EPF22:338,328,45A,126諸簡)。因此可直接取出新莽時的三個“四年”來考察,其中公元17年正月朔在丁巳(54),不在

(15)至(26)內,捨去,得到兩解。前者是始建國四年,後者是地皇四年。

注意到 EPT59:226B 記錄的十二月十七、廿二日(曾有官吏取大黃布)兩個日期。如依後解,地皇三年十二月小辛未十九日、丁丑廿五日,與記錄相差兩三天;如依前解,則與記錄基本吻合,據此得到一個結論:始建國三年(公元 11)十二月大丙辰(53)朔辛未十六日、丁丑廿二日和四年正月丙戌(23)朔己丑初四日,甲渠候官所轄第十、十七與吞遠諸部候長、士吏以下官吏至少有 107 人曾分三次領取拖欠的俸祿,EPT59 中共 41 枚簡對此作了記錄。

第 58 枚:EPT43:64,釋文爲:

“□三年十二月乙亥甲溝尉史常付小府吏□□”

出土於破城子,T43 在塢內西北角,該探方上限前 4 年,下限 26 年。在此 30 年中含“三年”者有六個,淘汰與簡文“十二月乙亥(12)”相悖的四個(前 4,公元 3,16,25 年),可得兩解:

始建國三年(公元 11)十二月丙辰(53)朔乙亥廿日

地皇三年(公元 22)十二月癸丑(50)朔乙亥廿三日

文獻[2]考此簡年代爲後者,根據是“甲溝爲新莽更名”。按此兩解皆爲莽曆,不應排除前者。順便提及,同文考 EPT43:83 號簡“□二年九月庚寅甲□□□”爲“建平二年(前 5),或更始二年(公元 24)”,漏掉了另四解(前 1,公元 2,7,10 年)。由此可見方法不嚴密導致結論不可信。

第 59 枚:EPW98,釋文爲:

“□□侯氏年三十九歲六年閏月中除爲甲溝□”

出土於破城子塢內,上限前 38 年,下限公元 23 年。此時限內恰有天鳳六年(公元 19)莽曆閏正月。假如任意放大時限,以 A8 上下限(前 88 至公元 31 年)代之(參考第 8 枚簡),其間既爲“六年”又有閏月者僅此一解。另有前 75 年因與簡文“甲溝”(新莽時更名)相斥,捨去。在此 61 年內考釋結果惟一,表明其可信度。

第 60 枚:231.22 號,釋文爲

“□六年十月癸卯甲渠郵□□”

出土於破城子 A8。231 組上限公元 20 年,下限 29 年。恰有天鳳六年(公元 19)十月辛丑(38)朔與簡文“十月癸卯(40)”相容,與文獻[2]所考一致。假如擴大上下限,以 A8 的上下限(前 88 至公元 31 年)代之(參考第 8、59 枚簡),其間有四個“六年”;同時滿足“十月癸卯”者也僅爲天鳳六年(另有前 81 年捨去)。在此 119 年內考釋結果惟一,表明其獨特性。

第 61 枚:231.28 號,釋文爲

“武彊隧長並持延水卒責錢詣官閏月辛酉□”

出土資訊同第 60 枚簡。在公元 20 至 29 年內含閏月共四年,與簡文“閏月辛酉(58)”相容者僅建武三年(公元 27)閏二月戊午(55)朔,辛酉四日。

三、結 論

上述 61 枚簡既無紀年，又無月朔，所記主要是月份與某日干支，但大部分簡的年代可以惟一考出。現在可以回答引言中的兩個問題了。

問題一：無朔簡應具備哪些條件纔有可能考定其年代？

對以上各例進行歸納，可將條件分為兩種：

(1)簡上祇寫一個月名與日干支的，須有“閏月”以及無年號的“二年”、“六年”等附加資訊。這些其實都是周期性標誌：閏周（這裏指連續兩閏始點間的平均時間）是 33.5851 個月，即 33 或 34 個月；而西漢的年號不少是四年一換。這些周期有利於確定年代。

(2)一簡（或相關多簡）上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月名與日干支的，祇要能證明這些日期在同月、鄰月或相近月，則其年代一般易於考定。

問題二：能否找到一種一般的方法來求這類無朔簡的年代？

第一，依據伴出紀年簡年代，劃定欲考簡所處的上下時限。當伴出紀年簡資訊不足時，所選時限跨度應與該簡出土地各探方（或各編號組）平均跨度相當（見第 1 枚的說明）。該簡年代也有可能跳出此時限，就將跨度適當放大（見第 11 枚的做法），目的是利用《朔閏表》在此區間內檢索。

第二，利用月朔與該月日干支的“相容性原則”作出取捨判斷。例如某月大戊寅（15）朔，則日干支（15）至（44）必在此月內，為相容；而（01）至（14）、（45）至（60）均在此月外，為相斥（見第 10 枚的淘汰法）。反之，假如某月大戊寅（15）為月中任一日，欲反推朔的範圍，則該月朔干支必不在（16）至（45）內，為相斥；而（01）至（15）、（46）至（60）均有可能為此月朔，為相容（見第 12 枚的定朔法）。反推朔的範圍是本法的關鍵。

第三，根據簡上記錄的日期通過假設或估算，反推出該月朔干支所在的範圍，仿照求“月朔簡”年代的方法，用《朔閏表》查出該簡的年代（見第 1, 5, 12, 13—16, 17—57 枚）。若獲得一解，該簡年代即被考定；若得到兩三解，可錄以備考。

祇要滿足無朔簡應具備的條件，此法頗為有效，不妨稱之為“估朔求年法”。

“估朔求年法”可用於一般年代考釋，其適用範圍當不以簡牘研究為限。

注 釋

[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羣、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69 頁。

[2]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編：《漢簡研究文集》，任步雲：《甲渠候官漢簡年號朔閏表》表三。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年，463 頁。

[3]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 年新 1 版。

[4]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

- [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年。
- [6] 陳夢家：《漢簡綴述·漢簡年曆表叙》（中華書局，1980年，233頁）認為，據居延漢簡 10.27, 5.10, 332.26, 10.33, 10.30, 10.32, 10.29, 10.31 八簡同冊，可證陳垣等諸表所載神爵元年（前 61）閏四月壬午朔誤，當為閏三月壬子（49）朔。這是一項重要的修正，當然需得到史學界、天文曆法學界的公認。筆者見到 1990 年出版的“歷代頒行曆書”中仍然記作閏四月壬午朔。[7] 屬於朔閏表本身正誤的考證，超出本文範圍，故仍依文獻[3]進行討論。
- [7] 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85頁。
- [8] 羅見今：《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的月朔簡年代考釋》，《中國科技史料》，第 18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72 ~ 83 頁。
- [9] 羅見今、關守義：《敦煌漢簡中的月朔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1998 年 1 期，總第 5 期，158 ~ 165 頁。
- [10] 羅見今：《居延漢簡中月朔簡年代考釋》，臺灣《漢學研究》，第 17 卷，第 2 期，1999 年 12 月，169 ~ 185 頁。

居延漢簡中無朔簡年代考釋一覽表

| 簡號 | 簡牘釋文 | 時限 | 考釋時間 | 公元年 | 參考時間 | 備注 |
|------------------------|---|--------------------|----------------------|--------|------------------------|-----------------------|
| No.1 A33 263.14 | 九月庚寅日勅田官令史……A 十月甲午石北亭長廣都 B 桑他候官 肩水候官……C | 前 88 - 前 71 | 元鳳二年 庚寅廿七 甲午二日 | 前 79 年 | | |
| No.2 A33 10.29 | 閏月丁巳 張掖肩水城尉誼 以近次兼行都尉事…… | 前 71 - 前 61 | 元康二年 閏七月 丁巳廿日 | 前 64 年 | 神爵元年 閏三月 丁巳六日 | 與下簡 同月 所書 |
| No.3 A33 10.31 |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 以私印行候事…… | 前 71 - 前 61 | 元康二年 閏七月 庚申廿三 | 前 64 年 | 神爵元年 閏三月 庚申九日 | 與上簡 同月 所書 |
| No.4 A8 202.15 | □□□□爲□□券書家財物 一錢□ □□□□到二年三月癸丑□ | 前 61 - 前 59 | 神爵二年 三月 癸丑八日 | 前 60 年 | | |
| No.5 A33 54.23 | 五月庚辰初壘亭盡甲辰廿□ 二百九十 / 五月乙巳作□ A 面 | 前 63 - 前 45 | 五鳳三年 庚辰五日 甲辰廿九 | 前 55 年 | | |
| No.6 A8 209.22 | 十一月己卯據彊所收五年…… 元年焚錢萬四千五百廿八…… 十一壬辰付令史根……A | 前 88 - 公元 31 | 永光元年 十一月 己卯十六 | 前 43 年 | 竟寧元年 前 33 年 己卯十四 | 兩解 |
| No.7 A8 264.21 | □□□□六月庚寅付□ □□□□六月甲子 舖時當曲 □□ | 前 44 - 前 5 | 建昭二年 甲子三日 庚寅廿九 | 前 37 年 | 河平二 前 27 甲子朔 | 建平元 前 6 三解 甲子三日 |
| No.8 A33 339.17 | □二年十一月戊辰 除爲□士吏□□年 | 前 46 - 前 28 | 建昭二年 十一月 戊辰十日 | 前 37 年 | | |
| No.9 A8 135.1 | □□□二年閏月癸卯 誠北候長弘□ | 前 34 - 前 28 | 建始二年 閏正月 癸卯十五 | 前 31 年 | | |
| No.10 A32 75.20 | 閏月壬午定時西山上者出吏 三月甲辰賁府半見□ | 前 32 - 前 10 | 陽朔二年 甲辰三日 壬午十一 | 前 23 年 | 前 29 年 或 前 15 年 | 假定閏三 月。否則 共有三解 |
| No.11 A35 495.11 | 出麥大石三石四斗八升 閏月己丑食驛馬二匹盡 丁酉□ | 前 18 - 公元 11 | 元延元年 己丑廿一 丁酉廿九 | 前 12 年 | | |
| No.12 A32 140.3 | 戌卒梁國睢陽新□里 公乘孫□年廿六 九月丙寅出癸巳入 | 前 27 - 前 8 | 元延元年 丙寅二日 癸巳廿九 | 前 12 年 | | |

居延漢簡中無朔簡年代考釋一覽表(續)

| 簡號 | 簡牘釋文 | 時限 | 考釋時間 | 公元年 | 參考時間 | 備注 |
|------------------------|---|--------------------|-----------------------|---------|-----------------------|----------------------|
| No.13 EPT 5:19A | □給元年十二月辛丑 盡二年三月積三□ □僨元年五月庚辰……A | 前 54 — 公元 15 | 始建國元年 庚辰十日 辛丑四日 | 公元 9 年 | | 13-16 似為同 人所書 |
| No.14 EPT 5:21 | □少僨元年五月庚辰盡七月 積二月廿一日食□ □年十二月盡二年三月積…… | 前 54 — 公元 15 | 始建國元年 五月大 庚辰十日 | 公元 9 年 | | 同上 |
| No.15 EPT 6:102 | □十二月辛丑盡二年三月 積三月二十黍日祿粟□ | 公元 14 — 30 | 始建國元年 十二月大 辛丑四日 | 公元 9 年 | | 同上 |
| No.16 EPT 59:30 | 九月奉泉七百少千四百 六十九宣又當得元年 十二月辛丑盡二年 | 前 62 — 公元 32 | 始建國元年 十二月大 辛丑四日 | 公元 9 年 | | 同上 |
| No.17 EPT 59:194 | 尉史李崇 十月祿 大黃布十三枚 十二月辛未自取 卅 | 前 62 — 公元 32 | 始建國三年 十二月大 辛未十六 | 公元 11 年 | | 辛未日 取布簡 共 5 枚 |
| No.18 EPT 59:226 | 十二月二十二日賦吏 二十六人 十二月 十黍日賦吏十三人 B | 前 62 — 公元 32 | 始建國三年 壬申十七 丁丑廿二 | 公元 11 年 | | 此兩月 取布簡 共 41 枚 |
| No.19 EPT 59:198 | □□□長賜林 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十二月丁丑候長良取 卅 | 前 62 — 公元 32 | 始建國三年 十二月大 丁丑廿二 | 公元 11 年 | | 丁丑日 取布簡 共 8 枚 |
| No.20 EPT 59:192 | 推木候史馮長 十月祿 大黃布十三枚三年 正月己丑候長□□取 卅 | 前 62 — 公元 32 | 始建國四年 正月 己丑初四 | 公元 12 年 | | 己丑日 取布簡 共 8 枚 |
| No.58 EPT 43:64 | □三年十二月乙亥甲溝 尉史常付小府史□□ | 前 4 — 公元 26 | 始建國三年 十二月 乙亥廿日 | 公元 11 年 | 地皇三年 公元 22 乙亥廿三 | 兩解 |
| No.59 EPW 98 | □□侯氏年三十九歲 六年閏月中除為甲溝□ | 前 38 — 公元 23 | 天鳳六年 閏正月 | | | 莽曆 |
| No.60 A8 231.22 | □六年十月癸卯甲渠鄯□□ | 公元 20 — 29 | 天鳳六年 十月癸卯 初三日 | 公元 19 年 | | 莽曆 |
| No.61 A8 231.28 | 武彊隧長並持延水卒 黃錢詣官閏月辛酉□ | 公元 20 — 29 | 建武三年 閏二月 辛酉四日 | 公元 27 年 | | |

懸泉漢簡《失亡傳信冊》所反映的兩個問題

◎ 甘肅省博物館

◎ 李永平

懸泉漢簡中的永光五年《失亡傳信冊》是一份很重要的文書，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1]中已予以披露。張德芳、胡平生二位先生，在《敦煌懸泉漢簡釋粹》^[2]中對此冊作了詳細的注解。筆者不揣冒昧，現就該簡冊所能反映出的兩個問題發表看法，不足之處，望學界師長給予指正。

一、關於“祀祠孝文廟”

漢代皇帝有嚴格的祖宗祭祀制，這種制度不僅是顯示皇帝的正統地位，光宗耀祖的儀典，還是闡述其制國方略，宣傳其大政方針的“宣言書”。漢景帝繼位之初就頒佈了為孝文帝建廟的詔書：“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奢侈，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職。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體儀奏。”^[3]該詔書給漢文帝政、刑方面的政績以贊譽，明確提出皇帝本人（漢景帝）要繼承文帝的施政措施。結果，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內的衆大臣表示一致擁護。緊接着，漢高祖劉邦的廟被列為“太祖之廟”，文帝廟被列為“太宗之廟”，並頒佈制書宣告天下：“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4]但是，孝文廟的設立，祇限於景帝“行所嘗幸郡國。”^[5]漢武帝時沒有祭祀孝文廟，祇是在明堂祭了文帝，《漢書·武帝本紀》：太始四年春正月壬午，在泰山“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

祀孝景皇帝於明堂。”昭帝祭祀孝文廟的情況，《漢書·昭帝紀》記載：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漢書·郊祀志》對昭帝時期祭祀祖宗廟的情況記載簡略，僅有短短的十四個字：“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時，對前皇帝的廟有一個統計數字：“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所。”^[6]漢元帝初即位，就因“毀廟”之議引發了朝廷大臣之間的爭論。貢禹上奏，要求將惠帝和景帝的廟全部毀掉，對於在各郡國建的廟也應“不應古禮，宜正定。”^[7]但是未及施行貢禹就死去了。到永光四年（前 40）時，漢元帝再次頒發詔書，就“罷郡國廟”的事，要求“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8]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等七十位大臣都一致認為：“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9]元帝採納衆人建議罷昭靈太后等六人的廟，“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10]在此之後月餘，漢元帝就“罷廟之事”再次徵詢各大臣的意見。朝廷內卻出現了三派不同的意見。

以丞相韋玄成為首的四十四人認為：“……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11]

以大司馬許嘉為首的二十九人則持不同的意見，尤其是不同意毀孝文廟，認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12]

廷尉忠認為武帝廟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則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13]

元帝對是否毀廟，毀哪些廟猶豫不決，並就在當年即永光四年（前 40）“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14]。所謂“依違”，顏師古注曰：“依違者，不決也”。也就是說元帝本人拿不定主意。《失亡傳信冊》中所反映，永光五年（前 39）朝廷頒發的“祭祀孝文廟”的文書，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頒發的。《失亡傳信冊》的發現至少可以說明，在永光五年（前 39），朝廷頒發了要求“祭祀孝文廟”的詔書，而對於這點，《漢書》中是看不出來的。

二、鄭弘在永光五年前後的政治動向和元帝時期朝廷內部的鬥爭

該追查文書的簽署者御史大夫鄭弘，為元帝時期的重臣，《漢書》卷 66 有本傳：“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跡，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漢元帝時期朝廷的內部鬥爭，早在元帝繼位之前就已埋下伏筆，原因是宣帝曾一度想立淮陽憲王欽。《漢書》卷 75《京房傳》載：永光、建昭年間，京房“奏考功課吏法”。目的是考察在任高級官吏的“崇教化”和社會治安的治理情況，遭到了當時在京師的部刺史的堅決反對，“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15]在《京房傳》的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發現，

京房所抨擊的，不僅是當時各地大權在握的地方大員，還有當時在朝廷權傾一時的宦者石顯、五鹿充宗和丞相韋玄成（元帝的老師）。如彈劾他的石顯、五鹿充宗等人就認為，京房曾與丈人張博說：“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16]從開始反對京房的主張到“後善之”，再到被京房推崇作為替代韋玄成的丞相候選人，很可能，鄭弘在元帝時期的朝廷政治鬥爭中是與京房等人一度站在一條線上的。根據《漢書》的記載，京房、張博“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17]這件事情發生在建昭二年（前 37），丞相韋玄成死於建昭三年（前 36）六月甲辰。韋玄成與鄭弘以及京房等人之間是否存在鬥爭，《漢書》的作者班固在各自的本傳中沒有明確說明。對於京房則比之於漢武帝時的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時期的眭孟、夏侯勝，元、成時期的翼奉、劉向、谷永，哀、平時期的李尋、田終術。並評論說：“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18]《漢書》卷 75《京房傳》指出：儘管這些人（即與京房等屬同類的上述儒者）道術不一定精明，但他們的建議對朝廷來說是值得重視的。並特別指出京房的悲劇：“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19]對於鄭弘，則與公孫賀、車千秋等同列於卷 66，儘管對鄭本人沒有評價，但是在“贊”中卻感慨地說：“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20]前述，在永光四年（前 40）時，鄭弘與丞相韋玄成等七十餘位大臣還都一致認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這說明，這個時候御史府與丞相府在有些方面是能達成一致的，但是，到建昭二年（前 37）時，鄭弘就因卷入朝廷鬥爭而被“坐與（京房）論議免”。永光五年正處於這個時間段，因此，我們認為《失亡傳信冊》中傳信的丟失和急迫追查丟失的傳信，正反映了朝廷內部鬥爭激烈和文書管理的紕漏疏忽。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從當時的政治鬥爭背景和《漢書》的有關記載中進行認識和分析。漢元帝時，宦官為首的中樞機構大權在握。丞相韋玄成等人曾曲從於石顯等人。“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21]“以顯（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22]石顯等人十分善於用朝廷文書籌劃陰謀，為試元帝對自己的態度，曾“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23]石顯等人的對朝廷文書的控制，是在對京房等人的鬥爭勝利後變本加厲的，而丞相、御史兩府的鬥爭正為石顯等為首的內朝所利用。

注 釋

[1]見《文物》2000 年第 5 期。

[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4]《漢書》卷5《景帝紀》。

[5][6][7][8][9][10][11][12][13][14]《漢書》卷73《韋玄成傳》。

[15][16][18][19]《漢書》卷75《京房傳》。

[17]《漢書》卷9《元帝紀》。

[20]《漢書》卷66《鄭弘傳》。

[21]《漢書》卷81《匡衡傳》。

[22][23]《漢書》卷93《石顯傳》。

西漢汝陰侯墓一號木牘《儒家者言》章題釋文

◎ 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

◎ 韓自強 韓 朝

前 言

阜陽西漢汝陰侯墓除出土大批竹簡外，還有三件木牘，其中有二件殘損，祇有編為一號的木牘完整。一號木牘長 23、寬 5.4、厚 0.1 釐米。木牘正面和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排，由右至左書寫章題；正面上排 7 行，中排 8 行，下排 9 行；背面上排、中排各 9 行、下排 5 行，尾部書“右方□□字”，木牘共書寫 47 個章題。內容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除了幾題字跡漫漶不清外，大都能在先秦和西漢時期的著作裏，尤其是《說苑》、《孔子家語》和《新序》裏找到它們的踪跡。

1973 年河北省定縣漢宣帝五鳳三年劉修墓出土的《儒家者言》^[1]炭簡 27 章，其中有 14 章與木牘內容相同，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認為“這部分簡從思想、內容直到體裁都是完全統一的，應當是單獨的一種書。”阜陽一號木牘章題的發現，更有力證實這是單獨的一種書。定縣這部分簡已被整理組定名為《儒家者言》，阜陽木牘沒有自書書名，姑以《儒家者言》章題名之。

釋文以木牘字體書寫，辨認不出的字以“□”代替，內容暫時找不到出處的，以存疑標出。編號從木牘正面上排自右向左順序編排，直到背面終止。

釋 文

一 子曰言病則豪

注：本章未查到出處，存疑。

二 子思曰學所以盡材

注：本章見《說苑·建本》：“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盡作益，材作才。

《大戴禮記·勸學》：“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

《荀子·勸學》：“吾嘗終日而思矣，”

三 子曰北方有獸

注：本章見《說苑·復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𪚩，”其前段“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依木牘應獨立為一章，《呂氏春秋·不廣》、《淮南子·道應訓》作“北方有獸，(其)名曰𪚩(𪚩)。”

《韓詩外傳·卷五》作“西方有獸名𪚩。”

四 孔子之匡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

《家語·困誓》作“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韓詩外傳·卷六》作“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

《莊子·秋水》作“孔子游於匡，宋國人圍之數匝。”

定縣簡：“□□之匡，問子欲殺陽虎。”

五 陽子曰事可之貧

注：本章見《說苑·權謀》：“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

六 白公勝弑(弑)其君

注：本章見《新序》：“白公勝將弑楚惠王，”

定縣簡也有這一章。

七 中尼之楚至蔡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遭難陳蔡之境，”《家語·困誓》作“孔子遭難厄於陳蔡之間，”

另有一篇《說苑·雜言》：“孔子困於陳蔡之間，”

《家語·在厄》作“楚昭王聘孔子……路出於陳蔡。”

《荀子·宥坐》作“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韓詩外傳·卷七》：作“孔子困於陳蔡之間，”

兩篇文章，多種書籍增刪引用，現難以確認何條為原作。

八 齊景公謂子貢子誰師

注：本章見《說苑·善說》：“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

《韓詩外傳·卷八》作“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

定縣簡作“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

九 季康子謂子游

注：本章見《說苑·貴德》：“季康子謂子游曰：”

十 子貢見文子言

注：本章見《說苑·善說》：“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木牘章題以客為主突出子貢回答“三窮三通”的道理。

十一 趙襄子謂中尼

注：本章見《說苑·善說》：“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
定縣簡作“趙襄子問中尼曰：先生行見。”
趙襄子與孔子時代不同，此章屬寓言類。

十二 孔子臨河而歎

注：本章見《說苑·權謀》：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
《家語·困誓》作“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

《孔叢子·記問》、《呂氏春秋·應同》、《史記·孔子世家》、《三國魏志·劉虞傳注引〈新序〉》以及定縣簡都有記載，木牘用特定時間和地點“孔子臨河而歎”作篇題。

十三 孔子將西遊至宋

注：本章見《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
《家語·賢君》作“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

十四 魯哀公問孔子當今之時

注：本章見《說苑·尊賢》：“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
《家語·賢君》作“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

十五 孔子曰丘死商益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
《家語·六本》作“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

十六 □□□□□

注：字迹漫漶不清

十七 孔子見衛靈公□歎且

注：本章疑為《說苑·政理》：“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
《家語·賢君》作“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
《呂氏春秋·先己》作“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

十八 子路之上趨也

本章尚未查到出處，疑是佚文。

十九 子路行辭中尼敢問新交取親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
《家語·子路初見》作“敢問：親交取親若何？”
定縣簡作“新交取親。”

二十 孔子行毋蓋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將行，無蓋，”

《家語·致思》作“孔子將行，雨而無蓋。”

二十一 子曰里君子不可不學

注：本章見《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不學’，”

《家語·致思》作“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

《大戴禮記·勸學》作“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

《尚書大傳·略說》作“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

二十二 子曰不觀高岸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曰：‘不觀於高岸’，”

《家語·困誓》作“孔子曰：‘不觀高崖’，”

二十三 子貢問孔：曰賜爲人下

注：本章見《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

《家語·困誓》作“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

《荀子·堯問》作“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

《韓詩外傳·卷七》作“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

定縣簡作“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如不知爲’。”

《春秋繁露·山川頌》亦有記載。

二十四 子曰自季桓子賜我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家語·致思》作“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

《孔叢子上》作“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

二十五 子路問孔：曰治國何如

注：本章見《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

《家語·賢君》作“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二十六 子貢問中尼曰死□□□知毋□

注：本章見《說苑·辨物》：“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將無知也？’”

《家語·致思》作“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

二十七 子路持□孔：問曰

注：本章見《說苑·貴德》：“子路持劍，孔子問曰：”

《家語·好生》作“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

二十八 孔子之楚有獻魚者

注：本章見於《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

《家語·致思》作“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

二十九 曾子問曰□子送之

注：存疑

三十 曾子曰鄉不辭聖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曾子曰：‘響不辭聲’，”

三十一 公孟子口見顓孫子莫

注：本章見《說苑·修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

三十二 子夏問中尼□淵之爲人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
《家語·六本》、《列子·仲尼篇》作“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
《淮南子·人間訓》作“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

三十三 子曰處爲有禮矣

注：本章尚未查到出處，疑爲佚文。

三十四 □公問萬邦子病

注：本章尚未查到出處，疑爲佚文。

三十五 □□□君子有三務

注：本章見《家語·三恕》：“孔子曰：‘君子有三思，……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三十六 □□□有死德三

注：本章疑是《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三十七 □山問孔子

注：本章尚未查到出處，疑爲佚文。

三十八 孔子閑處氣焉歎

注：本章見《說苑·尊賢》：“孔子閑居，喟然而歎曰：”
《家語·賢君》作“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
定縣簡作“孔子閑處，喟然歎曰：”

三十九 曾子有疾公孟問之

注：本章見《說苑·修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論語·泰伯》作“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定縣簡作“曾子有疾，公猛義往問之。”

四十 楚伐陳 = 西門燔

注：本章見《說苑·立節》：“楚伐陳，陳西門燔，”
《韓詩外傳·卷一》作“荆伐陳，陳西門壞，”
定縣簡作“楚伐陳，西門燔。”

四十一 孔子見季康子

注：本章見《說苑·政理》：“孔子見季康子，”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

四十二 中尼曰史鯀有君子之道三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仲尼曰：‘史鯀有君子之道也’，”

《家語·六本》作“史鯀有男子之道三焉！”

四十三 晏子聘於魯

注：本章見《晏子春秋·雜篇》、《韓詩外傳·卷四》。

定縣簡亦有殘句。

四十四 子路行辭中 = 尼 = 曰曾女以車

注：本章見《說苑·雜言》：“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

《家語·子路初見》作“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

定縣簡作“子路行辭於孔 = 子 = 曰曾若以車乎”

四十五 衛人醢(醢)子路

注：本章見《家語·曲禮子夏問》：“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

四十六 孔子之周觀太廟

注：本章見《說苑·敬慎》：“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

《家語·觀周》作“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

另外《太公金匱》、《金樓子·戒子篇》亦有相似的記載。

四十七 孔子問曰□□上其取之也

注：疑爲佚文

右方□□字

注：右方記章題字數，惜已漶滅不清。(見圖版 256)

結束語

《儒家者言》章題的發現，證實了它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單獨的一種書。章題是用傳統的方法，把每一章的首句作爲章題。首句如果太長，則用本章的典型事物來作章題，例如“衛人醢子路”；“孔子臨河而歎”；“中尼之楚至蔡”等。

一號木牘共有 47 個章題，其中有 8 章因漫漶不清或暫時查不到出處或已成佚文者外，剩下的 39 章章題，其內容大都保存在《說苑》和《孔子家語》兩書裏。特別是《說苑》保存的最多，共 34 章；《孔子家語》26 章；《新序》2 章。39 章的內容有一些被先秦和漢代的著作所加工、採用，如《荀子》有 4 章；《大戴禮記》2 章；《呂氏春秋》4 章；《淮南子》2 章；《韓詩外傳》7 章；《孔叢子》2 章；《史記·孔子世家》、《春秋繁露》、《列子》、《晏子春秋》、《尚書略說》、《太公金匱》、《金樓子》等，各有一章。從這些書引用《儒家者言》的內容來分析，《儒家者言》一書

產生於戰國時期是沒有問題的。

一號木牘出於汝陰侯夏侯竈墓(西漢文帝15年,前165),定縣簡出土中山懷王劉修墓(西漢宣帝五鳳3年,前55),在這一百多年內,《儒家者言》作為單獨的一種書,一直在世上流傳,祇是到了漢成帝時(前32—前7)皇族劉向領導並參與了對秦漢古籍的全面整理,從皇家或民間收藏的衆多古籍裏去除“章句相溷,上下謬亂”者,輯錄出《說苑》、《新序》、和《別集》(《別集》已失傳)。我們從一號木牘章題的編排次序可以看出隨意性很明顯,但到了“以著述當諫書”,“陳古事以諷今”的劉向手裏,就把這部流傳已久的書“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剪裁歸屬為臣術1章,建本2章,立節1章,貴德3章,復恩1章,政理3章,尊賢3章,敬慎1章,善說3章,權謀2章,雜言11章,辨物1章,修文2章。同樣的內容,又被《孔子家語》分解,歸納到五儀解1章,致思5章,三恕1章,好生1章,觀周1章,賢君5章,六本3章,子路初見4章,困誓4章,曲禮1章。

從《儒家者言》章題和定縣炭簡內容來看,《說苑》裏保存的這部分《儒家者言》的內容還是比較原始的。《孔子家語》和其他漢代著作所引用的內容,多有所增刪加工的痕跡,因此《說苑》亦顯得真實寶貴。劉向編輯的《說苑》流傳以後,作為“單行本”的《儒家者言》或許還有其他內容的“單行本”都逐漸失傳了。一號木牘的出土,使我們重新目睹了兩千多年前的《儒家者言》的本來面貌,這也是今世學人的幸運和福分。

注 釋

[1]《定縣40號墓出土竹簡簡介》、《儒家者言釋文》和《略說》,定縣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1981年第8期。

再談“神烏傳(賦)”

◎ 香港中文大學

◎ 饒宗頤

(一)

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村出土《神烏傳(賦)》，其釋文先刊於《文物》1996年第8期，嗣後著文研治者多家，有揚之水：《神烏賦讀論》（《中國文化》14期，1996年），繼有虞萬里：《神烏傳箋釋》（臺灣第一屆國際暨第三屆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33～852頁）。近年，書法界亦重視此簡冊，對其書法，大加贊揚，於《書法叢刊》1997年4期全文錄出，加以介紹，惟漏去一行。2000年8月，文物出版社印行《尹灣漢簡·神烏傳》一書，局部放大，附有釋文，為最佳之本。虞萬里文訂正字句，究其用韻，定為四言賦體，自此全文大致可以雒誦。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以下簡稱《綜論》），又收王志平《神烏傳與漢代詩經學》及駱名楠《文壇古珍〈神烏傳〉》二文，亦多所抉發。諸家引前人賦作以作比較者，或舉趙壹《窮鳥賦》，曹植《雛雀賦》，揚之水復引敦煌之《燕子賦》說之。余謂前代以烏為賦之題目者，有晉成公綏之《烏賦》，《太平御覽卷》920羽族部7，存序一段，文云：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歎曰：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瞻其所集，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服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觀其措詞，公綏作《烏賦》乃步武賈生，賈生惡鵩之入其室不祥，故為文以訊之，成氏則表揚烏之孝。彼自以為首作咏烏之賦，今有《神烏賦》出土，尚在其前。成文全篇，實載於明人劉節所編之《廣文選》卷三。錄之如下：

惟玄鳥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色。望仁里之廻翔兮，翩群群鳴以拊翼。差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陰，列巢布幹。繽紛霧會，廻星塵亂，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旦。噫啞相和，音聲可玩。嗟斯鳥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雖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之凌厲兮，飄輕翥於玄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於玉趾，凌西極以翱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應德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矧貞明於吉士。嘉茲鳥之淑良兮，永□樂而靡已。(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297-569頁)

孔鮒《小爾雅·廣鳥》云：“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鳩雁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慈烏，白脰，烏也，鴉，烏鷩也。”注“鷩斯也，亦曰鷩鷩”。鄭道元引《小爾雅》作“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返哺者謂之雅烏。”此烏與鴉之區別也。《說文》：“雅，楚鳥也，一名鷩，一名卑居，秦謂之雅。”

《異苑》記陽顏以純孝著聞，有羣烏銜鼓集其所居，烏口皆傷，故人於鼓處立縣名曰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章其行跡。(《叢書集成》初編)

(二)

《神鳥傳》文中引傳曰“衆鳥麗於羅罔，鳳皇孤而高翔(翔)。魚鰲得於苾(苾)筍，交(蛟)龍執(螯)而深藏”。按《楚辭·惜誓》：末云“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遠濁世而自藏。”似即《神鳥賦》所脫胎，故引稱傳曰。

賦引詩“云云青蠅(蠅)止于杆，幾自君子，毋信讒言”。此出《小雅·甫田之什》。楚簡屢引此“愷悌君子”一句，不止一見。上海博物館楚簡《孔子閒居》：“魁(幾)(弟)君子，按以“豈”通“幾”之例，若《左傳昭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朱駿聲云：“幾，辭也，與豈字同。”“幾自”乃愷悌之音借，虞文連上句之杆與幾聯讀，非是。杆乃樊之音假，“止于杆”即止于樊。樊在二十二元韻。《集韻》：“𦵏，說文藩也，引詩營營青蠅，止于𦵏，通作樊。”杆在二十五寒韻，《集韻》：“杆，僵木也。”此引詩𦵏作“杆”，僅見。漢昭帝薨後，立昌邑王，王淫戲無度，曾夢青蠅之矢積西階之東，以問龔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漢書》卷63《武五子傳》)亦引此詩，而字作“藩”。《易林》豫之園：“青蠅集藩”，足見杆、樊、藩三字之通用。昌邑王……習齊詩，則作杆者，讀爲藩，當出於齊詩。(參陳喬樞《齊詩遺說考》卷二)

《綜論》釋文：“天地剛紀，各有分理，今子自己，尚可爲士”

余按：剛借作綱。《詩·棫樸》：“綱紀四方。”分理，漢人慣語。許慎《說文序》云：“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士者，推十合一爲士。

《綜論》釋文：“扶翼 申頸”

余按：“申即伸，虞文誤申爲中。”

《綜論》釋文：“命也夫，吉凶浮汭，顓與女俱。”

余按：“浮汭猶言浮沈、倚伏。《楚辭九章·惜往日》：“乘汭汭以下流兮。”王注：“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汭。”《爾雅·釋言》：“舫，汭也。”浮上而汭下，與倚伏羲近。

《綜論》釋文：“吾聞君子不意不佞”。

余按：虞作不忘，非，原簡文缺不完，不意即《論語》之“毋意”。

《綜論》釋文：“曾子曰烏之將死，其唯哀。此之謂也。”

余按：唯字當應讀為鳴，从隹與從鳥，同意。

尹灣漢簡內有元延（曆譜），永始（兵車馬集簿）年號，大致為漢昭至成帝時物。其中一簡牘題曰《君兄繒方緹中物疏》牘列付葬書物名，中有《楚相內史對》、《烏傳》、《弟子職》、《六甲陰陽書》、《列女傳》，惟《烏傳》幸存，餘皆漸滅。烏傳（賦）簡末有小字二行云“蘭陵游微宏？賁？。故襄賁、沂縣功曹□□”，可能是書寫者之職銜。

《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領縣三十八，郟、蘭陵、襄賁、胸、費、蘭祺、繒、祝其、臨沂等。”諸縣名，均見尹灣簡冊。知所謂“繒方”之“繒”及襄賁乃是縣名。《貨殖傳》所謂“胸繒以北，其俗齊”是也。

春秋僖十四年鄧子來朝，字作鄧。《說文》邑部字同。繒為莒所滅。襄賁者，《水經注》引《魯連子》言“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漢初周勃為襄賁令（應劭曰賁音肥。）《王子侯表》有鱣侯，注云“襄賁”。鱣或為襄賁縣之鄉名，《尹灣報告》頁50於“襄賁”下加一？號，可以不必。

簡又有縣名復，似當讀為復，《漢書·宣帝紀》：“受詩於東海復中翁。”師古曰：“東海人姓復字中翁。”又蘭祺侯國，《王子侯表》作蘭旗。

蘭陵為荀卿為令之地。荀子曾說“齊相言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二地後均屬東海郡為縣名。西漢名臣蕭望之、毋將隆、疏廣皆蘭陵人，其地文風頗盛。《漢書》詩賦略有蕭望之賦四篇，今佚。此賦出土，表西漢時東海之文風，不特可為《全漢賦》添一新篇而已也。

尹灣漢墓遣策札記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馬 怡

遣策在尹灣漢墓簡牘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這批遣策包括：尹灣二號漢墓的衣物疏（木牘一正、反），尹灣六號漢墓的“君兄衣物疏”（木牘一二正、反）、“君兄繒方緹中物疏”（木牘一三正）和“君兄節司小物疏”（木牘一三反），凡四件。^[1]作為隨葬物的清單，它們含有大量關於漢代物質文化及風俗的寶貴資料，且頗多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之處。現試對其中的一些名物略作釋讀，願與學者共同探討，並就正於方家。

（一）諸于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綳綺諸于一領，羽青諸于一領，繡鮮支單諸于一領。●右諸于一領。”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早九諸于一領，繡九諸于一領。”

“諸于”，服飾名，也作“諸衿”。《說文解字》衣部：“衿，諸衿也，从衣于聲。”則“于”即“衿”之省。據《漢書·元后傳》記載，漢宣帝時，為太子選美，王政君因“獨衣絳緣諸于”而入選。可知諸于係外衣，可作女子的正服。

更始諸將也曾經穿著諸于。《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輔（按指洛陽地區）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又《後漢書·劉玄列傳》：“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洛陽與長安都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可知在正統的觀念中，諸于祇是“婦人衣”，男子是不應穿著的。

但是，尹灣漢簡卻表明：西漢時，至少在部分地區，諸于確實曾是一種男女通用的服裝。尹灣二號漢墓的墓主為一中年女性，該墓遣策中的“諸于”是做女服。而尹灣六號漢墓的墓主師饒，生前曾任東海郡功曹史，該墓遣策中的“諸于”是做男服。由此可知，在漢代，如更始諸將那樣身為男子而著諸于者並非孤例。^[2]

(二)直領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綺直領一領，帛綳合直領一領。●右直領二領。”

“直領”本是衣領的樣式。桓寬《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臺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而此處木牘文字有“直領一領”，說明“直領”也用作服裝的名稱。

尹灣二號漢墓主係女性，則“直領”為漢時女服。《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劉越》：“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晉灼為晉人，可知直領亦晉時女服。

作為服裝的“直領”，其樣式與男服中的“方領”相似。《釋名·釋衣服》：“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漢書·韓延壽傳》：“延壽衣黃紬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後漢書·儒林列傳》：“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李賢注：“方領，直領也。”《後漢書·馬援列傳》：“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李賢注：“《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則漢時的“方領”是上等之服，也是儒者之服。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引《續漢書》：“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褱直領，領袖正白。顧視御者，遠不及也。”蒼頭係男性奴僕。外家蒼頭驕奢逾制，著“綠褱直領，領袖正白”，故令馬太后不安。

直領又作“直衿”。《方言》卷四：“袒飾謂之直衿。”郭璞注：“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直領也稱為“裼”。《廣雅·釋器》：“直衿謂之裼。”又曰：“袒飾、褻明、褱、袍、襦，長褱也。”因直領即袒飾，故亦應類似長褱。《急就篇》：“袍褱表裏曲領帶。”顏師古注：“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褱，自膝以上。一曰，短而施要者褱。”也說明直領比一般的褱要長。

此處木牘所記“霜（繡）綺直領”，是以淡黃色的綺縫製的直領；“帛綳（縹）合（袷）直領”，是以淡青色的帛縫製的有夾裏的直領。^[3]

(三)中單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青鮮支中單一領。”一二反：“葛中單一。”

“中單”，服飾名，即“中褱”。《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褱衣，曲裾交輸。”顏師古注：“褱衣，若今朝服中褱也。”

中單又稱“中衣”。《隋書·禮儀志》：“何佟之議：‘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中衣穿在內衣與外衣之間。《釋名·釋衣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這種服裝上下連屬，樣式如古時的深衣。《禮記·深衣》鄭玄注：“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因漢之單（褱）衣亦如古之深衣，而中衣是穿在單（褱）衣的裏面，故稱之為中單（褱）。

中單多用作朝服、祭服的裏衣。例如，《晉書·輿服志》：“（皇太子）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繡鞶，采畫織成衮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烏絳襪……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緣中單”，即鑲有深紅色緣邊的中單。

中衣、中單也指一般的裏衣。《敦煌漢簡釋文》1143：“單襦、複襦各二領，單衣、中衣各二領。”^[4]《太平御覽》卷四零三引虞預《會稽典錄》：“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爲叔還錢。”注：“即今之汗衫也。”則中單可作汗衫。

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汗衫，蓋三代之觀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汗衫”這一名稱，未見於漢代文獻及相關考古資料，疑爲晚出之詞。而此處木牘所記“青鮮支中單”、“葛中單”，有可能類似後世的汗衫。

(四)合衣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丸合衣一領。”“帛綌合直領一領。”“綌丸合幫一。霜散合幫一。”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綌丸合衣一領。”

“合”，讀爲“袷”，有襯裏而無絮的夾衣。《說文解字》衣部：“袷，衣無絮。”《急就篇》：“襟袷袷複褶袴。”顏師古注：“衣裳施裏曰袷，袷之以綿曰複。”《廣雅·釋詁》：“袷，重也。”《漢書·匈奴傳》記載，漢文帝賜給匈奴單于的禮物中有“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顏師古注：“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爲表，綺爲裏也。”又《齊民要術》卷三《雜說》：“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爲袷。”“袷”因有襯裏而無絮，較“複”薄，故不屬冬衣。

“袷”也用來指其它帶襯裏的服裝，如夾裳。干寶《搜神記》卷二：“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此處木牘所記“合直領”、“合幫”，則爲夾直領和夾裙。

(五)綌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帛綌鮮支單襦一領。練□單襦二領。□鮮支綌二領。●右綌、單襦五領。”

“綌”，讀爲“裊”，服飾名。《廣雅·釋器》：“複袷謂之裊。”《集韻·銜韻》：“衫，小襦，通作袷。”則“袷”就是“衫”。《釋名·釋衣服》“衫，芟也，芟末無袖端也。”王先謙《疏證補》引畢沅曰：“蓋短袖無袷之衣。”“袖端”即“袷”，袖的邊口。《中華古今注》卷中：“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則衫應是短衣。《方言》卷四“汗襦”條郭璞注：“今或呼衫爲襦。”襦亦短衣。因“衫”爲襦，而“裊”爲“複袷”，故“裊”當類似複襦，爲絮有絲綿的短衣。

《廣雅·釋器》又曰：“裊，裊也。”王念孫《疏證》：“裊，謂衣中也，通作身。”《龍龕手鑑》卷一：“裊，近身衣也。”總之，“裊”大約是一種貼身穿著、衣袖不長且無袖邊口的短衣，其內或有襯裏，樣式與衫(袷)、襦等相近。

在古籍中，“綌”、“裊”常通作“茵”，指“茵褥”。例如，《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綌馮，黃金塗。”如淳曰：“綌亦茵。”師古曰：“茵，蓐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綌褥重陳，角枕橫施。”^[5]但尹灣二號漢墓衣物疏中的“綌”卻並非如此。通觀此衣物疏(木牘一正)的格式，所記隨葬品被分爲九組，每組包括同類之物若干件，末尾加黑圓點“●”，用“右某某(物名)多

少(數量)”作一小結。在此枚木牘中,“□鮮支緇二領”是與三領“單襦”列在一組,並以“●右緇、單襦五領”為結束,故此處的“緇”應是與“襦”同類的服裝,而不是茵褥。

(六)大袴、小袴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早丸大袴一。”“練早大袴一。”“早布大袴一。”“練小袴二。”

袴,服飾名,又作“袴”。《釋名·釋衣服》:“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說文解字》糸部:“袴,脛衣也。”段玉裁注:“今所謂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兩脛。”按照段氏的解釋,袴是左右分離不相連屬的兩隻“脛衣”,如今日民間的套褲。但考古資料表明,以上說法是不够準確的。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曾出土了一件綿袴,該袴為一整體,前腰合縫,後腰敞口,腰以下前後開襠。在宋墓所出的遺物中,也有幾個類似的例子。故有理由認為,這種一體的開襠褲當是“袴”的典型樣式。^[6]

“袴”有大小之分。《方言》卷四:“大袴謂之倒頓,(郭璞注:“今褌袴也。”)小袴謂之校訂,(郭璞注:“今褌袴也。”)楚通語也。”大袴一般是作男子的外服。《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劉去,“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漢書·武五子傳》:故昌邑王劉賀“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則知大袴可作正服。《漢書·朱博傳》記載,齊郡舒緩養名,“官屬多褌衣大褌,不中節度”。顏師古注:“褌音紹,謂大袴也。”大袴的樣式應是較為寬鬆的。在漢畫資料中,常可看到男子身著一種肥大的長褲,褲腳很寬,拖到地面。這種服裝或即大袴。

小袴大約是內褲。《漢書·周仁傳》:“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顏師古注:“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或以為小袴即褌。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十八《冠服》:“褌,褌衣,小袴。”褌是合襠褲。《晉書·阮籍傳》:“獨不見群蟲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因合襠褲可以“藉尿”,故陳氏的說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小袴也有不合襠的,上文提到的馬山一號楚墓所出綿袴就是一例。該袴由墓主貼身穿著,開襠,袴腳襠襠為襠而收攏,有緊口的緣邊。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則褌不僅可作內褲,也可作外褲。因此,小袴不一定是褌;其與大袴與小袴的區別或許並不在於是否開襠,而更要看袴腿的寬窄和袴腳的樣式。

小袴不可作正服。《南史·後廢帝紀》:宋後廢帝劉昱暴虐乖張,“恒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嘗著小袴,不服衣冠。”劉昱著小袴出行有失體統,故史家書之。此外,因小袴便於行動,也用為勞作之服。皮日休《憶洞庭觀步十韻》:“校訂漁人服,荇蕳野店窗。”^[7]是漁者著校訂,即小袴。據上引《方言》,“校訂”是漢時楚語,而洞庭一帶為楚之舊地,皮日休為唐人,可知“校訂”這種服裝及名稱在經歷約千年後猶存。

本衣物疏所記三件大袴皆早(皂)色。其中,“早(皂)丸(紬)大袴”和“練早(皂)大袴”是絲質料。“紬”為細絹,“練”為練過的熟絹。“早(皂)布大袴”則是麻布質料。而兩件“練小

綺”的顏色，應是“練”之本色。

(七)巨巾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青巨巾一。練巨巾二。縷巨巾一。”

“巨巾”，服飾名，又稱作“蔽膝”。《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袂。”郭璞注：“今蔽膝也。”蔽膝繫在腰前，略似圍裙，長可遮膝。《釋名·釋衣服》：“韍，韠也。韠，蔽膝也，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則“巨巾”是齊地對婦女所著蔽膝的稱呼。尹灣二號漢墓在今江蘇省連雲港，西漢為東海郡，屬齊地，該墓墓主亦為女性。其遣策中出現“巨巾”，與《釋名》的說法大致相合。

蔽膝有多種名稱。《方言》卷四：“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袂。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齊魯之郊謂之褱。”《廣雅·釋器》：“大巾，褱，蔽膝也。”一種衣飾，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名稱，說明其服用之普遍。

蔽膝被稱作“韍”、“韠”，可知其為皮質。又稱作“巨巾”、“大巾”等，說明也有紡織品。大約以後者為多。本衣物疏中的“青巨巾”、“練巨巾”、“縷巨巾”等，應都是紡織品。

《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欲令名譽過前人，克己不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又《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潘夫人“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亮”。王莽妻與潘夫人是貴婦，而布蔽膝是僮使的衣著，可知漢人不分貴賤，皆服蔽膝。此外，服蔽膝者可能女性居多。尹灣二號漢墓與六號漢墓基本上屬同時代。在二者的衣物疏中，相同種類的隨葬品很不少。但是，祇有二號漢墓的衣物疏中有“巨巾”，凡四件。

(八)紵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散紵一領。”

“紵”，單被。《儀禮·士喪禮》：“綯、紵、紵，衾二。”鄭玄注：“紵，單被也。”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中有“青綺衾，素裏緣（緣）”。“衾”即“紵”，大殮時用來包裹屍體。^[8]

《禮記·喪大記》：“紵，五幅，無紉。”鄭玄注：“紉，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紉”是綴在被邊的帶子，作為被識，以別上下，而喪用之紵無“紉”。《漢書·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漢一尺約合今〇·二三米。紵用五幅，則其寬度約為二·五三米。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曾出土一件單被，錦面，深黃色絹裏，發掘報告稱之為“紵”。該“紵”展開呈“亞”字形，是衣衾包裹的最外層，可將裏面的衣衾和屍體完全裹起。其寬度為二·三四米，^[9]略近於五幅。

(九)霜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散紵一領。”“霜丸衣一領。”“霜丸合衣一領。”“霜丸復縹一領。”“霜綺直領一領。”“帛霜帶一。”“霜散合帶一。”

在以上七條中，除“帛霜帶一”條外，另六條中“霜”字皆置於“散（織）”、“丸（紉）”、“綺”

等絲織品名稱之前，可知這個字應表示一種顏色。

“霜”，讀爲“繡”。王嘉《拾遺記》卷六：“（漢昭帝）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繡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繡絲”，《太平御覽》卷八六二引作“霜絲”。則“霜”即“繡”。

《字說》釋“繡”：“帛如初生桑葉之色曰繡。”^[10]《釋名·釋采帛》對“繡”字的解釋與之幾乎完全相同：“繡，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又，《玉篇》糸部：“繡，色莊切。”音“霜”。而“繡”字有兩種讀音，一爲“息良切”，見《說文解字》糸部，音“相”；一爲“師莊切”，見《集韻·陽韻》，音“霜”。後者正與“繡”的讀音相同。因此，“繡”字應就是“繡”字。

《說文解字》糸部：“繡，帛淺黃色也。”《急就篇》：“鬱金半見繡白麝。”顏師古注：“繡，淺黃也。”此處木牘文字中的“霜”，是說絲織品的顏色爲淺黃色。

(十) 蒸栗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反：君兄衣物疏：“蒸栗棺中席一。”

“蒸栗”，就是“蒸栗”。《詩·大雅·蕩》：“天生蒸民。”《孟子·告子上》引作：“天生蒸民。”則“蒸”“蒸”二字可通。

“蒸栗”是指一種黃的顏色。《釋名·釋采帛》：“蒸栗，染紺使黃色如蒸栗然也。”《急就篇》：“蒸栗絹紺緇紅縹。”顏師古注：“蒸栗，黃色若蒸熟之栗也。”

古人用“蒸栗”來描述黃色之物。例如，《文選》卷四十二魏文帝《與鍾大理書》：“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鸚冠，黃侔蒸栗。”是記玉的顏色。《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牛》引梁元帝《謝東宮賁蒸栗牛啓》：“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是記牛的顏色。“蒸栗”還被用來描述竹簡。《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蒲輪受伏生之誦，科門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內。”《統歸篇第十》梁蕭子云《玄圃園講賦》：“開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簡，採蘿樹之葉。”而此處木牘所記“蒸栗棺中席”，是說棺中席的顏色黃如蒸熟的栗子。

(十一) 散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散紛一領。”

“散”，讀爲“縠”。《廣韻·旱韻》：“縠，縠絲綾。”則縠爲絲織品“綾”的一種。

《說文解字》糸部：“綾，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釋名·釋采帛》：“綾，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冰凌爲積冰，其紋理細而潔淨。《正字通》糸部：“縠素爲文者曰綺，光如鏡面有花卉狀者曰綾。”此處木牘文字中的“散”，大約是指一種光亮細緻而有花紋的絲織品。

(十二) 鮮支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青鮮支中單一領。”“白鮮支單袴一。”“鮮支單襦二領。”

“鮮支”，絲織品名，也作“鮮厄”。《說文解字》糸部：“縛，白鮮厄也。”“縠，細縛也。”《廣雅·釋器》：“縠、總、鮮支、縠，絹也。”《急就篇》：“蒸栗絹紺緇紅縹。”顏師古注：“絹，生白縠，似縠而疏者也，一名鮮支。”則鮮支是“絹”類絲織品。

鮮支用作衣料的例子，除上引木牘文字外，也見於漢代文獻和其他簡牘資料。例如，

《東觀漢記·李忠傳》：“忠更作新袍綺鮮支小單衣襪而上之。”又如，馬王堆三號漢墓遺策：“鮮支襪衣一，縠掾（緣）。鮮支長襦一，素掾（緣）。”^[11]

鮮支又指梔子。梔子是茜草科梔子屬常綠灌木，漢代用作黃色染料。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有以種植梔子、茜草而大富者：“若千畝卮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集解》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鮮支黃礫。”顏師古注：“鮮支，即今支子樹也。”《說文解字》木部：“梔，黃木可染者。”段玉裁注：“梔，今梔子樹，實可染黃。相如賦謂之‘鮮支’，《史記》假‘卮’爲之。”鮮支在這裏是植物，而不是絲織品。

梔子開白花，其果實用冷水浸泡後，經過煮沸，可製得黃色的染液，適用於棉、毛、絲等纖維的染色。^[12]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紡織品中，有一些黃色的絲綢和繡品。經測定，發現它們含有黃酮類物質，是用梔子爲植物染料，經直接染色或媒染劑染色加工而成。^[13]

但是，作爲絲織品的鮮支卻未必是黃色的。《說文解字》糸部：“縞，鮮卮也。”《詩·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毛《傳》：“縞衣，白色男服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顏師古曰：“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縞、素都是白色的絲織品，前引《說文》亦謂縞爲“白鮮卮”，此處木牘文字則見“白鮮支單袴”，可知有白色的鮮支。而木牘所記“青鮮支中單”，說明又有青色的鮮支。

（十三）渠如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反：“渠如一具。”

“渠如”，就是“渠拏”，也作渠疏、淶拏、淶樺等，本是一種農具。《方言》卷五：“杷，（郭璞注：“有齒曰杷，無齒曰杙。”）宋魏之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郭璞注：“語轉也。”）”《集韻·魚韻》：“淶，宋魏之間謂杷爲淶拏。或作樺，通作渠。”

可知“渠如”即杷，也就是有齒的筴子。《說文解字》木部：“杷，收麥器。”《釋名·釋用器》：“杷，播也，所以播除物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八：“齊魯謂四齒杷爲權，權與渠拏、渠疏皆語之轉也。”

杷、權皆從木，可知此物爲木質。王褒《僮約》：“屈竹作杷。”^[14]可知又有竹質。此處木牘所記“渠如”，與手衣、簪、尺、刀等雜物並列，疑其爲一種形似小杷的器具，或即“爪杖”。

爪杖，晉代稱作“如意”，屢見劉義慶《世說新語》。如《豪爽第十三》：“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汰侈第三十》：王愷以一珊瑚樹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四引《音義指歸》：“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作人手指，柄三尺許。脊癢可搔，如人之意。清談者執之。鐵者兼藏禦侮。”則此物不僅有竹、木，又有以骨、角及鐵爲材質者。

（十四）頓牟簪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反：“頓牟簪一。”

“頓牟”，應即“玳瑁”。“頓”，端母、文部；“玳”，定母、月部。其聲皆舌尖音；又文部屬微

系字，月部屬歌系字，兩系韻部的同源詞語音關係密切，故“頓”、“玳”可通。^[15]“牟”、“瑁”則皆明母、幽部，兩字亦可通。

玳瑁也作“瑁瑁”、“毒冒”，是一種海中動物，形似海龜，其背為黃色與黑色斑紋相間的角質板，堅硬光滑，色澤溫潤，古人常用以製作飾物，如髮簪。

簪，首飾名。先秦稱作笄，漢代稱作簪。《儀禮·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鄭玄注：“笄，今之簪。”據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該墓女性墓主的頭上插有三支髮笄，分別為竹質、骨質和玳瑁質。^[16]此所謂“玳瑁笄”，就是玳瑁簪。

文獻中關於玳瑁簪的記載很多。例如，《史記·春申君列傳》：“趙使欲誇楚，為瑁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藝文類聚》卷三十九《禮部·親蠶》引董巴《輿服志》：“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藝文類聚》第八十四卷《寶玉部·瑁瑁》引班固《與竇憲牋》：“明將軍賜固瑁瑁簪。”《樂府詩集》卷六十七《雜曲歌辭》張華《輕薄篇》：“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可見玳瑁簪是一種較為貴重的首飾。

王充《論衡·亂龍篇》：“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黃暉《校釋》引《春秋考異郵》：“承石取鐵，瑁瑁吸楮。”是以頓牟為玳瑁。但也有人認為頓牟是“琥珀”。“琥珀”又作“虎魄”，是松柏樹脂的化石，色黃而透明，亦用以製作飾物。李石《續博物志》卷九引《本草經》：“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劉盼遂《論衡集解》：“王筠《某友臆說》云：‘頓牟豈虎魄之異名邪？抑別自一物邪？是頓牟之為物，宜存區蓋。’”琥珀經過摩擦會產生靜電，可以吸起芥子之類的細物，故有此說。這樣看來，《論衡·亂龍篇》中的“頓牟”，又似是指琥珀。

不過，若以琥珀同玳瑁相比較，由於後者與“頓牟”的讀音相近，且文獻中頗多關於玳瑁簪的記載，故將此處木牘所記“頓牟簪”解釋為“玳瑁簪”，似乎更為可信。此外，琥珀飾物在古時是高價的希罕之物。陸龜蒙《小名錄》：“東昏侯潘淑妃小字玉兒，帝為潘起神仙永壽玉殿……常市琥珀釵一隻，直百七十萬。”^[17]釵亦頭飾，其用法略近於簪，而為雙股。以尹灣二號漢墓的形製和此木牘所羅列的其他隨葬物來看，該墓似乎不會有琥珀首飾這樣昂貴的奢侈品。

(十五)道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三反：君兄節司小物疏：“道一枚。”

“道”，讀為“導”。道、導是古今字，義通。《荀子·性惡》：“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楊倞注：“‘道’與‘導’同。”

“導”，首飾名。《釋名·釋首飾》：“導，所以導櫟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櫟鬢’，以事名之也。”“櫟鬢”即“掠鬢”。古人束巾後，用導將鬢髮引入巾內，然後插在髮中。

《晉書·桓玄傳》：“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則桓玄頭上的玉導，似非細小之物。

導的形製類似髮簪，又稱作“幘導”、“笄導”、“簪導”。《文選》卷二十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李善注：“《通俗文》曰：‘幘道曰簪。’”《太平御覽》卷六八八引作“幘導曰簪”。《北史·何稠列傳》：“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

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導的材質，除玉石、象牙外，也用玳瑁和犀角。《隋書·禮儀志》：“今依《周禮》，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史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准是，唯弁用白牙笄導焉。”不過，由“笄”、“簪”二字皆從竹來看，普通的導亦應有竹製品。

在“君兄節司小物疏”中，“道一枚”與粉囊、鏡、髮囊、脂管、幘等物並列，或即所謂“內具”之屬。

此外，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所出木牘上，記有“導二枚”。在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一號晉墓所出木牘上，記有“故犀導一枚”。^[18]它們也都是用“導”做隨葬品的例子。

(十六)絮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反：“薄巾絮六。”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三反：君兄節司小物疏：“故絮七枚。”

“絮”，即“冒絮”，頭衣名。《集韻·御韻》：“絮，一曰冒絮，頭上巾也。”劉向《說苑·正諫》：吳王敗，“遂蒙絮覆面而自刎”。《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頤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

“絮”字，除有“絲綿”、“絮狀物”等含義外，也表示紡織物。例如，《後漢書·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李賢注：“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則“吹綸絮”與“紈”、“縠”等同爲絲織品。又《漢舊儀》：“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太平御覽》卷七一六《服用部》引作“皇后得以作絮巾”，卷八一九《布帛部》引作“巾絮”。無論“巾絮”還是“絮巾”，都是經過織室加工的產品，而不是“蠶絲絮”之“絮”。

王念孫認爲“絮”、“帑”可通。王引之《經義述聞·周官上》：“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襜之屬。’家大人曰：‘絮與帑通，亦巾帑也。’”其說甚是。《說文解字》巾部：“帑，巾帑也。”“巾帑”就是“巾絮”。

“冒絮”、“陌頤絮”，或即“絡頭”。《方言》卷四：“絡頭，帟頭也。紗縠鬢帶、繫帶、帟、幘、幘頭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帟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幘頭。或謂之帟，或謂之幘，其偏者謂之鬢帶。”此處的“帟”讀作“帑”，亦頭衣名。《方言》卷四：“幘巾也，大巾謂之帟。嵩嶽之南，陳潁之間謂之帟。”“帟”、“帑”、“絮”三字，聲旁“奴”、“如”相近，形旁“巾”、“糸”可以互換，故三字互通。

《釋名·釋首飾》：“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曰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齊人謂之幘，言幘斂髮使上從也。”“綃頭”即“幘頭”，“陌頭”即“帟頭”。此類頭衣的用法，大約是自後而前纏在額頭，將髮向上包起。

據文獻記載，漢代有一種名爲“絮巾”的服飾。《三國志·魏書·管寧傳》：管寧隱居遼東，

“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着絮巾。”《三國志·魏書·閻溫傳》引《魏略》：趙岐避禍，“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此“絮巾”，應是平民男子的頭衣，樣式或與“冒絮”相近。

簡牘中也有不少關於“絮巾”的記載。例如，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木牘：“故絮巾二枚。”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一號晉墓木牘：“故白絮巾二。”^[19]在西北邊塞簡牘中則更多。居延新簡 E.P.T56:101A：“布囊一。布巾一。絮巾一。”^[20]敦煌漢簡 1144：“絮巾、布巾各三。”²³²⁷：“絮巾一見。白布巾一見。”^[21]因“絮巾”往往與“布巾”並提，故推測其質地不是布類，而有可能是絲織品。

又居延新簡 E.P.T51:249：“自言十月中黃賣系絮二枚，直三百。”E.P.T59:38：“豐貴居延男子張君孫襄絮一枚，直百三十五，入三十五。”²²可知在漢代西北邊地，一枚絮的價格大約是百餘錢。

尹灣二號漢墓木牘所記“薄巾絮”，當為女子頭衣。同一木牘所記“靡絮三，盧絮一”大約也是頭衣，它們稱作“絮”而非“巾絮”、“絮巾”，其質地、式樣或有所不同。尹灣六號漢墓木牘所記“故絮七枚”則當為男子頭衣。但列於該木牘末欄的“方絮二”卻有些疑問。就其與“節衣”、“手衣”、“五采系”等“小物”並列來看，釋作頭衣亦未嘗不可。但《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服虔《通俗文》曰：“方絮，白紙。”此處木牘所記“方絮二”是不是白紙，作何用，囿於現有資料的不足，尚難確定。

(十七)方緹

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三正：“君兄繒方緹中物疏：方緹一。”

“君兄繒方緹中物疏”是本枚木牘的文字標題，其下記錄存放於“繒方緹”內的物品，“方緹一”（即“繒方緹”本身）亦包括在內。《說文解字》糸部：“繒，帛也。”“繒”為絲綢通稱，故“方緹”應是一種可用絲綢製作的物品的名稱。但此名稱未見於文獻和其它考古資料。又《說文解字》糸部：“緹，帛丹黃色也。”“緹”的本義是一種顏色，故“方緹”不詞，疑其中有通假字。

漢代稱書囊為“方底”。疑“方緹”即“方底”。“緹”，透母、脂部；“底”，端母、支部。兩字韻部關係密切，聲母皆舌尖音，故“緹”可通“底”。在“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內，除有“筭”、書刀、筆、研、墨等文具外，餘皆書籍、文書之類。雖今僅存《神烏傳（賦）》簡、《記》簡等數種，然而據推測，其他在疏中列名而不存者大約都是帛書^[23]。因此“方緹”有可能就是“方底”。

“方底”屢見於漢代文獻。《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顏師古注：“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勝耳。”此處的“方底”亦以厚繒製作，用來盛放詔記。又曰：“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絨……須臾開戶，嚀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此處先後提到的“綠囊”、“綠綈方底”、“方底”，應是同一物。又《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廣陵思王荆》：“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李賢注：“方底囊，所

以盛書也。”則“方底”又稱“方底囊”，此處亦用以盛放文書。

顏師古曰方底“形若今之算勝”。《通雅》卷三十七：“算袋，即算勝。武則天賜朱前疑緋算袋。又曰照袋。《唐公記》：王太保從蒼頭携照袋貯筆硯。”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九十九《水族部·烏賊》：“海人言，昔秦王東游，棄筭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則方底的外形大約爲囊袋狀，或有長帶，可以印封。

注 釋

- [1]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本文所引尹灣漢墓簡牘釋文，均出此書。另有兩件“贈錢名籍”（尹灣六號漢墓七號、八號木牘，或以爲亦屬遣策），未在本文研究範圍。
- [2] 關於諸于的樣式，筆者另作專文考述。詳見《“諸于”考》。
- [3] 對“繡”、“合”二字的釋讀，詳見下文。
- [4] 吳弼驤、李永良、馮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 《全漢文》卷二十二。
- [6] 參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93～94頁。
- [7] 《全唐詩》卷六百十二。
- [8] 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軟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文史》第十輯。
- [9]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25頁。
- [10] 《中文大辭典·糸部》引《字說》。
- [11] 《文物》，1994年第6期，66頁，圖二（1）。
- [12] 參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260頁。
- [13] 參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紡織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92～101頁。
- [14] 《全漢文》卷四十二。
- [15] 參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70頁。
- [16]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文物出版社，1973年，28頁。
- [17] 《說郛》卷七十七上。
- [18]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1頁，87頁。
- [19] 同注[18]。
- [20]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
- [21] 同注[4]。
- [22] 同注[20]。
- [23] 參李學勤：《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序，科學出版社，1999年。

尹灣簡牘所反映的漢代卒史署曹制度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

◎ 蔡萬進

今人嚴耕望(1916-1996)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1961年初版,1974年再版,1990年三版,1997年影印四版)一書中曾指出:“據如淳引《漢律》,秦及西漢郡吏重要之等級爲卒史與書佐。然西漢中葉以後至東漢,《碑》、《傳》所見多曰掾曰史,或多冠曹爲稱,而稱卒史者則較少,有之而地位亦較低。”^[1]嚴氏發現、提出這一重要現象而未做出解釋。數十年來,囿於資料,秦漢史學界也少有專文論及。近讀《尹灣漢墓簡牘》報告^[2],其中《集簿》(YM₆D₁)、《東海郡吏員簿》(YM₆D₂)、《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YM₆D₃₋₄)、《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YM₆D₅ 正)、《東海郡屬吏設置簿》(YM₆D₅ 反)等西漢晚期東海郡郡級地方行政文書檔案及墓主“名謁”(YM₆D₁₄₋₂₃)、《元延二年日記》(簡1-76),給我們瞭解西漢成帝時期東海郡郡府諸曹機構設置、卒史在郡府機構及吏員中的地位、卒史具體職事(卒史署曹)與卒史稱號之間關係等,提供了遠較《漢書》等多得多的新資料^[3],從而使這一歷史迷霧一朝撥散。茲據之就其所反映的漢代卒史署曹制度考述於下。

一、西漢東海郡太守府諸曹機構的設置

西漢時期,一郡太守與都尉往往異地分府而治,東海郡都尉府據《漢書·地理志》載在費縣,太守府在郯縣,《元延二年日記》(以下簡稱《日記》)記事,尤其是記錄墓主何時出發、何時住宿某地的文字中不見郯地,僅記“至府”也可爲證。關於西漢東海郡太守府內部機構的設置,依尹灣出土簡牘及《漢書》等文獻可復原如下:

太守、太守丞各一人,太守的秩次因 YM₆D₂ 筆跡漫漶不清而未能釋出,太守丞爲六百石。《漢書·朱博傳》稱“太守丞”又爲“府丞”,“太守”自稱“府”;《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秩二千石;丞,秩六百石。”

在太守、太守丞之下,設曹分科治事,主要有:

功曹：《日記》簡 64-5：“署功曹”；《名謁》木牘 15、16、17 有“東海太守功曹師卿”，22、23 有“東海太守功曹史饒”等稱號，墓主《日記》與所持名謁相比照，東海郡設功曹無疑，其長官稱功曹史或功曹。

法曹：《日記》簡 25-4：“夕署法曹”，從簡 24-4“癸酉旦之滎陽莫宿舍”看，此處應指太守府法曹。

決曹：《日記》簡 29-4：“己卯從決掾旦發宿蘭陵傳舍”。決掾，應即“決曹掾”省稱，《漢書·薛宣傳》有“府決曹掾”可證。《漢書·王尊傳》載王尊曾為“決曹史”。

□曹：《日記》簡 72-4：“丁巳旦謁署□曹書佐”，“曹”前一字未釋，依文例，應為“署某曹”，為東海郡太守府諸曹之一。

當然，東海郡太守府屬曹遠不至以上這些，據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的考證，大抵秦漢郡縣屬曹有“右曹”、“諸曹”之分。“右曹”即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諸總攬內外衆務之職吏；“諸曹”如戶曹（主民戶及禮俗）、金曹（主貨幣鹽鐵）、尉曹（主卒徒轉運）、賊曹（主盜賊）、決曹（主罪法）、田曹（主畜養）、水曹（主水利）、比曹（主檢核財物民數）、奏曹（主奏議）、時曹（主時節祠祀）、議曹（主參謀議）、漕曹（主運漕谷）等^[4]。嚴氏的考證有助於我們對東海郡太守府諸曹機構情況的瞭解。

諸曹主管官吏一般以曹名或曹史稱呼，如墓主師饒，名謁 15、16、17 稱“東海太守功曹師卿”，22、23 自稱：“東海太守功曹史饒”。《漢書·朱博傳》、《薛宣傳》有直呼“功曹”；《漢書·王尊傳》有決曹史。“曹史”應屬太守一府諸曹官長的統稱。《漢書·朱博傳》：“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同傳又載朱博“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YM₆D₅ 反：“凡羸員廿一人胡君門下十人曹史一人守屬九人”，將“曹史”單列、單稱，表明東海郡太守府諸曹官長通稱“曹史”，為一級重要官吏。尹灣《集簿》、《東海郡吏員簿》皆記太守吏員：“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十人嗇夫一人凡廿七人。”“卒史”排在“太守丞”之後，“屬”之前；YM₆D₅ 反“曹史”列於“屬”（守屬是代理屬之意）之前，同時從《漢書·王尊傳》、《朱博傳》、《薛宣傳》等記太守議事，皆不見卒史而僅提及諸曹及曹史等情況看，漢時郡諸曹史與卒史應該存在着某種對應關係，卒史是秩別等級名號，曹史是具體職事的官職名稱，擔任諸曹曹史是否必須具有卒史身份，或者說祇有卒史纔能充任諸曹官長，這與卒史在漢代郡府機構及吏員中的地位有密切關係。

二、尹灣簡牘及文獻所載漢代卒史

《集簿》（YM₆D₁ 正）：“吏員二千二百三人，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十人嗇夫一人凡廿七人。”《東海郡吏員簿》（YM₆D₂ 正）：“太守吏員廿七人太守一人秩□□□□太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嗇夫一人凡廿七人。”據《史記

·蕭相國世家·索隱》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史為秦漢時期郡級機構中的主要官吏，一般秩百石，三輔郡為二百石。

《漢書·武五子傳》：“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昌邑王賀即帝位二十七日廢，宣帝詔封為海昏侯（列侯），就國於豫章，刺史奏其與故太守卒史交通，表明已引起中央監察官注意。名謁 20、21 分別為東海郡容丘侯、良成侯遣吏奉謁向墓主師饒問疾的記錄，食邑本郡的侯國，還要向當地官員、時已由卒史任功曹的師饒存問致意，可見墓主師饒地位之重要，墓主師饒“署功曹”在“病告”之後，因此，兩侯國侯致謁存問師饒病愈情況之前，與墓主當交往甚深，墓主師饒此時也應僅是 YM₆D₁₄ 名謁木牘所稱的卒史而已，卒史地位之重要可見一斑。

《漢書·王尊傳》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刺史所部二千石即郡太守；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表明太守卒史一度曾由刺史選擇任免，二千石太守不能左右，足見卒史一職在郡中之顯。YM₆D₁₄：“進卒史 師卿（正） 東海太守級謹遣功曹史奉謁為侍謁者徐中孫中郎王中賓丞相史後中子再拜請 君兄馬足下（反）”，身為卒史的師饒得到本郡太守如此恭敬禮遇，當是上述制度之孑遺。

《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YM₆D₃₋₄ 正、反）載太守卒史升任“長吏”共 3 見：“即丘左尉潁川郡潁陰王昌故太守卒史以功遷”、“南城尉山陽郡東緡陳順故太守卒史以功遷”、“容丘尉潁川潁陰東門湯故太守卒史以功遷”；以“郡太守文學卒史”遷 10 見；以“太守屬”遷僅 1 見。表明太守卒史在太守府系統內其升遷“長吏”是比較多的，這與其在郡太守府中的地位有關。

卒史在郡府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有署曹的可能性。

三、尹灣簡牘反映的卒史署曹制度

尹灣簡牘具體記載了墓主師饒由卒史署曹這一典型事例，據同墓出土的名謁，墓主有“卒史”、“太守功曹”、“太守功曹史”、“主吏”等稱呼。其實際情況是墓主師饒的身份為“卒史”，因其分掌功曹，故又稱“太守功曹”、“功曹史”，因太守府諸曹中功曹最為緊要，故又稱“主吏”^[5]。

《元延二年日記》同時又記載墓主一年之內先後“署法曹”（簡 25 - 4, 7 月 15 日）、“署功曹”（簡 64 - 5, 10 月 19 日）等，說明太守、太守丞之下的卒史，不署曹即沒有具體職事，平時祇要工作需要，太守是隨時可以派這多名卒史中的一位去充任諸曹官長或主持諸曹事務的，署某曹即稱某曹史。墓主署功曹，在木牘名謁中就見“功曹史”稱謂，推想在七月“署法曹”期間當亦應有“法曹史”稱呼，祇是尹灣簡牘無記罷了。由此看來，各曹官長並沒有固定人員，祇是政事需要時太守便派卒史去執掌曹事，這是分析《日記》得出的由卒史署曹的又一事實。嚴氏《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云：“據如淳引《漢律》，秦及西漢郡吏重要之等級為卒史與書佐。然西漢中葉以後至東漢，《碑》、《傳》所見多曰掾曰史，

或多冠曹爲稱，而稱卒史者則較少，有之而地位亦較低。”究其原因，實則尹灣《元延二年日記》等簡牘所反映的卒史署曹制度使然，這是我們今日看到尹灣漢墓簡牘對前輩推斷的進一步發展。

當然，卒史未必一定或全部去擔任曹史，也有“不署曹”而安排擔任郡府其它一般官職的，如黃霸“使領郡錢穀計”^[6]、尹翁歸“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究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7]這些官職亦見於尹灣六號漢墓出土的第5號木牘，第5號木牘反面記錄了東海郡太守府定編和超編（即牘文所稱的“贏員”）官吏官職名稱，尤其記錄了諸多“以故事置”、“請治所置”的郡府各類人員，如“寫圖一人”、“勸田史四人”、“外郵掾一人”、“從使者奏事一人”、“案事史十一人”、“督盜賊四人”、“督郵史四人都水一人”等等，這些在列曹之外因需要設置的針對性很強的具體辦事官員地位當然低於諸曹官長，身居“卒史”稱號而不讓去“署曹”往往被認爲是不被重用或爲太守所輕，如黃霸因“以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不署右職”，當指不能署列曹；又兒寬身爲廷尉卒史，因“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8]張晏曰：“不署列曹也。”墓主師饒元延二年七月十五日“署法曹”、十月十九日“署功曹”，“署法曹”前據 YM₆D₁₄ 名謁木牘知僅有“卒史”稱謂，具體職事尚不清楚，但由同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YM₆D₆）推測，墓主自永始四年至元延二年七月十五日“署法曹”間，也曾未能署曹，可能擔任了與武庫有關的一般官職。

另外，屬亦有升任曹史的。屬，東海太守府有屬5人，有跡象表明它祇是某一類屬吏的泛稱，《漢書·儒林傳》注引蘇林曰“屬亦曹史”說法不可信。YM₆D₅ 反：“凡贏員廿一人胡君門下十人曹史一人守屬九人。”明記“曹史”在“守屬”之前可資爲證。“曹史”高於“屬”，但“屬”可以升任曹史，如《漢書·王尊傳》：“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YM₆D₁₂ 號木牘也將“屬”放在卒史之後，說明屬是曹史或卒史之下、書佐之上這一層次之吏，確證“卒史”在秩級上與“曹史”相同。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日記》等尹灣簡牘所反映的卒史署曹制度表明“曹史”本身就是由“卒史”來充任的，它們之間是秩級與職事的統一，不存在着升遷、降貶，因此，由卒史署曹這一作法至少在西漢成帝年間被廣泛施行。嚴氏無緣見到數十年後出土的尹灣漢墓簡牘，這就是嚴氏爲什麼僅僅提出西漢中葉以後多見史、掾、曹稱謂而卒史少見這種現象而不能合理解釋的原因。

注 釋

- [1]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112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5A，1997年。
- [2]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以下凡引尹灣漢墓簡牘，皆見本書。
- [3] “卒史”名稱見於《漢書》等文獻，有“大行卒史”、“太守卒史”、“郡國五經百石卒史”（《漢書·儒林傳》）、“廷尉卒史”（《漢書·兒寬傳》）等稱謂，秩百石，三輔之郡卒史秩“二百石”（《漢書·循吏·黃霸傳》），這是《漢書》等文獻所能提供的基本信

息。儘管居延漢簡等出土文字資料中也有“卒史”等制度反映(簡 EPT51.202,《居延新簡》,189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但屬邊塞屯戍文書,且過於零散,難以瞭解制度全貌。

[4]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組織》,108~146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A,1997 年。

[5]《史記·高祖本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

[6]《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

[7]《漢書》卷七十六《尹翁歸傳》。

[8]《漢書》卷五十八《兒寬傳》。

“諸于”考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馬 怡

“諸于”是一種漢代服裝的名稱，也作“諸衿”。《說文解字》釋“衿”：“諸衿也，从衣于聲。”則“于”爲“衿”之省。

諸于在漢史中頗引人注意。西漢宣帝時，“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待太子者”，王政君因著“絳緣諸于”而入選。《漢書·元后傳》記載：

及太子朝，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是。

“政君”即王政君，後來成爲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皇太后，也即王莽的姑母。據此可知，諸于是外衣，可有鮮明的緣飾；王政君著諸于見太子，則諸于可做女子的正服。

更始諸將也曾著諸于。《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兩漢交替之際，更始政權將定都洛陽，其諸將因身穿諸于而被洛陽人視爲“服婦人衣”，受到嘲笑：

時三輔（按指洛陽）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綉繡，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

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則將更始諸將的著裝稱作“服妖”，認爲其最終導致了更始政權的敗亡：

更始諸將軍過洛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

更始政權遷都長安之後，其諸將的服裝又引來了長安人的譏諷。《後漢書·劉玄列傳》記載：

時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按指更始）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更始新貴多出自社會下層，長安人認爲其服裝豪華而不得體，故編歌謠來挖苦他們。那麼，

諸于究竟能不能做男服？它的樣式是怎樣的？

事實上，諸于在漢代的確是一種男女通用的服裝，尹灣漢墓簡牘為此提供了證據。在尹灣二號漢墓中，出土了一件記載隨葬衣物的木牘，上面有這樣的文字：

紵綺諸于一領，羽青諸于一領，綌鮮支單諸于一領。右諸于三領。^[1]

該墓的墓主為一中年女性，諸于在這裏是作女服。而在尹灣六號漢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類似的木牘，題為“君兄衣物疏”，上面有這樣的文字：

早九諸于一領，綌九諸于一領。^[2]

據考，尹灣六號漢墓的年代不晚於西漢成帝末年，墓主師饒字君兄（況），男性，生前為東海郡功曹史。諸于在這裏是作男服。

尹灣漢墓簡牘表明，如更始諸將那樣身為男性而穿諸于者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尹灣漢墓位於今江蘇省連雲港，漢時屬徐州。更始諸將原為綠林軍首領，其起兵地點在今湖北省，漢時屬荊州。這些地區都與洛陽、長安這樣的政治文化中心相距較遠，其服裝自有特色。而洛陽、長安人將更始諸將穿諸于譏為“服婦人衣”，其所表達的大約祇是一種正統的服飾觀念，實際上與當時各地區人們的著裝情況並不一致。

關於諸于的樣式，因文字記載短少，祇能做一些推測。《漢書·元后傳》顏師古注：“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顏氏的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大掖衣”，也稱“逢掖之衣”。《禮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逢掖”也作“縫掖”。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可知“大掖衣”的特點是大袖，近於漢晉時代的袍。或因周公和孔子曾著此衣，所以它又成為儒生的服裝。《後漢書·王符列傳》記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可知大掖衣在漢時是儒生的服裝，“縫掖”也因此成為儒生的代稱。所以，大掖衣不大可能是被譏為“婦人衣”的諸于。

但是，顏氏說諸于“即袿衣之類”，卻有一定的道理。袿衣是婦女的上服。宋玉《神女賦序》：“振繡衣，被袿裳。”^[3]劉熙《釋名·釋衣服》：“婦人上曰服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王先謙注引畢沅曰：“上服，上等之服也。”劉熙稱袿衣的特點是“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可知袿衣有刀圭形的垂飾。《爾雅·釋器》：“衣梳謂之袿。”郭璞注：“衣縷也。齊人謂之縷。或曰袿，衣之飾。”邢昺疏：“言飾者，蓋以縷為緣飾耳。”則袿衣的垂飾為絲質，亦如“梳”如“縷”。司馬相如《子虛賦》：“蜚縷垂髻。”司馬彪曰：“縷，袿飾也。髻，燕尾也。”李善曰：“縷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飾也。”^[4]《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縷，袿衣之長帶也；髻，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也。”由此看來，袿衣的垂飾大約是一種可以飄動的長帶（圖一、圖二^[5]）。但是，更始諸將為男性，且係武人，似乎不大可能穿這種華盛的女子的服裝。



圖一：踏鼓舞女，河南南陽漢墓石刻畫像



圖二：伯宗妻，晉代顧愷之《列女傳圖》(宋摹本)

由《漢書·元后傳》可知，王政君因衣“絳緣諸于”而出衆。“絳緣諸于”，就是有深紅色衣緣的諸于。漢代的衣大多有異於衣色的緣邊，鑲在領口、袖口和衣襟邊沿。《禮記·深衣》鄭玄注：“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爾雅·釋器》：“緣謂之純。”“純”即衣緣。通常認為，漢代的單衣就是《禮記》中所謂“深衣之制”，可做正式的外衣，男女通服。其形制是上衣與下裳相連，以彩色的衣緣鑲邊。不過，單衣在漢時是常見的服裝，其衣緣的樣式一般比較簡單，而王政君所著諸于的緣飾或應與之不同。

在漢代畫像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女服：長衣，大袖，交領，右衽，左右身側在腰以下有連綴的緣飾(圖三)。有人認為這就是袿衣。^[6]但仔細觀察此衣的緣飾，可見其形狀不太像刀圭，亦非長帶，與《釋名》等文獻中有關袿衣的記述不完全一致。不過，這種緣飾確為“衣裾”，較為繁復，同袿衣也有相似之處。枚乘《七發》曰：“雜裾垂髻。”^[7]清代學者任大椿《深衣釋例》曰：“衣圭乃縷縷下垂如旌旗之有裾，即所謂雜裾也。”^[8]而此衣的緣飾恰如旌旗之裾“縷縷下垂”，故稱其為“袿衣之類”，或未嘗不可。此外，漢代畫像資料還顯示，穿著此種服裝的，不僅有女子，也有文吏和武士(圖四、圖五)。這表明，此衣是當時的一種較為定型的服裝。由於它具有特殊的緣飾，大袖，而且男子也穿，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諸于。不過，諸于雖然通用，其男女式樣卻可能略有差別。例如，圖三中的女子，其服裝的下擺的緣邊較

寬，腰前又圍有蔽膝，而圖四、圖五中的男服則不然。



圖三：執鏡臺女子，山東沂南漢墓石刻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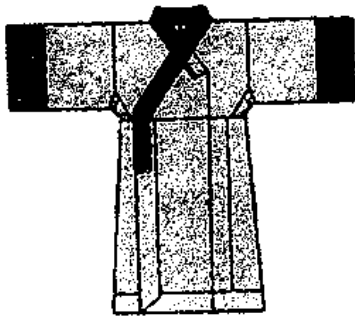


圖四：簪筆奏事官吏，山東沂南漢墓石刻畫像



圖五：執劍武士，山東沂南漢墓石刻畫像

附帶說一下，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9]曾出了一批戰國中晚期的衣物，其中有種短袖筒，寬袖口，刺綉鳳鳥紋樣，並以條紋織物為緣飾的長衣，似乎為一種固定的女裝式樣（圖六），有學者認為漢史中提到的“諸子”與之有相承的關係。^[10]但是，由于這種長衣的緣飾之樣式較為普通，沒有“衣縷”，與文獻所記載的“袿衣”相去較遠，因此還難以判定它就是“諸子”的前身，或是“諸子”。



圖六：絹面綿衣（示意圖），短寬袖，條紋緣飾，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

注 釋

[1]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151頁。

[2]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129頁。

[3] 《文選》卷十九。

[4] 《文選》卷七。

[5] 圖一與圖二的選用，參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1章；孫機：《深衣與楚服》，《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

[6] 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裝史》，中國旅遊出版社，2001年，100頁。

[7] 《文選》卷三十四。

[8] 任大椿：《深衣釋例》三，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九三。

[9] 該墓的墓主為一女性，年齡約40～45歲。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86～87頁。

尹灣漢墓簡牘材質與形制的研究

◎ 連雲港市博物館

◎ 周錦屏 劉洪石

東海縣尹灣 M6 合葬墓入葬的時間為漢成帝元延三年(10),墓主時為東海郡功曹史師饒。男棺中計出土竹簡 134 枚,其中素面簡一枚。木牘 23 方。M2 女棺中出土木方遣冊一枚,計木牘 24 方。竹簡有寬、窄兩種,但長度都一樣。均在 22.5—23 釐米之間,確合漢尺一尺。寬簡 21 枚。有素面簡 1 枚,為《神烏傳》底封。篇題《神烏傳》簡一枚,正文簡 18 枚。其寬度除兩枚為 1.2 釐米外,其餘皆為 1 釐米。厚度都是 0.3 釐米。窄簡計 111 枚。其長度基本都是 23 釐米,寬度 0.4 釐米,厚度 0.2 釐米。從出土情況看,窄簡間有結繩編次的痕跡,可分為二編聯和三編聯兩種,是為編簡。寬簡《神烏傳》為散簡。尹灣簡牘雖在棺液浸泡 2000 多年,出土後除少數因質變而斷裂,大多數完整,並有一定彈性,書寫的墨跡如新,字跡清晰可辨。祇是出土後由於脫離原來生存環境,簡牘發生收縮,字跡弱化。本文重點介紹尹灣簡牘的材質、加工方法以及簡牘的形制。以期為兩漢出土簡牘的搶救與保護提供實踐的經驗。

簡牘質料:

無論是剖製竹簡之竹,還是刮削木牘之木,完全是就地取材。

1、竹簡:

《論衡·量知篇》曰:“截竹為簡,破以為牘,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這是講簡的製作材料和書寫內容分類。竹簡,顧名思義是竹的加工產品,是從竹筒上剖片製成可以書寫的長條。製作竹簡的材料取之於本地山林間生長的竹子。尹灣漢墓出土竹簡的材質,經林業專家鑒識是當地生長的短穗竹和苦竹。這兩種竹子現在海州地區山陵平原是處可見,細密、肉厚、節短、而中空,也是製筆桿之材,也可作釣竿編製竹器之用。因其堅韌常被劈成長薄片去其肉(竹黃)作捆縛土紙和綁紮腳手架之用。它紋理細密,柔而韌,不易折斷開裂。經處理後製作成竹簡又極易受墨書寫。而毛竹、慈竹這類大型粗竹,劈開後纖維粗,並有軟硬纖維相間的現象,很像用松木製成的木札,堅硬的年輪木面不易受

墨，字跡又容易剝落、模糊不清，很少作為竹簡用材。因而對竹簡的材質選擇有着極高的工藝要求。凡是作為竹簡選材的條件必須具有堅韌、易着墨、經久不腐的特性。

竹簡的製作首要即是殺青。殺青是為防蛀，不變形而且受墨易書。《太平御覽》卷六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之竹簡作簡書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之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

這次尹灣漢墓出土的寬窄兩種竹簡，皆書寫於竹黃的一面。僅《神烏傳》篇題書於竹青。根據出土竹簡分析，竹青雖滑潤結構密致，但不易着墨，竹黃松軟，空隙大，易吸墨，便於書寫。因而儘管浸泡在棺液中歷 2000 年而不變色。字體小者如蟻仍清晰可辨。脫水後除少數粉化，多數仍不變形。這裏當然還有一個竹簡加工及毛筆和墨的選用問題。

2、木牘：

尹灣漢墓出土木牘 24 方，有厚薄兩種。木牘的材質極佳，經久不腐，正反無木結，材質又細而堅實。尤其是薄型的木牘片，對材質的要求更高。它要求牘面木質細潤平滑而無年輪。材質鬆軟而又堅韌，收縮變形小，抗腐而穩定。從我市歷年出土的木牘來看，都是取材於當地雲臺山上的楸樹和柏樹。“大葉梧桐小葉楸”。楸分二種：一種材質呈黃色為荊楸，材質鬆軟而不見年輪，板面細潤極易書寫。厚型的木牘都是這種材質做的，肉厚而無纖維，表面細膩。這種材質的木牘書寫字數不多，而且多為名謁以及禮錢簿等字數少的用材，一般正反兩面都書寫。有的背面無字。從我市古地理和古環境考察，兩漢時期雲臺山覆蓋着大片楸林。墓葬的棺和槨，大都以此材為原料。甚至有的棺木以整段楸木剝成，可見這種木材在兩漢時期取材易得。木牘《名秩總簿》、《武庫簿》等重要文書檔案在長 23 釐米寬 7 釐米的版面上，正反書寫達 4000 字之多。木牘較薄一般在 0.4 釐米左右，材質選擇經鑒定為松木，其上可見年輪，木紋成條狀較粗，纖維較多。在這批較薄的木牘中所使用的松木。即是揚雄所說“松槩”。以松木製牘，選材要求是極高的。從這幾片松牘中可以看出，不但對松木材種有選擇，而且對松木的剖製要求極嚴。板面松材直條木紋清晰細密、間隔一致。要求正弦切面的板材纔能製作。這樣可以防止彎曲變形。因松材較楸樹材質差，但不易得所以製牘皆薄些。從脫水後的情況來看，松材易橫向聯合和燥裂。變形也稍大，其優點是木質色澤清正，墨色清楚，縱向的收縮比楸樹也要小一些。這批木牘中一片記載兵車器的集簿是“松槩”。其字小而細密，字徑祇有 2 毫米，現仍非常清楚。它要求牘面木質細潤，平滑而無年輪，材質鬆軟而又堅韌，收縮變形小，抗腐耐久性好。

其實不論楸樹和松樹哪種材質製簡，都必須選用這些材質的正弦節面為最好，否則字寫在年輪硬質部位上墨色暈而不清楚，而且年輪硬而不易受墨，極易脫落。這種質差的木牘有時也有所發現。我們這批木牘中就有一塊是這樣的。從厚楸木牘來看，能見其木質收縮後的寬窄條痕。有時變形扭曲也不規則，如 M6 兩件《衣物疏》的木牘就是這一類型。

連雲港市歷年來出土的木牘，幾乎都是用楸樹和松樹材料製作的。而且楸樹材料製牘的數量遠遠多於其它材種。當然製牘絕非這幾種木材，祇要符合書寫要求，即受墨性能好，並能不蛀、不腐、變形小的材種都能製牘。《漢書·路溫舒傳》中，溫舒就是取澤中蒲，截以為

牒，編用寫書的。蒲是蒲柳。《爾雅·釋木》：“楊、蒲柳。”西北出的漢簡，即以松柳兩類居多。敦煌出土的簡經鑒定，其材料有青杆、（雲杉）、毛白楊、水柳、檉柳。都是當地所產。居延漢簡略同於敦煌，而有堅硬似棗木者。這都是就地取材的明證。

古時候製簡，用火炙之，以防蟲蛀變形，也利於受墨。雖沒見這方面的記載。但材質的乾燥過程和必要的工藝是必不可少的。竹於火上炙之。水分蒸發了，竹內的有機脂類凝固了，纔能受墨不暈，且能書寫極小極工整的字。木質也一樣，若不經過處理，容易發生霉變，也是不易於書寫的。

據陳夢家先生說：“武威木簡尤其是《燕禮》的若干簡，寫字的一面光亮有澤，不同於背面，並發現凡削改的字墨痕往往化開暈開”，因此，“出土木簡表面有光亮，似塗膠者。”

連雲港市和武威出土的簡有乾濕之分。這是因為西北乾燥，木簡存在於乾燥環境中。而我們這裏地下水位高，出土的竹木簡牘都浸泡於棺液中。但陳先生的發現卻引起我們的注意。在脫水過程中，膠體一般是不溶於醇液的。我們發現，在夾住木簡的玻璃片的下端似有一層沉積的粘附物，將其從玻璃片上撕下乾燥後，有似漆片的色澤。經南京博物院文研所化驗鑒定，認為是膠質物。

我們認為，木簡製作完畢後要塗刷一層膠液，這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因為木質在乾燥後，受墨性能也並不太好。尤其是，漢代用墨丸研磨墨汁書寫：先蘸點水，再去蘸墨，或者先蘸墨又去蘸水，爾後在板視上調和書寫時，如果水墨溶和不均，在一般未經處理的乾燥木片上書寫，暈化是不可避免的，尤其不能從容地停留在板上細心書寫。若不經膠液處理，要在一片簡上寫上幾千字，有的字小到祇有2個毫米，實在是不可想像。

書寫諸如《上計簿》、《武庫兵車器集簿》等字極多的木牘，都是用刀在木牘上劃上書寫格式後再寫。有時牘之上部擁擠，也根本不留“天”的空白。上部擁擠，下面卻又太空。也有的上部字小而密，寫到下面時字又疏又大，根本談不上書寫的章法。這也可能與當時這種書寫材料易得有關。漢時用刀劃線定格寫簡，這是我們在簡牘脫水中的發現。用刀劃線對木質厚的簡影響不大。而木質薄的簡則受害非淺，常因劃得過重，入葬後，在棺中就已斷裂。這種現象在發掘過程中也是常見的，在出土後的脫水過程中也常碰到這種現象。因頂線書寫，稍不注意就會損害墨跡。這給後來釋讀木牘文字帶來一定的困難。

3、簡牘形制

據《後漢書·光武紀》章懷太子注所引《漢制度》，述漢制皇帝策封諸侯王的策書是“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平常的詔書則是尺一，而律令簡則長三尺。《漢書·朱博傳》：“三尺律令。”在民間除經典載於長簡，其它的傳記諸子和書信則用一尺簡。故《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各為尺籍短書。”此所指尺書、尺籍、短書，即是尺一之版，它是根據長度而謂“尺一”，即漢尺一尺。約合今日的米制長度23釐米左右。

從尹灣漢墓出土竹簡，無論是寬簡和窄簡，所寫內容，包括日記雜占諸簡，皆非經非典，都屬尺牘之類，完全符合古制。

陳夢家先生有言：“簡，札與冊是應分別的，前者為單一的簡或札，後者為編聯若干簡或

札而成的書冊。”與尹灣漢墓出土的竹簡對照，此言極是。尹灣漢墓中寬簡《神烏傳》有篇題也有底簡，但未發現編聯的痕跡，因而祇能稱為“書冊”。日記簡雖為窄簡，但窄簡上留有用於編次的三角形楔口。其缺口有兩種。一種是，從上至下 7.6 釐米處有一缺口，再向下量到 15.6 釐米處又有一缺口。另一種編聯是：從簡上方向下量至 7.4 釐米處有一缺口，再向下量至 15.4 釐米處又有一缺口。窄簡三繩編，其尺寸為：距簡兩端 1 釐米處各有一繩編楔口，另一楔口是從簡下端向上量至 15.6 釐米處。簡之上首離繩編 1 釐米處有篆體的簡編號。從出土情況看，我們認為是先編聯後再依次書寫的。這從簡的編痕和簡編兩端字的距繩的位置均勻一致便可看出。每簡字數不多，最多的在 30 個到 40 個之間，這完全符合古制。《說文》：“編，次簡也。”《漢書·張良傳》：“出一編書。”師古注云：“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為書，故云一編。”《釋名·釋書》：“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漢制度》稱策書“編簡”，皆類同此理。編簡的書寫方法和其它簡牘不同。而是橫分格豎寫，在三繩編每一個空內，橫分，依次為一月、二月為一欄，三月、四月為第二欄，五月、六月為第三欄，七月、八月為第四欄，九月、十月為第五欄，十一月、十二月為第六欄，並從右向左依日記錄。日期以干支紀日，似為事先寫就，而逐日記錄當天行程、食宿以及記事。日記簡中有多處，祇記日而無記事，說明該日無大事而缺寫。

尹灣漢墓出土的竹簡和木牘雖說不能全面地囊括漢代的簡牘形制，但其類別以及簡質也十分豐富，為我們研究漢代的簡牘制度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豐富了文獻的記載，是十分重要的考古發現。

宋代永初漢簡的整理和研究

◎ 南昌大學文學院

◎ 陸錫興

前 言

北宋後期宣和年間，在陝右發現了東漢永初二年的《討羌檄》，引起了朝野的重視，並且作出了比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金石學者黃百思等把漢簡的原文全部釋讀記錄，保存了漢簡的原始文字面貌，不僅保留了可貴的漢簡釋文，豐富了古代文獻，而且為漢簡研究提供了基礎。更為難得的是簡影由宦者梁師成模勒上石，具備了拓印流傳的條件，使人們能目睹一千年前東漢草書的風貌。梁出入內廷，得幸以至竄名進士籍，然精於書法，能仿帝書，其模刻漢簡是出於書法上的愛好，採取唐代雙勾、宋初閣帖複製書法作品的辦法。《討羌令》簡文字數少，內容簡單，涉及的問題也少，因此，宋人的研究僅僅限於有限的幾個方面。黃百思根據簡文考史實、史期，糾正了史書的錯誤記載。黃又就漢簡的字體探索章草的形體和用途，趙彥衛進而就章草研究漢字形體演變之道，這些在當時都是很新鮮的觀點。趙選從簡文的“急急如律令”為漢代的公文用語，推知道教之語為此承用而來。總之，宋代對《討羌令》的整理和研究是科學而全面的，整理釋文、保存簡影，考證史實，與現代的漢簡整理沒有什麼兩樣，而且首次提出“漢簡”這個說法。永初漢簡的發現和研究正處在金石學興起之時，成為金石學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金石學是現代考古學的前身，可見，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作為考古學的歷史至少有千年之久。因此，值此紀念漢簡發現 100 年之際，回顧千餘年前宋代出土漢簡的歷史是頗有意義的。

漢簡的出土和保存

晉唐以來，皆有古簡發現，惟晉有簡文整理，成汲冢書，而唐代發現居延漢簡所載僅一

“陵”字。^[1]宋代崇寧與宣和年間二度在西北出土漢簡，均有對實物的詳細記載，特別是陝右漢簡的整理，在當時的條件下，堪稱完備，其釋文記錄和簡影留存，與現代簡牘整理相仿。

崇寧出土漢簡記載，祇有邵博《聞見後錄》卷二七：

崇寧初，經略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下狹，長尺許。書爲章草，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縑幾匹、綿幾屯、錢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爲之如新成者。字道古若飛動，非今蓄書帖中比也。其出於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儀》云爾。

天都，據《武經總要》稱：“《關右隴西圖記》並無此山，今西夏自爲天都山，在鎮戎軍西北五十里。”宋之鎮戎軍在今寧夏固原縣，天都山即今西華山，天都地區在今海原縣大部分地方，它北連西夏都城興慶府（今銀川市）、靈州（今靈武縣西南）。東側羣山環抱，中間祇有山坳河谷可供出入。興慶府的重要性自不必說，靈州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可出賀蘭山，渡黃河，入葫蘆川和馬蓮河谷。宋軍控制天都，能直取興、靈，西夏得到天都，直入宋境。所以，這是一個必爭之地。宋因置天都砦（在今固原西北 75 公里），崇寧所得漢簡當在天都砦一帶。章和爲章帝年號，早於永初，可惜有關這批木簡宋代文獻中再沒有進一步的記載。

北宋後期最重要的漢簡發現是永初簡，簡文較爲完整，爲發夫討羌之事，故稱《討羌令》。^[2]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下·漢簡辨》：“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跡古雅可喜。”此次漢簡出土的數量不少，好事者爭搶，宗師仲忽及宦官梁師成得到一部分，梁得到的是永初等簡。梁爲徽宗寵臣，授神霄宮，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欽宗立，梁罪暴露，不久被縊死。^[3]原簡與刻石俱亡，見者鮮少。黃伯思（1079—1118）元符三年（1100）進士，政和中，官至秘書郎通經史，精金石，與梁同朝，其稱簡字“書跡古雅可喜”，似乎祇見到石本。永初簡發現的時間，黃伯思沒有具體提及，據劉彥言“政和初，人與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書一瓮”，^[4]則在“政和初”，趙彥衛說是在“宣和中”，然後陸游也稱“政和中”，^[5]“政和”與“宣和”都是徽宗年號，各七年，中間隔一年的“重和”，時間相差不遠。出土的地點，劉言“陝西”、黃言“關右”，趙言“陝右”，陸游言“關中”。關中，東自函谷關，西至隴關，南至武關，北至臨晉關，西南至散關。“關右”，即關西，泛指潼關或函谷關以西的地區。陝右，指陝西路的西部。宋設陝西路，其轄境相當今陝西省而略大，範圍在寧夏長城以南，秦嶺以北，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肅東南部。所以，“關右”、“關中”、“陝西”大致含義差不多。“陝右”指陝西路的西部，相當現在的甘肅東南部。建武十一年（35），先零羌反叛失敗，安置於在今甘南的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此地成爲漢人與羌人雜處的地區，《討羌檄》在這一帶發現比較合理。所以，“陝右”說比籠統的“陝西”、“關右”等更加合理。另一個問題，永初簡到底是竹簡，還是木簡？劉言“木竹簡”，黃伯思之言“竹簡”，趙彥衛明明白白說“得木簡一瓮”。實際上，黃、趙等均未見到實物，是竹是木根據經驗而說，不足爲訓。一般來說，西北地區出土以木簡爲主，但是，竹簡也有可能，如甘肅南部放馬灘秦簡，即是竹簡。現在實物無存，難以下定論。宋代金石學起，古物多來自陝西，在長安形成古器市場，金石研究開創者劉敞的古器也在長安所得。^[6]靖康之變，關河淪落，長安市場一度蕭條，待金把河南地歸

還宋朝，又得恢復。“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携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7]陝西的古物市場與金石學的發展相隨，是鐘鼎銅器和碑石的主要來源，由此推知漢簡得之於長安市場，它和其他漢簡一樣，統稱置於瓮中，而真正得出土地點已經無法知曉。

吳師道是少數目睹原簡者，^[8]南宋以來，尚有模本存世。趙彥衛（1140？－1210？）從吳後人處見到模本。元末陶宗儀見到的“漢永初討羌檄”存張駒書，前記趙彥衛語，後云“乾道庚寅孟秋中命工鋟板”，當是根據模本再次刻版的書跡。^[9]現在，模本失傳，無法得見。近期有這樣的說法，北京故宮的庫房內發現五代的版本，是靖康年間宋內府之物，被金人擄去，北歸後存於此處，所以，北掠的漢簡或石本可能還會重現。

永初漢簡發現後，梁師成得到的部分可能就是兩枚，不久就上石，這樣可以保存書跡，以廣流傳。這是古代複製書法作品的基本方法之一。古代複製書法作品，是爲了摹臨和觀賞。臨、搨、拓是複製書法家作品的三個途徑，臨，即對着原作照樣寫下來，得到的是臨本。它受到臨寫者書法水平的影響，還會融入臨寫者的風格和習氣，難以存真，是複製技術中最差的一種。搨，把薄紙和絹覆在原作上，雙鉤外廓，再填墨，也叫雙鉤本。拓，用濕紙覆在金、石等器物上，然後用墨或其他顏料椎拓而成，得到的是拓本。雙鉤本大約始於東晉。南朝宋明帝命令虞龢整理皇家秘藏書帖，虞在泰始六年（470）的《論書表》謂：“要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劉宋是由東晉禪讓而來，也繼承了晉朝內府秘藏，這“搨書”即指晉朝之物。南朝書學大興，搨書大行天下。梁武帝收集的二王墨跡中不少是雙鉤本。^[10]唐代搨書已經很專業化，貞觀年間，太宗命搨《蘭亭序》《樂毅論》，分賜王公貴戚。石拓本至晚起於南北朝，王國維認爲：“《隋書》著錄之二種石經，確爲拓本。”^[11]唐代拓本也叫打本，書法名家的碑石面世，拓本隨之流行，對唐代書藝的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敦煌石窟中發現過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碑》、柳公權《金剛經》等。宋代帝王酷好前代法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甄挑選摹勒上版，刻成棗木版《淳化秘閣法帖》，由棗木版拓印成拓本分賜大臣。把書跡刻版拓印之法是宋太宗的首創。此風一開，後來者紛紛效仿，單單就《淳化秘閣法帖》續、補、覆刻上石成爲新帖數量就不在小數。在北宋後期，刻帖是一個高潮，哲宗、徽宗時期著名的有劉次莊《臨江戲魚堂帖》、英宗子《二王府帖》、詔命《元祐秘閣續帖》、詔命《大觀法帖》、詔命《太清樓續帖》、敷陽王案《汝帖》。陝右漢簡上石成帖，應該說是時代的產物。梁師成雖非良臣，但是他頗通書藝，善仿書跡，他“初隸賈詳書藝局”，後“主出外傳道上旨”，“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12]梁師成身居高位，仿書高手，有條件延請優秀匠師，可以推想，永初漢簡的石本是高度保真的。在近代西方照相技術進入中國之前，石本是最有效的保存墨跡的辦法，而且，可以取得數量衆多的拓印副本，真跡得以廣泛的流傳。黃伯思所見簡是梁之石本，“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13]趙彥衛謂“得其模本示余”，此“模本”本來是指雙鉤填墨本的，但是，宋代也混稱拓印的副本。所以，趙見到的和黃伯思一樣，也是石本。

釋文

陝右漢簡朽敗散亂，不可詮次，多無法釋讀，“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因此，簡文也得以完整記錄。現存各本的文字稍有差異。黃伯思所記爲（學津討源本《東觀餘論·漢簡辨》）：

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古逸叢書本“都”字下空五字，接“丞”字。

趙彥衛《雲麓漫抄》卷七所記，“二十日”作“廿日”，“如律令”後有“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日給。”

元末陶宗儀《古刻叢鈔》卷三六“漢永初討羌檄”錄此文，“四十”作“卅”、“匹”作“疋”。

清葉奕苞《金石補錄》卷二“漢討羌檄”文字同《古刻叢鈔》，但奪“六月”二字。

比較各本簡文的異同，可以辨別優劣。黃伯思是根據簡影作出的釋文，用當時的通行文字寫出。而且，祇取了一個檄文，以“如律令”結束，首尾完整，這可以從出土漢簡得到證明。而後附加的一般就是有關的官吏職名，如：

□□通移過所如律令 令史宗威佐殷《甲乙編》15·8

□如律令 令史熹V光V博尉史賢《甲乙編》29·7

如律令 /令史殷 番夫去疾□ 《甲乙編》41·27, 41·32

如律令 /掾襄令史譚尉史宗《甲乙編》160·6、

如律令 /守令史詡佐襄七月丁亥出《甲乙編》170·3A

忽□□令 /令史□ 《甲乙編》203·48

趙彥衛的釋文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模本，估計原本爲保存書跡計，他處殘簡也一併收入，並不在乎文獻上的合理性，造成了錯簡，這點他不如黃伯思。元末陶宗儀錄文規範，按照模本嚴格照錄，所以，文字上比黃伯思、趙彥衛更加嚴格。所異之“卅”“疋”並非當時通用之字，應該是簡影原字。所以永初漢簡文句應從黃本，而文字宜從陶本。不過，其中“疋”字是值得研究的。

《說文》：“疋，足也。”本與“匹”無關，但是古來有通用之例。《戰國策·魏策一》：“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漢書·叔孫通傳》：“乃賜帛二十疋。”此類例子還有。那麼，“匹”、“疋”二字是什麼樣的通用關係呢？我查檢了大部分漢簡，結果沒有用作“匹”的“疋”字。如，《敦煌漢簡》240“馬一匹”、355“私馬一匹”、849“驢一匹”、1044“馬一匹”、1045“馬一匹”；《居延漢簡甲乙編》3·33“馬三匹”、19·1“私馬一匹”、18·13“私馬一匹”、19·30“卒馬”、20·8“馬七匹”、26·2“馬六匹”、28·16“馬一匹”、46·7“私馬六匹”、62·13“馬一匹”、65·2“馬八匹”、65·12“馬一匹”、71·46“馬二匹”、78·36“驛馬一匹”、81·8B“馬一匹”、81·8C“囊馬一匹”、90·3“馬九匹”、90·39“馬一匹”、116·57“羣馬一匹”、122·14“私馬一匹”、142·26“驛馬一匹”、185·15, 217·10“練一

匹”、192·25“蓄馬一匹”、303·12A“蓄馬二匹”、387·21“馬一匹”、503·4“馬一匹”、515·45“候馬二匹”、522·2“帛五四”；《居延新簡》E. P. T43: 14“野馬一匹”、E. P. T51: 12“馬一匹”、E. P. F22: 188“馬一匹”、E. P. F22: 293“帛一匹”、E. P. F22: 585“馬一匹”、E. P. F22: 669“馬一匹”、E. P. W1: 34“縑一匹”。總之，在出土的漢簡中無論是馬還是布帛之類，量詞都用“匹”，而不用“疋”字。但是，這二字並非沒有關係，字形上相近。“匹”漢簡中書作“𠂔”，很容易和“疋”字相混淆，所以，其中一部分就誤隸定為“疋”字。這就是二字“通用”的實質。回到永初漢簡的釋文，同樣一個草書“匹”字，黃、趙隸定為“匹”，而陶隸定“疋”字，是不奇怪的。不過，“通用”在這裏講不通，定為“疋”字是錯誤的，應以“匹”為正。永初漢簡的釋文可以定為：

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馬卅匹、驢二百頭，日給。

書體與書法

梁師成將漢簡上石，是出於對漢代的書法作品的重視。對這件難得的漢代草書，人們給以充分的重視。黃伯思稱之“書跡古雅可喜”，吳師道為之題詠：“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宋代漢晉草書作品所餘不多，且輾轉模刻，其中多有偽作。“按草書今在世益少，惟《急就章》見在，並諸帖所傳耳。然《急就章》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藝叟所珍《鵝雀賦》，又率是贗作。”^[14]所以，永初簡彌足珍貴，趙彥衛贊“當為今章草第一也”。它不僅多次上板，而且被看作章草的主要作品，直至明代，張紳《法書通釋·立式》“章草”中，把“永初竹簡”排在“史游《急就章》”之後，張芝《八月九日》諸帖之前。就章草宋人討論了幾個問題。其一，章草名稱的含義。章草，得名之由種種，尤與章帝有關，章草起章帝，“因章帝所好名焉”，^[15]又有施於表章說。米芾也稱“章”乃章奏之章。黃伯思看到永初簡規整分明，可用於公文，故贊成此說。“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16]其二，章草的形體。黃伯思謂之“蓋此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17]趙彥衛由永初草書檄推之，“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章，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章草變亂，張旭、懷素輩狂草出現，“此法掃地矣”。事實上，出土得漢簡表明，草書早於隸書出現，法則嚴整的漢代草書要早於帶波磔的八分書，趙的說法未必正確。但是，他根據新發現的古代實物資料作出認真的考證，是合乎現代科學精神的。

史實和史期

黃伯思對永初漢簡所涉的史實判斷清楚，云：

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據《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月日首尾相應非史之先後差繆，宜以簡所書為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考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18]

先零羌是河湟諸羌之一，西漢時為趙充國擊敗，後曾要求渡湟水而牧。西漢末、東漢初，中原動亂，先零羌乘機而起。《後漢書》之《安帝紀》、《鄧騭傳》、《西羌傳》載：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夏，羌人不願出征西域，奮起反抗，聲勢浩大。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統率大軍征討。永初二年（108）春，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鄧騭與羌人戰，敗於冀西。黃伯思對永初簡歷史背景的判斷正確。自金石學興起，利用金石材料補正史籍成為傳統。歐陽脩《與劉侍讀書》：“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所謂闕失，無非史實和史期之誤。歐陽脩根據《孔穎達碑》孔氏之字“沖遠”糾正《舊唐書》“仲達”之誤。黃伯思舉簡文斷召還鄧騭在二年冬，《安帝紀》是而《鄧騭傳》非。宋人重視金石文獻，但也不迷信。中國古代以干支記日，歷史日期有條不紊，史籍傳寫之誤，可以根據干支日序加以訂正。歐陽脩就以曆法推算出晉陸曄碑所記“咸和七年，歲在庚辰”為“壬辰”之誤。^[19]黃伯思根據簡文“六月丁未朔”，以曆法推《安帝紀》“秋七月戊辰詔”，其干支“戊辰”也誤，而知《安帝紀》七月閏又誤。黃伯思得一漢簡短文竟然剔出正史三處錯誤，足見出土漢簡的史料價值。

“急急如律令”

永初漢簡以“如律令”收尾，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首先，宋趙彥衛論之：“‘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由今云‘符到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20]西陲漢簡發現後，王國維、陳槃皆有論及，而後者縱述古今。云：

“如律令”兩漢詔令書檄常語，道家亦襲之。唐李匡乂乃附會曲說，《流沙墜簡考釋》二已辟之矣。偶檢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曰：“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

家遂得祖述。”又清王堂《知新錄》曰“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注：“言當履繩墨，東不失律令也”；（按此應劭《風俗通》說，李引之）呂延濟注“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概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達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捷速。其說怪誕，不足信（卷十“急急如律令”）。按趙、王君此論，羅說之先導。是不可以不表而出之。^[21]

“如律令”之語由來已久，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石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漢承秦制，也爲公語之常，在漢簡中經常出現即是明證。公文加“急”字，秦簡已有記載。《秦律十八種·行書》：“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霽（畢），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關於令“急”與“不急”，其他條文也有提及。如《秦律十八種·倉律》“更隸妾節（即）有急事，總冗，以律稟食；不急勿總。”一般在正文結束斷句，後加“如律令”三字。在“如律令”三字前表示急切的用語有“毋忽”，敦煌漢簡如 1278、1382(B)、1629、1685、1759、（吳初曠、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年）《居延漢簡甲乙編》如 158·23、158·24、203·48、214·152、275·24A、278·7A、278·7B、326·7、487·63、517·4、《居延新簡》如 E. P. T8:39、E. P. T52:26、54、111、324、E. P. T53:23、33A、106、316、E. P. T56:382、E. P. T59:360B、E. P. F22:73、E. P. T65:168、291、506、757、769。“毋留”如《居延漢簡甲乙編》204·5、312·5、《居延新簡》E. P. T53:106、E. P. T57:10A、E. P. W32。其他還有“毋失期”，如《居延漢簡甲乙編》42·20A，“毋苛留”如《居延漢簡甲乙編》401·6、“毋苛留止”如《居延新簡》E. P. T53:46。漢簡中出現“急急”，“囚皆自思以爲意者將門口急急急稟”（《敦煌漢簡釋文》2198）、“告第廿三候長記到召箕山隧長明詣官以疾爲故急急”（《居延漢簡甲乙編》160·4）。但是尋檢已發表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未見“急急如律令”之語。很可能漢代的公文沒有“急急如律令”的說法，這個“急”或者“急急”是署在公文題外。當然，這要有待於出土實物的證明了。

現在已經發現的漢代道家符文中“如律令”有用“急急”的，也有不用的，尚不統一。僅有“如律令”者，陝西戶縣縣醫院漢墓陶瓶“陽嘉二年（133）”朱書文、^[22]西安市雁塔路陶瓶“初平四年（193）”朱書文、^[23]寶雞市鎗車廠東漢晚期墓二件陶瓶朱書文、^[24]洛陽邙山西花壇 24 號漢墓陶瓶“延光元年（122）”朱書文、^[25]光和二年（179）王當賣地鉛券、延熹四年（161）鍾仲游妻賣地鉛券。^[26]書“急急如律令”，長安縣南李王村東漢晚期墓陶瓶朱書文^[27]以及江蘇高郵邵家溝東漢末期墓符籙木牘。^[28]

西北大學歷史系文物陳列室陶瓶“初平元年（190）”朱書文末尾“急急如”後面是一組符籙，有人釋文作一“律”字，似不妥，細審符籙下面部分“令”字分明，上部對稱曲折長筆無疑是道家秘文，宜釋作“律”。這是唯一漢代“急急如律令”實例。^[29]充分的事實說明，在東漢時期，道家與公文一樣，一般祇寫“如律令”，直到東漢晚期纔出現“急急如律令”，惟一“急急如律令”例子卻有真偽可疑之處。西漢漢簡的年代多在西漢後期、新莽時期，東漢時期雖佔少數，還是有一定數量，早者有建武，遲者有永平十八年（75）（《敦煌漢簡》2201）永元五年（93）永元七年（95）（《居延漢簡甲乙編》128·1）及永初五年（111）（《居延新簡》E. P. T61:5A），永初

六年(112)(《敦煌漢簡釋文》2408),但都沒有發現“急急如律令”之語。為何現代出土的東漢簡沒有發現“急急如律令”,陝右永初二年(108)簡中卻出現“急急如律令”,東漢中期偏早公文用語,為何要到東漢晚期或末期道家纔有反映?而且用“急急如律令”為多?可能的結論是永初漢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注釋

- [1]唐牛僧孺《玄怪錄·居延部落主》。
- [2]有關永初漢簡,前賢孔令毅有過初步介紹,參閱《漢寧帝木簡發見於宋》,《說文月刊》第二卷,1941年。
- [3]見《宋史·宦者傳三》本傳。
- [4]《東觀餘論·記劉無言論書》引。
- [5]陸游《跋〈蘭亭〉〈樂毅論〉並趙岐王帖》。
- [6]歐陽修《集古錄》卷一“韓城鼎銘跋”：“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
- [7]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七。
- [8]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師道親睹梁簡。”
- [9]陶宗儀《古刻叢鈔》三六。
- [10]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跡，又似是摹。”又“‘治廉涇裡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跡。”
- [11]《觀堂集林·魏石經考四》。
- [12]《宋史·宦者傳三·梁師成》。
- [13]《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記與劉無言論書》。
- [14]《雲麓漫鈔》卷七。
- [15]《書斷》卷上引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
- [16]《東觀餘論·記劉無言論書》。
- [17]《東觀餘論·記劉無言論書》。
- [18]《東觀餘論·漢簡辨》。
- [19]《集古錄》卷四“晉陸嗜碑跋”。
- [20]《雲麓漫鈔》卷七。
- [21]《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六《漢晉遺簡偶述 28·如律令》1948年。
- [22]禡振西：《陝西戶縣的兩座漢墓》，《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
- [23]唐金裕：《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文物》1980年第1期。
- [24]寶雞市博物館：《寶雞市鎡車廠漢墓——兼談 M1 出土的行楷體朱書陶瓶》，《文物》1981年第3期。
-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1984至1986年洛陽市區漢晉墓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第7輯，科學出版社，1991年。
- [26]見吳天穎：《漢代賣地券考》，《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 [27]員安志、馬志軍：《長安縣南李王村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4期。
- [28]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 [29]高大倫、賈麥明：《漢初平元年朱書鎮墓陶瓶》，《文物》1987年第6期。

關於漢代的避諱

◎ 日本實踐女子大學

◎ 影山輝國

—

近年，中國古代思想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種依據調查出土文獻中的諱文來判斷其抄寫年代的傾向。但 50 多年前，胡適提醒我們不能輕易以後世的嚴格標準來考訂古代文獻。他主張漢代的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他共列舉了以下七種證據。

- 1.《說文》不但不避前漢諸帝之諱而且不避後漢光武帝、明帝之諱。^[1]
- 2.伏無忌(死於桓帝時)所作《古今注》舉後漢九帝之名諱。^[2]
- 3.司馬遷《史記》記有文帝、景帝、武帝之名。^[3]
- 4.《漢書·韋賢傳》韋孟的諫詩中有“寔絕我邦”等句，在鄒詩中有“于異他邦”等句，另從音韻角度來看，他亦不避劉邦之名。^[4]
- 5.魏王肅《諱議》曰：“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5]
- 6.蔡邕(133-192)之碑版文字中，不避後漢七帝之諱共有 36 例。^[6]
- 7.《論衡》不避“莊(明帝名)”字至少有 16 次之多。^[7]

胡文之結論如下：

“我們明白了兩漢四百年的避諱的寬大，纔可以明瞭三國兩晉以後避諱制度的逐漸變緊，變嚴，變專制，變野蠻，都祇是‘變本加厲’的歷史現象。……因此，我們更相信，我們決不可用後世的嚴格避諱的標準來考證漢朝文獻的年代。”

《兩漢人臨文不諱考》，《圖書季刊》新第 5 卷第 1 期 1944 年 3 月

胡氏列舉的諸書裏，即使考慮到有後人的修改，但也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此之前，陳垣也曾著書專論歷代避諱，舉出東漢碑文裏光武帝以後不避諱的 22 個例子，^[8]指出：

“則漢時避諱之法亦疏，六朝而後，始漸趨嚴密耳。”《史諱舉例》1928 年

如今，我們有必要通過客觀地研究漢代出土文獻中有關記述，進而瞭解漢代避諱的史實。

二

首先所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什麼意思呢？這句話可見於《禮記·曲禮上》。關於“詩書不諱”的意思，魏·王肅道：“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之明驗也。”^[9]由此可見，創作《詩》或《書》時，沒有避諱王的名字。不過，一般可能理解爲在讀或寫《詩》、《書》時，即使是諱字也不回避。

關於“臨文不諱”，鄭玄能注爲“爲其失事正”，梁·何胤將“詩書不諱”和“臨文不諱”聯繫起來，釋爲“‘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10]何胤勉強將“臨文”與“詩書”對照起來而限定於“禮執文行事”，不過是不是應該指爲更廣泛的日常行爲呢。孫希旦也說“愚謂臨文，凡官府文書、國史紀載，皆是。非惟禮文而已。”^[11]

三

下面我們來就 1949 年以後出土的漢代文獻，考察一下避諱。

(1) 武威漢簡

1959 年 7 月，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第 6 號墓出土了《儀禮》九篇（469 簡，27332 字）竹木簡和日忌、雜占的木簡。其中日忌木簡背後寫有可推斷爲墓主自書的一行字：“河平□[年]四月四日諸文學弟子出穀五千餘斛”（河平，成帝年號〔前 28 - 前 25〕），另外，從行間痕跡來看，可知簡本《儀禮》是生前教授弟子所用，同時還出土了王莽時的大泉五十，由此可推論墓主似乎活躍於成帝之時，葬於王莽之時。用隸書寫的簡本《儀禮》是西漢晚期成帝前後的抄本。

出土的《儀禮》九篇裏不見一處“邦”字。甲本《士相見之禮》中的“也國”、“在國”，丙本《喪服》中的“也國”、“國人”等，今本《儀禮》中“他邦”、“在邦”、“邦人”都記作“邦”字。《武威漢簡·叙論》中說是“避劉邦諱”，^[12]但如果真如此，爲什麼不避諱景帝、武帝、昭帝的名字呢？“啓（景帝名）”字出現 4 個、“徹（武帝名）”字 21 個、“弗（昭帝名）”字 8 個。另外同時出土的日忌木簡^[13]裏，爲什麼會出現“河魁以祠家邦必揚”的“邦”字呢？《武威漢簡·釋文》中說“知民間卜筮書可不避也”，不過爲什麼民間卜筮書不避“邦”字，而《儀禮》祇避“邦”字呢？是否可以說這就是胡氏所言的“兩漢四百年的避諱的寬大”的例子呢？據說簡本《儀禮》不同於大戴本、小戴本的慶氏本。這麼說，“邦”和“國”祇是由於文本的不同而已。《泰射》第 114 簡

裏寫着“公入囂”，今本“囂”爲“驚”。“驚”是成帝的名字，如果簡本避諱本該用代字的“俊”。^[14]由此可見，記作同音的“囂”字，不是避諱而是由于系統不同的文本而致。

(2) 銀雀山漢簡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1號墓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4942枚竹簡，從2號墓出土了《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32枚竹簡。1號墓出土的武帝建元時（前140—前135）的三銖錢和2號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的曆譜，由此可推斷兩墓皆爲武帝初年的墓葬。竹簡的字體是早期隸書，由此又可推斷是抄寫於文帝、景帝至武帝年間。

《孫臏兵法·陳忌問壘》裏兩次出現“晉邦之將”之語，並沒有避高祖之諱。還有公佈的銀雀山漢簡整部中，“盈（惠帝名）”字出現3個、“恒（文帝名）”字21個、“啓（景帝名）”字4個、“徹（武帝名）”字3個。《銀雀山漢墓竹簡情況簡介·關於竹簡的時代》中道“西漢時期避諱不嚴，這批竹簡有時似避‘邦’字諱，有時又不避。”^[15]承認有時連高祖的諱都不避。

(3) 馬王堆漢墓帛書

1973年12月，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3號墓出土了《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周易》及卷後古佚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五十二病方》、《天文氣象雜占》、《五星占》等30多種帛書。因有記載下葬年爲“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的木牘，而判明帛書抄寫於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以前。《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字體介於篆隸之間，《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則是隸書。

有關“邦（高祖名）”、“盈（惠帝名）”、“恒（文帝名）”3字，筆者所知如下：

據高亨、池曦朝《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16]：

《老子》甲本：“邦”字有22個，“盈”字有9個，“恒”字有25個。

《老子》乙本：“邦”字沒有，“盈”字有9個，“恒”字有29個。

甲乙兩本中對“邦”字的用法有着明顯的不同。《老子》甲本的“邦”字在《老子》乙本中變爲“國”字，由此許多研究者解釋爲甲本避高祖之諱，乙本不避諱。其中主張“卒哭而諱”者認爲甲本抄寫於高祖卒年以前，乙本抄寫於惠帝或呂后稱制時期^[17]；而主張“避今上諱”者則認爲甲本是劉邦稱帝以前寫成，乙本是劉邦稱帝以後，劉盈、劉恒爲帝以前寫成。^[18]

進而查閱甲本卷後古佚書發現：

“邦”字有28個，“盈”字有3個，“恒”字有2個。

乙本卷前古佚書中：

“邦”字沒有，^[19]“盈”字有10個，“恒”字有34個。

此類古佚書與《老子》甲乙兩本有着完全相同的傾向。那麼，《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是避“邦”字諱嗎？如果《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是“字體與同墓所出有文帝三年紀年的《五星占》很相似，抄寫年代可能在文帝時期”^[20]，《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爲什麼祇避“邦”字，而不避“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字呢？大西克也由此推斷：“一則宣帝以前的皇帝的名字都有常用字，二則人們知道皇帝名諱的機會恐怕極少……惟一的例外是劉邦……因

為高祖是漢朝的開創人物，後代的人們對他比較關心。人們熟悉‘邦’字是高祖名諱，用心避改，這樣養成了祇避高祖名諱的習慣。”^[21]筆者認為，這一見解值得注意。武威漢簡《儀禮》中沒有“邦”字的理由也可由此得以說明。但是，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中兩次出現“邦”字又怎麼解釋呢？另外，宣帝五鳳三年（前 55）以前抄寫的定州漢簡《論語》中也有“邦家”之語。^[22]加之，馬王堆 3 號墓出土的《春秋事語》中可見到“小邦”、“大邦”等 10 個“邦”字，《天文氣象雜占》裏“邦君”等至少有 42 個“邦”字。字體上，《春秋事語》“由篆變隸”^[23]，《天文氣象雜占》“雖然已是隸書，但篆書的意味還相當濃厚。同出土的許多帛書中，祇有《老子》甲本和《戰國縱橫家書》和它比較接近。”^[24]此兩書也有秦末抄寫的可能，但不能否定都是在高祖、惠帝時抄寫的。

黃金貴曾指出：“‘邦’是西周至春秋所使用對國家的通稱。……下至戰國，‘國’日趨增多，‘國’終於成了使用最廣的國家通稱。”^[25]如果黃氏的結論是正確的，保留“邦”字乃為依據古抄本，用“國”字乃為依據比較新的抄本，而決非依據避諱。

四

這麼說來，所謂“兩漢四百年的避諱的寬大”是無限制的寬大嗎？據《漢書·宣帝紀》記載，宣帝元康二年的詔言：“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此乃上書之際，犯宣帝原名“病已”而受罰者衆之故，宣帝憐憫，而改名為“詢”，可知上書之際必須避諱。如百姓上書強制避諱，官吏們執筆行政文書時當然也應該用心避諱。行政文書中出現的地名，如“恒山郡”便被改為“常山郡”，此種事例確為實在。再如何焯所言：“宣帝因人有以觸諱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26]由此可知避諱乃“避今上諱”也。即如周壽昌數語道破：“《禮記》‘卒哭乃諱’，《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生稱名，死稱諱也。此宣帝生時詔，亦云諱者，漢時名諱無異稱。《說文解字》禾部秀云：‘上諱’，謂光武也。示部祐云：‘上諱’，則安帝也。許慎卒於建光元年，其子冲即於其年奏上《說文》，安帝尚存也。”^[27]，漢代也已不存在“名”和“諱”的區別。

基於上述史實，武威漢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既為私人抄書，因此基本上沒必要避諱。

注 釋

[1] 許慎於後漢五帝之名（秀、莊、坦、肇、祐），其字皆“不解說而最在前”，但前漢諸帝名，則“皆識而不闕”。但是《說文》的解說文中有“秀（光武帝名）”，“莊（明帝名）”字。

禾部 稼，禾之秀實為稼。

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

艸部 莠，禾粟下揚生莠也。从艸，秀聲。

菰，茅秀也。

菰，菰之未秀者。

莊(篆文)，上諱。英(篆文)，古文莊。

[2]伏無忌：《古今注》：“秀(光武帝名)之字曰茂。莊(明帝名)之字曰嚴。烜(章帝名)之字曰著。肇(和帝名)之字曰始。隆(殤帝名)之字曰盛。祐(安帝名)之字曰福。保(順帝名)之字曰守。炳(沖帝名)之字曰明。續(質帝名)之字曰繼。”

[3]胡氏所舉司馬遷不避諱的例子：

不諱恒(文帝名)——“立子恒以為代王”(高祖本紀)、“次代王恒”(高祖本紀)、

“薄夫人子恒為代王”(呂太后本紀)

不諱啓(景帝名)——“不憤不啓”(孔子世家)

不諱徹(武帝名)——“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孝景本紀)、“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孝景本紀)

據李曉光、李波主編：《史記索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10月，據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版本)，“邦”字有11個，“盈”字有14個，“恒”字有16個，“啓”字有24個，“徹”字有5個。

[4]《漢書·韋賢傳》韋孟的諫詩：“……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邦事是廢……”。在鄭詩：“……寤其外邦……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於異他邦……”。

[5]《通典》卷104所引。

[6]不避秀(光武帝名)

1 周勰碑(桓帝延熹二年159)“宣所謂天民之秀”

不避莊(明帝名)

2 崔君夫人誄(桓帝延熹四年161)“喜不亂莊”

3 喬玄碑(靈帝光和七年184)“其性莊”

不避隆(殤帝名)

4 崔君夫人誄(桓帝延熹四年161)“既隆且昌”

5 胡廣碑三(靈帝建寧五年172)“升隆以順”

6 李咸碑(靈帝熹平四年175)“名莫隆於不朽”

7 陳球碑(靈帝光和二年179)“秉心茲隆”

8 喬玄碑陰(靈帝光和七年184)“干其隆指”

9 楊賜碑二(靈帝中平二年185)“在棟伊隆”

10 房植碑(無年月)“功隆名顯”

11 桓彬碑(無年月)“辭隆從廢”

不避祐(安帝名)

12 胡公夫人靈表(靈帝建寧三年170)“失延年之報祐”

13 胡廣碑二(靈帝建寧五年172)“受茲介祐”

不避保(順帝名)

14 蔡朗碑(似在桓帝時)“止於阿保”

15 郭泰碑(靈帝建寧二年169)“保此清妙”

16 東鼎銘(靈帝建寧三年170)“保乂帝家”

17 胡廣碑一(靈帝建寧五年172)“昭明德以保身”

18 胡廣碑二(靈帝建寧五年172)“保茲舊門”

19 胡廣碑二(靈帝建寧五年172)“保身遠則”

20 胡廣祠堂碑銘(靈帝建寧五年172)“保賴寶叙”

21 胡廣祠堂碑銘(靈帝建寧五年172)“保公之謨”

22 喬玄碑陰(靈帝光和七年 184)“視民如保赤子”

23 楊賜碑三(靈帝中平二年 185)“德宜師保”

24 楊賜碑四(靈帝中平二年 185)“宜建師保”

25 楊賜碑四(靈帝中平二年 185)“保乂帝家”

26 濟陽宮碑(無年月)“保之無疆”

27 警枕銘(無年月)“潛德保靈”

不避炳(冲帝名)

28 胡廣碑二(靈帝建寧五年 172)“彪炳其文”

不避志(桓帝名)

29 蔡朗碑(似在桓帝時)“栖遲不易其志”

30 陳球碑(靈帝光和二年 179)“樹口為志”

31 陳球碑(靈帝光和二年 179)“休休之志”

32 劉寬碑(靈帝中平二年 185)“皆不繇志”

33 范丹碑(靈帝中平二年 185)“志高行潔”

34 楊賜碑一(靈帝中平二年 185)“居高而志降”

35 楊賜碑四(靈帝中平二年 185)“先志載言”

36 翟先生碑(無年月)“既不降志”

[7]經查《論衡》(明通津草堂本),發現有“莊(明帝名)”26個。

[8]不避秀(光武帝名)

1 衡方碑(靈帝建寧元年 168)“攬英接秀”

2 孔寬碑(靈帝建寧四年 171)“容其玄秀”

3 逢盛碑(靈帝光和四年 181)“苗而不秀”

4 張納功德叙(靈帝中平五年 188)“旌甄秀異”

不避莊(明帝名)

5 嚴訢碑(桓帝和平元年 150)“兆自楚莊”

6 孫叔敖碑(桓帝延熹三年 160)“莊王置酒以為樂”

7 郭究碑(靈帝中平元年 184)“嚴莊可畏”

不避肇(和帝名)

8 平輿令薛君碑(桓帝延熹六年 163)“我君肇祖”

9 衡方碑(靈帝建寧元年 168)“肇先蓋亮之苗”

10 樊敏碑(獻帝建安十年 205)“肇祖必嚴”

不避隆(殤帝名)

11 丁勣碑(桓帝元嘉元年 151)“隆平”

12 韓敕碑陰(桓帝永壽二年 155)“哀隆”

13 衡方碑(靈帝建寧元年 168)“口隆寬標”

14 華山亭碑(靈帝光和二年 179)“大華優隆”

不避保(順帝名)

15 衡方碑(靈帝建寧元年 168)“保障二城”

不避炳(冲帝名)

16 史晨奏銘(靈帝建寧二年 169)“玄德煥炳”

不避繼(質帝名)

17 帝堯碑(靈帝熹平四年 175)“繼堯之緒”

18 尹宙碑(靈帝熹平六年 177)“克纘祖業”

19 張遷碑(靈帝中平三年 186)“纘戎鴻緒”

不避志(桓帝名)

20 劉脩碑(靈帝建寧四年 171)“志遐拔葵”

21 婁壽碑(靈帝熹平三年 174)“岐嶷有志”

22 曹全碑(靈帝中平二年 185)“先意承志”

[9]《通典》卷 104 所引。

[10]孔穎達:《禮記正義》所引。

[11]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卷 4。文中“非惟禮文而已”之句所見甚是,而“凡官府文書、國史紀載,皆是”之意還需要探討。

[12]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 年 9 月。

[13]字體是漢代通行的近乎草書的隸書。

[14]《漢書·成帝紀》注引荀悅說:“諱驚,字太孫,驚之字曰俊。”

[1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 年 9 月。

[16]《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17]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編者說明》,文物出版社,1974 年 9 月。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18]高亨、池曦朝:《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文物》,1974 年第 11 期。李裕民:《馬王堆漢墓帛書抄寫年代考》,《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4 期。

[19]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74 年 9 月)的《十大經·順道》中祇有一個“兵邦”,但是,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 年 3 月)的《十六經·順道》中改成為“兵邦(主)”。

[20]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說明》,文物出版社,1980 年 3 月。

[21]大西克也:《秦漢避諱芻議》,《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 2 輯),1999 年 5 月。

[2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595 簡。可惜這枚簡文因唐山地震而殘損。

[23]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 年第 1 期。

[24]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內容簡述》,《文物》,1978 年第 2 期。

[25]黃金貴:《方·邦·國——古漢語詞義辨析》,浙江省語言學會編:《語言論叢》,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26]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前漢書·紀》。

[27]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 4。

簡帛發現與《史記》研究

◎ 日本愛媛大學 藤田勝久 著

◎ 陳偉 譯

序 言

在 20 世紀,由於簡牘、帛書的大量發現,歷史學、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獲得許多成果。對 20 世紀上半葉發現的敦煌、居延漢簡的研究,以及對隨後由遺址、墓葬中出土的法律、公文文書資料的研究,推進了歷史學的綜合考察^[1]。

另一方面,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在古墓中出土的書籍,使得文獻學、思想史的研究也取得重大進展。關於這些簡帛資料發現的古文獻方面的意義,裘錫圭先生在日本的中國出土資料學會上所作的題為《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的演講中^[2],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提供了重要的佚書。

其二,提供了傳世古書在早期的實物形態,如《老子》、《論語》、《禮記》、《孫子》等。

其三,有助於認識古書的真偽,形成時代及源流。如兵書、《鶡冠子》、歸藏、醫學書、算術書等。

不過,在我看來,似乎還應該加上一條,即:

第四,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綜合性書籍的編撰過程。例如,《史記》在作為一部史書的同時,也具有雜家及百科全書的綜合性要素。因而,隨着出土資料的增加,似乎也給我們提供了《史記》這部書編撰方面的新知識。

在此,作為從歷史學角度考察古文獻研究的一個嘗試,想敘述一下簡牘、帛書的發現對《史記》研究有着什麼樣的貢獻^[3]。

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史記》注釋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候，參考了哪些書籍，可以根據《史記》引述的書名瞭解到^[4]。例如，瀧川龜太郎在《史記會注考證》（1932 - 1934 年。以下簡稱《會注考證》）的最後一章《史記總論》中，列有《史記資料》一節，其中除《漢書·司馬遷傳》論贊說到的《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以外，還列有以下書名：

詩、韓詩內外傳、書、古文尚書、書序、易、禮、周官（周禮）、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國語、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春秋雜說、董仲舒春秋災異記、論語、孝經、中庸、弟子籍、五帝德、帝系姓、夏小正、王制

諫記、五帝系諫、尚書集世、春秋曆譜牒、五德曆譜、禹本紀、山海經

刪通長短說、令甲、功令、列侯功籍

太公兵法、司馬法、管子、晏子春秋、孫子、吳子、魏公子兵法、老子、老萊子、墨子、李悝李克書、商君書、申子、莊子、孟子、鄒衍子、鄒奭子、淳于子、慎子、田駢子、接子、環淵子、劇子、尸子、長盧子、吁子、公孫固子、荀子、韓子、新語

離騷、宋玉·唐勒·景差賦、賈誼賦及論著、司馬相如賦

這些，大致是以六經（經書）、公文書、諸子以及文學方面的賦為序，開列出來的。司馬遷引用書籍的大略，由此可以窺見。

《史記》徵引的書名，在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中得到更詳細的論證。其後，張大可《論史記取材》（《史記研究》1985 年）也沿續金氏的考證，整理出以下 102 種：

1. 六經及其訓解書（23 種）
2. 諸子百家以及方技書（52 種）
3. 歷史地理以及漢室檔案（20 種）
4. 文學書（7 種）

此外，原富男的《補史記藝文志》（1980 年），整理了司馬遷以前各年代的書籍，並與現存的有關文獻加以比較。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祇是以書名考證為中心，至於這些內容是如何被編入《史記》之中，則缺乏足夠的關注。

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從另外一些方面對《史記》素材予以提示的成果。這蘊涵在歷代對於《史記》的注解之中。

在《史記》的注釋方面，南朝宋裴駟的《集解》、唐代司馬貞的《索隱》以及張守節的《正義》，以三家注而知名，宋代以後的版本合刊於一起。這些注釋通過各種版本的對照，對字句和含義進行考證。以《史記·晉世家》為例，三家注對司馬遷時代前後形成的以下書籍進行了核對。即：

〔集解〕左傳、世本、禮記、穀梁傳、公羊傳、韓詩外傳

[索隱]世本、春秋、左傳、國語、尚書

[正義]世本、國語、左傳

又如《史記·趙世家》，三家注引以對照的書籍有：

[集解]春秋、左傳、新序、韓詩外傳、戰國策、殷梁傳、淮南子

[索隱]穆天子傳、世本、左傳

[正義]山海經、穆天子傳、左傳、世本、司馬法

這些注釋，對文本加以說明，對年代、人名加以考證。如果從文章類似的方面來看，已經提示了與司馬遷所利用材料的關係。這樣比照諸書的注釋方法，一直被沿續下來。特別是梁玉繩《史記志疑》（清乾隆，1787年）與《會注考證》^[5]，進一步考訂年代、揭示出典。這裏試以《史記·趙世家》為例。

梁玉繩對與後世資料並存的先行文獻，予以指明。對於晉出公十一年的知伯事件，他指出：“《左傳》末篇無其事。史公或別有據。如《說苑》亦載之也。”推測依據了與《左傳》不同的《說苑》的有關素材。其參照的書籍如下：

山海經、大戴禮、穆天子傳、淮南子、國語、左傳、世本、說苑、新序、戰國策、呂氏春秋、荀子、韓詩外傳

瀧川《會注考證》在《趙世家》的開頭寫道：“愚按，此篇《左傳》、《國策》所不載甚多。史公別有所據。論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云云。豈他事亦有得之於馮者乎。”指出在《左傳》、《戰國策》之外，還有別的來源，如馮氏傳聞。顧頡剛在《司馬談作史》（1951年；《史林雜識》，1963年）中也有同樣的說明。然而，在傳聞之外，沒有一位研究者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作為《趙世家》的框架，《趙紀年》的存在及其性質。瀧川氏圍繞《左傳》、《戰國策》，作了詳細的注釋，比如說明晉文公（重耳）的事跡，“重耳以下，本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本僖二十四年《左傳》”；“本僖二十八年、昭（公）十三年《左傳》”。他所參照的書籍如下所示：

大戴禮、穆天子傳、國語、左傳、說苑、新序、荀子、韓詩外傳、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淮南子、孟子、商君書

這些發展了歷代的注釋，對司馬遷利用有關資料的出典加以考證。但是，在梁玉繩、瀧川等人的注釋中，並沒有分析到《史記》各篇的整體構成。那些作為典據的書籍，其形成時期的形態如何，它們與司馬遷所見版本相同抑或不同，與後世編撰的《戰國策》、《說苑》、《新序》又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也都是存而未決的問題。

在這些文獻研究方面，是王國維率先提出了利用出土資料的方法^[6]。王國維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1917年）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同年），就是通過與甲骨文拓本相比較，對《史記·殷本紀》所見商王系譜（王名）進行考證。此後，王國維還在《古史新證》（影印本，1935年；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闡述了利用地下資料與地上文獻相比照的二重證據法。

此外，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1917年；《觀堂集林》卷11，1929年），經過與敦煌漢簡的

比較，證實《史記索隱》曾加徵引的、《博物志》所載司馬遷經歷是可以信賴的。與《博物志》不同的是，他根據《史記正義》，提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的說法。這一考證也可以說是從敦煌漢簡的研究中派生而來的。郭沫若在《〈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歷史研究》1955年5期）中批判了司馬遷生年的這一考證，而支持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的說法。不過，郭沫若舉出敦煌漢簡中的十例以論證簿書的可靠性，也可以看作是利用簡牘資料進行司馬遷研究的組成部分。

在此之外，陳直的《史記新證》（1979）、《漢書新證》（1959）^[7]，是利用金文和出土資料進行新注釋的嘗試。雖說那時《史記新證》的份量不足，《漢書新證》先行出版，但經過1979年修訂，對西漢初期的考證，這兩部書就缺一不可了。如同《漢書新證》“初版自序”所說：

我之方法，以本文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其體例完全仿楊氏窺管……有百分之七十，取證於古物，其餘管見所及，一併附入。

我所引見之材料，主要在居延、敦煌兩木簡。次則銅器、漆器、陶器、封泥、漢印、貨幣、石刻各部分。

也就是說，陳直發展了楊樹達《漢書窺管》（中國科學出版社，1955年）用古物進行注釋的辦法，約七成是利用古物來考證。其主要利用的資料，是居延、敦煌漢簡以及銅器、漆器、封泥、貨幣、石刻等各方面。然而，其中多是對文字、名稱的考證，並沒有論及到《史記》各篇的編撰。這是由於出土資料的份量和內容有限所至。

1980年以後，與《史記》相關的簡牘、帛書的種類大量增加。依照西漢末王朝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的分類，這些出土資料大致可分成六藝（經書）、諸子、兵書、數術、方技（醫學等）^[8]。這些資料的一部分，與司馬遷所利用的資料相通，可以說是有關著述的原始資料。雖然它們並不屬於同一個系統的資料，卻可以用來推測《史記》先行資料的狀態，具有重大的意義。以下，把它們分為兩個方面試加說明，即（1）黃老思想、儒家、天官資料，（2）其他記事資料和紀年資料。

二. 黃老思想及儒家、天官資料

按《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馬談為官時，向唐都學習過天官的思想，向楊何學《易》，向黃子學習道論；有《六家要旨》傳世，其中對道家學派的評價尤高。還有，據說司馬談對司馬遷施行了儒家教育^[9]，並在委託兒子著書時強調要繼承孔子的《春秋》之義。從這些記載看，司馬談父子受道家、儒家和天官思想的影響很深。迄今，在傳世文獻中有關漢代初年黃老思想、儒家、天官的資料還不十分清楚。祇是在近年出土的資料中，包含有這方面的相關書籍。

1) 黃老思想和儒家書籍

儒家方面的資料以戰國早期的信陽楚墓出土的竹簡最早。其中，帶有“周公”的字樣，可以看作儒家資料。但殘缺過多，性質不够明確。其次是與黃老思想和儒家文獻相通的湖

北省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10]。其年代被定在戰國中期，包括有與《禮記·緇衣》相同的篇章，有儒家資料以及《老子》等道家著作。《六德》中，業已將“詩、書、禮、樂、易、春秋”并述。而在《語叢一》中，講述到《易》、《詩》、《春秋》的性質^[11]。如果以上這些被作為書籍得到認證的話，那麼到這個時期作為經書的原型當已形成。還有，在《窮達以時》中，有與《說苑》、《韓詩外傳》中類似的故事出現。其中說：“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是對伍子胥之死的評論。這不僅關係到《史記·伍子胥列傳》的內容，也提示我們《說苑》、《韓詩外傳》中有對先行資料的收錄。

在湖南省長沙市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文帝時期以前編寫的《周易》、《老子》等儒家、道家的資料^[12]。特別是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據說與《六家要旨》有關。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資料中有關重視天道思想以及關於存亡、興敗的觀點。《經法·論約》篇中有以下內容。這種探求興亡原理的視點與《太史公書》的構想是共通的：

故執道者之視於天下也，必審視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順有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恒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

安徽省的阜陽雙古堆漢簡中，有文帝時期的《周易》、《詩經》殘簡 300 枚與 170 枚。《史記》在對春秋以前的歷史敘述中，如同格言般地引述過《詩》、《書》、《易》等內容。這些出土資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阜陽漢簡中，據說還有一些《呂氏春秋》和《說苑》、《新序》的文字。這大概是後來劉向用來編輯的《說苑》、《新序》的一部分，是對戰國、秦漢時期故事的收錄。這些，成為《史記》素材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的竹簡。這座墓葬，據說是西漢末期中山王的墓，屬於司馬遷身後的資料。在《論語》之外，還有與《孔子家語》相類似的《儒家者言》^[13]。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贊》，司馬遷對孔門弟子的姓名，採用了《弟子職》與《論語》的資料，與傳世《論語》存在不同之處。相反，在《孔子家語》裏，有與《仲尼弟子列傳》相似的記載。以至於有人說《孔子家語》是後世偽造的。與定縣漢墓的資料相比較，可見《孔子家語》的一部分在西漢末期以前即已存在。因而作為一種可能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或許參考了先前書寫的、與《孔子家語》相類似的資料。這意味着，有必要注意司馬遷稍後時代的漢墓中出土的有關資料。

這樣，戰國、秦漢時代的墓葬中出土的資料，包含着與司馬談父子曾經學習過的學問相通的書籍，這也顯示着與《史記》的關連。

2) 天文、占卜資料

關於天文方面的資料，在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繪箱上，記有戰國初期“二十八宿”的名稱；在雲夢睡虎地秦簡中有一種叫《日書》的著作。工藤元男考察了《日書》的原理^[14]，還特別留意定縣漢簡《日書》、阜陽漢簡《日書》、江陵九店楚墓竹簡《日書》、江陵張家山漢簡《日書》、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以及江陵王家臺秦簡《日書》中的占卜術。在《日書》中，有二十八宿占的內容。而在阜陽漢簡《日書》中，據說還講述到祭祀、建築的吉凶。

近年來，從湖北省荊州市周家臺 30 號墓中，出土了秦代的曆譜，還有二十八宿占術和五行占的資料^[15]。尤其是在秦始皇 34 年的曆譜中，不僅有一年間的日曆，還記有官吏的任免、出差等。可以看成是一種紀年資料。

在馬王堆帛書中，有《五行占》、《天文氣象雜占》等天文占卜資料。《五星占》所述土星紀年中，記有秦始皇、漢高祖、孝惠帝、高皇后、文帝的紀年，並殘留有陳涉的國號“張楚”。這既是星占資料，也具有紀年資料的價值。

在這些天文占卜資料中，其實並不如《史記·天官書》所云，祇是為國家、王侯占卜的內容，而是有許多官吏占問個人的吉凶。戰國、秦漢時代《日書》與星占資料的發現，顯示到司馬遷時代，天文資料是書寫在簡帛之上。所以司馬談雖說從唐都、楊何、黃子那兒學習過天文、易經和道論，在口授以外大概也參考過一些書籍吧。

在 20 世紀出土的資料中，包含有黃老思想、儒家、天官方面的一些資料。這些資料與司馬談父子著述時，曾經給予影響的資料有關。不過，在黃老思想的資料中，儘管存在顯示歷史變化的記述，但有關《史記》框架的記載卻很少。而在儒家資料方面，在春秋時代以後，並未成為《史記》的主要部分。天文資料的一部分與《史記·天官書》的記述有關連，但對《天官書》以外的篇章而言，並不是主要資料。因而在《史記》中有必要利用更多的其他資料。其中，大量的素材是有關歷史典故、民間傳說、紀年和系譜資料。下面試對這些資料與《史記》的構成加以梳理。

三.《史記》的材料與編撰

1) 諸子和有關歷史典故

在許多民間故事中，如上所云，有很多和《呂氏春秋》、《說苑》、《新序》相關連的資料。而在諸子中，除了郭店楚簡《老子》與馬王堆帛書《老子》以外，還有山東省銀雀山竹簡《孫子》、《孫臏兵法》等有名的兵書。學者從軍事觀點作有考察^[16]。如果同出土資料相比較就會發現，對諸子文獻的部分引述，祇是在《史記·韓非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司馬相如列傳》等為數不多的篇章，並不是《史記》的主要素材。

從《史記》素材的角度看，不如說銀雀山竹簡《孫子》書後的有關民間故事更加重要。故事講叙孫武在吳王闔廬面前檢閱女兵，與《史記·孫子列傳》相同而內容更為詳細。因而可以說，有關係武的傳說，與《史記》的素材是相通的。

這樣的民間傳說在《史記》中屢有所見。《說苑》、《新序》、《戰國策》的其中某些部分與這些故事有許多共通之處。因而，由於簡帛的發現，對截至漢代的民間故事傳說的形式和內容，有必要再作考查。

2) 春秋資料和戰國故事

對春秋時代《國語》、《春秋左氏傳》，存在可以推測的資料。在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中，有關於晉、燕、韓、魏、魯、齊、衛、吳、宋、越等內容 16 章的記叙。這些雖然並不直接與

《春秋》、《國語》以及《史記》各篇相通，但表明在漢代以前有關春秋的故事，曾以多種形態廣為流傳^[17]。

關於戰國時期典故的書籍有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8]。這些資料中有 27 個故事。其中有六成是新發現的資料，剩下的四成則與《史記》、《戰國策》相通，其中有一篇部分地與《韓非子》相通。這與戰國故事的形態一起，對《史記》構成給與了重要啓示。

其一，西漢末年劉向編輯的《戰國策》，是司馬遷身後時代的資料。該書在宋代散佚，後又重新編集。這樣它的可信度就成了問題。現在可知其中的一部分，在西漢初期即已流傳。試將其語匯與《史記》相通諸篇比較，就可發現《戰國策》的結構與《戰國縱橫家書》更為相近，而《史記》則帶有編輯、改換文字的痕跡。這顯示《戰國策》中收錄的故事，保留着本來的面貌，而難以看作是從《史記》中轉引出來的。

其二，是使司馬遷在《史記》中利用典故的方法，變得具體而易於瞭解。其典型事例，就是《史記》的“穰侯列傳”和“韓世家”。這兩篇都是在戰國紀年與系譜資料之間，將與《戰國縱橫家書》相通的典故組合進來，從而描繪出國家和人物的命運^[19]。重要的是在《史記》中，這種形式的資料佔了相當大的比重。通過對《戰國縱橫家書》和《戰國策》的比較，可以考察到司馬遷對戰國故事取捨選擇的編輯方法。

其三，作為派生的問題，是得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韓非子》的成書^[20]。如果與戰國秦漢時代的出土資料相比較，就可以發現《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也是利用了各種思想和典故，編輯而成的書籍。今後對這些書籍的構成，會有更深入的分析。

與《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有着重大區別的是，司馬遷的著述利用大量的紀年資料，並對衆多資料進行編年整理。這就是《史記》之成為歷史典籍的原因。

3) 紀年資料和系譜

涉及到紀年的簡牘、帛書資料如下^[21]：首先，在戰國時代，戰國楚簡中發現了以事件為基礎的所謂“大事紀年”。在包山楚簡中有長達七年的楚紀年。不過，有關內容除開“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外，在《史記·楚世家》中並無記述。所以估計司馬遷並沒有參考楚紀年。

還有，在戰國與秦代，出土有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其中，53 枚竹簡分上下兩欄，記述了自秦昭王元年至始皇帝 30 年的紀年、有關戰役等事件以及墓主經歷、家族狀況。其中有關秦的事件，一部分與《史記·六國年表》一致。這就支持了司馬遷曾利用《秦記》的有關記載。但是《編年記》與《史記·趙世家》紀年也存在歧異，這就表明秦曆和趙曆有所不同。

阜陽漢簡《年表》殘缺不全。據說在一部簡書中，並列記述了各國系譜從而一覽可知；同時又被分為兩大部分。這正好關連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六國年表”的區分，成為研究司馬遷編撰的參考資料。

在秦漢時代，出土有曆譜和《日書》等。在這些資料中，如果記載有事件，同時也就成為紀年方面的資料。例如，湖南省沅陵虎溪山漢墓出土的《日書》，有“閭氏五生”、“閭氏五勝”的篇名，並且包含有楚漢戰爭中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記述^[22]：

陳勝反攻秦以十月壬申發西伐正當西方。

楚將軍項籍助趙。

同樣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也被認為是關係到紀年的資料。戰國秦漢時代的紀年資料，還為重新認識晉代所出汲冢書《竹書紀年》的性質，提供了線索。所有這些，對具體考察《史記》紀年資料的特性，都是有意義的。

4) 其他方面的資料

此外有趣的資料，是醫學方面的書籍。例如馬王堆帛書的醫學書籍中，有婦科、兒科方面的資料。這些醫學書籍的出土，使我們聯想到《史記·扁鵲列傳》的傳說^[23]。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扁鵲雲游天下時，常根據所在國的具體情形，變換醫學專業。這些傳說，是否屬實，還有待考證。但在漢代醫學書籍中有這類內容出現，顯示這些說法當有事實作為基礎。

還有，在《史記》方面，與漢代詔書、公文書相通的出土資料至今還沒有發現；而在《漢書》中，則存有類似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的記載。今後在類似公文書的內容方面，應該也能通過《史記》、《漢書》展開研究。

這樣，根據出土資料內容，並結合傳世文獻，考察《史記》的構成，就可以瞭解司馬遷是將收集到的書籍作為主要的素材。其他如故事、傳聞，到漢代也多已成書。這樣將紀年與記事資料相結合以敘述歷史的形式，可以說與《春秋左氏傳》的形式相近。在這種情形下，對《史記》的結構和編撰過程，必須分篇討論。這裏，簡單地作一展望^[24]。

首先，《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是以經書、傳說、系譜、紀年資料為中心編輯而成的。其中《周本紀》的後半部分採用了戰國故事。《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大量採用了紀年資料，並穿插一些碑文和記事資料。《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被認為是根據《楚漢春秋》編輯的。在漢代的《呂后本紀》、《孝文本紀》中，還使用了詔書和公文書資料。

《史記》十表中，大概利用了系譜、魯國的紀年資料、被稱為《秦紀》的紀年、楚王與項羽的楚紀年，此外還可能使用了漢代王侯的資料。《史記》八書中，講述制度沿革時利用了與經書相通的資料，此外還涉及到有關天文、曆法和卜筮、祭祀方面的資料。

《史記》諸世家中，在先祖的傳說方面，利用了與經書相通的資料；其他有關係譜、紀年資料、戰國故事、公文書等等都有被利用的跡象。此外，少許的紀年資料，加之傳說、系譜、諸子、戰國故事、公文書等等，合併構成了《史記》列傳。不過，《史記》列傳中還有記述周邊各民族社會和歷史的外國列傳，以及《日者列傳》、《貨殖列傳》，這些資料來源當比較複雜。

結 語

分析中國出土的簡帛資料，可以在其中發現一部分可以稱為《史記》先行資料的書籍。

利用這些資料，對流傳至今的古文獻性質進行再討論，可以看到這些文獻、包括司馬遷身後編撰的《戰國策》、《說苑》、《新序》的一部分，是對西漢初期以前記事資料的收錄。也就是說，簡帛的發現，為解明西漢以前的衆多資料的形成、流傳狀況提供了線索。

司馬遷利用衆多資料編撰《史記》。不過，司馬遷對先行資料的利用，並不是原樣照抄，而是根據自己的歷史觀有所取捨。這點是很重要的。他有選擇地利用了衆多資料：經書、諸子、紀年資料、系譜、曆譜、占書、戰國故事、公文，也有可信度較低的舊聞逸事，最終完成了《史記》。對於出土資料的分析，可以進一步明瞭《史記》的構造及其編寫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除了參考先行的書面資料外，同時也較多利用了旅行時的見聞，以及從漢代人中獲取的各種傳聞、故事^[25]。特別是在他 20 歲時的旅行，據說就是以著作為目的。不過，司馬遷所到之處，在《史記》正文中幾乎沒有記載，祇是在各篇篇尾的論贊中，記有一部分見聞。所以，司馬遷的旅行體驗對隨後著述的影響，祇限於寫作背景、編撰時的歷史評價、歷史地理等等，不能認為旅行取材就是《史記》的主要資料。司馬遷用以著述的首要資料，還是以當時書寫的衆多書籍為中心。因而我們應該重新關注簡帛的形式。

簡牘、帛書的發現，在深化古文獻形成以及歷史、思想的文獻研究的同時，也使諸如《史記》一類綜合性著作的構造變得明晰起來。今後，有必要在分析出土資料與古文獻關係的同時，對史記各篇的構造、以及司馬遷的歷史觀加以考察。

注 釋

- [1]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1925 年）中，依據古來的三大發現，即：1、漢代孔子宅壁中的書籍，2、西晉時的汲冢書，3、殷墟甲骨文以及敦煌、西域的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的寫本書卷等，指出各時代新學問興起的情形。有關發現，還請參看大庭脩：《木簡學入門》（講談社，1984 年）與《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簡》概說（同朋舍出版，1990 年），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的研究》序章（同朋舍出版，1989 年），駢宇騫、段吉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1999 年）。
- [2] 裘錫圭：《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中國出土資料研究》3 號，1999 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 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
- [3] 拙著：《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第一編第一章“《史記》與中國出土書籍”（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年）中，敘述了以戰國時期為中心的出土資料與《史記》的關係。後來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本稿是這一方面的補充。
- [4]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總論·史記資材”（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1934 年）；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張大可：《論史記取材》（《史記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原富男：《補史記藝文志》（春秋社，1980 年）等。
- [5] 梁玉繩：《史記志疑》（清乾隆，1787 年；中華書局，1981 年）；瀧川前揭：《史記會注考證》。
- [6]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1917 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同年），後收入《觀堂集林》卷 9。在《史記所謂古文說》（1916 年；《觀堂集林》卷 7）、《史篇篇疏證序》（1916 年；《觀堂集林》卷 5）中，也有相關的考證。
- [7] 陳直：《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漢書新證》（1959 年；第二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
- [8] 例如在李學勤：《馬王堆帛書與〈鶡冠子〉》（1983；《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中，根據《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對帛書進行了說明。
- [9] 佐藤武敏：《司馬談和歷史》（《司馬遷研究》，汲古書院，1997 年）。
- [10]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 年）。

- [11]《漢書·藝文志》中，把六藝略書籍分爲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易、書、詩、禮、樂、春秋，被視爲戰國時代以來的經典。郭店楚簡《六德》云：“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在《語叢一》中，也講到《易》、《詩》、《春秋》的性質。
- [12]參看淺野裕一：《黃老之道的形成與展開》（創文社，1992年）。
- [13]定縣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儒家者言〉釋文》（以上，《文物》，1981年8期）、《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
- [14]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第四章“睡虎地秦簡‘日書’基礎的研究”（創文社，1998年）。
- [15]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
- [16]湯淺邦弘：《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的研究》（研文出版，1999年）。
- [17]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吳榮曾：《讀帛書本〈春秋事語〉》（《文物》，1988年2期）。
- [18]前揭《馬王堆漢墓帛書（叁）》；佐藤武敏監脩：《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朋友書店，1993年）；拙稿：《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結構與性質》（前揭《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等。
- [19]拙稿：《〈史記·穰侯列傳〉考察》（《東方學》71輯，1986年）；《〈史記·韓世家〉的史料考察》（前揭《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
- [20]湯淺邦弘：《復活的戰國故事——〈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資料介紹》（《中國圖書》6～5，1994年）。
- [21]關於紀年資料，參看拙稿：《〈史記〉戰國紀年的再研究》（前揭《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拙稿：《〈史記〉“項羽本紀”與“秦楚之際月表”》（《東洋史研究》54～2，1995年）等。
- [22]《虎溪山1號漢墓後期發掘整理又獲成果》（《中國文物報》，1999年10月17日）。
- [2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山田慶兒：《扁鵲傳說》（《夜鳴鳥》，岩波書店，1990年）。
- [24]其概略，參照前揭《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拙著：《司馬遷及其時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
- [25]拙稿：《司馬遷的旅行與取材》（《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8，2000年）；拙稿：《司馬遷的取材與秦國人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館編：《第五屆秦俑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揭《司馬遷及其時代》等。

韓國出土木簡的形制及其內容

◎ 韓國慶北大學校

◎ 尹在碩

一

衆所周知,韓國和中國不僅在地理上緊密相連,而且在歷史文化方面,也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特別是韓半島初期國家從古朝鮮至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對自殷周以後至隋唐各王朝的中國先進文化採取引進吸收,進而發展成爲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在此過程中,特別令人注目的是漢字、儒學、佛教等從中國傳入韓半島,其中漢字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傳入,竟成爲此後韓半島國家政府乃至民間日常交流的重要手段。^[1]

但是,爲了補充與韓國古代相關聯的現存相當簡略的漢文文獻資料,來研究當時的歷史,韓國的古代史學界,從1975年即開始正式發掘出木簡史料,爲搜求新的資料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到現在爲止,約有140餘枚木簡得以面世,有力地推動了韓國古代史的研究。

二

在韓國發現了同中國戰國時代墳墓中出土的相同類型的銅鏃,而這種銅鏃其形製與劍相類似(長20釐米,寬2.5釐米),但祇是尖端兩面有刃,是製作木簡或竹簡的主要工具(夾刻刀),^[2]這是木簡在韓國普遍使用的主要證據之一。另外,事實上韓國發現木簡類史料,起自於1931年在平安南道大同郡南串面南井里樂浪東漢(第116號墓:彩篋塚)中發掘的1枚長23.7釐米,寬7.2釐米,厚0.7釐米(簡文:“嫌三匹,故吏朝鮮丞田肱謹遣吏再拜奉祭”)木簡。^[3]雖然此木簡爲東漢官吏所作,但此可以成爲說明從公元1世紀開始,木簡也在

韓半島使用的絕好資料。1975 年以後開始，記載韓半島史事的 51 枚木簡被首次發掘於慶尚北道慶州市雁鴨池；此後，如附表中所列，公元 6—8 世紀，即相當於韓國古代新羅及百濟時代的遺址中，約 140 餘枚木簡被發掘出土。如此數量的木簡，雖然和在中國（約 20 萬枚）、日本（約 20 萬枚）出土的木簡數量難能相比，但以後更多數量的木簡在韓國陸續出土的可能性，應當是不容置疑的。

韓國木簡的形製、書體與中國出土木簡十分相似，即主要以長方形為木簡的基本的形製。祇是中國木簡主要依據漢尺 1 尺（23 釐米）左右的製作原則，韓國的木簡以最長 37.5 釐米為首，有 30 釐米以上的木簡，短的 12—13 釐米木簡也多有出土；其寬度一般為 4 釐米以上，也有 0.2 釐米，呈多樣化形態。就是說，韓國製作的木簡沒有嚴格的規範，看來是根據木簡的用途隨意製作使用的結果。

一方面，韓國木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相當數量的木簡上、下兩端或者下端有三角形缺口或者穿孔。這說明用繩子連接木簡，以及為了把木簡插在特定的官署內，或者插在包裹的情況，此種形態和中國、日本的木簡或者付札相同。然而，特別的一點是，比較多的韓國木簡下端出現三角形缺口的事實（如在城山山城發現的 27 枚木簡中，有 16 枚簡下端有三角形缺口）；這種形態雖然在中國尼雅遺址出土的晉簡（木簡）中也有一部分出現，但其長不過 7.7—8.2 釐米，寬 1.2—1.1 釐米，兩者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同時這種形態的簡牘在中國也不具備普遍性。再者，在日本約 20 萬枚的木簡中，僅僅有 5 枚下端有三角形缺口，這種木簡主要用途是插在包裹的一種荷札，而記載內容是說明包裹內物品的名稱及數量、發送地、到達的地點等等的。因而這些日本木簡的形製可以為探明韓國出土一些木簡的用途提供幫助。另外，韓國木簡上的文字書體與中國的竹木簡簡文有相當多的相似點。就是說，韓國木簡都是經過修整松木等材木片段後，在其單面或者兩面（一部分木簡為三面或六面）上，用墨書寫間有隸書體、楷書體、草書體等書體文字。其中對於城山山城木簡的書體，中國簡牘學專家謝桂華先生認為其和魏晉以後流行的楷體草書（行草）相類似。從此可以看出魏晉時代以後，韓國和中國文化交流的活躍和興盛。

另一方面，韓國出土木簡中殘簡多，而且墨痕不清楚，釋讀相當不容易。所以把握其內容及用途困難點不少。可是，經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到現在為止，已經探明所發現木簡的內容分別為：官員的勤務情況，天文氣象關聯的內容，山城的整備和補修、築造山城徭役人員名簿，以及山城築造必要的軍糧，倉庫關聯的內容，行政單位和水田的開墾情況等，被評價為研究韓國古代國家新羅、百濟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重要的資料。其中特別注目的一點是，雁鴨池出土木簡中記有“天寶十載”（751），“寶應四載”（765）等唐王朝玄宗和肅宗的年號。據《舊唐書》卷 9《玄宗本紀下》“（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以及同書卷 10《肅宗本紀》“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的記載，唐王朝從天寶三年（744）起到乾元元年（758），曾經以“載”代替此前用“年”的紀年方法。可是實質上唐朝沒有“寶應四載”的年號，因寶應元年（762）4 月代宗代替肅宗即位而於 763 年 7 月改元“廣德”，且於 765 年正月又改元永泰，所

以雁鴨池木簡的“寶應四載”應當改寫為“永泰元年”。這種錯誤的主要原因，決不是由於單純修記年號的結果，由於兩國外交關係暫時斷絕，而新羅政府不知道唐朝政治變化的情況。從而可以說，雁鴨池木簡的一些內容可證實當時新羅和唐朝之間政治方面維持十分緊密的關係，而且反映斷斷續續的兩國外交關係，可以為兩國外交關係史的研究提供幫助。

除此以外，1999年韓、中、日三國的學者同聚一堂，以城山山城出土木簡的內容及用途為中心，展開了激烈的學術論爭。朱甫墩、金昌浩等大部分韓國學者認為，城山山城木簡的內容，是由築造山城時動員的地方民的出身地名、人名、地方官名等構成的名籍類或者身份證明書。日本的李成市、平川南等先生主要根據木簡的形態，主張木簡的內容為新羅政府向地方民徵發物資（穀物、鹽），運送城山山城物資插入的荷札（記錄物品的名稱及貢進物品的地名、人名、地方官名等）。^[4]中國唯一出席會議的謝桂華先生認為：如果城山山城木簡內容為名籍簿類性質的話，可以看出其為和中國睡虎地秦簡中的“名事里”及漢簡中的“名縣爵里”簡內容相類似的名楊或者人名楊的形態。但是，謝先生為了使得韓、日學者們的主張更具說服力，認為在還未對簡文中的“稗”、“稗石”等實體進行更緻密必要的論證的前提下，對於和簡文相關問題作決定性的結論是相當困難的。^[5]

另外，中國發掘的主要為戰國至魏晉時代的竹木簡。到現在為止，韓國出土的木簡都是發掘6-8世紀新羅和百濟時代遺址獲得的。當時的行政關係公文書和重要的民政文書主要為紙墨書，因為不僅木簡製作簡單，管理起來比較容易，而且可以多次重複使用節省的原因，其用木簡記錄不太重要的文件的緣由即在於此。這種現象在日本也同樣出現。從日本發現的簡都是7-9世紀此一點，可以看出韓國和日本曾經歷持續相當長時間的紙、木併用時期。與此同時，考察韓、日兩國木簡的形製、記錄樣式、記載內容等的時候，其和中國的木簡不僅樣式相似，而且從整體方面，其共通點亦隨處可見。韓、中、日三國所具有的地理鄰近的自然環境，而且三國處於以漢字作為同一媒介的語言手段，進而形成同質的文化形態，所以，韓、中、日木簡的製作和使用，經歷了相互影響交流的過程。從現在出土的木簡的製作過程看，秦漢時期及魏晉時期中國製作的木簡，直接影響了6-8世紀的韓國木簡的製作；同時，推定韓國的木簡再對於日本7-9世紀製作的木簡施加了相當的影響。

最後，應該提出的是，在韓國最初發現的典籍類木簡。2000年4月至5月釜山大學校博物館在慶尚南道金海市鳳凰洞居住地區的6-8世紀低濕地遺址發掘，發現長20.9釐米而四面（一面寬1.5-1.9釐米）都有墨書的一枝木簡。^[6]在木簡的三面書寫的字跡比較清晰，另有一面的字跡很不清楚而不能識讀，文字總數約57字，其中可以識讀的字數42字，記載《論語·公冶長》的一部分，如下：“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1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2面）“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3面）。雖然字數僅僅57字，和在中國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發現的竹簡《論語》^[7]難能相比，但在韓國這一枝木簡的價值仍然是難於估量的。大家知道，《論語》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特別是三國時代初期儒家思想從中國傳入韓半島以來，它無疑在韓國的政治、思想方面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從

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枝木簡說明，在 6-8 世紀韓半島儒學傳世而已普遍的情況，以及韓中兩國文化交流。而且，我認為，它為 6-8 世紀韓國和中國傳世《論語》本子的內容及版本的比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我們希望中國的專家學者對它進行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可以預測，中國和日本，當然還有韓國，在以後的歲月裏陸續出土更多木簡的可能性仍很大。這不僅對韓國的古代史研究，而且對研究形成漢字文化圈的韓、中、日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史方面提供相當多的幫助。同時，在中國興起的簡牘學研究，也喚起了韓、日兩國研究簡牘的風氣，並可能以此為契機，起到聯繫韓、中、日三國學者的歷史研究重要的橋樑作用。期待在不久的將來，簡牘學成長為韓、中、日三國共同的學問，三國學者之間協作研究，共同發展。（附表及木簡的釋文見下頁）

三

《慶州雁鴨池出土木簡釋文》^[8]

1. 洗宅 呈二興□四像(?) 一頭(以下 5 字未詳) 木(等?)松(?)
十一月廿七日典(其?)壹 恩林
2. 寓(?)洗宅寢(?) 寫(?)洗宅□
3. 天寶十載□十一月 韓舍
4. 寶應四載 策事 壹貳□□□
5. 庚子年五月十六日 原(?)□□史武(武?)
6. 甲辰年夏(?)五月(?)
7. 乙巳年正月十九日□日宋(?)
8. 甲寅年壹(?)八九月(以下 4 字未詳)
9. □(丙?)午年四月 □火魚□史三□
10. □□年二月八日□永造(?)
11. 二月□日作 階(?)盤
12. 三月廿一日(以下 5 字未詳)
13. 十一月廿一日□□ 單□史□□
14. 策(?)事門恩□□金 策事門果(?)□金
15. 華(?)抱相耕(?)慰璧慘(?)琴現(?)榮(?)
16. 立(?)迷急得(?) 膽(?)高城□武(武)
17. □席長十尺細(?)次我三件法次(?)北七□□□
18. □隅宮北門守迷□□四當□□□□□□
19. 是錯(?)處道□歲之 我飛□□者家宣宮處宮 □□□門宮(?)電(?)□

20. 重予木(等?)處
21. 杓(?)矩山徒
22. 僧門金□□ 金金□□□
23. 門□□寫(?)若赴 木(等?)水□使用次省寸(?)□
24. □二百(三日?)□□□□百
25. 二藥十
26. □□宋(?)第(?)二汁□□ (5字未詳)洗(?)宅(?)□
27. 九十二 □買
28. □公(?)□□歲(?) 十三千(?)
29. □坪棒 百廿二□ 庠
30. 丙
31. □(丁?)四□□(作?)

《城山山城出土木簡釋文》^[9]

1. 仇利伐 上乡者村波婁
2. △(川? 村?)余△利
3. 知(?)上十(干?)走(支?)
4. 甘文本波居(?)△(村?)旦利村伊竹伊(便?)
5. 王松烏(烏?)多伊伐支△(上下?)△(及)支
6. 上吟乃村居利支稗
7. 烏(烏?)欣彌村人(卜?)兮稗石
8. 仇伐于(干)好△村卑尸(卩?)稗石
9. 及伐城△乃巴稗
10. △△△△[支稗]
11. 正面: 仇利伐 上乡者村
背面: 乞利
12. 竹尸△乎(牟?)√于(干?)支稗(稗)一
13. 前谷村阿足只△
14. 正面: △(火?)△△
背面: △(仁?)△△(月?)
15. 正面: 甘文城下幾甘文本波王(?)△
背面: 本(?)△村利安△
16. 言斯(?)只元(一石?)

17. 陳城巴(己?)兮支稗
18. 正面: 仇仍支裨(稗)△(麥?)
背面: △△△△△(村?)利△(稗?)
19. △(夷?)△(財?)支△(沙?)刑余利△(知?)
20. △家村△△△
21. 大村伊息知(智?)一伐
22. 仇利伐 仇隄(弛?)余一伐
余△(?)利△(只?)一伐
23. 仇利伐 △德知一伐 奴人△(鹽?)
24. 正面: 屈仇△(伋?)△(兄?)△(村?)△△
背面: 裨(稗)石

《二聖山城出土戊辰年木簡釋文》^[10]

- 正面: 戊辰年正月十二日朋南漢城道使(缺失)
側面: 須城道使村主前(死則?)南漢城△(孤?)△(赤?)(缺失)
背面: (城?)△(滿?)△蒲(黃土?)△△△△△△(缺失)

《扶餘宮南池出土木簡釋文》^[11]

- 正面: 歸人中口四 下口二 邁羅城法利源水田五形
西卩 後巷 已 達已斯卩 依活△(率?)△(前) △(後?) △(卩?)
背面: 西卩 中卩△(夷?)

《慶州皇南洞 376 遺跡出土木簡釋文》^[12]

- 正面: 五月廿六日掠食△△之下掠食有△
背面: 仲掠食有廿二石

《慶州月城垓字出土木簡釋文》^[13]

1. 口禾差作之
2. 問干板卅五
3. 四月一日 典大等 教事

4. 使内

牒垂賜教在之後事者命盡
經中入用思買白雖紙一二斤
大鳥女郎足下萬引白了

《金海低濕地出土〈論語〉木簡釋文》^[14]

- 1 面：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2 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3 面：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4 面：(不明)

(附表：韓國出土木簡情況)

| 出土地點 | 出土時期(年) | 數量(枝) | 形製(釐米) | 書體 | 材質 | 製作時期 | 內容及用途 |
|-------------------|---------|-------|--|--|----|--|---|
| 慶尚北道慶州市的雁鴨池 | 1975 | 51 | 長 37.5(最長) - 4(最短),大部分木簡長 9 - 23,寬 4.5 - 0.6;厚 3 - 0.2,大部分 0.5 - 1.5。 | 大部分是隸書體的墨書,一部分簡係草書體的墨書。 | 不明 | 紙木併用時代的木簡,上起新羅景德王 10 年(751)下止新羅惠恭王 9 年(774)。簡文中有“天寶”、“寶曆”、“貞觀”的唐朝年號。 | 該木簡不是行政文書簡,是記載附屬於臨海殿的宮中官衙官員工作情況的票札,也有記載天文氣象的木簡。 |
| | | | 基本形製係長方形,大部分木簡係兩面簡,一部分係三面簡,也有圓筒形的六面簡。 | 可以判讀的木簡有 30 餘枝,不能判讀的木簡 15 枝左右,沒有墨痕的木簡 4 枝。 | | | |
| | | | 大部分木簡上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一部分木簡上下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而一枝簡上端鑿眼穿孔,都是為了繫繩用的。 | | | | |
| 全羅北道益山市的彌勒寺址 | 1980 | 2 | 長約 17.5,寬約 5 | 四面有墨痕,其他不明。 | 不明 | 百濟王朝時期。 | 不明 |
| 忠清南道扶餘郡官北里的百濟王宮遺址 | 1983 | 2 | 1 枝簡(殘簡)長 17.2,寬 4.1,厚 0.5 - 0.55,其上端鑿眼穿孔(直徑 0.3)。另外 1 枝簡長 20.4,寬 4.4,厚 1,其上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 | 1 枝簡殘留一些墨痕,而簡文不能釋讀,另外 1 枝簡不呈墨痕,書體不明 | 不明 | 百濟王朝時期。 | 不明 |

| | | | | | | | |
|-------------------------------|---|------|---|---|-----------------------|--|--|
| 慶尚北道慶州市的月城亥字 | 1984—1985 | 約 30 | 第1次發掘的1枝簡長14.8,寬2.6,其下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第2次發掘的約30枝簡中1枝簡下端刻有三角形缺口,但木簡大小還未發表。 | 不明 | 不明 | 7世紀前半的新羅王朝時期。 | 一部分的新羅王朝都城制度及官府買入紙物的內容。 |
| 京畿道河南市二聖山城的貯水池 | 1990—1991 | 21 | 長34.8(最長)–2.1(最短),寬4.6–1.0,厚1.4–0.2,其中“戊辰年木簡”,長15,寬1–4.6,厚0.5–2.9,但沒有三角形缺口及穿孔。 長方形木簡5枝,三角形4枝,圓形1枝,正方形7枝,橢圓形4枝。 有些木簡上下端刻有三角形缺口及下端鑿眼穿孔。 | 有墨痕的木簡共6枝,其中可以釋讀的木簡祇有1枝(“戊辰年木簡”)。 “戊辰年木簡”是以書寫三面的長方形木簡,其書體屬於夾雜草書的楷書體墨書。 | 不明 | 7世紀初新羅王朝時期。 “戊辰年木簡”屬於新羅王治世時期。 | “戊辰年木簡”係命令整備而補修南漢城(二聖山城)的下達文件。 |
| 慶尚南道咸安郡城山山城的貯水池 | 1992—1994 | 27 | 長23.7(最長)–5.7(最短)而大部分15–22,寬4.4–1.6,厚1.0–0.3,而大部分0.5–0.9。 基本形製係長方形,19枝簡係單面簡,5枝簡係兩面簡。 16枝簡下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5枝簡下端鑿眼穿孔。有文字的24枝簡中下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係14枝,下端有穿孔係4枝。 | 墨書,以行書為基本書體夾雜有些草書體,一些字好像李柏文書的該國木簡書體與中的楷體草書(行草)接近。 可以判讀的木簡係24枝。 | 松木(24枝),栗木(2枝),不明(1枝) | 6世紀中後半(560年代或者570年代,張從540年至561年間裏製作的)。 | 大部分韓國學者主張,該木簡屬於新羅王朝徵發地方民而動員赴山城築造人的名籍(人名簿)。大部分日本學者主張,該木簡是插於軍需物資(穀物,鹽)包箱的荷札(木簡)。 |
| 慶尚北道慶州市皇南洞376遺跡(製作玻璃及銅器的作坊遺址) | 1994 | 2 | 下部缺失的1枝簡長17.5,寬2,厚0.6,另外1枝係三分斷簡。 | 隸書體 | 不明 | 8世紀前半的新羅王朝時期。 | 有關倉庫的文件。 |
| 忠清南道扶餘宮南池 | 1995 | 2 | 兩枝中有1枝係殘簡,另外1枝長35,寬4.5,厚1,上端鑿眼穿孔(直徑0.4)。 | 混合楷書、行書、草書的墨書。書寫於正背的兩面,正面兩行32字而背面單行5字。 | 松木 | 6世紀中後半百濟王朝時期。 | 木簡主要內容包含關於6世紀百濟王朝的一些行政單位與人名,地名以及開墾水田的情況。 |
| 忠清南道扶餘郡雙北里的水路 | 1998 | 3 | 兩枝簡都已殘斷,1枝簡保存較完好,可是木簡大小不明,但木簡上端左右側刻有三角形缺口。 | 簡文保存很差。 | 不明 | 7世紀中期的百濟王朝時期。 | 不明 |
| 慶尚南道金海市鳳凰洞的低濕地 | 2000 | 1 | 將一根木頭削成四面的柱狀木簡(木方),長20.9釐米,一面寬1.5–1.9釐米,四面有墨書字跡。 | 總計約有57字,其中可以識讀的字數42字。 | | 6–8世紀的新羅王朝時期。 | 《論語·公冶長》 |
| 其他,於2000年發掘的木簡 | 京畿道河南市的二聖山城出土的木簡6枝。 忠清南道扶餘郡陵山里出土的木簡6枝。 | | 木簡的詳細情況還未公佈。 | | | | |

注 釋

- [1]參看黃渭周：《漢文字の受用時期と初期 定着過程(1)》，《漢文教育研究》，第10號，1996。
- [2]參看西谷正：《朝鮮發見の銅簡について》，《古代學研究》，第46號，1966。
- [3]參看駒井和愛：《樂浪——漢文化の殘像》，中央公論社，1973，東京。
- [4]參看韓國古代史學會編：《기획논문：咸安 城山山城出土木簡》，《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
- [5]謝桂華：《中國에서出土된魏晉代 以後의漢文簡紙文書와城山山城 出土 木簡》，《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
- [6]參看釜山大學校博物館：《金海鳳凰洞 408-2.10.11 番地遺跡發掘調查現場說明會資料》，2001年7月。
- [7]參看定縣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縣 40 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8；李學勤：《定縣八角廊漢簡簡書小議》，《簡帛研究》第1輯，1993。
- [8]李基東：《雁鴨池에서出土된新羅木簡에 대하여》，《慶北史學》，1輯，1979。
- [9]參看金昌鎬：《咸安 城山山城出土木簡에 대하여》，《咸安城山山城》，1998；朱甫曦：《咸安城山山城出土木簡의性格》，《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李成市：《韓國木簡研究의現況과咸安城山山城出土의木簡》《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
- [10]參看漢陽大學校：《二聖山城——2次發掘報告書》，1991；李道學：《二聖山城出土木簡의檢討》《韓國上古史學報》，12號，1993。
- [11]參看崔孟植、金容民：《扶餘宮南池內部 發掘調查概報——百濟木簡出土意義와成果》，《韓國上古史學報》，20號，1995。
- [12]參看李成市：《韓國木簡연구의 現況과，咸安城山山城출토의木簡》，《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
- [13]參看李成市：《韓國木簡研究의 現況과 咸安城山山城出土의 木簡》，《韓國古代史研究》，19輯，2000。
- [14]參看釜山大學校博物館：《金海鳳凰洞 408-2.10.11 番地遺跡發掘調查現場說明會資料》，2001年7月。

《額濟納漢簡》即將出版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

◎白音查干 特日格樂

內蒙古額濟納地區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又出土了一批居延漢簡，這是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七十年代該地區大規模出土居延漢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這批漢簡的整理成果《額濟納漢簡》一書，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有幸參加這批居延漢簡的整理，這裏就其發掘和整理的情況扼要地加以介紹，讓讀者先睹為快。

今天的內蒙古額濟納地區是歷史上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在地，該地區因連續出土了首批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而舉世聞名。居延漢簡以其出土簡數眾多，內涵豐富，學術價值高的特有魅力，一直受到眾多中外學者的傾心關注。居延漢簡的出土不僅給秦漢史注入了空前活力，而且開創了簡帛學的研究。

1930年4月，由中瑞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福克·貝格曼在我國額濟納河兩岸和黑城南州井塞，首次發現居延漢簡一萬餘枚。由於戰亂，這批漢簡輾轉世界各地後，現存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發現這批漢簡到今天的數十年中，國內外出版了很多有重要價值的論著，據不完全統計有關釋文、論文、專著多達數千種，史學研究和簡帛研究皆取得重大成就，其中勞幹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和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都是研究這批漢簡的基本論著。

1973年夏季，由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組成的居延考古隊在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新發現居延漢簡近兩萬枚，現存於甘肅省博物館。居延新簡的發現，無論在數量還是在簡文內容的豐富程度上都是空前的，與三十年代相比，這次發掘範圍廣，按科學要求進行，在文物出土地點層位、斷代、編綴等方面均取得了系統資料。新簡最大的特點為出土大量的簡冊，而且都是當時的檔案文書。經過幾十年的整理和研究，出版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著作。其中《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文物出版社）為研究這批漢簡的基本論著。而且，肩水金關出土的約一萬

二千枚簡牘的圖版和釋文亦已整理完畢和定稿。尤其通過居延新簡的整理和研究，漢簡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學術影響繼續擴大，簡帛研究和秦漢史研究得到空前的發展。

1999、2000、2002 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三次深入居延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共獲漢簡五百餘枚，現存於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這批漢簡在數量上雖然僅是首批居延漢簡的二十分之一，居延新簡的四十分之一，但這批漢簡的意義重大。不僅再次證明額濟納地區是居延漢簡埋藏的豐富寶庫，特別是結束了至今為止內蒙古自治區未發現和保存有一枚居延漢簡的歷史，為內蒙今後大規模發掘居延漢簡揭開了序幕。這批漢簡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兩漢與王莽時期的法律、行政文書傳遞、邊郡制度、屯戍活動、漢匈關係、數術曆法、醫方佚籍等各方面的內容。這批漢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應屬出土的兩部完整冊書，其中一部為王莽時期的邊郡土吏的行政規章制度；另一部為王莽時期一道赦令的逐級下達情況與當時分封匈奴單于史實之有關記錄，這兩部冊書，或補史籍之闕，或糾史籍之謬誤，彌足珍貴。由於這批居延漢簡，絕大多數出土於漢代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下屬第七隧、第九隧、第十一隧、第十二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等以序數命名的烽隧遺址，均屬於額濟納地區，故將這批居延漢簡整理成果的著作命名為《額濟納漢簡》。

為了使這批珍貴的居延漢簡早日公諸於世，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有關考古、簡帛、秦漢史專家於 2002 年秋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廟子溝考古工作站共同整理了這批漢簡。整理期間即與出版社商定出版事宜，並決定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該書。《額濟納漢簡》由漢簡圖版、發掘報告、漢簡釋文以及相關的研究文章構成。漢簡圖版全部為彩版，由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資深攝影師拍攝；發掘報告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撰寫；漢簡釋文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四個專家共同釋讀整理，研究文章由參與整理的專家教授撰寫，分別就這批漢簡的考古發掘，內容概述、學術價值等進行初步探討。目前《額濟納漢簡》一書的圖版和釋文均已編輯完畢和定稿，已交付出版社開始印製，相信讀者將很快見到這部書。《額濟納漢簡》從 1999 年首批出土到完成整理工作僅有短短的 4 年時間，這也是國內整理出版最快的一批漢簡。

雖然《額濟納漢簡》在數量上遠不及前兩批居延漢簡，但是兩者價值相侔，尤其對內蒙古來講，《額濟納漢簡》是他們自行發掘、整理、出版的首批漢簡，這無疑將加快內蒙古地區居延漢簡的發掘、整理工作進程，並對整個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也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銀雀山漢簡出土 30 周年紀念活動掠影

◎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

◎ 郭文鐸

1972 年 4 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的出土震驚世界。今年迎來 30 周年，這是一次創新發展的機遇。

機遇不常有，稍縱即逝。抓住了，倍加受益；放過了，終成遺憾。沂蒙人抓住這一機遇，自兩年前開始造勢宣傳，向市長直書建議，今年決定由市政府主辦紀念活動。這次活動非同往常，不是幾天時間熱熱鬧鬧，水過地皮濕，而是全年時間扎扎實實，搞點建設；不是單純召開一次會議造造聲勢，而是立足辦幾件有意義的實事。

一、回眸 30 年，重溫銀雀山漢簡之所以轟動海內外的因由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之所以轟動海內外，不單單是因數量之多，而最重要的是因內容價值之高。

其內容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佚書或首次發現的最早古籍：（一）《孫臏兵法》；（二）《孫子兵法》佚篇；（三）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四）見於《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下的《地典》；（五）唐勒、宋玉論馭賦（疑為宋玉賦佚篇）；（六）《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絕大部分；（七）論政和論兵的文章多篇；（八）有關陰陽、時令、占候之書；（九）相狗、作醬法等雜書。一類為現在還有傳本的古籍：（一）《孫子》；（二）《尉繚子》；（三）《六韜》；（四）《晏子》等。

出土的竹簡雖有數，但價值無量。如：（一）《孫子兵法》與失傳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同墓出土，結束了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千古論爭。《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孫武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司馬遷在這裏清楚講明，孫武、孫臏確有其人，並各有兵法傳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有《吳孫子》（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的記載。但《隋書·經籍志》卻不見著錄。因而後來有人提出異議，產生爭論。有的認為（較為流行的看法），先秦著作往往不出於一人之手，現存

《孫子兵法》源於孫武，完成於孫臏，是春秋末期到戰國中期戰爭經驗的總結，並不祇是一個人的著作；有的認為，《孫子兵法》並非孫武的著作，而是後人的偽託；有的認為，不僅《孫子兵法》是後人偽託，就連孫武這個人在歷史上是否存在，也值得懷疑；有的認為，現存《孫子兵法》是曹操根據前人的著作重新編定的，經過曹操的刪削和補充，等等。《孫臏兵法》的重現光華與《孫子兵法》同時出土，驅散了籠罩在孫子頭上的千古謎團，證實了孫武、孫臏實為兩個人，各有兵書傳世。證實了司馬遷《史記》提出的觀點是正確的。（二）出土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是迄今發現的我國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曆書。較《流沙墜簡》著錄的漢元康三年（前 61）曆譜，早 70 餘年。這份曆譜對研究古代曆法頗有價值。還可幫助我們校正《資治通鑑目錄》等文獻典籍的遺誤。（三）《尉繚子》和《六韜》這兩部古代兵書，過去也有人認為是後人的偽託，連同今本《晏子》，認為不是先秦古籍。銀雀山西漢前期的墓葬中發現了這些兵書的竹簡，可見當時已經傳世，證明了原先看法的錯誤。（四）《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田法》、《市法》、《庫法》等篇直接記述當時土地、市廛、庫藏的法制。由於典籍中有關這些方面的記載很少，所以，這些篇儘管都有殘缺，也仍是極其珍貴的史料。《田法》篇談到土地分配制度和賦稅制度，價值尤其大。（五）十三篇中的《兵令》、《守法》、《守令》、《王兵》篇，除了在文字上可以糾正今本《尉繚子》、《墨子》、《管子》有關篇的一些錯誤外，還為我們研究這些書的源流和沿革提供了重要線索。（六）秦漢正是我國文字由篆書轉變為隸書的過渡時期。簡文雖為隸書，但仍保留了篆書風格。這批竹簡對研究我國文字發展與書法藝術，研究西漢早期隸書，提供了重要資料，澄清了歷來關於西漢書體的種種猜測，填補了西漢在書法史上的空白。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科學家錢偉長視察後題詞指出的，這裏“展示我國文字發展的過程，是歷史的寶庫”。（七）秦漢以前的古籍這樣大量地從地下發掘出來，在西晉太康二年（281）汲冢出土《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書後的近 1700 年間，還是第一次。汲冢發現的古籍，大部分不久又散失。銀雀山墓葬距秦始皇 34 年（前 213）的焚書時間不過幾十年，距魯國都城曲阜地理位置頗近，但出土這麼多的先秦古籍，卻惟獨沒有儒家的經典，而多為兵書。這對研究先秦史學，評價秦始皇的焚書等，提供了可靠見證。

這一重大考古成就先後被列入“20 世紀 70 年代新中國 30 年十大考古發現”、“20 世紀 90 年代新中國 50 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中國 20 世紀 100 項考古大發現”。這就是銀雀山漢簡永載史冊的光環亮點。

二、陳列調整更新，突現以漢簡兩《孫子》為主題內容的個性特色

1992 年第三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在這裏召開，搞了一次陳列布展。10 年來，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隨着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旅遊業的興起，從陳列內容到形式遠不適應中外游客的需求。因此，借今年漢簡出土 30 周年之機，重新陳列布展勢在必行。這次改陳圍繞《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簡書這一主題，使陳列特色更鮮明，個性更突出。一是陳列內容加以充實擴展。如這次除展示《孫子兵法》竹簡 233 枚、《孫臏兵法》竹簡 222 枚，及其內容、戰例外，同時展示了在銀雀山 1 號墓一並出土的《尉繚子》竹簡 80 枚、《六韜》竹簡 160 枚、《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竹簡 220 枚、《晏子》竹簡 100 枚。為讓觀眾增加簡牘知識，在看完博大精深的銀雀山簡書後，再延伸一下，特增開了簡牘廳，從簡牘的起源與發展，到各地出土的

不同特色的簡牘，可以比較對照，互補鑒賞。這次布展大致增加了 25 項相關內容。二是陳列形式的更新。為增強陳列效果，採取了主副展帶協調配搭；重點文物特寫鏡頭展示；文化氛圍烘托渲染；自動光電語音演示程控裝置現代科技等手段。三是調整陳列格局，充分利用空間，增加了陳列面積。這次陳改受到來自不同觀眾的贊賞。中外學者評價說：“與前相比大為改觀，已達到中等水平（原先初級水平）。”重新布展成功，原因種種，這裏僅列三條：一曰領導重視，財政支持。市委書記、市長擔任組委會主席，現場辦公；市政府常務會議、市長辦公會、市政府協調會多次研究；市財政投入 120 萬元；省、市文化主管部門大力幫助。二曰科學態度。先後有 4 家設計單位設計出 7 套陳列形式方案，我們感覺均不理想，未能達到預想意圖。於是又聘請軍事科學院、軍事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央美院等部門的專家評審、論證、指點，依靠館內業務人員和本市文化系統專家，自行設計，立足本館實際，博采衆長，適當吸取外地經驗，綜合設計出一個新的方案（第 8 套方案）。然後照此方案，經 5 易其稿擬定出陳列大綱，又按 7 個展廳格局分別詳細制定具體內容實施方案。每個展廳經 3—5 次討論修改，最後投入製作。如序廳的陳列，曾先後設計出 13 個圖案，集思廣益，各取所長。以最具代表性的《孫臏兵法》竹簡（原簡放大 16 倍）作為大背景，以孫武、孫臏雕像及兵法為鮮明畫面，以春秋戰國四馬戰車展現歷史時代，較好地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三曰實幹精神。在人員緊、資金緊、時間緊，且不閉館的條件下，全館發揮主觀能動性，超負荷運轉，從實施製作，歷時 70 天完成通常情況下需半年的工作量。一些遊客、專家和領導參觀後稱贊道：“這麼短時間完成這樣全新的陳列，令人驚嘆！”

三、環境整治包裝，構築簡牘兵學文化的空間氛圍

8 月底，市領導來館召開現場辦公會時，院內還是一片雜亂無章的景象。時過 1 個月，領導同志再來時為之一振，昔日的影子一掃而光，代之而起的是耳目一新的面貌：用花崗岩鋪成 3 條石道，一條名曰竹書路，縱貫東西方向，長 50 米，寓意《孫子兵法》5000 言；一條名曰孫武路，南北貫通，同為平行的一條名曰孫臏路，各長 36 米，寓意 36 計。3 條石道獨具匠心，構築了簡牘兵學文化的空間氛圍。加之 1000 平方米的綠地草坪，伴以天工奇石景觀，3500 平方米的仿古建築刷漆一新，迎賓廊南牆 18 個版面“30 年回眸”縮影的點綴說明，形成濃鬱的文化環境。遊客感慨萬千，不由自主地說：秀珍小院，文化包裝，叫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四、整理出版著述，集中展示銀雀山漢簡研究的新成果

自 1972 年銀雀山漢簡問世，1974 年新聞媒體爭先報道，197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綫裝本，30 年間，雖然也陸續發表了一些有關論文，出版了有關著作，但就總體而言，對銀雀山漢簡的學術研究尚顯不足。鑒於此，值漢簡出土 30 周年之際，我們徵集整理出版部分成果，作為獻給“30 周年”的禮物，也想趁機擴大對銀雀山的宣傳，打造文化品牌，顯示文化山、兵學山的神彩。縱觀 30 年歷程，今年的成果勝過往年。一是解放軍出版社等出版《漫話銀雀山》、《銀雀山金雀山西漢墓群》、漢簡本《孫子兵法新譯》、《孫臏兵法新譯》、《絕代兵聖——銀雀山漢墓發掘之謎》等 10 部著述。二是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新華網等十幾家新聞媒體載文報道。三是中央、省、市電視臺進行綜合報道和專題報道，並

刻錄成音像制品。

五、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取“一次會議多項成果”的效能。

由臨沂市人民政府主辦的“銀雀山漢簡兵書出土 30 周年紀念大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改過去常規，不講一般形式的慶典規模，不求人多熱鬧的場面，不搞乾巴巴的學術討論，祇求實效。這次會議緊扣現實主題：銀雀山漢簡兵學文化與入世後的中國經濟。使古老的兵學文化與當今的經濟、社會發展密切聯繫起來，取得了“一次會議多項成果”的效能。成果 1：來自 6 個國家和地區的 70 名代表滿懷激情，雲集銀雀山，提交的論文頗具新意，大會發言高屋建瓴，小組討論暢所欲言。就銀雀山漢簡兵學的研究與應用，確立了與現實結合的新框架，使研究的思路、脈絡更清晰，主題更鮮明，重點更突出。這是理論成果。成果 2：借會議專家學者知名度高、代表性強、聯絡面廣的優勢，成立起“臨沂銀雀山兵學文化研究會”，召開了第一屆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產生了領導機構和理事，並聘請 3 位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本館名譽館長。這些舉措為今後加強同國內外的交流與合作奠定了基礎。這是組織成果。成果 3：圍繞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的創新和發展問題，獻計獻策，達成共識，起草出 3 份有說服力、有影響的建議書。這些建議，不僅僅是對竹簡館的發展，而是對臨沂經濟、文化的發展提出了大思路、大戰略問題。不僅關係到全市，而且關係到全省，乃至全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問題，如全體與會代表聯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轉遞的“將孫子列為世界人物遺產”、“將孫子兵法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書，可謂意義深遠。成果 4：參會代表中有的國外學者兼商家對臨沂作了實地考察，對有些地方的電子科技項目、綠色產品等投資環境表現出極大興致，為今後的經濟協作和項目開發，確立了意向，鋪設了路子。

六、充分看到自身不足和差距，向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設目標奮進

熟悉關心銀雀山的人們，回眸 30 年走過的路，深深感到：這裏曾有過輝煌，也有過遺憾；有過前進，也有過徘徊。在歷數取得的成果的同時，還必須充分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各方面存在的差距。面對現狀，銀雀山漢簡的整理成果，有待充實完善；銀雀山漢簡研究的新成果尚需不斷出現；銀雀山原簡廳和孫子研究院的建設已刻不容緩；銀雀山竹簡館亟待擴建，拓寬發展空間。我們堅信，祇要抓住機遇，堅持不懈地努力，申報世界遺產的工作即可成功。倘若如此，那將對臨沂，對齊魯大地的經濟文化及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帶來生機，產生無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因為齊魯文化，作為魯文化，以孔子為代表，旗子已經打起來了；作為齊文化，以孫子為代表，旗子還沒有打起來，或者說還沒有高高飄揚起來。在世界性“孫子熱”的今天，這面大旗到了該打起來的時候了。我們企盼有更多的漢簡研究新成果面世；企盼銀雀山原簡廳和孫子研究院早日建成；企盼“世界人物遺產——孫子、世界文化遺產——孫子兵法”這一申報工程在不久的將來即成為沂蒙大地上的現實。

有人說：30 年風雨，30 年坎坷，似乎使我們看到了兩次大宣傳，兩次輝煌。上世紀 70 年代算一次，那是歷史遺存、古人留下的輝煌，昔日的輝煌；時過 30 載，新世紀又迎來了一次，這是沂蒙人正在創造着的輝煌，今日的輝煌。

玉門花海出土的《晉律注》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張俊民

2002年6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疏勒河移民安置區，今玉門市花海鄉上回莊西北約2公里的畢家灘對一處分佈在砂梁上的墓羣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小型豎穴土坑墓53座。

出土《晉律注》的墓葬編號為24，位於清理墓羣的中間偏西北的部位，其西北側較為低窪，發掘不久前還有積水。文字是在考古人員清理棺板上覆蓋的芨芨草時發現的。這個墓地的棺板上均覆蓋有芨芨草，但是棺板上部外側有文字卻出乎意料之外。受西北側積水浸泡後的棺板，在乾燥的戈壁灘上，見到太陽後受戈壁灘乾熱風影響，很快爆裂起皮。匆忙之中，考古人員迅速將棺板擡至帳篷內，放在地面上用塑料薄膜覆蓋保存，並通過在周圍地表潑水的方法，保持地表濕度。

6月12日，筆者受命來到考古發掘現場，對棺板上保存的文字進行釋讀。前後用時一周，共錄有文字約5000字。打開覆蓋的薄膜，原本爆裂而卷曲的木皮已經變的較為平整。為防止再度起皮翹起，所以釋文時祇能揭起薄膜的一個小小的角，邊釋文邊覆蓋。釋文首先要小心翼翼地剔去覆蓋在棺板表面的芨芨草，再用毛筆或板刷拂去表面的浮土。根據文字書寫的方向由左向右逐行抄錄。文字除殘損嚴重者外，多數清晰可辨，釋文問題不太大。

棺板上的文字是用毛筆縱行書寫的，書體類似敦煌文書中的寫經體。有烏絲界欄。文字分大小兩種，正文用一般大字，文中使用了比較小的雙行小字夾注。根據文字的清晰與否和烏絲欄的重疊現象，判斷文字原是寫在紙上的。紙張上下疊壓的部位造成了上述現象。就是說文字不是直接寫在棺板上的，而是裱上去的。

M24的棺板從現存大小分析，棺蓋部分應該是由四塊木板拼接而成的，板與板之間用小木棒作暗釘貫穿，拼接後的棺板表面又用當時廢棄的紙張裱了一層，而所用的裱糊棺板的紙張則是《晉律注》。

判斷其為《晉律注》的主要依據是：一墓葬的年代。在 53 座墓葬中共出土 9 塊衣物疏，最早的紀年是建元十六年(358)，最晚的是庚子四年(403)。出土衣物疏表明這些小型土坑墓屬於十六國五涼時代的前涼至後涼時期，與這一時期敦煌、嘉峪關等地出土的大型磚室墓或土洞墓是有差異的。二是棺板文字明確反映出來的“諸侯律注第廿”。《諸侯律注》自然要從《諸侯律》着手去查找綫索。根據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諸侯律》首次在《晉律》中以篇章的名稱出現，並且篇章次第恰恰同《晉書·刑法志》所載《晉律》相合，正好說明棺板上的《諸侯律注》應是《晉律》的《諸侯律注》。晉以後雖也有以《諸侯律》命名的律文篇章，但不是因為時代原因，就是因為篇章次第原因可以排除在外。

因為棺板開裂殘斷，原來在一起的文字部位，或上下分離，或左右錯開。原律文面貌已經十分凌亂，保存下來的文字或多或少。其內容可以判定的首先是《諸侯律注》。《諸侯律注》殘存有數條律的開始部位，每條雖僅僅有幾個字，但是在每條律文開始部位烏絲界欄的上部均有圓點，具體再現了當時律注的格式之一。《諸侯律注》包括諸侯王犯法的處理規定，明確可見者有奪其國、削五分之一和諸侯犯法應免罪等。其次是關於追捕逃亡奴婢的法律和注文：如“誘導奴婢令亡與同罪至斬”、“諸亡相自出他縣變易姓字”等。另外還有捕繫犯人、如何治獄的律文，如何應付臨近地區發出的求救信號的規定。

《晉律注》作為法律文書，在法制史的研究中，可以說填補了考古學上由秦漢法律資料向傳統隋唐文獻過渡的一段空白，為中國法制史發展重要環節《晉律》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另一方面，作為最早發現的紙寫本文書，對於古文獻、古文字學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時代明顯要比新疆吐魯番文書和敦煌文書要早。棺板文字《晉律注》，雖然殘損，但是因為它是現今僅有的流傳下來的最原始律文，足以說明其學術價值的重大。《晉律注》的出土，無疑會對《晉律》乃至整個法制史的研究產生巨大的影響。

如此重要的資料，目前尚面臨着十分棘手的問題。文字釋讀可以說已經解決了，並且經過田野簡單地加固處理，已經移藏室內，但是如何能夠將朽木上的這些資料保存下去，將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希望有志之士，獻計獻策，保護好這難得的“寶貝”。

大庭脩先生的中國簡牘學之路

——悼念大庭脩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2002年11月27日子夜，日本方面傳來消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皇學館大學校長、大阪府立近飛鳥博物館館長大庭脩教授因患急性白血病，醫治無效，於11月27日12時10分溘然長逝。消息傳來，令人震驚悲慟。就是在當年的5月，大庭脩先生還來華參加學術活動，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中日韓古代法制比較學術研討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的津關令”的學術講演，敏捷的思維，簡潔的言辭一如既往。在京期間，他還遠赴西陵實地考察，深入燕下都遺址探訪，興致勃勃，精神飽滿，全然看不出已是一位75歲的老人。時隔半載竟仙逝他界，令人難以置信。

1927年1月，大庭脩出生於日本大阪，三歲喪父，賴母養育成人。高中時代因參加吉田松陰所著《講孟餘話》的讀書班而選擇了學習中國史。^[1]1948年畢業於龍谷大學東洋史研究科，任聖心女子大學講師、副教授。1960年任關西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65年任教授并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1979年以《秦漢法制史研究》一書獲關西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86年以《江戸時代汲取中國文化之研究》^[2]一書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1973年以來，歷任關西大學教養部長、文學部長、圖書館長、理事。1991年至1997年，任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自1994年起兼任大阪府立近飛鳥博物館館長，2000年任皇學館大學校長。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

大庭脩先生是在中國簡牘學領域內頗具影響、成果顯著的學者。

1951年9月，大庭脩先生與藤枝晃先生在京都南禪寺附近的小路上邂逅，他從藤枝晃先生那裏第一次聽到了“居延漢簡”這一名詞，並經藤枝晃先生介紹，參加了以後在漢簡研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居延漢簡研究班，由此開始了他漫長的中國簡牘學之路。

研究班的發起人並主持人森鹿三先生，是日本漢簡研究的創始人。他在1947年11月刊行的《東光》雜誌第二號上發表的《最近中國學術界的動向》一文，第一次向日本學術界介紹了處於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的中國學者研究居延漢簡的情形。該文不僅是森鹿三先生開始研究漢簡的標誌，也是日本漢簡研究的嚆矢，在日本的漢簡研究史上具有深刻的影響。四年後，以他為中心的居延漢簡研究班在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在1951年至1956年的五年間，研究班聚集了貝冢茂樹、藤枝晃、天野元之助、日比野丈夫、米田賢次郎、吉田光邦、岡崎敬、伊藤道治、川勝義雄、宇都宮清吉、大島利一、佐藤長、大庭脩、平中苓次、守屋美都雄、布目潮風、白井太平等人，成為日本漢簡研究學者的搖籃。

研究班最開始使用的讀本是勞榘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石印本），研讀對象是木簡所反映的內容。1953年3月出版的《東洋史研究》第12卷第3號，以“居延漢簡研究特集”為題，刊登了研究班成員的研究成果。像森鹿三的《關雎夫王光》、日比野丈夫的《漢簡所見地名考》、伊藤道治的《居延漢代戰線的展開》、米田賢次郎的《漢代的邊境組織——關於隊的配置》、大庭脩的《論漢代的因功次晉昇》諸文，均反映了研究班第一階段的研讀取向。1957年，伴隨著《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研究班的研讀打破了以往僅據釋文的局限，開始結合文字大小、筆迹及簡的寬窄長短來解讀簡文。二年後因《居延漢簡甲編》的出版，簡牘的出土地也成為解讀簡文的一個要素。在這一根據圖版研讀漢簡的階段中，又有邁克·魯惟一、永田英正、町田章、平岡武夫參與其中。

作為研究班的主持人，森鹿三先生的研究對研究班的成員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1975年，大庭脩先生在《森鹿三先生與木簡研究》^[3]一文中評述了森鹿三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關雎夫王光》、《有關令史弘的文書》可視為歸納法的名篇；在應用研究上，《居延漢簡所見的馬》則可視為特殊之篇，因為它並不是單純挖掘漢簡中所反映的問題，而是尋求漢簡與更廣泛的漢代史料的關係，並在這一關係中處理漢簡；在冊書復原上，《居延漢簡的集成——以第二亭食簿為主》、《關於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居延出土的王莽簡》為其代表作。“我是在森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漢簡研究的”，^[4]在大庭脩先生的漢簡研究中，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他與森鹿三先生的師承關係。

二

大庭脩先生的簡牘研究，若從1951年入京大人文所研究班計起，則終其一生而未間斷。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漢代法律制度研究。其成果主要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

1996年，大庭脩先生在回憶這一時期的研究經歷時道：“我試想用歸納法理解歸納《史記》、《漢書》，特別是《漢書》中的漢代術語。以法制史即法律與制度作為研究課題，其中尚有歷來不明的諸多問題。例如，漢代所謂不道之罪，適用範圍極廣，需要詳細分析其內涵。又所謂遷徙刑之刑罰，同後世的流刑有無異同。還有官吏勤務與休假是何種關聯。官吏遷任時履行何種手續。國內移動時是否需要身份證明，如果需要的話，採用何種格式，由誰簽發等等。這些可以從漢簡與《漢書》中同時覓到資料。”^[5]

這段文字基本概括了他自1953年至1958年間的研究成果。它們是1953年發表於《東洋史研究》第12卷第3號的《論漢代的因功次晉昇》，1954年1月發表於《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第10期的《漢代的關所與通行證》，同年3月發表於《聖心女子大學論叢》第4期的《漢代官吏的勤務規定——以休假為中心》，1955年發表於《東洋史研究》第14卷第1～2號的《漢代的嗇夫》，1957年1月發表於《聖心女子大學論叢》第9期的《關於漢代官吏的兼任》，同年3月登載於《東方學報》京都第27期的《漢律中“不道”的概念》，1958年發表於《聖心女子大學論叢》第13期的《爰書考》諸文。

上述論文中的《漢律中的“不道”概念》與《爰書考》可視為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成果。前者通過分類集成的方法，對泛見於漢代的不道罪的構成要素作了分析，並推測伴隨着法律概念的發達，漢代的不道罪產生了分化，並與唐代的“十惡”發生關聯。因此，還應當等待魏晉南北朝律的真相揭示，思考在漢律中尚無被納入不道罪確證的“惡逆”等罪名，在魏晉律中是如何表現的。1982年他在將該文收入《秦漢法制史研究》時，又增加了補論“漢簡中所見的‘不道’犯事例”。在法制史研究領域內，應當說這是一篇較早廓清不道罪內涵的文章。他的《漢代的遷徙刑》（載《史泉》第6號，1957年）一文，對漢代遷徙刑的分類、適用對象、遷徙地、功用、性質作了梳理探討，也是一篇較有分量的文章。有關爰書的考述，最早見陳槃先生的《漢晉遺簡偶述》之六，^[6]他認為爰書的性質有二，一是自辯書（可以表示不服或申辯），二是證書（單純證明事實）。大庭脩先生的《爰書考》一文在列舉分析了簡牘所出爰書的基礎上，將爰書內涵界定為“向官府申告因私事項的文書均稱爰書，其根據內容冠以‘秋射’、‘自證’等語”，將爰書研究推向深入。

這一時期的論文，都是將簡牘史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研究漢史，而且從題目上亦可一目瞭然，在制度研究上，大庭脩先生的側重點是在法律制度上。關於選擇漢史研究的起因其實非常簡單，這就是他所尊敬的石濱純太郎先生與吉田清治先生曾經評價“內藤湖南先生是偉人”，而內藤湖南先生曾說過“研究中國史，無論上溯還是下延，都以始於漢為宜”。至於在漢史中選擇了法制史，則是出於以下原因：“自不待言，歷史是人類的歷史，但人類制定的官制、法典，終究又因人類而變化消亡，因此倘對這種官制與法典的歷史加以研究，或許多少可以成一家之言”。^[7]1975年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後，在秦漢法制史研究領域已有深厚積澱的大庭脩先生於1977年發表了《雲夢出土竹書秦律研究》（載《關西大學文學論集》27～1）一文，文章在對秦漢律名比較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下見解：秦在六律之外尚有他律，這與漢九章律外亦有他律的情況相同，因此有必要對蕭何作九章律之事再加探討。內田智雄

等人的《譯注晉書刑法志》對“事律”的定義為“是各種制度規定以及對違犯行為的處罰規定”，而秦律中田律等諸律的性質正與事律相同；蕭何從田律等諸律中整理編纂出共通的規定，歸納為興、厩、戶三篇，但其它秦律并未廢止，而是就此繼承下來；是否可以假設秦的追加法稱律，以令名公布追加法創始於漢？在張家山二年律令簡面世的今天，重新審視他的這些見解，確實是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

第二，簡牘文書的研究。其成果主要產生於 20 世紀的 60 至 90 年代。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伴隨着《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及《居延漢簡甲編》的問世，大庭脩先生開始由利用簡牘資料進行制度研究而轉向對簡牘本身的探究。下述文字表達了他對開拓這一研究局面的認識：“我們通過勞幹漢簡圖版之部及甲編照片，對簡牘呈何形狀？是完整的還是斷片？文字在簡牘的什麼位置？已能從較廣闊的角度認清簡文所傳達的意思，而且對勞幹及甲編的誤釋能予以判斷，從此漢簡研究進入了新階段。還有，以前孤立地被對待的簡牘，現在開始認識到，把同筆文字或同質木材的二枚以上簡可續成冊書。也就是說，根據簡牘照片，有些簡牘能復原成冊書，由書寫格式可同類組編。”^[8]因此在這一時期，他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在簡文訂正與冊書復原上。

1975 年他在《森鹿三先生與漢簡研究》一文中梳理簡牘釋文研究史時寫道：“木簡研究原本就是從簡牘釋文開始的。如果說在漢晉木簡研究上功績最大之人，我認為首先就是愛德華·沙畹教授。他的敦煌漢簡研究專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反映了歐洲東方學的水準之高，堪稱不朽之作。其價值所在，不能以某些文字的釋讀多少有誤而以瑕論瑜。然後是根據沙畹氏的照片而產生的羅振玉、王國維兩氏的《流沙墜簡》，堪稱是清朝考據學盛開於木簡之花。我國的敦煌漢簡研究，在初期除書法論說與啓蒙性介紹外，瀧川政次郎博士的《流沙墜簡所見漢代法制研究》可能是惟一的成果。此後關於敦煌漢簡，有勞幹氏的《敦煌漢簡校文》，訂正了沙畹、王國維的釋讀。但王國維、勞幹兩氏是根據沙畹氏的照片進行釋文的，對於沒有照片的簡文，除去相信沙畹的釋文外別無他途。對此，依據木簡實物而訂正釋文的是邁克·魯惟一博士。我也附驥尾而有所拾遺。”大庭脩先生所說的“附驥尾而有所拾遺”，當指 1974 年發表於《關西大學文學論集》(23~1)的《敦煌漢簡釋文私考》一文。1975 年 12 月，睡虎地秦墓竹簡被發掘，1976 年第 7 期的《中國畫報》登載了相關圖版與釋文，大庭脩先生於次年發表了《雲夢出土竹書秦簡研究》(載《關西大學文學論集》27~1)，對釋文提出己見。

事實上簡文訂正與冊書復原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往往是後者的必由之路。因此除上述兩篇較為單純的釋文考證之作外，貫通於他簡牘研究中、後期的冊書研究始終與簡文訂正交匯而行。

這一時期的冊書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1961 年載於《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52)的《居延出土的詔書冊與詔書斷簡》，1963 年載於《史泉》第 26 期的《關於漢代詔書的形態》，1975 年載於《關西大學文學論集創立九十周年紀念號》的《漢代的決事比——關於王杖十簡的排列》，1981 年載於《東洋史研究》(40~1)的《居延新出侯粟君所責寇恩事——爰書

考補》，1984年載於《關西大學文學論叢》(32~2)的《肩水金關出土的永始三年詔書冊》，1985年收入《末永先生米壽紀念獻呈論文集》的《地灣出土的騎士簡冊——〈材官考〉補正》，1986年載於《關西大學論集一百周年紀念特集》的《武威出土的王杖詔書令冊》，1987年載於《木簡研究》第9號的《敦煌凌胡隧出土冊書的復原》，1992年收入《漢簡研究》的《檄書的復原》與《建武五年遷補牒與功勞文書》。

這其中的《居延出土的詔書冊與詔書斷簡》，可視為大庭脩先生冊書研究的開篇之作。他通過集成、歸納、考證等方法，利用8枚簡復原了元康五年詔書冊，使詔書自中央傳達至地方基層的系統與時間得以明瞭，亦使御史大夫的職能得到進一步的明確。更重要的是，像夏至行事之類不為史書記載的漢代社會的日常活動通過詔書得以獲知，從而為瞭解微觀的漢代社會生活提供了生動的認識來源。1991年他在撰寫《漢簡研究》時，在開篇的“漢簡的文書形態”中即以此為例，總結了冊書復原的操作原則，即出土地同一，筆迹同一，材料同一，內容關聯。《漢簡研究》第一篇“冊書研究”所收詔書冊、騎士簡冊、實籍部中冊、檄書、遷補牒及功勞文書，就是循此原則而復原的研究實例。

應當特別提出的是，1961年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復原成功，促使大庭脩先生從古文書學與中國法制史這兩個角度出發，對制詔與漢令的立法程序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1963年發表於《史泉》第26號的《關於漢代詔書的形態》一文，便是通過制詔研究漢令的力作。文章吸納前賢的研究成果，重點論證了漢代的制詔形態，指出其形式可分為三種：一是皇帝以獨立意志下達命令，詔書中附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以稱朕意”等語；皇帝直接行使立法權則使用“著令”、“著為令”等語。二是官僚在權限範圍內提出奏請，其附有皇帝的“制可”。三是皇帝委托官僚立法，是第一與第二形式的複合，其用語有“具為令”、“議為令”、“議著令”等。近30年後，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簡面世，其中《置吏律》219~220簡所載律文，規定了縣道官對律令擁有追加權，但這一權力必須在行政組織的範疇內逐級實現，超越權限則罰金四兩。而《津關令》所收的各條詔令，不僅印證了官員們對律令的忠實執行，也印證了大庭脩先生所提出的制詔形態。

在這一時期，大庭脩先生對簡牘形製及其功能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如1989年載於《中國史研究》第3期的《漢代的符和致》，在某種程度上應當是撰於1954年的《漢代的關所與通行證》的續篇。他認為榮與符互為二事，繡是符的代用物；出土於肩水金關的榮，全部都是關吏的複寫物而非真榮；致是用於短距離外出者的證明，79DMT9·28、562·3、15·18簡或許就是致的實例。1991年載於《書學書道史研究》創刊號的《再論“檢”》一文，受先行研究啟發而就一些疑點闡述了一己之見，其結論為：檢分為物品檢與書信檢兩種。物品檢表明內裝之物，具有禁止窺探內裏的含義；書信檢寫明收信人，其有書署的意味；有封泥的檢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受印的性質。作為《漢簡研究》第六章的《試論文書簡的署名與副署》，則從古文書學的角度審視簡牘文書，探討了各種公文副署的構成，並根據僅存尾部的文書推定了該文書的發文官署。

“地道的考證比高深的理論更有意思。”^[9]這是大庭脩先生步入漢史研究領域後一以貫

之的信念。簡牘文書的研究需要扎實的基礎知識與綿細的考證,更需要甘於寂寞的學術精神。通過梳理他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我們看到了一位學者長期以來在艱辛的治學之路上不改初衷的學術追求。

第三,簡牘與文化史研究。作為文字的書寫材料,從文化史的角度關注簡牘也是納入人們研究視野的一個課題。大庭脩先生的《漢簡研究》第三篇為“研究雜纂”,實際上是從文化史的視野叙及世界範圍內的木簡,書寫材料由木至紙的變化,漢簡與書法史等問題。如第二章《使用紙時期的木》,其主要內容為1964年載於《史林》第1號的《魏晉南北朝告身雜考——從木到紙》一文。文章建立在扎實的誥身研究的基礎之上,^[10]經過比較分析魏晉南北朝時任免官吏的相關程序,指出紙質任命書的規格要高於木,黃色的規格高於白色,白簡規格最低,用於書寫彈劾文章。在木簡與書法方面,他不僅與書法家共同編纂簡牘書法書籍,^[11]還撰文談述利用木簡研究書法應當思考的問題,例如應當將字體與筆法區別對待,有必要思考字體所反映的功能,書寫材料的變化給書法帶來的影響等,表現了如何將簡牘資料正確運用於書法研究的關心。

在此還應當特別提到《漢簡研究》的第六章,即《〈居延漢簡考釋〉之版本與勞榦氏來日》一文。大庭脩先生對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研究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居延漢簡研究的最大之功歸於勞榦氏。他在日軍侵略下的中國,在最惡劣的環境下進行了釋讀一萬枚簡並附考證的研究。在《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圖版二書刊行後,自1944年始,利用漢簡從事研究之勢一發而不可收。”^[12]1955年7月,勞榦先生訪美返臺途徑日本,從東京來到京都,在同志社大學啓真館舉行了題為“關於居延漢簡”的學術講演。時年28歲的大庭脩也參加了這次講演會。時隔30餘年,他在撰寫《漢簡研究》時,先就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的版本及流布作了梳理,隨後回顧了勞榦先生的講演會,並附以兩張記錄當時情形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有不少在今天我們已是熟知或並不陌生的學者:內田智雄、梅原末治、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平中苓次、森鹿三、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狩野直禎、藤枝晃、守屋美都雄、布目潮風、樋口隆康、伊藤道治。在漢簡研究史上,這篇文章所傳遞的信息應當說是相當珍貴的。

三

1967年,大庭脩先生在中日交流史研究領域裏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江戸時代中國船舶來書籍之研究》出版,時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的森鹿三先生聞訊後贊揚“大庭是自開始此項研究以來,鍥而不舍,不改初衷之一人”,“繼承了關西大學‘泊園之學’的傳統”。“泊園之學”是指泊園書院的學術傳統。泊園書院最早是由讚岐儒者東畠先生藤澤甫於文政八年(1825)在大阪開設的私塾,以傳授歷史與文獻尤其是中國傳世典籍為其特色,入門弟子甚多。泊園書院家學綿長,幾代傳人均為學者名流。像第四代傳人黃坡先生藤澤章次郎精通老莊、《左傳》之學,授業解惑深入淺出,深為弟子服膺。大庭脩先生所景仰的石濱純太郎先生以其姊為黃坡夫人之緣,亦在泊園授業。黃坡先生逝世後,泊園後人將二萬餘冊藏

書贈送給關西大學，關西大學為此設立了“泊園文庫”，并以次為契機成立了東西學術研究所。1963年，日本文部省撥款資助石濱純太郎先生主持的科研項目——泊園文庫漢籍調查。當時大庭脩先生作為課題組成員也參加了這一項目，并由此萌發了調查江戶時代中國船輸入漢籍的想法。《江戶時代中國船舶來書籍之研究》便是他四年來潛心調查并研究的成果。^[13]1982年，大庭脩先生應邀訪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相繼做了“江戶時代的日中關係”與“居延漢簡”兩次學術講演。當時有人不解地問：“漢代和日中關係史究竟有怎樣的聯繫呢？”大庭脩先生答道：“居延漢簡與江戶時代長崎貿易文書之間是沒什麼聯繫，但它們都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通過這樣的史料去展現、把握歷史的真實面貌，其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在我看來，這樣的研究其樂無窮。”^[14]

基於對史料的高度重視，尋訪漢簡的第一手資料，追求資料的共享也是大庭脩先生簡牘研究生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51年冬，大學畢業兩年後的大庭脩從東京文求堂書目上看到194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立即向東京方面打長途電話求購此書。當時的日本電話尚未普及，他頗費周折纔打通電話確認訂購，而以快件方式訂購的石濱純太郎先生則因慢了一步而希望落空。事實上當時此書的價格十分昂貴，相當於大庭脩先生月工資的四分之一，他是從供職的學校借錢支付的書款，而償還之款則來自他於兩個月後舉行的婚禮上的賀金。

1972年，大庭脩先生作為英國劍橋大學的訪問教授，對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進行了長達八個月的調查研究。發表於1974年的《敦煌漢簡釋文私考》可視為此次游學的直接成果，而1990年出版的《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則有益於更多的研究者。

1978年10月，從年輕時就希望能來中國留學的大庭脩先生第一次訪華，在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會面的前一天，他與徐蘋芳先生就居延漢簡筆談甚歡，心情愉悅。這是他第一次與神交已久的中國學者當面交流簡牘研究，事後他回憶道：“與互相通過論文文字神交的人會面，馬上就產生了親近之感，我感到友好之情油然而生。”^[15]

1987年6月，第九次訪華的大庭脩先生訪問了當時的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館，廣泛接觸中國簡牘學學者，與中國學術界的同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0年夏，年逾六旬的大庭脩先生與我國學者謝桂華、何雙全自蘭州出發，結伴而行，長途顛簸，前往敦煌、玉門關實地調查，並拍攝了以後飾於《漢簡研究》書首的小方盤城、漢長城、玉門當谷隧等照片。同年的10月、12月，他又兩度訪問臺北，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圍繞漢簡進行一系列的學術活動。1991年夏，第一屆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大庭脩先生組織了日本簡牘學、秦漢史學、書法界的學者參加，再作蘭州——武威——張掖——嘉峪關——敦煌之行。

在大庭脩先生所著的雜筆集《生於昭和的人們》一書中，收錄了一份名為“另一份履歷表——外國旅行記錄”的記錄。該文記錄了大庭脩先生自1972年至1996年的24年間每次出國的時間、地點、目的。瀏覽該記錄可知，大庭脩先生自1978年第一次訪華至1996年，共

25次訪問大陸，9次訪問臺北，大多數是為調查漢簡而行。如果計入1996年至2002年，這個數字應當還會增加。

四

大庭脩先生曾指出：“大學是教育機構，因此大學教員既是研究者，也是教育者。”作為一名長年從事大學教育的簡牘學者，大庭脩先生不僅身體力行從事研究，而且還秉承當年森鹿三先生舉辦研究班的傳統，於80年代中後期在關西大學創辦了漢簡研究會，聚集有志於簡牘研究的學人與學子。研究會儘可能地廣聚人才，“如果是有志者則不問資格”，不問門戶，因此參加者除關西大學的畢業生、研究生、本科生、留學生外，也有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龍谷大學、佛教大學的畢業生、研究生等。研究會利用每周五晚上活動一次，每次採用輪讀的方式逐字逐句研讀簡牘史料，互相切磋，集思廣益。多年來研究會輪讀了居延漢簡、敦煌漢簡、馬圈灣漢簡、尹灣漢簡等第一手資料，近年來還輪讀了《漢書·百官公卿表》。在大庭脩先生的指導下，關西大學漢簡研究會培養出了像吉村昌之、門田明、竊銅昌男等在日本具有一定影響的簡牘學者，編輯出版了《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關西大學出版部，1993年）、《居延漢簡索引》（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年）、《木簡——來自古代的信息》（大脩館書店，1998年）、《漢簡的基礎研究》（思文閣，1999年）等漢簡著述，在日本的漢簡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大庭脩先生也十分關注簡牘學的普及。他曾撰寫了兩部簡牘學的普及性讀物《木簡》（學生社，1979年）與《木簡學入門》（講談社，1984年）。在後者的序言中，他回顧了簡牘研究史的浮沉，認為伴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與中國考古發掘的顯著進展，漢簡研究將迎來一個大發展時期。此書的撰寫目的，即在於為這一時期儲備更多的研究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漢簡及其研究。

大庭脩先生在他的漢簡研究生涯中，還以他的學術地位與影響不斷獲得日本政府的各項研究資助，除此得以訪問大陸與臺灣相關的學術機構外，還多次邀請海峽兩岸的簡牘學學者訪日交流，合作研究。1992年12月，值日本居延漢簡研究四十周年之際，在大庭脩先生的精心組織與各方的努力下，“92漢簡研究國際討論會”在關西大學一百周年紀念會館隆重召開。海峽兩岸學者與日本、英國學者共聚一堂，切磋交流，實現了在“四十年前難以想像”的學術盛事。1994年10月，在中日兩國政府、文博界同行的攜手合作下，在大庭脩先生卓有成效的努力下，“絲綢之路之守護——被埋沒的記錄”，即“中國甘肅簡牘暨古墓文物展”在大庭脩先生任館長的大阪府立近飛鳥博物館舉辦，甘肅簡牘第一次出國展覽，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為更多的人們所認識，中國簡牘的價值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拓展。

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末期，自嘲為“不懂計算機之人”的大庭脩先生，實際上對高科技運用於漢簡研究所能獲得的研究效益具有清醒的認識。1989年，以他為主持人的“利用計算機製作漢代木簡索引的基礎研究”課題獲日本文部省科研資助。課題組吸

納了漢簡研究專家與信息學專家，對約 900 枚敦煌漢簡進行了技術分析與處理，根據其設計思路，利用這一系統，可將漢簡所反映的漢代的人名、地名、官名、年號、成語、慣用語等制成索引。課題組同時又以大庭脩先生復原的居延出土的詔書冊為分析對象，在對其畫像化的基礎上，探討了能够反映簡牘文字特徵與相關簡牘關係的幾何參數。^[16]這一研究為進一步提高漢簡的研究效力做了有益的探索。1989 年底，大庭脩先生在臺北訪問了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簡牘整理小組的劉增貴、邢義田、林素清、蕭璠諸先生會面。3 年後據邢義田先生撰文回憶，“（大庭脩教授）談及紅外線攝影及計算機技術的利用。這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並在管東貴所長的大力支持下，迅速購得 Canon Ci-20RCamere 一套。我們利用這套設備，重新檢查發表的漢簡，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許多過去以肉眼和放大鏡無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在紅外線的幫助下，清晰呈現”。^[17]1998 年 5 月，簡牘整理小組編纂的《居延漢簡補編》出版，圖版中除常見的簡牘圖版外，還附有紅外線攝影圖版。

1997 年，大庭脩先生年屆七十從關西大學退休，同時獲得關西大學名譽教授稱號。隨後進入皇學館大學從事中日交流史的教學與研究，1999 年他以在該領域裏的學術地位與權威性影響，全票當選為該校校長。皇學館大學位於三重縣伊勢市，距大庭脩先生自宅所在地大阪府箕面市有近兩個小時的路程，因此他祇有在周末纔返回家中，平時都是在大學或博物館緊張地工作研究，在近幾年內出版發表了數種有關中日交流史的著述。也許是勞累過度，身體一直十分健康且喜好網球運動的大庭脩先生終於病魔纏身，於 2002 年 7 月入院治療。在住院治療的 4 個月中，他在以樂觀豁達的心態對待疾病的同時，依舊心繫學術，通過電話、信件與學術界保持聯繫，思考今後的研究。以下摘錄的是關西大學漢簡研究會的吉村昌之先生給筆者的電子郵件，它記錄了大庭脩先生作為一名中國史、中國簡牘學學者，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生命的最後軌迹：

11 月 18 日（星期一），病情出現異常。

11 月 20 日（星期三），病情惡化。

11 月 22 日（星期五），先生夫人打來電話。

11 月 23 日（星期六），前去探望。當時精神很好，交談了約一個小時。頭腦一如既往地清晰，承諾為《漢書百官表譯注》撰寫卷頭解說。

然而……^[18]

前幾天看到了先生在住院期間書寫的手稿，其中有 400 頁 200 字稿紙的與“木簡學”相關的內容。手稿幾乎有一本書的份量，……可能是準備出版的著作手稿，好像是在住院期間狀況較好的那一個月寫成的。^[19]

隔海遙祈大庭脩先生冥福。

（特邀中國政法大學徐世虹教授執筆撰寫）

注 釋

- [1] 有關選擇中國史的動因，可參見徐世虹：《大庭脩的學術道路及其漢學研究》，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下卷641～643頁。
- [2] 此書的日文名稱爲：《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研究》。
- [3] 該文爲森鹿三著《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1975年）之解題，後收入大庭脩著《生於昭和元年的人們》，日本同朋舍，1997年1月。
- [4] 《生於昭和元年的人們》，351頁。
- [5] 大庭脩著、陳波譯：《我的漢簡研究四十年——1996年6月在西北師範大學的演講》，《簡牘學研究第二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207頁。
- [6] 撰於1947年，後收入《漢晉遺簡識小七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年。
- [7] 《秦漢法制史研究》書後私語，日本創文社，1982年，675頁。
- [8] 同注5。
- [9] 同注7，674頁。
- [10] 大庭脩先生有關詔書文書的研究有如下成果：《關於龍谷大學所藏吐魯番出土的張懷寂告身》（《龍谷大學論集》359，1958年），《建中元年朱巨奏授告身與唐考課》上、中、下（《史叢》11、12、18，1958～1960年），《唐代告身的古文書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三教壇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1960年），《關於高階真人遠成的告身——遣唐使的告身與位記》（《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論叢》41，1960年），《關於漢代官吏的任命》（《關西大學文學論集》10—1，1960年），《關於敦煌所出張君義文書》（《藏書》20，1961年），《魏晉南北朝告身雜考——從木到紙》（《史林》41—1，1964年），《圓鏡（以卓彌呼爲親魏後王制書）的幾個問題》（《末永博士古稀紀念古代學論叢》，1966年），《顏真卿自書告身》（《書道藝術》3，1970年），《關於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的誥命——我國現存的明代誥敕》（《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4，1971年），《董其昌臨徐浩張九齡告身卷》（《書道藝術》3，1972年）。
- [11] 如與宇野雪村共著《木簡書法》，日本同朋舍1989年出版。
- [12] 同注3。
- [13] 1982年，他將該書中的研究篇進行了修改增寫，撰成《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研究》（日本同朋舍1982年出版）。1986年，他以此書獲日本學士院獎。
- [14]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研究》跋，後收入《生於昭和元年的人們》，424頁。
- [15] 《日中文化交流》（267，1979年），後收入《生於昭和元年的人們》，376頁。
- [16] 參見該課題組研究結項後向日本文部省提交的報告《利用計算機製作漢代木簡索引的基礎研究》。
- [17] 邢義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收入大庭脩主編：《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關西大學出版部，1993年，106頁。
- [18] 收信日期爲2002年11月27日。
- [19] 收信日期爲2002年12月9日。

內容提要

20世紀是簡牘帛書大發現的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來的幾批重大發現，震驚了中外學術界。如今，簡帛研究已成為專門之學，與甲骨學和敦煌學一起被視為國際顯學。為推動簡帛研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曾先後編輯出版了《簡帛研究》一至三輯、《簡帛研究二〇〇二》及《簡帛研究譯叢》一至二輯，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這裏奉獻給大家的《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集中收錄了近年來簡帛研究的前沿成果。本書所收論文，既有微觀的考證，也有宏觀的闡釋，對歷史學、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學科的專家和廣大讀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蔣 輝

封面設計：楊鵬廣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張政烺



ISBN 7-5633-5370-4



9 787563 353705 >

ISBN 7-5633-5370-4/K·307

定价:88.00 元